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中国深宫实录



中国深宫实录

第一章中国历朝皇宫

中国的皇帝以国为家，奄有四海，但他们的主要生活空间却是高墙围起的皇宫。若想了解帝王的生活，首先要从皇宫说起。

皇宫是帝王的居处所在，帝王的住所在其全部生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帝王不是普通人，是被赋予并且自诩为具有神格的人，皇宫便起着把帝王和普通人分隔开来的作用。宫殿雄壮、华丽、肃穆，门禁森严，有着不可替代的象征意义，象征帝王的神圣、威严和神秘莫测。

宫廷苑囿既是帝王生活的主要场所，也是帝王活动的产物。历代帝王，包括创业和守成的，都把营建宫室作为其生活中的重要活动。特别是开国君主，卸身戎马之后，便要立即营建宫室，这是他坐天下的必要工作。

由于不断的改朝换代，两千年来中国古代的帝都分布在六、七个城市中，每一座帝都，都建立了形制、规模相近的皇宫。然而今天人们能够看到的完整的宫殿，只有明清两代的紫禁城和清入关以前的沈阳故宫。中国古代木质结构的宫殿很难保持数百年。这些宫殿最大的天敌就是火，有时一座宫殿刚刚盖成，第二年便被火烧掉了。这些火，或者是由于平日不小心烧起来的、或者是雷电引起的；战争发生时，人为的纵火焚烧宫殿是最为严重的，它标志着居住在宫城里的一姓王朝的失败。

宫，有两个意思，一个指的是单一的一座宫殿；一个指的是由几个或众多宫殿及其附属物组成的宫区、宫殿群。

供皇帝生活听政的宫殿群用高大的城墙包围着，称为宫城。坐北朝南是其一贯的方位。宫城以南北为纵向分为外廷和内廷。外廷是皇帝举行大典，接见群臣，处理政事的地方。外廷由若干个大型宫殿组成，其中最大的一座一般称为“前殿”，是皇帝举行即位、大赦、节庆等大典的地主。外廷的东西两侧是官员办公的低矮房屋。内廷是皇帝上朝前和退朝后日常生活的地方。内廷的东侧是皇太子生活、读书的地方，称为东宫；西侧是皇后、皇太后、妃子们的居住区。古人认为，东象征春天，属阳性，故为太子宫；西象征秋天，属阴性，故为后妃宫。但事实上并非每个朝代都这样严格布置。宫城南北贯穿着一条轴线，两侧排列的宫殿采取大体对称的布局，表现出古人观念中的均衡秩序。明清两代宫城之外，又有一圈包围着它的供王公贵族、高级官员居住的城区，叫做皇城。

一、秦咸阳宫——阿房宫

秦始皇是中国第一个皇帝，他的都城位于现在西安市的西北部。咸阳背靠大山，南临渭河。秦始皇的宫殿几乎铺满了整座城市。气吞山河的始皇帝动用了数百万的劳工为他修建宫室，包括为他修建死后的陵墓，耗费了二十多年时间，直到他死在巡游的路上，庞大的建筑工程仍然没有结束。

据史书上说，秦始皇每吞并一个诸侯国，便令工匠仿照该国的宫室式样，再造于咸阳。将虏获的各国美女、钟鼓，纳入其内。还将收缴的各国兵器销还为铜，铸成各重一千斤的十二个铜人，置于宫中。各宫殿之间用复道相连。复道是封闭的走廊，秦始皇行踪诡秘，一是为保性命安全，再是听信方士的建议匿居深宫，不令外人知晓，冀与仙人往来。

秦始皇构建的宫室，史称遍及咸阳内外二百里，共二百七十座，复道相连。是否确实，不可详考。但阿房宫无疑是最大的宫殿群。建造工程浩大的阿房宫，是秦朝盛极而衰以至灭亡的转折点。阿房宫的建造构想来自于秦始皇炫耀威德的狂热心态。秦始皇在灭亡六国后的第九年，忽觉得咸阳宫太子，无法容纳成千上万的各国旧贵族的朝见，更无以显示新王朝的气魄，遂决定在渭水之南营建朝宫。朝宫规模壮观，阿房宫是整个朝宫的前殿。阿房宫并不是这座宫殿的名字，当时名称未定，因前殿东西北三面以高墙为屏障，当时俗呼为阿城，阿房宫后来便成为这个宫殿群的称谓。阿房宫建筑在高大的台基上，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下两层，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树五丈旗，四周为阁道。以南山为阙（阙即宫之大门）。北阙门为磁石门，此门以磁石构筑，以防止藏甲怀刀的人进入门内。

自咸阳到阿房宫，宫殿一脉相连，中间横渡渭水，如同星象中阁道绝汉抵营室（绝，横渡之意。汉，即银河。营室，星宿名）。这是秦始皇有意为之的。中国古人认为，天国高于人间并和人间一一对应，天帝也有自己的宫殿。星象中的许多星宿，是以宫殿的意义命名的。于是，中国历代宫殿的形制和命名往往与星象有关系。譬如，天上有被认为是天帝寝宫的紫微星宿，那么人间便有紫禁城。

秦宫中，有供皇帝游乐的各种设施，史书记载不详，但也可从中略见一斑。长安宫中有酒池、鱼池。酒池上设有平台，上有肉炙树；鱼池引渭水流柱，可以行船。苑囿中设兽圈、虎圈，供皇帝赏玩。咸阳宫中有一支精巧的机械人乐队，不知是哪位巧夺天工的工匠制成的。这支乐队有十二枚铜人，列坐在一个筵席上，坐高约三、五尺，分别手执琴、筑、竽、笙，身披色彩缤纷的丝缎，宛如生人。席下有铜管，高数尺，其中一个空管，管中贯有一条绳子，旁边立两人，一人吹管，一人扭绳，则琴筑竽笙并作。其效果几乎与真人演奏无异。

秦朝虽然因为大兴土木、滥用民力而灭亡，但秦朝的宫室并不是历史上最为华丽、壮美的，这与当时建筑技术、工艺水平及社会财富的积累有关系。

二、西汉长乐宫——未央宫——建章宫

秦朝二世而亡，项羽的一把毁灭性大火在咸阳连烧了三个月，当年雄视一切的王朝在大火中消亡，秦始皇苦心经营的宫室也被焚毁殆尽。数年之后江山易手刘氏，汉代的开国君主刘邦住进了尚称完好的秦兴乐宫。之后，刘邦开始建筑自己的宫城——长乐宫与未央宫。长乐宫位于长安城的东南角，未央宫位于长安城的西南角。后建的未央宫规模壮丽。当时，刘邦从外还京，见丞相萧何正指挥营建未央宫，刘邦抬眼见工程相当浩大，不禁怒火中烧，质问萧何：“天下匆匆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回答：“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今后世有以加也”。刘邦听后默然，点头称是。萧何道出了宫室之壮丽对于皇帝的意义。

西汉初年的宫廷苑囿，比较而言尚不算奢侈，因而它无法满足好大喜功的汉武帝的需要。于是他大兴土木，增修了明光宫、建章宫，并修缮、扩充原有的宫室。至汉武帝时代，汉代宫室在精美、舒适方面已经超过了秦代，规模较之秦代也不为逊色。

长乐宫，周迴二十余里，有鸿台、临华殿、温室殿及长信、长秋、永寿、永宁四殿。长乐宫的前身是秦兴乐宫，汉高祖刘邦在位时居于此宫。惠帝以后的汉帝居未央宫。

未央宫，周迴二十八里。利用龙首山的地势为台殿，高出长安城。前殿东西五十丈，周围台殿四十三座、宫十三座，池一个。武帝修缮后的未央宫，以香木为栋椽，以杏木作梁柱，门扉上有金色的花纹，门面有玉饰，椽端上以璧为柱，窗为青色，殿阶为红色。殿前左为斜坡，以乘车上，右为台阶，供人拾级。黄金制作的壁带，间以珍奇的玉石，清风袭来，发出玲珑的声响。

未央宫有宣室、麒麟、金华、承明、武台、钓弋等殿，又有殿阁三十二，包括寿成、万岁、广明、椒房、清凉、温室、永延、玉堂、寿安、平就、宣德、东明、飞羽、凤凰、通光、曲台、白虎等。又有天禄阁、朱雀堂、画堂、甲观等。

宣室，为未央宫正堂，是皇帝日常起居的地方。汉文帝曾在这里召见一代名士贾谊，二人盘坐于席上，谈至深夜。作为一名外臣，能在皇帝的居处被召见，实是难遇的恩宠。

温室殿，在未央宫殿北，皇帝冬天取其温暖居于此殿。温室以椒涂壁，再饰一层文绣，以香柱为柱，设火齐屏风、鸿羽帐，地上铺以毛织地毯。

清凉殿，也在未央宫殿北，皇帝夏居之殿。清凉殿以画石为床，设紫瑶帐，殿内盛夏时仍清凉无比，如同含霜。

桂宫，也是皇帝日常居住的地方，位于未央宫北，用紫房复道与未央宫相连。桂宫内有武帝所喜好的四件宝物：七宝床、杂宝案、厕宝屏风、列宝帐。所以桂宫又叫四宝宫。

后宫，在武帝时有八殿，后又增修了十几个殿，有的殿名颇为雅致，如兰林、飞翔、萑若、椒风、蕙草等。除后宫区以外，还有其它藏娇纳艳的地方，如月影台、云光殿、九华殿、鸣鸾殿、开襟阁、临池观。

建章宫本是武帝为求仙所造的，后来也成了选养美女的地方。武帝命将燕、赵地区二十以下、十五以上的美女纳入此宫中，年满三十的出嫁，亡者递补。

建章宫位于长安城外，在未央宫西，跨城池作飞阁，两宫相通，皇帝乘辇往来于两宫中间。建章宫据史书上说有高二十余丈的阙，阙上有铜凤，高大的阙门，迎风而立的铜凤表达着汉武帝要与仙人相见的意愿。宫内建有造仙昂贵的玉堂，阶陛皆为玉造，似乎是准备迎见仙人的场所。

真仙行踪杳然，但铜铸的仙人却每天为武帝服务。建章宫的神明台，高五丈，上有承露盘，一位铜仙人手把铜盘玉盃，以承云表之露。汉武帝以此露和玉屑服之，冀求长生。

除宫室外，帝王的游乐之所——池、台、观、榭也比比皆是。其中著名的有：

池

太液池，在未央宫的西南，建章宫之北。池中刻石为鲸鱼，长三丈。池中筑起三山，象征传说中仙人所居的瀛洲、蓬莱、方丈三仙山。

长乐宫中的酒池原为秦始皇建造。史书中未有对秦始皇在酒池戏谑的记载，却见有汉武帝作乐场面的记载。汉武帝命三千人在酒池牛饮，他在池北的平台上观赏。这三千人，每人用一铁盃饮酒，盃重举不过两次，酒量相当于牛饮水的量。汉武帝看着怪态百出的三千人，品味着作皇帝的威福。

汉昭帝时建淋池。汉昭帝曾在淋池流连忘返，池中生长着一种荷花，一茎四叶，形如骈盖，日光照射时叶片低首，当时称为低光荷。荷花的果实如佛珠，可以佩带，花叶咀之令人口气常香，宫女十分喜爱。每当游宴时，宫女都口含花叶，或折枝蔽日，楚辞称为折芰荷以为衣。昭帝以文梓为舟，木兰为桨，船首刻飞鸾翔鹤。昭帝与宫人终日忘归，乃至通夜。昭帝命宫人歌唱，宫人唱道：“离秋素景泛洪波，谁云好手折芰荷。凉风凄凄揭棹歌，云光开曙月低河。万岁为乐岂为多？”

台

柏梁台，以香柏为梁。汉武帝曾在此置酒，召君臣和诗，能作出七言诗者才能登台。后来形成一种诗体，叫做柏梁体。汉武帝曾召上至大司马下至上林令众官，以各自的职事为内容赋诗。柏梁台诗体共二十六句，一人一句，至倒数第二句时，一位郭舍人赋成“啮妃女唇甘如饴”，出口后方觉得此句涉于猥亵，正不知所措，机智的东方朔马上接一句诙谐的“迫窘诘屈几穷哉”。一首柏梁台诗遂作成，武帝也未介意。

柏梁台上筑有一个史称高三十丈的铜柱，柱顶立一铜铸的仙人，掌托玉盘，离长安二百里犹可望见这一高耸入云的建筑。如史载无误，真是一个奇观。不久，柏梁台遭受火灾，显然是雷电引起的。汉武帝决定重建此台，便召来方士，问如何能避免火灾，方士禀称以水克火，在建筑上安装兴水的象征物螭吻、鸱尾。螭是传说中兴云雨、出入水中的灵物，或说是没有角的龙。鸱是一种鸟，海中有种鱼的尾部似鸱，可以喷浪降雨。从此历代宫廷建筑顶部都设有这两种东西，但火灾仍然不能避免。

灵台，为观天象之所。

秦汉皇宫中，台是很多的。最初台是用来远望，后来宫殿建筑也以台为基。汉代的各种台，有的台上有殿，如渐台、钩弋台；有的便是一种游乐的场所，如斗鸡台、走狗台。

观

观是一种楼台。汉代著名的飞廉观，是用飞廉这种神鸟命名的。据说飞廉能引来风气，铜铸的飞廉在高高的台柱上迎风展翅。可以肯定，飞廉观是

汉武帝常常流连的地方。

宫殿既是皇帝享乐的场所，便有贪于享乐的皇帝去发明别出心裁的宫殿。

汉成帝想追求一种神秘的、梦幻般的又无人知晓的游乐意境，于是在太液池边筑起了一座宵游宫，宫内所有物品都涂以黑色，以利于暗中行动。成帝所喜幸的宫女皆服黑色衣，全身罩上木兰纱绡，进入霄游宫中。宫中灯烛如豆，筵席中、氍毹上，成帝与美人如醉如痴。一番欢娱之后，已夜静更深，美人散去，步不扬尘，一切悄无声息。

汉成帝的另一项发明是飞行殿。汉时轿子还没有问世，出门一般都乘车马。汉成帝设计的飞行殿，结构同于宫殿，长宽各一丈，选禁中卫士肩扛疾行，汉成帝坐在“殿”中，只觉风声灌耳，可知飞行殿移动速度之快。

能够与汉成帝飞行殿比美的是隋炀帝的观风行殿。观风行殿开间为三间，除皇帝外还可容纳侍者数百人，房间可开可合。殿脚设轮轴，但不知是用人力还是畜力推移，据史书称，速度极快，“有若神功”。

三、东汉南北宫

东汉的都城位于洛阳，皇宫分南宫和北宫，分别位于洛阳城南北，中间距离为七里，用复道将两宫连接起来。复道中，皇帝走中道，护从夹护左右，十步一卫。

南宫的正殿是德阳殿，殿高三丈，陛高一丈。殿中可容纳万人。殿周围有池水环绕，玉阶朱梁，坛用纹石作成，墙壁饰以彩画，金柱镂以美女图形。德阳殿高大雄伟，据称离洛阳四十三里的偃师城，可望见德阳殿及朱雀阙郁郁与天相连。

洛阳城外，散布着众多的供皇帝游乐的苑、观。苑有西苑、显阳苑、显明苑、灵昆苑等。其中西苑为最大，游乐设施最俱全。

耽于淫乐的汉灵帝，在西苑筑起裸游馆十间，馆前台阶以绿苔为被，馆之四周引渠水环绕。汉灵帝挑选十四岁以上、十八岁以下的美女在裸游馆长夜饮宴。白日，汉灵帝乘小舟在绕馆的渠水中游荡，选宫女肤白体轻者为其划浆，时值盛夏，汉灵帝故意将小舟捣翻，宫女纷纷落水，他在一旁嬉笑着观赏宫女们水中的玉色肌肤。

汉灵帝在西苑中的游乐项中层出不穷。一度想以骑驴为乐，便将四条白驴御为一驾车，汉灵帝一人操辔、驾驭着四驴车奔驰周旋，在车上乐不可支。

四、唐太极宫——大明宫——兴庆宫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辉煌的时代，作为统治着唐朝的帝王，宫廷苑囿当然也是辉煌的。

唐代在长安有三个宫殿区，即太极宫、大明宫和兴庆宫。这三个宫城不是同时建造的，也不是同时作为帝王生活的中心。

太极宫兴建于隋代，当时称为大兴宫。唐初的两位皇帝主要居住在太极宫。大明宫原是一座避暑用的宫殿，唐高宗中年因患风痹病害怕潮湿，便移住到凉爽干燥的大明宫内，扩建后的大明宫从此成为唐帝王的主要居处。兴庆宫的前身是唐玄宗即位以前的邸宅，唐玄宗即位后，将此地扩建，形成又一个宫殿区。兴庆宫的规模不及太极宫、大明宫，但装修极为华丽。玄宗时成为皇帝听政与生活的中心。

安史之乱中，兴庆宫遭到严重破坏。唐代后朝皇帝一般不居住在这里。

太极宫兴建最早，被认定为正式的宫城。太极宫的正门为承天门，太极宫的前殿为太极殿。每逢元旦、冬至、大赦天下等重大节庆日及外国使臣来会，皇帝便登承天门主持盛典，其间设宴奏乐。太极殿是皇帝朝见群臣、处理政务的地方。

太极殿北门叫玄武门。玄武代表北方，按星象来说，玄武是由北方七个星宿组成的星象。在神话中，玄神是北方之神，是一种龟蛇合体的水神。唐代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李世民夺嫡事件——玄武门事变，就发生在这里。

在唐代，皇宫的内外朝有了明确的区分。太极殿以北、包括两仪殿在内的数十座宫殿构成内朝，是皇帝、太子、后妃们生活的地方。内朝又分为东西两路，东路称为东宫，是太子居住和读书的地方。西路为掖庭宫，是皇帝与后妃们的居住处所。两仪殿是内朝的主殿，居中轴线上，皇帝日常听政也常在这里进行，唐中叶以后，多在这里举办帝、后的丧事。两仪殿之北的甘露殿、神龙殿，是唐中期皇帝常住的宫殿。唐代皇帝的寝殿都叫做长生殿，取其吉祥意义。《长恨歌》中“七月七日长生殿”，是皇帝在华清宫的寝殿。

太极宫内有三泓水池，即东海池、北海池、南海池，为帝王、后妃们泛舟之所。据史书上说，玄武门事件发生时，唐高祖李渊正在池中泛舟。可见唐太极宫的规模很大，在宫北部的海池内，竟然听不到玄武门的动静。

大明宫在太极宫之东，所以又叫东内。大明宫原是太极宫后苑，靠近龙首山，较太极宫地势为高。龙首山在渭水之滨折向东，山头高二十丈，山尾部高六、七十丈。汉代未央宫踞龙首山折东高处，故未央宫高于长安城。唐大明宫又在未央宫之东，地基更高。

大明宫扩建后比太极宫规制更大，又依山而建，雄伟壮丽。大明宫的正殿含元殿，座落在三米高的台基上，整个殿高于平地四丈。远远望去，含元殿背倚蓝天，高大雄浑，慑人心魄。皇帝在含元殿听政，可俯视脚下的长安城。殿前有三条“龙尾道”，是地面升入大殿的阶梯。龙尾道分为三层，两旁有青石扶栏，上层扶栏镂刻螭头图案，中下层扶栏镂刻莲花图案，这两个水的象征物是用来祛火的。

含元殿前有翔鸾、棲凤二阁，阁前有钟楼、鼓楼。每当朝会之时，上朝的百官在监察御史监审下，立于钟鼓楼下等候进入朝堂。朝会进行之际，监察御史和谏议大夫立于龙尾道上层扶栏两侧。

大明宫与其地基龙首山似乎构成一幅龙图，龙首山为头，含元殿坐镇尾

腹，驾馭着巨龙，殿前的龙尾道，阶梯鳞鳞，形似龙尾。

含元殿后的宣政殿，是皇帝日常朝见群臣、听政的地方。宣政殿东西两廊有门，东为日华门，西为月华门，门外是政府办公机关和史馆、书院。含元殿之后的紫宸殿，是皇帝的便殿。皇帝可以在便殿接见重要或亲近的臣属，办理政务。在便殿办公可以免去在宣政殿办公的很多礼节。紫宸殿之后，为大片散落的宫殿群，皇帝可以随意游玩、居住。

大明宫中规模最大的宫殿是麟德殿，它由前、中、后三座殿宇组成，当时又称为“三殿”，面积相当于北京故宫太和殿的三倍。宫中盛大的宴会，多在麟德殿举行。

大明宫内，中轴绕北部为太液池的所在。唐太液池与汉太液池同名，但一个在宫内，一个在城外。唐太液池供帝后荡舟、赏月。池中有凉亭，池的周围建有回廊、殿宇，皇帝也经常以太液池大宴群臣。

唐朝三座宫城之外，又有三座大型苑囿，分别为西内苑、东内苑、禁苑。西内苑在太极宫之北，苑内有宫殿若干，其中弘义宫是李世民为秦王时居住的地方，即位后改名为大安宫。贞观四年，退居太上皇的高祖李渊搬迁到大安宫，贞观九年，李渊病逝于大安宫之垂拱殿。东内苑在大明宫的东南角上。苑内殿有承晖殿、龙首殿，看乐殿、毬场亭子殿；院有灵符应圣院，唐僖宗崩于此处；池有龙首池，引龙首渠水注入，后又将池填平，改建为鞠场。坊有小儿坊、内教坊、御马坊。

三苑之中，禁苑的规模最大。东、西两苑只有方圆一两里，而禁苑地处唐都长安西北部的大片地区，北枕渭水，向西包揽了汉长安城，南接宫城，周迴一百二十里。禁苑中有柳园、桃园、葡萄园、梨园，充满生机。数十座闲雅的小亭散布于苑中，在各个景点附近建有宫殿，供帝后们设宴观景并休息之用。在汉宫阙的遗址上，重建了著名的未央宫和数座亭台。禁苑中还饲养着多种禽兽，皇帝兴之所至，便前来游畋。

五、宋汴京宫室——临安宫室

北宋的都城是汴梁，即今开封，当时称为东京。把汴梁作为帝王皇宫所在地，是从五代的梁开始的，唐、晋继之。北宋的皇宫是仿照洛阳宫殿的模式，在五代旧宫的基础上建造的。

宫城周迴五里。皇宫的正殿叫做大庆殿，是举行大典的地方。大庆殿之南，是中央政府办公机关，二者之间有门楼相隔。大庆殿之北的紫宸殿，是皇帝视朝的前殿。每月朔望的朝会、郊庙典礼完成时的受贺及接见契丹使臣都在紫宸殿举行。大庆殿西侧的垂拱殿，是皇帝平日听政的地方。紫宸、垂拱之间的文德殿，是皇帝上朝前和退朝后稍作停留、休息的地方。宫中的宴殿为集英殿、升平楼。北宋皇宫内的殿宇并不很多，后宫的规制也不很大。后宫有皇帝的寝殿数座，其中宋太祖赵匡胤住的是福宁宫，除后妃的殿宇外，后宫中尚有池、阁、亭、台等娱乐之处。

宋初，皇帝为了表明勤俭爱民和对农事的重视，在皇宫中设观稼殿和亲蚕宫。在后苑的观稼殿，皇帝每年于殿前种稻，秋后收割。皇后作为一国之母，每年春天在亲蚕宫举行亲蚕仪式，并完成整个养蚕过程。

延福宫是相对独立的一处宫区，在宫城之外。延福宫是帝、后游乐之所，最初规模并不大。宋徽宗即位后不满于宫苑的狭小，遂大肆扩建、营造。延福宫扩建以后，幽雅舒适，宋徽宗大部分时间是在这座宫苑中度过的。

延福宫殿、台、亭、阁众多，名称非常雅致，富于诗意，当然是富于艺术修养的宋徽宗所取的。宫的东门为晨晖，西门称丽泽。大殿有延福、蕊珠。东旁的殿有移清、会宁、成平、馥谟、凝和、崑玉、群玉。阁有蕙馥、报琼、蟠桃、春锦、叠琼、芬芳、丽玉、寒香、拂云、偃盖、翠保、铅英、云锦、兰薰、摘玉。西侧的阁有繁英、雪香、披芳、铅华、琼华、文绮、绛萼、琼华、绿绮、瑶碧、清荫、秋香、从玉、扶玉、绛云。在会宁殿之北，有一座用石头叠成的小山，山上建有一殿二亭，取名为翠微殿、云归亭、层岫亭。在凝和殿附近，有两座小阁，名曰玉英、玉润。背靠城墙处，筑有一个小土坡，上植杏树，名为杏岗，旁列茅亭、修竹，别有野趣。宫有右侧为宴春阁，旁有一个小圆池，架石为亭，名为飞华。又有一个凿开泉眼扩建成的湖，湖中作堤以接亭，又于堤上架一道梁入于湖水，梁上设茅亭栅、鹤庄栅、鹿岩栅、孔翠栅。由此到丽泽门一带，嘉花名木，类聚区分，幽胜宛如天造地设。

艮嶽是宋徽宗时建造的又一奇艳的宫苑，可以说巧夺天工、宛若仙境。艮嶽周围十余里，以浙江的凤凰山为蓝本建造，人工堆土叠山，主山万岁山（艮山）设数十个大洞，洞中藏雄黄和卢甘石，雄黄据说可以驱避蛇虫，卢甘石则能发散阴气、聚集云雾，使空气濛郁如深山幽谷。艮嶽中有将太湖石积叠成的各式各样的人造山。苑的中部有景物如药寮、西庄、巢云亭、白龙沂、跃龙峡、蟠秀亭、练光亭、跨云亭、罗汉岩。再西有万松岭，岭畔立一倚翠楼，楼旁平地开凿了两处弯形的水池，东边的叫做芦渚，设浮阳亭；西旁的叫做梅渚，设雪浪亭。池水向东流为雁池，向西流为凤池。池周围有馆、阁、亭数座。万岁山脚下设登道直达山上最高处的介亭，介亭左右各有二亭，左为极目、萧森，右为丽云、半山。从山顶向北可俯瞰景龙江，江水的上流引一支注入山涧。苑的西侧有漱琼轩，山石间错落着炼丹观、凝直观、圆山亭，从这里可以望见景龙江旁的高阳酒肆及清澌阁，江之北岸，小亭楚楚，江水支流流向山庄，称为回溪……

艮岳的建造，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从政和到清康间十余年，各地花竹奇石，都聚于此。其中宣和五年，为运载一具高数丈的山石，动用了上千人，凿河断桥，毁堰拆闸，数月的时间才运到汴京。艮岳中的楼台亭馆，除上述记载外，月增日益，难以数计。徽宗晚年，耽于建造苑囿，以致国力不支。不几年，金人打来，围攻汴京，宋钦宗命取山禽水鸟十余万，尽投之于汴河，拆屋烧火，凿石为炮，伐竹为篋箘，又将苑中数以百千计的大鹿尽杀，作为鼓励士兵的食物。至此，艮岳已不复当年面目了。

南宋建都于临安，即今杭州。临安的宫城，早在北宋时就开始经营了，当时以临安为南京。南宋的宫室最初较为简易，认为汴京之制侈而不可为训。偏安日久，南宋南王日渐耽于歌舞升平的生活，遂不断修葺、增建宫室。

南宋皇宫的正门为丽正门，丽正门装饰华丽，门为朱红色，缀以金钉，屋顶为铜瓦，镌镂龙凤天马图案，远望光耀夺目。丽正门的城楼，是皇帝举行大赦的地方。宫中正殿为大庆殿，又名崇政殿，是举行大典、大朝会之所。大庆殿东西两侧设朵殿，是皇帝举行仪式前休息之所，后改为延和殿，供皇帝便坐视事，即为便殿。規制简朴，陛阶且一级，小如常人所居。垂拱殿是皇帝处理日常政务、召见大臣的地方。紫宸殿用作皇帝祝寿的场所。集英殿则是策试进士的地方。

内朝宫殿有十余座。勤政殿、福宁殿是皇帝的寝殿。慈宁殿、慈明殿是皇太后起居的殿宇，仁明殿、慈元殿等数座宫殿为皇后、嫔妃所居。太子的东宫为了节省，没有另外修筑，而是和帝、后的宫室连为一片。

内朝除宫殿外，堂、阁、斋、楼、台、轩、观、亭，星罗棋布。这是南宋的特点，帝王居处的奢华不表现在宫殿上，而多表现在苑囿上。南宋朝廷借助于临安的山水灵秀，建造了大量的供帝、后闲适生活的场所。后宫及后苑的堂有三十余座，如观赏牡丹的钟美堂，观赏海棠的灿美堂，四周环水的澄碧堂，玛瑙石砌成的会景堂，四周遍植日本罗木建古松的翠寒堂。楼有博雅书楼，观德、万景、清暑等楼。阁有二十余座，其中有源自北宋的龙图、宝文、天章等阁。轩有晚清轩。观有云涛观。台有钦天、舒啸等台。亭有八十座，其中赏梅的有春信亭、香玉亭；桃花丛中有锦浪亭；竹林中有凌寒、此君亭；海棠花旁有照妆亭；梨花掩映下有缀琼亭；水旁有垂纶亭、鱼乐亭、喷雪亭、流芳亭、泛羽亭；山顶有凌穹亭。后苑有各成一景的小园，其中有梅花千树组成的梅冈，有杏坞，有小桃园，等等。禁中还仿照杭州名胜西湖和飞来峰，建造了大龙池和万岁山。

此外，南宋还有许多独立于宫城的皇家苑囿。如聚景园、玉津园、富景园、屏山园、玉壶园、琼华园、小隐园、集芳园、延祥园等。南宋的御园较北宋晚期数量更多、更加兴盛。南宋偏安的一百多年中，各朝帝后游玩、享乐，极尽荣华富贵，过着人间仙境的生活。有诗为证：“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六、元宫城——隆福宫——兴圣宫

气吞欧亚的蒙古帝国，最终选中了燕京作为首都，定名为大都。燕京作为帝王之都，这不是第一次，在蒙古军队打败金人之前，燕京已是全国的首府。战争中，金国的宫室变成废墟，蒙古帝国重又兴建本朝的宫室。经二十余年的兴建，元宫的规制与华美又胜于金代一等。

元代的皇宫以太液池为中心，分三个部分，即大内、隆福宫和兴圣宫。

大内是正式的宫城，宫城呈长方形，长有六、七里，周廻二十里，四隅各有一个角楼。宫城的正门为崇天门，自中南海引出的水渠从崇天门前流过。宫的正殿为大明殿，是举行重大节庆、大朝会的场所。殿内设皇帝与皇后的宝座，元代制度规定，帝、后并坐临朝，大明殿后有寝殿，作为皇帝休息或暂时居住之所。大明殿是整个宫殿中规制最大的一座，装修也最华丽。大明殿的东西分别有文思殿、紫檀殿，后有宝云殿，宝云殿两旁分设钟楼、鼓楼。

大明殿内有两样精巧的东西值得一提。一为灯漏，漏是古代计时用的器具。元宫灯漏用机械控制，上设十二个小木偶人，捧十二个时辰标志，每当时辰交替时，下一个小偶人便从小门中出来，捧着时辰牌，立于御床对面。郭守敬进献给元世祖的七宝灯漏，朝会时陈设于殿中，灯漏中的钟鼓能应时自鸣。另一样精巧的东西是机械控制的笙，笙又与一个机械控制的孔雀相连，笙一鸣则孔雀相应起舞。宴会时此笙又是乐队的首席，笙鸣则众乐齐作，笙止则众乐亦止。

以延春阁为主的后宫区，结构与前廷相似。延春阁为后宫的正殿，阁后有柱廊，柱廊后为七间寝殿。寝宫当时俗称为拿头殿。朱红镶金的窗棂，用玉板明花没纸糊窗，间缀双金花，外罩一层黄油绢幕，油浸过的纸、绢可以透光。冬天则用油皮罩在窗外。殿内遍铺红黄色的厚地毯，寝处屏幢帷幄几重，床上茵褥重叠，上盖纳失失（一种皮褥），纳失失上贴以金花，再熏以异香。后廷的东西两庑有一百七十二间，供嫔妃居住，寝殿与长庑相通。此外，后廷还分布着许多小型的殿阁。

宫城的北门叫厚载门。厚载门建有高阁，四周建旋梯，称为飞桥，舞台与飞桥连接。元顺帝最爱观看十六天魔女的舞姿，每临幸厚载门的高阁时，便命天魔舞女歌舞于旋台上，前面由吹奏乐队导引，自飞桥而升。厚载门外的市民可隐隐听见、望见那里的歌舞景象，宛若仙境。

史载元世祖忽必烈曾命令将塞外的青草植于大内丹墀之前，谓之“誓俭草”，提示子孙勿忘创业艰难，但后世君主却忽视了这些青草，忙于追金逐玉。

太液池的西部，为隆福宫和兴圣宫两个宫区。隆福宫主要供太后居住，兴圣宫主要供太后、皇后、嫔妃居住。嫔妃能够到这里来住，算是宠遇。女性在蒙古族中的地位高于汉族，皇后可与皇帝并坐临朝，后妃可单独占据一两个宫区，而不象汉族皇宫那样，后妃的住所位于遮拦密匝、无人窥视的后宫深处，不与外人相通。而元代的兴圣宫却有文士往来其间，兴圣宫内有奎章阁，选文翰才俊在奎章阁中任学士兼经筵讲官。

太液池水源自京西的玉泉山，太液池俗称海子。池中有小岛名琼华岛，该岛以玲珑石砌为山，元时称为万岁山。据说这些石头取自于宋代的艮嶽。该岛岩洞窈窕，林木郁郁，岛上建有广寒、玉虹等殿。广寒殿是元帝观景、饮宴的佳处。此殿装璜华丽，窗为朱红色，镶以金线，窗楹镂刻云龙图案，

上铺一层黄金。殿内设间玉金花玲珑屏台床，四周排列金红连椅，殿中设一黑玉酒瓮，可贮酒二十余石。殿后有两个石笋，为龙首形状，太液池中的水被抽上来，又从龙嘴中喷出。殿的窗外有露台伸出，旁有一个数丈长的铁杆，上置三个金葫芦，以镇岛下的龙潭。皇帝在琼华岛凭栏四望，视野空阔，前面是瀛洲桥，太液池东西宫殿金碧流辉，回望西山云气，与高大的城阙相接，天宇显得低沉可就，人在一片清虚之中……

太液池中，皇帝与嫔妃泛舟娱乐，中秋之夜泛舟于池上更是美妙无比。元武宗时，中秋太液池上，皇帝与嫔妃乘船赏月，令宫女编为两队，左为凤队，右为鹤团，驾彩帛装饰的采菱、采莲之舟，往来如飞。武帝仰望中天一轮圆月，彩云四合，乃开宴张乐，令宫女们上前起舞，歌一曲“贺新凉”。随后又令两队宫女用水激战，宫女们在各自的船上摆开战场，交战的水柱在月光下如剑戟的寒光。最后，武帝携众女乐们在“龙归洞”歌声中归去。

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工于匠作，曾亲自设计龙舟式样。制成的龙舟，上有穿廊、暖阁、殿楼，全部用五彩金妆。舟身落在龙背上。龙舟在太液池中行进时，龙的头、眼、口、爪、尾皆动。虽然驾船的动力来自水手的篙杆，但远望金光闪跃的巨龙在水上行进，足以令当时的人叹为观止。

七、明清紫禁城

明清两代的皇宫——紫禁城，至今仍保存完好。从构建的技术、艺术水平上讲，紫禁城遥居于历代宫室之上，尽管它的占地面积并不很大。

紫禁城位于都城的正中央，中轴线穿过皇宫的正中，也即是穿过正殿太和殿的正中。紫禁城体现着古代的中央集权观念和均衡意识。它的高大、庄严、肃穆更体现着皇权至上。

天安门（明代叫做承天门）是皇城的大门，雄伟壮丽。进入天安门后，迎面而来的是端门，端门处于皇城的大门与宫城的大门之间，起一种缓冲作用。端门之北，高大的午门矗立着，雄浑凝重。午门是宫城的正门，是宫城中最高大的门座，重大仪式如大赦、献俘在此举行。紫禁城的北门为神武门，东西各为东华门、西华门。

进入午门，建筑物渐趋紧凑。由午门跨过内金水桥，入太和门，抬头便可仰望太和殿。殿前广场空阔，可容纳万人。太和殿是明清两代皇帝举行登基和大节庆（包括元旦、冬至、万寿节等）仪式的地方。太和殿后的中和殿是皇帝在大典之前休息的地方。中和殿后的保和殿，是策试进士的场所，皇帝也常在此接见大臣，举行宴会。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是前朝位中轴线上的三大殿。在太和门两侧，有文华、武英两殿。文华殿在东侧，是进行文事活动的地方，明代文华殿正堂按期举行经筵，由翰林院学士向皇帝进讲经史；文华殿的廊庑，是太子读书的地方。清代废除预立太子制度，文华殿除经筵进讲外，还贮藏书籍。清代重建了文渊阁，贮藏四库全书。太和门右侧的武英殿，也主要作为宫廷文化活动的场所，清廷在武英殿用当时先进的铜活字印刷书籍，称为“武英殿本”，该殿附近有南熏殿，收藏历代帝王与名贤画像。

从保和殿北的乾清门迤北，便进入内朝。乾清宫是内朝的正殿，是明代和清初皇帝的寝殿。乾清宫堂中有一个匾额，上有“正大光明”四个字。清雍正皇帝创立秘密建储法，将预先写好的皇位继承人名字装入密匣，藏于“正大光明”匾后，待皇帝临终时才开匣验看。

乾清宫之北，是皇后居住的坤宁宫。乾以配天，坤以配地。乾清、坤宁分别为帝后的寝殿，象征着天人合一的秩序，也表明皇宫在人间的崇高地位。坤宁宫的东暖阁，是清代皇帝大婚时的洞房，婚期时在这里居住几天，然后皇帝再回到乾清宫。在乾清与坤宁两宫之间，还有一个殿，名曰交泰殿，取天地交泰之意。交泰殿是皇后受贺和举行亲蚕礼的地方。乾隆以后，在这里存放了二十五颗宝玺。

内朝中轴线的两侧分布着十二宫，东六宫，西六宫。分别由太后、嫔妃、太子居住。每个宫又是各自独立的单位。

除上述主要宫殿的组成的大致格局以外，紫禁城内还有难以一一尽数的殿、阁、门，分布有序。

然而紫禁城并不是皇帝唯一居住、生活的地方，尤其对于清代皇帝而言。离宫、苑囿是任何一朝都不可或缺的，明清两代在这方面不逊于任何一代，特别是清代皇帝对苑囿的“需要”更大。清代皇帝每年约三分之二的的时间住在离宫。

明清的离宫苑囿有圆明园、避暑山庄、三海（北海、中海、南海）、颐和园。这当中，只有三海明代已有，其他均为清代所建。这些离宫苑囿令人

能够亲眼目睹、亲身游历，这里就不再详细描述了。

第二章皇帝的早年生活

一、出生在宫中的婴儿

中国绵延几千年的历史中，不断地改朝换代，而每个王朝，又是相类似的。每一个王朝都有自己的开国皇帝。开国皇帝的出身或者是普通农民、豪侠，或者是勋臣、贵戚，或者是外族首领，都要经历一番惊心动魄的政治决战，最终坐上皇帝的宝座，其统辖下的江山便是自家财富了。

王朝的延续要靠血缘世袭维持，开国皇帝要把江山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那么，继开国皇帝以后的君主都是由世袭关系传位的。由此形成了这样一种模式，即每一位君主在有生之年，都要立一个皇子作为太子，太子又叫储君。老皇帝死后，太子即位。如此循环推衍。这也表明，除开国皇帝外，每一个君主一般都是在高墙包围着的宫中生育、长大的。

每一个皇帝最初都是皇子，而且是众多的皇子中的一员。当然也有少数皇帝是以先皇的旁系子孙承统的。一般来说，首先是皇子，才能有资格被选定为太子，也只有太子，才有资格入继大统。

皇子来到人世

皇子的出生及出生前后的情况，对外界来说是一件神秘的事情。一般各代都有这样的规矩，后宫一旦发现怀孕，便为其置办待产和分娩的场所，称为月子房或产阁。南宋宫中规定，后宫怀孕七个月，宫中有关机构（南宋叫门司）置办产阁。照例从内藏库（皇家府库）提取皇帝赐给产妇的物品，包括大量的罗、绢、金、银、日用品、食品。太医局指派产科大小方脉医官，入内廷日夜值班，观察产妇，画出产图，督察膳食部门送来的饮食，指明禁忌品种、备好药材、催生物件。产婆与乳妇也准备就绪，并告知学士院撰写净胎发祝寿文。皇子出生，立即上奏皇帝。

宫中孕妇在妊娠期间要受到特殊关照，这种关照不仅在身体、饮食方面，还包括行为举止。早在周代就已经有所规定了：“王后有身瑞，七月而就蓼室。太史持铜而御户左，太宰持升而御户右。此三月者，王后所求声音非礼乐，则太师抚乐缦瑟而称不习；所求滋味非正味，则太宰荷斗倚升而不敢煎调。”古人认为，约束孕妇的行为举止是一项胎教，胎教对于皇室比之对于民间，更显得重要。未来的人君能在胎中打下遵循礼法的基础，功莫大焉。

历代皇后的受孕和分娩，据说常有神迹出现，这些神迹被传颂于内外，载在史册，而当世人和后人又无法验证。这无非是给皇帝赋予神格，证明他们统御天下的必然性。开国皇帝之母，不是在野外踩大人脚印，便是梦见神、龙、日。后嗣皇帝投胎以至落生也有不同寻常的迹象，只是后嗣皇帝之母生活在宫中，无法到野外踩大人脚印。例如汉武帝之母是这样受孕的：汉武帝父亲景帝曾坐在崇方阁上，见丹霞涌起，赤龙盘旋于栋间，遂将此处作为王夫人的卧房，改名为猗兰殿。后来王夫人在此梦见太阳冲入自己怀中，于是怀胎生下武帝。至于魏文帝曹丕出生时，史载有一团青色云气，圆如车盖，覆在其体上。唐太宗则更加神奇：唐太宗在胎中，便能将声音传出母体之外。分娩时，其母没有任何感觉，而太宗已生出来。这时，空中有祥云弥漫，二龙戏于门外水中，三天后乃冲天而去。宋代仁宗皇帝，更有仙人转世之说。仁宗母李氏梦见一位羽衣仙人，从空中跌足落下，对她说：“来为汝子”。李氏遂孕育仁宗。仁宗幼年时，常常拒穿鞋袜，徒步禁中，禁中人呼为“赤脚仙人”

历代宫中孕妇的分娩过程很难令外界知道，史书记载不详。而契丹人建

立的辽国，对皇后的分娩建立了一套制度，这套制度是和游牧民族的生活相联系的，十分有趣，不妨一闻：

皇后待产时，先造团白毡帐四十九座，皇后在其中最大的一座内待产，其余四十八座内各有角羊一只，一人扭着羊角，另几个人抓住羊的其它部位，等待中间帐内的动静。皇后帐内，分娩在即。翰林院使负责抱住皇后胸部，产婆在下面准备接生，皇后身下铺着甘草苗。分娩之时，皇后痛苦难忍，失声叫喊。这时，四十八座小帐内诸人同时用刀割羊角，四十八只羊一齐痛叫，淹没了皇后的痛叫声。此法旨在用羊代皇后忍痛。皇后帐内若传出生男孩的消息，守在帐外的契丹主便穿上红衣服，令乐队奏乐。皇帝与近臣饮酒庆贺。那些被割伤的羊，不予医治，放归羊群，任其自毙。

由于帝王们嫔妃众多，宫女无数，孕、产都是不时发生，难寻规律，所以宫廷要时时准备办理有关事务。例如明代形成制度，每年每季朝廷都要在民间挑选奶口（乳媪）、稳婆、医婆。

奶口是用来哺乳皇室婴儿的，挑选标准十分严格。明代每季都要精选奶口四十名，养于锦衣卫之奶子府，另外还要选八十名候补奶口，这些奶口随时等待内廷的宣召。如该季已过，奶口没有接到任务，便放归其家。奶子府又重新选一批奶口待命，如此是为了保证以最佳哺乳期的妇女供应宫廷。

入选奶口的年龄规定必须在十五至二十之间，夫男俱全，容貌端正，而且是生完第三胎后第三个月的妇女，还要察看乳汁厚薄，有无隐疾。一旦内庭宣召，便从四十名奶口中选择数名最出众的，用宫妆打扮一番，梳上高髻，换上新衣，送入内廷。内廷审查后，如认为某位奶口不符合要求、或不懂规矩，则退回，奶子府另挑一名补上。

稳婆负责接生，从民间接生婆中挑选技术娴熟、人品端庄者为之。医婆是负责料理产妇身体的精通方脉的妇女。稳婆和医婆靠的是自身的手艺、技术，不同于奶口依赖当时的生理状况，所以稳婆与医婆的选择竞争更为激烈，要知道民间妇女是以入选内廷为荣耀的。一次，内廷招选医婆，一位十五、六岁的女孩应选，考其医药知识，女孩对答如流，原来此女早就研习医术以待朝廷选用。稳婆和医婆进入内廷前，也要宫妆打扮。

在产前几天，这三类妇女要在内廷直房候召，待分娩之际前去伺候。如产出的是皇子，使用生女孩的奶口哺乳；产出的若是皇女，则用生男孩的奶口哺乳。几位奶口先试着哺乳加以比较，一月以后留下一位最佳的奶口，其余送回。医婆和稳婆在产妇月子满后也要出宫，唯独最后选中的奶口作为奶妈长期留在宫中。有的医婆和产婆结识了皇后和嫔妃，日后也常出入宫禁，并获得许多好处。如宋代大书法家米芾的母亲原是产媪，米芾在进士及第前，因母亲的关系当过殿侍。西汉有位相当于医婆的女医淳于衍，为刚生完孩子的皇后诊病，竟接受当朝权贵的收买，下毒害死了汉宣帝的许皇后。

皇帝对生子是十分重视的。任何一位皇帝三十岁过后未有皇子出生，便会忧心如焚，因此无论是皇后还是嫔妃、宫女生育，皇帝往往亲临现场，守在门外。如诞生的是男孩，朝廷便会一片欢腾，皇帝还要举行盛宴，接受大臣们的称贺。或者吉庆之际，厚赐群臣。例如晋元帝时，皇子出生，皇帝赏赐群臣，大臣殷洪乔接受赐品时谢恩说：皇子降生，举国欢庆，微臣没有什么功劳，却得此厚赏！此番迂腐之言，引得晋元帝大笑，说：这事你哪能有功？众臣忍俊不禁。

然而许多寿长的皇帝，在位期间，皇孙已经出生。如清乾隆皇帝晚年已

是五世同堂。许多中年还没能即位的太子，也已经有了子孙。

皇子（女）出生几天后，要用金盆或银盆洗澡，满月剪胎发，百日命名。皇子的名字一般先由文臣拟出。交皇帝定夺，皇子的命名也有或早或迟的。如明代万历皇帝五岁时，其父即位，才得以命名。古人对头发、指甲都相当重视，头发梳理的形状标明一个人的年龄，各朝专设宦官为皇子女修发，明代该机构叫做篦头房，每次剪下的头发，指甲都要保存起来。

大多数的皇帝一出生便被荣华富贵所包围，在一片赞贺声中长大。然而历史上也有一些皇帝是在困境和颠沛中出生、并度过幼年时期的。汉宣帝刘询，出生才数月便遭巫蛊之祸，随父母颠沛流离。刘询又体弱多病，为求其身体结实，父母给他起名病已。不久，父亲史皇孙和母亲王夫人被害，小病已被收入郡邸狱。幸亏负责治狱的丙吉不忍加害，悉心照顾，选用两位女犯人喂养病已。这个幼小的孩子手臂上戴着一个八铢钱大小的宝镜，这是母亲王夫人生前亲手用丝线系上为他祈福的。长大即位后，汉宣帝经常拿出当年的小宝镜，感咽久之……

明孝宗皇帝的身世也十分悲惨。母亲纪氏刚刚怀孕，当时骄宠横行的万贵妃派人送去堕胎药，强令服下。幸亏药量不大，否则孝宗便会死于胎中。孝宗出生在紫禁城外的一个安置病老宫女的地方，名为安乐堂。出生时，头上有一寸左右的地方未长头发，乃是被药打中。母亲纪氏偷偷生下了这个小皇子，但感到危机四伏，在她之前，已有其它宫女所生的数名皇子被万贵妃害死。纪氏日夜惊恐，反复思量，不知如何是好。一天她突然决定让太监将小皇子溺死。太监张敏不同意这样做，而是决定和纪氏一起秘密哺育这个孩子。六个寒暑过去了，皇帝终于知道了这件事情。当时宪宗三十已过，还未得到一个成活的孩子。听说自己已经有了一个六岁的孩子了，十分激动，派内使把孝宗接来。当小皇子向父皇跑去时，背后拖着长了六年的胎发。宪宗把儿子抱在膝上，悲喜交集。

在乳母的怀抱中

皇子（女）出生后，无论生母奶汁如何，都一律由奶妈专门哺乳。皇子（女）一旦离开母体，便不得再接受生母提供的营养。这种截然的中断，恐怕是皇子（女）身体素质差的一个原因。皇家子女比起民间的孩子，体质要虚弱得多，很多皇子（女）在婴幼儿时期便夭折了。例如汉和帝前后十几个皇子，一一夭折；明宪宗长子不满周岁而死；明世宗长子出生两月夭折。中国历史上年龄最小的皇帝——汉殇帝，出生百余日继位，两岁时夭折。

乳母担负着哺育皇子（女）的任务，责任重大。唐玄宗在位时，代宗出生，作为皇孙的代宗单薄瘦弱。玄宗要乳母把皇孙抱来，乳母惶惑不安，不敢将这个瘦小得可怜的孩子抱过来，惟恐玄宗将孩子的瘦弱怪罪于她。没想到玄宗对这个小孙儿喜爱备至，乳母这才松了一口气。

皇子在婴幼儿时期，离不开奶妈和宦官的养育和陪伴。因此古人说皇帝长于妇人和阉寺之手。皇子（女）与父母相处的时间，远远不如与乳母、宦官相处的时间长。皇子在奶妈与宦官的扶持下学会走路，学会说话。宦官教皇子最基本的礼节，平时，陪小皇子玩耍、游戏。在皇帝们幼年天真的岁月里，宦官成为他们最好的朋友。而乳母对于小皇子来说更加重要，哺育、爱抚之中，母子间的依恋情感油然而生。当皇子稍稍长大，不再需要乳母的照顾时，在感情上仍然离不开她。幼年失母的皇子，更是把乳母看作自己的亲生母亲。

皇帝与乳母之间的感情联系是难以割断的。有一个流传千古的故事，生动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汉武帝是一代雄主，晚年因巫蛊之祸害死了太子、孙子、女儿，皇后也被迫自杀，这场祸乱固然出于他的误解，然而也足见其心肠之狠。但他对乳母却不忍伤害。一次，乳母犯了罪，武帝一时气愤，准备严惩。乳母求救于武帝的近臣、智者东方朔，东方朔为她出了一计。乳母按计，在辞别武帝时，几步一回首，作依依不舍状。这时东方朔在旁大声说：你真痴心啊！皇上哪里还记得你的哺乳之恩？武帝见此景，想起与乳母一起生活的日子，望着苍老了许多许多的乳母，悲悯之情涌上心头。于是当下赦免了乳母的罪。

由于乳母在皇帝幼年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即位后的皇帝对乳母的礼遇也是很厚重的。如东汉安帝封乳母王圣为野王君；北魏太武帝生母早死，尊乳母窦氏为保太后，继之文成帝也尊乳母常氏为保太后，次年又尊为皇太后；元文宗封乳母的丈夫为营都王；明永乐帝封乳母冯氏为保圣贞顺夫人；明宣宗封乳母李氏为奉尚夫人；仁宗封乳母为翊圣恭惠夫人；天启帝封乳母客氏为奉圣夫人。乳母们本是民间普通妇人，由于她们哺乳的该童后来当上了皇帝，她们也随之越居万人之上，其家人亦荣华富贵。于是有些乳母以皇帝为靠山，在朝廷内外横行不法，其家人称霸乡里。最甚者是汉安帝乳母王圣与宦官勾结，竟为侈虐，出入宫禁，传通奸赂。其女伯荣被封为中使，气焰逼人，朝廷大臣每见到伯荣的车驾驶来，都要屈身行礼。

在一朝又一朝基本相似的格局中，一代一代的皇子们在深深的宫院中出生、成长。一般情况下，他们不得出宫城的大门一步。他们看不到日出海面、日落西山，看不到遥远的地平线，抬头看到的是高大的、只有飞鸟才能越过的城墙，雄伟肃穆的宫殿。白天和深夜的大部分时间都是静悄悄的，只有黎明和傍晚从宫门传来钟、鼓声，更衬托出内廷的寂寞。这种寂寞，皇子和宫女们、受冷落的嫔妃们是一同体验的。皇子们很少见到父亲，也不能天天生活在母亲身边。皇子们的心灵极为孤寂、脆弱，虚弱的身体也难以经得住疾病和惊吓的打击。宋高宗唯一的儿子赵昀，三岁时卧病在床，服侍他的宫女进屋时不小心踢倒了一只金炉，金炉发出响声，赵昀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所惊吓，病情加剧，不久便重病而死。在那种违逆天性，隔绝人与自然的生存环境中，宫女、嫔妃们难享天年，皇子们夭折也是常有的事。宋真宗六个皇子，最后只剩下仁宗一个；宋神宗十四个皇子，有八个夭折。如果开有一份中国历代皇子死亡率的表格来，比例数定会十分惊人。皇子们成活下来是幸运的，被选立为太子，更是他们唯一的希望。诸皇子当中只有一个最后成为皇帝，其它的皇子便有可能成为新皇帝猜忌的对象，至此他们只希望平安地度过此生。

二、东宫生涯

太子册立

除清代以外（不包括清前期），我国古代各朝都有预立太子的制度。每一个在位的皇帝都要确立一名自己的继承人。预立太子，对于政局的稳定有密切关系。古人甚至认为，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根本一定，方可言他事。气势磅礴的秦王朝，就是在太子问题上没有早定根本，最后铸成大错。秦始皇过于相信长生不老术，没有想到自己会死在巡游的路上。临死前，秦始皇才想到皇位继承人还没有定下来，遂用最后一丝气力，叫丞相李斯、中书令宦官赵高拟定并发下诏书，命扶苏继承皇位。秦始皇一死，赵高便与始皇幼子胡亥共谋篡改诏书，由胡亥即位。结果，秦王朝的江山便落在奸佞赵高及其所控制的冥玩无知的胡亥手中，只三、四年时间，王朝的命脉便被异姓枭雄斩断了。

鉴于秦的失误，各个朝代都十分重视预立太子。帝王们大多广置嫔妃，因此子嗣众多，不少皇帝生育皇子多至数十个。在大量的子嗣中，如何选择一名将来继承皇位的太子，是帝王们最头痛的一件事。根据周代以来的礼法，立太子应该遵照“立嫡立长”的原则。“立嫡”就是要辨明嫡庶之分，嫡是指皇子的生母具有正宫的地位，即皇后；相对来说，庶子便是身份较低的女人所生的皇子。庶子中，宫女所生的皇子比嫔妃所生的皇子，地位更低。“立长”就是要辨明长幼之分，在众多的皇子中，长兄的地位高于诸弟。嫡与长的身份兼具的嫡长子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太子人选。但事实上，要选中一位嫡长子很难，历史上大部分皇太子都不具有嫡长子的身份。除了其它原因外，主要是由于皇帝喜好的偏颇。皇帝对他所生的数名乃至数十名皇子并不是个个宠爱的，皇子们有得宠的，也有失宠的。皇帝周围的人，特别是他的至亲，得宠与否是其荣辱兴衰的决定因素。即使身为嫡长子，也往往得不到父皇的宠爱，而立谁为太子又是由皇帝最后独断的。

一般来说，开国皇帝在立储的问题上比较谨慎并恪守章法。汉高祖刘邦立嫡长子刘盈为太子。刘邦在个人偏好与正统原则之间徘徊多年，内心充满痛苦。刘邦钟情于戚夫人并十分喜爱戚夫人所生的如意，打算废掉刘盈，改立如意。但终于拗不过吕后和大臣们的坚决反对，未能遂愿。当然最后做主的还是他自己，刘邦深感江山得之不易，不能在立接班人的问题上失足。嫡长子在古代家族意识中，确实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唐代的开国皇帝李渊，也恪守立嫡长子的原则，立李建成为太子。李渊将这一原则高擎于具体现实之外，没料到酿成一场惨祸。二儿子李世民发动夺嫡兵变，结果不仅太子被杀，李渊也被迫退居太上皇。

最可怜的是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他即帝位的同时，立嫡长子朱标为太子。二十五年后太子病故。本来皇长子死，便可依次立二儿子，但朱元璋却执意地立皇长孙为皇太孙，把江山传给了这个头骨发育畸形的少年。年幼的皇孙如何控制得了拥兵自重的皇叔们，朱元璋生前始终没有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大多数皇帝在立储上除了分辨长幼以外，都要考虑德与才。小皇子聪颖与否是皇帝们十分注意的，而皇子的聪颖也常常能得到显露的机会。皇帝经常用各种方式试验皇子哪个机智、哪个愚钝。例如晋元帝司马绍年方数岁时，父皇将他抱在膝上，问他太阳与长安哪个远？司马绍回答说：太阳远。没听

说有人从太阳那边来，由此可知。元帝对他的机智很惊异，第二天召集群臣宴会，告诉大家这件事，并当着群臣，再问一遍。晋元帝如是提问，而司马绍却冷不防回答说：太阳近。晋元帝顿时脸色就不自然了，他怕儿子在群臣面前出丑，忙问：你怎么和昨天说的不一样？司马绍镇静地说：抬头能见太阳却看不见长安。晋元帝和群臣大为叹服。司马绍十八岁时被立为太子。

又如梁元帝萧绎五岁时，梁武帝问他：你读什么书？萧绎说：能背诵《曲礼》。武帝说：试试看。萧绎随即背诵了上篇。梁武帝左右的侍从发出惊叹声，武帝亦十分欣喜。

唐玄宗童年时，也有不同寻常的表现。唐玄宗李隆基是武则天的孙子。一次，武则天召诸皇孙坐于殿上，将西国的贡品玉、环、剑、盘列于皇孙们的前后，让他们随意拿取，以观其志。只见众皇孙争相抢夺，纷纷将宝物抓到自己手里，唯独李隆基端坐，丝毫不为所动。武则天见李隆基如此奇异，拍着他的背说：“此儿当为太平天子。”

仁、孝也是确定皇太子人选的条件。宋高宗时，由于皇子夭折，高宗决定选立一名太祖的后裔（宋太宗以弟承兄位，北宋皇帝皆是太宗子孙）。宋高宗从太祖一千六百多名传孙中，选七岁以下的儿童，又经淘汰，最后剩两名，其中一名较为瘦小的，名叫伯琮，便是后来的宋孝宗。高宗开始打算把瘦小的伯琮淘汰掉，留下另一位稍壮实的儿童。这个想法刚一产生便收回了，高宗想仔细观察这两个孩子，他让两人垂手站着，这时一只猫偶然从两个孩子身旁走过，伯琮一动不动，而另一个孩子则伸脚踢了一下猫。高宗见状，看出两人中一个稳重、一个轻狂，遂留下瘦弱的伯琮，把另一个打发走了。伯琮留在宫中养育，但没有马上册封。

几年后，伯琮又遇见一位也作为太子候选人的伯玖，二人都封了王，高宗在立谁为太子的问题上又拿不定主意了。苦思之后，高宗想出了一个办法测试二人。某日，高宗各赐给他们十名宫女，几天以后，高宗又将宫女召回，验身。结果，凡赐给伯琮的十名宫女仍是处女，而赐给伯玖的都已不是处女了。

赵伯琮（立为太子时改名赵昀）在德行上胜过了其他的候选人，赢得了高宗的信任，被立为太子。高宗晚年又将皇位禅让与他。

由于仁孝德行也是选立太子的条件，历史上便出现了伪装操行，争夺太子位者，这种手段也能够奏效。隋炀帝杨广就是用此法夺得太子位的。

本来，隋文帝已将长子杨勇立为太子。杨勇不拘小节，在一些事情上引起隋文帝及独孤皇后的不快。隋文帝的次子晋王杨广觉得有机可乘，便利用一切机会，表现自己的操行高于杨勇。节俭是一项美德，杨广便伪装节俭，车马侍从一概朴素、简单；谦恭是一项美德，杨广每遇见大臣，总显出谦和、恭敬的样子，对于父母派到晋王府办事的宫官、婢女，也都以礼相待。进出都要迎送。在私生活方面，杨广也表现出不好色、不纵乐，只有一个嫡妃，丝竹也落满了灰尘。以上这些，身为太子的杨勇都没有注意到。至于孝顺更是操行的首要方面，杨广就任扬州总管前，与父母辞别，装出一副依依不舍的样子，眼里噙着泪水。结果，杨广以伪善取得了父皇母后的赏识，夺得了太子位。其兄杨勇被废为庶人。

册立仪式

立太子是朝廷的一件大事。礼仪繁缛的中国古代宫廷，册立太子的仪式是一项重大的仪式。

汉代册立皇太子的仪式是这样的：

当日，百官朝集于宫中大殿。负责宫中礼仪引导的谒者引皇太子到皇帝御座前，向北面封御座，司空（三公之一，居相位）立于太子西北处，面向东，宣读皇帝的策书。读毕，中常侍手持太子的玺绶郑重地交与太子，太子再拜三稽首。接着，谒者高声赞道：“皇太子臣某（太子名字）。”另一位赞礼官中谒者应声曰：“可”。册立太子的仪式进入高潮，三公升阶上贺皇帝万岁，皇帝宣布大赦天下。明代册立太子的仪式可以说是历代最为繁琐的。且看明初的一整套仪式：

在册立前一日，宦官在奉天殿（即清太和殿）陈设御座香案，在御座前的大殿正中，安放诏书案、册案、宝案。丹陛之东设临时的册宝亭一座。

参加册太子典礼的赞礼官、百官及其他各色人物都要在前一天排演仪式。授册宝官站于皇太子之东，西向，读册宝官位于授册宝官之北，西向，捧进册宝官位于读册宝官之南，西向。受册宝官内使两人位于皇太子之西，舁册宝亭内官八人位于丹陛册宝亭之东，承制官位于殿内之西，宣制官位于殿门外东北，赞礼两人位于丹陛上之南，知班两人位于丹墀中，纠仪御史两人位于知班之北。知班与纠仪御史俱东西相向。文武百官按班次排列于午门外，文官面西，武官面东。使臣、僧道、耆老侍立于文官之南。负责宫廷事务的文官及负责宫廷保卫的武官按规定位置站立。殿中，诏书、册宝安放就绪，内使监官负责守护。

册立之日，清晨，负责守卫的宫廷武士——金吾卫站列于午门外东西两侧，旗仗布于奉天门外之东西，拱卫司陈仪仗于丹陛之东西及丹墀之东西，陈车辂于文武楼之南，典牧官陈仪仗马于车辂之南，虎豹陈于奉天门外，和声郎置乐队位于丹墀之南。鼓乐与仪仗伺候迎送册宝至东宫。文武百官齐立于午门外。

尚宝卿、侍从侍卫官一同恭敬地在谨身殿奉迎皇帝。皇帝身著最尊贵的礼服——衮冕。太子在奉天门外著冕服侍立。皇帝乘舆自谨身殿前往奉天殿，尚宝卿捧着皇帝的金印，侍仪导引圣驾，沿路警蹕。此时宫廷乐队吹奏雅乐之章，直到皇帝升上御座。四位引导官引皇太子入奉天门，鼓乐齐鸣，太子至殿前丹陛拜位。各赞礼官立于太子左右。赞礼官高喊：“鞠躬！”皇太子再拜。承制官跪向皇帝承制，然后起出立于门外，称：“有制。”赞礼官喊：“跪！”皇太子跪，宣制官宣布：“册长子某为皇太子。”太子在赞礼官引导下俯伏、平身。承制官跪于殿西说：“传制毕”。太子再鞠躬、再拜。赞礼官宣布行册礼，引礼官引太子由殿东门进入殿内，内赞礼官接引太子至御座前拜位。太子在内赞礼官唱：“跪”声中跪下。捧册官于案前跪捧册，授与读册宝官，内赞官宣布读册，读册宝官跪着宣读册书。完毕，以册授与丞相，丞相以册跪授皇太子。太子将册交与身旁的捧受册宝内使。然后，宝按同样程序授与皇太子，太子又交与捧受册宝内使。皇太子在赞引官唱令声中出圭、俯付、平身。以捧册、捧宝内使前导，太子出殿，内使将册宝置于册宝亭匣中。皇太子在丹陛下鞠躬，四拜。内使舁册宝亭前行，皇太子出奉天门。册宝亭在仪仗鼓吹及百官迎送下抬入东宫。皇太子到中宫朝谢皇后。

皇太子接受册立之后，要拜谒宗庙，敬告祖宗。太子在拜谒太庙的沿途，百姓们都要夹道争睹未来天子的仪容。

自此，皇太子作为皇位继承人住在东宫，其他皇子被封王，在宫外各王府居住。

读书生活

历代太子在六、七岁时都要开始读书学习，接受正统文化的熏陶。宫中设立负责教授太子的老师。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教育是极为重要的，相信后天的教育可以造就或改变人的品性、才智。

太子的老师是由皇帝严格挑选出来的学识渊博、德行高洁的文臣。世代研习儒学者最有资格担任太子老师。太子老师称为师保，从职官上讲是六个职位，即：太傅、少傅、太师、少师、太保、少保。傅者，傅之德义；师者，道之教训；保者，保其身体。在实行上，太子并不一定需要那么多导师，一般只任命一、二人。师保与其他辅助官吏一同组成太子官署——东宫官署，师保成为东宫官署的负责人。

用博学而德高的大儒来辅佑太子，是从汉代开始明确下来的。汉高祖时，吕后为了确保太子刘盈的地位，求教于张良，张良出计，请出隐居商山的四个儒老。四个白发苍苍的硕儒簇拥着太子，太子在皇帝眼中及朝野内外，实在是显得益发庄重而不可动摇。汉宣帝时，名儒疏广为太傅，其侄疏受为少傅，太子每上朝进见皇帝，都是太傅在前，少傅在后，皇帝见了十分欣慰，大臣们也都叹服而心向往之。太子师保乃是文臣们十分钦羡的职位。

太子师保的任务一是教授经史，二是在德性上对太子予以规训。平时，作为太子顾问，指点太子在各项问题上的取舍去从。

师保与太子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们要对太子的行为负相当责任。秦国商鞅执政时，太子犯法，理应判重刑，但考虑到太子是未来的国君，不便施刑，便以太子师傅公孙贾和公子虔作替身。宋神宗作太子时，聘请名儒王陶、韩维为太子师傅。神宗赵顼上朝觐见时，行拜礼节奏快了些，显得不够稳重。回到东宫后，韩指出了这个问题，并说：“我来下拜，你跟我学。”于是赵顼亦步亦趋地跟着韩先生学习下拜。一日，近侍给赵顼送上一双弓样靴，韩维见到了，觉得不利于引导太子行止合乎规矩，便讽喻说：“王怎么可以用舞靴。”赵顼顿时面有愧色，立即令手下人将此靴毁掉。

太子的启蒙书籍是《孝经》、《论语》。“孝”是古代人伦体系的出发点，孝道就是幼对长，后世对祖宗的行为准则。《论语》作为儒家观念的汇集，蕴含着帝王的治国方略。在国家最高学府太学的开学典礼——释奠礼上，皇帝或太子要先讲一段《论语》或《孝经》。显然，皇帝或未来的皇帝对经典应该有熟练的掌握程度。除这两部书籍以外，太子的学习书籍还有其它种类。例如汉戾太子刘据行冠礼前就已修过《公羊春秋》和《谷梁春秋》。太子的学习书籍大体可分为经史和帝王规范两类。例如明代所用的书籍为：四书五经、《通鉴直解》、《帝鉴图说》。

书法也是太子学习的一个重要科目。

很多朝代，太子读书由其他皇子陪读。

清代废除了公开预立太子制度，每一个皇子都有可能成为皇位继承人。诸皇子都在宫内读书，从翰林宫中挑选数人作为老师。王公大臣见皇子，都要双膝跪地，而师傅们见皇子，只须捧手为礼，皇子也相对长揖。皇子们入学之日，将书籍笔砚安放桌上，然后行拜师礼。皇子师傅受到的礼遇在大臣中是无以复加的，足以表明宫中尊师重教的程度。

清代皇子们六岁开始就学。每天寅时以前起床，出门时天尚未明，太监提有灯笼在前面引路，走向上书房，寅时开始一天的学习，先温习满蒙文，再练习汉字书法。卯时，师傅到达上书房，教授新课。雍正时规定的汉文功

课为：五经、《史记》、《汉书》，策问、诗赋，诗赋每天必学，因此清代帝王的文学修养很高。

皇子起床上学的时辰与皇帝上早朝的时辰大体相同，申时，皇子们散了学，皇帝也退了朝，皇子们便入宫向皇帝请安。皇帝常常问起今日所学的课程，皇子们都要对答如流。

康熙每日在乾清宫听政，常能听到从乾清宫左侧的上书房传来的皇子们读书声，每逢此时康熙便欣然会心。他曾做诗抒发这种情怀，其中写道：“为声何朗朗，毓德想鱼鱼。教子惭贞观，延师企二疏。”

如果一位太子幼年即位，那么他也要按照顾命大臣及母后的安排，完成他应该完成的学业。

明代几位皇帝幼年时由宦官作文化导师，在宦官的指导下学习。如明英宗的老师是宦官王振，英宗由王振一手培养以至于成年后很多事情都要听王振的意见。明孝宗的老师是覃吉，孝宗九岁开始由覃吉教授四书章句和古今政典，孝宗称他为“老伴”。明神宗的老师冯保被称为“大伴”，冯保对神宗的要求也很严厉，当小宦官引诱神宗玩乐时，见冯保过来，神宗马上正襟危坐，小声说：“大伴来了。”

三、少年天子

太子什么时候即位，取决于其父皇的寿数。历史上只有少数皇帝逾古稀才撒手尘寰，太子即位时已两鬓沾霜。相比之下，幼年即位的皇帝要多一些。就是说，历史上有一些皇帝从孩童时期便开始了帝王生活。

幼年即位的皇帝，在未成年前不能亲政，他们是在母后与顾命大臣的荫护下，辅佑下学习如何作皇帝的。

小皇帝在心理上对母后与顾命大臣很是敬畏，特别是母后，她不仅掌握着对小皇帝的惩戒权，甚至拥有废掉该帝另立他人之权。北魏孝文帝五岁即位，六岁时因小事触怒太后，被幽禁在一间暗室里，哀求太后。东晋成帝即位时也仅五岁，皇太后庾氏临朝称制。晋宗室南顿王被外戚诸庾诛杀，成帝问太后南顿王何罪，太后答称附逆作贼，成帝不满地说：舅舅作贼造反，从何说起！太后怒起，抬手用牙尺打在成帝头上，训道：你怎么说这种话！成帝一句话不说，睁大眼睛看着太后和周围的外戚诸庾。

小皇帝要学会在重大仪式上的各种繁琐的礼仪。在朝会大臣时，要端坐，面部表情要庄重、肃穆，这对于一个天真活泼的儿童来说，无异于一种刑罚，特别是天未明就要起床上朝，更是一件苦刑。

明神宗九岁即位，其母慈圣太后对他的督教很是严格。每得上朝的日子，慈圣太后五更就来到神宗的寝处，叫一声：“皇帝快起来，今日上朝。”然后命宦官们左右扶着神宗的两腋，让他坐起来，睡眼惺忪的小皇帝被宦官强迫着穿衣下床。这时有宦官端来盥洗盆，给他洗脸，洗了脸，小皇帝才醒过神来。不等他迟疑，宦官们已经扶着他出门登车，驶向前朝大殿。此时天尚微明。困乏的小皇帝来到大殿，见百官已经黑压压地站好了，便强打着精神，端坐在御座上。在他宽大的袖袍里，揣着辅政大臣事先写好的纸片，上朝的官员请示问题时，小皇帝使用纸片上的话来回答。

除了每月逢三、六、九日上朝以外，神宗每早要在日出时前往文华殿，听儒臣讲读经书。少憩片时，再御经筵，再读史书。至午膳时才回到内廷。

慈圣太后因生育神宗，由一名宫女升为贵妃，神宗即位她又成了太后。对于儿子，她寄予了极大的希望，要把儿子培养成圣君明主，对儿子的不如意处，则不能容忍。平日，慈圣太后督促神宗读书，一旦发现他因贪玩而误了读书时，便要罚他下跪。一次神宗与宦官们喝酒，喝到兴头，神宗令一宦官唱一曲新歌，该宦官推辞说不会唱，未想到激怒了少年皇帝。神宗醉醺醺地拿过剑，向那名宦官刺去，被众宦官拦住求情，最后割下该宦官的头发作为惩罚。第二天，事情被慈圣太后得知，太后怒不可遏，认为儿子太失体统了，如此怎样成为一个好皇帝？！她立即把神宗叫来，令他跪下，狠狠地斥责了一番，并气愤地说：“你以为皇位非你莫属吗（天下大器，岂独尔可承耶）？”神宗跪在地上，泪流不止。许久才得释还宫。几天后，有人告知神宗，太后令太监冯保到内阁去取《霍光传》，试图效法霍光废昌邑王刘贺的故事废掉神宗，另立潞王。此事虽然没有兑现，但自此神宗心里时时充满恐惧。直到神宗大婚，太后让权，他才敢为所欲为。

明神宗的命运比起历史上许多不幸的小皇帝要好得多。历史上很多幼年即位的皇帝，他们有的终身被母后、权臣、宦官挟持，身心不得自由，甚至被母后、权臣废掉、杀害，有的不幸成为亡国之君，逊位后仍遭杀害。总之，很多幼年即位的皇帝皇祚不长。

那些自即位起便被权臣、母后、宦官挟持的皇帝，自幼养成了不能独断、听任他人摆布的性格。汉灵帝竟然宣称宦官张常侍是我父，赵常侍是我母；唐僖宗称掌权的宦官田令孜为“阿父”。久之，把持朝政者权势越来越大，小皇帝想摆脱别人的控制，实在是一件难乎其难的事。年幼的皇帝力不从心，只好不问政事，虚度岁月，或者寻欢作乐，不求进取。例如汉顺帝先后受制于宦官和外戚。西夏惠宗八岁即位，十六岁理应亲政，而母后梁氏仍不肯放权，还将惠宗一度囚禁。清代同治与光绪二帝，都是幼年即位，都受制于慈禧太后，一个不问政事，自暴自弃，一个始终无法解除慈禧的挟制，郁郁终生。光绪幼年便身体虚弱，每次见到太后都紧张得要命，苍白的脸更加苍白，这弱小的男孩终生在一个老妇人的巨大阴影下生活，是何等悲惨。当年慈禧宣布立四岁的载湉为皇帝时，光绪的父亲、醇亲王奕譞惊哭失声，当场伏地晕厥。回府后愤郁成疾，上疏恳请慈禧不要立自己的儿子为皇帝，疏中说：“忽蒙懿旨下降，择定嗣皇帝，仓猝间昏迷罔知所措，迨异回家，身战心摇，如痴如梦，致触犯旧有肝疾等病，委顿成废。”可见醇亲王已经预知儿子的命运不祥了。

小皇帝不仅有被废的可能，而且有可能遭到弄权者的毒杀。东汉质帝八岁即位，梁太后扶持外戚梁冀把持朝政，梁冀嚣张跋扈，独断专行。质帝少年聪慧，对梁冀深为不满，一次朝会上，质帝眼瞪着梁冀说：“此跋扈将军也！”梁冀怀恨，命手下人在煮饼中下毒。质帝中毒，腹中燥烦，想喝一点水，梁冀在一旁拒绝提供饮水。质帝一句话未说完便气绝。北魏孝明帝六岁即位，十九岁时，其母胡太后仍然专权。孝明帝试图胁迫胡太后放权，却被胡太后用鸩酒毒死。胡太后本是孝明帝的生母，为了权力，竟杀害亲子。然而这并不是历史上唯一的案例，武则天就曾毒死了当时身为太子的李弘，李弘恰是武则天的长子。

不少朝代的末代皇帝都是幼年即位的孩童。汉献帝九岁即位，先为董卓的傀儡，后被各路军阀居为奇货，最后成为曹魏政权的牺牲品。

南朝宋顺帝刘准，也是九岁即位。刘准姿貌端华，眉目如画，见者以为神人。十一岁时被权臣萧道成篡位。篡位当日刘准见内殿陈兵，欲逃无路，慌忙躲到佛盖下，被搜出来时，他两眼含泪问领兵官：“要杀我吗（欲见杀乎）？”对方回答：“只是出居别宫。你家天下便是用此法从司马氏家夺来的（出居别宫耳。官先取司马家亦如此）。”刘准大哭着说：“愿后身世世勿复生帝王家！”刘准被降为汝阴王，不出一年又被杀害。

南梁敬帝萧方智，十二岁即位，十六岁被陈霸先篡位，同样又被杀害。

北齐幼主高恒八岁即位，不到一年，北周宇文氏灭北齐，高恒与其父太上皇被赐死。

北周静帝宇文阐，六岁即位，大权在皇太后之父杨坚手中。宇文阐八岁那年，王朝易姓，北周亡国，杨坚夺位。同年宇文阐死，史书未载明死因。

唐朝的末代皇帝哀帝李祝，十三岁被朱全忠拥立，成为傀儡，十六岁被迫禅位与朱全忠，次年被朱全忠毒死。

五代后周恭帝柴宗训七岁即位，次年发生陈桥驿兵变，赵匡胤被拥立为帝，建立宋朝。柴宗训降为郑王，出居房州。宋太祖较为仁慈，没有杀他。

宋恭帝赵昺四岁即位，五岁时元兵不战而进入都城临安，赵昺被俘。忽必烈封他为瀛国公。后来剃发出家，不知所终。

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的末代皇帝也是一位小皇帝。

四、婚前性启蒙

中国一向注重传宗接代。以一姓血统统治一个王朝的皇家，传宗接代就更为重要了。广衍后嗣就需要早生、多生。当然，帝王们纵情声色，也多以延续后代为藉口。纵享衣食男女之欲本是帝王们打江山、坐江山的一个目的。

皇太子或小皇帝在进入青春期以前就开始接受性启蒙。担任皇帝(太子)性启蒙任务的是宦官。宫中藏有大量的春画。宫中还开辟专殿，内有展示两性交合的壁画和塑像，宦官负责开启殿门。

《万历野获编》记载，明宫内廷有欢喜佛，一说是外国进贡的，一说是元代遗留下来的。“两佛各瓔珞严妆，互相抱持，两根凑合，有机可动”。皇帝大婚前，由宦官导皇帝入此殿，先行礼，礼拜毕，“令抚揣隐处，默会交接之法”。

皇家还煞费苦心地在宫中豢养小动物，用小动物们本能的活动，提示皇帝(太子)两性关系的概念。明代《禁御秘闻》中说：“国初设猫之意，专为子孙长深宫，恐不知人道，误生育继嗣之事，使见猫之牝牡相逐，感发其生机。又有鸽子房，亦此意也。”

因此，各朝代皇帝(太子、皇子)的性活动从未被耽误过。

皇室中男性结婚的年龄一般不超过十八岁，常见的是十三岁至十七岁。然而很多皇帝(太子、皇子)在结婚以前已经“御”过女人了，甚至已经生育子女。例如北魏文成帝十七岁结婚，实际上他十四岁便已经作了父亲。西晋的痴呆皇帝惠帝为太子时，十三岁结婚。在这之前，其父皇派后宫才人谢玖到东宫，教太子以房帷之事，谢氏离开东宫时已经怀孕。几年以后惠帝在父母宫中见到一个孩子，并被告知这是他的儿子。清朝在制度上规定，皇帝大婚之前，先选宫女年龄稍长者八名，供皇帝“进御”。这八名宫女都有名分，被冠以四个宫中女官的职称：司帐、司仪、司寝、司门。这种制度，意在使皇帝在夫妇问题上取得一些经验，在和皇后的生活中能够从容不迫。

一般来说，哪些女人最先与皇帝(太子)发生性关系并没有制度上的规定。对于青春年少的皇帝而言，在性问题上处于被开导而无禁忌的状态。对于太子而言，十四、五岁行冠礼以后，被视为成年，非有皇帝的诏命不得随意出入后宫，以防与妃嫔、宫女发生瓜葛。至于在东宫服侍太子的宫女，太子可以任意猥亵。

那么谁是皇帝或太子的第一个女人呢？从可能性上说，是其身旁的宫女，有些皇帝的乳妈也担任过这一角色。这两种人都属于没有名分的。宫女如果得宠，会取得名分，乳妈会长期出入宫禁，但名分不会更改。

大多数皇帝对于他的第一个女人，感情是不会持久的，浅尝即止，然后转向其他目标。例如明神宗十七岁时，路过慈宁宫，遇见宫女王氏，也许是缘份，神宗竟“私幸”了她。而王氏竟从此有了身孕。象这样重大的事情，太监那里都有案可查。但神宗却从此失去了对王氏的兴趣，倒是抱孙心切的慈圣太后关心这件事。一次，太后提起此事，神宗却装着没听见。王氏的宠遇极短，她所生的儿子同样遭到冷落。然而，明代的另一位皇帝宪宗，却始终依恋他的第一个女人——万贵妃。万贵妃四岁就成为宫女，在英宗的母亲孙太后面中服侍，进入少女时期以后，越发娇艳，加上聪明伶俐，很得孙太后的喜爱，于是成为孙太后身边的“小答应”。英宗的儿子宪宗出生不久便被立为太子，万贵妃被调去服侍太子。宪宗小于万贵妃十七岁，在这个和乳

妈年龄相仿的女子照养下，宪宗逐渐成长为一个少年。天性慧黠的万贵妃不知在何时、用何种方式勾引了少年太子。自此，宪宗对她的依恋更加深了一层，万贵妃充当着情妇和监护人的角色。宪宗对她除了感情和需要以外，还充满了敬畏。宪宗十八岁即位时，万贵妃已经三十有五。在宫苑中，人们常能看到，宪宗的御驾前，有一位肥硕的中年妇人戎服前驱。仗着宪宗对她的尊宠，万贵妃在宫中作威作福，而宪宗即使私幸别的宫女，也要避免让她知道。万贵妃五十八岁时，一次怒打宫女，因身体肥胖心脏负荷量大，加上怒气冲顶，竟一口气没有接上来而猝死。宪宗闻讯后，哀痛发自心底，怅然叹道：“万使长去，吾亦安能久矣！”果然，未出几个月，宪宗在郁闷忧怀中，也随万贵妃长去了。

明熹宗（即天启皇帝）据分析最初与奶妈客氏有过性关系。客氏在明宫中淫乱是有名的。她与熹宗的关系决非一般的奶妈与养子的关系。从下列轨迹中可以看出客氏与熹宗的关系之不寻常，因此可以肯定客氏最先“勾引”了弱冠的熹宗，至熹宗二十三岁死，两人的关系始终暧昧。

首先，客氏和其他奶妈一样，将皇帝喂养大。但皇帝长大以后，就不再需要奶妈朝夕陪伴，而史载客氏“每日清晨入乾清暖阁（皇帝卧室）侍帝，甲夜后回咸安宫”。从照顾皇帝的角度上说，没有这个必要，成年皇帝自有宦官服侍。如果说客氏是由于慈爱每天守着熹宗，那么又和下一个事实相矛盾：客氏后期与魏忠贤私通，一天，她和魏忠贤在太液池上欢饮，这时不远处上树捕鸟的天启帝，忽然跌落，裂裳破面，客氏与魏忠贤却仍在嬉谈笑谑。此时客氏作为一名奶妈可谓玩忽职守了。其次，客氏在熹宗面前不是一副慈祥的母亲形象。客氏四十余岁时，面色仍如二八丽人，而且打扮得与身份极不相符，妖冶艳丽令年轻的宫女瞠目。平时，用宫女的唾液梳发，以保持头发的乌黑光润。再者，客氏先后害死了数个曾被熹宗“临幸”过的嫔妃，例如，张裕妃怀孕临产，客氏竟断绝她的饮食，也不派人接生。张裕妃饥渴难忍，一个暴雨之夜，她匍匐到屋檐下接雨水喝，最后哭喊着断了气。另有皇子三位、皇女两位，皆因客氏而婴年夭折。这与历代后妃间争宠残杀没有什么不同。如果客氏仅仅作为乳母，可以借皇帝的光称霸乡里，任人唯亲，却不必对皇帝的后妃恨之、害之。第四，从客氏与魏朝、魏忠贤的关系上看，客氏是一个性欲极强的女人，上述两个宦官头领入宫前，“净身”做得不彻底。最初，客氏与魏朝私通，后来得知魏忠贤性功能高于魏朝，便又投向魏忠贤，这些事情是在明目张胆中进行的。那么试想，客氏如此求欢于刑余的宦官，对青春年少的皇帝却会无动于衷？客氏常常将龙卵（马的外肾）烹制好了献给熹宗，是为大补，滋补的目的岂能是让熹宗多御几个嫔妃？皇帝多生育子嗣？那又何必予之又夺之？生之又杀之？

第三章 皇后的个性和命运

一、皇帝皇后大婚

皇帝的大婚是与册封皇后同时进行的。在即位前已经结过婚（纳妃）的皇帝一般不再举行大婚仪式，将即位前的太子妃升为皇后，如果皇帝无意将他原在东宫时的正房立为皇后也可以另行选立。对于那些即位前未曾结婚的皇帝，大婚便是一项极为隆重的嘉典了。

皇帝举行大婚的年龄普遍为十六、七岁。决定皇帝何时结婚的是皇太后。皇帝的婚龄并无制度上的规定，皇太后如认为皇帝应该结婚了，便开始为皇帝物色皇后。

皇后是皇帝正式的配偶。在极度重视伦理的中国古代，皇后被赋予女性中至高的形象。天与地，即乾与坤，由皇帝、皇后分别代表。皇帝是天下之“父”，皇后便是天下之“母”。“后”这个词，在夏朝是王的意思，夏禹被称为夏后。从商朝开始，国君不再称“后”，在历史的递嬗中，“后”成了王或帝的配偶的名号。在皇帝家族中，帝后并尊。如能成为皇后，在女性中便是登峰造极了。皇太后是上一个皇帝的皇后或当朝皇帝生母，地位就更高了。

皇后的地位决定了她的吸引力，成为追逐权势的家族追逐的目标。在宫中，宫女与皇后的地位有天壤之别，民间贫穷人家都不愿女儿入选宫中成为宫女。每当皇宫从民间征选宫女时，百姓们都纷纷将女儿嫁出去，生怕女儿选入皇宫，终生禁锢。因此，皇室在宣布征宫女时，先命令民间暂停嫁娶。相反，若是哪家的女儿被选为皇后，对其家族来说真是喜从天降、荣耀无比。当朝的外戚、勋臣以及豪门富室，为了巩固地位，攀缘为皇后，争相将自己的女儿引荐给皇室。不少人家召来相术家，给自己女儿看相，如相出大福大贵来，便将女儿居为奇货。

皇太后在决定皇后的人选中起着关键作用。对于第一次册封皇后的少年皇帝来说，他本人对于未来皇后的决定权很小。只有当他成年后，由于种种原因，才可独断地废掉原有的皇后，另立新后。

太后在物色皇后入选时，有自己的一套标准。在选后之时，她要考虑到皇后的出现会带来新的外戚势力，后族外戚势力的形成势必影响太后族外戚势力。重视权欲的太后，往往不从皇室的利益出发，而为自身家族利益着想。因此，很多太后先从自家亲戚中挑选女子，自家女子成为皇后，便可以避免新的后族势力兴起，就可以保住太后家族的势力。汉高祖的吕后将自己女儿的女儿，即惠帝姐姐鲁元公主的女儿立为惠帝皇后。汉文帝的母亲薄氏将内侄孙女嫁给汉景帝。汉哀帝的傅皇后也是傅太后的自家侄女。东汉和帝的阴皇后也是其太祖母阴氏的自家人。清慈禧太后将自己妹妹的女儿隆裕册封为光绪皇后。在议婚的过程中，光绪已经看中了江西巡抚德馨的女儿，并已由内务大臣奎俊作为中介人。光绪无可奈何地听从了太后的安排，奎俊无法向德馨交代，便将其女聘给了自己的儿子。以上事例，显然构成了近亲联姻，作为与皇帝有一定血缘关系的皇后，其命运大多不幸。

较为公正而谨守礼法的太后，选立皇后时往往重德而不重色，未来皇后的相貌应端庄而不是妖艳，气质应凝重而不是轻佻。如宋仁宗选后时，仁宗欲将他宠爱的张美人立为后，刘太后却觉得此女过于美艳，会引导少年皇帝纵欲，荒废政事，于是淘汰了这位皇后候选人。

宋理宗选后时，候选人中有一名谢氏。谢氏生而黎黑，一只眼睛黑眼珠

上长着白膜。将她选入宫时忽得了一场湿疹，病愈后一层黑皮肤脱落，皮肤变白，又请医生治好了眼病。这种相貌仅属及格。同为候选人的还有一位贾女，容貌很超人，理宗看上了贾氏，欲立她为皇后，这时，太后却说：“谢女端重有福，宜正中宫”。理宗只得听从太后的决策。立谢氏为皇后，贾氏为贵妃。

太后选婚的具体方式各朝不一。明代规定，选挑选一正二副三位淑女为候选人，送交太后前，由太后决定取舍。太后看中哪一位，便用青纱帕罩在该女的头上，再用金玉挑脱系在臂上。不中选的，则将年月帖子放在该女的袖中，给银数十两，立即送还其家。清代太后选婚时，以金如意插在被选定的女子头上，作为标志。参加皇后竞选的女子，即使未被选中，其身价在该地也大大提高，上门求婚者为数众多。

除了太后，权尊势众的辅政大臣为了驾驭年轻的皇帝，也会把自家女孩配给皇帝。西汉上官桀将孙女嫁给汉昭帝，其时，小皇后只有六岁，直至汉昭帝崩逝时，上官皇后也只有十五岁。当初上官桀为了保证小皇后生出皇子来，竟然想出了一个荒唐的办法，让宫女们统统缝紧裤裆（汉宫女裤原为开裆），免得皇帝另有所幸。篡汉的王莽也将自己的女儿立为平帝皇后。

当皇帝尚不能为自己的婚姻做主的时候，立为皇后者，都具有高贵的出身和强硬的靠山，贫寒人家的女儿难以入选。如若一位出身贫贱的女子成为皇后，说明皇帝已经能为自己做主，虽然会遭到来自各方面的反对，最终的决定权在皇帝手里。历史上确实有一些皇后出自贫寒人家。汉武帝的卫皇后本是公主家的歌女。汉成帝赵皇后出生时，父母不愿养育，长大后为歌舞伎。其实，要改变出身微贱并不难，汉成帝欲立赵飞燕时，禀告太后，太后嫌其家微贱，后来成帝得到太后暗示，立即封赵父为成阳侯，几个月后，赵飞燕便以侯爵之女立为皇后。不过，出身贫贱的皇后一般都不是皇帝初婚的皇后，而是以美色打动皇帝，成为第二任或后几任的皇后。

只有明代，“皇明祖训”规定，皇后必须选自民间。意在抑制后族势力嚣张。

皇帝结婚、册立皇后，被纳入到繁缛的宫廷礼仪中。各王朝要通过隆重、庄严、高贵的大婚仪式，为天下树立人伦夫妇的典范。皇帝的婚礼“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共牢而食，合卺而醑，所以合体。同尊卑而亲之，成男女之别，立夫妇之义，而后父子君臣。故曰婚礼者，礼之本也。”在古代浩繁的典制中，详尽地规定了皇帝大婚应遵循的礼仪程序。在这场浩大的礼仪活动中，文武百官都被调动起来，充任皇帝与皇后（家）的媒介。

首先，皇帝要临轩命使，承担大婚的使者必须是高官大僚。唐代由太尉和宗正任正、副使者，皇帝临轩命使的规模相当于大节庆。雅乐悬于殿庭，百官朝集，仪仗就位，皇帝驾临，典仪官指挥百官再拜。正、副使站在规定的地方。皇帝的近侍官侍中宣布：纳某女为皇后，命公等待节行纳采等礼。

使者率随员受命前往女家，站在女家的大门外，女家的主人即未来皇后的父亲立在其家庙或正堂，使者在门外说，“某奉制纳采”，由宾者将此话传给女家主人，女家主人说：“蒙制访，臣某不敢辞。”宾者出来将话传给使者。于是，主人被引导出来迎接使者，使者与随员进入正堂前，按规定的方位站好，使者说，“有制”。即提示对方将要宣布皇帝制书了，主人再拜。使者宣读制书，之后主人再拜稽首。使者从执雁的官员手中取过雁——这是

第一份彩礼，授给主人。然后再交给主人一份答表案，主人应在上面写上对皇帝制文的答文。

纳彩之后是问名。使者又立于门外，令宾者传话：“将加卜筮，奉制问名。”问名是寻问女家的姓名、生辰。宾者传话后，主人按规定的句式回答。按如上方式，使者进入女家，与主人按规定的方位站定，礼仪性地问答一番。随后盥手洗觶，双方以醴相递授，用脯醢行祭礼。礼毕，双方又按规定站好，使者的随员又将一份重礼——币筐，授与主人。

使者回去后，负责占卜的官员对女方的姓名、生辰做出占卜，如结果为吉，那么数日后再行纳吉仪式，即告知女家吉祥，然后再行纳征礼，即正式向女家赠送聘礼。纳征之后，选定大婚的日期，使者再到女家行告期仪式。纳彩、问名、结吉、纳征、告期都有一套大同小异的郑重而繁缛的仪式，每次使者都要宣读皇帝的制书，女家主人也要相应地送上答文。

册后仪式紧接着告期进行，前一日内廷设专人在女家门前和未来皇后阁外住守。当日，正、副使者与内侍、宫廷礼仪官站立在女家门外，女家主人要身穿朝服立于庭阶，使者令宾者传话：“某奉制授皇后备物典册。”主人出迎于门外，再拜，使者不答拜，在谒者的引导下入门，后面跟着持节、持案者。主人与官员们按位次站定，持案者恭敬地将册宝奉授正副使者，使者将册宝传给内谒者监，内谒者监在皇后的阁外跪置册宝于案。女官尚宫等人进入阁中，帮助皇后着装饰首，傅母引导皇后出阁，尚宝引皇后立于庭中，面向北，尚宫跪取册，尚服跑取宝绶，然后按规定方位站立。尚宫称：“有制”，皇后在尚仪的赞导下再拜，尚宫宣读册文，皇帝的册封皇后文写道：

“维某年月日、皇帝使使持节太尉封某司徒封某，册命某官女某氏为皇后，咨尔易阶乾坤，诗首关雎，王文之本，实由内辅。是故皇英嫔虞，帝道以光；太任妣姬，周允克昌，皇后其祗勳厥德，以肃承宗庙。虔恭中馈，敬尽于妇道；帅教于六宫，作节仪于四海。皇天无亲，惟德是依，可不慎欤”。

皇后再拜。尚宫、尚服奉册宝进授皇后，皇后郑重地接过册宝，表明她接受了皇后的地位。皇后将册宝交给司言、司宝收掌。然后在尚仪的赞导下升座，坐北面南，皇后第一次以皇后的身份，接受内官们的稽拜。大婚之日，皇帝身着衮冕、驾到正殿。侍卫环立，文武官五品以上分别立于东西朝堂。使者与诸女官前往女家奉迎皇后。在后家，使者宣读皇帝迎娶皇后的制书，皇后父亲礼仪性地将答表递与使者。使者宣布奉皇帝之命迎接皇后，司言将此话奏闻皇后，皇后再拜。皇后父亲按规定告诫女儿：“戒之敬之，夙夜无违命”。此时，乘舆进到皇后跟前，皇后登上乘舆，车出大门，迎接皇后的卤簿队伍喜庆而庄重地驶向皇宫。

皇帝的婚姻生活便从大婚的当晚开始。尚宫、尚寝在皇帝的寝殿设御幄，御幄位于寝殿东角。地上铺设重茵，四周设屏幃。当晚，尚食率其属官端入饌品，有酱、菹醢、俎、豕俎、黍、稷、稻、果等，食品上各放在匕箸。尚食跪奏饌品准备完毕。皇帝于是揖手请皇后对坐。先行祭礼，即分别将韭菹、擗醢、黍、稷、稻、粱，入祭于豆（祭具）中。然后司饰分别向帝、后奉上手巾，用于饮时擦手用。两位尚食跪着先尝食品，验明无毒，再将黍与黍脊（带骨的肉脯）授与帝后。皇帝与皇后皆食三饭。食毕，尚食二人盥手盥爵，斟上两份酒，进授与帝、后。帝、后先行祭礼，然后行合卺礼。

礼毕，侍者们撤饌。皇帝与皇后准备入寝，尚宫引皇帝入东房，脱下冕服，换上常服。另一位尚宫引皇后入幄，脱衣。然后，皇帝被引入幄内……。

以后数日，皇后要朝见皇太后，接受群臣及命妇的恭贺，入庙行礼。

二、皇后的困境

皇后正位中宫，母仪天下，既具有实在的地位，又具有象征意义。在极重视阴阳夫妇的古代，皇后统率六宫，内辅皇帝，代表着人间和谐与秩序。在宫中，除太后以外，所有女性都应听命于皇后。每月朔望，皇后要在内殿升座，接受嫔妃的参拜。在古代男耕女织的生产分工原则下，皇后作为全体女性的代表，每年都要举行亲蚕仪式，为全国妇女作出象征与表率。所以，皇后的位置是不可空缺的，皇后这一伦理形象也是无人可以替代的。

皇后与皇帝之间的关系有着制度上的维系。那么，二者之间是否有着情爱上的维系？这就显得复杂而微妙了。皇后的命运也各不相同，同样坐在皇后的宝座上，有的形同摆设；有的权焰超过皇帝；有的落寞终生；有的宠遇无匹。

不论是太子时已成婚的皇帝，还是在位时举行大婚的皇帝，他们的第一个正妻都不是自己选定的，而是由他人（父皇、母后、皇太后）包办的。也即是说，绝大多数皇帝的第一个皇后，都是在没有感情基础的情况下配给皇帝的。

自然，皇帝对别人为其选择的皇后，不会很感兴趣。出于对长辈的尊重，皇帝只能接受这种正式的婚姻。皇后们大多出身高贵，甚至与皇帝有近亲关系。在相貌上，未必出众，因为她们是在很小的范围内选择出来的，大多相貌平平，有的还不及于常人，如晋惠帝贾后又黑又丑。由于出身高贵，皇后们在礼仪、学识上的修养很好，但性格不免自奉清高，甚至倨傲，不肯刻意奉迎皇帝，求欢于皇帝；或者以修养掩盖了柔媚、持重代替了娇羞。在这一点上，皇后们比不上嫔妃。具有各色出身的嫔妃（入宫时为宫女），为了获得皇帝的宠爱，搜肠刮肚，不惜任何手段诱使皇帝走向自己。如果她们获得成功，就会使皇帝一时衷情于她，有的会进一步施展各种手段，最终取代原有的皇后。不过，皇后也有她独特的优势，她们作为正妻首先进入皇帝的生活，有更多的机会接近皇帝。

然而，主动权由皇帝掌握，皇后们大多力不从心。普遍情形是，皇帝在礼仪上尊重皇后，在情爱上冷落皇后。作为皇帝的第一位正妻，皇后在感情上往往是不幸的。有的皇后新婚几年中，与皇帝也有过恩爱绸缪、出双入对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接着是无尽的落寞。失宠的皇后，被废的可能性很大。而不少皇后自始至终都未被宠幸过，皇帝对她一贯敬而远之，这些皇后被废的可能性却相对小一些。

对于一个大权在握的皇帝来说，他一旦不喜欢现有的皇后，便有权废掉她而另立她人。废后的事，史不绝书。如果皇帝对皇后没有多少情意而并未将其废掉，那么他是出于以下几种考虑：

废后是朝廷的一件大事，当初立后隆重盛大，皇后的地位是不能轻易动摇的。

废后的根据只能是皇后德行上的缺陷，如果皇后在这方面无可指摘，便很难将其废掉。皇后的持重与正统风范，会使皇帝感到敬重的。所以，尽管皇帝不喜欢她，也难以作出废后的决定。

皇后所生的儿子被立为太子，太子的地位能够保全其母的地位。如汉元帝皇后王氏，失宠多年，却不被废掉，在于她所生的儿子为元帝长子，被立为太子。汉武帝卫皇后色衰失宠，因是太子之母，仍据皇后之位。

皇后尽管在色相上并不很吸引皇帝，但尊重礼法的皇帝都认为，持重、守礼的女人作为皇后是应该的，妖媚的嫔妃们才是自己纵欲的对象，而这种女人又不能放到皇后的位置上。例如明神宗一生笃好笃爱郑贵妃，却没有废掉皇后，由郑贵妃取代。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故事更是帝王爱情生活的一份绝唱，但杨贵妃无论如何得宠，也没有成为杨皇后。

历史上与皇帝有近亲关系的皇后，命运是最无奈的。这些人成为皇后，一般都不是皇帝做的主。古人对近亲联姻虽无厌恶感，但这种亲上加亲的皇后，并不具备足以使皇帝迷恋的美貌。更难办的一件事是，为皇帝生育子嗣，这显然与血缘相近有关。如汉惠帝张皇后，“欲其生子，万方终无子”，武帝陈皇后“十余年而无子”。汉景帝薄皇后“无子无宠”。无子与无宠之间，又有着因果关系，无子而无宠，无宠而无子。他们最初以家族为靠山，日久天长以后，家族零落，皇后们既乏美色又无子嗣，处境更加无奈。

在皇帝的近亲婚姻中，汉武帝的陈皇后还算不幸中的有幸者。有幸、不幸都品尝过。陈皇后名阿娇，是武帝的表妹，幼年时两人就在一起游玩。汉武帝很喜欢这个妹妹，曾表示长大以后，给阿娇建一座金房子住，“金屋藏娇”的典故便出于此。武帝十六岁即位前，阿娇已是武帝的正妻了，即位后，她由太子妃升为皇后。阿娇自幼养尊处优，娇情万端，武帝迷恋于阿娇的这种个性。与她恩爱地生活了十年。这十年中，她享尽了人们至高的富贵与宠遇。然而未能生子成为不可弥补的缺憾。多情又盼子的武帝移情于色艺俱佳的卫子夫，陈皇后的生活一下子阴暗下来。日日形单影只，夜夜寒衾独眠。陈阿娇苦思苦想，如何从卫子夫手中夺回汉武帝的宠爱。这时，一个名叫楚服的巫女来到她身边，教她用巫蛊之术诅咒卫子夫。不料，此事被武帝得知，宫中严禁巫道，陈皇后因此被收回皇后玺绶，罢退居长门宫。

长门宫远离皇帝所住的皇宫。陈阿娇由失宠到被废，乃至终生无法再见到皇帝，她感到自己被彻底抛弃了。现在，不可能再有专宠的希望，只要今生能再见到皇帝就无限欣慰了。她知道汉武帝很喜欢司马相如的赋，当年武帝读到《子虚赋》，称赏不已，感叹自己没能与作者生在一个时代。当她得知作者就是本朝人时，大喜，立即将司马相如征召到长安。陈阿娇认定，要想打动皇帝的心，只有司马相如一支生花妙笔能够帮助。于是，她用重金聘来司马相如。司马相如精心构思，构成《长门赋》。在赋中，陈阿娇婉转悲戚地诉说着她对皇帝的思念：

……愿赐问而自进分，得尚君之玉音。奉虚言而望诚分，期城南之离宫。修薄具而自设分，君曾不肯乎幸临……。

赋中描述了陈阿娇对武帝期待、绝望、再期待的苦情——从白天盼到黄昏，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屋中徘徊，深夜仰望着明月，不能安眠。拿过琴来弹奏，曲调中渗透着悲哀而不同以往，这番愁思已不能再长了。夜长如年没有尽头，郁郁的情怀已不能加重。尽管我如此悲哀，也永远不会忘记皇上的恩情。

武帝看完《长门赋》，虽认为是佳作，但仍旧没有回心转意。陈阿娇至此已无计可施，只能自怨自艾地度过残生。

然而，比起陈阿娇来，历史上自始至终未能得宠的皇后则是更加无奈，转圜的余地更小。历史上最无奈的皇后要数清光绪的隆裕皇后。隆裕是慈禧胞弟的女儿，其貌不扬。据说，光绪幼年初即位时，见到这个女孩子就不喜欢，这恰恰和汉武帝“金屋藏娇”相反。慈禧太后将隆裕硬配给光绪，实在

是双方的不幸。光绪早料知这是一场死亡婚姻，痛苦万分。对隆裕来说，荣华和苦难同时降临，结婚成了寡居的开始。光绪帝、后二人不和，宫廷内人人知道。在权势上驾驭光绪的慈禧太后，也无法令光绪对隆裕产生恩爱。

荒淫无道或者昏聩不经的皇帝，其皇后更有一番说不出的痛楚。

隋炀帝是历史上不多见的昏君，而皇后萧氏却是一个有知识、明义理的女子。她目睹炀帝滥用民力、铺张奢侈、失德于天下的行为，心知其不可，又无法进行规劝。她知道炀帝一意孤行，任何意见都不能接受。于是，她痛心地下写了一篇《述志赋》，以抒发自己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情。隋炀帝在扬州日夜游乐的同时，各地的反叛势力风起云涌。而只顾活一天享乐一天的炀帝，根本不愿知道外面真实的情况。萧皇后忧心如焚。一次一位宫女听说外间人人都要反叛，便告知萧后，萧后把这个消息上奏给皇帝。不断炀帝竟大怒，将该宫女斩首。自此，萧后不再寄希望于炀帝的翻然醒悟，实际上，一切都已来不及了。当有人要报告说宫廷宿卫们也想要谋反时，萧后冷静地说，“天下事一朝至此，势已然，无可救也。何用言之？徒令帝忧烦耳！”国亡势所必然，萧后只能无奈地等待命运的发落。

宋徽宗时，朝廷上下沉浸在一片纸醉金迷的气氛中。徽宗以风雅自赏、挥金如土，奸佞适其所好，推波助澜，嫔妃们争奇斗艳，惟独王皇后始终端庄俭朴。王皇后在压抑与冷落中，默默死去，享年只有二十五岁。

明熹宗昏蒙不辨善恶，乳妈客氏与宦官魏忠贤横行宫中。熹宗皇后张氏欲将客氏绳之以法，反遭客、魏二人的诬陷。张氏忍辱负重，每日以读书、教宫女识字为务，在无奈中打发时光。一次，熹宗到张后宫中，见她正在读书，遂问道：“是什么书？”张后答道，“是《赵高传》”。张后意在讽喻魏忠贤，对于昏蒙的熹宗也只能如此。

三、遭遇废黜的皇后

历史上皇后的数量要比皇帝多出许多。不少皇帝一生前后有几个皇后。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个是皇后早逝，皇帝另立新后；一个就是原来的皇后被废，改立新的皇后。

每一个朝代，都有一批不幸的皇后，从皇后的位置上被迫怆然离去。贵为皇后者，一旦被废，其地位还不如宫女。废了的皇后，或者被幽禁，或者迁往别宫，修行佛、道，或者赐令自尽。

大部分皇后被废的缘由是失宠。任何一个大权在握的皇帝，都不可能将其宠信的皇后废掉，否则便不可思议。只有被曹操挟持的汉献帝，被迫废掉了伏皇后。原因是伏皇后曾写密信与父亲，令其秘密设法除掉曹操。事泄，曹操大怒，逼汉献帝废后，还代写废后的策书，称伏皇后“阴怀妒害，包藏祸心，弗可以承天命、奉祖宗。”

虽然历史上一部分皇后未因失宠被废，但不能否定失宠与被废之间有着因果关系。皇后由失宠而产生怨恨，心怀怨恨的皇后更容易与皇帝发生冲突，触怒皇帝。从皇帝的角度说，皇后失宠就失去了其自身的价值，不再能引起皇帝的兴趣和尊重，等于在皇帝心目中大大失去了份量。加上未能生子，在母以子贵的宫廷中就更得不到皇帝的重视。

得宠与失宠之间，有着天壤之别。一切人的命运都是以皇帝的意志为转移的，尤其是宫中女性，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皇帝的宠遇上。宠遇一旦失去，则别无所求，性命也将难保。《后汉书》的作者范曄深有感慨地论道，“物之兴衰，情之起伏，理有固然矣。而崇替去来之甚者，必唯宠惑乎？当其接床第、承恩色，虽险情赘行，莫不德焉。及至移意爱，析嫌私，虽惠心妍状，愈献丑焉。爱升，则天下不足容其高；欢坠，则九服无所逃其命。”皇后虽是皇帝的正妻，但无固宠之法。皇后的悲剧命运一代一代地重复上演。

皇帝若想废后，当然不能用失宠作根据，这在封建礼法上讲不通。必须找出皇后违反宫禁和重大的失德行为。各朝被废的皇后，多以巫蛊案牵连被废。巫蛊是一种秘术，用神秘而近似荒诞的办法，陈述自己的愿望，诅咒所嫉恨的人。对于一位失宠又无子的皇后，若想保住皇后的地位，夺回皇帝所转移的宠爱，别无妙法，或者是想尽了所有办法均属无效。最后，皇后寄希望于巫蛊秘术，求助于冥冥之中的神灵。然而，宫中是严禁各种邪术活动的，巫蛊案被视为诅咒皇帝的大逆不道的罪行。如果皇后从事巫蛊活动或被诬陷为从事巫蛊活动，一旦定案，便足以构成废后的依据。很多失宠的皇后，都走了这一条自投（被投入）罗网的道路。

如前所述，西汉武帝陈皇后，因巫蛊案发被废。武帝的第二任皇后卫子夫，本是陈皇后的诅咒对象，在皇后位上居几十年，也色衰爱弛，最后因牵连太子的巫蛊冤狱，被废，同时自杀。

东汉和帝阴皇后，因邓女入宫宠衰。阴后要除掉邓氏，没有它法，遂与外祖母在宫中密行巫蛊之事，案发后被废。汉灵帝宋皇后，遭宦官诬陷为扶左道祝诅，被废。其真实背景是宋皇后本来无宠，而此时宦官王甫误杀了渤海王及其妃宋氏，恐宋皇后追究此事，王甫与其同谋者遂诬陷宋皇后，置宋皇后于死地，使自己逃脱罪责。

唐高宗的原皇后为王氏。王氏的第一个劲敌是萧氏。王氏看到萧氏得宠，恃宠而骄，十分气愤。为了排挤萧氏，王氏费尽心机地想出了一个蠢主意，

王氏知道高宗对太宗的才人武媚（即武则天）很有好感，武媚当时正在感业寺修行。王皇后将武媚接到宫里来，企图用她分解皇帝对萧氏的宠爱。果然，武媚一来，皇帝就顾不上萧氏了。王皇后原以为，自己主动将武媚送到高宗面前，武媚能对自己感恩，然而没有料到，未出几年，武媚又要与她争夺皇后的位置了。高宗本来是个懦弱、没有主见的人，他对武媚爱恋中又有几分畏惧，对武氏的话当然计从，但是，武媚若想替换王氏为皇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废立皇后仅次于废立太子，关系极为重大。再者，王氏本是太宗亲自为儿子选定的，太宗临终时嘱托大臣，好好照顾这一对佳儿佳妇。

武则天为使高宗废掉王皇后，首先使出了一招毒计，她不惜以自己女儿的生命为代价，诬陷皇后。小公主刚刚生下来几个月，皇后十分喜爱，常去看顾。一次，王皇后刚来看过小公主，武则天见王皇后离去，便狠心地掐死了女儿，盖在被子下面。高宗过来，武氏故意和高宗谈笑甚欢，然后走过去，揭开女儿的被子，脸上大惊失色，又惊问左右谁来过？宫婢们说皇后刚刚来过。武氏计成，遂泪流满面，悲痛不已。被蒙骗的高宗怒火中烧，气愤地说，“皇后杀了我的女儿！过去她与萧氏互相诋毁，现在又做出了这种事！（原文：后杀吾女，往与妃相谗媚，今又尔邪！）”此时，高宗愈加信赖、宠爱武氏，准备废掉王氏。武氏的这一计已经使皇帝动了废后的念头，为了使皇帝决然废掉王皇后，还须加重王氏的罪愆。于是，武则天诬告王皇后与母亲柳氏密行咒祝法。高宗对王氏前怒未消，又听说她密行巫术，乃深信不疑。高宗不顾大臣们的反对，终于下诏书废掉王氏，同时，将皇后的玺绶授给武则天。

唐玄宗也借巫道事件废掉了皇后王氏。当初玄宗移情别宠，皇后心情凄惻，加上自己未能生子，感到前途非常的不妙。一次和玄宗谈起往事，想勾起玄宗对当年与她同甘共苦生活的回忆。玄宗未得势时，处境十分艰难。当时，朝中韦皇后乱政，玄宗作为皇侄，只能韬光养晦，听说妃子怀孕也惊恐不安，担心子嗣昌盛引起当权者的猜忌，忙找来堕胎药亲自为妃子煎制。提起过去，王皇后泪眼模糊地问玄宗，陛下不记得我父亲用身上的衣服换来一斗面，为您做生日汤饼的事吗（原文：陛下独不念阿忠脱紫半臂易斗面，为生日汤饼邪）？”玄宗听了也一脸难过的表情。然而，宠爱既弛，无法挽回。

玄宗决心废掉皇后，却又一时找不到适当的理由，只能暂缓此举。玄宗曾将废后的意图告诉过内臣姜皎，姜皎将此话泄漏给皇后家族，玄宗竟将姜皎处死。皇后与兄长王守一知道玄宗的意图后十分惊恐，在无计可施之下，转求于秘术。用和尚教祭北斗，用霹雳木刻上天地图形及玄宗名字，以“后有子，与则天比”为祷词。此事一经败露，立即成为玄宗废后的根据，玄宗还亲自劾问，为此，王守一丧了命，王皇后被废。废后的诏书上言，“皇后天命不祐，华而不实，有无将之心，不可以承宗庙、母仪天下。其废为庶人。”

宋哲宗皇后孟氏，也因牵涉此类案子被废。孟氏当年是由两位皇太后从世家女子百余人中挑选出来的。两位皇太后十分喜爱孟女，还亲自教导女仪，使孟氏熟知宫中礼法，尊贵而端庄。册后、大婚的仪式十分隆重，太后还语重心长地对少年哲宗说，“得贤内助，非细事也”。然而却无法使哲宗只顾恋孟氏一人。几年后同样的命运又落到孟氏的身上，孟皇后遭到冷落，刘婕妤得志。刘婕妤根本不把孟氏放在眼里，而且，不顾宫廷礼法，在行礼中，不站在嫔妃的行列中，后来竟要求和皇后坐同样的朱髹金饰的椅子。在礼法甚严的宋代宫廷，一个妃子敢于越礼，完全倚靠皇帝为后盾。对于一个无视

皇后尊严的皇帝来说，废掉皇后无需下很大的决心。

皇后一经被废，旦夕之间由九天跌入地狱，从女中王变为罪人，遭此噩运的皇后大多忧愤而死。即使不死，也没有希望回到原来的位置上，皇后位置上坐的是新得宠的皇后，重新废立，颠倒过来，已经不可能了。

尽管如此，有些皇帝念及当年与皇后的恩情，及废后时的理智薄弱和草率，都不免后悔。唐玄宗被废的王皇后死后，玄宗十分痛悔，复又追认王氏的皇后名号。

宋仁宗皇后郭氏，也是在仁宗一时气盛的情况下废掉的。当年，身为皇后的郭氏，眼看着皇帝迷上了容貌强于自己的尚美人和杨美人，妒火中烧。皇后是六宫之主，有权教训嫔妃、宫女们，后者对于皇后要礼敬、逊让，而两位美人仗恃着皇帝的娇宠，对郭皇后了无敬意，而且还和皇后争吵。一天，郭后见尚美和仁宗正在谈笑，郭后走近，听到尚美人正在诋毁自己，不禁大怒，挥手向尚美人脸上打过去，仁宗见状，急忙保护尚美人，不料这一巴掌打在了仁宗脖子上。仁宗也顿时大怒，皇后竟敢打皇帝！这一巴掌实在不轻，仁宗脖子上落下了爪痕。于是，仁宗召来内侍阎文应，商量废后之事，阎文应建议皇帝将脖子上的爪痕给宰臣们看，以取得他们对废后的支持。郭皇后遂被废。仁宗还算仁慈，没有将郭氏幽禁。当然皇后的过错并不值得大兴罪狱。郭后的身份改为女道人，赐封为玉京冲妙仙师，法名清悟。

这是发生在宋仁宗二十岁左右的事。几年后，仁宗常常想念郭氏，多次派人前去问候，还带上仁宗的乐府思念诗。郭氏见到皇帝的诗，悲欣交集，遂凄惋地写诗回赠。如此几番后，仁宗想接郭氏回宫，不料郭氏在几天之内猝死。此事最大的嫌疑是内使阎文应，他在废后时很积极，深恐郭氏回宫后对自己不利。但阎文应毒死郭氏又查不出证据，此事便不了了之。

被废后成为女道人的皇后还有：前述宋哲宗废后孟氏，号为华阳教主，玉清妙静仙师，法名冲真。明宣宗废后的胡氏，赐号静慈仙师。

胡后被废没有任何过失，只因明宣宗宠爱孙贵妃，急不可待地废掉了胡氏。宣宗命胡氏以无子多病为由，主动辞位，接着册封孙贵妃为皇后。皇后无过被废，朝廷以至民间无不为胡氏惋惜。宣宗多年以后念及此事，也很后悔，曾自解说，“此朕少年事。”这就近于承认当年废后之事不符合情理。

废立皇后最多的朝代是明代。除明宣宗以外，景帝因皇后汪氏不同意改立太子，遂废汪氏立杭氏。宪宗皇后吴氏曾怒杖万贵妃，被废，接任皇后的王氏对万贵妃淡然处之。世宗皇后陈氏，不知何故被废，这大概与世宗性情乖僻、喜怒无常有关。明代出现如此多因小过或无过废皇后的事件，说明随着明代皇权的加强，皇后在礼法上的尊严和地位有所下降。废掉皇后已经不再是举足轻重的大事，而只是皇家小事。

历史上被废的皇后绝大多数没有失德行为，而确有失德行为的皇后却大多权位巩固。历史上确因失德而被废的皇后大概只有西汉宣帝的霍皇后。霍皇后是汉宣帝的第二任皇后，其母霍^显与宫中女医淳于衍阴谋毒死了第一任皇后许氏，再将自己女儿纳为皇后。在宫中，霍皇后仰仗父亲大司马大将军霍光的势力，皇太后对她也要敬而礼之，霍氏车驾侍从甚盛，挥金如土。为了立自己儿子为太子，霍皇后与母亲共谋毒害太子（许皇后之子），霍氏数次将有毒药的食物令太子吃，未能得逞。事情败露后，皇帝下诏废掉霍氏。

历史上嚣张跋扈的、越权揽政的、操行沦丧的皇后大多能坐稳皇后宝座。

皇帝若想废掉这类皇后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她们形成这种气候，非一日之功，既然她们在形成气候的过程中没有受到阻挡，那么大势已成，再行推倒就更加困难。皇权是决定一切的权力，如果皇后将皇权控制住，即控制住皇帝本人，那么她不仅保住了后位，还可以向皇位挑战。例如唐高宗皇后武则天，武则天从妃子成为皇后，得志而大肆其威福，而且办事不通过皇帝的允准便自行其是，高宗久之则有不平之心。武则天又肆无忌惮地召方士到禁中行巫道。事发后高宗动怒，召来大臣上官仪，上官仪指出武后长恣，失海内望，不可承宗庙，坚决支持高宗废掉武后。高宗乃命上官仪起草废后诏书。废后之事被武则天得知，急忙找到高宗自我辩护，并指责别人要陷害她。高宗的懦弱本性帮了武则天的大忙，她见高宗羞缩地收回了废后之意，对她待之如初，便作出冤枉的样子，仍旧哭闹忿恨不已，促使高宗道出是谁鼓动废后的。果然，高宗为平武后之忿，说：“是上官仪教我！”于是，武则天唆使党羽陷上官仪于他罪，杀害于他。从此，“政归房帷，天子拱手矣”。

四、帝后间的情与义

明英宗在土木之变中被蒙古瓦剌部也先掠走。次年英宗生还，回到大内。钱皇后出来迎见。分别仅一年，二十出头的钱皇后已经消磨得几乎认不出来。钱皇后一只眼睛失明，行走时被人搀扶着，一条腿已经无用了。

八年前，一个十四、五岁的民间少女钱氏被选为英宗皇后。大婚后七载，钱皇后仍未生育，然而英宗却丝毫没有嫌弃之意，情义不改。他见钱氏家族贫寒、势力单薄，多次提出要加封后族，钱皇后每次都拒绝了。这种高风亮节，更令英宗敬佩。

正统十四年，英宗带兵亲征瓦剌。不久，英宗兵败被俘的消息传到宫中，钱皇后五内俱焚。为了救回丈夫，他将宫中资财全部捐出，佐军迎驾。每天深夜，静静的宫院不停地传来钱皇后的哀泣声。吃、穿、休息的日常规律全部遗忘了，钱皇后只顾哭泣、祈祷，疲倦了就歪在地上。这样持续了一年时间，因受寒和长期弯曲，她的一条腿残废了。因流泪过多，一只眼睛也瞎了。这种残酷的自我折磨终于感动了上天，英宗归来无恙，钱皇后欣喜万分。

然而，由于景帝在位，英宗归来后只能作为太上皇住在紫禁城外的南内（即今皇史宬一带），郁郁寡欢。只有钱皇后守在英宗身旁为其解忧。由于生活供给贫乏，钱皇后还不停地做针线活，让人拿到宫外卖钱，用来改善英宗的饮食。这样一直生活了七年，直到英宗复位。基于多年的患难，英宗更加重视夫妇的情义。早在结婚以前，少年的英宗就秉持夫妇为伦之始的观念，对夫妇情义看得很重。先有云南布政使周璟，其妻丧未多久，又娶一室，被巡抚郑辰指摘，杖罪革职闲住。正统五年，逢朝廷下恩赦诏书，周璟上书为自己辨解说，只有在父母及夫丧时私下娶嫁者有杖一百之刑律，从未有妻丧嫁娶坐罪之条。周璟认为自己冤枉，要求廷议是非，昭示天下。年仅十四岁的英宗大怒，驳回其上书，命不再叙用此人。后来又有一位叫马良的都督同知，姿容俊美。英宗让他随侍左右，甚至与他朝夕相伴，对他的厚遇已无可再加。后来马良妻病故，回家居丧。过了一段时间，英宗在内苑中忽闻远处传来鼓乐之声，问左右是什么事？得知是马良续娶一个王侯家的女儿，英宗气愤地说：“奴薄心肠乃尔！”以后便不再召见马良。

皇帝与皇后的情义，多出于危险之日。历代开国皇帝大多有同甘苦、贤慧能干的妻子。最典型的要算明太祖朱元璋的马皇后。马皇后跟随朱元璋征南逐北。郭子兴为首领时，曾怀疑朱元璋对自己不忠，马皇后款结郭子兴之妻，令其帮助释嫌。一次正逢饥荒，朱元璋又在郭子兴怀疑之中，食物匮乏，马氏偷偷烙了一张饼，揣在怀里给朱元璋送去，热饼在怀中烤焦了肌肤，疼得她一头大汗。朱元璋即位多年以后，还时常想起马皇后当年从怀里掏出热饼的情景。在军中，马氏率领将士之妻跟随大军，在短暂的休息时还为士兵们缝制衣鞋。后来又将宫中的钱财用来犒劳军士。

马氏不仅具备妇女善良、贤淑的品质，还具有高于朱元璋的文化修养，好读书史。朱在军中的札记都由马氏掌管。马氏还诫朱元璋，定天下以不杀人为本。

攻克元大都时，尽收元宫中宝物。马皇后见到这些宝物，寓意深长地问朱元璋，“元有这些东西而不能守，这就是说帝王自有宝物了（原文：元有是而不能守，意者帝王自有宝欤）？”朱元璋答说：“我知道皇后指的是得贤为宝（原文：朕知后谓得贤为宝耳）”。马皇后拜谢，说，“诚如陛下言，

妾与陛下起贫贱，至今日，恒恐骄纵生于奢侈，危亡起于细微，故愿得贤人共理天下。”又告诫朱元璋，“法屡更必弊，法弊则奸生；民数扰必困，民困则乱生”。兴亡的哲理简单却是深刻，朱元璋叹道“至言也！”

马皇后深明大义，始终坚持得贤为宝的观念，在行动中也不遗余力地维护她所认定的观念。一次，名儒宋濂因牵涉其孙子的罪案而被捕。明初法令严酷，稍触犯法令便大罪相加，因此，宋濂被判死刑。马皇后得知此案，认为宋濂是当今硕儒，又是朱元璋的老师，一定要保护宋先生。鉴于朱元璋毫不留情，马皇后婉转地劝道，“民家为子弟延师，尚以礼金终始，况天子乎？且濂家居，必不知情”。不料，朱元璋根本不听，一意要将宋濂付之死刑。马皇后见朱元璋如此轻易地丢戏一位有经世济国之才的学者，去标明自己执法无情，实在太令人悲哀了。在进餐时，马皇后酒肉不沾，朱元璋问为什么？马皇后答道，“妾为宋先生作福事也”。恻隐之情袭上朱元璋心头，他把筷子一投站了起来。第二天，便赦免了宋濂。

马皇后先于朱元璋死去。朱元璋恸哭，不再立皇后。

深明大义的皇后，可以说是帝王的贤内助。当然，这要看皇帝是否也深明大义。贤后对于皇帝来说，义重于情，情牵于义，决非一般的男女私情可比。皇帝纵使有美艳缠绵的妃子，仍然会始终把贤后视为知己、始终保持对皇后的尊重。

唐太宗的长孙皇后，无愧为唐太宗的皇后；相对于唐太宗在帝王系列中的地位，长孙皇后可以说是皇后中的楷模。上述明太祖马皇后便处处效法长孙皇后。

服饰俭约、抑制外戚入主朝政，是皇后们最难做到的。相反，奢华的生活、培植家族势力正是贵为皇后的女性及其家族所争取的目标。长孙皇后却能始终如一地秉持高风亮节。

长孙氏饱读书史，手不释卷，经常私下对唐太宗进行规谏，但从不越权过问具体的朝政事宜，即使唐太宗问她，向她提出赏罚之类的问题，她也坚决不作表态。她认为，国中自有贤人，只要唐太宗求贤若渴，朝政就会运行妥当。

长孙三十六岁患病而亡。病危之时，太子请求大赦囚犯，普渡僧道，以求吉祥。长孙皇后坚持大赦是国家大事，而僧道，国家仅表示容许异教存在，并不提倡，怎么能以我一人而乱了国家大法？太子不敢将此话直接告诉太宗。当太宗从房玄龄处闻知后，深为皇后临危仍秉公无我而感动。君臣们唏嘘不已。在群臣恳请下，太宗同意大赦囚犯。皇后听说，撑着病体，近于顽固地要求太宗不要这么做，太宗只能尊重皇后的意愿。与太宗诀别时，长孙皇后叮嘱后事，要依山而葬，不同棺椁，不须起坟，器用只须木瓦而已，“俭薄送终，则是不忘妾也。”如此贤后，皇帝能不感动得泪如雨下？

长孙氏死后，唐太宗也没再立皇后。一天，他看到皇后生前写了一本《女则》，又悲伤不已，对近臣说，“……顾内失良佐，哀不可已矣！”

在皇帝面前，皇后不是一个只供传宗接代或只供享乐的工具，这就注定了皇后与宫中其他女性的不同，这就要求皇后要有相应的修养。对于守礼法的皇帝来说，有修养的女子才能从嫔妃中选拔为皇后。

东汉明帝马皇后，先为贵人，好读书，能陈述《易经》，喜读《春秋》、《楚辞》，对《周官》、《董仲舒书》更爱不释手。在嫔妃位中，不争宠斗艳，还关心推荐后宫女子给皇帝。显然这种做法决非出自自然，而是修养的

表现。因此，当选立皇后时，太后指示“马贵人德冠后宫，即其人也。”明帝也以为是。

马皇后以立足于宫中，除天生一头美发外，对服饰无所求，娱乐更是不屑于介入。明帝曾携宫嫔、诸王一同游濯龙苑，大家发现皇后不在场，便请皇帝派人叫马皇后来。明帝笑着说，“是家不好乐，虽来无欢。”对于一般皇后来说，不被召幸游玩，便意味着遭到冷遇，然而马皇后却“宠敬日隆，始终无衰”。是一份敬意加于宠爱之上。明帝遇到繁杂的政务，不知执何端时，经常想到马皇后，马皇后也不负于明帝的重视。

汉和帝邓皇后，六岁能读《史记》《汉书》，十二岁通《诗经》《论语》。其修养在五岁时就显露出来了。一次，祖母为她剪发，老人十分疼爱孙女，但由于年老眼花，误伤了孙女的后脑。五岁的邓氏忍着痛，一声不吭地让老人剪完了发。事后，家人问她，她说，“不是不痛，太夫人喜欢我才为我剪发，我不愿伤害老人的好意，所以忍痛不言（原文：非不痛也，太夫人哀怜为断发，难伤老人意，故忍之耳）。”

邓氏入宫后，处处在德行上胜过了阴皇后。阴皇后动用巫蛊，被废。和帝决定立邓氏。下诏说，“皇后之尊，与朕同体，承宗庙，母天下，岂易哉。惟邓贵人德冠后宫，乃可当之。”

……

梁武帝皇后郗氏，幼而明慧，善隶书，读史传，女工之事，无不娴习。

陈后主沈皇后，性端静，寡嗜欲，聪敏强记，涉猎经史，工书翰。

金_皇宗皇后徒单氏，好诗书，尤喜老庄，持正明理。

宋高宗皇后吴氏，颇知书，博习书史，又善翰墨。

明成祖徐皇后，徐达之女，幼贞静，好读书，称女诸生。……

这些人能成为皇后，与她们的修养有密切关系，有修养的皇后往往能保持后位。虽然没有一时的荣宠，却能长期得到皇帝的礼敬。女人不以色进，便不会因色衰而退。隋炀帝皇后萧氏，在皇后中学识修养是第一流的，隋炀帝虽然昏庸，但从未想过动摇萧后的位置。

皇后的修养，竟能够庇佑丈夫，保持住帝位的继承权，是千古仅见的。这位皇后就是明仁宗皇后张氏。明仁宗为太子时体肥貌蠢，大腹便便。英武善战的父皇明成祖对太子大为不满，一次，他命太子与诸王驰马，太子知道自己登不上马鞍，便推辞了，令父皇极为失望。成祖下令减少太子的饮食，仁宗领会其意，惴惴不安。然而，仁宗的元妃张氏却十分难得，她外表大方、温和，侍奉父皇母后很是周到、谨慎，成祖徐皇后十分喜爱她，多次向成祖夸奖这位未来的皇后，缓解了他废黜太子的意图。

后来，成祖在内苑曲宴，仁宗陪侍。成祖一见仁宗，脸上立即全无笑容了，还边唾边骂，仁宗只能垂手恭坐。过了一会儿，成祖指着张氏说，“此佳妇，他日当承我家，脱微此，废尔久矣！”张氏马上起身顿首表谢。曲宴继续进行，忽然，大家发现张氏不知何处去了？成祖觉得奇怪，派人寻找，发现张氏正在厨房亲自调制汤饼！

聪慧的张氏知道这场曲宴非常重要，需要自己最佳的表现，进一步取得父皇母后的欢心，以保住丈夫的皇位继承权。显然，成祖见状，且喜且感，成祖回过头来看徐皇后，徐皇后已经感动得落下泪来。于是，成祖招呼仁宗、张氏到近前欢饮，酒宴尽兴而罢。从此，成祖再也没有考虑废太子的事。

明宫词对这件事这样写道：

汉储羽翼重商山，大计今凭妇道潺。

洗手入厨汤饼荐，能回天意指弹间。

五、皇帝唯一的妻子

两千多年的历史，只有隋文帝和明孝宗不设姬妾，仅皇后一个配偶。一个女性能够做到成为皇帝唯一妻子的地步，实在是奇迹。在宫中实行一夫一妻制，几乎是不可能的，纵使实现了，也是一种例外。因为皇帝的角色与后宫制度，的确不具有实行一夫一妻制的条件。

那么，成为皇帝唯一妻子的女性是天下最幸运者。这种生活，是皇后力争的结果，但起决定作用的仍是皇帝。

隋文帝的独孤皇后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女子。她十四岁嫁给杨坚，一对少年夫妻恩爱融洽，杨坚发誓决不纳妾，孩子们都同出一母。豆蔻年华的独孤氏也柔顺恭孝，表现出一个贤妻应有的姿态。

随着时光推移，杨坚由外戚揽政到受禅为帝，独孤氏也成了皇后。独孤氏在杨坚争取大统的关键时刻曾起了推动作用，当杨坚权高震主之时，独孤氏让人告诫杨坚：“大事已然，骑虎之势，必不得下，勉之！”

二人成为帝、后以后，隋文帝杨坚对独孤氏“甚宠惮之”，实则就是惧内。一位篡权成为皇帝的男子也惧内，说明其妻的性情和手段决非一般女子可比。

每得上朝的时候，独孤皇后总要与文帝一同坐辇向外廷走出，到前殿后面的供皇帝休息的阁前，独孤氏才停下来，目送文帝走向前殿。独孤氏坐在阁中等待丈夫下朝，并派宦官在皇帝身边观察，默记君臣们议政的事项，然后告知她。皇后对她认为不妥当的事情，随时提出甚至匡正，她的慧识也决定了她参与决策的质量。待皇帝退朝，二人相视欣然，同坐一辇返回内廷休息。在多数情况下，夫妇俩谈论政事都是不谋而合，二人都是朝廷的主人，因此，在宫中他们称之为二圣。

独孤皇后对于自己家族没有什么私心，其表兄坐罪当斩，文帝担心皇后反对，想赦免这位国戚。然而，独孤氏却毫不留情地说：“国家之事，焉可顾私。”在夫妇问题上，皇后却显得私心颇重，妒忌成性。后宫的大批宫女只能怨天尤人，不得见皇帝一面，抱恨终生。幸亏上天保佑，皇后一连生了五个儿女，否则，皇朝就有后继无人之忧了。

独孤氏坚持终生和皇帝夫妻相守，对于他人纳妾也极为厌恶。她试图制造一种人人不纳妾的外围环境，让皇帝不感到委屈。她听说某位大臣妻死，妾又生男，便要求文帝降黜该大臣；诸王中有妾怀孕的，也要劝皇帝对他们加以斥责。当时，太子杨勇正室元妃暴卒，便怀疑是太子爱妾云氏暗害的，由此，对太子益发不满，促使文帝下决心废掉杨勇。

隋文帝虽然立下过不纳妾的誓言，但那是他当皇帝以前的事，在民间一夫一妻，不纳妾，并不难做到。然而，既做了皇帝，又不得享受皇帝的待遇，实在是难耐。随着承平日久，隋文帝渐渐起了跨越雷池的念头。一次，他在仁寿宫见到一位宫女，艳丽夺人，是尉迟迥的孙女。文帝“见而悦之，因此得幸”。尉迟氏年轻娇嫩，比中年独孤氏妩媚诱人得多，文帝迷上了这个少女。独孤氏发觉了丈夫与尉迟氏的关系，怒气冲顶。她不能处置皇帝，只有泄愤于尉迟氏。她趁皇帝上朝的机会，派人杀了尉迟氏。文帝寻找尉迟氏不见，后来得知此女已魂归天外，凶手正是皇后！

他压抑不住内心的怒火，大跑着出去，从厩中拉出一匹马，纵马疯癫地奔出宫苑，一气驰奔了二十余里，闯入出谷间。大臣高颎、杨素怕出意外，

紧追其后。见皇帝在山谷间停了下来，高颙、杨赶快扣马苦谏。文帝长叹道：“吾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高颙开启皇帝说，“陛下岂以一妇人而轻天下？”文帝觉得此话有理，稍缓和了一下情绪。君臣在山谷间驻马良久，中夜方始回宫。

独孤皇后五十岁病逝。文帝开始肆意地享受女色。由于过度沉溺，身体不支，病重时想到了独孤皇后的好处，他对内臣们说，“若是皇后在，我不会成这个样子（原文：使皇后在，吾不及此）！”

至于明孝宗皇后张氏的宠遇，史书记述得很简单，“笃受宫中，同起居，无所别宠，有如民间伉俪然者。”明代各个皇帝都有几个到十几个妃嫔陪葬，而唯独孝宗只有张皇后一个陪葬。

张皇后的事迹找不到什么记载，似乎史家忽略了他与孝宗在宫中所过的民间夫妻生活。这本应传为千古佳话，但史家如此隐晦张皇后的事迹，是为了表示对张皇后的不满。在古人看来，皇后禁止或限制皇帝宠幸其他女子，是缺德行为，对于皇帝是不公平。如果说，隋唐时期的人稍开明一些，那么明代人要固执得多。因此，对于这种皇后不能大书而特书，防止后人效法。然而，皇帝勤政而下贪色，是一种美德，孝宗这种做法，无过失可言。因此，史家只能对孝宗夫妇的事迹不褒不贬，简单划过。

关于孝宗帝、后的生活，有些疑团留给后人。张皇后是否是武宗的生母值得怀疑。当时，曾出现过一怪事，一个叫郑旺的平民到处声称武宗是他女儿郑金莲（一个宫女）所生，闹得朝野鼎沸。一个平民不怕冒杀头的危险自称为国戚，这种事前代也是有过的。当事人中，郑金莲自然没有发言的机会，孝宗则严加斥责郑旺的狂言，并严办此案。

一个帝王，与宫女生子并不是稀罕事，用不着躲藏隐晦，历代也不乏皇后将宫女所生之子当作亲生儿子抚养的事例。明代宣宗孙皇后就将一位不知名的宫女所生的男孩，即后来的英宗扶为己子。如果张皇后不能生育，而武宗真是孝宗与宫女所生，也不必隐晦。那么似乎可以推论郑旺是无中生有。

然而，孝宗与张皇后特殊的伉俪关系，使后人不得不再作考虑：如果张皇后的确抱养了宫女生的孩子，孝宗对外隐瞒，可以理解为顾全皇后的面子，而且，孝宗也会出于对皇后的关爱，让武宗始终把张皇后当做生母。自己去世以后，武宗也能够很好地孝敬母亲，这样张皇后的后半生也就平安了。否则，如果此事不加隐瞒，武宗知道自己的生母是谁，那么他继位后就会作出对张皇后不利的的事情，孝宗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宁了。

因此，武宗生母是谁已经不重要了，不论张皇后是不是武宗的生母，都同样能够说明孝宗与张皇后的伉俪情深。

六、血泪深宫

后宫是一个看不见的战场。这个战场摆在皇后与嫔妃、宫女之间。主要对垒者是皇后对嫔妃，至于成千上万的宫女，只有先得皇帝的“御幸”才能介入这个战场中。

后宫制度本身就是一个残害女性的制度。无数个女人共有—个丈夫，这怎么能使妻群安宁呢？忧怨、嫉恨的情绪在妻群中翻滚着。有得志的，便有失意的。皇后是皇帝的正妻，但她无法将皇帝拴在自己身边，除非是皇帝自愿。隋文帝、明孝宗这样的皇帝是极个别的，即使是他们，也有越雷池的时候。所以，皇后如果没有不妒忌的胸怀和修养，每天都会如坐针毡，然而不妒忌是不可能的。

读史的人发现，历代皇后的平均寿命都不长，多数以上的皇后都在四十岁以前殒命。嫉妒、心酸、期盼、失落，循环往复，度日如年。嫉妒的火焰如果不能烧死对手，就会烧死自己。

有些修养较高的皇后，能够调节自己嫉妒的程度，将妒心藏得深一些，故作淡然。或者每天诵佛经、读书练字，来回避那些烦恼的问题。少数德行较高的皇后，不必用他物排遣苦闷，似乎可以走出妒意的缠绕，去从皇帝的角度看问题，于是心胸豁然开朗——皇帝“御幸”其他的女人完全是应该的，皇帝至高无上，不应受到任何约束。而且，皇嗣的繁衍极为重要的，皇帝这样做也是为了广衍皇嗣，关键是，皇帝最讨厌嫉妒的皇后。于是，贤后就主动去后宫物色宫女，供给皇帝。皇帝自然要感动一番，为自己能有如此贤德的皇后而庆幸。然而皇后这么做，将来的祸福她自己也无法预料。

事实上，皇后若能做到这一步实在太难了。为妒情所控制的皇后们不肯这样做，她们的神经极敏感的这样提示着自己：不能为别人提供机会，不能让皇帝见到比自己漂亮的女人。但是，又怎能阻止皇帝的自由呢？

妒情在皇后的血液中疯狂地流动。她们要尽一切可能战胜对手。败下阵来失宠的皇后，在暗地里诅咒得宠的妃子，把对手刻成小木人，写上名字，天天用乱针扎，同时用恶语诅咒。但是，现实中诅咒的对象并未能受到任何伤害。势力较强的皇后不会这么做，她要直接伤害对手。如何伤害？方式各异。

最残毒的莫过于吕后了。吕后对夺宠又欲夺嫡的戚夫人恨之入骨。但在刘邦生前，她拿不出任何办法来对付戚夫人。宠虽夺去，嫡却保住了。吕后把仇恨忍到刘邦离世。

刘邦—死，吕后成了太后，她先把戚夫人罚做宫奴，穿着囚徒的衣服，每天从早到晚地舂米。为了防止戚夫人万—翻身，吕后使出了最毒的一计，派人砍去戚夫人的手脚，再将双眼挖去，用药将耳朵熏聋，再强灌下暗药，使之不能言语。最后，将她放在一个窟室里，名为“人彘”。

汉桓帝窦皇后，因桓帝移宠于采女田圣，憋了一腔妒火。待汉桓帝—死，便火山爆发，桓帝的梓宫尚在前殿，窦皇后就迫不急待地杀了田圣。

武则天的狠毒与吕后不相上下。不同的是，武则天是胜利者，已经取胜的人对败下阵来的人毫不留情，杀之以防后患。武则天不择手段地登上皇后的宝座、王皇后与萧淑妃被废为庶人，囚于宫中的一间黑室，屋门在外面紧锁着，墙上只留一个小洞，二人每天从小洞领取食物。

高宗本性宽厚，却很懦弱。—天，高宗来到囚禁她们的地方，见到此景，

觉得十分心酸。他在屋子外面喊道，“皇后，淑妃安在？”二人一听是皇帝的声音，悲哀与欣喜交织，呜咽着说，“妾等得罪，废为宫婢，何得更有尊称？”王皇后又说，“今至尊思及畴昔，使妾等再见日月，也入院中。望改此院名为回心院，妾等再生之幸。”高宗说，“朕自有处置。”

这段情节被武后侦知——由耳目奏报，武后大怒，令人将王、萧各打一百杖，截去手脚，塞在酒瓮中。武后恶毒地说，“令此二姬骨醉？”两个不幸的女子就这样被折磨死了。萧妃临死前咒骂武后，“愿阿武为老鼠，吾作猫儿，生生扼其喉！”有人将此话传给武后，武后十分恐惧，马上命令把宫中的猫全部杀尽，不许再养猫。武后觉得至此还泄愤不足，使命令将王氏改为蟒氏，萧氏改为梟氏。

孽毒施尽之后，武后心神不宁，常常梦见王、萧二人披散着头发，浑身淌着血的样子。武则天担心她们阴魂不散，要向她索命，她不敢再住在原来的宫中了，移居蓬莱宫。在蓬莱宫又恶梦不断。于是，武则天不敢住在长安了，移住东都洛阳。

南宋光宗皇后李凤娘，性格妒悍，也正逢光宗这种懦弱无定见的皇帝，李凤娘得以宫中所向无敌。一次，宫女侍候光宗洗手，光宗注意到这个宫女的一双白嫩可人的双手，遂表现出爱怜之意。这一情景恰好被李凤娘看见。几天后，她派人给光宗送一盒食物，光宗打开盒，顿时出了一身冷汗——盒里装的是那位宫女的一双手！这位被砍去双手的宫女不知下落，光宗却丝毫也不敢追究此事。

实际上，这位宫女并没有夺她的宠，尚未成为她的情敌，那么对于真正的情敌呢？李凤娘下手就更狠了，不幸一位姓黄的贵妃在劫难逃。黄贵妃本是光宗做太子时的妃子，先于李皇后入宫。李凤娘权位巩固以后，要将黄贵妃这颗眼中钉拔去。她趁光宗行郊礼住在斋宫时，派人杀了黄贵妃。

光宗在斋宫听说黄贵妃暴病而亡，心里猜得出黄氏的真正死因，心慌意乱。行郊礼的这一晚，风雨大作，祭坛上的烛火全被吹灭，礼仪无法完成。懦弱的光宗对李皇后无计可施，从此他得了一场大病，严重到不能视朝。光宗旧有的妃子还有张贵妃、符婕妤，还算幸运，被送出宫，下嫁于民间。

奇怪的是，李凤娘仗着她的个性，在宫中竟无人能驭得了她。她不仅对嫔妃手狠，对太上皇也毫不客气。一次，宫中内宴。李凤娘在宴席上提出立她亲生的嘉王为太子。太上皇孝宗不同意。李凤娘厉声顶撞：“妾六礼所聘，嘉王，妾亲生也，何为不可？”从此，李凤娘恨上了太上皇，恶意离间光宗与父亲的关系，至孝宗病逝，光宗竟不敢违背李皇后的意，去亲自主持父亲的丧事。

后宫流淌着鲜血，也流淌着弱女子的泪河。

如同帝王夺取政权、中原逐鹿一样，后宫也是一个以杀人流血为代价的战场。在这种你死我活的战场上，牺牲者不仅是其中的一方，而且包括无辜的小生命。

历史上最典型的悍妇——晋惠帝贾皇后，曾亲手杀死数名宫女。见到怀孕的宫女，猛刺过去一把利戟，鲜血飞溅，胎儿滚落到地上，宫女倒在血泊中毙命。

前面说到的武则天，为了诬陷王皇后，竟将刚出生不久的女儿杀死。

在血腥的皇宫，“母以子贵”并不象这几个字那么简单，因生子而得祸的女性大有人在，尽管她们所生的儿子被立为太子，也不能使她们免遭厄运，

有的还正是因为生了太子，才命归黄泉。

汉惠帝在吕太后的安排下，与其外甥女张氏结婚。张皇后不生育，吕太后让张皇后佯装怀孕，取后宫一位不知名的美人生的孩子，佯为张皇后所生，那位美人惨遭杀害。

东汉章帝宋贵人生皇子刘庆，梁贵人生皇子刘肇（汉和帝），窦皇后没有儿子。杀人夺子之计在窦皇后脑中产生，她先诬陷宋贵人行巫道邪术，迫使宋贵人饮恨自杀。然后又诬陷梁贵人的父亲犯法，使得梁父被诛，梁贵人忧愤而死。窦皇后一石击二鸟，既去掉了两名情敌，又得到了儿子，她将刘肇养为己子。刘肇（和帝）即位以后，对窦太后礼敬始终。窦太后作为胜利者，全家显贵，横行于朝廷。后来，窦氏兄弟因谋反被诛，窦太后却安然无恙。

汉顺帝的母亲李氏，是一位普通宫女。她生下顺帝后，惨遭不幸，被阎皇后用毒酒害死，埋在洛阳城北。顺帝即位后，惮于阎太后的威势，没有人敢将母亲的遭遇告知皇帝，直到阎太后死，顺帝才得知真情。

同样的悲剧不停地上演，汉献帝的母亲王氏，因生下献帝，被夺宠的何皇后用毒酒害死。

权力是和鲜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与性爱不容分享同样，权力也不容分享。双份的内容，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古人把后宫的悲剧及至整个朝政的悲剧称为“女祸”。于是，就有自奉英明的皇帝或朝代，用杀戮的办法，试图根除“女祸”，被杀戮者，就是太子的生母。

汉武帝鉴于吕后的祸害，在决定立幼子弗陵为太子之际，先杀了其母钩弋夫人。钩弋夫人赵氏是武帝晚年最宠爱的妃子，为了朝政的稳固，雄才大略的武帝是能够下这个决心的。但他不忍向钩弋夫人讲明原委。武帝借一个很小的过错，故意大发雷霆，斥责钩弋夫人。钩弋夫人吓得赶快将耳环，头饰卸掉，叩头请皇帝息怒。武帝却招呼左右，“把她带走，送掖廷狱！”钩弋夫人委曲而不解地边走边回头，希望皇帝能软下心来，不料听到武帝更无情地说“快走，你不能活了（原文：趣行，女不得活）！”钩弋夫人只能无望地死去。那一天，暴风扬尘，百性感伤。

鲜卑人建立的北魏，居然定立了一项制度：立其子必杀其母。因此，后妃们都愿生公主、诸王，而不愿生太子。这项惨无人道的制度，断送了一个又一个年轻母亲的性命。文成帝李贵人，临死前给兄弟写信，托付后事，每写一句，都止不住捶胸恸哭。这项制度到孝文帝时才未再执行下去。

在后宫这个女性魅力、权术的竞技场，失落而暗自垂泪的女子无法尽数。有这样一个女人，她生下了皇子，皇子又被立为太子，后来又当上了皇帝。但她至死不能与儿子相认，儿子也不知道她就是母亲。她默默地死去。她，就是宋仁宗的母亲李宸妃。

李宸妃性格庄重寡言，生下仁宗后，宋真宗（仁宗父亲）刘皇后明目张胆地把仁宗夺为己子。李宸妃毫无办法，也无反抗之力。仁宗即位以后，刘皇后成为皇太后，李宸妃却杂处于先朝的嫔妃之中，没有人敢将真情透露给仁宗。仁宗对待“生母”刘太后至孝至敬，在盛大的节庆上，仁宗向太后再拜、双膝跪地，手捧酒杯向她祝寿。仁宗二十岁那年冬至，又要率百官为太后举行大型的祝寿礼，范仲淹上书，力陈此举不当，仁宗不听，大礼按计划举行。

李宸妃在仁宗即位后十年，默默地死去。刘太后要按普通宫女的礼仪治

丧。在朝会上，丞相吕夷简要求丧礼应该从厚。刘太后急忙把仁宗引出殿外，独自坐在帘后，与吕夷简争执，她大怒道，“相公欲离间吾母子邪？”

吕夷简从容答对，“陛下不以刘氏为念，臣不敢言；尚念刘氏，则丧礼宜从厚。”刘太后悟出道理，妥协了。李宸妃被用皇后礼殓。这件事仁宗未予以注意。到刘太后病危，仁宗竭尽全力保住太皇的生命，他下诏大赦囚犯，又下令全国的医生迅速前往京师，又令将太后曾贬谪的人升职，死者追复官位。

刘太后死后，燕王告诉仁宗：“陛下为李宸妃所生，妃死于非命。”震惊、悲痛、悔恨，仁宗为之心碎。他大哭不已，几日之间消瘦了许多。陷于哀痛之中的仁宗还下诏书自责。他为生母李宸妃迁葬，打开棺盖，仁宗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端详母亲的容貌。李宸妃因水银实棺，玉色如生。仁宗除了厚葬、改谥以外，无以表达对母亲的追念。

明光宗的生母王氏，既无宠，又多年不得见儿子一面。当光宗得知母亲病危，忙奔向母亲的住所，门紧闭着，光宗把门撞开，冲了进去。王氏数十年以泪洗面，双目已经失明。她手拉着儿子的衣服，哭着说，“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恨！”然后含泪而终。

七、皇后的隐情

后宫是一个万象具备的场所，权欲、情欲在这里潜伏着，挣扎着。得势者可以逞其所欲，失势者性命难以苟全。在重重的帷幕后面，龌龊的、无耻的勾当在悄悄地、或者从容地进行。外人难以窥视，最后落在史家笔下的只能是星星点点。

不过，古人称男女之事为人道。皇后（太后）也是健全的女人，既然权力可以使皇帝拥有无数的配偶，那么，皇后（太后）在男女上偶而为之，也不算怪事。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太后——秦始皇之母，就是以淫乱为特色的。秦始皇之母先是大商人吕不韦的舞姬。吕不韦将她献给了秦储君子楚，生了秦始皇。秦始皇即位，尊其母为太后，勋臣吕不韦为“仲父”。

秦始皇初即位时年幼，吕不韦权势极重，经常与太后沟通旧情。数年后，吕不韦发觉秦始皇长大了，而太后的淫欲仍不肯终止，他怕事情败露，祸及己身，于是四下寻找能够代替他的人。

不久，吕不韦发现了一个取代他的人，名叫嫪毐。嫪毐的本领传到太后的耳中，太后大喜，吕不韦为了让嫪毐入宫服侍太后，想出了一个办法。他指使人告嫪毐有罪，应受宫刑，然后又通知太后，太后以重金贿赂执行宫刑的狱吏，只将嫪毐的胡子、眉毛拔掉。从此，嫪毐作为一名宦官，服侍太后，二人相得益彰，如漆似胶。不久，太后有了身孕，怕人发觉，遂假称占了一卦，应避时，征得秦始皇的同意，便移往远离皇宫的雍城居住。

在雍城，二人可以肆无忌惮地厮混，连续生了两个儿子，藏匿起来。太后和嫪毐知道事久必发，相谋一旦秦始皇死，就以嫪毐之子为嗣君。

奸情终于被秦始皇知道。嫪毐先发制人，他用太后的金印发兵。叛军和秦始皇的禁卫军交战，嫪毐兵败逃跑，被追兵斩首。秦始皇一气杀了嫪毐三族，太后所生的两个儿子也被囊载扑杀。吕不韦被查出与太后、嫪毐的关系，秦始皇想杀了这个相国兼仲父，念他辅佐先君功大，又有众多的宾客辩士为他游说，始皇未忍将他处死。吕不韦被贬出京师。第二年畏罪饮鸩自杀。

太后在儿子的宽容下，又活了十年。这十年她尝够了孤独与寂寞。

汉高祖吕后，在权力争夺中刚毅残忍，在私情上老当益壮。史书上说，汉兴，高祖帷薄不修。刘邦拥着戚夫人，听大臣入内奏事，受冷落的吕后与辟阳侯私通。吕后与辟阳侯的关系，知道的人很多。当淮南厉王的母亲因贯高谋反案被牵连，有生命危险时，她的弟弟去找辟阳侯，要辟阳侯通过吕后求皇帝宽恕。厉王的母亲“被幸”于刘邦而生了厉王，吕后出于嫉妒，不肯替她求情，而辟阳侯又不竭力争取吕后的帮助，致使厉王母自杀身亡。

吕后与辟阳侯长期保持私通关系。惠帝在位时，听到诸多关于辟阳侯行为不轨的议论，怯懦的惠帝大怒。儿子对于有损于母亲尊严的事极为敏感，惠帝决意除掉辟阳侯。吕太后内心惭愧，无面目向儿子求情。

辟阳侯求助于平原君，平原君想到了一个关键人物——惠帝的幸臣閼籍孺。由閼籍孺出面向惠帝求情，结果，惠帝赦了辟阳侯。多年以后，文帝在位时，辟阳侯被厉王用铁锥砸死。厉王在文帝面前历数辟阳侯的罪状，其一就是辟阳侯当年“力能得之吕后”，而不尽力要求吕后保全厉王母的生命。厉王自幼就对辟阳侯怀恨在心，吕太后在世时他不敢发作，到孝文帝时才报了仇。

赵飞燕虽然作了汉成帝的皇后，却被封为婕妤的妹妹夺了宠。赵飞燕没有精力用在和妹妹争宠上，而是去冒险寻欢。

有位十五岁的少男庆安世以擅长鼓琴入宫为成帝侍郎。他弹奏的《双凤离鸾》曲引起了皇后的共鸣。日后，庆安世经常出入皇后的卧室，脚踩轻丝履，手执招风扇，身穿紫绋裘，与赵飞燕一同起居，“绝见爱幸”。

赵飞燕这样做的另一个目的，是想怀孕生子，然而未见成效。此后，她又以祈祷为由，别开一室，规定除服侍她的宫女外，其他人包括皇帝一概不得入内，密令手下人召京城中的轻薄少年，化妆成女子，以车载入后宫。每日十数人，与赵皇后淫通，但赵飞燕仍未能生子。

贾南风，晋惠帝皇后，面黑貌丑，身材矮小，性格妒悍。她控制了痴呆的惠帝，不容许皇帝接近其他女性，她自己却荒淫放恣。太医令程据是她一个较为固定的情夫。她还派人从宫外带进男子，玩腻了就送他们归天。

洛阳城南有一个不知名的小吏，仪容俊秀、举止优美。一天，他忽然穿上了华丽的衣服，这种衣服只有臣室和宫中才有，而他只是一般的厮役，根本不可能拥有这种衣服。众人怀疑他行窃得来，他的长官盗尉审问他。这时恰有贾皇后的一位远亲，想得到这件衣服，前来听审。

小吏说出了事情经过，“先行逢一老妪，说家有疾病，师卜云宜得城南少年厌之，欲暂相烦，必有重报。于是随去，上车下帷，纳簏箱中。行可十余里，过六、七门限，开箱簏，急见楼阙好屋。问此是何处？云是天上。即以香汤见浴，好衣美食将入，见一妇人，年可三十五、六，短形青黑色，眉后有疵。见留数夕，共寝欢宴。临出赠此众物。”

这位事后仍蒙在鼓里的小吏，道出了贾皇后派人物色美少年、装箱运入宫中供其淫乐的真实过程。在一旁听审的贾皇后远亲，根据小吏的描绘，知道那个中年妇人大概就是贾皇后，只得惭笑着离去。盗尉见此心领神会。这位小吏得以活着出宫，大概是贾皇后见他憨厚无知，起了怜悯之心，不忍将他杀害。

南齐郁林王皇后何婧英史载其生性淫乱。为妃子时就与外人奸通。南郡主喜欢和无赖人（无业游民）混在一起，还常把他们带进宫中。何妃挑选其中美貌者厮混。

南郡王的侍书少年马澄貌美，何妃又和他在一起玩乐，二人还时常斗腕较力，看来何氏体格较壮。后来，她又迷上了女巫之子杨珉之，他们同居一处，形同伉俪。

那么，皇帝为何不加干涉呢？因为郁林王也是一个荒唐皇帝，杨珉之对他也作出亲昵举动，二人发生同性恋。何氏被立为皇后以后，淫乱活动仍无顾忌，连接她的寝殿的斋阁通夜洞开，通往后宫的路径上人影不断。

南朝宋文帝的路淑媛，是孝武帝的生母。文帝晚年，路淑媛年老失宠，便经常和儿子在一起。孝武帝即位后尊为太后。路太后与儿子孝武帝之间的关系颇为暧昧。史载孝武帝在太后房内礼敬甚寡，“有所御幸，或留止太后房内，故人间咸有丑声”。宫闱的这种秘事无人说得清。

北魏文成帝文明皇后冯氏，是历史上有名的女政治家。她没有生子，有幸在文成帝死后，作为太后临朝听政，也逢孝文帝雅性孝谨。冯太后坐镇朝中，大事由她参决，生杀赏罚，决于一念之间。

在私生活上，太后也不甘寂寞。朝臣们皆是男性，太后在处理政事的过程中，又可物色对象。一位叫王睿的，被她看中，让他经常出入自己的卧内，

几年之间又将他升为宰相。由于很得太后的欢心，赏赐的钱和布匹以千万亿计，数目惊人！

太后的这种大方也是让人震惊的。因为，她生性俭朴，讲求节约是传为佳话的。她为了节省，将自己的饭桌裁掉了一尺左右、减少了规定膳食的五分之一。一次，晚间厨师送上粥来，她刚要吃，发现一只螭蜓浮在粥上，孝文帝在一旁看见，太怒，要将厨师付以重刑。太后只是轻轻笑笑，用饭叉把螭蜓挑了下去。如此一个太后，却给自己的情夫巨额赏赐，可见情重如山。不仅如此，她还赐给王睿金书铁券，许以不死之诏。另外一名男宠李冲，待遇和王睿不相上下。

太后怕自己的短处被人议论，因此，对下属疑心重重，稍有疑忌，便行诛戮。被杀的多达十余家，死者数百人。天下都知道这些人大多冤枉，但无人敢于鸣冤。

北魏的另一位冯皇后，即孝文帝皇后，也做出淫乱后宫的事情。最初她是妃子，她的异母妹妹也入了宫，由于妹妹是正妻所生，被立为皇后。轻佻的活泼的姐姐在争宠中战胜了性格厚重的妹妹。经过她不断在孝文帝面前挑拨妹妹的是非，结果妹妹被废为庶人，她继立为皇后。

冯皇后很得孝文帝的宠爱，但她却颇不自重。她曾一度回家养病，这期间就发生过有失贞操的行为，但孝文帝并不知道。回宫后，皇帝对她更加专宠，别的女子很难见到皇帝。

在孝文帝出征期间，她难耐寂寞，遂与宦官高菩萨私通。后来听说皇帝在外病危，她便公然毫无掩饰地与高菩萨往来。孝文帝病愈，冯皇后惊慌失措，与母亲常氏求女巫诅咒皇帝速死，自己要象文明冯太后一样，行使全部的自由。

有人将冯皇后与高菩萨的行为告知孝文帝，孝文帝大为惊愕，他想象不出宠遇正隆的皇后会是这种样子。回到宫中，孝文帝让人把冯皇后叫来，往日的恩爱皆成泡影，宦官奉命在冯皇后进门时搜身，以防她携带凶器。

冯皇后见到皇帝，哭着叩头，孝文帝让她坐离他两丈远的东窗下，先让高菩萨陈述罪状，然后让冯皇后回答问题。冯皇后还很爱面子并故作神秘，让皇帝命左右侍臣退出，塞上唯一在坐的长秋卿白整的耳朵，再向皇帝陈述。

孝文帝考虑到前面已经废过一个冯皇后了，再废一个皇后将大失冯门光彩。孝文帝对宗室的两个王说，“让她在宫中空坐，她自己若有惭愧之心便会自裁，你们不要认为我对她还有情义（原文：且使在宫中空坐，有心乃能自死，汝等勿谓吾犹有情也）。”

直到孝文帝病死，冯皇后仍然活着。孝文帝临终前遗诏赐皇后死，毒药送到她面前，冯皇后惜命不肯就死，奔跑着喊道，“皇帝不会让我死，是诸王辈杀我！”

同样的情节连续上演，北魏还有一位与文明冯太后媲美的胡太后。宣武帝死后，孝明帝即位，胡太后临朝听政。她志得意满，逼迫清河王元怱和她淫乱，元怱无奈，只得从命。孝明帝一度将太后幽禁于北宫，杀了元怱。几年后，胡太后与孝明帝母子和好，她又开始临朝。

胡太后旧习不改。男宠有郑俨、李神轨、徐纥。这群人仗着与太后的帷幄之情，“一二年中，位总权要，手握王爵，轻重在心，宣淫于朝，为四方所厌秽”。胡太后的侄子僧敬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他聚集亲族，向胡太后涕泣进谏，“陛下母仪海内，岂宜轻脱如此！”太后听了大怒，从此不再

召见僧敬。

孝明帝对于母亲的行为极为反感。胡太后是孝明帝的亲生母亲（那时北魏王不再立子杀母了），胡太后也很清楚儿子对她的愤恨，对于儿子所亲信者，她派人秘密杀死。母子间的嫌隙越来越大。几年后，孝明帝突然死去，朝野内外人们纷纷推测，此事是太后的情夫郑俨、徐纣的阴谋。

时值盛唐，洛阳城内出现了一个装疯使狂的人，名叫冯小宝。当时，社会风气竟尚奢华，淫荡不以为耻。冯小宝的“伟岸淫毒”在洛阳城中传布开来，千金公主（高祖李渊之女）把他迎进了府第。不久，为了讨好武则天，公主把他献给了武太后。

武则天对此人极为满意，将她改名为薛怀义，还将他剃发为僧，任命为白马寺主。实则是掩人耳目，便于出入后宫。薛怀义由一介无赖到昂首于宫中，人人对他侍奉唯谨。完全是武则天的权力和淫欲使然。

薛怀义最得宠期间，武则天女儿太平公主的丈夫薛绍，对薛怀义以父礼事之；武则天的至亲武承嗣、武三思对他也毕恭毕敬；薛怀义的马匹由宫中供给，专人负责。武则天命薛怀义指挥数万人，大造明堂。明堂建成后，武则天封他为威卫大将军、梁国公。

薛怀义如此威风，朝中不少人垂涎，也知道武则天的喜好。于是，有位叫柳模的尚食奉御官，向武则天推荐自己的儿子柳良宾，称他皮肤洁白、美须眉。还有自我推荐的。大家纷纷投其所好。

随着喜新厌旧的规律，薛怀义的宠遇渐渐衰落，御医沈南璆成为太后的新欢。薛怀义怨恨、气愤，使出野性，火烧明堂。武则天内心羞愧，但还是下狠心将薛怀义除掉。于是，密诏太平公主选数名体格强健的妇女，在殿中侍立，待薛怀义一到，一齐扑去，把他绑起来，又命亲信武攸宁、宗晋卿率壮士击杀。薛怀义的死尸用辘车还白马寺。

武则天晚年，宠幸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为他们设置机构——控鹤府。以张易之为府监、位在三品。二张在宫中得意非凡。张易之小名五郎、张昌宗小名六郎。有人赞誉张昌宗的美貌“六郎面似莲花”。内史杨再恩更加无耻地说，“不然，乃莲花似六郎耳”。

武则天也真不寻常，虽然年事已高，但经过她精心修饰、保养，左右的人竟看不出她的衰老状。后来，掉了牙的牙床上，居然又长出两颗新齿，武则天大喜，下诏改元为长寿。

武则天死后，接踵而来的唐中宗韦皇后，在宫中继续行乐。

韦皇后曾跟随中宗吃过不少苦。当年，武则天为了称帝，废了中宗。韦后随中宗流落到房陵。每当朝廷派使臣来，中宗都吓得心惊肉跳，时时准备自杀。韦皇后给了他不少安慰，在同处逆境的日子里，中宗向韦皇后保证“等我重登帝位，一切随你所欲（原文：一朝见天日，不相制）”。

苦难结束了，中宗与韦皇后入主朝政。韦皇后开始随心所欲。首先，她和武三思勾搭在一起。她与武三思之间的牵线人是上官婉儿。上官婉儿幼年因父罪没入宫廷。此人天性机智，好读书，善写文章。武则天时期，她在后宫负责起草诏命。不知从何时开始，她与武则天的侄子武三思私通。武则天死后，大臣们要尽诛祸乱宫中的诸武。武三思知道他肯定包括在内，急忙求助于上官婉儿，上官婉儿把他进献给韦皇后，武三思的命就保住了。

上官婉儿被中宗封为昭容，韦后与上官婉儿这一对皇帝的妻妾，在宫中竟相淫乱，中宗也不反对。当韦皇后与武三思厮混时，武三思居然坐到御床

上，与韦皇后玩博戏，中宗却在一旁为他们典筹，还笑个不停。如此丑闻朝野尽知。韦皇后又与光禄少卿杨均、散骑常侍马秦客通奸，这两人都有自己的特长，杨均善于调制饮食、马秦客颇通医药，二人经常出入宫禁。

上官婉儿穷极奢侈，在宫外大营宅第，与崔提淫乱，通过皇帝将崔提提升为副宰相。众多无耻的男子为求高官要职，争候于上官婉儿的门下，希望能够获得她的爱慕。

至于中国最后一位太后——清慈禧太后荒淫行径的传说，各种各样。但是，正史上并没有写入。那么，慈禧是不是有过荒淫行为？从推论上说是不能排除的。如前所述，历史上除宋、明两朝较为安宁外，大多数朝代都发生过太后淫乱的事例。

慈禧荒淫的对象是宦官首领，先有安得海，然后是李莲英。野史上说，安得海以柔媚得太后欢，话无不纳。同治皇帝对母亲与安得海的暧昧关系十分恼火，找到慈安太后商议。慈安认为，长此秽乱宫中，西太后就成为武则天第二，他日九泉之下，无颜以对咸丰皇帝。

清廷规定，太监不许出宫。但慈禧却派安得海到山东办事。同治在慈安的建议下，密令山东巡抚丁葆楨，如发现安得海有不法事，立即擒捕。安得海到山东，乘两只太平船，悬张龙凤旗帜，带男女多人，并有丝竹女乐。在他生日那天，还摆设龙衣，令男女参拜。

丁葆楨将安得海的不法事实奏闻太后。慈禧忍痛命丁葆楨将安得海正法。又一种传说是，丁葆楨奉同治之命，先杀了安得海，暴尸三日，再禀告慈禧太后。

李莲英在入宫前，外号皮硝李。因为生活落魄，曾私贩硝磺，被抓入狱，出狱后又以补鞋为生。后来好友沈兰玉见他可怜，将他引进宫里，当一名宦官。

当时，慈禧听说京城中流行一种新发式，要梳头太监们为她梳成那种样式，但各个太监皆不能令慈禧满意。李莲英从沈兰玉那里听说此事，乃刻意琢磨梳妆技巧。经过沈兰玉引荐，到慈禧前一试其技，果然出手不凡，李莲英从此得幸。

以后多年，慈禧对李莲英宠眷不衰，二人常在一起并坐听戏，凡李莲英喜欢吃的东西，慈禧多在膳食中为他留下来。李莲英四十岁寿辰时，慈禧赐赏他大量的珍品、蟒缎、福寿等字。京城的军机大臣及地方的封疆大吏，都送上祝寿的礼品。这决不是一个宦官应该或能够享受的待遇。李莲英为人极为聪敏，善解人意，对待其他人也比较和善，不如安得海那样气焰嚣张，所以能够得到善终。

安得海、李莲英与慈禧的暧昧关系较为可信。野史中还记载着慈禧更加淫荡的故事，无法印证其真实性。据说，慈禧爱吃汤卧果，每天早晨派人带二十四两银子，到宫门口买四枚汤卧果，由金华饭馆的伙计派人送来。

金华饭馆有一个年轻的伙计，姓史，皮肤白皙，仪容俊美。史某和李莲英混熟了，经常偷偷跟着李莲英到宫中游玩。一天，慈禧发现李莲英旁边站着个美少年，问他这是谁？李莲英很害怕，带外人进宫严重违反宫禁，但又不能撒谎，只得如实禀告。

慈禧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十分高兴，乘机将史某留在宫中，“昼夜宣淫”，一年后生下光绪。慈禧不敢养在宫中，命妹夫醇亲王收为亲生子养育，又将史某杀害以灭口。因此，人们推测：同治死后，慈禧不立同治的下一代，反

而立他的弟弟，立子不立弟是常规，慈禧违反常规，乃因为光绪是她的亲生儿子。

清末人文廷式在《闻尘偶记》中有另一段记载：光绪八年春天，琉璃厂有一位卖古董的，姓白，白某经李莲英介绍，进入大内，得幸于慈禧，那年慈禧四十六岁。慈禧留白某住了一个多月以后，放出宫。不久，慈禧感到不舒服，慈安太后派人密察，得知慈禧怀孕了。

慈安太后十分气愤，召来礼部大臣，寻问废后之礼。礼部大臣回答说，“此事不可为，愿我太后明哲保身”。当夜，慈安猝死。原来，慈禧当天探知情况后，派人给慈安送去药酒，慈安喝下后就死去的。

历史上发生过一起皇后私通的冤案。被诬陷者为辽道宗的萧皇后。萧皇后小字观音，姿容冠绝，多才多艺，善写诗，曾自编歌词，弹得一首好琵琶。她十七岁被封为皇后，很得道宗的宠爱，她也十分自重。有一次，萧皇后见皇太叔的妻子重元艳冶白矜，一副轻佻浮躁的样子，就告诫她，“为贵家妇，何必如此！”

萧皇后生的耶律濬被立为太子，太子逐渐长大。他看不惯枢密使耶律乙辛在朝廷弄权、挑拨是非。耶律乙辛也看出太子对他不满。野心极大的耶律乙辛决心用计策迫使皇帝废掉太子，废太子必先废皇后，于是，他从萧皇后下手。

萧皇后由于喜爱音乐，常与伶官赵惟一切磋技艺。耶律乙辛用计诬陷萧皇后与赵惟一私通。他先让党羽炮制了一首淫诗《十香词》，然后收买了萧皇后的婢女单登，要求单登假称从别处抄来了这首宋朝皇后做的诗，请萧皇后抄写一份赐给她。

萧皇后没有多想，一口气把诗抄了下来，抄完以后，她忽然感叹赵宋王朝的那种只顾眼前享乐的生活，提笔又附上了自己的四句诗：

宫中只数赵家妆，败而残云误汉王。

惟有知情一片月，曾窥飞鸟入昭阳。

《十香词》和萧后的这首诗被拿到道宗的面前，作为揭发萧皇后淫乱的证据。萧皇后做的四句诗中，正嵌着赵惟一的名字，不由得道宗不信。道宗怒气填膺，下诏废掉皇后，并赐萧氏自尽。赵惟一被杀。

几年后，耶律乙辛的阴谋败露，道宗追查其罪行，得知萧皇后被诬陷的真相，痛悔不已，立即追复萧皇后的名号，命全国僧尼诵经，为她超度亡魂。

第四章 深宫女性生活

一、皇宫嫔御制度

古人把为皇帝提供性服务的制度叫做嫔御制度。把嫔御所居之处叫做六宫。皇后是皇帝的正妻，位居中宫、并统率六宫，皇后便是六宫之长。嫔御制度和六宫制度是同一个意义。

周代，内宰（国君的内廷事务官）的职责之一是，用阴礼（女性应遵循的礼节规范）教导六宫女御、掌进御於五所。秦代，取六国的美女列六宫。帮助汉高祖建立制度的儒生叔孙通，揉合古礼和秦制，把六宫制度延续和确定下来，以后历代大同小异。

六宫嫔御成为制度，就需要给那些为皇帝提供性服务的女性定立名号。

《周礼》规定，天子立一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皇后是皇帝的正妻，天为乾地为坤，皇天配后土。因此，各代皇后只有一个（有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朝代例外）。皇后以外，嫔御的名号、数量各代都有不同的规定。除了有名号的嫔御以外，还有数不清的宫女。

我们先不厌其烦地看看各个朝代的嫔御制度：

西汉，经汉初、武帝、元帝的订立和增修，嫔御名号有十四等。昭仪、婕妤、姁娥、容华、美人、八子、充依、七子、良人、长使、少使、五官、顺常、无消（这一等还有：共和、娱灵、保材、良使、夜者）。

东汉仅有贵人、美人、宫人、采女四等。

曹魏的皇帝对嫔妃名号甚感兴趣。也许是出於喜好文学的缘故，每个皇帝在位时都要把嫔妃名号作番调整。至魏末定为十二等：贵嫔、夫人、淑妃、淑媛、昭仪、昭华、修容、修仪、婕妤、容华、美人、良人。

晋代，雅兴祖法《周礼》中的嫔御制度，其影响及於南朝、隋唐和金代。晋制：贵嫔、夫人、贵人为三夫人；淑妃、淑媛、淑仪、修华、修容、修仪、婕妤、容华、允华为九嫔；下有美人、才士、中才人。

南朝宋，各个皇帝在晋制上有所增删，至宋明帝时规定：贵嫔、贵妃、贵姬为二夫人；淑媛、淑仪、淑容、昭华、昭仪、昭容、修华、修仪、修容为九嫔；婕妤、容华、充华、承徽、列荣为五职；美人、才人、良人为散役。

南齐规定：贵妃、夫人、贵人为三夫人；修华、修仪、修容、淑妃、淑仪、淑媛、婕妤、容华、充华为九嫔；美人、中才人、才人为散职。

南梁及南陈，以贵妃、贵嫔、贵姬为三夫人，淑媛、淑仪、淑容、昭华、昭仪、昭容、修华、修仪、修容为九嫔；婕妤、容华、充华、承徽、列荣为五职；美人、才人、良人为三职。

北魏有左右昭仪、三夫人、三嫔、六嫔、世妇、御女。

隋朝，隋文帝在独孤皇后死后，按《周礼》修订嫔御制度。炀帝雅好此事，参详典故，自制嘉名，规定：贵妃、淑妃、德妃为三夫人；顺仪、顺容、顺华、修仪、修容、修华、充仪、充容、充华为九嫔；婕妤十二员及美人、才人十五员为世妇；宝林二十四员，御女二十四员，采女三十七员，共为女御。

唐代，贵妃、淑妃、德妃、贤妃为夫人；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为女嫔；婕妤、美人、才人各九人，为二十七世妇；宝林、御女、采女各二十七人，为八十一御妻。唐中后期有些改动，姑不计。

宋代的嫔妃名号没有准则，纷纭杂乱。一女子初入宫名号有：侍御、红霞帔，再进一步，封君，如永嘉郡君、始平郡君；南宋改君为夫人，如齐安郡夫人、咸安郡夫人、平乐郡夫人，人数及郡名不定，再由此升为才人，由才人进为美人，再上是婕妤、昭仪、昭容、修媛、修仪、修容、充媛、婉容、婉仪、顺容、贵仪等众名号。妃一级是：贵妃、贤妃、德妃、淑妃、宸妃。宋代的特色是人无定位，先由初级开始，随着宠遇的增长，不停地晋级。

辽代，有元妃、德妃、文妃、惠妃，这之间没有级次。

金代，贵妃、贤妃、德妃为三夫人，其下与唐代相同。

元代对后宫女子定立名号，并无多大兴趣，除皇后外，仅有妃这个名号。

明代，受元代影响，后宫女子虽多，名号仅妃一级。宫女被“御幸”后可获得妃的名号。有贵妃、淑妃、宁妃、贤妃、恭妃、宸妃、康妃、庄妃、裕妃等，贵妃位最高。

清代，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五级。下有答应、常在，不算正式名号。

以服务于皇帝为中心的后宫事务，各代都由女官和宦官负责。女官有些朝代是由嫔御兼任的。女官及嫔御不同于一般宫女，她们既已获得名号，在后宫就是官，有相应的俸禄。最高一级的妃子俸禄等同于丞相，以下者也与处廷官员一一对应。

《周礼》中规定，九嫔兼掌教导女性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世妇兼掌丧礼、祭礼、迎送宾客之事；女御兼掌君王的燕寝事宜；女史专门负责监督后宫的规章执行情况，记功书过。

在嫔御不兼任女官职务的朝代，女官自成体系。如隋朝女官设六局二十四司。第一是尚宫局，下设四司：司言、司簿、司正、司围。二是尚仪局，下设四司：司籍、司乐、司宾、司赞。三是尚服局，下设四司：司玺、司衣、司饰、司杖。四是尚食局，下设四司：司膳、司馐、司醢、司药。五是尚寝局，下设四司：司设、司舆、司苑、司灯。六是尚工局，下设四司：司制、司宝、司彩、司织。唐代相沿。宋代也设置上述职掌的女官。明代也设六局二十四司及女史，另设宫正负责戒令责罚。

夹城门与内门通，朝罢巡游到苑中。

每日日高祇候处，满是红艳立春风。

——花蕊夫人宫词

退朝后走进后苑，满目是春风中玉立的娇艳女郎。皇帝会由衷地感到做天子的滋味。就象每天的御膳，面前摆着无数的美味佳肴，绝对不可能一次吃完，只能吃眼前的几味菜，后面的也只能挑着尝一点。中国皇帝，要的就是这么多，这么大的气派。

今夜是谁侍寝？千百个、甚至上万个后宫女子在寝静冷寞的深夜里盘算着、叹息着。

嫔妃进御之事，是内廷的一件要务，如在外廷皇帝上朝一样重要。对于皇帝来说，后者可以免去，而前者一日不可或缺。后宫有专人负责办理、记录寝妃进御之事。

周代已有负责君主阴事的阴令。汉代的掖廷令“昼漏不尽八刻，白录所记推当御见者”。就是在夜晚来到之前，记上当日谁侍御寝。东汉以后这件任务由宦官负责。各个朝代，宫中都有一本备忘录，专记皇帝御幸之事，以备日后查考。如同外廷大臣克尽职守一样，负此职的宦官也是一丝不苟。

北魏文成帝偶然登楼四望，见平城宫内有一位美人。文成帝问左右的人，“此妇人佳乎？”众人一致赞同。于是，文成帝走下白楼，向美妇人走去。二人宿于斋库。该女李氏因此怀孕。

日后皇太后查问，恰有守库者在库墙上记下了当时的时间和事件，两相核对，无差错，李氏怀的这个胎得到了承认。由此可知，皇帝办事固然随心所欲，记录者也能捕捉到踪影，守库者本不负责此职，事关重大，也得及时记录。

明代，文书房宦官负责记录皇帝每晚寝宿所在及所幸宫嫔名字。女官彤史，负责记录后妃宫女被幸於皇帝的寝所。看来，明代是双重记录，宦官与女官，各根据皇帝、后妃宫女的形迹，分别记录。

明神宗最初偶然御幸宫女王氏，事后隐讳不言。后来王氏有了身孕，太后急于抱孙，查验了文书房的记录，然后向神宗说起此事，神宗不愿承认。太后遂命人将内起居注拿来让他看，神宗才不得已承认了。神宗这种态度是因他不再对王氏感兴趣，但明代惯例，宫女被幸后怀孕就要进封为妃。他不愿封王氏，只想蒙混过去。

后妃宫女的佩物——环，在皇帝的御幸制度中有一定的意义。“环”与“还”同音。后妃在侍寝时寻问皇帝何时回去不直言，而是用佩玉鸣佩环，问：“何时大刀头”？这又拐了一道弯，因环系於刀头，使用刀头代指环。如后妃宫女遇月经，不能侍寝时，也不能直言，而是以丹注面，灼然为识。

蜥蜴因其特有的用途被称为“守宫”。蜥蜴被用朱砂喂养於器皿中，因以朱砂为食，身体尽赤，食满七斤以后，将其捣成碎末。用这些赤色粉末涂在或点在宫女肢体上，可以终身不灭，但有房事时则灭。李贺《宫娃歌》中有句诗“蜡光高悬照纱空，花房夜捣红守宫。”

下朝后走向后宫的皇帝，脚步有些徘徊，打不定主意去找谁，今夜宿在何处。风流皇帝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后宫女子多至四万，不知道怎样安排她们为他服务。后来，玄宗想出了一个办法，每天将一群宫嫔集中在一起，让她们投骰子，投中者中最优胜者，当夜侍寝。私下里宦官把骰子称为剉角媒人。

春秋季节，唐玄宗令后宫女子们在门前栽花，玄宗追随着一只蝴蝶走，蝴蝶落在谁的门前，当晚便宿在该处，称此法为蝶幸。

由于进御的女子太多，玄宗难以一一记住她们的姓名和相貌，便又发明了一则风流办法，将已进御的宫女臂上，打上“风月常新”之印，再渍以桂红膏，使印记牢固，经水洗不褪色。

自杨贵妃入宫，夺得皇帝的独宠后，剉角媒人、蝴蝶和“风月常新”印都派不上用场，后宫女子只得在七夕向牛郎织女诉幽情。

唐敬宗发明了一种风流箭，用意也是决定侍寝之事。用竹皮做弓，纸做箭，纸中间密贮龙麝末香。宫嫔聚在一起，敬宗搭箭一射，中箭者浓香触体，了无痛楚。后来宫中流传着“风流箭中的——人人愿”的话。

西晋武帝的后宫生活是和羊车联系在一起的。武帝司马炎是司马昭之子，“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是说司马昭握朝中大权，想取代皇帝，但他至死也没有下定决心。他的儿子司马炎早就不耐烦了。权臣虽然有权，但色欲的满足却比不上皇帝，权力即使大过皇帝，也不能象皇帝一样享受无数的美色。

司马炎的祖父司马懿就已经对老妻厌烦了。司马懿曾卧病在床，正室张

春华已经色衰爱弛，蹑手蹑脚地前来照着丈夫。司马懿一见这个黄脸婆就骂道：“老物可憎，何烦出也！”张春华又羞又恨，要绝食自杀。司马昭兄弟们都同情母亲，也跟着绝食。司马懿发现连累了儿子们，忙向张氏致歉，张氏和儿子们才开始进食。事后司马懿私下对他人说：“老物不足惜，虑困我好儿耳！”。

司马炎三十岁那年，司马昭死，他取代了父位，立即逼魏帝禅让，自己登上了帝位。他要好好享受只有皇帝才可享受的待遇。祖父的委曲他不会再遇上了，后宫有的是美人。晋武帝开创了后宫万人的历史纪录。

由於宫嫔数量太多，晋武帝最初也头痛于到何处过夜。后来，发明了羊车，用羊车载着他在后宫的小路上漫游，羊停到谁的门前，就由谁来侍寝。宫嫔们都盼望皇帝的羊车在自己的门前停下。这时，便有聪明的女子显示智慧了，她们用竹叶插在门前，把盐汁洒在通往门口的小路上，引诱羊舐着盐汁，顺路走到门前，吃门上的竹叶，于是，车子就停了下来。

从此，羊车成了后宫的传世宝物。南朝宋文帝乘羊车经过诸嫔妃房前，羊总在潘淑妃的门前停下来，舐地上的盐水。文帝见到潘淑妃，感叹地说，“羊都为你留连，何况人呢？”潘淑妃由此爱倾后宫。

后宫进御是否有规律道理可循？五代后梁的一位国子博士崔灵恩的研究结果是：后妃进御，十五日轮一遍，从最低位的妃子开始，与月亮的规律相配。月初最小，越来越大。月亮象征阴，也象征女性。月晦和月望即每月初一、十五是需要谨慎的，所以古代君主不在这两日御于内，因为晦者阴灭，望者争明。

《春秋》上说“晦阴惑疾，明谣心疾，以辟六气”。九嫔以下，每九人中进御一人，八十一女御占九个晚上，世妇二十七人占三个晚上，九嫔占一个晚上，三夫人占一个晚上，以上共十四夜，皇后独占一个晚上，共十五夜。上半个月按上述安排进御，下半个月从十六日开始，由皇后起，再御九嫔、世妇、女御，与月亮由盛而衰相对应。至于年龄上的规定是，九嫔以下，女御以上，到五十岁停止进御。三夫人和皇后不在此例。

古代学者的这套理论显然牵强附会，也不能为古代帝王们接受。皇帝拥有众多的女性，是为了满足色欲，哪一夜由谁来侍寝取决于皇帝的兴致，如果皇帝没有兴致，也可以独寝。如果按照崔灵恩的安排行事，岂不成了一种劳役，周而复始，个个点卯，还有何种乐趣？

明代后宫，每日天渐黑时，嫔妃所住的宫门前，都挂起两只红纱笼灯。皇帝临幸某宫，则该宫门上的灯卸下来，表示皇帝已选定寝宿的地方。于是，负责巡街的宦官，传令其他各宫均卸灯寝息。失意的嫔妃们只得灭掉希求宠幸的红纱笼，明晚再重新挂上。

明代皇帝第一次临幸嫔妃的住所，要铺宫，由宦官将房间装饰一新，该承幸的妃子也要有相应的装饰。

皇帝临幸之所照例焚香，香气异常，其用意有宫词道出“参于鼻观气非清，脉脉遗芳媚寝情。雨迹云踪易牵引，莫容轻露上空明。”

一次，崇祯皇帝来到一间便殿，觉得有团异香浸入心脾，心怦怦直跳，问近侍这是什么东西？回答是：“圣驾临幸之所，例焚此香。”崇祯叹息道，“这是皇父、皇兄所以话不长的原因啊（原文：此皇考、皇兄所以促其天年也）！”于是，禁用此香。其实焚香之例，古已有之，唐诗人张籍在《焚宫行》中有句：“下辇更衣入洞房，洞房侍女尽焚香。”

清代嫔妃侍寝与各代不同，不再是皇帝亲自登门。清代皇帝自有一套制度。每日晚膳时，决定哪一个妃子当晚侍寝。每个妃子都有一块绿头牌，牌面上是该妃子的姓名。备晚膳时，敬事房太监将十余块或数十块绿头牌放在一个大银盘中，谓之膳牌。

皇帝晚膳用完，太监举盘跪在皇帝面前。如果皇帝没有兴致，则说声“去”。若有所属意，就拣出一块牌，扣过来，背面向上。太监拿过此牌，交给另一位太监，这位太监专门负责把将要求承幸的妃子用背扛到皇帝的寝所来。

出于清代皇帝高度的戒备心理，防止妃子中出现刺客，妃子必须裸体来到皇帝寝所。方法是妃子被带到离皇帝寝所不远的一间屋里脱光衣服，宦官用红锦被或大衣将她裹上，扛上肩，背进皇帝的寝所。到帝榻前，去掉外裹的红锦被或大衣。

后面发生的事情当时人的记载道，“届时，帝先卧，被不复脚。……妃子赤身由被脚逆爬而上，与帝交焉。敬事房总管与驼妃之太监，皆立候于窗外，如时过久，则总管必高唱曰：是时候了。帝不应，则再唱，如是者三。帝命之入。则妃子从帝脚后拖而出。驼妃者仍以擎裹之，驼而去。去后，总管必跪而请命曰：留不留？帝曰：不留。则总管至妃子后股穴道微按之，则龙精皆流出矣。曰：留。则笔之手册曰：某月某日某时，皇帝幸某妃。亦所以备受孕之登也。此宫禁中祖宗之定制也。”

若皇帝住在圆明园，这套方法就不必了。膳牌之法仍旧。皇帝在一年中的大多数时间住在圆明园，觉得那里更自由一些，又可以不破坏紫禁城内的祖宗规矩。皇帝一般在年终回宫，一、二月又返回圆明园。

清帝召幸嫔妃，照例在门前倒悬红灯，在行宫也是这样。

宫女们入宫时梳辫子，一旦被召幸并获得名号，就要把头发盘上去。

二、宫女遴选制度

中国古代宫廷蓄养的女子之多，在世界上是无匹的。皇帝们，尤其是性喜渔色而荒于政务的皇帝们，对填充后宫之事，乐此不疲。没有人能够阻止皇帝这么做。如同贪婪的土地所有者一样，要把粮食堆积得顶破了天。前前后后的帝王们似乎竞相着开创或者说打破宫女数量的记录。

西汉初年，宫女只有十人。到汉武帝时，宫女突破一千数字。东汉桓帝时，后宫聚集美女五、六千人。晋武帝司马炎将宫女数字突破一万。南朝宋文帝时，后宫“椒庭绮观，千门万户，而淫妆怪饰，变炫无穷”。南朝仅有半壁河山，后宫却如此繁盛，可以说打破了晋武帝创造的记录。

南朝齐东昏侯，陈后主也把宫女数量列入了万人的记录。隋炀帝时，离宫遍天下，各离宫都置备大量宫女。但历史最高记录的创立者并不是隋炀帝。

唐玄宗大概是后宫女子数量最高记录的创立者。开元、天宝年间后宫人数跃升四万。唐玄宗曾召见大师一行，问他：“师何能？”一行回答，“惟善记览”。玄宗为了证实一行的本领，令人拿来登记宫女的簿册——宫人簿，让一行从头至尾看一遍，然后合上簿册，复述一遍。一行大师“记念精熟，如素所习读。”背至数页之后，玄宗心服了，忙叫他停住，从御榻上走下来，向一行恭敬地行礼，呼为圣人。

明代宫女的数量是九千，但宫中每年花费的脂粉钱达到四十万两银子，由此可以推知各代用在宫女身上的费用。

各朝各代从民间挑选宫女是一件经常性的工作。宫女的家族大多是普通百姓，但必须是良家，即非医，非巫，非商贾和百工，这些人家的女子叫良家子。历代都规定宫女取自良家子。例如汉代王昭君就是良家子。

唐玄宗遣使到全国各地选拔美女，号称“花鸟使”。

明代选民间淑女的情况，以天启大婚时为例，“天启元年，熹宗将举行大婚礼，先期选天下淑女年十三至十六者，有司聘以银币，其父母送之，以正月集京师，集者五千人。后亦被选入都。天子分遣内监选女，每百人以齿序立，内监循视之，曰：某稍长，某稍短，某稍肥，某稍瘠，皆扶出之。凡遣妇者千人，明日，诸女分立如前，内监谛视耳、目、口、鼻、发、肤、领、肩、背，有一不合法相者去之。又使自诵籍、姓、年岁，听其声之稍雄、稍窳（粗劣、难听）、稍浊、稍吃者皆去之。去者复二千人”。

“明日，内监各执量器量女子之手足，量毕，复使周行数十步，以观其丰度，去其腕稍短、趾稍巨者；举止稍轻躁者，去者复千人。其留者亦仅千人，皆召入宫，备宫人之选”。

“分遣宫娥之老者引至密室，探其乳，嗅其腋，扪其肌理，于是入选者三百人，皆得为宫人之长矣。在宫一月，熟察其性情言论而评汇其人之刚柔愚智贤否。于是，入选者仅五十人，皆得为妃嫔矣。”

清代每三年选一次秀女，入选者都是八旗少女，汉女则不入选，清代这种做法固然是为了保持满州血统，实行时确实不扰民，有利于广大汉民的安居乐业。以往任何朝代，每当选宫女的事情落在哪一个地区时，该地区的百姓就人心惶惶，纷纷赶到朝臣到来之前，把女儿嫁出去。

如果女儿被选为宫女，在宫中没能出人头地，那么，今生再无机会见到家人了，只能在宫中默默死去，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宫女都是这种命运。那么百姓的女儿登车而去时，不就是和家人生离死别？

清代比较而言，还算人道。宫女只有一、二百人，有百人左右能够 and 皇帝接近。青春完全旷废的女子几乎没有，因为，清代还规定，宫女未被皇帝看中的，二十四岁（有时是二十五、三十岁）时送出宫，另行择配。

清代选秀女的详细情形是这样的：各旗每年要将本旗的十四至十六岁的女子造册上报。在行选期间，各旗的参领、领催负责把候选的女子运上车，送往宫城北门——神武门。运送秀女的车队按规定要在夜间行进，到达后，候选的秀女们被领入神武门内，在顺贞门外恭候，由户部官员负责管理。

至时，由太监首领主持挑选工作。秀女们每五人一组，引到太监面前，站立，太监审视。当意者，留下姓名牌子，叫做留牌子。牌子上书着“某官某人之女，某旗，满洲人（或蒙古、汉军人），年若干岁”。至当日午时，初选完毕，未被选上的，由本旗的车子载还。

初选通过后的女子，要入宫进行复选，“试以绣锦，执帚一切技艺，并观其仪行当否”。凡不合格者被送出宫，叫做撻牌子。

清咸丰年间选秀女时，一位不知名的少女的表现，被载入史册：当一群秀女们在拂晓时分站在坤宁宫外，等候挑选时，正传来太平军攻克南京的消息，咸丰皇帝坐卧不宁，屡屡召见大臣。

到午后，站在坤宁宫外的女子们已经疲倦不堪，饥渴难忍。秀女们相向饮泣。太监在一旁喝斥道，“圣驾行且至，何敢若此！不畏鞭笞耶？”众女子吓得战栗不止，有的要晕倒。这时，一位少女站出来，厉声说：“去室家辞父母以入宫禁，果当选即终身幽闭，不复见其亲，生离死别，争此晷刻，人孰无情？安得不涕泣？吾死且不畏，况鞭笞耶？且赭寇起粤峽间，不数载悉长江而有之，今遂陷金陵，天下已失其半。天子不能求将帅之臣，汲汲谋战守以遏贼锋，保祖宗大业，而犹留情女色，强攫民家女，幽之宫禁中，俾终身不获见天日，以纵己一日之欢，而弃宗社于不顾，行见寇氛迫宫阙，九庙不血食也。吾死且不畏，况鞭笞乎？”

太监从未听到过秀女说出这种话来，惊恐地去捂她的嘴。这时，恰好咸丰乘御辇过来，见太监们捆住这位秀女，拉到自己面前，硬按住她下跪。该女犹倔强不肯屈膝。

咸丰已经稍稍听说该女刚才的一番言论，他命太监们松手，笑着问她刚才说了些什么？少女侃侃对答。咸丰欣然地说，“此真奇子也！”命松绑。引入宫入朝见皇后。咸丰为她择婚，并将此次所有秀女放还回家。

显然，被选为宫女不是一件幸事。清宫中有地位的女性亲属加恩免试。规定：太后、皇后之姐妹，嫡亲兄弟之女、嫡亲姐妹之女免试，后又包括嫔以上的亲姐妹免试，乳妈的亲生女也可免试。

明代的一位邵太后也深感于入宫女子的不幸，她对孙子嘉靖皇帝说：“女子入宫，无生人乐。饮食起居，皆不得自如，如幽系然。以后选女入宫，无下江南，此我留大恩于江南女子者也。江南人家亦幸无以丐幸泽，送女子入宫。”

入送的宫女中有一些是十岁左右或更小的女童。这种做法是为了确保其处女身份？或者太后、皇后喜欢年龄更小一些的侍女？当然还有女家的原因，如一位妇女亡夫，自己打算改嫁，小女无所依托，就会把她送入宫中。宋仁宗的张贵妃就属于这种情况。明代万贵妃四岁入宫，宋仁宗的另一位贵妃冯氏九岁入宫，有名的陈后主宠妃张丽华，入宫时仅十岁。如果十二、三岁入宫，就属于普遍情形了。

元代要求高丽国每年进贡美女，以示臣服。由此形成制度，到明代初期还在延续。明成祖妃权氏就是高丽女子。

不少女子是被父、兄主动纳入宫中的，家人寄希望于她获得皇帝的宠幸，以求得全家荣显。历史上传为佳话的“倾国倾城”的故事，就是出自李延年向汉武帝引荐妹妹的事情。李延年是宫中的歌、舞艺人，能自制词曲、美妙动人。一天，汉武帝听他唱道“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武帝被歌声感动了，叹息说：“善！世岂有此佳人乎？”李延年并没有直接告知武帝这位佳人就是自己的妹妹，而是令平阳公主使武帝得知此情。武帝一见李夫人，真是名副其实。

汉明帝的马皇后是名将马援的女儿，马援以身殉职，还遭到他人诬陷，马家又被权贵欺侮。马皇后的堂兄在忧愤中上书皇帝，请将马援的三个女儿入选太子宫中。当时，马皇后只有十二岁，她带着家族的希望进入宫廷。

古人相信相术，一位平凡的女子若是被相术师相出大吉大贵来，而女中尊贵者就是皇后、贵妃，那么该女子的家人就会把她献到宫中去。如西汉景帝的王皇后，本来在民间已和一位姓金的结婚，生了孩子。王皇后的母亲听相师说她女儿命中富贵，便把女儿硬从金氏家中夺走，送入太子宫。而东汉章帝窦皇后也是因相师的判断，为求富贵进入宫中的。

也许冥冥之中真神灵保佑，她们竟如愿以偿。起关键作用的不是别的，恰是美貌。汉章帝就是听说窦氏美貌，才引见她的。

朝廷官员的女儿也是宫女的候选人，并且是重点候选人。

凡被家人主动献入宫中，或者父、祖在朝廷任官的女子，比一般从民间批量载入宫的女子，更有机会令皇帝注意。这些人大多一入宫就被封上名号，再进一步越居后宫女子之上。而普遍的良家子即使有美色，也很难被发现。如王昭君，杂处于成千的宫女之间，默默无闻。

三、宫女的色艺之竞

进入后宫的成千上万的宫女，她们唯一的出路就是赢得皇帝的青睐，过上真正人的生活，然后再走上人上人的地位，这一生就算成功了。不然的话，只能做一辈子宫女。宫女在后宫的地位是仆人，是后妃们的仆人。为一个皇后服务的宫女一般有一、二百人，在太后周围服务的宫女数量也许更多。而嫔御们既已获得名号，在后宫就升为主人，升为官，她们也需要宫女们侍候。如汉元帝传昭仪初入宫时，为上官太后的侍女；陈后主的宠妃张丽华，先是龚贵人的侍女。

当然，宫女在后宫是备用为皇帝提供性服务的，从事杂役也不繁重，繁重的事务由宦官承担。有些宫女是因父亲犯死罪，被没入宫廷的，她们相当于女犯人，从事惩罚性的劳动，如织布、舂米、洗衣。宫中专设织布的作坊，叫做暴室，因为丝麻需要凉晒，作坊就以暴室为名。从事这些劳动的人数也不少，汉宫专设暴室令，监督她们的劳动，处罚违反规章者，暴室同时又成为宫中的监狱。凡在宫中犯重罪者，都要遣送暴室，西汉的数名被废黜的皇后，送往暴室幽禁，并死在那里。

宫女们怎样才能越于众人之上，引起皇帝的注意呢？这是无数的、各朝各代的宫女们日夜思虑的问题。

机会是最重要的，只有先让皇帝看见她，才能使皇帝注意她。“春风一面晓妆成，偷折花枝傍水行。却被内监遥觑见，故将红豆打黄莺。”试想皇帝在苑中闲步，隐约看见水畔花旁，有个少女婀娜的身影，能不触景生情？然而实际上机会大多不由宫女自己掌握。一些在太后、皇后、贵妃身边作侍女的宫女，因为皇帝经常与上述人联系，她们便近水楼台。傅昭仪、张丽华就是这种情况，还有宋徽宗的郑贵妃（后来升为皇后）、王贵妃开始都是太后身边的宫女。

美色是决定性的因素，没有哪个皇帝见美色而不爱，否则他就不会派人去选美。后宫是一个美女如云的地方，仅仅靠端庄秀丽是不够的，非国色天香不足以引起皇帝的喜爱。汉元帝时，王昭君默处后宫多年，当元帝决定将她赠给呼韩邪单于时，并未见过这位宫女，是王昭君主动要求远适匈奴的。当王昭君临行到元帝面前行礼时，元帝才第一次看见这位绝代佳人，他痛悔不已。由于无法收回成命，只得将怒气转向宫廷画师。元帝后宫女子突破千人，他不能一一阅看，便让画师将宫女们描画成图，呈送皇帝，任皇帝挑选其中美貌者。宫女纷纷讨好，贿赂画师，求他们把自己画得美一些。独王昭君性格倔强，不去求请画师，结果画师毛延寿把她画得平淡无奇。王昭君远嫁匈奴，刚刚骑上马背，元帝就派人把毛延寿杀了。

汉武帝时，宫女尹氏被武帝看上，封为夫人，不多久便被疏远了。她得知武帝又看上了一个比自己貌美得多的邢夫人。武帝大概相信“美女入室，恶女仇之”的谚语，不让二女相见。尹夫人为了知己知彼，要求见一见邢夫人。武帝为了应付她，便让一位普通宫女穿上夫人的衣服出来相见，尹夫人看了这个女子一眼，就对武帝说：“这不是邢夫人。”武帝惊异地问：“你怎么知道？”尹夫人平静地回答：“视其体貌形状，不足以当人主。”武帝见无法蒙骗她，只得命人传召邢夫人。邢夫人穿着一身旧衣服，尹夫人望见邢夫人向这里走来，说声：“就是她。”垂下了头，自愧不如。自卑自怜的泪水不禁落下。

“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中原逐鹿，自命为天下英雄者，无一不好美色。

吴大帝孙权时，有一位潘姓女子为江东绝色，后来潘女因父亲生罪，被收入宫中织室。孙权听说织室中有一位绝色，命画工前去画下她的容貌。画工画了一幅潘氏的写真图，送到孙权面前，画面上潘女一副哀愁的神态，孙权心花怒放地说：“愁貌尚能感人，况在欢乐？”于是立即命侍从用雕轮把潘氏从织室接出来。孙权的儿子孙亮，对美色也津津乐求。他从宫中选出相貌最佳的四名宫女，赐给新名，一名朝姝，二名丽居，三名洁珍，四名洁华，四个名字分别是四种香料。孙亮让四名美女同坐在一个琉璃（应是玻璃）帐内，从外望进，如四位水晶宫女。

江北沛县一个出身微贱的女子甘氏，“玉质柔肤，态媚容冶。”被刘备发现，纳入宫掖。甘氏的美艳使刘备产生了如遇仙人的感觉。他把甘氏放在白绡帐中，自己从窗外向里望，白绡帐中的甘氏如站在月光下的皑皑白雪中。刘备对甘氏宠爱备致，又将她封为皇后，甘氏所生的阿斗刘禅被立为太子。

魏文帝曹丕是一个极为好色的君主。他先把江北绝代佳人甄氏拥为己有。甄氏的美貌在曹植的《洛神赋》中被描绘得仙姿神韵，如梦如幻。后来曹丕对她冷落了，他又发现了新的美人薛灵云。薛灵云家在常山郡，曹丕命地方选良家子时，常山太守谷习特别注意到本郡的这位美人。谷习给了薛家一个值千金的宝物，把薛灵云聘来，专车从常山出发，送往京师。曹丕得知情况，派文车（有花纹的车）十乘去接。离京师十里之远时，曹丕亲自乘雕玉之辇相迎。望着华贵盛大的车队，想象着美人的容颜，曹丕产生了诗情，他对自己说：“昔言朝为行云，暮为行雨”，今非云非雨，非朝非暮，改灵云之名曰夜来。夜来不仅美色夺人，技艺也惊人。她善于女红，过去贫贱时常在夜间做针线活儿，用麻藁点燃为光源。在宫中，她不用灯烛就能在深帏重幄之内裁衣制衣，完成的速度也很快。曹丕后来穿的衣报都是她缝制的。在宫中人称为“针神”。

和夜来同时期的孙权赵夫人，善于刺绣，技艺绝妙无双。她能在方寸内，用彩色丝线织绣出云霞龙凤。宫中人称她为“机绝”。

可见，美人的色与艺是相辅相成的，才艺是美人的本领，高超的才艺能更好地展示自己的魅力。

汉武帝时，有位宫女名丽娟，年仅十四。丽娟肌肤白如玉，一阵风吹来，如兰花一样随风而动，身体柔软到似乎衣服系上纓佩，就会把皮肉磨伤。丽娟歌喉十分动人，歌声起时，李延年在芝生殿和之。她所唱的回风之曲，使得庭中的花起了感应，随着歌声翻落。丽娟也聪明过人，她把琥珀作成的珮藏在衣裙里，琥珀发出优美的响声，别人十分惊异，她却说是自己的骨节自鸣，更让人觉得她仙气十足。武帝对丽娟爱怜得无可复加，一身英雄豪气的汉武帝，竟象小孩子一样，把自己的衣带和丽娟的衣袖系在一起，把她放在一层又一层的重幕之中，怕她被风吹走。

汉成帝时，赵飞燕姐妹入宫，妹妹赵合德比姐姐更美艳，更得成帝的宠幸。赵合德的化妆技艺十分高超，初入宫时，她巧为妆扮，令宫中所有女子黯然失色。她用一种膏状物抹在头发上，把头发卷上去，做成一个耸立的发髻，叫做新兴髻；把眉毛修得细而长，曲线优美，叫做远山黛，脸上略施朱色，似乎不经意，叫做慵来妆。赵合德走入宫，无人能与之媲美。以好色著称的汉成帝，把赵合德看成天赐的尤物，大加宠幸。但赵合德的形体方面不

及姐姐，赵飞燕善舞，体轻腰弱，舞步轻柔，进退之间变化无穷，赵合德却跳不出这种舞步。赵合德弱骨丰肌，娇媚而任性，还善于言笑，更能投汉成帝之所好。

唐敬宗宝历年间，从浙东来的两位宫女超凡出众。她们本是舞女，一个叫飞燕，一个名轻风。她们的容貌古人形容为“蛾眉螭首”，螭是一种小蝉，额头广而且方。她们头戴用金丝编成的形如鸾鹤的金冠，冠上装饰着五彩细珠，冠顶嵌着红玉雕成的芙蓉花。她们的身上散发着幽兰之气，冬天可以不穿厚衣服，夏天也不出汗。她们的歌舞技艺非凡人所能，夜晚降临时，敬宗命她们载歌载舞，歌声如鸾凤之音，届时百鸟莫不翔集。歌舞完毕，敬宗命人把她们藏之于金屋宝帐。白天不让她们出来，以免被风吹日晒。宫女们带着羡慕和嫉妨的心情传诵着：“宝帐香重重，一双红芙蓉”的宫谣。

美人需要美饰。宫女们竞相奇巧地装扮自己，以求得皇帝的欣赏。在争奇斗艳中，宫女们的聪明智慧起到了作用。曹魏宫中有个叫莫琼树的宫女，善于修饰头发，用奇妙的方法把头发修成蝉翼状，薄而透明，赢得皇帝的宠爱。

凡皇帝赏识的装束，宫女们都要争相仿效。南唐后主李煜宫中有位叫窈娘的，身材纤细，舞姿优美。李后主忽发奇想，用金铸成一支六尺高的莲花，花边上装饰宝物、细带缨络。他让窈娘用帛把脚缠紧，外穿白袜，在诗人皇帝眼中，这双脚形同新月。窈娘以这种装束舞于莲花上，步态十分轻巧，在细而高的莲花上犹如凌云的飞燕。有诗赞道“莲中花更好，云裹月长新”。窈娘的缠足法是皇帝的杰作，从此，宫女们纷纷把自己的脚缠起来。

“宫衣新尚高丽样，方领过腰半臂裁。连夜内家争借看。为曾著过御前来。”元代从高丽来的美女，穿着自己民族的服装在皇帝面前受到赏识。宫眷们听说皇帝欣赏高丽服装，连夜借来这种衣服，琢磨它的特点，研究如何缝制。在很短的时间内，宫女们都把自己原来的衣服改成高丽式样，于是宫中高丽服如云。

明崇祯时，皇女们为获得皇帝的宠幸，风行起浅碧绫做的衣服，因为她们听说袁贵妃曾身穿浅碧绫和皇帝坐于月下，崇祯对这色衣服感到新奇，称赞道：“此特雅倩。”崇祯周皇后又首穿白纱衫，凉爽飘逸。宫女们很快也穿起了白纱衫，她们把红色帕腹衬在里面，从白纱衫外可隐约看到里面的红帕腹，效果更加诱人。崇祯不喜欢宫眷们脂粉涂得过厚，每见到厚施脂粉者，就嘲笑说：“浑似庙中鬼脸。”于是宫女们急忙改变化妆风格，轻描淡扫。

宫女中有少数富于文采，得到风雅皇帝的赏识，这也是宫女们得志的一种渠道。

历史上广为人知的宫中女才子当数西汉的班婕妤。在赵飞燕姐妹入宫前，汉成帝最宠爱的是班婕妤。最先处于宫女群中的班氏，知文懂礼，容止出众，被成帝发现，封少使，进而升为婕妤。班氏对于《诗经》很有研究，《诗经》中关于女戒的诗篇她都能背下来。时时铭记先贤的教训，对待皇帝的宠爱十分冷静，决不恃宠而骄。成帝在宫中游玩，要与她同乘一辇，班婕妤推辞了，说：“观古图画，圣贤之君皆有名臣在侧，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辇，得无近似之乎？”班氏的嘉言令成帝赞叹，遂打消了与她同乘一辇的想法。不过，庄重自持、拘泥于礼法，也使班婕妤渐渐失去了成帝对她的热情。

古代文人对班婕妤的言行评价很高。曹植的《班婕妤赞》中写道：“有

德有言，实惟班婕。盈中其骄，穷且厌悦。……”傅元《班婕妤画赞》道：“斌斌婕妤，履正修文。进辞同辇，以礼匡君。纳侍显德，说对解纷。……”

西晋大文学家左思的妹妹左芬，才气仅次于其兄。左芬的名声被晋武帝得知，把她召入宫中，封为修仪，进而升贵嫔。左氏兄妹的相貌不及中人，兄左思由于貌丑、口吃，平日居家很少外出交游。妹妹左芬也不具备美貌，晋武帝对礼敬多于宠幸。遇到诗赋、文仪方面的问题，晋武帝常来找她交谈，当左芬用清丽、优雅的语言对答皇帝时，武帝身边的侍从无不发自内心地羡慕和称道。武帝的羊车在宫中漫游，每当路过左芬的住处时，即使羊不停下来，武帝也要自动停下来，找左芬聊聊。左芬奉命写了很多赋、诔、颂，武帝十分欣赏她的词藻，常用宝物酬谢她。

唐太宗时，有位名徐惠的女子，四岁就能通《论语》、《诗经》，八岁已能写文章。她父亲曾叫她仿照《离骚》的体裁作《小山篇》，徐惠提笔写就“仰幽严而流盼，抚桂枝以凝想。将千龄兮此遇，荃何为兮独往。”父亲大为惊奇。徐惠的名声从此远近传播。大概皇帝对才女都有一一致的好奇心，唐太宗知道后，便召她入宫，初封才人，后又升为充容、贤妃。唐太宗对徐惠很是眷宠，而徐惠对唐太宗并不奉承，经常向太宗进谏，言之有据；还经常不讨太宗的喜欢。一次，太宗派人召她来，徐惠迟迟不来，太宗等了很久才见到她。徐惠见太宗一脸怒气，便挥笔写了一首诗，递给太宗：“朝来临镜台，妆罢暂徘徊。千金始一笑，一召讵能来？”唐太宗怒气全消。徐惠矜持而幽默的性格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五代后蜀宫中有位来自四川青城女子费氏，文才与美色并秀，入宫后得宠于后蜀皇帝孟昶，进封为花蕊夫人。花蕊夫人善写宫词，作品有上百首。

金代有位叫李师儿的少女，全家因罪没入宫籍监，宫籍监是奴婢服役的场所，后来李师儿以监户女子身份入宫当了宫女。当时的皇帝金章宗喜诗、重文教，他命宫中教官张建教宫女们读书。教书时，宫女们居帐内，教官居帐外，只能闻其声，不能见其面。在这群学习的宫女当中，李师儿学得最快、最好，尽管隔着一层青纱，教官张建从声音上知道李师儿最堪造就。金章宗很关心宫女们的学习情况，他问张建，宫女中谁学得最好，张建禀告：“就中声音清亮者最可教。”这个声音清亮者就是李师儿。章宗令把李师儿召来，经过考查发现，李师儿的文才正合自己的兴趣，于是大加宠幸。日后，他们经常在一起和诗对句，其乐陶陶，不久，李师儿被封为元妃，地位仅次于皇后。

明世宗时，庄妃王氏最初入宫为宫女，许久未引起皇帝的注意。后来王氏偶作小诗，传到皇帝手里，诗中有句“风吹金锁夜声多”，令嘉靖皇帝击节叹赏。王氏由此得“幸”，宠冠后宫。

除绝色、技艺、才学以外，个性也是颇能吸引人的因素。帝王们习惯了宫女娇羞、怯懦，而又渴求的共同性格，也厌倦而渐渐不屑于理会。个别宫女出人意表的言行，却能引起皇帝的兴趣。

晋武帝选宫女时，少女胡芳以良家子入选。武帝在宫女中又亲出挑选其中美艳者，挑选活动在大殿举行。武帝对宫女一一审视，用红纱巾系在选中者的手臂上，胡芳是选中者之一。对于普通宫女来说，被皇帝亲自选中是幸运至极，应该感激、庆幸、谢恩。但胡芳性格刚强、放任，她不愿被别人摆弄，又想念远离的家人，便大哭着走下殿来。宦官们见胡芳这样无所顾忌，十分惊讶，立即跑过去把她拉住，警告她说：“陛下闻声！”胡芳却抹一把

眼泪，大声说：“死且不畏，何畏陛下！”一切都看在晋武帝眼里，这个大胆的胡芳令他刮目相看，他决定封胡芳为贵嫔。

胡芳当了贵嫔以后，承然率性而不虚饰，对武帝毫无以卑对尊，以下对上的态度，自然而然，想怎样说话就怎样说话。武帝司马炎很欣赏胡芳的为人，在所有的嫔御中，他最宠爱的就是胡芳。

明世宗时，尚女尚氏因失笑得宠。明世宗嘉靖皇帝性格乖僻，忌讳颇多，晚年迷信道教，整日诵经修道。一天，他边击磬边诵经，宫女们侍列周围。世宗诵经时间长，击磬的手有些不听使唤，一槌敲错了地方。这个奇怪的声音发出后，宫女们都忍笑低头不敢作声，而其中一名十三岁的小宫女，忍不住失声大笑，世宗的目光盯了她好半天。大家都为她捏着一把汗，以为小宫女触犯了忌讳，命在旦夕。然而世宗却觉得她很有意思，这件事情也很有趣。诵完经之后，当夜就让这个宫女侍寝了。她，就是靖嘉皇帝晚年最宠幸的尚美人，以后又封为寿妃。这个奇特的女子令皇帝对她溺爱得不能自拔，在封她为寿妃的百日之后，世宗就病重不起了。世人认为皇帝的死与她有关。

宫女与皇帝的奇遇，不能不算一种得“幸”的途径。

元顺帝曾在春夜漫步月下，清风送凉，万籁俱寂，忽然从翠鸾楼传来婉转的笛声，顺帝听出这是一首词曲，词是“兰径香消玉辇踪，梨花不忍负春风。绿窗深锁无人见，自碾朱砂养守宫”。顺帝问左右的人，是谁在吹笛？宫人都知道才人程一宁常常在翠鸾楼倚栏弄玉龙之笛，现在吹笛的应该是她。宫人告诉了顺帝。程一宁的名字和月夜的笛声，给顺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天后的夜晚，顺帝又来到此处漫步，再次听到了程一宁的笛声。顺帝被感动了，他乘车来到程女住的地方。程一宁见一群火炬簇拥着皇帝到来，不知出了什么事，吓得叩头俯伏。顺帝亲手把她扶起来，说：“非卿玉笛中自道其意，朕安得至此？”牵着程一宁到了柏香台，命御厨设宴，称为开颜宴。顺帝笑着对程一宁说：“今夕之夕情圆意聚。然玉笛卿之三青也，可封为圆聚侯。”从此，程女成为皇帝的宠妃。“浣衣局内新承宠，报是佳人王满堂”。王满堂曾被选为宫女，不知何因，又被送还回家，她心志很高，在家不肯嫁人。后来受梦的启示，说如有赵万兴来聘，就许嫁他，此人贵不可言。有个姓段的道士听说后，改名赵万兴，前来迎娶。段氏为了应验大贵，作妖书宣传他将承天命，居然有人相信，在儒生的帮忙下，段氏暗地做起皇帝来，改元大顺平定。最后事泄，段氏被捕、问斩。明武宗得知这一切都源于王满堂的美梦，遂将她收入浣衣局，不久，召她侍寝，大为宠幸，王满堂的美梦终于实现。

四、皇帝与宠妃的情爱（一）

帝王的一生中，是否有过真正的爱情，这是颇令人踌躇的问题。

皇帝自命为上天在人间的主宰，整个国家都是他的财产，衣、食、美女，都是满足他各种需要的物质。女人，在皇帝面前不是同等意义上的人，而是物质，供皇帝享受，和一盘鲜美的菜肴没有什么两样。如果皇帝喜欢吃，这盘菜下次还会被端上来，如果不喜欢，饭桌上就不会再出现。皇帝对一切都是以上临下的姿态，如同驾驶马车一样，皇帝对一切都是御，一切都被皇帝所御，“御”成了专为皇帝所用的动名词。衣服是服御，饮食是御膳，女色是嫔御，这些都要被皇帝来御。皇帝和宫女发生性行为叫做御幸，女性被皇帝召来侍寝叫做进御。这种关系在清代表现得更加明显。宫女在夜晚被裸体送到皇帝的御床上，这与一顿晚餐在本质上有什么不同？这种关系被典章制度所规定。

那么皇帝一生不可能有爱情出现，这又与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事情相违，谁能说唐玄宗与杨玉环、清顺治与董鄂氏之间不存在爱情，而只是御和被御的关系？

爱情是双方在平等位置上的相互倾心。如果有爱情，就是说皇帝也有不做皇帝而做人的时候，嫔御也有不做物质而做人的时候。

皇帝也需要感情，否则，他站得太高，会高处不胜寒。皇帝的内心也很虚弱，没有人比他更孤独，他需要安慰。本是凡胎的皇帝，感情需要一个寄存的地方。他必须把自己降得和普通人一样，否则他无法获得真情的安慰，当皇帝一旦被真情牵动，就会不由自主地脱下皇帝的外衣，使内心融进人间的温暖之中。

但是，人们又无法分清皇帝与宠妃的情意究竟是爱情，还是对色的迷惑？或者兼而有之？因为没有哪一个皇帝会抛开美女去迷恋丑妇的。

唐玄宗李隆基与杨贵妃的爱情，经过白居易《长恨歌》的诗化，为千古传唱。这个风流皇帝的这段爱情感人至深，以至于人们一提起唐明皇，就马上想到他和杨贵妃的故事。

不过唐玄宗对待感情并不象人们想象得那么专一，他先后爱过很多女人，在迷恋杨贵妃的同时，又不能忘情于梅妃江采萍。玄宗即位前，喜欢出身倡优的赵丽妃，赵丽妃美貌而善歌舞。即位后，又移爱于武惠妃，赵丽妃等人一一失宠，王皇后就更不是武惠妃的对手了。因武惠妃，王皇后遭到了废黜，玄宗要将武惠妃升为皇后，大臣们上书，要玄宗“无以妾为妻”，此事便罢休了。终玄宗之世，没有出现第二个皇后。

江采萍先于杨贵妃走入唐玄宗的生活。江氏是福建莆田人，宦官高力士出使闽粤时，发现了这个美人。自从江采萍入宫后，宫女四万在玄宗眼中皆视为尘土。江采萍是个典型的南方淑女，喜欢读书，写诗赋文，以才女自居，性情恬淡，平日淡妆雅服，姿态明秀。她最喜欢的是梅花，在居所的门外种植了数株梅花，玄宗为她写了《梅亭》的匾额。每当梅花开时，江采萍赏花赋诗，在梅花前流连不肯离去，直至夜分还顾恋在花下。玄宗以其所好，戏称她为梅妃。

梅妃通乐器、歌舞，聪明灵秀。一次她和玄宗玩斗草的游戏，诸王在一旁观看，梅妃获胜。玄宗笑着对诸王说：“此梅精也。吹玉笛、作惊鸿舞，一座光辉，今斗草又胜我矣。”梅妃应声说：“草木之戏，误胜陛下，设使

调合四海，烹饪鼎鼐，万乘自有宪法，贱妾何能较胜负也？”梅妃灵巧的话语令玄宗心情欢畅。

显然，梅妃是个知书达理、内慧外秀的女子，她与玄宗的感情是和风细雨。当丰满、妖艳、浑身散发着魅力的杨贵妃出现，梅妃便陷入困境。江、杨二人的风格、个性截然不同，江采萍瘦弱文雅，性情柔缓；杨玉环体肥、性情狭刻而机智。二人在宫中势同水火，充满敌意。二人争宠，江采萍在气势上敌不过杨玉环，玄宗明显被杨玉环吸引，但又不忍割舍梅妃，他最初把江、杨比作舜的两个相处得非常友善的妻子——娥皇和女英。

梅妃的命运实际上握在杨玉环手上，玄宗对杨玉环到了痴迷的程度，杨玉环有她无我的态势，使得玄宗不得已放弃了梅妃，把她迁到上阳东宫。

不知过了多久，一天夜晚，玄宗忽然念起与梅妃的旧情，派宦官悄悄把梅妃接来，一路上遵嘱不敢点灯，以免被升为贵妃的杨玉环发现。在翠华西阁，玄宗与梅妃重叙旧情，互诉相思，梅妃泪如雨下。天刚亮，玄宗惊醒过来，御侍突然来报告：“贵妃已经到了前阁，怎么办？”事情已被杨贵妃得知，玄宗慌忙把梅妃抱起，藏在夹幙间。杨贵妃已经进门问罪：“梅精在哪里？”玄宗慌称：“在东宫”。杨贵妃说：“告诉她，今日同浴温泉。”玄宗还解释：“她已经被远放了，并没有往来。”贵妃再次质问，玄宗东张西望不予回答。杨贵妃环顾室内，大怒说：“肴核狼籍，御榻下有妇人落下的鞋，夜来何人侍寝，欢醉至于日出不视朝？陛下现在应该朝见群臣，我在这里等你回来。”玄宗羞愧难堪，把被子盖在身上，闭上眼说：“我今天不舒服，不可临朝。”杨贵妃气冲冲地走了。玄宗叫梅妃出来，得知梅妃已经被宦官送回东宫了。玄宗恼羞成怒，一气杀了那个宦官。拾起梅妃落下的鞋和头饰，命人还给梅妃。梅妃见到玄宗派来的使者，问：“皇上要永远遗弃我了？”使者说：“不是遗弃你，是怕惹杨玉环生气。”梅妃惨笑道：“怕怜我而动肥婢的怒气，岂不就是遣弃我？”

怎样才能使皇帝看重与自己的情意，重新回到皇帝身边，江采萍想起了西汉司马相如为陈皇后作《长门赋》的故事。当今才子济济，只要高力士肯帮忙，就能找到今日的司马相如，她送给高力士一笔重金，告诉她自己的心愿。高力士正是奉承杨贵妃的时候，并且畏惧杨贵妃的盛气，只得对梅妃谎称没有人会写赋。江采萍怀着满腹幽忿，提笔自作《楼东赋》。

梅妃的《楼东赋》被递到玄宗手里，同时也被贵妃看见，她向玄宗建议：“江妃庸贱，以瘦词宣言怨望，愿赐死。”玄宗默然。

江采萍递上赋以后，盼着玄宗被感动而有所表现。一天她见去岭南的使者回来，便问左右的人：“哪里来的驿使，会不会是梅使？”人们告诉她：“是向杨贵妃进贡荔枝的。”梅妃悲咽泣下。

唐玄宗对梅妃《楼东赋》的回答是赐给她一斛珍珠，梅妃见到这份密赐的宝物，伤心不已，附上一首诗，令使者把珍珠退回去，诗写道：

柳叶双眉久不描，残妆和泪湿红绡。

长门自是无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

玄宗览诗，内心怅然，令乐府将诗配以旋律，号《一斛珠》。但玄宗与江采萍仍未能重聚。梅妃只能饮恨度日。

安史之乱，玄宗携杨贵妃西逃，及贵妃死在马嵬坡、平乱、东归，没人知道江采萍的下落。回到皇宫，玄宗找不到梅妃，推测也许是在兵乱时流落他处。下诏求访，知道梅妃下落的，官二秩、钱百万。然而时间过去了，没

有结果。玄宗又命方士飞神御气，潜经天地，求梅妃所在，也不可得。有位宦官拿来梅妃的写真画，玄宗哀叹画得象，但不是活人，乃题诗于画上：

忆昔娇妃在紫宸，铅华不御得天真。

霜绡虽似当时态，争奈娇波不顾人。

写完诗，复读一遍，眼泪随之而下。命人把梅妃的画像刻在石上。

后来玄宗梦见梅妃在竹林中哭泣，用袖子障面，如花朦胧露状。梅妃说：“当年陛下蒙尘，妾死于乱兵之手，可怜我的人把我埋在池东梅株傍。”玄宗醒后立即命人到太液池边发掘，不获。玄宗忽然想起温泉池侧有梅十余株，会不会在那里？玄宗亲自带人去发掘，果然发现了梅妃的尸骨，右肋下有刀痕。玄宗大恸，号哭不止。

比起杨贵妃来，梅妃的存在并不广为后人所知，瘦弱的江采萍被杨玉环肥硕的身影所遮挡。风流皇帝李隆基，虽然喜欢淑女江采萍，但更迷恋杨贵妃，后者在许多方面，更令李隆基适意。二人之间如漆似胶的恋情，最终也以悲剧收场。

杨玉环本是玄宗之子寿王的妃子，寿王之母就是前面提到的武惠妃。玄宗派高力士访求美女，得如儿子寿王的妃子美貌惊人，召至掖庭。为了显示离开寿王府是杨玉环的本意，不使寿王过于气愤，玄宗先让杨玉环做宫中女官，度为女道士，号太真，住宫中太真宫，因此杨玉环又名杨太真。同时，册封左卫中郎将韦昭训的女儿为寿王妃。

唐玄宗初次见到杨玉环时，见她一身女道士装扮，鬓发腻黑，纤纒中度，举止闲冶，容貌如同汉武帝倾国倾城的李夫人。玄宗喜不自胜，诏杨玉环沐浴汤泉，以观其体态。玉环肌肤莹白丰嫩，从水中出浴，好似体弱力微，无力披上罗衣，娇态浑然，容颜却光彩焕发，转动照人。这番景象都在玄宗的目光审视之下。

进见之日，玄宗命乐工演奏他创作的《霓裳羽衣曲》。定情之夕，玄宗授给玉环金钗钿合，又亲自将珍奇制成的头饰步摇，插在她的发间。同衾共枕之时，玄宗觉得神合意恰。第二年，杨玉环被册封为贵妃。如果不是为了缓和寿王的情绪，玄宗会在进见的第二天册她为贵妃。玄宗曾喜形于色地对后宫人说：“朕得贵妃，如得至宝也。”还乘兴作了一首曲子，名《得宝子》。此后，玄宗与贵妃行同辇、止同室、宴专席、寝专房。宫人称贵妃为娘子，礼遇等同皇后。

自从得宠于玄宗后，杨玉环更加“冶其容，敏其词，婉变万态，以中上意。”除容貌外，她聪慧的天赋、机敏的性格，是吸引唐玄宗不离左右的第二个特长。《长恨歌传》中说她“才智明慧，善巧便佞，先意希旨，有不可形容者。”

音乐、歌舞方面的超常技艺，是杨贵妃吸引唐玄宗的又一个特长。在对音乐的共同好尚中，二人情投意合。《霓裳羽衣曲》是玄宗的得意佳作，贵妃醉中依曲而舞，舞姿回雪流风，玄宗叹为知音，只有贵妃才能领会玄宗曲中意境，用舞姿完美地表现出这种情韵。在乐器中，杨贵妃善弄琵琶，她的姐妹和诸王、郡主都称她为师，被称为“琵琶弟子”。贵妃的琵琶以逻娑檀为槽，温润如玉，光辉可观，上刻有金缕红纹的双凤。贵妃每抱此琵琶演奏于梨园，声韵凄清，飘向云外。除了琵琶，贵妃又善于击磬，喜欢泠泠然的磬声。贵妃制曲演奏，专攻乐器的太常寺的梨园妓都比不上她的技艺。玄宗见贵妃喜欢磬，使命人采蓝田绿玉，琢为磬，饰以珍奇旒等，供贵妃使用。

贵妃创作的《凉州》曲在当时广为传唱。

玄宗与贵妃的情意缱绻，但身为皇帝也难免有心存旁鹜的时候。后宫佳丽万千，贵妃无一能容，玄宗如有蛛丝马迹，她便妒情发作，大闹使性。一次竟惹怒了玄宗，玄宗一气之下，命高力士把她送还回家。然而事过才半天，玄宗就后悔不迭了。身边没了贵妃，竟觉得坐立不安，膳食摆上桌也吃不下去。皇帝不可朝令夕改，玄宗恼恨交加，胸中一团无名火向宦官发泄，服侍他的宦官走路稍快了些，便遭一顿猛打。高力士见玄宗动辄鞭笞宦官，情绪失常，推知他内心的意图，小心翼翼地建议把贵妃接回来。当晚贵妃回到宫中，见到玄宗，伏地谢恩，玄宗心释颜开。只隔一天，竟象分别多年的情人一样，玄宗对贵妃抚慰备至，从此宠爱更隆。

几年后，杨贵妃又因故被玄宗遣还回家。这次是她不安份所致。玄宗经常与兄弟们长枕大被，共卧一处，贵妃得以与诸王过从。一次贵妃偷拿了宁王的紫玉笛，张祜诗云“梨花静院无人见，闲把宁王玉笛吹。”宁王在许多方面与玄宗相似，落拓不羁，爱好音乐。贵妃与他之间的形迹足以令玄宗动怒。这次贵妃的过失似乎无可挽救了。其兄杨国忠惶惶不安，不过他知道，玄宗下不了杀贵妃的狠心。要先把她置于死地才能后生。杨国忠请人进奏玄宗，说妃子既犯死罪，请皇帝看在她曾蒙恩的份上，让她死在宫中，不要在外面受辱。玄宗正在爱恨交织，内心煎熬中，不知如何处置贵妃，听此一番话，愀然伤怀，饮食不思。在家日夜不安的杨贵妃，见到玄宗派来的中使，哭着说：“请上奏皇帝，妾罪当万死。衣服之外，皆圣恩所赐，只有发夫是父母所生。今当即死，无以谢上。”剪发一缕请中使献给玄宗。玄宗初见到中使肩上放着一缕头发，大吃一惊，以为贵妃要自裁，急命高力士接贵妃回宫。二人相见，又重叙恩爱。

两情相悦，两心相知，玄宗与贵妃愈到后来愈情投意合，在玄宗面前，杨玉环不象一个妃子，却象恩爱家庭中的娇妻，敢说敢笑敢打敢闹，肆情而娇憨。几个回合的冲突，都是由玄宗作出让步。平日玄宗对贵妃没有居高临下之态，倒象一位好脾气的丈夫对待不懂事的娇妻。他们在宫中漫游，每走到鲜花盛开的地方，玄宗总要摘一朵艳丽的花，给贵妃戴在头上。御苑千叶桃花新开，玄宗折一枝给贵妃，说：“此花犹能助娇也。”玄宗把贵妃比作盛开的花朵，秋八月，太液池中白莲盛开，众人于岸边欣赏，无不叹羨。过了一会，玄宗忽指着贵妃对贵戚们说：“白莲能比得上我解语花？”

杨贵妃的性魅力是吸引玄宗的又一特长。在这方面，后宫女子没有一个能够与她竞争。使皇帝如痴如醉地贪恋在枕席之间，不是江采萍般淑女能够做到的。玄宗与贵妃贪欢，以至于放弃了早朝。寝居生活不只在夜间，二人还时常昼寝。夏季避暑于兴庆池，玄宗和贵妃白天仍不离床席。窗外，宫嫔们正凭栏倚槛，争看水中鸂鶒，雌雄游戏。玄宗拥着贵妃在绡帐内，对宫嫔们说：“尔等爱水中鸂鶒，争如我被底鸳鸯？”安禄山为了讨好玄宗和贵妃，进贡一种春药，名助情花香，香粒大小如粳米，红色。每当寝处之际，含香一粒，助情发兴，筋力不倦。玄宗神秘地对贵妃说：“这就同于汉代的慎恤胶。”南方进贡一种果子，名合欢果。合欢果的名字和形状引起了玄宗和贵妃的兴趣，他们互相赏玩，爱不释手。玄宗对贵妃说：“此果似知人意，朕与卿固同一体，所以合欢。”于是两人紧坐在一起，把合欢果吃了。玄宗为留下纪念，命画工描绘此景。

杨贵妃的确不是一个淑女型的女人，她肥胖、贪杯。玄宗曾戏言她的肥

胖。一次玄宗在便殿览《汉成帝内传》，贵妃从后面走过来，给他整了一下衣领，问：“看的什么书？”玄宗笑着说：“别问，你知道了又要生气。”贵妃坐在旁边，看书上写道：“汉成帝获飞燕，身轻欲不胜风。恐其飘翥，帝为造水晶盘，令宫人掌之而歌舞。又制七宝避风台，间以诸香，安于上，恐其四肢不禁也。”玄宗对贵妃说：“你则任风如何吹。”

肥硕的身体对她也是一种折磨，夏天苦于高温，大量出汗，不停地喝水。每到夏天便把一个玉鱼儿含在口里，藉其凉津润肺。身穿轻绡，侍女们围绕着她不停地挥扇鼓风，仍无法解热，带着香气又红腻的汗止不住地冒。

嗜酒贪杯亦不是淑女的做法，然而唐代的风格是和酒联系在一起的，自然、浑厚。贵妃醉酒成为后人欣赏的一幅美的画面。不过贵妃本身肥胖，夜晚纵酒欢饮，早晨起来，肺部燥热难受。她常清晨走到后苑，攀花树之枝，吸吮花露，用露水润肺，感觉便稍好些。有时玄宗和她在华清宫游逛，夜晚饮酒，早晨相携到花园，玄宗折一支木芍药，递给她嗅其香味，玄宗说：“不惟萱草忘忧，此在香艳，尤能醒酒。”玄宗很欣赏贵妃醉后的憨态，一次玄宗坐在沉香亭，命人召贵妃来，此时贵妃酒还未醒，高力士使侍儿扶掖着她走来。玄宗见她醉态残妆，鬓乱钗横，不能再拜，笑着说：“是岂妃子醉，真海棠睡未足耳。”

杨贵妃酷嗜荔枝，荔枝在盛暑时节成熟，朝廷专门安排驿马昼夜驰骋，从岭南往长安运送荔枝。在穿衣问题上，专为贵妃一个人服务的织绣工达七百人。杨贵妃的生活如人间天堂，荣华富贵与皇帝的宠爱并享，古今遭此盛遇者有几人？然而一切都有完结的时候。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曾被玄宗、贵妃收为干儿子的安禄山，在天宝十四年（七五五年）举兵叛乱，这场叛乱以诛杨国忠为名，并把贵妃、虢国夫人都列为罪人。危难从天而降，玄宗打算禅位给太子，与丞相杨国忠商量。杨国忠大惧，怕太子继位把他送上断头台，急请妹妹救命。贵妃到玄宗面前，含土块请死，以阻止玄宗禅位，玄宗只得作罢。次年六月，安禄山兵陷潼关，唐王室被迫西逃。

走至马嵬坡，大军忽然停下不走了。右龙武将军陈玄礼奏请皇帝以天下计，诛杨国忠。众将士围住行宫所在的驿门，杀了杨国忠。杨国忠既死，玄宗以为无事了，便出驿门慰劳六军，而六军尚不解围，玄宗环顾左右，不明原因，派高力士前去问明，军士们称：“祸本尚在！”高力士回来告诉玄宗，兵士们不肯放过杨贵妃，因“贵妃即国忠之妹，犹在陛下左右，群臣能无忧怖，伏乞圣虑裁断。”来得太突然了，又象是在预料之中，玄宗顿时老了许多。他徐徐走回驿门，驿门旁有条小巷，玄宗不忍回行宫面见贵妃，拐向小巷，倚着杖，斜着头，眼光昏然，呆立了很久。这时京兆尹韦谔上前进奏：“乞陛下割恩忍断，以宁国家。”玄宗似乎失去了思维和判断能力，或者象一个被野兽追逐的农夫，只想狂奔逃命，其他的人和事都不去想了。总之，一切的事都不由自主了。玄宗在行宫外走来走去，不知怎样进了行宫。玄宗不用解释，贵妃什么都明白了，她知道自己已成为众矢之的，今天就是末日。

玄宗扶着贵妃走出厅门，走到马道北墙口。诀别之际，贵妃涕泣呜咽，对玄宗说：“愿大家（宫中称皇帝为大家）好住。妾诚负国恩，死无恨矣。乞容礼佛。”玄宗象站在阴阳界上，说：“愿妃子善地受生。”然后用长袖掩面，使高力士牵贵妃而去。高力士奉命将贵妃缢于佛堂前之梨树下。用紫褥裹尸，埋于道侧。

玄宗自失去贵妃后，陷入绵绵无尽的怀念和伤感中。西行路上，阴雨连绵，雨打铃声，隔山相应。玄宗悼念贵妃，于马上作《雨霖铃》曲。

长安收复，玄宗从成都还宫，皇帝已是肃宗。玄宗退居太上皇，密令宦官将贵妃迁葬他所。贵妃的坟被打开，时过一年余，肌肤已消入土中，胸前仅有一个锦香囊。宦官把香囊献给玄宗，玄宗睹物伤情，把香囊置之怀中。香未消，玉已殒，玄宗心上的伤口永远无法弥合。

《雨霖铃》曲，玄宗在西行的马上授给梨园弟子中善吹愁鬻箏的张野狐。回长安后，玄宗再次来到华清宫，物还在，人非旧。在望京楼，玄宗命野狐奏《雨霖铃》，曲未半，玄宗回顾凄凉，不觉流涕。

画工绘制的贵妃像挂在墙上，玄宗朝夕视之而歔歔。有道士名杨通幽从四川来到长安，自称有李少君之术，玄宗求之不得，命他召致贵妃的神灵。杨通幽竭尽全力，在皇宫外内求索，不见；又游神驭气，出天界、入地府求索，也不见贵妃的神灵；再旁求四虚上下，东极横越大海、跨蓬壶。忽然出现一座神山，上有许多楼阁。杨通幽至此，发现西厢下有门洞，朝东，门开着，门额上写着“玉妃太真院”。方士叩门，童女开门，方士未及言又见童女走了回去。这时出来一位碧衣侍女，问他从何处来，杨通幽称奉天子之命到此。碧衣侍女说：“玉妃方寝，请少待之。”过了一会儿，侍女引出一人，说：“玉妃出。”玉妃头戴金冠，身披紫绡，佩红玉，脚穿凤鞋，左右侍女七、八人。玉妃向方士行礼，问皇帝安否及天宝十四年以后事，言罢神情悲切，命侍女取出金钗钿合，折其半授给杨通幽说：“为我谢太上皇，仅献是物，寻旧好也。”方士准备返回复命，但觉得仅此未必足以使玄宗相信，于是回身跪下请示玉妃：“请当时一事，不闻于他人者，验于太上皇，不然，恐金钗钿合，负新垣平之诈也。”玉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然后徐徐说道：“昔天宝十载，侍辇避暑骊山宫。秋七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上凭肩而望，因仰感牛女事，密相誓心：‘愿世世为夫妇。’言毕，执手各呜咽。此独君王知之耳。”方士向玄宗具奉此情，玄宗内心受到了极大震动，对贵妃的怀念更加深切。一直到死，玄宗的贵妃的思念无日无之。“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从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故事，人们很容易联想到清顺治帝与董鄂氏的爱情。顺治帝因董鄂氏之死，丧失了全部的人生希望。这种刻骨铭心的生死恋，在茫茫的深宫历史上只有这两对。从时代上说，清代离现代较近，可惜当时的人没能将顺治帝与董鄂妃的故事详细记载下来，人们找不到象唐玄宗与杨贵妃之间那样生动的史实。正是因为史书记载不详，才给人们的想象提供了丰富的余地，在传说中，董鄂氏与明末秦淮四大名妓之一的董小宛成了一个人，这就太离奇了。

顺治帝的宠妃董妃氏的来历有些曲折，与上述杨贵妃的情况颇有些相似，她们最初都不是皇帝的嫔御。据清初经常出入宫中的传教士说，董鄂氏原是一位满洲贵族的妻子，此贵族受顺治皇帝的虐待而死。这位贵族就是顺治的异母兄弟襄亲王博穆博果尔，他死于董鄂氏入宫前一个月。顺治帝与董鄂氏初次见面大概就在襄亲王府中，可以推想，董鄂氏的美貌惊动了年轻的皇帝，紧接着顺治、襄亲王与董鄂氏的关系发生转变，襄亲王死于忧愤。

董鄂氏入宫后，始终得到顺治帝的宠爱，但他们的恩爱生活只持续了四年，死神就夺走了董鄂氏。

董鄂氏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子？顺治在她死后亲自作的董妃《行状》中，

表述了她的为人。《行状》中说，董鄂氏娴静而循礼，对皇太后孝敬、奉养得十分周到。在回顾他们的共同生活时，顺治帝写道：她每天关照我的起居，对我的饮食、服御照料得无微不至。我每次从外面回到宫中，她一定迎上前问寒问暖，如果我稍有些不舒适，她就会问：“陛下回来得晚，身体疲倦了吧？”马上疾步走去给我准备饮食，亲自端上来，我若要她共餐，她便辞谢。在庆典时，我多次举觞饮酒，她就告诫侍者，不要让我喝得太多。她常担心屋里温度过高，夜里经常起来看看炉火。我批阅文书经常到深夜，她总在身边陪着我。各机关按旧列递上的章报，我常不看就搁置一旁，她劝告我：“此虽奉行成法，怎知里面没有新的内容和其它事项，为何疏忽啊！”我若令她和我一同来批阅，她拒绝说：“不敢干政”。我在批阅死刑案件时，握笔不敢匆忙定论，见此情形，她问我文书上写的什么，我告诉她，她落泪说：“那些办案人员都很愚蠢，里面岂无冤案，应该酌其可宽宥者尽量宽宥”。如果大臣偶然顶撞我，令我不快，她就请我心平气和地详查是非。有时我不去上朝，她就劝我不要对勤政倦怠。经筵日讲回来后，我和她谈经典中的章句大义，她会十分高兴，有时我忘记了所讲的一些内容，她及时规劝我：“你应该静心默默思索”。狩猎时，我亲身骑射，她就劝我：“不要以万邦仰庇之身，轻于驰骤。”偶然遇到不合我意的时候，我责备她，她起初强调自己没错，自从听到“姜后脱簪”的故事后，遇到可以辩解的事，她也引咎自责。她崇尚节俭，生活中摒却金玉。但读书上十分用功，《四书》与《易经》已经修完，又学书法，时间不长就精熟了。我教她禅学，她参禅、究义，颇有领悟。当她开始得病时，皇太后每次派人问安否，她必回答：“安”。后来病重，我和皇后、诸妃嫔探望她，她说：“我恐怕不行了，但我心中澄定，亦无所苦，但来不及报答皇太后和陛下的大恩于万一。我死后，陛下要多保重！皇太后必会为我伤痛，我很不安”。临终时还建议诸王要博施于贫民，其下属不要贪于敛括珍宝。

这是一个多么贤慧、温柔、知礼的女子。如果说顺治帝与董鄂氏的初次见面，迷于她的美貌，那么在共同生活中，让顺治帝刻骨铭心的是董鄂氏对他的关爱。除了董鄂氏，顺治帝身边没有一个女子能够做得这样周全，给他以人间的温情，这样情深而义重。

顺治十四岁结婚，第一个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美貌又聪明，但嗜好奢侈，与顺治帝简朴的好尚正相反。此外她还妒情甚旺，与顺治多次发生冲突。两年后，在顺治的执意下，废了这个皇后。继立的皇后也是博尔济吉特氏，顺治对她也不很欣赏，曾责备她在皇太后患病期间不懂礼节。董鄂氏是顺治帝十九岁时结识的，入宫后深得眷爱，顺治曾想废掉第二个皇后，立董鄂氏为皇后，因皇太后和大臣的反对而未能实现。第二年，董鄂氏生了个儿子，他们极为高兴，不料三个月后孩子夭折了。这使董鄂氏陷入了失子的巨大悲痛中，身体和精神极大消耗。两年后，董鄂氏撒手尘寰，构成了顺治帝生命史上极为悲惨的一幕。

遭此沉重的打击，顺治帝五天没有上朝，天天守在董鄂氏的灵前，几次哭倒。董鄂氏死后的第三天，顺治帝破例追封她为孝献皇后，在灵停放的承乾宫举行了隆重的追封仪式。董鄂氏死后不到半年，年仅二十四岁的顺治皇帝也离开了人间。

顺治的死显然与董鄂氏有关。史书上说他死于天花，传说中说他离开皇宫，出家于五台山或北京的天台寺。总之，顺治帝在尘世中的生活，在董鄂

氏死后就结束了。关于他出家的说法难有确证。不过，顺治帝生前确实是一个佛教信徒。

五、皇帝与宠妃的情爱（二）

皇帝感情的投入，多缘于美貌，这很难与贪色区分开来。只有在生离死别时，才看得出皇帝的真情。

汉武帝李夫人是一位绝代佳人。史书上没有仔细描绘她美在何处，只留下“倾国倾城”的赞美。

李夫人红颜薄命，入宫没几年就死去了，象流星一闪而过，划痛了汉武帝一颗英雄心。

李夫人病危时，汉武帝守在旁边。她却用被蒙住脸。武帝要和她见一面，她说，“我病了很久，形貌毁坏，不可以见帝。愿将王和兄弟托付给皇帝。”武帝说，“夫人病重，恐难好转，面见我嘱托王（李夫人所生子）及兄弟，岂不更好？”李夫人在被中回答，“妇人貌不修饰，不见君父。我不敢以此面貌见皇帝。”武帝说，“你只要见我一面，就加赐千金，封你兄弟尊官”。李夫人坚持说，“对我兄弟尊官的决定在于皇帝，不在于见此一面”。武帝非要见李夫人一面不可。李夫人翻过身在被中哭泣起来，没再说一句话。汉武帝面露不快地起身走了。

武帝走后，李夫人的姐妹们责备她，说，“你怎么能不让皇帝见你一面再嘱托兄弟？为何对皇帝如此怨恨？”李夫人说，“所以不愿意见皇帝，正是为了更好地托付兄弟。我因容貌很好，得以起身于微贱被皇帝爱幸。凡是以色取爱于人的，色衰则爱弛，爱弛则思绝。皇上拳拳顾念我，是因我平生的容貌。如果今天见我容貌毁坏，颜色非故，肯定会厌恶我，怎么会念我的情感用我兄弟？”

李夫人死后，武帝怀念不已，令画工把她的画像挂在甘泉宫。对着画像，武帝想象李夫人动人的形态。武帝梦想能够再见到生前的李夫人。这时，齐国来了一位方士名少翁，会召魂术。他安排武帝在一个夜晚，点上灯烛，设帷帐，摆上酒肉。令武帝坐在另外一个帐内。少翁使用法术，武帝向有灯烛的帐中望去，似乎看见一个美女极象李夫人，在帐中坐着，又徐徐迈步。武帝想走过去看清楚些，少翁不许。武帝心中激起更强烈的思念，作诗道“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

武帝把诗交到乐府，配曲歌唱。武帝的思念仍然表达不尽，乃亲自写就了一篇赋，伤悼李夫人。

汉武帝的这篇赋，无一句不是怀念之语，他问天、问地，到缥缈的灵界寻找李夫人的魂魄。

南朝宋孝武帝也是一位雄武的君主。在疆场上和权力斗争中，智勇双全，同胞骨肉的性命一一断送在他的刀下。这样一位君主在儿女情上也不落汉武帝之后。

宋孝武帝有位殷淑仪，宠冠后宫。殷氏丽色巧笑。她本不是孝武帝的御婢，是孝武帝从敌人手里夺过来的，神秘地养于后宫。但殷淑仪享受不长，匆匆离世，令孝武帝身心大伤。

殷氏死后，孝武帝不忍立即埋葬。他命人做了一个特制的棺材，孝武帝可以经常抽出棺材，一睹殷氏的仪容。过了很多天，殷淑仪居然形色不改。

但终究还是要下葬的。送葬的仪式十分隆重。銮辂九旒、黄屋左纛，前后部羽葆、鼓吹。孝武帝在丧事前，悲不自胜，百官见皇帝如此悲哀，也随之

掩泣。

丧事办完后，孝武帝被巨大的悲痛与怀念所缠绕，以至于精神恍惚，政事不想料理。每天临睡前，先在殷淑仪的灵床前奠酒，边饮边流泪，有时痛哭得无法止住。

又有方士前来自荐，说可以招殷氏之魂。孝武帝自然大喜过望，命方士实施法术。孝武帝果然见到了帷幕中殷淑仪的形象。他要和她说话，她默然不答。孝武帝伸手去抓她，她忽然消逝了。

怅惘之情耿耿于心，于是，拟汉武帝李夫人的赋，作怀念殷氏之赋。赋的最后几句是，“流津有终，深心无歇。徒倚云日，徘徊风月。思玉步于凤墀，想金声于鸾阙。”

大臣谢庄前来自显示文采，他写了一篇哀策文，奏上。孝武帝览读时，涕泪横流，从座位上站起来说：“未想到当今有如此大才”。这篇哀策文传流开来，一时市场上纸墨涨价。

唐代宗的宠妃独孤氏，以姝艳被代宗所爱幸，与皇帝一同起居，这种恩爱，后宫中只此一人。

也许，恩宠会使人变得娇弱？或者是为暗箭所伤？独孤氏在不衰的宠遇中离开了人世。可以想见代宗的伤痛情状。代宗把死去的宠妃留在身边，几年中，独孤氏的棺木停在内殿，迟迟不下葬。每当悲思时，代宗就去看看她。

独孤氏死后在宫中陪伴了代宗三年。在决定安葬时，代宗诏令在京都之左造陵，他可以天天望见她的陵墓。但这不符合规制，在大臣谏阻下，代宗不得已将她葬于庄陵。葬礼费资甚巨，又命宰相常袞作册，文辞凄惋，合乎帝意。代宗又命群臣各写挽辞，选其中最能抒发悲伤之情的，令宫廷艺人歌唱。

情爱，有时就是一种迷惑，迷惑产生迷乱。沉游在这种情爱中的皇帝会把一切置之度外，甚至忘了江山社稷。只顾顺着宠妃的意愿行事，只顾尽兴玩乐。

汉成帝迷恋赵飞燕之妹赵合德，就是一种失去理性的迷恋。汉成帝把赵合德称为温柔乡，说“吾老是乡矣，不能效武帝求白云乡也。”就是说，他不求成仙、长寿，甘心死在赵合德的温柔乡里。

汉成帝贪于色欲，后宫女子众多，但他后来独恋被封为昭仪的赵合德。成帝后期竟得了一种病，要握持赵昭仪的脚才能安寝，这就使得汉成帝更加依恋赵氏。

赵昭仪得宠后，性情忌刻。她不容成帝与后宫女子有性关系。当她得知后宫有怀、生子的事后，就在成帝面前打自己的头，把头往柱子上撞，滚下床来，啼哭拒食。

为了平息赵合德的嫉怒，汉成帝把许美人所生的儿子要来，当着赵合德的面，弄死在筐中。后宫曹氏女生的儿子也被成帝派人取走不知下落，又赐曹氏自尽。为了求欢于宠妃，竟杀害亲子，这不是一个有理智的皇后所做的事。

如果皇帝整日迷恋于女色，又逢内乱外患，那么江山就可能不保。那些丢掉江山的君主，往往是迷于女色者。由此，古人把女祸说成是导致王朝毁灭的原因，还总结出夏、商、周三代都是坏于女人之手，载在史册，今后世引以为鉴戒。

夏代最后一个君主桀，迷恋施妹喜。妹喜是有施氏为了迷惑桀而进献的

美人。果然，桀对她所言皆听，为她造琼室、象廊、瑶台、玉床，行淫纵乐。结果，异族领袖商汤率师伐夏桀，灭了夏朝。

商代的亡国之君纣，对有苏进献的美女妲己也言听计从。也为行乐而奢侈、而造鹿台、作琼室玉门、牧狗马奇物，充斥宫室。妲己认为刑法太宽，不能建立王的威严，纣因此加重刑法。将熨斗用火烧热，令罪人举之，手立即即被烧烂。又将一个上涂油膏的铜柱，放在炭火之上，使有罪者踩上去，滑落火中，惨叫烧死。妲己在一旁觉得十分可笑。这种刑法定名为炮烙之刑。纣又剖孕妇视其胎，断人脊骨视其骨髓，如同儿戏。周族首领姬昌因不满于纣的做法被纣囚禁。周人用美女和奇兽进献，纣果然释放了姬昌。数年后，周师伐纣，纣师前线倒戈，纣在鹿台自焚。周武王斩了妲己。

西周幽王也有一个宠妃褒姒。褒姒性格冷僻，在幽王面前从无笑脸。幽王为了让她笑，用了千方百计，仍然无效。后来，幽王想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方法。他曾与诸侯王约定，有外寇来，点燃烽火为信号，则诸侯必来增援。

幽王带褒姒到烽火台，点燃了烽火。诸侯见到信号，急发援兵赶来，虚惊一场。褒姒见这些被愚弄的诸侯及其兵马煞有介事的样子，大笑起来。诸侯们沮丧地回去了。周幽王这一招固然使褒姒笑了，但从此失信于诸侯。褒姒还有个特殊的爱好，喜欢听布帛撕裂的声音。幽王就拿来大量的布帛让人撕给她听。褒姒十分惬意。最后幽王被外寇所杀，褒姒被虏走，西周结束。

其实，这些为女色所左右的君主是自取其祸。在君主与宠妃之间，居主动地位的是君主。这些君主昏庸无能，其精力只能用在玩乐上。他们除了迷恋女色，别无它长。

陈后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陈后主宠爱贵妃张丽华和龚、孔二贵嫔。造临春阁、结绮阁、望仙阁，极其瑰丽。后主与张丽华分别住在前两阁，龚、孔住后一阁，三阁间用复道相连。

张丽华发长七尺，鬓黑如漆，发质闪亮，举止闲雅，容色端丽。每当眼波向一旁飘去时，常令人觉得光彩溢目，映照左右。史称张丽华工于厌魅之术，借用鬼道以惑后主。宫中建淫祀、聚女巫于其中。

后主整日沉溺于欢情之中。还命女学士、词臣赋新诗，以赞美张、孔二人的容貌，选择诗中最艳丽的，配上曲调。其曲有《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有名句“璧月夜夜满，琼树朝朝新”。选宫女中有容色的千百人，分部歌唱。后主本无心处理政事，或者说把政事也纳入儿戏之中。他常把张丽华放在膝上，一同决策政事。于是，朝廷内外都贿赂、求请于张丽华，朝政紊乱。

陈灭于隋，张丽华被当作祸根斩了。

南朝齐东昏侯整天和宠妃潘玉儿厮混在一起。在神仙永寿殿，凿金为莲花贴于地，令玉儿以舞步行于其上。东昏侯美之曰：“步步生莲花”。齐亡于梁。梁武帝见潘玉儿有国色，想留下她。大臣王茂进谏说“亡齐者此人，留之恐贻外议”。武帝乃警觉地把她遣出皇宫，赐给一个普通军士。

但潘玉儿认定自己只能与帝王相配，下嫁于匹夫，是莫大的污辱，于是自缢而死。这种女子对于王朝的兴亡并不看重，她不以亡国为耻，而以下嫁匹夫为耻。如果梁武帝宠爱她，她会和东昏侯在一起时一样。

这样的女子竟能亡国，那么君主也太好欺了。没有帝王的蠢笨哪来亡国的宠妃？也许，宠妃的魅力真能使帝王丧失理性？或者因果难分，互为因果。

北齐后主高纬似乎甘心亡国而不舍弃宠妃冯小怜。他们坐则同席，出则

并马，愿得生死一处。当北周军队攻占北齐的平阳城时，后主正在和小怜一起围猎。前线消息传来，后主要还宫计议，小怜玩兴正浓，要与后主再杀一围。后主只得从命。

后主对冯小怜的依从，到了置亡国于不顾的地步。周师占领晋州后，只留少数军队留守。后主率齐军攻打晋州。当齐师作地道攻城，要乘势冲进去时，后主却命令他们暂缓，派人召冯小怜观赏这个场面。

冯小怜不慌不忙地大施浓妆，迟迟不来，等她来时，城内的周师已经用木头塞住了地道，齐师无法攻进去了。冯小怜这时又想起传说晋州城西的石上有圣人脚印，要去看看。后主又为她取攻城用的木料造远桥，去看圣人脚印。

在败退的路上，后主无御敌之策，却要封小怜为左皇后，命人快马去取皇后服饰。二人奔往洪洞戍。外面战事紧张，小怜对镜自玩，侍从喊道敌人来了。他们又慌忙逃回邺城。晋阳来的快骑带来了皇后衣服，后主勒住马让车停下，等冯小怜把皇后衣服穿上，再继续逃命。

北齐亡国，后主被俘。他别无它求，只求周武帝把冯小怜还给他。周武帝爽快地说，“朕视天下如脱屣，一老嫗岂与公惜也。”同年，后主被周武帝赐死，冯小怜被赐给代王宇文达。

冯小怜没有实现与后主当年的誓言——生死一处，她又成了宇文达的宠妾，与达妃争宠，构陷对方，致使达妃几乎丧命。十二年后，杨坚代周称帝，命冯小怜穿布衣裙作达妃兄李恂的婢女，借以羞辱她。李恂的母亲最后逼令她自杀。

六、宫禁荒淫生活与房中术

如果说耽于情爱的帝王还具有人类的感情，那么有的帝王则行同禽兽，不齿于人类。

在这方面，最为无耻、淫荡的帝王要算金代的海陵王。“常令教坊番直禁中，每幸妇人，必使奏乐，撤其帟帐，或使人说淫秽语于其前。尝幸室女不得遂，使元妃以手左右之。或妃嫔列坐，辄率意淫乱，使共观。或令人效其形状以为笑。凡坐中有嫔御，海陵必自掷一物于地，使近侍环视之，他视者杀”。

金海陵帝还不满足于淫乱宫中女子。任何一位有夫之妇，只要他淫念一起，就得从其所愿。其夫如不被杀，就是万幸了。

先后嫁过两个人的阿里虎，被海陵召入宫中，连同她的女儿重节，都被海陵王淫乱。定哥先嫁给乌带，海陵命她杀夫入宫，否则灭她全家，定哥只得将丈夫缢死。入宫后，开始得幸，后又被冷落一旁。

定哥之妹石哥，也被召入宫中，后来海陵将其夫召入便殿，令石哥用秽语对他戏谑，以为笑乐。定懒本是海陵叔父的妻子，海陵杀了叔父，霸占了定懒。凡被他杀害的宗室成员，其妻都被他霸占。

海陵对姐姐的女儿叉察也不放过。他告知太后要把叉察纳为嫔御。太后说：“是儿始生，先帝亲抱至吾家养之，至于成人。帝虽舅，犹父也，不可”。最终，叉察还是落入了海陵之手。

元妃的妹妹入宫看望姐姐，也被海陵逼淫。对于孕妇，他也要肆其淫欲。辟懒有夫而且怀孕，海陵亲自给她堕胎，强令她喝下麝香水，用力揉其腹部，辟懒哀求他不要这么做，海陵根本不听，最终弄掉了胎儿。

海陵最宠刁嬖、莎里古真。二人都有夫，海陵召她们入宫，令其夫在内廷值宿。每召入她们，海陵必在廊下提前等候，显得很殷勤，有时，立久了腿发酸，他认为这种约会比当天子更难得，所以可贵。实际上，是二女最能与他的淫行配合，令他重视。

后来，海陵发现莎里古真在外面有奸情。海陵大怒，质问她，“尔爱贵官，有贵如天子者乎？尔爱人才，有才兼文武似我者乎？尔爱娱乐，有丰富伟岸过于我者乎？”气塞于喉，海陵说不下去了。过了一会儿，怒气消了，还抚慰莎里古真不要惭愧。若是其他女子有外遇被海陵得知，肯定性命不保。

北周宣帝宇文赟也是一个荒淫的皇帝。其父皇丧礼正在进行中，他脸上没有任何悲哀的神色，心里念的是父皇原来该享受的东西该轮到他享乐了。于是，放下丧事不办，去父皇后宫阅视宫女，强行与她们淫乱。即位后，整日肆情声色，派人到各地挑选美人以充后宫。年仅二十一岁就传位给七岁的儿子，他一心扑在色欲上，二十二岁就病死了。

五代的后晋出帝石重贵也同北周宣帝一样，被色欲所驱使，根本不讲伦理、孝道，竟在先帝的梓宫前结婚。

乱伦的皇帝也集中在南北朝时期。

南朝宋前废帝刘子业，七岁时父皇就为娶何令婉为皇后，但在生活中却和姐姐山阴公主关系暧昧。即位后，他和山阴公主出入宫内外。山阴公主天性淫荡，她对刘子业说，“妾与陛下虽男女有殊，俱托体先帝，陛下后宫数百，妾惟驸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刘子业同意为她配置面首左右三十人。面首是指相貌出众的男子。面，取其貌美。首，取其发美。

刘子业在位时仅十六、七岁，这个昏狂的少年大概觉得乱伦更加刺激，他和山阴公主的来往是双方淫荡生活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他又看上了姑姑新蔡公主。新蔡公主刘英媚嫁给何迈，刘子业召她入宫，假称她得病猝死，杀了一名宫女装敛到何家。何迈疑惑又不敢询问。刘子业改刘英媚为谢氏，封为贵嫔。

刘子业自己乱伦还不够，有一天，他想出了一个恶虐的主意，让王妃公主们进宫，参加饮宴。宴中，他令侍臣们分别从其所好，与王妃公主们配对行淫。王妃公主们吓得惊恐万端，有的想夺门而逃。这时，武士们已将各门封住，一切按照刘子业的命令行事。

只有南平王的妃子江氏无论如何不肯就范，刘子业威胁说要杀死她的三个儿子，江氏仍然不从，这使刘子业的乐兴大扫，气得他命人鞭打江氏百下，活活打死，同时，命人杀了她的三个儿子。

南齐东昏侯有两个姐姐，也封为山阴公主。当东昏侯为太子时，父皇为他纳褚氏为妃。他不喜欢褚氏，待她冷漠。东昏侯感叹地对身边的侍从们说，“若得如山阴公主无恨矣！”山阴公主是齐明帝的长女，东昏侯是明帝次子，后来姐弟俩真的发生了乱伦关系。

北齐文宣帝高洋，开创高氏王朝，东征西讨，建立了功业。但数年后，沉于酒色，肆行淫暴。有时，他一个人欢舞、讴歌，从早到晚，甚至通宵。有时，他袒露形体，面施粉黛，披头散发，穿着不伦不类的衣服，拔刀张弓，游于街市。常常在炎热的盛暑或寒冷的隆冬，他脱去衣服狂跑，随从都觉得难以忍受，他却居之自若。他还征集外间的淫妇，剥衣裸体，令从官朝夕临视。

随着酗酒，不断刺激神经，高洋的恶作剧越发残酷。一天，他跑到李皇后家，不知为何与李母霍氏动气，便用鸣镝射向崔氏，正中其颊，还骂道“吾醉时尚不识太后，老婢何事！”又用马鞭乱打一百多下。

李皇后的姐姐是元昂的妻子，高洋见她貌美，要把她纳为自己的嫔御。他令元昂伏在地上，然后向元昂连射鸣镝一百余下，元昂周身流血，血又凝固，将近一石。残酷地杀死元昂以后，高洋故作悲痛，前去哭丧，在灵堂前遍拥李氏。

高洋有位宠妃薛氏，正得宠之时。一天，高洋见到薛氏，忽然忆起她曾与高岳私通，这原是入宫以前的事，高洋此时怒不可遏，一刀斩了薛氏。他把首级藏在袖中，便这样去参加宴会。

宴会上大家相互劝酒，气氛很欢洽。高洋忽然将薛氏的头掏出来，扔在一个大块木柴上，众人都惊呆了。高洋又命人把薛氏的尸体拖来，支解了，取大腿骨准备作琵琶，众人毛骨悚然，莫不丧胆。忽然，高洋悲从中来，收拾起薛氏的尸骨，哭着说“佳人难再得，甚可惜也”。于是，为薛氏办丧事，尸体载出宫门，高洋披散头发，大哭着步行跟在后面。

南朝宋明帝身体肥胖。他作湘东王时，前废帝刘子业把他封为猪王，加以虐待。明帝在位时身体更胖，到晚年患痿疾，不能御幸后妃。但他还有淫乐的嗜好，即剥光妇人的衣服。

一次，他在宫内举行盛会。会上，令人把一群裸体妇人带上来，供大家观赏，以此为欢乐。众人中，最难堪的是皇后，皇后以扇障面，用沉默表示不满。明帝很生气，揶揄她说：“你们家寒酸了，今天一块享乐，你为甚么偏不看”。皇后郑重地说，“为乐之事，方法很多，岂有姑姊妹集聚，而裸

妇人形体？我们家取乐的方法确实与此不同”。明帝大怒，让皇后站起来，走开。

观念和社会风气决定了南北朝时期宫中淫乱的盛行，这之中有位妃子值得一提。南梁元帝的徐妃名昭佩，多情而淫乱。徐昭佩以父、祖任朝廷要职，入选为妃。她的相貌并不美，元帝两、三年才到她房中去一次。

元帝有一只眼睛失明，当徐妃估计他要来时，就化半面妆戏谑他。元帝一见就大怒而去。徐妃虽不美，但她喜欢俊男，对瞎了一只眼的元帝不欢迎。徐昭佩先与一个出入宫中的名叫智远的道人私通。后来又发现元帝的近侍暨季江相貌英俊，于是，目标又转向他。

暨季江后来感叹说，“柏直狗虽老犹能猎，萧溧阳马虽老犹骏，徐娘虽老犹尚多情”。暨季江对这个多情的中年妇女不感兴趣，却又抵挡不住她的攻势。在暨季江之后，徐妃又听说普贤尼寺有个叫贺徽的美男子，便派人前去联系。贺徽也领情。徐昭佩又在白枕上写情诗赠给贺徽。两人后来不知用何方式见了面，估计贺徽凭和尚身份入宫，因为，南朝特别是南梁佛教盛行，和尚可以获准入宫讲经。

对徐妃的淫行，梁元帝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然而，徐妃还曾在有孕的宫人面前挥过刀子。到后来，元帝所宠爱的王妃死了，元帝怀疑是徐妃加害的，愤而逼令她自杀。徐昭佩自知没了退路，便跳了井。徐妃死后，元帝作了一篇《金楼子》专述其淫行，大概她的淫行还不止上述这些。

五代十国中南汉的末主刘铤，置内患外乱于不顾，兴趣专在淫戏上。淫戏中有号称“大体双”的项目。《清异录》中记载，“刘铤昏纵，……延方士求健阳法，久乃得多多益办。好观人交，选恶少年配以雏宫人，皆妖俊美健者，就后园褰衣使露而偶，铤扶媚猪（铤宠爱的波斯女），延行览玩，号曰大体双。又择新采异与媚猪对，鸟兽见之熟，亦作合”。

历史上皇帝的淫荡生活决不止上述这些。人们在史书上看到的多是失败的、亡国的、被废的君主淫行的记载，这些记载可以当作该皇帝败、亡的注释，已经不属于秘闻了。真正的秘闻大多秘而不闻了。

皇帝对于人生快乐的追求，首先就是女色。皇帝一人要享受千百个女人，他只会嫌少，不会嫌多，多多益善。不过，有时在夜分，皇帝会感到自己能力有限，在御幸时有些力不从心。

道家术士们最能体谅皇帝的这种心理和需要。每一个朝代，都有道士入宫向皇帝传授房中之术。他们形象地用御敌比作皇帝御女，怎样才能常胜不败，以一当十，就需要考虑战术。房中术就是房中御敌（女）的战术。当然还包括药物。

中国古代的道士以求仙为目的，炼丹就是炼仙药，以求长生，长生才能成仙。但是，房事的亏损，也是损伤寿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增年延寿，也得研究房中术。

据《抱朴子》中说，彭祖是房中术的创始人和集大成者。彭祖名篋铿，是颛顼的玄孙。彭祖主张“男女相成，犹天地相生也，所以神气导养，使人不失其和。天地得交接之道，故无终竟之限，人失交接之道，故有伤残之期。能避众伤之事，得阴阳之术，则不死之道也”。

显然，彭祖主张的不是纵欲，而是法象天地，调理阴阳，以避伤寿。传说彭祖活了七、八百岁，经历了帝誉，并佐尧、舜，又从夏代活到殷代，殷

王封他为大夫，派采女到他那里学习房中之术，行之有效。殷王不愿彭祖将此术再传与他人，想杀了他。彭祖发觉了殷王的杀机，逃走了。

到魏晋时，房中之法已经有了十余家，或以补救伤损，或以攻治众病，或以采阴盖阳，或以增年延寿，其大要在于还精补脑。这些方法都由真人口口相传，不记在书上。

道家研究房中术是为了养生，而帝王需要的是能够多御女色。因此，来到皇帝面前的道士，如果宣讲少近女色、保养圣躬，是不可能被接受的。他们要向皇帝进献多御女而不伤身之法。

历代向皇帝进献房中术的人，不过是为了投皇帝之所好，求取自己的名利。房中术名目繁多，没有一种能促成长寿。但确实为皇帝的淫欲助了不少焰。

秀色宫娥足疗饥，殿廷行乐少人知。

番僧运气多神术，秘戏新传演揲儿。

元代末年，西域僧人到宫中向皇帝传授房中运气之术，号称“演揲儿法”。

明宪宗时，有方士李孜省、继晓进献房中术。李孜省一跃成为朝廷要员，任通政使、礼部左侍郎掌司事。继晓也被封为通玄阐教广善国师。明武宗时，色目人于永进阴道秘术，官拜锦衣卫都指挥。明世宗时，进房中术的人更多，先有梁指甲、段瘸子。梁被封为通妙散人，段被封为宣忠高士。后有邵元节、陶仲文等，恩遇更隆。还有朱隆禧作太极衣进献，世宗大喜，朱便升任显贵。

房中药，汉有慎恤胶，唐有助情花香，到明代又有长足的发展。

明宪宗时，首辅大臣万安以媚药进献皇帝。万安非道士，并不会造药，他的药得自御史倪进贤。大概是民间秘方。万安先因年老得痿疾，其门生倪进贤送他秘方，一洗便灵验。因此，倪进贤便被时人讽刺为洗

御史。之后，寡廉鲜耻的万安又将此药进献给皇帝。

明世宗时，方士陶仲文、进士出身的大臣顾可学、盛端明都进献丹药。陶仲文最受世宗赏识，官至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少傅、少保、礼部尚书、恭诚伯，支大学士俸禄，并可荫子为官，赏银十万两。每次进见，世宗常邀请他同坐绣墩。走时，世宗与大臣们相送，在门庭握手告别。

与陶仲文相识的朝廷要臣也求他传授房中秘方。功勋显赫的兵部尚书谭纶兴致最高，用丹药后大有效果。于是，谭纶将此法授给同僚张居正。张居正任内阁大臣，后来升为首辅，二人一将一相，皆迷于此道。谭纶行此法二十年，一夕御女失败，一病不起，临死前，嘱咐张居正要谨慎。张居正前去吊丧时大哭，而继续使用老友的办法，以后身体日渐枯瘠，减损了寿数。

明世宗吃了这种热药（强壮剂），不论白天黑夜，随心所欲地御幸宫女。世宗中年以后，长居深宫，根本不上朝听政。本来，明宫规定，皇帝御幸的宫女，第二天要报名谢恩，然后由皇帝进封名号。但世宗非时御幸，打乱了规律，谢恩和封赏都顾不上了。

世宗之后，明穆宗也用这些药物。实际上，穆宗即位正当壮龄，体质并不虚弱，根本无须用强壮剂。然而，穆宗也非明智，不忍置房中药于一旁不用。因此，“循用此种药物，致损圣体，阳物昼夜不仆，遂不能视朝”。明神宗则十分谨慎，拒用此药，臣下也不敢进献。

清朝咸丰时大臣彭毓松，同治时大臣王庆祺，进献房中药，名龟龄集，并由此得到皇帝的提拔。王庆祺本是进士出身、士家子弟，此人风度翩翩，工于谄媚之术，赢得同治皇帝的青睐，以五品官加二品衔，在内廷行走。

一天，太监送上茶来，见君臣二人亲昵地共坐一榻，一同低头阅看一本图册。太监小心地到近前偷看，是一本《秘戏图》，君臣二人看得津津有味，并未觉出身旁有人。此后，王庆祺又引诱同治到宫外嫖妓。

七、皇帝狎妓闻略

说到皇帝与妓女的往来，并非稀罕。

中国古代的妓女起源于卖艺的女子，叫做倡优。倡优是艺人的称谓，当然也包括男性。汉代的卫子夫、赵飞燕都出身于倡优，堂而皇之地登上了皇后之位。曹操的正妻丁氏也出身倡家。

唐玄宗时，太子瑛的母亲赵丽妃，本来身份也是倡优。倡优后来演变成两类：一类是专门从事卖艺活动的艺人，这类人经常流动，到处演出。另一类是有固定居住场所（青楼），以卖身为主的娼妓。这些卖淫的女性也学些琴棋书画，作为修养或者是点缀，其中也有个别色艺出众、格调较高的女子，不轻易卖身。

对娼妓感兴趣并与之交往的皇帝，自然不会遵循礼教的明君。据史书记载，宋徽宗很喜欢名妓赵元奴和李师师，封她们为才人。南宋理宗晚年眷恋杭州妓女唐安安，不时召入宫中。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征战时尝夜宿妓馆，并题诗留念。后来，该妓女生子，又听说朱元璋当了皇帝，便携子到京请求进见。朱元璋封其子为王，命工部建造王府，而对当年的妓女避而不见。作了皇帝以后，朱元璋还放不下嫖妓的爱好，但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为之，偶尔“羊车夜半出深宫”。高启曾作宫词“女奴扶醉踏苍苔，明月西园侍宴回。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高启这首诗触怒了朱元璋，因此得祸，反而证明了朱元璋确有其事。

明武宗则迷恋晋王府乐户杨腾名下的妓女刘氏，封她为刘美人，召入宫中。武宗一度与刘美人形影不离，“专寝、饮食起居必与偕，言事辄听”。武宗的近臣江彬等人，在他人面前倨傲，但对刘美人侍之如母，称她为刘娘娘。武宗南征前，与刘美人相约，武宗先行，随后派船接她。刘美人从头上摘下一簪，赠给武宗作为信物。武宗把簪藏于衣内，在过芦沟时，驰马失落。武宗为了这个簪子，在芦沟附近派人严密查找了几天，没有找到。武宗的人马到了临清，派宦官去接刘美人。刘美人执意不见簪子不动身。武宗只得乘船，昼夜兼程赶到张家湾，亲自接刘美人南行。

清咸丰时，君、臣共与一个女伶风流，实不多见。当时，有位雏伶名叫朱莲芬，美貌出众，善唱昆曲，歌喉娇脆无比，还能作小诗，工楷书，颇得咸丰的爱幸，不时召见。而同时至少有两位大臣与朱莲芬有瓜葛，一位是御史陆某，一位是吏部官员龚引孙。陆某因朱莲芬经常入宫，不能常与自己在一起，便上书皇帝，直言极谏，劝皇帝勿近倡优。奏章中引经据典，洋洋数千言。咸丰看了他的奏书，大笑说：“陆都老爷醋矣！”随即挥笔批示：“如狗啃骨，被人夺去，岂不恨哉！钦此！”

对陆某不加惩处，这真是少有。

可见女伶也时常扮演妓女的角色。

皇帝与妓女的交情，大多是为了淫乱。而崇尚风雅如宋徽宗者，与李师师的交情，令人不忍断然指斥。宋代无名氏写了一篇《李师师外传》，记载了他们之间的故事。纵然有些渲染，但非虚构。李师师是汴京一个染匠的女儿，母亲刚生她，就死了。父亲用豆浆代替乳汁喂养她。汴京习俗，父母若爱孩子，必舍身佛寺以求孩子吉祥。在佛院中她显得很奇异，父亲自语道：“是女真佛弟子”。为她起名“师师”。师师年方四岁，父亲就因罪入狱而

死，无所依归的师师被倡籍李姥收养。

宋徽宗讲求奢华，尽享声色狗马宫室苑囿之乐，在宫中乐久生厌，便考虑出宫微行。受徽宗宠信的宦官张迪未入宫前，往来各家妓院，与李姥相熟，又早知李师师色艺双绝，遂向徽宗讲述了李师师的情况，令徽宗心动。

次日，徽宗命张迪携带宫中珍宝，他自称大商人赵乙，前去拜访李师师。徽宗是天黑时出门的，他杂在四十名宦官中，走出东华门，步行二里，来到镇安坊。徽宗令众人离去，只留下张迪随行。步入坊门，李姥见这位大商人送礼贵重，乃用水果招待赵乙（徽宗）。徽宗无心吃水果，只等李师师出见，然而李师师却迟迟不出来。徽宗和李姥闲聊了许久，又被引入一间小轩，小轩内外陈设颇雅，窗外新竹参差弄影，徽宗爽然落座，意兴闲适，等待美人的到来。过了一会儿，李姥引徽宗入后堂，一顿盛宴已备，李姥陪徽宗进餐。李姥的谈吐还算殷勤，但徽宗不解李师师为何还不出见。吃过饭，李姥请徽宗入浴，徽宗辞之，李姥对他耳语：孩儿天性好干净，不要见怪。徽宗不得已，只好进了浴室。浴后，李姥再请他到后堂，继续饮酒。时间过得真慢，李姥再举着烛火，请徽宗进入卧房，徽宗以为李师师一定在房中，撩帷而入，只见一灯荧然，绝无美人影子。又出徽宗意料，他颇觉奇异，耐着性子，倚在几榻间。

过了很久，徽宗抬眼见李姥拥着一位美姬姗姗而来。该女淡妆不施脂粉，一身素色衣服，新浴方罢，娇艳如出水芙蓉。见到自称赵乙的徽宗，师师目光轻蔑，神色倨傲，也不施礼。李姥对赵乙耳语说：孩子生来任性，请谅解。徽宗在灯下凝视她的容颜，只见幽姿神韵，闪烁惊眸。徽宗问她的年龄，她不予理睬，再问她问题，她便移坐到另外一个地方。李姥又耳语赵乙：孩儿喜欢静坐，得罪了，请莫怪罪。说完出去。

李师师站起来，取下墙上的琴，在桌旁端坐而弹《平沙落雁》，轻拢慢捻，流韵淡远，徽宗被琴声感染，忘记了倦意。三支曲子奏完，外面已传来鸡鸣声。徽宗走出屋外，李姥过来备上早点，徽宗饮罢杏酥，离去。内侍们通宵潜候于镇安坊外，这时拥帝回宫。

徽宗去后，李姥责备师师：赵氏礼送得不薄，你怎么这样慢待？师师一脸怒容：一个商人罢了，还要我怎么样？

不久，京城纷纷传言，皇帝驾访李师师。李姥闻知大为惊恐，日夜哭泣，李师师却说：不要害怕。皇上这样顾惜我，不会忍心杀我，况且相见之夜没有强逼，一定是十分怜爱我。只是我心中很悲伤，贱命流落风尘，让不洁之名连累圣上，真是死有余辜！四个月后，徽宗派张迪赐李师师蛇跗琴。不久，徽宗又微行到镇安坊。师师淡妆素服，俯伏门阶迎驾。徽宗心喜，伸手扶她起来。徽宗环视，发现上次来时的幽雅景观都变得富丽堂皇了，不免惋惜。李姥见徽宗到来，躲藏起来，被召到徽宗面前，浑身颤抖。徽宗很不喜欢李姥这种样子，告诉她不要拘束。李姥拜谢，引徽宗到新建的楼前。李师师叩请徽宗赐额，时当三月，杏花盛开，徽宗书“醉杏楼”赐之。李姥置席，徽宗命师师坐在一旁，命她弹奏蛇跗琴。师师乃奏出《梅花三弄》曲，徽宗衔杯饮听，连称师师奏得好。徽宗发现席上的肴品都成龙凤形，或镂或绘，和宫中一样，问李姥，知李姥出钱请尚食房精制的，徽宗颇不快，席未终便离去。

徽宗回宫后，经常派人给李师师送去物品。事情被郑皇后闻知，郑后进谏说：妓女下贱，不应侍伺圣上，况且夜间微行，恐怕会有什么不测，圣上

自爱吧！徽宗点了点头。连续多年没去见李师师，但经常派人慰问、赏赐。

十年后，徽宗再次来到李师师处。到醉杏楼，端详自己多年前赐给师师的画，画题为“金勒马嘶芳草地，玉楼人醉杏花天”。观玩久之，徽宗忽然回首望着李师师，说：画中美人怎么出来了？又赐李师师文房四宝。

张迪看出徽宗对李师师的眷恋，向徽宗提议，从宫中向东修二三里的地道直通镇安坊，以免微服夜行不便。徽宗同意。地道修好后，徽宗经常前往李师师处，而镇安坊到宫城一带有御林军防守，李师师每日在镇安坊坐等与徽宗相会。

徽宗曾在后宫集嫔妃宴坐。韦妃悄声问徽宗：李家姑娘什么样儿，让皇上这样着迷？徽宗答道：没什么，如果让你们一百人丢掉艳妆，都穿素服，让这孩子和你们在一起，一看就不一样——她的一种天然仙姿逸韵，远在美色之外。

升平时代被金兵的铁蹄打断。李师师将徽宗前后赏赐的金钱捐献为军饷，又请张迪代为禀告徽宗（已禅位太上皇），她愿出家为女道士。徽宗允许，赐她住在城北慈云观。

金师攻破汴京，主帅搜索京城，连续几天，未能搜出李师师。叛臣张邦昌循迹找到李师师，要进献给金帅。李师师怒斥张邦昌“吾以贱妓，蒙皇帝眷，宁一死无他志。若辈高爵厚禄，朝廷何负于汝？乃事事为斩灭宗社计？今又北面事丑虏，冀得一当为呈身之地。吾岂作若辈羔雁贄耶？”李师师只求以死报答皇帝的眷顾，拔下金簪刺向自己喉咙，未死，再折断金簪，狠命吞下去，才悲壮而死。身陷五国城的徽宗许久以后得知师师的死状，不禁涕泣滂沱。

像李师师这种如风之猎猎的侠妓，虽不是古来仅见，亦属于奇人。她和清同治皇帝遇到的那种藏垢纳污、传播性疾病的下等妓女，不能算作同类。可叹导引同治皇帝嫖妓的竟是一流文士。

八、宫女的悲哀

自入长安帝子家，一年一见紫薇花。
花开花落年年事，不管愁人鬓又华。
沉沉庭院夜如何，坐看黄姑织女过。
月下偶然应识面，谁知人间有嫦娥。

被送入宫中的女子，实在是网中的鱼、笼中的鸟，从此开始变相的囚禁。没有自由，享受不到人间的温暖。宫女的忧愁，是人间最绵长、最无望的忧愁。刚入宫的少女，愁的是再也见不到家里的亲人。这些如同刚孵出壳的雏鸡般的少女，被带到远离家乡百里千里的地方，从此和家人音信稀疏甚至断绝，生死各一方。杨玉环当年被送入寿王府的时候，红泪都洒满了一路，何况那些凶多吉少的少女？

每个宫女在几千粉黛或几万粉黛中，只是水之一滴、万花之一瓣，谁会把她当成每一个个体的存在？她们如同树、草、花一样，成为宫中的景物和摆设。就连和皇帝生过孩子的宫女，都不一定能留下姓名，不一定受到重视，何况终生未被眷顾者？

那么宫女入宫后，一生便无快乐的时候？有时也有。入宫时间不长的宫女，豆蔻年华、天真活泼，对宫中的事物、小山小水和游乐活动感到新奇。在季节的变换中，宫中的游乐活动也变出不少花样。春季赏花、荡秋千，夏季游湖、采莲，秋季七夕赛巧、赏月，冬季堆雪人、贴窗花，等等。

表现宫女欢笑时刻的宫词，也有不少：

太液池中翻翠荷，宫娃学唱采莲歌。
画船不系垂杨下，尽日随风漾碧波。
翡翠空闲云母屏，宫娥夜坐数流萤。
月华淡淡清无暑，笑把瑶笙学凤鸣。
一夜瑶花满禁阶，晓来旭日映西斋。
宫人团雪作狮子，笑把冰簪当玉钗。

宫女们对于承幸于皇帝的渴望，是颇有耐心的，她们不到中年不会丧失这个唯一的期盼。见到宫中的花并头而开，她们相戒不折，凡见到这种花就像见到吉兆，心中不免惊喜。七夕的晚上，宫女们祭祀织女，希望她能保佑自己有被皇帝赏识的那一天。唐代的宫女在七夕时还要捉蜘蛛，放在小盒内，第二天打开盒盖看蛛网稀密，她们认为蛛网织得密便意味着将有巧事。

然而人生和岁月一样无情，生命在宫墙包围着的狭小空间内消磨着，生命的光彩和生活的乐趣逐渐消失。有时听到临院里笙歌起伏，是翠华（皇帝御辇的代称）临幸，而自己的院中“镇日无人独掩门”。在期待中走向绝望的宫女“空余孤枕不成寐，拨碎琵琶弹泪痕”。

那些被皇帝临幸过的宫女，即使进封名号，恐怕惆怅更多。“半倚朱门久凝睇，和愁和月待昏黑。”而无数个黄昏到来，皇帝却没有再驾临。她们“拥衾欹枕暗伤心，起坐窗前弄玉琴。曾使君王痛怜惜，曲中犹写《白头吟》”。从此不再有平静的夜晚了，无法安寝，在愁中数着岁月。

“霜露满天红叶老，有人愁听捣衣声。”才情并茂的宫女，将心事寄与红叶。拾起一片红叶，提笔落下一首怅惘的诗，送入御沟，流出宫外。唐玄宗时杨贵妃得宠，宫女无望，有位宫女在落叶上题诗：

旧宠悲秋扇，新恩寄早春。

聊题一片叶，将去接流人。

文士顾况在洛阳的上阳宫外的水中，捡到了一张写在桐叶上的诗：

一入深宫去，年年不见春。

聊题一片叶，寄与有情人。

顾况深为感动，第二天他也题了一首诗，送入上游的御沟中：

愁见莺啼柳絮飞，上阳宫女断肠时。

帝城不禁东流水，叶上题诗寄与谁。

顾况离开洛阳以后，又有文士游于此地，又发现水中流出一首诗，写在杏叶上：

一叶题诗出禁城，谁人酬合独含情。

自嗟不及波中叶，荡漾寻春取次行。

这段故事颇令人伤感，宫女题写春怨诗，恰逢知音回赠，可以想见宫女得到回赠诗时的心情，但是未能得到如愿的结局。宫女每日在御沟旁，不知等了多少时日。

唐僖宗时，真的发生了一件红叶题诗结良缘的事情，当时年轻的儒生于祐，一天傍晚在城中漫步。时值悲秋，他颇怀伤感。看见御沟中浮着落叶缓缓流出，于祐躬身洗手，忽然发现一片较大的红叶上面有墨印，取而视之，果然上面题着一首诗：

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

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

一定是宫女所作。于祐把诗带回家里，此事日日萦怀。几天后，他在红叶上题诗两句，置于御沟的上流水中：

曾闻叶上题红怨，叶上题诗寄阿谁？几年过去，于祐在富室韩泳家教书，一天韩泳告诉他，最近宫中放出三十名宫女，有位韩夫人是韩泳的同姓，住在韩舍，他愿为二人结缘。于祐尚未娶亲，听说韩夫人姿色甚丽，大为庆幸。二人结亲后，韩氏在于祐画笥中看见自己题写的那片红叶，问于祐哪里得来的，于祐如实告之。韩氏说：“吾于水中亦得红叶，不知何人作也？”拿来一看，恰是于祐所作。俩人相对感泣良久。自红叶题诗到他们结为夫妇，中间隔着十年。

韩氏慨然又作诗道：

一联佳句题流水，十载幽思满素怀。

今日却成鸾凤友，方知红叶是良媒。

僖宗朝宰相张濬，作诗叙述并赞叹这件红叶为媒的故事，可以证实此事的真实性：

长安百万户，御水日东注。

水上有红叶，子独得佳句。

子复题红叶，流入宫中去。

深宫千万人，叶归韩氏处。

出宫三十人，韩氏籍中数。

回首谢君恩，泪洒胭脂雨。

寓居贵人家，方与子相遇。

通媒六礼具，百岁为夫妇。

儿女满眼前，青紫盈门户。

兹事自古无，可以传千古。

唐玄宗时，还有一件脍炙人口的题征衣的真实故事。开元年间，朝廷赐给卫边士兵的棉衣都由后宫制作。有位军校发现分给自己的棉衣中藏着一首诗，诗中写道：

沙场征戍客，寒苦若为眠。
战袍经手作，知落阿谁边。
蓄意多添线，含情更著棉。
今生已过也，重结后生缘。

军校拿着这首诗禀告军帅，这件新奇的事又被上报到唐玄宗那里。玄宗召集宫女们，出示此诗，说：“作者勿隐，不汝罪也。”这时有一位宫女跪地，自称：“万死。”玄宗命将她许给得诗的军校，并对她说：“与汝结今生缘。”玄宗也算做了一件积善的事。然而历史上这种机遇能有几个获得？宫女们在禁严的宫墙内煎熬着，没有出头之日。

从宫城逃出去！这是宫女们随时潜伏着的一种冲动。但是若要实现这种愿望，难乎其难。机会太不容易获得了，但也有天赐良机之时，唐中宗神龙四年元宵夜，放出几千名宫女看灯，结果有多数宫女跑掉了。唐中宗又和韦皇后微服到街市上游览，带着一大批宫女，史称这些宫女们“皆淫奔不还”。清代《旧京遗事》中说，有人曾见过宫女从皇城逸出，“虽举体男装而袅袅回步。”用男装打扮，肯定早有准备，早就伺机外逃。如同网中的鱼发现了一个破口，悄然滑出；笼中的鸟束身从笼缝飞出，去回归自由和真正的生活，不管前途吉凶如何。

当金朝都城燕京遭元军围攻，王朝岌岌可危之际，金哀宗决定遣出宫女二千四百人，配给三衙兵卫之无妻者。相貌居上等的宫女配给诸郎将及子弟。宫女们听到这个消息，喜不自胜。“忙熬掖庭诸女伴，马头争逐爱根来。”金人称丈夫为爱根，宫女们争着挑选丈夫，那份激动、急切全部展现出来，毫不遮掩。古人感叹宫女不知亡国恨，然而对她们来说，国就是把她们锁进深院而不看一眼的那位“大家”的财产，那么国昌对她们有何幸，国亡又有何恨？那些终生囚禁在宫墙内的宫女们才是终生抱恨的女子。宫，就是一种刑法，“宫者，丈夫则割其势；女子闭于宫中。”宫女们囚禁在宫中就等于受宫刑。

唐玄宗聚四万宫女于后宫，而天宝五年以后，杨贵妃得宠，后宫女子皆被搁置一旁。在杨贵妃的授意下，后宫凡姿色稍美者，都被迁移到远离玄宗日常生活的地方，连梅妃都被迁走。东都洛阳上阳宫是安置宫女的一大场所。这些宫女被困在上阳宫，至死方休。到唐德宗贞元年间，离玄宗天宝时已有四十多年，上阳宫还有白发的宫女存活着。诗人白居易痛心地下写了《上阳白发人》一诗，以纪念这群无辜的牺牲者：

上阳人，红颜暗老白发新。
绿衣监使守宫门，一闭上阳多少春。
玄宗末岁初选入，入时十六今六十。
同时采择百余人，零落年深残此身。
忆昔吞悲别亲族，扶入车中不教哭；
皆云入内便承恩，脸似芙蓉胸似玉。
未容君王得见面，已被杨妃遥侧目。
妒令潜配上阳宫，一生遂向空房宿。
秋夜长，夜长无寐天不明；

耿耿残灯背壁影，萧萧暗雨打窗声。

春日迟，日迟独坐天难暮。

宫莺百转愁厌闻，梁燕双栖老休妒。

莺归燕去长悄然，春往秋来不许年。

唯向深宫望明月，东西四五百回圆。

今日宫中年最老，大家遥赐尚书号。

小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

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妆。

上阳人，苦最多。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两如何？

君不见昔时吕向《美人赋》；又不见今日上阳白发歌！在宫中，宫女和普通宦官一样是仆役，帝后、妃嫔们是主子。宫女们吃苦，遭受打骂都是自然的。宫女们遭受身、心的非人折磨，大都忍气吞声，默默地承受。

明宫规定，宫女如犯过失，要被罚以提铃警夜。深夜提着铃，在后宫徐行正步。规定从乾清门提铃至日精门、月华门，再走回乾清宫前。边提铃还要口唱“天下太平——”，声音要缓而长，与铃声相应。即使刮风下雨，天寒地冻，也不许回避，照样提铃夜行。崇祯皇帝经常办公到深夜，一个风雨之夜，他听出外面传来宫女“天下太平”的唱声，声音凄婉，牵动了他的怜悯心。他命人把这位宫女叫来，问她姓名，答称：“韩翠娥。”崇祯命解除她的刑罚。后来韩翠娥刻意读书，升为宫中女史官。

泰昌、天启年间，加重了对宫女的惩罚。除提铃外，还新设一种叫做“扳著”的刑法。执行时，宫女向北而立，弯腰，伸两手自扳其足，腿不许打弯，如身曲腿弯，则用荆条乱打。宫女被施以这种刑法，往往时间较长便头晕目眩，僵仆卧地；有时呕吐成疾，甚至有死于此刑的。

明世宗时，宫女们被逼得走投无路，铤而走险，刺杀这个暴戾的君主。这就是有名的“杨金英案”。

明世宗中年服食丹药，性情暴躁，动辄鞭打宫女。宫女们每天提心吊胆，生怕出一点小错。在世宗身边服役的宫女中，有位杨金英年近三十，她和另一位年龄较大的宫女邢翠莲一起，带领三四十名宫女干活，每天天色微明时就要起床，到花园中为皇帝采集甘露。一点一滴，把树叶、草叶上的露珠收进杯中。这种劳役十分折磨人，腰弯背酸，弄湿了衣服，还枯燥乏味。多少天下来，宫女们的怨气无处发泄，只好装病。世宗对杨金英等人的工作很不满，斥责她们偷懒，还将杨金英、邢翠莲狠狠鞭打了一顿。杨金英自忖在宫中服役了这么多年，还要常常挨打，毫无生的乐趣。

然而祸不单行，杨金英等人又犯了一场大错。世宗笃信祥瑞，大臣们为了讨好皇帝，不停地进献祥物。其中有一只五色龟，据说是千年神龟，得来不易。世宗异常珍惜，命放它放在水中，令杨金英等人小心看顾。其实这只五色龟是严嵩党羽赵文华假造的，龟背上的颜色是用染料染成的。放在水中，颜料发散，这支龟也许因颜料中毒，不久就死了。杨金英等发现神龟死了，大为惊恐，知道死到临头了，皇帝不可能宽恕她们。

活着虽无乐趣，但谁又甘心就死。杨金英和姐妹们决定冒险刺杀皇帝，皇帝一死，宫中忙着治丧，谁会再管死龟的事。

嘉靖二十一年十月某日的凌晨，杨金英等四名宫女潜入世宗的寝室。杨金英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绳子，先做了一个结往世宗脖子上一套，令同伙们用力向两个方向拉，世宗惊醒，拼命挣扎。不巧杨金英结的绳扣是个死扣，怎

么也拉不紧，世宗的头拼命抵着，口中呻吟。害女们害怕、紧张、慌乱，杨金英见另外三个宫女都用不上力，气得动手掐世宗的脖子，再拔下簪子，向他的胯间猛刺。

宫女中有一个见事不妙，飞奔到方皇后处告密。方皇后赶来，杨金英等急忙逃走。方皇后命宦官解下绳子，召来御医。世宗已经昏迷，御医迅速配制下血药，服下，六、七个小时后才苏醒过来，一个多月后才恢复说话能力。

杨金英和从犯、知情者二十人左右被判以凌迟处死。

明清两代，宫女病、老或有罪，先发落到内安乐堂。内安乐堂在紫禁城内金鳌玉螯桥（今北海大桥前身）西，棂星门北的羊房夹道。明孝宗的母亲纪氏生孝宗于此，同时在这里的还有被宪宗废黜的吴皇后。安乐堂在北安门内，房屋数间，住着不幸的宫女。宫外的浣衣局也是收容病、老或有罪宫女的地方。

净乐堂在西直门外，是宫女死后焚化、安放骨灰的地方。凡没有获得名号的宫女，死后不赐墓，尸骨被抬到紫禁城后顺贞门旁右门，承以敛具，再抬出神武门，送往安乐堂。再由安乐堂的雇工移到北安门外停尸房（在北安门外墙下）。尸骨被封进朱棺里，运到净乐堂，入火葬塔焚化。

在宫中，宫女的后事由宦官办理。凡有宫女病故，必请旨，拿到铜符，才能将尸体送出神武门。各堂房的簿册由中贵人（宦官首领）掌管。亡故宫女的父兄在京者，可以从停棺所为她送行，直至净乐堂外。净乐堂内有东西二塔，由塔中焚化的骨灰，放置在塔下的罍井（干枯的井）中。

第五章帝王的归宿

一、长生术——帝王的白日梦

帝王们既已拥有天下，天下的山川河海、子女玉帛、珍奇异宝当然都在一己手中。一代又一代的帝王，在人间最美妙的居所——宫室殿阁、楼台亭榭、离宫别院，享受着人间独一无二的快乐时，年华在不知不觉中流走。一朝揽镜自照，发现鬓已沾霜，自封为天子的帝王，会马上意识到自己还缺少什么、还需要什么。

缺少的是无限的生命，需要的是长生不老。其实皇帝不一定到老年才知道寻求长生，许多皇帝即位不久就为长生术而忙碌。

帝王们对于成仙、长生的追求真是百折不挠，却没有一次达到过目的，没有一个皇帝驾驭了长生术而不是被长生术所欺骗。

秦始皇是中国第一个皇帝，可以说是中国千年帝国中帝王的缩影。他夺得天下、抚定四方后，便追随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等先行者，派人求仙，寻找长生不老之药。在秦始皇身边出现过许多方士，他们乘皇帝之所好，谋取富贵。当时方士们描述的神仙世界和生长不老药的地方都在东瀛海中，海外神仙遥远缥缈，海上风波难测，秦始皇一次次相信方士的神话，一次次不惜代价派方士入海求仙。

传说仙人生活在东海之中的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上。古来君主多次派人寻访神山，都未见踪影，而秦始皇时，大胆的方士却说找到了神山，看见了山上的仙人以及漫山遍野的不死之药，此外，山上的禽兽因吃了不死之药也毛发尽白而悠闲自得。果真如此？年方四十一岁，日夜渴求仙药的始皇帝，派徐市率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卢生、韩终、侯公、石生等方士先后奉始皇之命，寻访仙人、求不死之药。

然而派出去的方士不是一去不复返，就是回来说船被风波所阻。徐市入海数岁，求仙药而不得，又耗资巨大，恐遭始皇雷霆之怒，乃谎称：蓬莱药可以寻到，但苦于有大鲛鱼出没，得不到。请派善射的武士一同前往，用连弩射杀大鲛鱼。秦始皇居然听信，令入海者捕巨鱼，还亲自在琅邪海边观测大鱼出没，发连弩而击之。到之罘，又射杀一条巨鱼。然而寻仙的事仍未能乘风破浪而达目标，始皇却在古渡平原津病倒了，史称始皇本想借此南巡北返之行，亲自入海尝试求仙，不料致命的病先袭击了他。

在多年的求仙梦中，秦始皇对方士的巧言几乎无不尊信。例如卢生说他居室不隐，世人知道他住的地方，所以神仙无法降临，若想与仙人往来，必须隐蔽居室，心性恬淡。所以此后始皇耗巨资修筑了绵延不绝的宫室复道，从复道间行，外人无法知晓皇帝的行踪，即使是当朝大臣，也不知道皇帝经常躲在哪里。秦始皇一定常在神秘的居室屏心静气，等候仙人前来会面，在期待中失望，在失望中期待，这需要多大的耐心！以皇帝的身份入海求仙也是方士的建议，秦始皇梦想尝试，却力不从心只得抱憾。由于渴求生长、恶言死事，竟然把确立皇位继承人的事严重地耽搁了。

汉武帝的雄才大略和气质性情与秦始皇相似。平定四方，创立了帝王伟业以后，自信心极巨膨胀，以为在寿数上能够人定胜天，能够挥手間荡平天下，所以天下无难事。

令皇帝虔诚笃敬的是从不露真面目的各种神灵，汉武帝不断地祭祷名山大川、五岳四渎，冀望神灵保佑，自己能够成仙。

这时的方士比秦始皇时聪明，多自称与神仙有过往来或曾从师于仙人。

李少君最先脱颖而出，以祠灶、谷道、却老之方，邀宠于汉武帝。李少君入宫后，不吐露自己的真实年龄，一次武帝给他看一件铜器，少君说：“此器齐桓公十年陈于柏寝。”后来经查对，果然是齐桓公时器物，少君之神异一时震撼宫廷上下，被认为是数百岁的寿翁。少君建言武帝：祠灶可以致物，致物可以使丹砂化为黄金，黄金作饮食器可以益寿，益寿以后才能见到海上神仙，见仙后封禅就能长生不死，黄帝就是这样做的。少君还说，他在海上见到过仙人安期生，见他以巨枣为食，枣大如瓜。这巨枣无疑就是令仙人长生的仙果。于是汉武帝照着李少君的说法去做，亲自祠灶，再炼金，再遣人入海求仙。

李少君后来因病而死，武帝却以为他羽化飞升了，继续按他的法术寻仙。入海求仙之事一直未有所获，而齐地的方士更多地涌向京师，大谈神仙。其中一位自称少翁的人，身怀招致鬼神的绝技，被汉武帝接见。由于使去世的李夫人在帷幕中现形，武帝信服，封他为文成将军，以客礼待之。少翁对武帝说：皇上要与神仙来往，宫室服饰不象神仙，神仙不会来。武帝很快命人制造云气车、以及各具象征性的青、赤、玄、白、黄车，驾车辟恶鬼；又在甘泉宫画天、地、太一（即太阳）诸神，祭之。之后，武帝静心等待了一年多，少翁的方法快要用尽，却不见神仙来访。少翁十分不安，乃密将一封帛书塞进牛嘴，然后对人声称：“此牛腹中有奇”。当众宰牛，取出帛书，帛书上的语言很怪。拿到武帝面前，武帝一眼认出这是少翁的手笔，质问少翁，少翁不得已如实回答。武帝恼怒，杀了这位文成将军。这件丑闻被禁止外传。

据《史记》上说，少翁的师兄弟栾大继少翁之后又来到武帝身边。汉武帝之所以接纳栾大，乃是因后悔过早杀了少翁，未来得及让他献出全部的求仙之方。武帝此时求仙心切，认为应该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宁信其实，不信其诬，所以栾大的到来令他大为欣喜。

栾大对武帝说：我的师傅认为，黄金可以炼成，河决了口可以堵上，不死仙药可以得到，仙人也可以来往。可我怕象文成将军一样被杀！方士们都闭了口，谁还敢说什么！武帝解释少翁的死：文成将军是吃马肝死的。并向栾大许诺：如果真有神方，我是不会吝惜任何东西的。栾大明白了武帝的心思，因而比少翁更敢大言而不惭。

栾大尚未大显神通，武帝就急于实现他的诺言，不惜金钱爵禄，封栾大为五利将军，赐列侯甲第，僮仆千人，还将自己的女儿、卫皇后所生的公主嫁给了栾大。在皇宫与栾大的宅第之间，武帝派去存问、供给的使者相属于道。对此栾大均以理所当然的态度受之，比如武帝派使者又授给他“天道将军”的玉印时，栾大并不跪受印，而是与武帝的使者同样站着，以示不臣。

然而栾大的招神本领尚且不如少翁，他除了刚入宫时与人斗棋，能使棋子自相触击以外，几乎没有什么灵验的神术。在爵禄尽得以后，他常在夜间祈祷，召神下凡，结果当然是徒劳的。不久，他又煞有介事地整装东行，要入海求请其师父。栾大一路威风，但他没有胆量入海，海上更没有其师存在，等于炫耀了一番富贵荣华，令沿路官民艳羡，折过泰山，返回京城。武帝对他一无所获很不满，经调查，得知栾大施展的全是骗术，一气之下，武帝又杀了这位五利将军。

几番失误之后，汉武帝仍继续听信神话，接纳方士。仍来自齐地的方士公孙卿告诉武帝：已故的仙人申公与安期生往来，受黄帝之言。黄帝当年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成，有龙垂胡须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

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武帝心向往之，叹道：“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屣（无跟的小鞋）尔”。公孙卿曾候神于黄河之南，回来说在缙氏城上看见仙人的脚印，有个象雉的幼物往来于城上。武帝很兴奋，决定亲自前往缙氏城观看，但仍有一丝疑虑，他问公孙卿：不会象文成、五利将军骗我吧？公孙卿说：“仙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宽假，神不来。言神事，事如迂诞，积以岁乃可致也”。汉武帝再次耐下心来，下令郡国清除道路、缮治宫观名山神祠，恭候神仙降临。汉武帝不知疲倦地寻求仙人，某年东巡海上，齐地方士借机上疏大谈神怪奇方，然而上万奇方无一效验。武帝仍沉着不馁，造发大船，令声称见过海中神仙者数千人登船出海，求请蓬莱仙人。公孙卿持节先行，回来后，说在东莱夜见大人，长数丈，临近时忽然不见了，其脚印甚大。同行的诸臣也说曾见一老父牵狗，道：“吾欲见钜公”。然后就消失了。武帝情绪亢奋，连续在海上过夜，配给方士传车及上千名助手。

武帝按照自己的意愿在泰山封禅以后，方士们再次进言，说诸神即将可得。武帝喜于离遇仙不远了，乃再至海岸翘望。结果却是杀了一名败事的侍官，北行，返都。

两年后的春天，公孙卿又说在东莱山见到了神人，神人说：“欲见天子”。武帝起身往缙氏城、再到东莱，等候神人数日，无所见，但看见了巨人脚印。公孙卿自有道理，说：“仙人可见，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见。今陛下可为观，如缙城，置脯枣，神人宜可致也，且仙人好楼居”。武帝唯言是听，在长安及附近大起楼观，派公孙卿持节设具而候神人。

几年后，武帝又东到海上，考问方士入海求神之事，无一灵验。武帝再增求仙人数量，寄希望于万一。

如此反反复复、寻寻觅觅，锲而不舍，汉武帝活了七十一岁，求仙生涯达五十年。公元前八十九年（汉武征和四年），六十九岁的汉武帝最后一次行幸东莱，来到海边，不顾群臣劝谏，决心乘船浮海，以最后的勇气试图与神仙相会于海上。然而天公不作美，大风晦冥，海水沸涌，武帝在海边徘徊十余日，终于无法登船下海。汉武帝此行结束之后，无可奈何地感到求仙无法实现，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他对群臣叹道：“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善可少病而已”。尽逐方士。后继的帝王们对长生不死的追求，不会因某个皇帝暮年的悔悟而终止。求长生的方式有了变化，不只是徒劳地入海求仙。南北朝时，“长生不老药”已经从道家的炼丹炉里产生了，这种丹药或称秘药代替了传说中仙人手持的长生草或巨枣。长寿术继续施展魔法，入此彀中的皇帝不仅有昏主，也有明君。

晋哀帝司马丕是个短寿皇帝，其短寿乃是因追求长寿所致。司马丕二十一岁即位，即位不久，年轻的皇帝就迷上了长生术，按照道士传授的长生法，断谷、服丹药。丹药是以雄黄为主要成份的热剂，对于年迈体虚者尚有强体作用，而晋哀帝正值青壮，服药后，药性大发，以致于不能听政，遂由褚太后再次临朝。药剂的作用使得晋哀帝年仅二十五岁便一命归西。

同一时代，北魏道武帝拓跋珪也来以身试药。拓跋珪雄才大略，十六岁建立了北魏王朝，随后不停地征服外敌、击败内部挑战，迁都、立官制、定律令，堪为一代人杰。然而三十刚过就把注意力转向服丹药，纵欲，求长生。拓跋珪经常服用的寒食散，最初是在太医令阴羌的指导下有节制的服用，自阴羌死后，寒食散中的毒性发作得愈来愈甚，在毒性的攻击下，拓跋珪日渐

变得精神失常，加之灾变屡次发生，拓跋珪在宫中的夜忧懣不安，心神再也平静不下来，或数日不食、或达旦不寝，喜怒无常，多疑。象个幽魂，不断地独自追思既往成败得失，白天黑夜滔滔不绝地自言自语，仿佛与身边的鬼物争论。朝臣进见，拓跋珪可能会忽然忆起与该臣往日的嫌隙，下令立斩。大臣们因忧惧或面色失常、或喘息不定，或行步快慢无节、或言语失措，拓跋珪便会断定其人怀恶在心，变见于外，乃亲手殴击。由此而死者皆陈尸于天安殿前。

在服用长生药的帝王之列中，唐太宗是其中一位。关于唐太宗求长生不死之事，并不广为人知。唐太宗不愿将此事搞得象秦皇汉武那样轰轰烈烈，他由患病而急于求愈、更求不死、永寿，这番情事是在不愿声张的状况下进行的。

唐太宗服用的长生药不是中原本上的道士所造，而是婆罗门僧那罗迦娑寐，依其本国旧方配制的。时值贞观末年，这位异国僧人以异术闻于朝廷，很快，唐太宗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唐太宗命那罗迦娑寐照他所宣扬的不死神话，调制秘药。于是，征求灵草秘石，僧人历一年工夫制成了不死之药。唐太宗服用后，并没有出现奇异效果，不久，病情加重，进而大渐。由服秘药而加剧的疾病，呈现的症状却是痢疾，御医们不知如何开方诊治，在慌乱和不知所措中，唐太宗死在寝殿的卧床上。所以说太宗之死，乃因于胡僧的灵草秘石，唐廷本想归罪于胡僧，予以诛戮，又恐取笑于夷狄，故未敢声张。

唐高宗时，来自婆罗门的僧人仍得宠于皇帝，往返于宫廷内外。高宗数次诏命卢伽阿逸多调制长生药。由于大臣郝处俊直言抗谏，揭出先皇为秘药所害之事，高宗才没敢服用已经制好的长生药，但对该僧的嘉赏仍然不减，封其为怀化大将军。

丹药的魅力是无与伦比的，在追求长生的路上前赴后继的帝王们，无法放弃对丹药的需求。唐代是一个崇尚冒险、相信奇迹的时代，由唐太宗作先驱，唐代的帝王们多有以性命为代价，苦求长生者。

唐玄宗、宪宗、穆宗、武宗、宣宗都是长生药的崇拜者，后三位皇帝皆因此而殒命。

唐宪宗服用方士抑泌炼就的金丹药，起居舍人裴潏上表切谏：“金石含酷烈之性，加烧炼则火毒难制。若金丹已成，且令方士自服一年，观其效用，则进御可也”。如此忠恳的嘉言竟引来宪宗皇帝的大怒，裴潏被贬出京城。因金丹中毒，宪宗数月不能上朝，不久之后的一个深夜，宪宗暴崩于大明宫的中和殿。宪宗死于宦官陈弘志的弑逆，但如果没有陈弘志的暗害，酷烈的金丹也会成为宪宗体内的杀手。

唐武宗服金丹后，中境躁乱，毒热难忍，宦官童膺福制作“胞玉条”以缓解其困。胞玉条是用锦做成一条中空的带子，里面裹以冰条。武宗将胞玉条系在腹部，顿感心肺俱凉，稍稍好受些，不多时冰条融化，再换上另一条已备好的胞玉条。然而金丹的魔法终非人力所能制，武宗变得喜怒无常，中毒更深时，连续十天不能说话，不久而亡。年在壮龄三十三。

宣宗继武宗而立，对武宗被金丹所戕害之事应该记忆犹新，然而宣宗竟能无视前车之鉴，抛开顾忌，重新以身试药。其实这种事情早已发生在宪宗、穆宗父子身上，宪宗死后，穆宗即位仅四年，就带着一身金丹之毒踏上了冥路。宣宗虽然在武宗之后继位，却是武宗的叔叔，其父正是宪宗。宣宗与武宗服丹药后的症状相似，躁热不安，时值隆冬，不敢穿丝绵衣拥炉。坐在冷

殿中，身穿单衣，宫女端进盛着少许麸炭的金盆进来，宣宗只用于暖手。此后禁中把麸火称为星子炭。

唐玄宗、宪宗、宣宗都曾追寻秦皇汉武的遗踪，妄想成仙。唐玄宗在大同殿安置真仙之像，每每夜深人静之时，在殿中焚香顶礼。派道士、中官设醮于天下名山，因为山是仙人有可能往来、存身的地方。玄宗还特好轻举（轻身、隐身）之术，在道士罗公远的指导下学习。罗公远以隐身术闻名并且运用自如，但他不肯将这招绝技全部授给唐玄宗。唐玄宗一心要学会此术，由于罗公远传授时有所保留，所以玄宗每次试行，不是衣带外露就是袱头脚没隐好。后来玄宗怒而命人扑杀罗公远。

唐宪宗元和五年，内给事（宦官）张惟则从新罗国回来，带回来一个海市蜃楼的神话。说在海中遇见一位公子，自称是皇帝的朋友，交给他一方金龟印，印上有篆文：“凤芝龙木、受命无疆”。宪宗皇帝大受感动，手持金龟印自语：“朕前生岂非仙人乎？”把金龟印缄以紫泥玉锁，置于帐内。此后，宪宗对前生、仙境苦思竭虑，常常处于幼觉之中。处士伊祁玄解应运而来，自称能描述千百年事，事事如同目击过。意味着其寿数惊人。宪宗密诏伊祁玄解入宫内，馆于九华之室，设紫菱之席，饮龙膏之酒，宪宗每日亲自访问，对玄解颇加敬仰。玄解说他家住海上，以灵草为食，从衣间掏出三类草种，美其名曰双麟芝、六合葵、万根藤，种于殿前。宪宗吃了长出的草以后，感觉不错。后来宪宗与玄解在宫中“海上三山”的木雕前谈论仙境，宪宗指着蓬莱说：“若非上仙，朕无由得及是境。”玄解忽然感到应该走了，乃作弄一番：探物、跳跃，闪身不见了。宪宗连声追呼，事后追思叹恨，几乎闹出一场病。这不可思议之事也许是宪宗的幻觉。

唐宣宗时，罗浮山有位道士轩辕集之名传入朝廷，宣宗派中使前往罗浮山迎接，同时下诏给进谏诸臣：“朕以万机事繁，躬亲庶务，访闻罗浮山处士轩辕集，善能摄生，年龄亦寿，乃遣使迎之，或冀有少保理也。朕每观前史，见秦皇、汉武为方士所惑，常以之为诫。卿等位当论列，职在谏司，阅示来章，深纳诚意”。派人转告谏官：“虽少翁、栾大复生，不能相惑。如闻轩辕先生，欲与之一言耳。”轩辕集被带入禁中后，宣宗问他：“先生遐寿而长生可致乎？”轩辕集说：“撤声色，去滋味，哀乐如一，德施周给，自然与天地合德，日月齐明，何必别求长生也。”轩辕集实是无力满足皇帝的愿望，又不愿名列少翁、栾大之后，遂很快返回了罗浮山。

五代时，南唐先主李升晚年结交方士，饵硫磺丹砂，同样导致喜怒无常，最终死于丹药中毒。

两宋期间，朝廷务实、谨慎，长生术对皇帝的吸引力大有减退。沿至明清，帝王们似乎不再坚信人能通过某种法术或药物达到长生不死，尤以康熙皇帝对生老病死之事最为清醒，认为生、死是自然规律。南巡时，有人献《炼丹养身秘书》，康熙对御医说：“凡炼丹修养长生及师巫自谓前知者，皆妄诞不足信，但可欺愚民而已。通经明理者，断不为其所惑也。宋司马光所论甚当，朕有取焉。此等事朕素不信，其掷还之。”

豁达如康熙者，帝王之中无一人能过之。明清两代仍有皇帝对秘药、道术孜孜以求，例如明世宗、清世宗。明世宗嘉靖三十五年，问礼臣古来芝草入药之作用，尚书吴山作出了令嘉靖皇帝满意的解释：“本草论芝，有黑、赤、青、白、黄、紫，其色不同，其味亦异，然皆云久服轻身。……”《黄帝内传》云，王母遣山人歌万年长生之曲，授帝以石函玉笈之书。会阉风瑶

池之上，授《神芝图》十卷。嘉靖乃下令采芝于元岳、龙虎、鹤鸣、三茅、齐云诸山及五岳，又令民间献芝，宛平县民张巨佑献山灵芝五本，嘉靖喜赐金帛，于是臣民献芝者纷至沓来，加上采芝使者的四处活动，一年之后，嘉靖皇帝已获得鲜芝一千余本。

灵芝作为主要原料炼丹。把养心殿附近的无梁殿专辟为炼丹之所。炼芝时，按照顾可学、陶仲文等“专家”之言，须用真龙涎香配和，并得矿穴先天真银为器，炼出的灵芝丹药服用后就可得长生。以献灵芝而大获宠眷的王金，被任命为御医，负责炼芝，炼芝杂进其他不经之剂，服用结果是“致损圣躬”。明世宗死后，王金坐“子杀父”律论劓，后来居然贷出。

清世宗雍正皇帝对道术存有几分希冀，曾密谕地方督抚，访求精通修养性命之人或道士。一位叫贾士芳的被推荐给雍正，几年前雍正曾接见过他，对他的“医术”不甚信任，此次贾士芳再行入宫，本领有所长进，也得到了雍正的刮目相看。贾士芳善于按摩，同时运用符咒，一段时间后，雍正身体的不适日渐好转，自然认为是贾士芳的手段高明。贾士芳获得赏识后，颇感得意，一天在给皇帝按摩时，口诵经咒，雍正听出他此时的咒语是：“天地听我主持，神鬼听我驱使”。雍正顿时大怒，立即停止按摩，将贾士芳逮捕入狱。贾士芳因咒语不当，犯下了“大不敬”罪，九月出事，十月被施以斩立决。祸福荣辱旦夕之间。这也许是历史上皇帝与道士（方士）较量的最后一个回合。

总观皇帝与道士（方士）的较量，代价是双方的，皇帝付出的更重，因为长生术根本不在道士（方士）手中。二者一个是自欺，一个是欺人。而对长生术的追求缘自皇帝的妄想，这是不能委过于人的。

二、帝王寿数与死因

从黄帝开始一直到清朝灭亡，中国历史上总共存在过五百五十八个帝王，包括了三百九十六帝，一百六十二王。史载商汤以前，帝王都具百龄以上的高寿，如黄帝活了一百一十一岁，尧一百一十七岁，舜一百岁，后人没有足够的理由确信这是事实。

从秦始皇到清末帝宣统，共有三百三十五个帝王，如果不包括南北朝时期的五胡十六国和五代时期的十国君主，那么帝王的数字就是二百三十五。这二百三十五个帝王中，寿命在二十岁以下的有二十八人，二十一——四十岁之间有八十三人，四十——六十岁之间有七十七人，六十——八十岁之间有三十六人。在长寿的三十六人中，七十以上的有六人，汉武帝、吴大帝、唐高祖、唐玄宗、辽道宗、明太祖；八十以上的有五人，梁武帝、武则天、宋高宗、元世祖、清高宗。清高宗享寿八十九岁，居中国帝王寿数之最。而二百三十五位帝王中除十一位寿数不明者以外，其余的平均寿数是三十九岁。岁数均以传统的虚龄计算。

和平时期的平民多死于疾病，战乱时期平民多死于兵燹。而帝王的死因则是各色各样，其中死于疾病的约占三分之二，死于它故的约占三分之一，这三分之一是帝王所特有的死亡方式，包括死于篡弑、死于丹药中毒、暴死而原委扑朔迷离、死于荒淫。

死于疾病

病魔对于所有人都是同样凶恶的。医学自古代发展至今，有着艰难的探索，渐进过程。愈是遥远的古代，医疗、医学水平愈是远离现代科学。由于历史记载不详，今人很难根据史料总结出导致大多数皇帝死亡的各种疾病是什么。

因病而死的皇帝，史书上多未说明死于何病。而且病死的皇帝也少有卧病多年、日渐危重者，而多是一、二个月发病，不久病故。凡史书上出现“帝不豫”三个字，就等于标明该皇帝的死期不远了，其实“不豫”就是身体不适，一个人一生可能得很多次病，“不豫”很多次，然而身为皇帝，一旦宣告不豫，那就危乎殆哉了。难道皇帝的生命就如此脆弱？

既然生在帝王家，帝王一个人自幼享用的一切就比平民高上千万倍。庶民百姓为衣、食、生计财产奔波忙碌终生，付出一生心神和体力代价，其间还受到天灾、人祸的多次袭击，疾病难以获得及时、精确的医治，要想活得愉快、长久实在很难。然而皇帝的美衣、玉食是其基本享受；全国一流的医师不离左右；禁卫森严以避免外来的伤害；出外卤簿大驾，在宫内行走也需坐辇，皇帝连摔一个跟斗几乎都不可能。这种安稳的生活，如何能不快乐长寿？然而，皇帝的生命的确是脆弱的。康熙皇帝就曾感叹古来没有几个白发天子。皇帝的生命之所以脆弱，是因为导致其长寿的因素远不如导致其短寿的因素更强，更能使皇帝难以摆脱。

皇帝是这样一种稀罕物：他除了发号施令外，不需要做任何具体的事。虽然有些皇帝能文能武，但更多的皇帝手无缚鸡之力，打不过宦官、甚至打不过宫女，是世上最无防卫能力、最虚弱的人。但事实上，戕害其生命的力量，多是来自他自己而不是外人。首先，做皇帝决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有多大的享受就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这付出，并不是一一具体地表现在每个皇帝的行动上，而是一种沉重的心理负荷。官员丢官后可以归田，归田后还有可

能再返官场，皇帝则是没有退路的，要彻底坐下去，牢固地坐下去。宝座位于无限风光之险峰，坐在那里安然与否，只有皇帝的内心知道。只活了三十八岁的宋神宗，当读到苏轼的“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之词句时，叹道：“苏轼终是爱君！”如果一旦皇位不稳，则处处隐藏着杀机、性命旦夕不保；被从帝座上赶下来，想退身为平民亦不可得、想苟全残生也办不到。自南朝宋武帝刘裕开了杀害亡国皇帝的先例后，皇帝们一代代位亡则身亡。所谓圣明君主终生殚精竭虑、孜孜勤政，不就是因为害怕丢失皇位、无葬身之地？正如康熙皇帝所说：“人君无退葬之地，岂当与臣民较安逸哉！”唐太宗在遗诏中说：“自栉风沐雨，遂成弭诊，忧劳庶政，更起沉痾，况乃汉苦周勤，禹胼尧腊……”就连后世一致指责的暴君秦始皇每天都要批阅一百二十斤的竹简奏章。如此忧烦，如何能安养天年，做一个与天地同呼吸、忘身物外的寿星？

因此大多数皇帝根本达不到寿星之龄，在离寿星之龄尚远时就注定要死于心脑血管、内脏的疾病。

其次，多欲而非寡欲、躁动不安而非宁静闲和，伴随皇帝们的一生。荒淫是帝王共有的禀性，只是程度深浅不同。帝王绝对不会为了长生而接受寡欲之说，想当年中原逐鹿，不惜抛头、洒血最终拥有天下，岂是为了寡欲？在皇帝能够享受的衣、食、色等大欲中，以色为先，而且尽可能推向极致。纵情声、色之时，皇帝们没有意识到享受与享寿在暗地里做着交易；或者意识到了，只能求助于房中术、长生术，而任何术都不可能在皇帝身上显灵，扳回他急步奔向死亡的双腿。

皇帝的病因极不单纯，多属疑难杂症，发作时积患已久。御医虽是当时最高明的医师，但医治皇帝所患的某种病例并不多，不敢确保诊治无误。求医者由于是皇帝，御医顾虑重重，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经常发生的悲剧不是御医被杀，就是皇帝速死。

皇帝的肌体被认为是神圣无比的，在皇帝身上动针药是极大的冒险。唐高宗患严重的头痛病，一度晕眩得看不清东西，御医张文仲、秦鸣鹤会诊，请示：风上逆所致，针砭头部出血就能痊愈。武则天在帘后听说要给皇帝刺头出血，乃怒斥：真是该杀！圣体哪能刺出血？御医赶快顿首请命，高宗苦于头眩，说：御医是看病，有什么罪？我头晕目眩很厉害，快让他看病吧！御医乃敢取针刺高宗头。针灸之后，高宗说：我看得见了，此音未落，武则天在帘后一再拜谢，说：天赐我神医！幸亏针刺成功，否则御医祸将及身。

皇家对御医未必信任。御医为皇帝诊病时，常有太后或皇后在帘后监视，时时提出质疑。例如宋宁宗患痢疾，曾御医入视。按完脉，奏明病证。尚未开处方时，立在御榻后的杨皇后插话：“曾防御，官家吃得感应丸否？”曾某连称：“吃得，吃得”。杨皇后又插一句：“须是多把与官家吃”。曾某承旨，开药二百丸，宁宗如数吃下，腹泻得以控制，又吃了二百丸，痢疾全好。

皇帝或代表皇帝的皇后、太后作主张，就是对御医的不信任。对医药、病理稍有些修养的皇帝，宁肯相信自己而不相信御医。康熙皇帝就曾指斥太医院院长官黄运和御医霍桂芳：“此劣等大夫们知道什么！”光绪皇帝也曾指示御医按照他的方案开方用药，御医不敢不遵守。

小病固能胜任愉快，然而对难以治愈的、突然恶化的重病，御医简直是一手给皇帝号脉、一手提着自己的脑袋。唐懿宗曾将同昌公主的死归咎为御

医用药之误，杀了主治医生韩宗绍及助手二十余人。当宋宁宗不豫滋久，急召曾御医入内时，曾某惊魂不定。给皇帝诊视后，竟失控而呜咽不止，宁宗问：“想是脉儿不好也？”曾某归家后，自诊其脉，对家人说：“我脉亦不好”。竟猝死于宁宗去世前的一晚。明世宗遭宫女杨金英等谋杀未遂，但颈部被帛带紧勒，气已绝。事发后，负责急救的是太医院使许绅。作为太医院的最高长官，许绅的医术当时无人能过之。许绅冒着极大的风险，调治峻药给皇帝灌下。早晨八时（辰时）灌下的药，到下午二时（未时）皇帝才有动静，喉咙出声，呕出紫血数升，然后才能说话。经过许绅连续数月的全力调治，嘉靖皇帝方得痊愈。许绅受到加官厚赐之赏，然而紧张的神经一旦松弛，很快大病不起。许绅临终前说：“吾不起矣。曩者宫变，吾自分不效必杀身，因而惊悸，非药石所能疗也”。

许多皇帝病危时，下诏向全国征求医术高明者。谁敢应诏？

御医在皇帝患重病时，往往不敢下无把握之药，以避免承担责任。诊得皇帝脉象凶险，口中却说脉象尚好，开些甘草、陈皮。皇帝升遐，朝廷总不能归咎为御医误用药品所害，只能以医术平庸或不克尽职而予以例行处分。由于御医的谨慎小心、明哲保身，许多皇帝失去险中求治的可能，很快崩殂。

求生的欲望有时会促使皇帝去冒险，相信巫术或道术，有时是身不由己。例如曹魏明帝寄希望于自称的天神下凡的某农妇，该农妇用符水为人疗疾，多有应验。魏明帝病重时，饮用“神女”的符水，然而无效。“神女”遭杀身之祸，三十六岁的魏明帝曹睿也命归黄泉。南朝齐明帝萧鸾自知病重难愈，敕令各官府求白鱼以为治，他自己身穿绛衣，服饰全部改为赤色，用来厌胜。巫师奏云：“后湖水头经过宫内，致帝有疾”。齐明帝撑着病体，亲自巡视太官（御厨）旁的水沟，左右启奏：“太官若无此水则不立”。萧鸾决意塞水断流，然而无济于事。齐明帝死后，塞水的事就罢了。

二十三岁的明熹宗在天启七年五月初六日不豫。魏忠贤盼望皇帝康复，以图继续他弄权的好日子。他将库中所贮的金寿字大红纱翻腾出来，给近侍穿作贴里，在御前起襁祝作用，还不时大声传言：“圣驾万安矣”。大臣霍维华赞助魏忠贤，进献“仙方灵露饮”及蒸法、器具。由魏忠贤主持治病，太医院院使吴翼儒等御医只得唯唯听从。仙方的做法是：用银锅一口，内放桶状木甑，甑中有篾，篾中安长颈大口空银瓶一个。用淘净的米按程序添水甑中，即热气透一层，添一层，围在瓶外。银锅之上，扣一尖底银锅，其尖处正对银瓶之口。用水蒸气，尖底银锅外洒冷水，使锅内的蒸气迅速化为水，滴入银瓶。最后取出滴满的一瓶“灵露”，其实就是米的精华。天启皇帝日日饮“灵露”，人变得浮肿，却不见病情好转。八月二十日，天启吐一口血痰于白纸上，似肉非肉，似痰非痰，凝结如筋。老内臣见此物，有嗟叹落泪者。两天后，明熹宗“龙驭上宾”。

死于篡弑

二百三十五位帝王中，在位期间被杀害的有四十五人。如果包括下台以后（各朝末主）被杀以及史书隐讳而普遍被史家认为死于篡弑的皇帝，就有六十多人。

帝王本是操全国生杀大权的唯一人，是一切权力的中枢。儒家规定，“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天无二日，人无二主”。那么皇帝怎么会被他他人所杀害呢？

关键仍是一个“权”字。皇帝的权力附着于皇帝身上，他就是一个实实

在在的皇帝；如果皇权游离于一旁，或权力之柄操之于他人之手，双方发生你死我活的冲突，结果不是弄权者被杀就是皇帝成为牺牲品。例如发生在两汉的皇帝与外戚之间的冲突，东汉章帝与宦官郑众等诛外戚窦宪、安帝与宦官江京等谋划杀了外戚邓氏家族、桓帝联合宦官单超等灭了外戚梁氏之势，各自夺回了本属于皇帝的权力。然而西汉平帝与外戚王莽冲突，被王莽用毒酒结束了性命，东汉质帝由于年幼缺乏策略，与掌权的外戚梁冀敌视，被梁冀毒死。

外戚较之大臣更容易干政，而权臣才是皇帝在朝中真正的政敌。权臣的权力大到能够废立皇帝的时候，皇帝已经不是他的对手了。

曹魏的第四位皇帝曹髦见威权掌于司马昭之手，不胜其忿，召大臣王沉、王经、王业等人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王经以为应讲策略，而王沉、王业却奔走向司马昭告密。曹髦拔剑升辇，率殿中宿卫苍头官僮鼓噪而出。追随司马昭的大臣贾充毫不迟疑地率中护军，在南阙下迎战皇帝的小队人马。司马昭的亲信成济问贾充：事情紧急，怎么办？贾充说：司马公养着你们，就是为了今天，还问什么！成济便一马当先，抽戈刺向皇帝。二十岁的曹髦死于车下。皇帝死后，司马昭以大逆不道之罪杀了成济，然而按照史家书史的原则，杀害皇帝的正是司马昭。

同一年，被权臣孙琳废为会稽王的吴国皇帝孙亮突然死去，年仅十八岁。

权臣废掉皇帝之后，能与废帝共在一个苍天之下，安然无事？为了防止时有可能发生的不测，权臣定会或明或暗地将废帝除命。例如东汉董卓废少帝刘辩之后，又派人给他送去一壶毒酒；南朝宋少帝刘义符被权臣徐羨之等人废为营阳王，一个月后死于徐羨之派来的特使之手；南齐十五岁的萧昭文只作了三个月的傀儡皇帝，被废后仍免不了一死。北魏后期权臣尔朱兆连续废杀了两个皇帝，继尔朱氏掌权的高欢紧接着又废杀了两个皇帝，北魏的最后一位皇帝被权臣宇文泰酖杀。北周的五位皇帝中，有两位被权臣宇文护所杀。

欲图篡位的权臣经常使用的伎俩是，先废杀在位的成年皇帝，然后拥立幼主，再图禅位。例如唐代就落入这样一种结局：同样以军事起家的朱全忠杀了三十八岁的唐昭宗，另立十三岁的昭宗之子李祝，三年后朱全忠禅位为帝，次年李祝被毒死，谥为唐哀帝。

权臣之所以能爬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凭借的是智谋和勇力，这种本领远胜于昏狂无知的少年皇帝。而且历史有时还给图谋坐皇帝的权臣提供道义上的机会，即某些在位的狂躁肆虐的皇帝实在该杀，其被杀乃是自取其祸。这种历史活剧集中在南北朝。

南朝宋后废帝刘昱喜欢亲手杀人取乐，针、锥、凿、锯不离手。刘昱常到街巷中扰民，对不顺其意者，当即屠剖。杀人成瘾，以至于一日不杀便惨然不乐。时值盛暑，刘昱提着弓箭到将军府，见萧道成袒露肚皮在午睡，刘昱要萧道成站起来，画其腹为靶心，准备引

弓射之。旁有人建言，一箭射死，就无法再射了，不如用软质的髀箭射。结果刘昱一箭射中萧的肚脐，扔下弓大笑说：“此手何如！”当时刘昱对萧道成的威势日重已经不满，曾磨着铤说：“明日杀萧道成”。

萧道成广结党羽，密谋结束皇帝的性命。越骑校尉王敬则衣间以青衣蔽体，匍匐于道路，伺察皇帝的往来，刘昱的近侍杨玉夫等人也成为萧道成的

合作者。刘昱出入无常，事发的那一晚还在新安寺偷狗，然后煮食、饮酒，醉后忽然对杨玉夫恶狠狠地说：“明日当杀小子取肝肺！”当夜，杨玉夫与另一近侍杨万年伺帝熟寝，取防身刀把刘昱身首分离，然后将首级密传给等候在外的王敬则，王敬则赶到将军府，将皇帝首级扔进墙内。萧道成紧急入宫，证实刘昱已死，内廷成员咸称万岁。

南齐皇帝萧昭业也是个无赖少年，被萧鸾（后来的齐明帝）所杀；东昏侯萧宝卷荒唐不经，后来的梁武帝萧衍起兵，宫中卫士杀萧宝卷，迎萧衍入建康（南京）。

宦官杀皇帝，可以在后宫不动声色地进行。第一位死于宦官之手的皇帝是秦二世；北魏宦官宗爱接连杀了二个皇帝，即太武帝拓跋焘和继立的拓跋余；唐宪宗李纯、敬宗李湛分别被宦官夺命。宦官杀了皇帝后，不可能自己做皇帝，而是另立柔顺听命的皇帝。

最恐怖的是皇家父子、母子、兄弟相残杀，是为宫中权力斗争的最高潮。南朝宋时，首都建康有句民谣：“前见子杀父，后见弟杀兄”。创“元嘉之治”的宋文帝刘义隆，早年立袁皇后所生的刘劭为太子，袁皇后因失宠怨恨而死，刘劭因此而仇恨潘淑妃及其子刘浚。刘浚很怕刘劭，遂曲意逢迎，二人结为密友。他们与女巫勾结、诅咒宋文帝早死。宋文帝得知后，夜夜与大臣徐湛之秉烛谋议废太子之事，并告知潘淑妃。这项密谋被潘淑妃吐露给了刘浚，刘浚已是刘劭的走狗，急忙奔告刘劭。第二天，刘劭率人闯进宫中。宋文帝与徐湛之讨论了一夜，刚入睡，灯烛尚未吹灭。宋文帝发觉不测，急忙起身，杀手们已经冲上前来。宋文帝抓起几案自卫，银光一闪，五指被削落，几刀落下，一命呜呼！

刘劭即位，然而二个月后，其弟刘骏在江州举兵征讨刘劭，先自立为帝，然后攻入建康，杀了刘劭、刘浚。

北魏道武帝因服用金丹而烦躁、神经失常，他所宠爱的贺氏为他生了一个更加癫狂的儿子拓跋绍。拓跋珪经常用毒打来教训拓跋绍，使得父子间结下了仇恨。一个深夜，拓跋绍带人毫不费力地杀了其父。拓跋嗣是早已确立的太子，后来因故出走，此时闻知其弟弑父，乃奔回京城，讨伐拓跋绍，杀之而自立。

前面二位弑父者都未能当上皇帝，而隋炀帝则顺利地坐上了宝座。隋文帝杨坚重病在床，宫女误将一封杨广与杨素探讨对策的文书交到文帝手里，文帝怒火中烧；接着，又发觉宠妃陈夫人被杨广猥亵，文帝抵床吼叫：“畜生！何足付大事！独孤误我！”命人将原来废黜的太子杨勇召来，杨素闻知急告杨广。杨广与杨素紧急布置，尽遣后宫人员出就别室，然后命左庶子（东宫官职）张衡一人入内，“服侍”文帝。很快，文帝崩逝的消息传出。

后梁开国皇帝朱温（即朱全忠）被其子朱友珪杀死，友珪即位不及一年，被其弟友贞诛杀，友贞即位。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被其子宁令哥乘其酒醉，割掉鼻子惨死。

北魏献文帝拓跋弘死于冯太后的毒酒。冯太后并不是拓跋弘的亲生母亲，而北魏另一位掌权的胡太后，则用同样的方法毒死了亲生儿子元诩。孝明帝元诩已十九岁，不满于母后专权，密诏尔朱荣来京要挟太后，却被胡太后先行毒杀。唐中宗韦皇后为了效法武则天称帝，与女儿安乐公主合谋，在饼中下毒，中宗丧命。晋孝武帝司马曜竟因一句戏言，燃起宠妃张贵人的妒火，当夜酒醉暴死，其被弑之情形外人不得而知。

在军事强人制造的大动乱中，皇帝手中的权力变成一纸风筝，撒手而去，随即皇帝变成无足轻重的东西，被来势凶猛的新的掌权者视为弃物。在杀人无算的背景下，皇帝之死已经不足以令人激愤或惊愕了。晋惠帝遭“八王之乱”，性命被一张毒饼所了结。梁简文帝在“侯景之乱”中被废为晋安王，幽拘。某日，有人送酒来，简文帝知道死期将至，生平最后一件事就是把酒喝光。饮罢说道：“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酣醉倒地。左卫将军彭隽按照侯景的安排，将一个大土囊扛进屋子，压在简文帝身上，同谋者王脩纂坐于土囊之上。诗人皇帝生前直发委地，双目翠色，死时极为屈辱。

当改朝换代的战火烧及皇宫或皇帝的行营时，皇帝往往不幸成为其部下的刀下鬼。

死于荒淫、荒诞

春三月的一天，年方四十四岁的汉成帝一早起床，忽然不能言语，随后心脏停止了跳动。皇帝暴崩的消息传开，民间喧哗，赵昭仪成为众矢之的，在被查问皇帝的起居发病情状以后，赵昭仪自杀，史家推论，汉成帝死于纵欲。

其实很多皇帝的短寿都与纵欲有关，但死亡与纵欲有着最直接关系的皇帝，只能推定为两位，即汉成帝与清穆宗。清同治帝无聊至极，多次微服出宫，到城内寻暗娼纵淫，久之染上梅毒。最初尚未觉察，继而疮扩展至面部、背部。据坐观老人《清代野记》所载，清穆宗将死之前数日，下部溃烂，臭不可闻，至洞见腰肾而死。清廷为维护体面，将皇帝的病定为天花，御医也只得按天花医治，加快了同治皇帝的死亡。

北方民族所建立的朝代，皇帝对酒的迷恋程度惊人，其中有的成为酒精的战利品。北齐皇帝高洋多年酗酒，性情益发残忍、多变，到三十岁时，自身已经被酒消磨得不能进食了，但还是力所能及地饮酒，以致“麴蘖成灾，因而致毙”。

成吉思汗的儿子、元太宗窝阔台嗜酒成性。他五十六岁那年隆冬十一月，出宫大猎，还至铎钵^{ᠳᠦᠪᠲᠦ}胡兰山，与奥都刺合蛮（商人，任提领诸路课税所官）尽情饮酒，一夜酣畅。然而第二天早晨，人们发现皇帝之魂已急不可待地随酒神而去了。

南朝宋明帝刘彧身体肥胖，又有饕餮的习性。刘彧之死简单说就是饱食撑死的。由于最喜食逐夷，一顿吃下数钵，满腹逐夷已经不胜消化了。最严重的那一次，也就是导致他死亡的那一次，吃得胸腹痞胀，气将绝，近侍们给他饮下数升酢酒，才有缓解。此后陷入重病，却不停地猛吃糟汁，一顿要食三升，以至肚中水患积久，无药可治。弥留之日，宋明帝正坐，呼道人，合掌而气绝。

三、历朝宫闱疑案

中国古人讲究为尊者讳，同时史家崇尚秉笔直书，但这两项原则若并行不悖恐怕很难做到。后人在翻阅官修的史书时，发现有些皇帝活着时被叙述得详尽周全，有声有色，人物快要凸出纸面，然而在记述其死亡前后的情形时，文字却晦涩，或简而不明或略而不述，好象修史者的笔端忽然变得沉重千倍，每写一个字都要喘息半天。

许多官修史书在帝王死亡情节上隐晦的地方，却有记载较为详细的、结论正相反的野史资料。野史包括当时或稍后时官员的私人笔记以及民间传说的文字记录。哪一种记载更真实？持谨慎、小心态度的历史研究者均以官修史书为依据，野史作为备考，有所存疑，亦不妄下定论。

具有重大疑点及不同记述的帝王死亡案，就叫做宫闱疑案。其实很多皇帝的死亡情节都令后人读正史时生疑，只是没有出现与之相左的野史记录，便无法立为疑案。

公元九七六年十月某日，宋太祖赵匡胤暴崩于万岁殿，次日，其弟赵光义继皇帝位。这是历史上最扑朔迷离的一幕。

弟承兄位，本是杜太后的嘱托。杜太后并非等闲妇人，赵匡胤在陈桥驿兵变中黄袍加身，做了皇帝后，她心怀忧虑，深谙“为君难”之理。因病去世前，她把自己的一番思虑变成遗命留给了赵匡胤。她说，正是周世宗立幼年之子为皇帝，才使得赵家夺得了后周的天下，“使周氏有长君，天下岂为汝有乎！汝百岁后当传位于汝弟。四海至广，万几至众，能立长君，社稷之福也”。赵匡胤顿首泣曰：“敢不如教”。老臣赵普在场，按杜太后之嘱，在榻前为约誓书。

当时宋太祖在世的兄弟有两人，一为光义，一为光美。《宋史》上说，杜太后临终与宋太祖定下的方针是，赵匡胤死后传位于光义，光义死后传位给光美，光美再传给赵匡胤之子德昭。赵匡胤品性孝友，对母命不敢违背，对兄弟也是手足情深。由光义继位之事定于宋代开国的第二年，之后，赵匡胤封光义为晋王，任开封府尹，掌管京城事务，光义也知道自己是皇位继承人。而赵匡胤的两个儿子：德昭、德芳却未封王爵。赵匡胤作为兄长对光义的关爱已到仁至义尽的地步。有一次他注意到晋王光义的居所地势较高，用水不便，就亲自从宫中的左掖门步行到晋王府第，指挥雇工安设大轮，将金水河之水激入晋王府的沟渠中。为这项工程，赵匡胤数次临视、督促。光义曾得过一场重病，不省人事，赵匡胤急急奔来探视，亲自为兄弟热灸，光义感觉很痛，他就拿过另一副器具给自己灸上。从上午八时（辰时）一直忙到下午六时（酉时），光义出透了汗清醒过来，赵匡胤才还宫。又有一次，兄弟二人在宫中欢宴，光义大醉不能乘马出宫，赵匡胤起身送他到殿阶，还扶腋着他小心下台阶，嘱咐晋王府的卫士尽心照料。身为皇帝的赵匡胤还间或对近臣说：“晋王龙行虎步，必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

赵光义比其兄小十二岁，宋太祖五十岁时，他已到三十八岁，接近帝王的平均寿数。就在这一年，太祖死了。

《续资治通鉴》记载，开宝九年二月十九日，太祖召晋王入宫议事，夜分乃退。在此之前，赵匡胤已经患病，曾派内侍王继恩到建隆观设黄醮。十月二十日，太祖溘然长逝，时在深夜。不知是太祖的遗命还是皇后的自作主张，皇后在深夜四鼓派王继恩出宫，召太祖的小儿子德芳前来，其意就是

命德芳在灵前继位。而王继恩并没有按皇后的指令去召德芳，他以太祖传国于晋王之志素定，乃径趋开封府召晋王。赵光义闻知噩耗，大惊，犹豫不行，说：“吾当与家人议之”。进内许久不出来，王继恩催促：“事久，将为他人有矣”。当时外面下着大雪，赵光义与王继恩徒步踏雪进宫。在直班房（直庐）前，王继恩止住赵光义说：“王姑待此，继恩当先入言之”。随同前来的卫官程德元主张：“便应直前，何待之有！”于是晋王一行直奔寝殿。皇后见王继恩回来，急问：“德芳来邪？”得到的回答是：“晋王至矣”。紧接着看见赵光义进入寝殿，皇后惊愕。但她很快明白过来，遽呼官家，说：“吾母子之命，皆托于官家”。赵光义流着眼泪回答：“共保富贵，勿忧也！”在接踵而至的第二天黎明，赵光义即皇帝位。

北宋时人文莹的《湘山野录》为人们提供了另一种宋太祖崩逝之际的情状。十月二十日晚忽然阴霾四起，天气陡变，雪雹骤降，赵匡胤心中顿感不祥。他从太清阁上下来，传令守宫的宦官打开端门，急召晋王入宫。当时已是深夜，赵光义入宫后被延入寝殿。太祖与他酌酒对饮，把宦官、宫女都屏于寝殿之外，所以无人目击他们密议的切实情形，近侍宦官只能遥望寝殿的窗棂。只见烛影下，赵光义时或避席，这种形体语言是辞让的意思。两人继续对饮，到了禁漏三鼓时，殿外的雪已积数寸，殿外宦官仍在注视着室内的动静。饮罢了酒，太祖拿过柱斧，挥了一下，象是点击什么，回首对光义说：“好做！好做！”然后解带就寝。很快传出如雷的鼾声。然而到五鼓时，一切都寂然无声了，此时人们发现太祖已经崩逝了。《湘山野录》未说明这一夜光义是否一直呆在寝殿没有离开，是不是他最先报出太祖的死讯。天亮后，赵光义即位，宣遗诏，大臣们哀恸着瞻仰遗容，却见太祖玉色温莹如出汤沐。

这真令人迷惘，如果说太祖生前始终以光义为继承人，为何不按正规仪式立光义为皇太弟，不论他寝疾而终还是暴病而亡都可顺理成章地由光义继位；如果说太祖临终嘱托皇后召晋王入宫即位，并非德芳生母的宋皇后怎敢改变太祖的遗命，召德芳即位？《宋史》上说“太祖崩，帝遂即皇帝位”，“遂”字即意味着不是受遗诏而即位的，这符合暴崩的情况，未来得及拟遗诏，而《湘山野录》中提到的遗诏不知从何而来。《湘山野录》记述的情况本身就扑朔迷离，它没有直接告诉人们赵匡胤死于赵光义的刺杀，看不出这究竟是怎样一种死亡方式。如是斧砍，定会血流遍地，面色苍白，何来“玉色温莹如出汤沐”，如有合作者，则必先策划周密，但从记述上亦看不出象策划好的。因此《湘山野录》只给后人留下了所谓“烛光斧影”之谜，令人耿耿于怀却难下定论。而此疑又无法释去，不得不存案。

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引用了《湘山野录》的记载，清代编纂《续资治通鉴》时否定了李焘的做法。而宋太宗（赵光义改名为赵炅）即位以后发生的事仍需要注意：宋太宗以“太平兴国”为年号，这应是开国而非守成皇帝的年号；据《宋史》记载“太平兴国”年间，太祖之子德昭因恐惧而自杀，德芳夭亡，太宗之弟、担任太宗即位前开封府尹职务的光美（改名廷美）很不安，后来试图谋害太宗而未达目的，被告发。太宗从赵普那里看到当年杜太后主持制定的关于传位方法的誓书，大为感悟，打算释光美于罪，几日后又以传国于光美的意向找赵普商讨，赵普却说：“太祖已误，陛下岂容再误邪？”于是光美难脱重罪，最终忧悸成疾而卒。

明成祖朱棣通过“靖难之役”向皇位挑战，以胜利者的身份走进被攻下的南京皇宫。他急于找到事实上已滚下帝座的建文皇帝，连续三天清查了宫

内的每一个角落，终未能找到活人、完尸。有宫女指着一堆灰烬，里面有具烧得不成模样的尸体，明成祖俯身对着这具焦炭大哭，心中却抹不掉是真是假的疑团，因为马皇后被证实死于这场火。朱棣在即位后的多年中，仍不断试图把建文帝的下落弄清，派人四处查找。

《明史》上说：“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实则承认建文帝下落不明，并加上“或云帝由地道出亡”之句。《明实录》也有“出亡”二字。

由于民间很同情品性仁孝的建文帝，更愿相信他的下场是逊国出亡为僧。那么建文帝是否有可能出亡？可能性也是极大的。而且，能够证明他出逃了的历史证据比之证明他烧死的证据更多更有力，推论上亦是如此。建文帝出逃决非是不可能实现的愿望。

明太祖朱元璋在他去世前六年，因皇太子朱标去世，立朱标之子朱允炆为皇太孙，即预定为皇位继承人。早在朱元璋坐定天下之初，他就把自己的二十四个子分封到各地为王，为中央王朝起屏障作用，其中四子朱棣被封为燕王，据守燕塞。朱元璋立当时年仅十六岁的孙子作继承人后，未尝没有想过这个弱小的孙子如何对付得了众多拥有实力的叔父。撤藩？为皇孙解决尾大不掉之困？他决不会改变藩王镇守各地的格局，决不能撤藩。这是处心积虑的安排：将来如果皇孙与诸王发生争斗，不论哪方取胜，天下还是姓朱，坐在皇帝宝座上的还是自己子孙。反之，如果异姓功臣、将领叛乱得逞，那么自己开创的江山就会丢失，所以分封诸王是保障江山之必需。皇孙能否坐稳皇帝位，就看他的本领和运气了。

朱元璋日夜考虑将来可能发生各种情况，对孙子的命运不能不十分担忧，为他做最坏的准备，但这种准备又不能悲剧未发生之前亮出来。

当燕王朱棣的军队攻进了南京的金川门，下一个目标就是直攻建文帝所居的皇城时，建文帝痛不欲生，企图自杀。这时身边的翰林院大臣程济提出出亡之策，王钺跪在建文面前说：“昔高帝升遐时，有遗篋，曰：‘临大难当发’。谨收藏奉先殿之左”。群臣齐言赶快拿出来，很快一只红篋被搬来。篋的四周俱用铁封固，二锁也用铁灌满，建文见而大恸。出亡的决心已定，后宫燃起了大火，皇后马氏消失在一片火光中。程济等人砸碎了红篋，见到三张度牒、袈裟、帽鞋、剃刀俱备，白银十锭。篋内还有一纸书，写着：“应文从鬼门出，余从水关御沟而行，薄暮会于神乐观之西房”。建文叹一声“数也！”程济当即为他祝发。吴王教授杨应能、监察御史叶希贤毅然祝发随同出亡，各易衣披牒。总共随建文出亡者有二十二人，在神乐观会合后，次日黎明取道溧阳而去。

此后三十九年建文帝作为僧人栖居、往来于云南山中，明成祖、仁宗、宣宗三朝皇帝死后，建文仍然活在世上。到明英宗即位，往事渐为云烟，建文觉得应该恢复本来面目了。他从云南至广西，流亡三十八年后，道出自己是建文帝，随即被送往京师。在此之前，有位九十余岁的老僧，自称是建文帝，后被核查为诬，死于锦衣卫狱。当年服侍过建文帝的老太监吴亮尚在，被带到建文面前。建文一见吴亮便问：“汝非吴亮邪？”吴亮有些紧张，慌称：“非也”。建文说：“吾昔御便殿，汝尚食，食子鹅弃片肉于地，汝手执壶据地狗吠之，乃云非是邪？”吴亮伏地而哭，他记得建文帝左趾上有黑痣，便摩其脚，视之果然。吴亮抱着建文的脚又痛哭一场。

此后，建文帝居于西内。追随建文多年的老臣程济感到该卸职了，便往云南焚庵，散其徒。在宫中，宫女们称建文帝为“老佛”，寿终后，葬于西

山，不封不树。

明代第二个死后不被十三陵所容纳的皇帝是景帝朱祁钰。“土木之变”，英宗被蒙古人掠走，国家一日不可无君，皇太后下旨：“皇太子幼冲，朕王宜早正大位以安国家”。郕王祁钰是英宗之弟，在群臣的交章劝进下，遵太后之命即位，时在英宗正统十四年八月。然而第二年八月，英宗归来无恙，居于南宫作太上皇。

相安无事了六年之后，景帝病了，太上皇并无夺位之谋，而一帮邀功之臣未费多大周折、突如其来地把太上皇从南宫搬到了奉天殿御座上，这正是太上皇日夜盼望之事。景帝在寝殿听到从奉天殿传来的钟鼓声，大惊，得知是英宗复位，景帝只说了两声：“好！好！”

时值正月，复位后的英宗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二月，以皇太后之诏，废景帝仍为郕王，迁居西内。十八天以后，郕王去世。英宗毁其所营寿陵，以亲王礼葬于西山。

景帝之死，实是太监蒋安希旨（迎合皇帝的意愿）用帛勒死的，当时景帝的病已经好了。此说见之《罪惟录》。《明史》上只是说“郕王薨”。

清明顺治、康熙、雍正、光绪四位皇帝之死都有种种异说。

顺治皇帝福临二十四岁就撒手尘寰。正统的、更能为研究者所接受的说法是死于天花。天花来得很突然，仅五天时间就使福临由不豫、再至大渐、乃至崩逝。

顺治出家的说法广为人知，富于戏剧性。其根据是由于董鄂妃之死，福临痛不欲生，见到董鄂氏的遗物和往日生活的场景每每伤怀，加之笃好佛学，乃决定出家为僧。下了一封以自责为内容的遗诏，命八岁的儿子玄烨即位，然后福临就奔向五台山了。后来玄烨曾四次去五台山并写诗志之，其迹象似乎别有目的，被推测为朝拜其父，这也成了顺治出家的证据之一。清人吴伟业的《清凉山赞佛诗》四首，内容很象是咏顺治帝在五台山出家之事，清凉山是五台山的最高峰。

至今，人们尚无法确定哪一说是实，哪一说是虚。

康熙皇帝六十九岁时在畅春园突然病故，病因不明。康熙一生都没有解决好立储的问题，为后人留了“遗诏之谜”，至今争论不休。除雍正篡改遗诏之外，康熙之死亦与雍正有关，而关心这后一桩疑案的人并不太多。

由于康熙没有早定储君，未来的皇位便成为十多名皇子暗中角逐的目标。其中四子胤禛锋芒内敛，沉着、老辣胜于众兄弟。康熙十月还在南苑围猎，十一月就病了，父皇的突然不豫，使得争夺继承人的斗争更加惊险、微妙，伺机多年的胤禛不能再坐等福运了，皇位靠争取。他和掌管京都防卫兼宫内一等待卫的隆科多早已结为盟友，康熙病重时只有隆科多在旁承旨，胤禛得以单独入内侍疾。因此有人推测，雍正与隆科多合作，在康熙的食物中下了毒，毒发后昏迷，同时步军统领隆科多在京城布置好了应变的军队。前来畅春园侍疾的其他皇子被挡驾在外，直至康熙崩逝，隆科多宣布传位于四子的遗诏，胤禛即位于梓宫前，一切无误。

野史《胤禛外传》记载了下述情景，不问其信否，聊备一读：“时康熙病已殆……康熙宣诏大臣入宫，半晌无至者。募见胤禛立前，大怒，取玉念珠投之。有顷，康熙即歿。胤禛出告百官，谓奉诏册立，并举念珠为证”。

雍正在登位十三年后，如同许多皇帝一样，以暴死的形式离开了他的宝

座，引发了后人纷坛的推论。

《清史稿》上只是显示雍正由不豫到崩殂中间只隔了一天，也如同许多皇帝的本纪一样，以简而不明的文字宣告皇帝一生的结束。而许多人从一篇《鄂尔泰传》中看出了其中的不测和惊险：当日雍正象往常一般视朝，午后忽然急召鄂尔泰入宫，鄂尔泰是身兼数职的大员：兵部尚书兼署吏部，本身是大学士，一等伯爵，刚刚在办理苗疆事务时不利，引咎削爵。鄂尔泰急忙跨马向圆明园奔去，此时外间已经喧传皇帝暴崩。鄂尔泰的坐骑连鞍都未及放，一路上髀骨部位被磨破，流血不止。入圆明园后，留宿三日夜始出，未吃一餐。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雍正死于被刺。然而没有更多的佐证。

雍正死于吕四娘的谋刺之说在民间流传甚广，这种传说可以编入历史演义，但由于缺乏可靠的史料证据和推论上的严谨性，很难被研究者当作历史事实看待。

雍正死于食丹又是一说。在寻访术士、寻求不老术方面，雍正继承了各代先行帝王的遗志。据说宫中有一些由各地选送的炼丹道士，为雍正炼制金丹，其结果是使雍正因长期服用丹药，中毒而亡。历史上因食丹而死的皇帝，其死因大都明明白白地载在史册，如果雍正确实死于丹药中毒，为何清代史官和修清史者讳莫如深？

清光绪皇帝终生在慈禧太后的阴影下郁郁寡欢，其死亡之日恰在慈禧咽气前的一天。对此，官修史书未加任何注解。

光绪之死，令在野的士大夫们悲愤满腔，认为这是一段痛史，是五千年未有之奇冤。光绪在死亡前确实病魔缠身，然而一些文人、医士的回忆材料，令人无法相信光绪之死实由疾病而无人人为的加害。

在权力斗争中，光绪虽一直处于劣势，但暗中的较量愈到晚期愈微妙而尖锐；光绪体弱多病，慈禧进入七十以后健康每况愈下，所以体力的较量到后来至关重要。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秋天，慈禧患泄病，十月转成严重的痢疾，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事的太后曾说：“吾不能先彼死”之话，光绪此时也病情严重。十月十六日他们最后一次在西苑勤政殿召见臣工。那天被召见的是新任命的直隶提学使傅增湘，傅增湘看得出“太后神殊惫，闻是日病已不支。上天颜癯晦，玉音低微，座中掖以数枕，强自支持”。角力场上的两个对手都已筋疲力竭了，不同的是一个是七十三岁的老妪，一个是三十八岁的壮龄男子。

先倒下的却是光绪皇帝。十月二十一日傍晚光绪死了。那天，早晨，御医周景焘入内看脉，“见帝东床仰卧，瞪目指口，意欲得食，而其时内监只余一人。宫中器皿皆被奄人盗窃殆尽，只余一玉鼎。正旁徨间，复见光绪转侧，见医在，招手使前，而无一言，俄顷忽吐血盈床，跪近视之，无少声息”。此前三日，即十月十八日，为光绪治病的西医屈桂庭，见光绪腹痛，在床上乱滚，并对屈桂庭叫道：“肚子疼的了不得！”屈桂庭诊得皇帝的病况：心跳，面黑、神衰，舌黄焦，便结，夜不能睡。他认为，此时的腹痛与以往之病，“固绝少关连者”。

光绪之死岂能不是一件宫闱疑案？如果是被害，加害者是谁呢？慈禧之外，袁世凯、李莲英都有可能。袁世凯是光绪最恨之人，恨之入骨，袁世凯自己不会不知道；李莲英也是光绪眼中的一颗钉子。他们能坐等光绪在慈禧死后对他们报复？本世纪初的这件事情，未能得到及时查证，旷隔多年，只剩下人们的纷纭推测了。然而近些年有关研究者，一再对光绪之死作出解释，

断然肯定光绪死于长年之疾病，对其死于慈禧前一日，淡然以“巧合”一词了之，置各种疑窦于不顾。实是开释慈禧等人的嫌疑或为之平反。

四、皇帝临终前后

权去生道促，忧来死路长。
怀恨出国门，含悲入鬼乡。
隧门一时闭，幽庭岂复光。
思鸟吟青松，哀风吹白杨。
昔来闻死苦，何言自身当。

北魏孝庄帝元子攸死于非命，临终前作了这首五言诗。大多数被疾病夺去性命的皇帝，在垂危时，会感觉到生命即将结束。最可怕、最冷酷的事情莫过于死亡，帝王们一下子变得十分渺小，在死神脚下战栗，巴望着各路神灵相救，挽狂澜于即倒。陈武帝在病榻上挣扎时，派遣大臣以疾苦告太庙、告太社、南北郊；宋真宗派人祷于山川神祇。病危时，推恩于罪犯是另一种试图挽救自身的方法。唐穆宗发布降死罪以下，减流人一岁之令，宋仁宗、英宗宣布大赦，减天下囚罪一等，徒刑以下释放，宋哲宗大赦天下并且蠲民租。然而皇帝们仍然无法从死神的手指缝间逃走。

令皇帝心急如焚的还有性命以外的事情。那些早先没有定立嗣君的皇帝，此时要急忙把继承人定下来，这是权力交接的关键时刻，王朝一脉相承的链条决不能在自己手中接错或中断，否则如何面见祖宗？汉武帝晚年疼爱幼子弗陵，有心立他为太子，诏令未及下，死神匆匆向武帝走来准备会面。武帝急忙定下弗陵为嗣君，几日后武帝驾崩。曹魏明帝在离世前数小时，急定曹芳为太子，八岁的曹芳在这一天中一变为太子，再变为皇帝。同样，晋简文帝赶在驾崩之前立司马曜为太子，同日简文帝崩，太子即位，是为晋孝武帝。

在皇帝寝疾期间，大臣有责任提请皇帝早建储君。宋英宗患的是某种精神错乱的怪病，他自己不能自觉意识到必须速建储君，宰相韩琦到皇帝卧内入间起居，因便建言：“陛下久不视朝，愿早建储，以安社稷”。英宗点点头，韩琦立即请皇帝写在纸上。英宗写下“立大王为皇太子”。韩琦指出应该写明确，英宗又在后面写下“颍王颙”三字。韩琦立即召学士承旨张方平到福宁宫起草制书，再将起草的制书拿到英宗面前批定。英宗靠在几案上，话语已含混不清，张方平把笔递到他手上，请他写上名字。英宗竭力写下了嗣君的名字。嗣君定下来了，英宗泫然下泪。不到一个月，英宗驾崩，神宗即位。宋神宗三十八岁时，一病不起，群臣请立皇太子，于是立赵煦为太子。立太子后的第四天，神宗崩逝，哲宗继位。

如嗣君尚幼，皇帝病危时常提升两人以上的大臣，并授予顾命。汉武帝晚年暗中估量过群臣，认定奉东都尉、光禄大夫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乃命人画了一幅周公背负成王朝诸侯图，赐给霍光。临终，命霍光行周公之事，升其职为大司马、大将军。服侍武帝数十年的匈奴人金日磾升为东骑将军，上官桀为左将军，三人同受遗诏辅少主。汉宣帝寝疾时以史高、萧望之、周堪受遗诏辅政。魏文帝召曹真等受遗诏辅嗣主。魏明帝病危中急召司马宣王，在病榻前，明帝握着太尉的手说：“吾疾甚，以后事属君。君其与爽（曹爽）辅少子。吾得见君，无所恨！”晋明帝以司马藁、王导、卞壶等七人并受遗诏，辅太子，南齐高帝召司徒褚彦回、左仆射王俭受顾托。唐太宗召长孙无忌、褚遂良入卧内，谓之曰：“太子仁孝，善辅导之！”又对太子说：“无

忌、遂良在，汝勿忧天下！”

一般情况下，皇帝在一息尚存之际，要召见大臣，口授遗诏，令翰林大臣书写。遗诏的内容，是皇帝最后需要阐述的事情，包括对自己一生业绩的概括或评估，嘱咐丧事从俭，对嗣君即位事宜的说明。顾命大臣辅佑嗣君要在遗诏中特别说明，大臣方得以遗诏为据，行使顾命之职。顾命大臣往往是聆听遗言，起草遗诏者。

唐代未出现过幼年即位的皇帝，上述长孙无忌、褚遂良虽受命辅导太子，但不能算顾命大臣。唐代更多的做法是，皇帝病危时令太子监国。唐肃宗在病逝前一天，诏皇太子监国，大赦、改元，唐代宗召太子监国，当晚崩逝。唐德宗病危时急召翰林学士草遗诏，宦官议论说：“禁中议所立尚未定”。身为太子的顺宗已患风疾，行动非常困难，元旦朝会都没能参加，但太子名号早已定立，此时决不能仓猝更改，负责起草遗诏的卫次公厉声斥责宦官。太子闻知人心忧疑，乃强使自己起身，从容地走出九仙门，召见诸军使，人心得以稍安。唐穆宗亦是在前一日令太子勾当军国政事，次日驾崩。宋代沿唐代之例，但常常加上令皇太后权行处分军国政事的遗命。

如果皇帝在驾崩前未来得及定立嗣君，那么就需由皇太后下诏立嗣或与执政大臣协商而立。例如晋穆帝死后，皇太后下诏立穆帝的从兄、成帝之长子司马丕为帝。晋海西公被废，皇太后诏令会稽王司马昱即位，是为简文帝。

宋哲宗撒手而去，皇位空缺，哲宗又无子。向太后（神宗皇后）哭着对宰臣说：“国家不幸，大行皇帝无嗣，事须早定”。章惇抗声说：“在礼律当立母弟简王似”。向太后说：“老身无子，诸王皆神宗庶子，莫难如此分别”。章惇又建言：“以长则申王必当立”。太后有自己的倾向：“申王有目疾，不可。于次则端王佖，当立”。章惇以为不可，说：“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话音未落，便遭曾布的严厉反对：“章惇未尝与臣商议，如皇太后圣谕极当”。蔡卞、许将相继附和。太后又说：“先帝尝言端王有福寿，且仁孝”。章惇只得缄口。然后，端王赵佖（宋徽宗）被带到哲宗的灵柩前即位。

明代常见的做法是，皇帝不豫时，太子摄事于修学之所——文华殿。皇帝崩逝日，百官朝太子于文华殿。与唐代太子监国再即位的道理一样，权力衔接得更加紧凑。

当遗诏公布时，皇帝已离开人世。在遗诏中，皇帝要充分显示对死亡的坦然：“自古有死，贤圣所同，寿夭穷达，归于一概，亦何足特痛哉！”（晋明帝遗诏）“人肖形天地，禀质五常，修短之期，莫非命也”。（北周武帝遗诏）“道存物往，人理同归，掩乎元泉，夫亦何恨矣”。（唐太宗遗诏）。

有些皇帝，在临终时表现了从未有过的冷静和自我批判精神，好似恶梦初醒、良心回归。如明武宗在位期间玩误政事，视天下如儿戏，临终向皇太后转达己意：“往事多误，天下事重，其与辅臣议处而行”。一生纵欲、求长生的明世宗在遗诏中自省其愆：“过求长生，奸人狂惑，以致禘祀日举，土木岁兴，郊庙不亲，朝讲久失”遗命将建言得罪诸臣在世者召用，歿世者恤录；对于方士则按轻重入刑。不务政事而纵容魏忠贤紊乱朝纲的明熹宗，病危时召皇太弟朱由俭（即崇祯帝）到榻前，谕令他嗣位，并嘱以：“当以尧舜为法”，或说当为尧舜之君。

五、皇室丧葬活动

皇帝死后停殡于宫中将近一个月，这时被称为大行皇帝。停殡期间举行丧礼仪式，嗣皇帝、皇室成员、百官军民服丧服二十七日，停止娱乐、婚嫁活动。

卧在灵柩中的大行皇帝，接受死后宫中为其举行的按部就班的、备极哀崇的丧礼仪式：发丧，宫中举哀，沐浴、饭含、入敛、发引。在这过程中，以嗣皇帝为首的举哀成员按礼仪官的指挥，高声哭、踊（顿足）。

沐浴。将沐浴时，负责此职的内廷侍从先在殿西廊下设灶，用于煮热水，准备好沐浴用的器具物件：盆、盘、瓶、鬲（形状似鼎的瓦瓶）、帛巾、沐巾、浴巾、栉、浴衣。内掌事者端着盛以米泔（淘米水）和热开水的盘，授给沐者入内后，嗣皇帝与妃、公主等退出帷外，立在殿东楹间，面向北痛哭，沐浴完皇帝的遗体后，梳理头发。内中有执事者六人抗衾，御者四人用巾洁拭大行皇帝身上的水份，再用浴衣擦拭。浴后，将皇帝安放在东侧的新床上，该床上层是竹席（簟），下层是蒲草席（莞），因《诗经》中说：“下莞上簟，乃安斯寝”。头下设枕，枕下有一小囊，盛着掉下的头发和剪下的指甲，准备在大敛时纳入棺中。有些朝代则是将这些东西焚化。皇帝身上被裹以明衣、裳，明衣裳适合浴后穿。然后以方巾覆面，以大敛之衾盖身。沐浴仪式以内外的哭声为结束。

饭含。饭含是在死者口中纳入实物，象征死者生时的食物。春秋时，周天子含珠，诸侯含玉。汉代皇帝含珠。唐代的饭含礼仪规程是这样：负责这一事务的内廷侍从恭敬地端着水盘走上堂来，嗣皇帝在帷外，用盘中水盥手，再在外另外的盘中洗涤宛若贝肉的玉块，然后放在竹器中，执入帷内。嗣皇帝面向西，坐在大行皇帝的床前，揭开面巾、撤去枕头，由一名大臣操作，亲纳梁饭，次含玉。完毕，嗣皇帝回到原来站立的位置。掌管服饰的人员抬过来装着衾衣十二称的箱筐，放在席上，摘去大行皇帝的面巾，换上面衣。再以玉塞耳，叫做充耳。手上套以长一尺二寸，宽五寸的囊，叫做握手，再加上手衣。脚上着舄。十二套衣服一层层穿上，之后覆以大敛之衾。开帷，内外哭声一片。

皇帝的敛衣以西汉最为奢侈，叫做“珠襦玉匣”。匣形如铠甲，连以金缕。皇帝含珠后，周身缠以缁纆十二重，将碎玉片做成细密的罗网，称为襦，很象铠甲，连缝以黄金为缕。腰以下以玉为札，札的原意就是铠甲上的叶片，这一部分延至脚，形成匣状，中间缝以黄金缕。汉武帝的珠襦玉匣上镂刻着蛟龙、鸾凤、龟鳞图案，世谓之蛟龙玉匣。直到东汉末年，皇帝的敛服都是珠襦玉匣。魏文帝曹丕曾下制书，规定自己死后“无施珠襦玉匣”，因为当年孔子曾指斥大办奢糜之敛的贵族，说无异于暴尸于中原。其实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迭兴，朝代与朝代内部君主的替换频繁，不可能在每个皇帝死后做贵料精工玉匣了。唐以后确定下来的十数套甚至二十套衣裳作为敛服。

由于停殡时间长，为防止尸体腐化，便要在灵床底下放置冰块。负责此事的人员叫做凌人，专设凌室提供冰块。

沐浴、饭含之后举行小敛、大敛。唐代规定，小敛在天明时举行。尚食先备好太牢之饌小敛之前三刻，侍中举版奏（简牋）示令中严，宫中回荡起鼓声。御府令设小敛床，枕席安放好，外施帷幄，帷用白布。主衣率下属将衣裳十九套、绞（敛尸所用的束带）、衾安放在殿中间之东席上。小敛前二

刻，开宫殿诸门，禁卫分部设仗，这时百官、内外命妇各自在拜哭之位站立。小敛前一刻，侍中请外办礼仪使引嗣皇帝、皇子等就位，在场众人发出哭声。内谒者引诸王等就位。执礼者说“哭！”各个位置上的人齐声痛哭。侍御小臣进入殿中，按规定操作，为皇帝的遗体穿上十九套衣裳，然后系上绞，盖上衾。嗣皇帝在近侍的搀扶下哭着进来，跪地凭着大行灵床，哭踊无数，之后，被搀扶着还于原位。

按礼仪之规定，该哭踊时哭踊，大多数嗣皇帝都能勉强做到，还有哀毁过重者。有些昏狂任性的少年嗣皇帝却张不开嘴、挤不出眼泪，甚至掩饰不住笑意或者丧事活动时不在场而去寻欢。即位时年仅十岁的晋孝武帝司马曜在父皇的灵前不哭，却显得很有理性：一日的丧事进行到下午申时（三至五时），大臣们还不见嗣皇帝哭出来，便纷纷进谏，司马曜却说：“哀伤到了程度就会哭，哪有什么常规！”（原文“哀至则哭，何常之有！”）大臣谢安叹其精理不减先帝。

小敛之后的大敛是治丧的高潮。程序略同于小敛，但规模更大，参加者还包括皇弟、皇叔、皇叔祖、皇从父兄弟，诸公主、长公主、大长公主。嗣皇帝按礼仪使的奏请哭踊再拜，所有在场者也随之哭踊再拜，十五举声。礼仪使奏请皇帝止哭，皇帝便止，内外皆止。大敛操作者是宦官和女官，加衣毕，再将六玉（珪、璋、璧、琮、琥、璜）系于其上。这时，梓宫、龙輶、缚等已经陈列于殿西阶下，輶是载灵柩的车，缚是牵引柩的绳索。梓宫被沿着西阶抬入殿中，放在大行皇帝的西南侧。先将七星版安放在棺底，版上凿有七孔，各孔之间有槽相连。再加席褥于版上，画着日、月、星辰、龙、龟之属的黄帛施于棺盖内，陈衣（以前穿过的衣服）和六玉敛放好后，中官掌事者将大行皇帝安放于梓宫内，然后加盖，覆上夷衾。

大敛之后，梓宫还要停于宫中一段时日，在殿下设二丈九尺长的铭旌，题曰某尊号皇帝之柩。明代仁智殿是梓宫停放之所，俗称白虎殿。

宫中治丧活动结束后，皇帝的灵柩被发引出宫，送往墓地。明代规定，发引之前，百官斋戒三日，遣官的葬期告天地、宗庙、社稷。……发引前一日，遣官祭金水桥、午门、端门、承天门（即天安门）、大明门、德胜门、以及山陵沿途的清河桥、沙河桥、京都应祀神祇及沿路神祠。这一晚举行辞灵礼，嗣皇帝、后妃皇子、亲王等，皆衰服以序致祭。礼仪部门在午门外设大升舆，依图式陈葬仪。

发引日，先行启奠礼，陈设醴饌，嗣皇帝率皇室成员就拜位，四拜，奠帛，献酒，读祝，再四拜、哀哭，望瘞或焚帛。在大行皇帝安卧之殿，嗣皇帝面向西站立，皇子、亲王站在丹陛上也面向西。执事者进殿，撤帷幕等物，拂拭梓宫，内执事官将龙輶停于殿下，设真亭、神帛舆、谥册宝舆于丹陛上。再行祖奠仪式，即设奠以告亡灵。与辞灵仪式同，嗣皇帝被带到梓宫近前，面向西，内侍于梓宫前跪奏，请灵驾进发。

内侍们捧着谥册宝、神帛（招魂幡），由殿中门出来，放置舆内，接着铭旌也被移出。这时，执事官与内执事官小心翼翼地抬梓宫出殿，执事官负责搬动梓宫，内执事官在两旁执翼，翼用来障蔽、保护梓宫，顺着台阶，梓宫降下殿来。内侍官于梓宫前跪奏，请梓宫升上龙輶。于是，执事官抬梓宫上龙輶，然后以彩帷装饰梓宫，执翼者列于梓宫左右。内侍擎伞扇。侍卫站立如仪，皇帝旧时用过的仪仗列于前，后面跟着是谥册宝舆、神帛舆、真亭、铭旌，队伍开始行进。内导引官导皇帝由殿左门出、后妃、皇子、亲王及宫

眷随后。在午门内、举行遣奠仪式，与祖奠仪式同。然后，内侍在梓宫前跪奏，请灵驾进发，队伍启行。皇帝、后妃、皇子、亲王痛哭极哀，内侍跪奏，请皇帝回宫，然后导引皇帝、后妃还宫。在午门外，礼官跪奏，请梓宫升上大升舆，于是梓宫被抬上大升舆。礼官再跪奏，请灵驾进发，皇子、亲王哭送。灵驾出端门，停住，在太庙行辞祖礼，由皇子主持，礼毕，礼官再请灵驾进发。梓宫由承天门出，皇子、亲王步送至德胜门、再骑送至陵。

在陵墓中，皇帝得到安息，并加入祖宗之列。

六、历朝皇宫人殉

在中国君主丧葬仪式中，曾出现过惨无人道的人殉。

殉葬之事始终为社会的良心所不忍、所痛恨。孔子见到模仿人能跳动的俑，叹道：“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其意是先有了俑，才引发君主、贵族直接用人殉。荀子则直言斥责人殉：“杀生而送死者谓之贼！”

春秋时结草报恩的故事就系于人殉：晋国大夫魏武子有爱妾。魏武子初患病时曾嘱咐儿子魏颗，他死后一定把妾嫁出去，但他病重时又对魏颗说，让该妾殉葬。魏武子死后，魏颗还是把父妾嫁出去了，并说：“病重时头脑糊涂，我按照他理智时的吩咐办”。后来在辅氏之役时，魏颗见有位老人在战地上结草，秦将社回败绩，马被草绊住，颠下马来被俘获。战役结束后，魏颗梦见结草的老人，老人说：“余，而所嫁妇人之父也。尔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报”。老人为报女儿免遭杀殉之恩，结草以助魏颗。

人殉在殷周王室盛行，沉寂千年后，又在明代宫廷复兴。

殷周时的人殉，多至数百，不仅包括服侍过该王的女性，还有青年男子。秦缪公死时，殉葬人数多达一百七十七人，良臣之子奄息，仲行、针虎也在其列，秦国百姓为之哀恸，作《黄鸟》之诗。

秦始皇大治陵寝，死后，秦二世诏命：“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殉葬。

汉以后，杀生殉死之事大致不存，常有皇帝在遗诏中指示将无子之嫔妃宫女放出宫。但人殉之事也偶然在私下出现过。唐武宗病危时与王才人的一段对话，决定了王才人殉葬的命运：当王才人在病榻前服侍武宗时，武宗注视她许久，说：“吾气奄奄，情虑耗尽，顾与汝辞”。王才人说：“陛下大福未艾，安语不祥？”武宗说：“脱如我言，奈何？”王才人回答：“陛下万岁后，妾得以殉”。武宗没有说话。王才人果然在武宗断气之前，自经于幄下。王才人的“烈举”博得了宫廷内外一致赞颂，平日忌妒她专宠的嫔妃也为之感动。

《宋史》曾隐隐约约地透露过妃嫔殉葬之事，也似乎情有可原。宋高宗曾宠幸过才人吴氏、韩氏、李氏、王氏，其中李氏、王氏容貌明艳，高宗作太上皇以后，仍然爱恋二人。太上皇驾崩，皇太后见到二才人，每每感愤，孝宗探知此情，即迫告命，让她们自便。实际就是胁迫她们自杀，殉高宗之葬。

以率领下层民众起义而登上皇位的明太祖朱元璋，明目张胆地复兴人殉之制。位于南京的孝陵地下，陪朱元璋瞑目的嫔妃达四十人，其中只有二人，先于皇帝病故，其余三十八人都是治丧时勒令而死的。

明成祖的长陵，殉葬者十六妃。

明仁宗的献陵，殉葬者五妃。

明宣宗的景陵，殉葬者十妃。

明景帝在英宗复位后被降为郕王，死时仍有数名嫔妃从殉。

殉葬的嫔妃在宫中被缢死，再装敛入棺从葬。缢死的过程见之于朝鲜李朝实录，因为明初朝鲜仍沿元制，向中国朝廷进贡美女，对于死情的记述则不会是虚妄的：当死之日，殉葬者在庭中饱餐一顿，之后，被引入堂中。刚进入堂中，主持此事的嗣皇帝明仁宗走来与她们辞诀。堂上已经准备好了就死的工具，殉葬者哭声惨绝，声震殿阁。但只能就范，别无生路。宦官迫使

她们登上小木床，梁上垂下来的绳索荡然，头伸进绳圈中，宦官撤去其床，便一一形同长颈之雉，挣扎、气绝。韩氏临死时，对乳母金黑说：“娘，吾去！娘，吾去！”语未竟，脚下的床立时被宦官撤走，一命呜呼。

明代殉葬之制贯彻了五朝，在明英宗死时中断，此后未再实行。明英宗临终，口占遗嘱四项，命太监牛玉执笔，其中第二项是“勿以嫔御殉葬”这份草拟的遗诏交到文臣手中润色，李贤等览诏激动而叹：“止殉，真盛德事，度越千古矣！”《明史·英宗后纪》中赞道：“罢宫妃殉葬，则盛德之事可法后世者矣”。由英宗作法，后嗣皇帝未敢再遵太祖之制。

满洲旧有殉葬之俗，清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世祖福临死时，都有人从殉，从殉者有嫔妃和侍从武官。满清贵族也常以妾、奴仆殉葬。康熙皇帝在位时发布了禁止贵族以奴仆殉葬之令，清皇室率先做到了废止殉葬，从康熙起，未再出现人殉之事。

然而中国的最后一位称帝者——洪宪皇帝袁世凯将死之际，亲手用刀杀其爱妾。这是对古来杀殉遗风的继承。好在袁世凯的王朝及时夭折，否则殉葬之制又可能卷土重来。

第六章 宫中奴仆——宦官种种

一、皇宫中不可或缺的成员

除了皇帝、后妃、宫女外，后宫中走动着一类奇特的人——被阉割后的男人，他们被称为宦官。宦官与上述几类人共同构成后宫的成员。从数量上说，宦官仅次于宫女，但在有些朝代，宦官人数比宫女还要多。

宫廷中需要宦官，是出于君主的多欲。

后宫是皇帝的家，因此皇帝在后宫被称为“大家”或“官家”。后宫这个一夫多妻制的政治家庭，其构成并不比豪门大户复杂多少，皇帝是唯一的丈夫，后、妃是妻妾，宫女是丫环，有可能成为妾。这个贵不可及的家庭需要繁重的和特殊的服务。多妻制的豪门大户也有同类需要。尽管皇帝和后妃有众多的女仆，但皇室事务不可能完全由女人担当，比如跑腿、传呼和繁重的执役。而男性出入内廷又可能节外生枝，皇帝的猜忌心理是不允许男性在内廷执役的。因此，宦官（阉人）成为担负宫廷服务的最理想的人选。豪门贵族府院中也选用宦官服役，宋以前，任何有钱的人家都可以购买宦官。宋朝廷下令禁止民间蓄养阉奴，此后宦官归皇帝专有，清代又允许王府中使用宦官。

宦官成为一种制度，是由皇帝的专制权力决定的。在星象中，帝座周围有宦者四星，《周易》说：“天垂象，圣人则之。”皇帝号称天子，就是人间的神，皇帝的权威有一种神秘的色彩。在皇帝与臣民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这道鸿沟拉开了君主与臣民的距离，臣民不能看到皇帝的日常生活，事实上皇帝确实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因此，宫墙和宫殿起着保障皇帝神秘的外衣不被窥破的作用。那么，看守宫殿、伺候皇帝的人必须是与外界隔绝的具有特殊人格的人，这种人只能是宦官。宦官由于身体残缺，不能再过人世间的的生活。《后汉书》的作者范曄说，宦者体非全气，所以情志专良，容易役养。由这些人守护皇宫，皇帝大概可以放心了。

皇帝们心里很明白，宦官的存在不仅是为了防止后宫女子失去贞洁，主要是他自己需要宦官。刘邦做了皇帝以后便疏远了昔日的战友，在他临死的前一年，长期抱病不见群臣。一天樊哙大胆闯进宫内，发现刘邦正枕在一个宦官的腿上，思虑着什么。樊哙见此情景，十分悲愤，流着眼泪说：“始陛下与臣等起丰、沛，定天下，何其壮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惫也！且陛下独不见赵高之事乎？”刘邦笑着坐了起来，没有回答樊哙的问题。

刘邦当了皇帝便成了天底下最孤独的人，他不再有与自己利益相同的人，如果有那只能是敌人，必须杀掉。强敌项羽已成过去，当年的功臣变成了潜在的敌人，他便日夜不得安宁。没有人值得他信赖，没有人会不渝地忠于他——宦官却属于例外。皇帝确信，真正忠于他的人是宦官。臣子有内外之分，文武百官是外臣，宦官是内臣。皇帝对内外臣子加以区别，发现内臣是爱他的，而外臣则有私心。外臣爱自己甚于忠于皇帝，他们有自己的家族、血脉，他们做事先要为自己和子孙着想，只有宦官日夜陪伴着皇帝，是皇帝唯一可以信赖的人。

关于宦官的忠诚，古代阿拉伯和欧洲人也有同样的见解。他们认为，男人被阉割等于被征服，被征服者失去了反抗能力而代之以效忠，再者，他们与家族、与外界脱离了关系，就能心无二用地效忠他的主人。西亚和欧洲的王室也常用阉奴看守王宫，并保护国王的安全。看来宦官并不是中国特产，但在中国古代皇宫中，宦官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和利用，宦官在皇帝生活中的

意义也最为重大，宦官竟成为皇宫中一时不可或缺的成员。皇帝需要真正的奴仆，百官、后妃、外戚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奴仆，真正的奴仆是宦官。皇帝与宦官是明确的主奴关系，而君、臣之间虽有一定的主、奴色彩，但还有一种“义”存在。君、臣见面有一定的礼仪，皇帝怎么可以枕在宰相的腿上？汉武帝时，汲黯来见，武帝没有戴好帽子，就躲起来不敢出见。因此大臣与手持溺器的宦官决非一种人。大臣有自己的是非观，不以君主的是非为是非，而作为奴仆的宦官则注定要以皇帝的是非为是非，皇帝妄喜妄怒，宦官从而不违，大臣则要提出规谏。宦官以顺从来显示对皇帝的敬与爱，他们在皇帝身边察颜观色、林贴入微，皇帝愈发觉得他们可爱、可信。那些为所欲为的皇帝，特别喜欢和需要这种温和恭顺的奴仆，视宦官为自己人。在宫内，皇帝称宦官为家奴，宦官称皇帝为万岁爷，称后妃为娘娘，俨然一种大家族的气氛。

皇帝们自一出生，就离不开宦官了，他们脱开乳妈的怀抱后，就由宦官抚养。他们跟着宦官学习说话、走路、行礼，甚至由宦官教授文化。许多备受皇帝信任的宦官，都是皇帝幼年时的伙伴。大臣们若想把他们从皇帝身边排斥掉，往往要冒杀头的危险。皇帝对于陪伴他多年的宦官的依赖超过对任何人的信赖，包括皇帝的母亲和皇后。

二、宦官的来源

凡是被阉入宫的人，都是不堪回首者。

是哪些人经历一番残痛的折磨而成为宦官的？人们首先想到了古代的一种刑法——宫刑。宫刑又称腐刑，因被阉者伤口发出腐臭而得名。宫刑是仅次于死刑的一种刑法，可知受刑的人一定罪行很重。受宫刑又叫下蚕室，蚕室是一间封闭的，避免阳光照射的屋子，受刑的人在这里忍耐四十几天，出来时伤口已经愈合。

不幸的是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成为受宫刑的一员。法国的哲学家彼得·阿比拉德（Peter Abelard）也遭此巨辱。作为太史令的司马迁在汉武帝面前为李陵降匈奴辩护，触怒了武帝，被施以宫刑。刑余后，司马迁在内廷当了一名要职——中书令。同一时代的音乐家李延年也不知犯了什么罪，被武帝变成了一名宦官。司马迁和李延年都是武帝需要留在身边的两种人才，也许是武帝有意让他们受腐刑而进入宫廷，不然为什么不将他们置之别的刑法？不过后世君主若想把什么人变成宦官要简单得多，不必让被阉者担当什么罪名。唐太宗时有伶人罗黑黑，太宗为了让他在内廷教宫女弹琵琶而不发生意外，就一举阉了罗黑黑。明代一个军府中的士卒名叫王敏，善于蹴鞠，被明宣宗看上，随即阉为内侍。

受刑后的罪犯始终是宦官的一个来源，在北魏，这是宦官的唯一来源。因此，人们常称宦官为刑余之人。唐宋以后，把罪犯变成宦官的事例大为减少。明代大概只有怀恩是因叔父犯罪，迁连受刑为宦者的。

阉幼童为宦官属于常见的另一种宦官来源。被选来阉割的幼童都是聪明伶俐，相貌俊秀者，他们进入宫中，深得太后、皇后和妃子们的喜爱，不会分给他们繁重的工作。唐武则天时，岭南讨击使李千里带回两个被阉的童男，冠之以两个新名字，一名金刚，一名力士。力士黠慧、相貌端正，一来就得到武则天的嘉赏。明成祖时，大臣张辅到交趾选了一批俊美的男童，带到京城阉为宦官。其中有范弘、王瑾、阮安、阮浪等人。范弘有一副娴雅的神韵，在文学上颇有敏识，成祖十分喜爱，破例让他读书深造。历经几个皇帝，范弘都被另眼相待，英宗赞赏他的雅致，称他为“蓬莱吉士”。

明代朝臣、太监剿平南部少数民族的反抗后，多次阉割其幼童供给朝廷，理由是剪其逆种，防止他们再行叛乱。明英宗天顺年间，镇守湖广贵州的太监阮让，一次竟将俘获的苗童一千五百六十五人阉割，术后病死达三百二十九人，后用同样的人数补上，总共阉割了一千八百九十四名幼童。英宗闻知后大怒，下旨切责阮让。数目太惊人，皇帝会深感不安的，如果稍少一些，皇帝会安然受之。明武宗时，福建总兵陈懋向皇宫进献净身幼童八百人，武宗就安然收受。

自唐至明，许多宦官都出身于岭南、闽中。这两个地方成为宦官的供给地。唐朝向这片地区征收宦官，如同征粮征税一样。岭南和闽中在唐朝廷看来是化外之地，内地禁止人身买卖，这里却属例外。在这一带产生的宦官，许多被阿拉伯人买走，运往各地。贫困会促使人去冒险，做非人的事情，被充作宦官的岭南、闽人并非比其它地方的人更愿意当宦官。不过那一带确实有些人作转手宦官生意发了财，所以宦官市场兴旺不衰，并延续到明朝。

唐时，各道（道是行政区）的朝廷进献阉割后的儿童，号称“私白”。自宫刑逐渐消失后，实施阉割叫做“净身”，“白”也代表这种意思，一般

净身以后就叫白。“自宫”则指的是自愿接受净身手术，或自行净身。

自宋以后，宦官成为人们求问的一种职业，大量的自愿者成为宦官候选人，他们自愿、争相被阉为宦官，进入宫廷服务。自愿者的数量越来越多，以至于到明、清两代供过于求。

宋代规定，凡是自愿净身的，先到兵部报名。选择相貌端正即有福相的，再择吉日实施手术。兵部记录日期，上奏以待日后查验，被阉割者伤口痊愈后，送入内廷。此后该人开始了另一种人生，将自己受阉之日作为诞辰日，一切都从那一天开始，日后算命都根据那一天的天干地支。

宦官变成令人眼红的职业，恐怕是和唐朝宦官得志有关系的。唐朝宦官的气焰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甚至可以把皇帝拿来拿去，或者杀掉。此后民间对于宦官除了蔑视以外，增加了许多敬畏。那些世代转辗于贫困而无计改变命运、同时天性懒惰又好妄想的下层人物，会想到去做宦官。许多爱面子的人宁愿去走读书、科举的途径求取富贵，不过读书也需要钱和毅力，而且十几年苦读的痛苦不比受一番宫刑轻多少。那些根本不可能与书结缘的无业流民更愿意选择做宦官这条路。一旦在宦官中出人头地，地位就等于在最高级官员的肩膀之上，到那时家庭显耀，万人仰慕，不论世代官僚还是豪族臣室，都要争趋于自家门下，除了皇家以外，普通人至此便是极至了。

更多人的基本出发点是谋生，谋求一个寄身的地方。衣食男女本是人生之大欲，对于衣食难以周济的穷人来说，能混上一份不虞的衣食十分不易，陷于穷乡的男子有些终生都无法实现娶妻生子的奢望，最基本的衣食需要就足以驱使他们去做仆役，与其在豪门大户做仆役，不如干脆投身到皇家，伺候皇帝和后妃。

明代自宫者来自于全国，离京师数千里的闽地到明崇祯时仍然提供上万名的宦者，京郊、河北一带是新兴的宦官产地。

明代每年有近万人自愿净身到朝廷求职，清代每年也有上千人。明清两代浩大的自宫队伍说起来令人吃惊。在京郊、河北民间，自宫甚至成为一种时尚，因为当朝的宦官许多来自这一地区，当地人几乎无不看到和听到某家某人做了宦官，给家族带来了权势和荣显。这种实例在当地产生了巨大的震动，这种震动显然要比离京师遥远的闽地来得更快、更强烈。京郊，河北的农民当然并不比其他地区更穷，人们争相去做宦官是被大富大贵的光环所吸引。于是某些村庄就有上百人走上自宫之路。

随着自宫的兴盛，便产生了一种持刀阉人的职业，把制造宦官当作谋生和取富的手段。在紫禁城外，有私人开设的实施净身手术的作坊。自愿接受手术者先要被作坊主查看相貌、身段、言谈举止。对于成年、相貌丑陋者义无反顾地坚持自宫，作坊主也不会为难他。一般在手术前要交纳手术费和医药、照料费，许多人事先交纳不起，便要立下字据，找好担保人，待进宫后用月薪偿还。

自宫者中，儿童占的比例有时更大些。这些无辜的儿童多是被父亲送来的，他们身上寄托着这个穷困之家的希望，而他们自己对父命没有否决权。所以当它们作为宦官长大后，十分仇恨自己的父亲。有些孩子是被人贩子拐骗来，卖到净身作坊的，这些孩子从此和家里失去联系。

宦官这个职业对穷且无赖的人吸引力更大，甚至引人发痴发狂。有人已经结婚生子了，听说宦官如何威福，痴想着去作宦官，不久毅然走上了这条路。还有一种无赖，在市面上混不下去了，便投到宫中当宦官，如明末最狂

妄的大宦官魏忠贤，本是一个赌徒，因交不起债钱，被债主追得又羞又恼，愤而更改姓名入宫当了太监。李莲英的情况与魏忠贤相似。

朝廷如何对待这些自宫者？朝廷的态度是否定的。明朝廷严令禁止自宫。明初自宫求职者尚不是很多，明仁宗时，命将自宫求为宦官者发配到交趾戍边。宣宗时有来自山西的九名自宫者投身晋王府，宣宗闻后命法司逮治。而景泰年间，朝廷接纳了一批自宫者，此后自宫者千百成群，纷纷涌来。明宪宗又重令禁止自宫，将自宫者发回原籍当差，不许在王府家潜住，违者死罪。未几年后，宫外又聚集了四五百名自宫者，哄闹着要求朝廷收用，宪宗气愤，下诏“此辈逆天悖理，自绝其类，且又群聚喧扰，宜治以重罪。但遇赦宥，锦衣卫其执而杖之，人各五十，押送户部，如例编发海户当差。是后有再犯者，本身处死，全家发边远充军。”命礼部将此禁约公布于各地。

可怜那些毁身离家、求取富贵的幻想者，得到的是棍杖和死刑威胁。

明孝宗时，禁止自宫的法律条文编入了《明会典》。规定自宫者属于不孝罪。孝就意味着不能毁伤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的身体发肤如果毁伤就是不孝，所以古人对于头发都十分珍惜。孟子的名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孝的最重要的定理。那么自宫者犯的是最重的不孝之罪。因此法律条文规定，自宫者要被施以最重的刑法——大辟。

然而事实上未见一位自宫者被处死。对于自宫者的处理，每次都以皇帝的诏书为法令，皇帝在诏书中都要指斥一番自宫的不孝之行，然后说明不忍置之于法，以显示皇帝的恩德。

于是自宫者还是一批一批产生，一浪一浪涌来。自宫者相信，只要后廷还需要宦官，他们就有可能进入皇宫，皇帝也不会一概将他们拒之于宫门外。然而能否被选入宫中，要看自己的运气，明宫每隔几年，就选用一批新宦官，人数在二三千人左右，而候选者却有数万之多，十人中仅有一人能够被选用。

未能被朝廷选用的自宫者，处境就很尴尬了。崇祯在位的十七年中，共选了三次宦官，三次加起来人数上万。未被选中者散居于皇城外有堂子的佛寺，民间称他们为“无名白”。万历年间，未被选中的自宫者在京师附近游荡，靠劫路为生。《万历野获编》的作者沈德符亲眼见到几十名自宫者藏在败垣间，见往来车马，体质稍弱的自宫者上前乞讨，而稍有些力气的，便会勒住马车，强行索要。如遇旷野中两三名单骑者，他们就突然截住马，曳下鞍，抓住对方的要害，将其腰腹间值钱的和有用的东西全部取下，然后一哄而散。

尽管多数自宫者未被选入，宫内的宦官就已经超饱和了，明代宦官人数达到了历史上最高峰。清初整理明末宫廷用度时，发现明末宦官有十万人，比宫女九千多出十倍。明亡之际，太监从宫中哄走逃命达七万人。而清代太监的数量受到了严格限制，清代宫廷及宫外苑囿服役的宦官共计二千余人，而康熙年间仅及七百人。

清乾隆皇帝废除了自宫者拟大辟的刑律，谅穷民阉割其子是为生计所迫。事实上父亲做主，阉割儿子，无法定儿子的不孝之罪。朝廷不再将自宫视为犯罪，无疑开大了自宫的大门，而宫中又不可能大量录用他们，因此只得增加畜养宦官的场所，允许宫廷以外的贵族之家收用宦官。王公之家使用宦官属于当然。朝廷允许一品以上大臣使用宦官，事实上中上级官员都在使用，而满洲官员用得更多，显然满洲人从关外带来的蓄奴习俗仍然发挥着影响。康熙十九年，宰臣上奏要求重责王公外收买宦官的大臣，康熙皇帝说：

“三品以上官员，本不宜禁止，但私自阉割者多，未免于民有害，着依部议。”

自宫者申请入宫先要在礼部登记，接受查验。清代是这样规定的：自宫者凡在礼部登记后，再由内务府会计司、掌仪司的首领，从掌仪司中派出年老的太监，对他们作出检验，通过后交与宫殿监首领。宫殿监首领带他们进见皇帝，由皇帝挑选其中可意者，留在身边，其余的分配到各宫。

入宫后，需要先认师父，师父就是义父，这种规矩自唐代就开始了。入宫当宦官，开始另外一种人生，变化是很大的，体现在要以师父为父亲，有的还要从义父的姓氏。如高力士本姓冯，其曾祖父冯盎隋朝时在岭南做官，力士入宫后拜高延福为义父，遂姓高。在高力士之前的大宦官杨思勳，本姓苏，被宦官杨氏收为养子，遂姓杨。俱文珍从义父姓，又名刘贞亮。宋代几乎所有的宦官都从义父之姓，在他们的传记中，必带上其“父”的名字。每个宦官到中年后，又可以收养子，一代一代传下来。伦理观念的需要和人身依附的需要并重。明代宦官入宫，必须投一个大珰（珰是汉代官者的冠饰，又作为宦官的代称）为主，称某某名下，如曹吉祥入宫后，投到王振名下。

师父（义父）与徒弟（养子）的关系就是主奴关系。大宦官在内廷主子面前是奴才，在小宦官面前则是主子，所以刚入宫的宦官先做奴才的奴才，也许终生只是奴才的奴才。

三、宦官的职责

宦官是内廷的仆役，凡皇帝、皇后、妃嫔日常生活所需要的服务由宦官提供。内廷门禁森严，守护内殿各门也是宦官的重要职责，后宫简单说就是以女御充之，宦者守之。当然，皇家这个国、家合一的家庭所需要的服务要比豪门富室多得多，宦官的职责也就分化出许多，因此便产生了内廷服务机构，即宦官机构，宦官又叫做内官。

从三代到西汉，内廷服务人员不完全都是阉人。吕后称制时以士人张卿为大谒者，出入卧内，受宣诏命。汉成帝时，淳于长先为黄门郎，后升侍中，也非阉人。

内廷机构，西周时有宫廷、宫伯，掌管王宫事务；宫人，掌管寝宫事务；内宰，管理王宫内的政令；阉人，负责守护宫门；寺人，管理后宫女子。

战国时出现了宦者令，赵国的宦者令是缪贤，蔺相如最初是缪贤的舍人，后来被缪贤推荐给赵王。

秦代设中书谒者令、丞，负责礼仪和公文传递、收贮。中常侍，参用士人为之，在殿内服务。赵高的职位先是中车府令，管理皇帝的车马，后来升为郎中令，至于越居于丞相之位，已经不属于宦职了。秦代负责宫女簿帐、女工等事务的宦官叫做永巷令。

西汉，皇帝身边有侍中、中常侍各一人。因石显得志，元帝设立中尚书的职位，负责诏令文书。黄门侍郎一人，负责上递下传奏章。黄门指的是掖廷的小门，黄门侍郎之下有中黄门、小黄门。太后住在长秋宫，该宫中的宦官都由大长秋领导，大长秋一职或用士人或用中人（即阉人，意为宫中的人）。秦时的永巷令西汉改称掖庭令。内者令掌管内库出纳。

东汉，中常侍在宦官中职位最高，在皇帝面前以备“顾问应对”，出入卧内，赞导内廷众事，中常侍人数四名，其后员数增为十人。确切地说，东汉自邓太后临朝听制以后，由于事实上的需要和便利，规定宦官全部使用阉人。中常侍以外，设立的宦者职位是：大长秋管理皇后宫内事务，其属官有内谒者监，设中宫谒者三人，负责章奏传递。黄门侍郎，负责沟通内外信息。小黄门在太后身边服务，整理文书，在太后和皇帝之间联络。接受临时分派的任务，如诸公主及太妃有疾病，小黄门作为太后派去的使者探问。黄门一条的职务还有中黄门，中黄门冗从仆射，中宫仆令，负责管理车舆杂畜，出门时负责车马导从。掖庭令，掌管后宫贵人、采女之事。其下属的暴室令负责管理暴室内的妇女，送来暴室的人包括患病的宫女和犯罪的皇后、贵人。永巷令管理宫中服劳役的婢女。御府令负责指挥宫婢制作、浣洗宫中衣物。宫中如有织室，则设宦官为织室丞。钩盾令，管理皇家苑囿。东汉第一位著名的宦官郑众就是钩盾令。

隋朝设立宦官机构内侍者，唐代因之。内侍者在唐代曾改名为内侍监、司宫台，又复归内侍省名下。内侍省设内侍四人，负责宫中供奉事务，车驾出宫，则在车驾两旁夹侍、引路。内常侍六人，属官有内给事八人，内谒者监六人、内寺伯二人，寺人六人。较具体的内廷事务分设五局管理：一为掖廷局，主管嫔妃、宫女簿籍；二为宫闱局，主管宫内门闾之禁，下属有掌扇、给使等员；三为奚官局，管理宫女疾病治疗、死丧事务；四为内仆局，掌管宫中供帐灯烛；五为内府局，管理内库出纳。各局设令、丞为正副长官，唐中期开始，宦官作为中使出外监军，从此宦官的职责超出了服侍帝后、管理

后宫事务的范围。

宦官的品位，唐太宗时规定不得立三品官，宦官中职位最高的内侍定为四品。经武后、中宗，宦官人数增长，达三千人，七品以上者就有千余人。玄宗在位时，承平日久，踌躇满志，对宠信的宦官不吝惜封赏。宦官中出现了三品左右监门将军，四千多名宦官中有千余人居四、五品。三品将军在殿头供奉，委以重任，持节传命，“光焰殷殷动四方”。宦官出外监军，掌地方军政大权，节度使反而听命于他。权势与财富并进，大宦官置办的田舍、名园、上腴之田几乎占了京畿的一半。德宗以后，授与宦官掌禁军之权，禁军即左右神策、天威军，置护军中尉、中护军分提禁兵。皇帝由于信任宦官而将禁卫军权交与他们，军权在手，使得宦官有了要挟皇帝的实力，适得其反。

宋代的官称显得啰嗦而杂乱，宦官机构也是这样。宦官机构有前后省，即入内内侍省、内侍省，前者与皇帝更加亲近，凡在皇帝身边随侍的，即“通侍禁中，役服褻近者”，属于入内内侍者。而“拱侍殿中、备洒扫之职、役使杂品者”属于内侍省。

宦官职位，入内内侍者设：都都知、都知、副都知、押班、内东头供奉官、内西头供奉官、内侍殿头、内侍高品、内侍高班、内侍黄门。

内侍者设：左班都知、副都知、右班都知、副都知、押班、内东头供奉官、内西头供奉官、内侍殿头、内侍高品、内侍高班、内侍黄门。宦官定员是一百八十人。

初入宫的宦官，先当小黄门，经皇帝恩迁为内侍黄门，再依次上升。

在皇帝认为比较关键的非宦官部门，派遣宦官为勾当官，由宦官督察重要工作，皇帝便可放心。在御药院，派入内内侍四人做勾当官，“掌按验方书，修合药剂，以待进御及供奉禁中之用”。同样派入内内侍四人在内东门司为勾当官，“掌宫禁人物出入，周知其名数而讥察之。”龙图、天章、宝文阁设勾当四人，“掌祖宗文章、图籍及符瑞宝玩之物，而安像设以崇奉之。”在翰林院，以内侍押班或都知充当勾当官，总管天文、书艺、图画、医官四局。可看出宋皇家对文化部门的重视。

宋代宦官人数大概是历史上最少的，宋太祖初定天下时，宦官只有五十人，后来虽增加了人数，也不过二百余人。南宋时规定宦官足额二百人，后来确定的二百五十人。

承唐代的遗风，宋宦官从征，领兵征讨是常有的事。

明代宦官机构至为发达，职能全面，以往制造宫廷用具的非宦官机构，明代归入宦官机构。明代宦官机构统称内府衙门，分设十二监、四司、八局。太监是宦官首领之称，从此又成为宦官的同义词。

司礼监，是宦官最高机构，掌印太监率秉笔、随堂太监代替皇帝，用硃笔批阅章奏。有了司礼太监，明代皇帝轻松了许多，可以几十年不上朝、不理政，而太监便由此掌握了皇帝应有的权力。秉笔太监兼掌管东厂。司礼监提督常住衙门内，掌管古今书籍、名画及文房用品，各设库藏之。宦官的人事档案由提督下属的六科廊掌司记录和管理。

为办理批阅章奏，司礼监设文书房，司礼监掌印官在司礼监正房阅文书，而秉笔、随堂则在文书房各自的办公室，细看文书。魏忠贤做掌印太监时，公然在乾清宫大殿上批改文书，他本人并不识字，命人在一旁高声朗读。秉笔、随堂太监需要有高深的学识，崇祯皇帝极为重视这一点，如同考进士一

样在太监中考试选拔，一次出题为“事君能致其身”，郑惠和曹化淳考中。

司礼监中设立内书堂，由大学士、翰林院词臣教授宦官读书。史无前例。

司礼监下属机构还有负责皇子女出生至选婚事务的礼仪房；安置年老太监掌管文华殿旧文书、对联和干杂务的中书房；管理营造龙床、龙桌等物的御前作。

司礼监还有被派往山、陵等地镇守的太监。

明代委宦官以重任，创设东厂作为警探机构兼管刑狱。后又增设西厂和内行厂。京城、皇城各门关防出入，都须向东厂奏报。地方失火、雷击之类也要立即奏闻，至于京内的粮、米、油价，每月三十日定期汇报给东厂。东厂衙署中横挂扁额：“朝廷心腹”。

初入宫者如身材高大强壮，则被分派练习抬轿、持伞。凡皇帝乘驾而行，这些职为“答应”、“长随”的太监抬着弓箭、赏赐等箱子，跟在后面。皇帝赐给大臣的物品由长随奉送，朝廷文武官员和地方长官呈给皇帝的表笺、礼物，也由长随接收。

刻漏房的太监负责照看时辰，白天在文华殿后值班，每一时辰到，则入宫更换时辰牌，夜间在隆宗门外值班，用喊声报时。

宫中各长街设有路灯，以石为座。每日晚，内府供用库的太监负责添油点灯。

夜间的安全极为重要。住在神武门东西两侧和长庚门外廊下的答应、长随们，要警惕从宫门缝中传来的光亮，一旦有事，各长随要遍寻何处失火，紧急救护，立即报告皇帝。

夜晚有留在殿中值宿的太监，职称为掌印、秉笔、管事牌子，在宫内各处也留有值班太监，待皇帝安寝后，散归各处值班。寝殿之门关闭。负责管理衣、帽的太监，将值宿太监的衣、帽，用两条带子串连在一起，称为“一把莲”，有事穿衣时会很利落。负责本房的太监每晚在桌上点上暗灯，备好用来写字或唾痰、擦手的小方纸，备用的笔装在袋中。值宿太监夜间睡时也要保持几分清醒，如皇帝夜间忽然想起什么事起身、或有意外事件及火灾报警，值宿太监要立即穿好衣服，手持五尺竿，迅速到皇帝面前以应召并保卫。

值宿太监也常有松懈、怠慢之时。天启年间，魏忠贤祸乱宫中，太监们敢在皇帝面前怠慢，一次夜间边警传报，皇帝惊起，侍候在身边的只有几名宫女，大约过了一顿饭的时间，值宿太监才慢腾腾走来，皇帝已是一脸怒气。有时睡前喝醉了酒，解衣赤身而卧，遇事当然迟缓。

崇祯时，边防紧张，夜晚值宿的太监，整衣睡在貂囊内，有事则出囊应召。崇祯皇帝常常夜不能寐，有时夜览奏章，便令值宿太监先睡。从规定上说，皇帝上床安寝前，太监不能先睡。宫中用火十分小心，因为木质结构的建筑最忌讳失火，值房太监的饮食都是先在御河边做好的，抬到宫中，用炭火热一热，不敢烧煤。

朝夕在皇帝身边服侍的太监叫御前牌子、暖殿，都是皇帝亲自挑选的，当然都是些年纪较轻，相貌俊秀、善解人意的太监。而宫中祭祀和礼仪活动中，起重要作用的赞礼太监，则要挑选行动敏捷、声音洪亮、举止文雅者。

清代由非宦官机构内务府担当明代二十四司的诸多职能，宦官机构和职能显然萎缩。

清代宦官，裁定员数，统领于内务府大臣。

清代额设太监二千四百人，品级到四品而止。太监的最高职位是总管太

监，四品，设十四人；以下是副总管太监，六品，设八人；首领太监，七品，设八十九人；副总领太监，八品，四十三人；笔帖式，有敬事房的八品。其余的普通太监，供扫除、守护之役，无品级。清代太监的主要职掌是伺候皇帝、后妃的衣食。四时所需的冠、袍、带、履及典礼所用的物品，要先期预备，交御前大臣。内廷坐更，由首领太监，执事太监充此差。

清代太监按规定不得出紫禁城的大门。

四、皇帝忠实的仆人

唐朝时，有个受皇帝宠信的宦官到宫外放鹤玩乐，鹤损坏了百姓的庄稼。县令杨德干将这个宦官抓住，重打二十杖。该宦官回到宫里，哭着撩开衣服，让皇帝看他背上的伤。皇帝安慰他说：“你既然知道那个汉子（杨德干）胆子大，何必去侵犯他的百姓？”这位皇帝是性格温和的唐高宗，没有将杨德干免职或重责。如遇一般情况，皇帝是不会饶过这种地方官的，一定要为宦官出气。宦官是皇家身边的人，不敬重宦官就有不敬重皇帝的成份。

从唐高宗的上句话中可以听出，皇帝自然地把宦官视为自家人，地方官和百姓则是外人。“何去犯他百姓”这句话使人回味，似乎百姓不属于皇帝，与皇帝没有共同的利益。

皇帝需要宦官。身边没有宦官的皇帝如同没有拐杖的盲人，不敢动一步，没有宦官皇帝就不能生活，没有人能够代替宦官整日守在皇帝身边。孤家寡人的皇帝能把信任交给谁呢？交给宦官，只有宦官值得他信任。这种信任基于皇帝的判断：宦官最忠于他。

宦官对皇帝忠诚，这种判断是否与事实相符？在皇帝与宦官主奴关系稳定的情况下，这种判断是正确的。没有人比宦官更忠于皇帝了，皇后、妃嫔在忠诚上也比不过宦官，在关键时刻，宦官能够保护皇帝，而后妃们无暇自保。

唐敬宗时宫中发生了一场变乱。有个叫苏玄明的卜者，结识了染署的工匠张韶，苏对张说：“我为你占卜过，你会做皇帝，我协助你。听说皇帝昼夜狩猎，出入宫中没有规律，可以借机而行。”张韶听信了他的话，作为染工他经常运染材入宫，卫士不会阻挡他。于是秘密召集工匠百余人，将兵器藏在运染材车中，深夜进了宫门。整日忙于游戏的唐敬宗正在清思殿击球。张韶在宫中发现有人怀疑他们，立即杀了那人，从车中抽出兵器，大叫众工匠摆成队列。敬宗近侍慌忙跑来告变，敬宗大惊，准备逃到右神策军，近侍劝皇帝还是投到左神策军，更近一些。原来敬宗宠爱右神策军中尉梁守谦，经常令两军角戏，帮助右边取胜，左军常受委屈而不满。敬宗逃到左神策军，中尉马存亮立即出迎，得知宫中发生变乱。大概是敬宗逃得慌忙，鞋都跑掉了，马存亮跪下，捧着敬宗的脚哭泣，然后背起敬宗，入军门。

由于马存亮危险中相救，敬宗得以继续做皇帝。变乱讨平后，马存亮并不比受宠的梁守谦升职更高，但他问心无愧。唐宣宗时的一天深夜，突然从皇帝的寝殿中传来惊叫声，原来是个宫女正试图谋杀皇帝，在咸宁门值宿的宦官严季宴闻声立刻赶来，救了皇帝一命。第二天，皇帝对他说：“没有你，我的危难逃脱不了。”

同样是深夜，时间已转到了宋仁宗年间，宫中突然失火。当时任小黄门的王守规先发现了火情，夜间皇帝的寝殿和后妃住的后苑都上了锁，王守规发疯地一路击碎门锁，把皇帝、太后叫起来，扶着他们逃到延福宫。火扑灭后，仁宗回来发现所经之处都已燃成灰烬，如果不是王守规奋力相救，皇帝有可能烧死在宫里。第二天仁宗在延福宫召见群臣，感怀地说：“如果不是王守规把我救到这里来，我可能无法与你们相见了。”此后王守规升职，在殿内服侍皇帝。

宋代宦官冯世宁在宫禁服务长达六十年，忠诚、谨慎，一切为皇帝着想，从无任何闪失。一天深夜，哲宗闻知杨国公主病情严重，要立即出宫探视，

命令准备车驾。任内押班的冯世宁上前阻止，执意不许皇帝出宫，哲宗心情急切，必欲出宫，冯世宁与哲宗争执起来。哲宗刚要发火，转念一想，冯世宁是出自忠诚，担心自己黑夜出宫发生不测。于是哲宗欣慰了，脸上的怒容转为笑容。徽宗时又发生夜间宫中失火，冯世宁急召宫外的宿卫士卒前来扑火。火灭后，冯世宁别有心计地引领卫士们从另一条道出宫，以免他们熟识宫中的结构和道路。徽宗得知后，赞叹不已。

明孝宗张皇后独宠，她的两个兄弟经常出入宫禁，参与内宴，得意忘形，甚至不把皇帝的尊贵放在眼里。一次内宴时，孝宗出去上厕所，张鹤龄喝着酒，拿过皇冠，戴在自己头上，而张皇后置之不问。当时宦官何文鼎为长随，在一旁侍立，见此情景心中腾起一团怒火，但没有立即发作。过些日，他又发现张鹤龄在偷看皇帝的床帷，何文鼎怒不可遏，手持大瓜要砸过去，被孝宗、张皇后拦住了，何文鼎进奏孝宗：“二张不敬，无人臣礼。”皇后在旁回击何文鼎。孝宗心知何文鼎一片忠心，但在张皇后的挑拨下，惧内的孝宗还是将何关入监狱。何文鼎被张皇后指使人杀于狱中，孝宗十分痛心，命人祭之，并刻文于碑。张皇后蒙皇帝独宠，却不维护皇帝的尊严而袒护自家人，她对于皇帝的忠距何文鼎差之远矣。

高力士，历史上最有名的宦官之一，他与唐玄宗之间忠诚与信任的关系最为典型。

高力士十岁入宫，在宫中长大，身高六尺五寸，很有风采。玄宗在藩邸时，高力士倾心依附，二人似成知己。玄宗即位后，高力士负责玄宗与外间的联系，玄宗可以安然在幄内解决一切问题。高力士日夜随侍玄宗，每晚在殿内陪宿。玄宗曾说：“力士当上，我寝乃安。”

高力士在朝中令奔竞之徒仰慕，许多人想见他一面都很难，侥幸见到他，如望见天人一样，激动不已。众宦官唯高力士马首是瞻，杨国忠、安禄山等也厚结于高力士，遗赠金银、珍奇。高力士这人善于置产，在京师筑建甲第、池园、占据良田。在宫中，玄宗不称其名而称将军，有时还对高力士自称小字“阿瞒”，肃宗待他如兄长，诸王、公主称他为翁。

高力士对玄宗的忠诚却始终没有改变过。他身处高位仍不失持正的立身原则，在玄宗懵懂之时，能够分辨是非，劝谏玄宗。玄宗中年渐图安逸，打算把政务一概付之奸相李林甫。李林甫阴险奸诈，肃宗在东宫时曾日夜忧惧，怕遭到他的构陷，忧心导致肃宗的鬓发斑秃。高力士在玄宗面前力陈天下柄不可假人，如李林甫权威既振，谁还敢议论他！玄宗面呈不悦之色，高力士只好顿首自责：“心狂易，语谬当死！”玄宗思量，终觉高力士有理，乃置酒席嘉赏他，左右臣僚见此，不禁高呼万岁。

玄宗曾为立太子的事忧烦，肃宗在诸子中最长，而玄宗偏爱寿王，拿不定主意。一次吃饭的时候，玄宗神色恍惚吃不下饭，高力士小心地问：“大家吃不下饭，是膳馐不使您满意？”玄宗说：“你是我家的老人了，能猜出我为何这样吧？”高力士说：“是因立太子的事吧？推长而立，谁敢争？”玄宗说：“你的话有理。”一句话令玄宗内心的积郁释然，于是立肃宗为太子就这样定下来了。

高力士与玄宗共患难是从安禄山叛乱开始的。高力士随侍玄宗逃往蜀地。在逃亡中闻知郭子仪等将军收复两京，玄宗与高力士以手加额、庆幸之至。回到京师后，玄宗的地位有了改变，高力士继续在兴庆宫侍奉太上皇玄宗，其时他已是七十多岁的老翁了。

肃宗宠信的宦官李辅国正在走运，李辅国原是高力士手下的低级宦官，心胸狭窄，一旦小人得志，便要恣意猖狂。他见太上皇和高力士仪容高傲，对他蔑视，貌丑心黑的李辅国耿耿于怀。他向肃宗建议，要玄宗搬出装修华贵的兴庆宫，移住西内。在移仗前一日，派人将兴庆宫原有的厩马三百匹牵走，只留下十匹，玄宗与高力士忍气而故作从容。

次日玄宗去见肃宗，肃宗自称有病，令他人代为起拜，留玄宗吃饭，饭后温语劝玄宗继续住在兴庆宫。玄宗和高力士骑马走至夹城，忽闻后面传来急促而噪耳的马蹄声，玄宗一阵心悸，回望知是李辅国率铁骑百余人奔来，直逼玄宗的面前，高力士气愤，斥责李辅国：“纵有他变，也须遵守礼仪，岂能如此惊动皇帝！”李辅国回骂道：“老翁不大解事，走开！”斩了高力士从者一人。年老的高力士忍辱负重，牵着皇帝的御马，缓缓走向西内。到西内，惊魂甫定，主仆相顾凄然，玄宗忽然老泪纵横，对高力士说：“如果不是将军护佑，阿瞞已是乱兵前的死鬼了。”

高力士与玄宗继续过共患难的生活，然而为时已经不长了。玄宗的膳食中不再出现肉，但他坦然接受了这种待遇。每天，玄宗和高力士看人扫除庭院，也过来动手修剪花枝，有时他们坐在一起，讲经论义，或者说些有趣的话，高力士文义并不很通，但这对年老的主仆相伴着打发时光，彼此也很开心。然而十几天后，高力士患上了虐疾，怕传染给玄宗，就移住到功臣阁下。

高力士盼望病好了能再随侍玄宗。一天晚上，有人敲门进来，告他：“圣人唤阿翁。”高力士问他：“见到太上皇了？”对方说见到了。高力士欣喜又有些疑惑，他随着走出阁外，一个宦官交给他一卷文状，上面全是对他的指责，高力士要求到肃宗面前辞罪，以申明自己的冤枉，但未被允许。第二天，上面宣布高力士潜通逆党，曲附凶徒，既怀泉獍之心，合就鲸鲵之戮。以其久侍帷幄，颇效勤劳，且舍殊死，可除名，长流巫州。这完全是李辅国的陷害。

高力士未能与玄宗再见一面，就怆然上路了。带着数月的衣粮和八、九名随从，一路凄风苦雨，过了三年的流放生活。第二年走到夷州，遇见大臣第五国珍也被贬至此，他们相见悲欣交加，饮酒赋诗，高力士对第五国珍说：“宰相都遭此噩运，其他人就更不用提了！”对国事充满忧心。一路跋涉，在停宿的日子里，高力士发现地里野生的荠菜，是京师常见的蔬菜，而这里人却不知道它能吃，不禁感慨南北遥远、风俗不同，赋诗道：“两京秤斤买，五溪无人采。夷夏虽有殊，气味应不改。”于是拾菜做羹，觉得美味无比。

肃宗临终前几个月，诏命一切流放的人回京。几个月后，玄宗、肃宗先后离世。高力士在巫州，听到玄宗的死讯，号天叩地，悲不自胜，哀祭、服丧的程度超过了礼仪规定。高力士起程回京，要将自己的风烛残年服务于玄宗的陵寝，一路上号哭不止，每次号恸都几乎回不过气来。由于哀毁过甚，哽咽成疾，从巫山走到郎州一个多月时间，就痛得不行了。临终时泣下沾襟，眼里流出的不是泪而是血。高力士在宝应元年八月十八日死于郎州开元寺西院。高力士去世的消息传播于远近，没有人不为之伤叹。他的灵柩被送往京师，陪葬在玄宗陵。

明崇祯皇帝国亡而身殉。当内城陷落，崇祯心急如焚，跑到前殿敲钟召集百官，竟无一人前来。最后崇祯在煤山寿皇亭自缢，陪着他死的是司礼监秉笔太监王承恩，崇祯以身殉国，而王承恩则是以身殉主。明亡时与王承恩同样以死报主恩的还有太监首领方正化、高时明等五人。

东汉皇帝中，有许多是依赖宦官打倒外戚，从而把权力夺回自己手中的。在吉凶难卜的情况下，年轻的皇帝想除掉执掌朝政的外戚，需要冒极大的风险，孤注一掷，皇帝能够依靠的力量只能是宦官，如果没有充分的信任，贪生怕死的皇帝是不会冒这个险的。

东汉从和帝开始，新即位的皇帝都是少年或孩童，导致母后临朝，外戚入主朝政。皇帝与外戚的权力斗争便不可避免。汉和帝十岁即位，朝政掌于外戚窦宪，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大臣们见皇帝幼弱、外戚擅权，只能暗自叹息、流涕，无能为力。和帝身边的钩盾令郑众，为人机敏，从和帝作太子时就随侍左右，被和帝视为心腹。永平四年，和帝十五岁，发觉窦宪要图谋不轨，和帝与郑众计议对策，郑众设计了一套方案。先让和帝下诏，将窦宪控制的禁卫军调开，再召窦宪进宫，然后紧闭宫门。窦宪进宫后，宦官们立即向他宣布皇帝的诏命，收缴其印、绶，迫令他回到封地。窦宪一到封地，和帝又下诏令他自杀。事情成功后，郑众升为宦官首领大长秋。郑众这个人在宦官中是一位贤者，对皇帝的赏赐辞多受少，和帝对他更以贤者待之，经常与他谈论政事，未料从此开创了东汉宦官用权的先例。十年后，和帝深念郑众的功绩，封他为鄴乡侯，又开创了宦官封侯的纪录。

和帝皇后邓氏在皇帝死后，又临朝听政，将邓氏家族引入了权势中。安帝即位时十三岁，十五年后，安帝决定铲除邓氏家族势力，这时宦官李闰和乳母王圣成了皇帝的同谋。事情的结果正符合他们的愿望。

汉安帝死后，阎太后为了久专国政，立了一个幼童做皇帝，史称北乡侯。小皇帝即位二百多天就死了，阎氏家庭准备另立皇帝，他们紧闭宫门、屯兵自守。济阴王刘保是原来的太子，宦官孙程、王康都是服侍过济阴王的人，他们在此关键时刻，誓死扶立济阴王，孙程聚集宦官同党们谋划，撕下一角单衣以为誓。地震加重了当时的紧张气氛。孙程等十几名宦官在北乡侯死后的第七个夜晚，突然闯入内廷，杀了依附阎氏的宦官江京等人，并胁迫李闰听从他们的指令，李闰在宦官中资历老、职位高，跟随他的人很多，孙程把刀放在李闰的喉咙边，说：“今当立济阴王，无得摇动！”李闰只得应诺。于是以李闰为前导，迎济阴王入正殿。次日，召百官在南宫进见新立的皇帝，因此大臣们和孙程等取得了共识，帮助宦官们收拾了在北宫准备反扑的阎氏家族。

相类似的事情紧接着发生在桓帝与宦官身上。桓帝十五岁即位，二十八岁时外戚梁氏还在总揽朝政。桓帝迫于梁冀的威胁，多年隐忍，梁冀的女儿又是皇后，桓帝又怕泄露心机。梁皇后一死，桓帝认为可以行动了，桓帝趁上厕所的机会，召来他最信任的小黄门唐衡，问他宦官中哪些人与外戚有仇，唐衡告诉桓帝，单超等人与梁家结有私怨，于是桓帝召来单超，密图除梁之策。主奴们意气相投，定议，为表示坚定的决心，桓帝在单超的手臂上猛咬了一口，以血为盟。事情取得了成功，桓帝更加信任宦官。

五、弱主身边的强奴

古人很自然地把宦官列为小人，宦官群就是小人聚集所，宦官是皇帝的奴仆，仆人得宠于主人，无非靠讨主人的喜欢，靠伺察主人的喜恶，言行乖觉、献媚，把主人服侍得舒舒服服。这就是典型的小人得道的方式。

得了宠的宦官就不再是普通宦官了，成为宦官首领。宦官的升职都是由皇帝决定的，不同于百官需要经过科举考试、吏部甄拔。因此被提升为首领的宦官都是得宠者。

得了宠的宦官，能够做到得意而不忘形的很少。孙程帮助汉顺帝取得皇位，被大封特赏，有时得意便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一次在大殿上，当着皇帝的面，呵叱左右，惹怒了顺帝。明代大宦官魏忠贤和皇帝一起围猎时，骑马狂奔过天启帝前，毫无敬意，天启帝搭箭射中其马颊，魏忠贤从马上掉下来，怏怏然。

宦官们只需要忠，不需要诸如学识、道德、礼仪等修养，如果想增加修养是他自己的事，没有人强令他。宦官在皇帝面前定性为奴仆，在大臣和百姓眼中被视为非人。人格扭曲，躯体伤残，因此宦官心理上产生了强烈的屈辱感、逆境感。他们时时想改变这种状况。奴才最大的愿望就是做主人，奴役别人。他们在皇帝面前得宠后，就要做皇帝以外的任何人的主人，奴视他们，污辱他们。如有可能，他们也要改变与皇帝的关系，做弱主前的强奴，甚至使皇帝屈从于自己。那么对于君主的忠也就不再需要了，到那时他们只忠于权力。

被宦官首领视为奴才的首先是小宦官，他们对小宦官颐指气使，任意污辱、折磨，小宦官只得从命。小宦官不是直接听命于皇帝而是听命于大宦官的，他们只能依附于大宦官。

其次，宦官首领要奴视百官。他们手握王爵，口含天宪，动辄代表皇帝，在皇帝的默许下，百官只得就辱。唐代宗时宰相李揆向李辅国执弟子礼，称他为“五父”。明代王振弄权时，朝廷百官上至太师、英国公张辅都要跪着向王振禀报事情。大臣薛瑄、李时勉由于对王振不敬，被王振陷于他罪，薛瑄险些亡命。御史李铎一次遇见王振没有下跪，事后就被贬谪到铁岭。凡是大臣与宦官发生冲突，宦官没有不加倍泄愤、欲将对方便置之死地的。宦官出镇地方或出外办事，几乎无不纵逞威福、欺侮地方官和百姓。

宦官首领将有求于他的外朝官视为当然奴才。宦官首领声威赫赫于朝廷，就会有趋炎附势的外朝官前来奉承，求他们向皇帝引荐、称道自己，而宦官首领正需要对他们奴颜卑膝的势利小人，以满足心理需求。明英宗朝工部郎中王祐因攀附大宦官王振而升为工部侍郎，在王振面前他一副奴相，王振也爱耍弄他开心。王祐面白无须，王振就问他为何无须，王祐谄笑着答称：“您没有胡须，我怎么敢有？”明代甚至出现了一群被称为阉党的官僚，他们以奉承宦官首领为仕进的门路，升官之后，一切按恩主的意旨行事。官至宰辅的焦芳就是大宦官刘瑾的党徒，面见刘瑾，开口必称千岁，自称为门下。明末宰臣顾秉谦等人则是魏忠贤的门下走狗。

宦官首领既震慑了百官，就要进一步改变与皇帝的关系。宦官首领与皇帝间奴主关系的更改不是一朝一夕实现的，许多宦官是从小皇帝或太子身上开始下功夫的。从服侍小皇帝或太子起家，使皇帝从小就接受他们的训导，养成信赖的关系和听命的习惯。赵高就曾是太子胡亥的老师，胡亥即位后，

赵高仍以师长的身份对待他。明代几个得志的大太监王振、刘瑾、魏忠贤都是走的这条途径。王振服侍幼年英宗，还充当他的文化老师；刘瑾在武宗做太子时，就陪伴武宗玩乐；魏忠贤最初为熹宗母亲王才人典膳，后又结交了熹宗乳母客氏，周旋于幼年皇帝身边。

皇帝幼年缺乏父爱、母爱，在太监的抚养下长大，这份亲情就多少转移到太监身上。皇帝长大在后对自幼服侍他的太监言听计从。这样，大太监就可以左右皇帝的思想和行动了。皇帝对他多一份敬重，他就会对皇帝少一份礼仪，奴主关系就这样移动。汉灵帝十二岁即位，与中常侍张让、赵忠最为亲近，常说：“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宦官们以张、赵为首，大行其是，聚金钱、筑第宅。一次，灵帝登台眺望，宦官们怕皇帝看见他们修筑的拟于王宫的宅第，便进谏说：“天子不能登高，登高百姓就会离心而逃散。”灵帝相信了宦官的话，从此不再登高了。唐僖宗幼年就和宦官田令孜吃、睡在一起，日夜相伴，即位后僖宗称田为“阿父”，一任田令孜所欲，政事也委之于他，明代王振由于辅导年幼的英宗，英宗即位后称他为“先生”。明英宗因为信赖这位先生，付出了重大代价。

当时，蒙古瓦刺部落据于明朝边外，英宗十四年，其太师也先向明廷贡马，王振煞价付钱给也先使者，使者恼恨而去。当年七月，也先率军大举入寇，好大喜功的王振，要求英宗亲征，英宗毫不犹豫地听从了，至于大臣们频频进谏，英宗却不予考虑。于是王振带着英宗，率几十万大军向北开进，到宣化遇大风雨，大臣进谏，王振号怒不听，成国公朱勇跪着求他，尚书邝埜、王佐不从王振之意，被罚跪在草中。八月军驻大同，王振还要向北进，镇守太监郭敬报告敌情，王振开始怕了，决定班师。路上，王振打算邀请英宗到他的家乡蔚州看看，借此向当地人炫耀，然而王振又担心大军踏坏他的庄稼，遂改变主意，从宣化回京，绕了一个大弯，到了土木堡。这时瓦刺兵追至，明军大溃，像一场噩梦，王振被乱军所杀，英宗束手就擒，继宋徽、钦二宗后，明英宗又一次成为被外族俘虏的皇帝。然而英宗运气要好得多，次年也被也先放回。回京后，英宗退居太上皇，在宫城外的南内苦熬了七年时光，经过夺门复辟，英宗再度坐朝。复位后，英宗对王振所造成的这番颠沛、折磨无怨，还十分怀念王振，为他祭祀、招魂，为他设立祠堂，赐名“精忠”。

宦官首领的能量究竟有多大？大到能够废立、杀害皇帝。最早废立、杀死皇帝的是历史上第一个掌大权的宦官赵高，赵高杀了胡亥，立子婴为秦王。接着是北魏宦官宗爱逞凶，继往开来。宗爱对于北魏宫廷的祸害令人瞩目。最先他与东宫官员仇尼道盛等人有矛盾，因而构陷对方，利用太武帝拓跋焘的猜忌，杀了仇尼道盛。东宫官员因“罪”被杀，致使太子忧惧不安，陷于忧惧之中的太子不久就死了。拓跋焘对儿子的死十分伤感，转而对宗爱产生怀疑。宗爱敏感到了，开始惶恐，然后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冒险杀了拓跋焘。拓跋焘身体魁伟、武力过人，至于他如何被一个宦官杀死，没有人知道。宗爱诈称皇帝暴崩，秘不发丧，然后立其少子拓跋宗。拓跋宗既然被宗爱拥立，乃将军政大权委之于宗爱。宗爱权既重，便目空一切。拓跋宗深以为患，谋划夺其权，预谋又被宗爱闻知，宗爱再起杀机，拓跋宗又成为宗爱手下的死鬼。及殿中尚书源贺等拥立拓跋浚即位，宗爱遂遭夷三族的下场。

宦官最得势的唐代，确切地说是唐中晚期，宦官废立、杀戮皇帝不再成为稀罕事。宦官得力于手中掌握的禁卫、枢密之权，而能够做出这种“大逆”之事。皇帝把统领禁卫军权交给宦官，依据的是对宦官的信任。唐代自“安

史之乱”后，少数民族对中央政权的攻击经常发生，皇帝经常处于外患临头的境地，在患难中，宦官表现了对皇帝的忠诚。唐玄宗和太子避难，逃往蜀地的途中，服侍太子的宦官李静忠给太子献计，在灵武，力劝太子即位，于是肃宗遂不经玄宗禅位而自立为皇帝。肃宗感于李静忠的拥戴，改其名为李护国，后又改为李辅国。回京后，李辅国备受信赖，升为兵部尚书，职掌兵权。紧接着代宗时，吐蕃大举进攻唐都，代宗逃难，在华阴，受到宦官首领鱼朝恩领军奉迎。平定后，代宗命鱼朝恩掌神策军。继任的德宗反对宦官领军，委用士人掌禁卫军。然而德宗却受到后面发生的事实的教训。在一场军士叛乱中，德宗召集禁卫军，竟无一人前来。唯有宦官首领窦文场率宦官和一群亲王前来护卫，带领德宗逃往奉天，宦官的忠诚又一次在危难中展现，教育了皇帝。此后德宗将禁卫军权再度交与宦官，并且定为制度，设置左右神策军中尉、中护军官职。同时德宗还有一个重大的创制，就是委任宦官为枢密使，参掌机要。宰相奏事时，枢密使在场，宰相出去后，枢密使可以按皇帝的意图，发布诏书，改变诏书内容、或发布伪诏是不难的。

宦官自掌禁卫军和内廷机要权后，干政愈演愈烈。宦官与皇帝的关系发生了相应的转移，由奉承皇帝而得宠信，再借权逞威到以实力挟持皇帝，将皇帝控制。唐代有七个皇帝是由宦官拥立的，宪、敬二帝直接死于宦官的杀害，顺宗、文宗则死于幽愤。

唐顺宗试图夺回宦官的军权，未能成功，而自身患有严重的风疾，宦官迫使他禅位给太子，宪宗由此即位，顺宗次年死去。宪宗冀求长生而服用丹药，导致性情暴躁、动辄杀人。宦官首领害怕殃及自身，共谋杀害宪宗。宪宗被杀后，王守澄、陈弘志称皇帝服药致死，然后共立太子即位，是为穆宗。穆宗是个短命皇帝，继位的敬宗和穆宗一样，整日打猎、游乐，这一点符合宦官们的要求，但在动气杀人上却像宪宗，令宦官们身心不安。于是宦官们决定除掉这个皇帝，在一次夜宴时，敬宗喝得大醉，宦官扶他在内室更衣，宦官首领刘克明一举送敬宗归天。另一名大宦官王守澄未参与杀敬宗的行动，他带领另一支宦官力量，就在刘克明想扶立绛王为帝时，率禁军入宫，杀了刘克明等人，绛王同被杀害。然后王守澄立文宗即位。文宗有一定的智识，即位后试图扭转宦官专权的局面。他知道王守澄曾参与杀害宪宗，目前最得势，为了削弱王守澄的权势，文宗将另一名宦官仇士良升为左神策军中尉。在士人李训、郑注的谋划下，先鸩杀了王守澄。李、郑建议杀尽所有宦官，设了一计：称大明宫左金吾厅事后的石榴树上，夜里结了甘露，要宦官陪同皇帝前去观赏，预先在这周围埋伏甲士。然而仇士良等发觉了埋伏的甲士，立即挟持文宗，发禁卫军反扑，将外朝官员杀戮将尽一半。这一事件，史称“甘露之变”。

此后至唐朝灭亡，皇帝们多是宦官的傀儡。宦官首领俨然成了朝廷的主人。当年的鱼朝恩，擅权到有不经他裁决的事便怒道：“天下事有不由我乎！”至仇士良把持内廷，文宗心怀忧愤，却无可奈何。文宗末年曾与学士周墀有过这样的对话——文宗说：“你估量我算哪一类的君主？”周墀拜称：“臣不足以估量陛下，但天下人都说陛下是尧、舜式的君主。”文宗说：“我问你这种问题，是想与周赧王、汉献帝比较。”周墀惶恐，回禀：“陛下之德，成、康、文、景都不足与您比，怎能与上两个君主相比呢？”文宗痛心地说：“周赧王、汉献帝受制于强臣，我却受制于家奴，我自认为比他们还差得远呢！”随之泪流满面，周墀也伏地哭泣。且看文宗受制于家奴的情景：

仇士良、陈弘志等对文宗参预甘露之谋十分气愤，一天夜晚，他们矫皇帝之命召翰林学士崔慎由至秘殿，崔慎由进殿后，见仇士良坐在堂上，仇士良对他说，皇帝快不行了，要他拟写诏书，废文宗，另立皇帝。崔慎由大吃一惊，未想到会有这种事。他坚决表示，虽死也不奉命。仇士良等无话可说，沉默了一会儿，打开后门，引崔慎由进入小殿，文宗呆坐在那里。仇士良在文宗面前历数其过失，文宗只能屈辱地俯首认罪。

文宗死后，仇士良又立武宗即位。仇士良一生杀了两个亲王、一妃、四位宰相，自己老病而终。仇士良死后，宦官势力暂时压抑。继武宗之后的宣宗，本是武宗的叔叔，宦官们见他貌似痴人，便拥立为帝，然而宣宗并不傻，宦官势力继续受到抑制。唐末期皇帝寿命都不长，继而宦官首领王宗实拥立懿宗；刘行深、韩文约拥立僖宗；杨复恭、刘季述拥立昭宗。

僖宗时，田令孜专权，僖宗在其挟制下，意不得申，与左右之人言及田令孜，常常委屈得流涕。而杨复恭因拥立了昭宗，便把昭宗看作自己的门生。后来他被武臣所擒，送京师斩首，临死前恨皇帝不救他，斥为“负心门生”。刘季述任枢密使，矫诏以太子监国、废黜昭宗。刘季述带领太子入思政殿，路遇阻挡者皆杀。当刘季述带人闯宫来见昭宗时，昭宗正在乞巧楼，见来了一群气势汹汹的兵士，吓得坠落床下，企图逃跑，被刘季述抓住，硬按到座位上。刘季述手持银棍，在地上边划边数昭宗的罪状：“某时某事，你不从我言，其罪一也；……”一直数了数十条。然后将昭宗幽囚在东宫。在东宫，昭宗和后妃每天从一个小洞里领取食物，衣服则昼眼夜洗，哀声不断。不久，刘季述被另一伙势力杀死。武将朱全忠趁机发展势力，大杀宦官，拥立并挟持唐哀宗。之后，唐朝与宦官的运祚同亡于朱全忠。

唐亡后，宦官力量经历了数百年的落潮，至明代，宦官力量再度潮涌，然而较之唐代要弱一些。

六、奇异的个性

宦官是殿阶下、庭院中的仆役，这个人数众多、默默无闻的宦官群，与那些专宠、擅权、甚至做出“大逆不道”的事情来的宦官首领有着天壤之别，他们是真正的奴隶。

宦官一入宫，就要先认师父，然后是侍候师父，作为徒弟或养子的小宦官，每天要侍候师父洗脸、更衣，听候师父的指教。在师父的指导下，学习宫中的规矩，比如见到皇帝、太后、皇后，妃嫔，如何行礼，如何称呼；平时如何端茶、备膳、传旨；白天如何站班；晚上如何值更。

宦官中最低层的是终身洒扫、干力气活的人，在明代他们被称为“净军”。宦官入宫后都先由皇帝、太后、皇后们挑选为自己服务的奴仆，剩下的大概就是苦役宦官——净军了。净军们没有机会直接伺候主子，因此那些伺候主子的宦官就看不起他们，然而当伺候主子不周到或有较大闪失时，那些伺候主子的宦官就会降调到净军中。

宦官们经历阉割手术，成为没有生殖能力的男性，有人把他们算作第三性。其特征是面白无须、苍颜丰体，年纪较轻的宦官，形似女扮男装者，年老的宦官，则不堪端详。宦官的声音尖而调高，古代西方教会中，曾用阉割的男性充作女高音，明清时期的宦官也被用来唱戏。由于泌尿系统致残，宦官们多有尿裤子的毛病，从人们身旁走过时的腥臭气味令人恶心。汉代有位郎中令周仁，患有溺裤之疾，时常穿着带补钉的破衣服，被汉景帝当作宦官使用，出入皇帝的卧内。

宦官的性格表现为情绪不稳定，自我哀怜，很容易伤感或者气愤，心胸比较狭窄，爱耍心计，或者一副无赖相。然而宦官们大多心肠很软，颇具有同情心。关于宦官的心善，《旧京琐记》中讲了一个故事：清代为内廷置办果品的商人蒋某，借了许多宦官的例钱，长时间赊帐。一日某宦官上府讨债，蒋某赶快躲避，让家中女人出见。宦官一脸怒气地进屋，拍案声称今日若不还钱，必以性命相拼。女人待宦官气息稍平，端上茶来，然后诉苦、哭泣，说家中处境如何艰难，欠债太多，不如一死了之。宦官听着她的哭诉，被感动了，不禁随之落泪，边擦泪边婉言劝慰，最后说：“这真是不得了，我们多年的交谊，怎忍坐视？”从怀中掏出一把钱交给她，安慰道：“区区相助，度此数日，不要过于伤心。”女人收了钱，哭着道谢，其实心里在想，这一着又灵了。宦官走后，蒋氏商人笑着走出来，告诉该书的作者说，将近十年时间，他用这种方法将一个个讨债的宦官打发回去，均十分灵验。于是《旧京琐记》的作者叹息道：“这就是妇寺之仁吧？”寺，也是宦官的别称。

小宦官有时爱作弄人。光绪大婚时，上述的蒋某承办御果，九盘各摆九个金红大苹果，准备好后，准备端进去时，蒋某发现每盘都少了一个顶上的苹果，小太监邪着眼在一旁笑。蒋某似乎早料到会有这种情况，便从容地自怀中掏出九个苹果，一一安上，象这种打点不周而找麻烦的事情经常发生。

宦官们不会放过利用职权勒索钱财的机会。凡是掌管采购、置办工程材料的宦官，善于侵吞银两、以次充好；而那些掌管接收上贡物品的宦官，总爱找对方的麻烦，对方私下给他们一定数目的钱，事情就可完结，如果对方不明此理或者不愿填其欲壑，那么宦官也会想出令对方窘迫的方法，拖延、刁难，让对方完不了差。宦官们的积蓄就是这样得来的。其实得势的大宦官并不一定绞尽脑汁挖钱，钱就会到手，财源之一是皇帝的赏赐，之二是大臣

或攀附者的巨额馈赠。这就使众多的普通宦官望尘莫及了。

七、独特的生活

“白面内官无一事，隔花时听打球声。”年轻的太监们闲来无事时，喜欢赏花、唱曲。宦官们爱把花插在头上作为装饰，就连丑类如魏忠贤者，也爱戴花，夏天发髻上戴着茉莉、梔子花。明代宦官经常从外面购买奇花异卉，种在皇帝的辇路旁。当时的异花有红水仙、蛱蝶菊、番兰柿等。番兰柿即美人蕉。有宫词云：“春风香艳知多少，一树番兰分外红。”

清代宫中戏班子都由宦官组成，聪明、伶俐、相貌俊秀的小太监被选来演戏，他们学戏、唱戏，引得宦官们大多成了戏迷。有的小太监把演戏的作派移到生活中，平时出入不由得走着台步，还低声按拍，与人调笑，也借用戏曲中的词句，就连日常说话，褒贬事物都爱本着戏曲语言，十分有趣。

太监们每天站班或者干活，都小心翼翼，规规矩矩，不敢妄说、妄笑。在听候吩咐时，须全神贯注，恭耳聆听，不能让主人重复一遍，所以精神非常紧张。只有在晚上，各宫门都上了锁，那些不值更的太监们才可以放心地玩乐。宫词中描述说：“卫道严更鼓第三，重门深锁尽封函。中人许作逍遥戏，醉舞酣歌彻底潭。”

过节的时候，宦官们互相馈赠瓜果，以联络友情。重阳节前后，宦官们设宴相邀，叫做迎霜宴，吃兔肉。备宴时，宦官们喜欢陈列菊花，叠至数十层，望之如菊山。菊花五色绚烂，令宦官们心喜。

宦官大多信佛，相信因果报应，把自己当宦官看作出家。唐代凶神恶煞的李辅国似乎也是个佛教徒，身上常挂着念珠，不食荤血。明代颇有正义感的宦官兴安是一位坚定的佛教徒，临终前要求把自己的骸骨磨为粉，埋于佛寺。清代顺治朝，有位常与皇帝接近的宦官，名吴良辅，大概是通过吴良辅的影响，年轻的顺治皇帝对佛教开始感兴趣，并通过太监的介绍，与佛学大师相往还。吴良辅在顺治病重时，还举行了剃度仪式。不过，一般宦官对佛学未必有多深的修养，他们把信佛作为精神上的寄托，把自己与和尚并列，也是一种安慰，否则他们无法正视自己阉人的面目以及第三性的人格。

宦官在进入中年后，被允许收养假子。古人认为断子绝孙是人生的最大惩罚，所以宦官养子对他们也是一种安慰。唐代规定，宦官只能收养十岁以下的阉童作为假子。宋代规定，年满三十而无养父的宦官，始可收养一个小宦官为假子，还要登记在案。宋代有个宦官在外出时，掠劫民家小儿，致使其母抱儿投海。

宦官的养子并非都是阉儿，例如东汉大宦官曹腾收养了一个姓皇甫的男孩，取名曹嵩，曹嵩即是曹操之父。清末大太监多收养自家侄子，在宫外居住。因此徒弟和养子便分为两类。至于宦官养女则有赵高为之，其女婿阎乐为赵高的亲信。

并不是每个宦官成年后都有收养假子的能力，在宦官中要有一定的职位和财产，才可能为人之父。大宦官很重视收养假子，有了假子就有了财产继承人，有了为他尽孝、守制、祭把袭爵的人，不怕在死后成为野鬼孤魂了。

普通宦官在宫中受到的是非人待遇，他们每天在主子面前陪着笑脸、讨好，而不能有自己真实的喜怒哀乐。委屈、怨怒不能表现出来，对屈辱还要表现出乐意承受的样子。他们是各级主人和大太监寻开心的对象。皇帝有时高兴了，洒地上一些小钱，让太监们争相拾取，这就是恩赐，一个个还要谢恩。主人有时让他们学猫、狗叫，为了让主人开心，他们有时主动学猫、狗

叫，甚至装成畜牲模样。明建文帝一次进膳时，太监吴诚在旁执酒伺候，建文正吃着小鹅，一片肉掉在了地上，吴亮不及把酒壶放下，就学着狗的姿势，把地上那片肉舔着吃了。这件事令心慈的建文帝有些感动，多年后他还记得这个场面。

宦官们地位低贱，动辄得罪，其实很多情况属于主人拿他们出气。主人动怒时，宦官们就如临深渊了。走路稍快、或动作稍慢、表情难看、眼睛看错地方都会成为挨打的原因。打人的板、杖经常备在一边。挨打的太监被其他太监按在地上，边打边有太监在旁喊数，挨打者不许默不作声，要服罪，讨饶，打完后，还要被架到主人面前，伏地“谢恩”。明代魏忠贤指挥下的东厂，发明了一种刑杖，头粗尾细，头上刻着“寿”字。这种杖打在冬瓜上，瓜烂而皮完好，打在人身上，则肉烂而皮不裂。清代继承了这种刑具并加以革新，杖的中部灌以铅，技高一筹。被打的太监经不过十杖就会死。清末自戊戌至慈禧末年，用这种杖打死的太监达到百余人。

明代规定，犯有过失的太监，按其职位和过失轻重，或遣出宫闲住、或降为普通宦官、或发往孝陵司香、或充净军、或到孝陵种菜，或上刑后发往南海子（京内苑囿）打更。

明宫中的更鼓房，是有罪宦官干活的地方。每夜有五名宦官轮流到玄武门（清代改称神武门）楼打更。自起更三点起，到五更三点止，按数目用藤条击鼓、用檀木榔头击铜铸的大云板。每更由一人上楼，不许提灯，如若风雨之夜，天空漆黑，摸索着上楼打更，真是苦不堪言。如果有差误，就要受到处罚。

清代有过失的太监，或发往打牲乌拉为奴，或到黑龙江给官兵为奴。有的被交付内务府总管，用九条链锁身。罚款应属较轻的处罚，罚月银四个月或六个月。

年老、有病的宦官，便走上了生命的末途，境遇十分凄凉。明代年老太监不允许回到民间，怕泄露宫中秘事，他们退居到京城内外的寺庙，每日烧香，宫中供给他们柴米、冬衣、鞋子，以终天年。在北安门里的安乐堂，是安置有病宦官的地方，他们在此接受医治，病好后可以回宫继续供职。如病故，则有负责送终的宦官料理后事，送棺材出北安门，到西直门关外的净乐堂焚化。净乐堂有数名宦官负责管理。宦官和宫女们没有亲属的，焚化后，骨灰都存放在塔下的罍井中。

稍有些积蓄的宦官，年老时都要盘算好后事，他们捐资摆酒，成立老衣会、棺木会、寿地会，念经殡葬，备好死葬的排场。清代北京南郊有一片二百多亩的土地，被用来建立寺庙，专供太监们养老，不过先要交纳一定数量的银子，才可获准到这里养老，死后便葬在这里。

八、宦官的配偶

宦官都是经过阉割手术后入宫的，然而古代却发现他们的生理外貌并不划一，有个别宦官显示出不似阉人的特征。如北宋宦官首领童贯，状貌魁梧，骨骼钢劲，颌下还生有数十根胡须。明代宦官、《酌中志》的作者刘若愚也长着胡子，颇觉得意。宦官一般性格懦弱，气力不足，而有的宦官如唐朝的杨思勰，却膂力过人而残忍好杀，甚至以残杀为乐事：将囚犯生剥面皮，或把头发割掉，连头皮一起剥下来。玄宗命他杀了受贿的宦官牛仙童，他竟将其挖心，截断手足，割肉吞吃。宦官中有膂力的也不少，宋代某些监军的宦官，亲临沙场，俨然一名勇将，如宦官怀岳，常持大铁鞭上阵，身中流矢多处，秦翰也倜傥有武力，参加过多次战斗，身上有四十九处伤。

史书上记载着一名宦官复原的事情。东汉顺帝时，有位黄门令栾巴，其人品性正真，博览经典，从不把自己归为宦者之列，不与其他宦官往来。后来他发现自己阳气畅通，上书皇帝要求退出掖廷。后来，栾巴娶妻生子，其子栾贺，官至云中太守。

然而史书上并没有说栾巴入宫前受过宫刑，估计他和汉景帝时的周仁一样，患生殖系统的疾病而充作宦官，到内廷服务的，他们根本不把自己认同于阉人。

因此历史上并没有真正的宦官复原为男性的事实。然而古人的观念就是把“阳气不通”的男性当作阉人，同时把宦官看作没有生育能力的男性。古人的两极观念很强，非男即女，非女即男，而从不把宦官分出来作为第三性。男性一般被尊称为“某公”，而宦官则被尊称为“老公”、“公公”（清代变为贬意），看来把宦官归为男性是不成问题的。

既然如此，古人就不必追究宦官男性化的程度了，长胡须的宦官不仅不惶恐，反而得意洋洋。

宦官虽然失去了作为男性的重要器官，但仍有程度不同的性意识。从医学上讲，人的性意识受到早在胎儿时期就已形成的脑组织的支配，即使在婴儿时作了换性手术，其原来的性意识在成年后仍有遗存。

自古宦官就有娶妻之例。西汉大宦官石显就有妻室，石显被贬后与妻子回乡。石显是少年时受腐刑入宫的，娶妻当然在入宫以后。东汉宦官单超等，立功封侯，势力大张，抢娶良家美女为姬妾，还把这些姬妾妆饰华美得如同宫眷。北魏宦官大多有配偶，如张宗之纳萧氏为妻，萧氏本是南朝宋大臣殷孝祖之妻；抱疑的妻子姓张；王遇也有妻子。唐代最有名的宦官高力士娶吕元晤之女为妻，吕氏容貌俊美，举止娴雅，然而中年病故，高力士没有续娶。李辅国由唐肃宗作媒，娶元擢的女儿、即元载的从妹为妻。唐后期的宦官妻子还有荣衔，如刘宏规妻李氏，被封为密国夫人，马存亮妻王氏，封岐国夫人。

宋代宦官首领也有妻室。梁惟简有妻，从下则史料中得出：宋神宗病重时，皇太后对梁说，令你新妇做一领黄袍，十岁来孩儿着得者。即是皇太后打算立神宗九岁的儿子赵煦继位。宋徽宗时，大宦官梁师成权倾内外，其妻死时，大臣苏叔党、范温竟穿着孝服前来哭丧。

明太祖曾规定，凡宦官娶妻，则受剥皮之刑。此禁例是否遵守由后世各个皇帝决定，明英宗十分宽容，大太监吴诚不仅有妻而且有妾，吴诚在土木堡事件中阵亡。景泰年间其妾姚氏上奏，言吴诚生前曾在香山置坟，现请求

将吴所遗衣冠招魂安葬，景帝批准了。宪宗时，太监龙闰娶方英之妻为妻，宪宗命他们离异。

宦官娶妻，是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需要。宦官既然有男性意识也会有性需要，情欲的强弱可能各不相同，然而心理上的需要应是相同的，宦官无不想被人视为正常的男人，无不想证明自己的男人本色，娶妻正是他不次于正常男人的外在证明，让人忽略他曾受过阉刑。元代有位宦官赵伯颜不花，本是契丹才子，受刑入宫前已经娶妻，后来把妻子接入宫中，继续生活在一起。史书上说他不舍其妻，估计其妻也不愿离开他，可见他们夫妻间的恩情不以丈夫受阉刑而泯。这又另当别论。

性的需要是宦官寻配偶的内在动力。历代不乏得势的宦官抢掠民家妻女的事，他们以此为乐。如东汉宦官侯览到民间虏夺民女为己有，恶名昭彰。明初河南按察使曾微行民间，闻一家悲哭之声，前去探询，得知该家的女儿被宦官逼奸而死，这种逼奸完全是凶徒式的残害。明英宗朝镇守大同的宦官韦力转，强求某军官的妻妇与其奸宿，对方不从，韦力转就乱杖打死了该军官。然后韦力转又与养子之妻淫戏，被养子发现，韦力转竟将他射杀，又强娶部下的女儿为妾。明代宦官不乏冒死罪娶妻者，冀求皇帝得知后宽饶，英宗性情宽忍，连韦力转都饶恕了，而世宗则将畜使女的宦官侯章置之极刑。

北魏时有宦官高菩萨，与孝文帝冯皇后私通，人们怀疑高菩萨不是阉人。孝文帝得知后，亲自审讯了高、冯，严格调查此案，但并没有得出高并非阉人的结论。孝文帝在审冯皇后时说：“汝有妖术，可具言之。”试想，如果查出高菩萨不是阉人，与秦朝的嫪毐同类，那么孝文帝就不会说冯皇后有妖术了。熟读史书的孝文帝大概知道汉武帝的陈皇后挟妇人媚道之事。陈阿娇被武帝疏远后，寂寞难耐，令女巫穿男子衣冠，与她同寝居如夫妇般。这种女而男淫便是妖术。史书中没有说明高菩萨被处以何种刑罚，大概孝文帝认为冯皇后的罪更重。由此或可以推知，被阉后的男性仍具有性能力，但不知其详。

高力士在幼童时被阉割，当然不会是假宦官。如果说正式娶妻尚不能说明性需要的问题，而私通应能说明问题。当时宰相裴光廷娶武三思之女为妻，此女后来成为高力士的情妇。下面的事例更能说明问题：元顺帝时的宦官罕失有一妻一妾，妻妾相妒恨，被妒火烧得疯狂的妾，杀了其妻，还剁成肉酱饲给家犬。

宦官们的淫戏对象常是妓女。宋宦官林亿年告老休致后，养娼女以营利，传出艳闻，另一个宦官陈源因过失被贬，在贬所与妓女淫乱。林、陈的事迹传布以后，人们怀疑他们不是真宦官，这又是误会了宦官的能力。明代宦官有的与娼妓交好，然后娶为己妇。当时京都有些下层妇女与宦官相往还，甚至有弃其夫而跟随宦官的。万历年间曾有这样一例事：禁中查出了一个女扮男装者，经问讯，知是该女与某宦官私通已久，而宦官不交纳夜合资，躲进宫中不出，该女遂决定身着男装，闯入宫中找宦官索钱。至于宦官因争风吃醋而斗殴，也非稀罕事。

明熹宗的乳妈客氏是个淫荡的妇女，她可以作为宦官性能力的验证人。客氏是与宦官首领魏朝交好，后来听说魏忠贤能力比魏朝强，又和魏忠贤寻欢。客氏把二魏都当作情夫，致使二魏相敌视，本来魏忠贤属于魏朝名下。一天夜晚，二魏在乾清暖阁为争宠而殴斗，响声惊醒了已入睡的熹宗。客氏和二魏到熹宗面前说明情况，熹宗没有生气，对客氏说：“客奶只说心里要

谁管事，我替你断。”客氏示意倾向于魏忠贤，熹宗乃将魏忠贤判给客氏。魏朝不久发落到宫外苑囿。客氏与魏忠贤奸情甚浓，由于客氏帮忙，本不识字魏忠贤当上了司礼监秉笔太监。明廷严格规定，司礼监秉笔太监应从内书房出身的经通文理的太监中选任。

宦官首领权力炙手可热，为所欲为，近乎无所不能，唯一缺的就是阉物不能复生，他们四处探寻复生的办法。到福建办税收的宦官高 宰，听术士说童男的脑髓吃了管用，便出巨额购买童男的脑髓，杀手们赚了钱，而不知其数的无辜儿童死在刀下。魏忠贤听说这种“药方”后，也杀了七各囚犯，狼吞了他们的脑髓。古人在讨论宦官的淫行时，对他们生殖器官复苏的可能作过推测，认为在旧的伤口上多年后会生长出新的组织。但未闻哪个宦官被验证出来，而宦官们使用假阳具倒有确证。明武宗时大太监刘瑾曾用假阳具淫死过宫女，万历时有个宦官也用此法，把一个卖艺的女孩弄死，被官府杀头抵罪。

“早寒天气换吴绫，月下针楼袖半凭。

相约今宵西苑去，金鳌桥上看河灯。”

此宫词是说一个宫女在月下等约会他的宦官，七月十五日是中元节，他们相约去河上看灯。明宫中，普通宦官和宫女自愿结成配偶，叫“对食”。“对食”一词最早出现在西汉，是指宫女之间私下结偶。明代宫中宦官十多万，宫女近万人，这种结偶现象无法不出现。普通宦官无资格正式娶妻，而宫女被皇帝看中的可能性极小，宦官和宫女相匹配就自然而然了。

开始时，直房宦官与司房宫女接近的机会较多，逐渐产生了情意，结为伴侣，又有负责替宫女造办食物、衣物、首饰的宦官，追慕宫女、大献殷勤，被人称为“菜户”。他们对所爱的宫女任劳任怨，为之驱使，甚至不愿再供养宫外的父母兄弟，久之“菜户”成了宫女对象的代用词，开始别的宦官斥责“菜户”们没有骨气，后来宦官们都争当“菜户”和宫女“对食”。

据说宫女们十分懒惰，她们整日无所事事，只有闲散和闲愁，有了“菜户”，她们就等于有了佣人，许多“菜户”并不是宫女的意中人，如果被宫女看上，就不会再让他干太多的活儿，而另雇别人去干。地位最低贱加上貌丑年岁大的宦官不可能被宫女看上，他们甘心做宫女的仆役，为之执炊、扫除、浆洗，宫女每月付给他三五两银子，他们穿着窄袖衣，衣上有油渍，背着菜筐。在宫中，近侍太监因直房靠近皇帝的寝宫，怕引起火灾而不能在宫中设炊，而宫女则在宫中有炊室，她们争相雇用善烹饪的宦官，这种人被其他宦官称为“镞匠”，不知何意。

宦官和宫女“对食”，在明中期处于地下状态，他们对此事十分隐讳。到万历朝发展到公开。如果一个宫女久无配偶，其他宫女就会笑她为弃物。又有好事者做“对食”的媒人。“对食”的双方，有的在星前月下彼此誓盟，终生不再和他人相爱，宦官若和有了配偶的宫女偷情，被其夫发现，便会引起一场冲突，不过宦官们在此事上不会凶恶杀人。有这样一件真实的事情：宫女吴赞女，与宦官宋保相爱已久，后来她又和张进朝结好，宋保不胜愤恨，万念俱灰，出宫为僧不返。宦官们给予他很高的评价。宫女与宦官以守节相尚，如其中一方死后，另一方终身不再选配，便被周围人敬重而津津称道。

从记载中可以发现宦官很看重与宫女的感情，感情深而持久。这大概是他们人生的唯一寄托。万历时人沈德符曾在一个寺庙读书，发现寺中有一间紧锁的小屋，是宦官用来祭祀宫女的地方，屋中摆放着已殁的宫女的牌位。

一天有位宦官前来致奠自己的女伴，捶胸顿足、恸哭不已，竟感动了在旁的沈德符，他认为这种深挚的情感比民间伉俪尚有过之。

若是宦官不顾宫女不从，强与宫女结好者，被称为“白浪子”，浪子是无赖的同义词。而白，是宦官的代称。一个中元节之夜，某宫女从外归来，过大高玄殿时，一老宦官见宫女貌美，动了淫念，把宫女诱至石查傍逼淫。该宫女本有配偶，事后控诉了老宦官的罪行。

年轻而貌美的宦官是其群体中的宠儿，得到大家的爱怜。明熹宗时有位叫高永寿的“御前牌子”，其人丹唇鲜眸，姣好如处女，宦官们都称他为“高小姐”。凡宴饮时，众宦官都对他献殷勤，如果他不参加，大家都没有兴致。后来高永寿与另一宦官陪熹宗在太液池荡舟，风起船翻，熹宗被救起，高永寿却被淹死。“红颜薄命”，高小姐之死令宦官们大为痛惜，以后，宦官们游西苑，常常追怀他的音容笑貌。这也是人间的一种正常情感。

九、皇帝的幸臣

中国皇帝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只要能够做到。不少皇帝对男色感兴趣，但没有一个皇帝是专一的同性恋者，玩弄男色不过是他们的业余爱好。皇帝的男宠包括美男和宦官两类。

西汉的皇帝大多有恋男色的癖好。《汉书》中说，汉高祖刘邦有男宠名籍孺，汉惠帝的男宠叫闾孺，他们“以婉媚贵幸”，与皇帝同卧起，受到公卿百官的巴结奉承。然而在《史记·酈生陆贾列传》中，闾籍孺是一个人，平原君对闾籍孺说：“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闻。……”请他出面向惠帝说情，惠帝果真听了闾籍孺的话。由于内臣都知道惠帝喜欢男色，便争相打扮自己，冠上装饰美丽的羽毛，用海贝装饰衣带，还涂抹脂粉。

孝文帝时有位邓通善划船，在内廷当了一名黄头郎——给皇帝划船者都戴黄帽。孝文帝做过一个白日梦，梦中欲升腾上天，但腾不起来，身后一位黄头郎把他推了上去，孝文帝回头看见黄头郎臂后的衣服划破了。梦醒后，孝文帝来到未央殿西的苍池边，让黄头郎划船上渐台，他打量着几位黄头郎，发现其中一位与梦中的一样也划破了衣服。问其姓名，黄头郎答称姓邓名通。孝文帝寻思，邓与登同音，于是甚喜，召邓通到自己身边服侍。

邓通性格内向，不愿与外臣来往。文帝经常私下到宫外邓通的家中游戏，邓通没有什么技能，也不太会讲话，只是在一旁恭谨地以媚态侍奉皇帝，所以文帝更喜欢他。孝文帝赐给他数十万计的金钱，后来相术师却说邓通终将贫饿而死，文帝不相信，乃赐给邓通一座铜山，让他开矿铸钱，于是邓氏钱遍天下，富贵无人能比。

一次宰相申屠嘉进见皇帝，见邓通在殿上对他毫无礼敬之态。申屠嘉认为他破坏朝廷礼制，大怒回府。然后在相府传檄召邓通问罪，不来则斩。邓通惶恐，向孝文帝求救，文帝心爱宠臣，但又不愿妨碍宰相执法，劝邓通去受审，不过答应派个使者替他求情。邓通来到相府，免了冠、光着脚，磕头向宰相谢罪。申屠嘉毫不留情，斥责道：“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戏殿上，大不敬，斩！”邓通吓得不断磕头求饶，血溅了一地，这时文帝的使者刚到，传文帝的话说：“这是我的弄臣，留下他吧。”这才免了邓通一死。皇帝的宠臣除了皇帝喜欢外，人人都恨，所以下场都很悲惨。

一次文帝生疮发脓，邓通多次用嘴为他吸脓，毫无难色。在邓通吸吮他的疮口时，孝文帝颇有些伤感，问邓通：“天下谁最爱我者乎？”邓通答：“当然无人比得上太子。”于是孝文帝召太子入宫，命太子给他吸脓，太子面露难色，还是勉强为之。听父皇说邓通已经吮过疮，太子心中惭愧，怕由此影响父皇对自己的看法，便恨上了邓通。景帝即位后，邓通果然贫饿而死。

在恋邓通的同时，孝文帝的男宠还有宦官赵谈、北宫伯子，但都比不上邓通得宠。

汉武帝是个雄武而多情的皇帝，也继承了祖上同性恋的癖好。某侯之孙韩嫣，自幼就与武帝相处，产生情意。当了太子后，武帝对韩嫣的感情更深，韩嫣很聪慧，善于骑射，与武帝的爱好颇一致。武帝即位后，与韩嫣同睡一床。

一次江都王入朝，武帝邀他一起打猎。江都王先到了上林苑，武帝尚未出宫，先令韩嫣乘天子车驾，率近百名骑手前来观测猎情，而江都王见天子车驾驰来，忙让路，伏在道旁，韩嫣驱驰而过如若无人。江都王发现自己受

辱，不胜气愤，到太后处哭诉此事。太后由此衔恨于韩嫣。

韩嫣比不上邓通谨慎，他得宠后放肆，经常出入宫女住所永巷，奸声传出，武帝未发怒，而太后已经怒不可遏，下令赐韩嫣死。武帝为他求情，太后执意不允，韩嫣遂命归黄泉。

韩嫣的弟弟韩说，也是武帝的幸臣。

李延年是当时的一流音乐家，受宫刑为宦官后，武帝不仅让他作曲、弹唱，还经常把他引入卧内。李延年之妹李夫人也受宠于武帝，也许是李延年想摆脱侍寝的任务，引荐了妹妹给武帝，或者兄妹二人同时受用于武帝？

李延年也没有得到好下场，他的弟弟李季借兄姐之宠，也入宫骄恣无法，淫乱武帝的宫女。武帝一气把李延年兄弟宗族杀光。

武帝的男宠之多竟包括卫青、霍去病，这大概和他的个性有关，对自己亲信的内臣加以亲昵，不讲礼节，不分彼此，例如武帝时常一边蹲厕一边同卫青谈话。

汉成帝姑姑的儿子张放也常有侍寝的任务。后来在太后的迫令下，张放离开皇宫，成帝与他泣别。

西汉最后一位以色得宠的男子是董贤，其宠遇过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位男宠，迷于同性恋的汉哀帝竟想把江山送给董贤。

哀帝做太子时，董贤因父亲的关系当了太子舍人。一次董贤在殿下报告时辰，哀帝这时已经即位，在这之前他一直没有注意过他的太子舍人，现在他发现这位男子容貌极美，召董贤过来谈话，极为投合，董贤便由此得幸。

董贤受宠而升职，由黄门郎升为附马都尉侍中，后又封为高安侯，不久又代替哀帝的舅父当上了大司马卫将军，领尚书事，百官都要向他奏事，当时董贤只有二十二岁。匈奴单于来朝，见董贤年轻而位于群臣之上，不解，哀帝命译者告知：“大司马年少，以大贤居位。”单于起身拜哀帝，祝贺汉得贤臣。

董贤性情柔和恭顺，在哀帝前善用媚法。自得宠后，君臣二人几乎形影不离，除夜间同眠外，还经常昼寝。一次昼寝时，哀帝准备起身下床，而董贤还在梦中，哀帝的袖子被他压在身下，哀帝不忍惊醒他，便用刀割断那截袖子。

董贤也不是单一的同性恋者，他有妻室，哀帝对董贤之妻也很照顾，允许其妻入宫看望董贤，而董贤之妹被哀帝纳为昭仪，仅次于皇后，因此陪侍哀帝的就成了三人：董贤夫妇、董昭仪。哀帝还赐给昭仪及董贤妻不少金钱，自然董贤的父亲也蒙恩大贵了。

除赐给巨额金钱外，哀帝述命将作大匠率百工为董贤大造宅第，重殿洞门，木土之功穷极技巧，柱槛用绵绵为衣。连董贤的家仆都受到厚赐，给董贤的赐物难以数计。董贤败亡时其家中查出财产四十三万两。这还不足以表达哀帝对董贤的宠爱。一次宴饮中，哀帝从容地面对董贤，亲切地说：“我想效法尧禅位给舜的先例，将皇位禅让与你，如何？”中常侍王闳当即进谏：“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庙，当传子孙于无穷。统业至重，天子亡戏言！”哀帝默然不快，在场的人都十分恐慌。禅让的事便不了了之。

哀帝死后，董贤被辅政的王莽问罪，自杀。王莽疑其假死，竟发棺裸验其尸。

东汉只有和帝有幸人吉成，其他皇帝似乎无暇顾及男色。

以投鞭断流而豪迈一时、终以淝水之战败落的前秦君主苻坚，也有一段迷恋男色的经历。当年苻坚打败了前燕，俘获了其君主慕容暐，慕容暐有一对小儿女，姿色惊人，也在俘虏群中。姐姐清河公主年方十四，弟弟慕容冲年十二，都被苻坚看中。姐弟在苻坚身边专宠承幸，苻坚对慕容冲的情意决不亚于对其姐。久之，连长安城中的百姓都知道了此事，于是一首讽刺歌谣流传开来：“一雌一雄，双飞入紫宫。”辅臣王猛对君主此行很气愤，痛切地责备了苻坚，苻坚只得忍痛把慕容冲送出宫外，把他安置在阿房宫旧地阿城。慕容冲小名凤凰，传说凤凰棲于梧桐，以竹果为食，苻坚命人移植了千株梧桐和竹子于阿城，供他爱恋的“凤凰”居住。

慕容冲虽少年时充当苻坚的男妾，但长大后性情毒暴，其父被苻坚杀害后，慕容冲率旧部自立为帝，在苻坚淝水败后，攻入了长安，在长安纵兵大掠，死者不可胜计。

至于残忍淫毒的北齐文宣帝高洋，也忘不了玩弄男色的游戏，他见彭城王容貌俊秀，就把他召入后宫，为他递去胡须，涂上粉黛，充作嫔御。

明清两代，社会上男性同性恋的风气很盛，有闲阶层对此颇有兴致。皇帝的兴致略逊于公卿贵族，而皇帝中也有佼佼者，如明武宗、神宗。

明武宗初即位，就从宦官中挑选俊秀者加以恩宠，称他们为“老儿当”，其实都是些年少的宦官，后来又有“金钢老儿当”。武宗到南方游幸时，在大臣杨一清家，注意杨家有位歌童，面白清秀，武宗问他的名字，歌童答称：“杨芝”。武宗色迷迷地说：“赐你叫羊脂玉。”爱而不舍，遂带羊脂玉从驾北上。当时杨芝的未婚妻之父宋闰，因人命案在押于常州府狱，巡按御史李东得知武宗宠幸“羊脂玉”后，立即传命常州知府李嵩，释放宋闰归家。

皇帝对于玩物本来就不当一回事，过后辄忘。一次武宗游宣府，也喜欢上了一名男艺人，武宗问他叫什么名字，左右答称他叫“头上白”，是别人为他起的浑名，武宗颇觉好笑，便戏言：“头既白，不知腰间亦白否？”在旁的宦官们以为皇帝要把他召入内廷进幸，武宗出去后，宦官们立即将他阉割。然而武宗游戏的活动过多，竟忘了此事，日后没有传召此歌童。

明神宗对男色偶有留心，曾选十余名聪慧、美貌的小宦官，或贴身服侍，或承恩于帷幄，内廷人称他们为“十俊”。后来这些人侍宠而嚣张，与人勾结，营私谋利，神宗发现后毫不留情，一一杖杀，数年后“十俊”无一生存。一旦皇帝失去兴趣，珍金也会变成尘埃，宠物变成弃物，不一定等到宠物犯大的过失再抛弃，所以神宗杖杀“十俊”也不必称之为英明。

后来明神宗在驾幸天寿山的途中，又看上了一个年少美丰姿的扈驾军官，为此在途中停宿数日，事后该军官遭到同僚的讪笑，他自己也羞愧不愿见人。

第七章 宫中服饰化妆生活器用和饮膳

一、皇帝的服饰

礼仪之邦的古中国，礼仪的繁密主要是由朝廷、皇家展现出来的，尤以围绕皇帝的一切事务礼仪最繁密。皇帝在何种场合穿何种衣服，都有礼仪上的正式规定。每个新建立的朝代都要重新制定本朝的舆服制度，规定服色（即以何种颜色为尊）。人们印象中的皇帝形象，都是头戴旒冕的庄重模样，其实那种妨碍视线、左顾右盼就要敲脑袋的沉东西皇帝最不喜欢戴，在平日和后宫燕居时，皇帝自然不会戴那个累赘物。所以皇帝的服饰大致可分为礼服与常服。

皇帝的服饰是由饱读经史的文臣们去规定和解释的，中国古来的舆服制度卷帙浩繁，有时又语焉不详，皇帝无暇对此作全面的研究。因此皇帝在服饰问题上常常感到困惑，例如唐高祖曾向令狐德棻提问：丈夫冠、妇人髻都那么高耸是为什么？令狐德棻答称：冠、髻都在头顶，象征君主。晋代将亡时君弱臣强，因此江左的女子也上衣短而下裳长。宋武帝登位后，君主的尊严重振，人们的衣裳就随之改过来了。这是前一段历史的验证。把冠服与国家兴亡联系在一起是古人常有的思想方法，因此更使冠服制度意义重大了，也更令人难以索解。

为了使国家永远昌盛、自己的地位永远安稳，后世的君主无不想穿上尧、舜的冠服，但又不知是什么样。周成王就问过周公：“舜戴的是什么冠？”周公回答得很玄妙，但仍未说出舜冠究竟是何种结构。同样的问题由鲁哀公向孔子提问，孔子答不上来，却说：“舜之为君好生恶杀，任贤授能，您不问这些却问冠，所以不予回答。”后来鲁哀公又见孔子，注意到孔子穿的衣服，问：“夫子穿的衣服就是儒服吧？”孔子又答非所问。古人常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垂何种衣裳不得而知。

皇帝的服饰，头上的种类有：冕、冠、弁、帻、帽、巾、纓、簪；身上着袞、袍、中衣、单衣、裘、衫、裳、裤褶等种类，装饰着带、佩；脚上是舄、靴、履、袜。

冕是皇帝最重要的礼冠。冕的规定形状是前圆后方，前低后高，作俯视图，前后各有十二旒。早期的冕长六寸、宽六寸，到东汉明帝时更定为长一尺二寸、宽七寸，成为长方形。东汉冕上呈黑色，里裹朱色，以白玉珠为旒，悬彩色的组纓。皇帝在戴冕时，要头戴玉簪，还要以黄主纒（黄色的丝棉）塞耳，以防听到非礼之语。唐代的冕根据不同场合之用分为几种，最大的一种冕长二尺四寸、宽一尺二寸。宋代初沿唐制，后更定冕统一为长一尺六寸、宽八寸，顶上是用青罗绘制龙麟图案，里面用红罗绘紫云白鹤。明代又将冕规定为前圆后方，旒珠用五彩玉。清代皇帝不再戴冕。

冕通常和袞服一起用，合称袞冕，和大裘配用称大裘冕。

袞冕用于祭庙、登基、纳皇后、元旦受贺时穿用。唐代还包括战事遣将及征还时用。

裘冕，一般在祭天时穿用。东汉用于祭上帝。唐代裘和无旒的冕配用祭天地。宋代在袞冕和裘冕的用途上大臣们进行过激烈的争论，有的认为祭天在冬季可取裘冕，而祭地在夏季则应服袞冕，有的认为裘不如袞庄重，裘应罩在袞服里面祭天。

袞服为玄衣衿裳，衿是绛色，即上黑下红。袞服上绣着十二章纹。关于十二章纹，唐宋规定为上衣有：日、月、星辰、山、龙、华虫、火、宗彝；

裳有：藻、粉米、黼、黻。明代规定，上衣：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六章；裳：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章。十二章纹的意义是：日月星辰，取其照临；山，取其稳重；龙，取其应变，华虫（雉鸟），取其洁净；火，取其光明；粉米，取其滋养；黼为斧形，取其决断；为亚形或两兽相背形，取其明辨。清代皇帝的袞服上绣着五爪正面金龙四团，两肩前后各一围团，还绣有日、月、万寿篆文及五色云。龙袍上绣金龙九个，十二章纹及五色云，下幅是八宝和水波纹。

袞冕、裘冕以外，还有次一级的重要礼服用于礼仪场合下穿，唐代规定有 毳冕、毳冕、绣冕、玄冕。

皇帝最重要的礼服称作祭服，袞冕、裘冕就是祭服，次于祭服的称朝服、常服和杂服，后三种服基本归为常服，与礼服相对应。

冠通天冠是皇帝冬至受朝贺到平日上朝和燕居时所戴，既用于礼节又用于平日。不过，皇帝在后宫燕居时多不戴冠，例如汉武帝在内廷头上仅带簪子与丞相公孙弘谈话。通天冠的形制是高九寸，正面竖立，前面是展簷，顶部向后倾斜，后有一个铁卷梁。唐宋时冠高一尺，冠上卷梁二十四道，梁宽一尺。为了更加美观，施以珠翠，用玉、犀簪横贯于冠，后面垂着黑巾（黑介帻）。

刘邦在民间时，曾用竹皮做过一种冠，自己戴用，称为刘氏冠。即位后，刘氏冠地位提高。刘邦的后代在祭祀时才用此冠。

唐太宗也发明了一种冠，叫做翼善冠，在朔望（初一、十五）上朝时服用。

弁的形状是长七寸，高四寸，如倒置的杯子，前部高而宽，后部低而尖，如两手相合状。皇帝服用的弁多为鹿皮制成，叫做皮弁。东汉皇帝在辟雍行大射礼时服用。唐代皇帝在每月初一上朝时戴皮弁，在讲武、出征和阅兵、大射等活动时戴武弁。明代皮弁蒙上了一层乌纱，前后十二缝每缝缀五彩玉一颗；武弁为赤色，也缀以五彩玉。

帽帽是由有帻的冠和弁发展来的。曹操时天下凶荒，为节缩开支，他设计了一种简易的武弁，按照古代皮弁式样，用缣帛制成帽。曹操常戴着此帽召见属下，当时被认为有失威严。后来南朝的皇帝多爱戴这种帽。南朝皇帝在宴会和私下常服用白色的帽，用白帽制成。估计与南方气温较高有关。流传下来的梁武帝画像中，梁武帝戴的就是白帽。不过在古人观念里，白色是丧服专用颜色，因而是不祥的，可见南朝皇帝十分开明。

冕、冠戴在头上的功能是笼制头发的，发簪从冠、冕中部穿过。而帽则覆盖整个头，较为美观，特别是那些中年秃发的皇帝更需要戴帽。王莽当年为了掩盖秃顶就用帻在头上做了个屋状。所以帽子出现后越来越受欢迎。清代的皇帝帽子有吉服冠、常服冠、行服冠三个等次，内分暖帽、凉帽。吉服冠中的暖帽用海龙、薰貂、紫貂制成；凉帽用玉草、藤竹丝制成，里面是红纱绸，顶上缀朱纬、衔大珍珠一个。常服冠的顶部是个红绒结。行服冠的暖帽用黑狐或黑羊皮制成，凉帽顶部是黄色，前缀一珍珠。

下雨时皇帝戴笠状的雨帽，清代叫雨冠。分冬夏两种，冬用的雨帽顶高，前沿深，夏用的雨帽顶平，前沿敞。两冠都用明黄色，制作材料是里面为缎子，外面用毡及油绸（冬用）、羽缎（夏用）。

幞头幞头是从北周兴起的，又称折上巾、软裹。折上巾本是北方民族为便于骑射所戴，北周武帝作为皇帝首先戴幞头，与士庶同样。隋文帝受禅让

登基后，上朝时也戴幞头，与群臣相同。北方战火不断，胡服包括幞头简易自如，被广大中原士庶所接受，皇帝也未能免俗。其实幞头与汉末流行的巾有继承性，幞头是用一幅黑巾向后把头发笼住，脑后垂两个巾角，另两个巾角折上去。唐太宗发明的翼善冠与幞头很相似，后来直接取用了幞头。今人能够见到的唐太宗像和《步辇图》中的唐太宗，都头戴幞头。

幞头是临时裹上的，可以裹得松一些也可紧一些，形状平或高或前后倾，随着流行样式而变化。人们在裹幞头前，先在头上加一个巾子，后来在巾子中包上桐木作的固体形状物，裹上幞头就显得高而整齐。

唐中期以后，皇帝开始把幞头的两个软角变成硬角，两角或圆或阔，用丝弦为骨，便翘起。唐末兵荒马乱，为了节省裹幞头的时间以应付紧急情况，宫中改革了幞头的形制和戴法，裹头部分用木制材料包成一团，外层是原来的黑纱幞中，内层是纸绢做的衬，两角以铜铁为骨。这样的幞头转变为一种帽子，随戴随摘。

沿五代至宋，皇帝戴的就是两角平直的幞头，角内以桐木作骨。明代皇帝戴的帽子对宋的形制作了继承和改变，顶部较圆，两角也短而圆在脑后向上翘，名称叫做翼善冠，颇有复古之意，不过和当年的幞头相去就远了。

袍袍是由先秦两汉的深衣演变来的。古人上衣和下裳分开，上衣下垂部分遮住裳，留出裳的下幅。深衣则将衣裳连为一体。有了深衣以后，“袍”的名称便出现了，据说周公抱成王燕居时最早用袍。战国前后深衣颇为流行，袍则是一直垂到脚面。袍，包也，包裹全身的意思。

袍也有各样的制作材料和颜色。孔子曾说：“穿着敝袍与穿狐貉者站在一起而不觉羞惭的，那就是子由吧。”汉武帝梦想与神仙往来，命人给他制作了一件赤霜袍，该袍云彩乱色，非锦非绣，如仙人的衣服一般。传说汉武帝穿着赤霜袍真与仙人相会了。东汉规定，皇帝戴通天冠时服袍，按照各季节变换袍的颜色。

南北朝时，袍被规定为皇帝的朝服。晋明帝在位时诏定用朱纱袍作为听政之服，但未禁止士庶服用各色袍。隋文帝命制作柘黄袍用于听朝，不许士民服黄袍。唐朝的袍有青、绯、黄、白、黑五种，承接了东汉的五色季节袍，赤、黄两色为皇帝常用之色。规定除元旦、冬至受贺及大祭祀以外，皇帝均穿袍服。唐高祖下令禁止士庶用赤、黄两色为衣服及杂饰。黄袍到唐高宗时上升为皇帝的主要服装，再申不许士庶服黄之令。但唐玄宗常爱服绛纱袍。

唐玄宗曾召李白入宫作乐章（配唱的诗词），李白佯醉不起，玄宗向他许诺：“赋成乐章，以貂豹锦袍与卿。”李白即刻醒了“酒”，提笔完成任务。玄宗见李白如此之快完成作品，一时不忍将袍割舍给李白。李白看出玄宗的心思，一把将袍夺过来，玄宗忽又爽然笑了，答应给他。后来杜甫作诗赠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龙舟移棹晚，兽锦夺袍新。”

自从黄袍成为皇帝的独有服装，“黄袍加身”就显然是登基称帝之义。这个典故是宋太祖当年和拥立他的将士们创造的。将士们突然把黄袍披在了赵匡胤身上，赵匡胤先穿上黄袍后当了皇帝。黄的颜色分为浅黄、赫黄、淡黄等。浅黄袍衫与折上中、九环带、六合靴配用，是唐代皇帝最常穿的一套。如唐太宗接见吐蕃使者就穿这套服饰。宋代沿袭下来，大宴时，皇帝常穿赭黄、淡黄袍衫，玉装红束带、皂文靴。平日上朝或服以上诸种，也可服红衫袍、淡黄衫袍。明代规定大祭祀，大礼仪（元旦、冬至、圣节）用袞冕外，次者服绛纱袍加通天冠，而盘领窄袖黄袍是常服。

清代皇帝的袍服一般用明黄，祀天时用蓝，朝日时用红，夕月时用白。春夏时，袍的边缘饰以缎，秋冬则用珍兽皮毛。日常穿的明黄袍因上面绣着九个龙而称为龙袍，穿龙袍时束带、挂朝珠。龙袍以明黄为主，也有金黄或杏黄等色。龙袍的九条龙前后身各绣三条，两条绣在肩上，所以从正面与背面看都是各五条，而第九条绣在衣襟里面，从外面难以看到。龙以外穿插绣十二章纹和五色云，下端是水脚，水上是山石宝物，即八宝立水，表示一统山河。

清代高级文武官员允许服用蟒袍，蟒与龙外形上看不出什么区别，仅比龙少一爪，五爪为龙，四爪为蟒。如果皇帝赐给大臣五爪龙袍，大臣应挑去一爪（从绣龙上拆下一爪）作蟒袍穿用。

清代龙袍制作十分复杂，先由北海画舫斋内的如意馆师傅设计图样，皇帝审定后再交送苏杭内务府织造机构，按设计裁、绣。用料考究，手工精细。

衫、衣古代的内衣叫中单、中衣。直接穿在外面就叫衫了，当年汉王刘邦与项羽交战时，战酣天热，汗透中单，从此将中单改称汗衫。皇帝的内衣通常是一日一换，换下来的就不再穿，而讲究节俭的皇帝，常把单衣洗了再穿。一次唐肃宗在朝堂上，把袖口的内衣翻出，指着对大臣们说：“这件内衣已经洗过三次了。”大臣们纷纷称赞皇帝俭朴，唯独柳公权不以为然，肃宗问他为何不称赞，柳公权说：“人主当进贤退不肖，纳谏诤明赏罚，穿洗过的衣服不过是小节。”

明崇祯帝更加俭朴，内衣袖口破了还继续穿，一次在经筵上，破了的内衣袖口露了出来，崇祯把袖口纳进里面，讲官看到了，进奏：“衣之敝，虽过于俭，然美德也，何必讳？”

晋简文帝登基时，竟穿着单衣，头戴平巾帻接受皇帝玺绶，看来皇帝破例的事情也是有的。唐德宗避吐蕃之乱到梁州，时值天热，而将士们未来得及换下冬衣，德宗体恤士情，上朝时不着衫而着夹衣。将士们闻知后感动得落泪。

夏天皇帝着衫以为便服，单层的袍子称为袍衫。宋徽宗赵佶的《听琴图》中，坐地弹琴者就是他的自画像，穿着士人常服的襟衫，头戴束发巾子。

清代皇帝的内层汗衣都是由松江织造用三棱布制成的，比较吸汗。外层的衫子用绢或纱制作。

皇帝的雨衣又称油衣，直至明朝都是用桐油涂在衣上。皇帝出外，侍从要备上雨衣。唐高宗曾出猎遇雨，穿上油衣后，问：“油衣为什么不漏雨？”随从的谏议大夫说：“若能加上瓦就不漏了。”意在谏阻皇帝不再游猎。清代的雨衣非常完备，雨衣之制有六种，雨衣又分两种，以毡、油绸、羽缎制成，明黄色。

珮、带古代君臣都把佩玉作为服饰的组成部分。珮喻以礼容、昭声、制容、不变（品行不变）。用彩色的丝织成的阔带子为绶。汉明帝订立皇帝服大珮之制，珮上有双衡，下有双璜，后世沿之。唐宋皇帝服礼服时，着白玉双珮。明代皇帝礼服佩白玉并加饰。清代皇帝以头垂朝珠代替了佩玉。朝珠共一百零八颗，最贵重的是产于松花江的珍珠，称东珠，在大典礼上佩戴。在不同的礼仪场合佩戴不同原料制成的朝珠，如祭天时用青金石朝珠；祀地时用蜜珀；朝日时用珊瑚；夕月时用绿松石。朝珠上的饰物有佛头、纪念、背云、大小坠。佛头是朝珠正中位于胸前一个大珠子；挂在颈后有一个下垂的饰物叫背云，背云的下端还有一个葫芦形的佛嘴；纪念是朝珠两侧的三串

小珠，左两串右一串，各有十粒。这些饰物的吉祥意义有多种解释。

带，起着束腰和装饰作用。皇帝所服的带称革带或珮带，一般宽二寸，用皮子制成。珮，就在带的左右系着。隋唐皇帝常服九环带，带上的饰物叫做珮，用玉或金银等制成。九环带与赤黄袍衫、幘头配为一套服饰。皇帝日常服用的带还有很多种，从皇帝赐给大臣的带中可略见一斑，因赐给臣下的带原是皇帝自己所用：隋文帝赐给杨素万钉宝带；唐玄宗解下自己的红玉带赐给宁王；唐文宗在盛夏时赐给李训水玉腰带，水玉腰带应是皇帝暑天取凉所用；唐太宗赐给房玄龄黄银带时充满人情，房玄龄与杜如晦都是太宗的得力辅臣，杜如晦溘然离世引起太宗极大伤惋，惟恐房玄龄也命不久长。太宗泫然流涕对房玄龄说：“世人传说黄银是鬼神惧怕的东西，今天将此带赐给你。”

宋代皇帝服袞冕时，配金龙凤革带；服黄袍时，配玉装红束带；服便装窄袍时，配通犀金玉环带。明代初期曾一度取消革带，后来发现没有带，佩物就无法系，只能附在裳的腰间。不久又复用带，礼服配玉革带，便服带用玉或束带用金、琥珀、通犀为饰。

清代有朝带、吉服带、行带，都用明黄色。其中朝带分两种，一种是大典礼时服用，十分考究，主要用龙文金圆版四片，饰红蓝宝石或绿松石，再衔珍珠等物；一种是祭祀时服用，祀天饰以青金石，祀地饰以黄玉，朝日饰以珊瑚，夕月饰以白玉。

蔽膝蔽膝是礼服的组成部分，用熟皮制成。呈梯形，颜色随裳色，上绘山、龙、火图案，明代永乐时规定绘织藻、粉米、黼、黻四章图案。

舄、履、屨、屐、靴以上属皇帝的鞋类。汉代规定皇帝服祭服时穿舄、朝服穿履、燕服穿屨、出外穿屐。舄是一种双层履，履下一层木，又涂上一层乾蜡以防泥溺。舄的出现很早，传说黄帝死后葬在桥山，其墓无尸只有剑与舄。汉孝文帝所穿的舄用革制成，叫做革舄。唐宋礼服用赤舄，唐舄加金饰，宋舄饰金钹花、四神玉鼻。宋代朝服用黑舄，乌皮制成。常服则用白舄，丝制成。

履是单底鞋。古代庶人用草履，稍富者用丝履，皇帝的履一般用乌皮制成，唐代皇帝朝服即用乌皮履。唐宣宗为表明对孔子的尊崇，设计了仿孔子式样的鞋，名鲁风鞮，引起宰相和诸王的兴趣，纷纷仿效，稍改式样，称为遵王履。明代皇帝燕居服用玄履，上饰朱缘、红纓、黄结。

屨是用麻、葛制成的单底鞋，与履没有式样的不同，只是稍简单些。

屐是木底较厚的鞋，下有齿，也可无齿，出门行路可以防滑、耐磨。

靴，本属胡服，引进中原成为军旅用鞋，隋唐皇帝在接受幘头的同时也接受了靴。隋文帝着六合靴上朝，与贵臣同样，唐代沿之，而六合靴渐为皇帝专用。宋代几次更定舆服制度，朝服用履还是靴反复多次，其靴用黑革制成，参用履制，形似增长筒的履，大宴时则服皂文靴。元代皇帝的靴有红罗靴，用红罗制靴筒，当时民间喜用铜饰靴，皇帝也采用此法以求俭朴。

袜足衣也。袜都有带。周武王罢朝时袜带断了，武王环顾左右，想找一个可代替袜带的小绳，没能找到。武王的袜子早在他伐纣时就添过麻烦，武王率军伐纣至商山，袜带松开了，身边的五个人都不肯为他系上，都说：“臣所以事君，非为系袜。”

袜的作用有时不可思议。汉成帝时皇侄中山王朝见，成帝赐他一同进餐。中山王吃饱后站起来时，袜带松开了。成帝一直在观察他，见此状，便认为

中山王无能，转而认为定陶王较好。成帝没有儿子，想从皇侄中选一位继承人，后来选中了定陶王。

与礼服相配一般用赤袜，东汉皇帝着赤袜祭祀山川宗庙以表其赤心。后世沿之。礼服中的袜比较精致，里外双层，宋朝用罗表缙里与鞋筒相系。唐代皇帝拜祖陵时服白袜。燕居时皇帝也着白袜，用绢绫等制成。立冬时皇帝要穿用罗、帛十余层做成的“千重袜”。

二、后妃宫女的衣着

因皇后不同于皇帝有登基、受朝贺、祭天地等大礼活动，她们的绝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后宫燕居，所以皇后服装的种类比皇帝少。皇帝的礼服是谒祖庙和亲蚕礼服。

东汉皇后的礼服是深衣，上呈微红的黑色，下呈黑色。头上饰以假结、步摇、簪珥。假结是用来使头发耸起的衬物。步摇是一端别在发上别一端垂悬的金属发饰。珥是耳环，垂以珍珠。东汉皇后行礼时头饰复杂而华丽，难以详考。

唐代皇后受册、助祭、参加朝会时服袞衣。其衣深青色，上有翠翟（一种小而鲜艳的鸟）图案。衣领上有黑白相间的花纹，袖口、衣边用红色的罗为缘饰。腰服大带，带与衣色相同。蔽膝随裳的颜色，上绘翟为图案，青袜，舄加金饰，白玉双珮。皇后亲蚕时服鞠衣，用黄罗制成，形制如同袞衣，但无翠翟图案。平日宴见宾客则服钿钗礼衣，颜色不限。皇后服袞衣时，头上也要盛妆，插十二支花，两鬓做宽；服日常的钿钗礼衣时，头上只戴钿钗。宋代皇后礼服略同于唐代。

明代皇后在受册、谒庙、朝会时服礼冠，戴凤冠。其冠的圆框饰以翡翠，冠上是九龙四凤，大花十二树，小花十二树，两博鬓上饰十二钿。后又更定冠上的一龙口衔大珠一颗，冠上有翠盖，冠沿垂珠结，冠上加珠翠云四十片及繁密的大小珠花，鬓上饰金龙、翠云。礼服一为袞衣，一为翟衣。袞衣深青色，绘翟，翟为赤质，五色十二等。亚纹领，袖口衣边用红罗为饰。大带与衣同色并加饰，青袜青舄。翟衣深青色，上织翟纹十二等，间织小轮花。领、袖口、衣边均为红色。服礼服时配玉革带、绶、玉珮，装饰复杂而精致。

明代皇后的常服，在制度上也规定得十分考究，大致力凤冠，霞帔、玉带。清代皇后冠服并无严格的礼服与常服之分。皇后有朝冠、吉服冠。朝冠冬用薰貂，夏用青绒，上缀朱纬。冠上的饰物为凤、珍珠、猫睛石、金翟。皇后的朝褂有三种，朝袍有三种，还有龙褂两种，龙袍三种。朝褂为石青色，绣龙、万福万寿文或八宝平水。朝袍为明黄色，领分冬夏加绿，冬用貂绿或海龙绿，夏用片金绿，袍上绣龙、五色云和八宝平水。龙褂石青色，龙袍明黄色。服朝服时挂朝珠之盘，即东珠一盘，珊瑚两盘。

后宫皇后以下各有名分的嫔妃都有规定的服饰等次，她们都属于内官，在制度上占一席之地。

中国人十分讲究女性的修饰，“妇人貌不修饰，不见君父。”妇女修饰容貌之事被提升为必须遵守的社会道德。《战国策》的作者又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修饰容貌不仅以情感为动机，也被理义所认定和推动。其实爱美是人特别是女子的天性，也是本能。即使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贫困妇女，稍有些钱就要买一包胭脂，而贵族妇女每日对镜梳妆是她们最乐意的必修课，至于皇宫中的女子，当然是最有条件打扮的。

古人对奇装异服的爱好远远超过今人对他们的估计。上至君主也不乏对奇装异服的闲情。战国时的君主居然充当过服装潮流的带动者，例如邹君喜欢冠系长纓，不久，身边的人以及百姓都系上了长纓；齐桓公喜欢穿紫色的衣裳，结果全国人都争相服紫，导致紫装涨价，有人想用五件素衣换一件紫衣而不可得；楚文王喜欢戴獬冠，转眼间楚国上下纷纷效仿。以上事情令君主们十分为难甚至恼火，他们只愿独享自己喜欢的东西。汉唐以来，百姓不

敢再效仿皇帝的服装式样和颜色，但皇帝却禁不住拿来民间的式样自己用，象朱元璋这样勇略俱全的皇帝也经不住民间异服的诱惑。朱元璋六十四岁时微行到神乐观，见路上有人头裹网巾，觉得这种式样颇好，第二天他就下令地方官推行网巾。之后，朱元璋在后宫也享用上了网巾。

女性求美求异的意识更浓。几乎每代都有流行发式和面妆的起落，潮流的源头多是宫中和京城中。东汉桓帝时，京城洛阳流行愁眉、啼妆、堕马髻、折腰步、龇齿笑。所谓愁眉即细而弯的眉；啼妆是在下眼睑薄施胭脂，似刚哭过；堕马髻是发髻倒在一边；折腰步是腿和身体不在一条线上；龇齿笑则是象牙痛般的笑。这种流行妆起自于当朝外戚梁冀的夫人，后来风行全国。古代文人对于女子趋从流行妆很注意，他们发现女人们在仿效中还添油加醋，如城中流行高髻，则四方高一尺；城中流行广眉，则四方眉长半额；城中流行宽袖，则四方几乎将一疋布全披在身上。妇女们对宫中式样的兴趣极浓，甚至不加分辨一意仿效，如楚王好细腰，宫女们竞相节食，传播开来，倾国的妇女都面呈饥色；唐僖宗避难在成都，因为时值非常时期，宫女们为了紧急应变而简化了髻的打法，只在头顶系根丝，发式与囚徒相似，故称囚髻，未料到成都的妇女们也随之打上了囚髻。这种流行意识恐怕古今皆同，没有什么奇怪。

三、宫廷发式花样

宫廷女性的装饰可作古代女子装饰的代表。

中国古代男女的头发都是在头上打髻，不同的是，男子打髻就是束发，然后要加上冠、帽、巾、帻，而女子很少戴帽，靠髻的式样变换发型种类。在女性修饰中变化最多的就是发髻了。古代女子很重视发美，发美是美色的一个显明标志。汉武帝第一次见到歌女卫子夫，就被她的美发吸引住了，“上见其美发，悦之，遂纳于宫中。”东汉马皇后初入宫时，以绝好的一头秀发令后宫粉黛一一失色，她的头发多而黑，做四个大髻后仍有余发。同样，陈后主的宠妃张丽华也是以秀发夺人之目的。

宫中后妃以及社会上的贵族妇女喜梳高髻，以示尊贵，而属于宫婢类的宫女则梳如牛羊之耳般的双髻。高髻在梳妆上比较复杂，如没有别人合作（后、妃有服侍梳头的宫女）很难梳成。宫中有时规定或限制何种身份的女子梳何种髻，但髻的式样变化多端也难以归类。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宫中发髻名称繁多，如无实物便难以想象其形制。

秦始皇诏令皇后梳凌云髻，三妃梳望仙九鬟髻，九嫔梳参鸾髻，又令宫女在夏天梳黄罗髻；汉高祖令宫人梳奉圣髻；汉武帝令宫人梳二十鬟髻、堕马髻；汉灵帝令宫女梳瑶台髻；魏文帝令宫人梳百花髻、芙蓉归云髻；梁武帝令宫人梳回心髻、归真髻；隋炀帝令宫人梳朝云近香髻、归秦髻、奉仙髻、节晕髻。唐宫中的发髻式样更多，名称足以让人眼花缭乱，如半翻髻、反绾髻、乐游髻、双鬟望仙髻、回鹘髻、愁来髻、归顺髻、闹归妆髻等等。上述各种宫妆发髻应是皇帝们所喜好或者亲自设计、定名的，其中大部分今人无法知道它们的形状。

从下述灵蛇髻的故事中，令人也许能够领悟到古代女子发髻种类之多的缘由：魏文帝的甄皇后梳的发髻式样一日一换，据说她每天都见到一条口含赤珠的绿蛇，绿蛇以盘卷的姿态向她传授髻的各种梳法，因此甄皇后的发髻每日更新，称为灵蛇髻。不论这个故事是否真实，人们仍可据此推测发髻是可以任意盘结的，只要能够固定在头上。

为了固定头发并显示头发的茂盛，古人发明了假髻，假髻是用别人的头发或自己以前剪下来的头发，做成需要的形状，衬在打髻者头发里面，做成耸而不乱的髻。古人对头发的重视过于今人，曾专设髡刑，以剃光头发作为对犯罪者的处罚。髡下来的头发估计被秃发的男子取走或用来做女子的假结。夺人美发的事也曾发生，如鲁哀公在城上见到一位美发的女人，便派人把该女子的头发剃下来，做王后吕姜的假发。假髻被编入《周礼》中，叫做“副”，规定为王后行礼时的头饰。为了固定头发，也可使用纁绦或丝线（带）缠缚，如飞天髻，需要三个大鬟髻耸起而不塌下，就得借用丝带缠缚。由于有了技术手段，高髻在东汉以后成为常见的宫中发式并波及民间。

高髻的许多种类，除了通称的高髻外，今人可推知形状的有：飞天髻、望仙髻等。飞天髻十分浪漫，始于南北朝，一直至明朝仍流行不衰。飞天髻显然和佛教信仰有关。起于唐初而盛于武则天时的螺髻，也是系于佛教信仰，据说释加佛的发型就是螺髻。望仙髻的梳法与飞天髻相似，打两股环状髻耸于头上，如望仙人来临，形状不如飞天髻飘逸。唐玄宗时宫女们均爱梳望仙髻取媚于玄宗。惊鸿髻起于曹魏宫中，延至隋唐，其形状是鸟欲展翅的瞬间姿态。唐宫中流行的抛家髻十分美观，两鬟蓬松向后拢，好似两鬟抱面，头

上做成椎形的朵子。与抛家髻相似梳法稍有不同的是半翻髻。宋宫中盛行朝天髻，与翘角望仙髻的不同处是前高后低、前圆后椎的两个实髻。

凡宫中盛行的各种高髻在梳法上都有所讲究。

今人所喜闻乐见、经常出现在屏幕、画页上的古装青年女子发式是古代宫中及民间常用的发式，即用本身头发分作两股，在头上盘成一个不太复杂的形状，下成两束垂于耳后或成一束垂于头后、或加垂长的两髻。

明清两代宫女发髻并无多少创新。清末慈禧太后喜好新式发髻，或梳双髻上竖，或梳双垂后如燕尾形，这种梳法和式样古代早已有之。

髻式与髻饰是美发的重要部分。最简易的长髻是不将髻发梳上去，而垂于耳前两侧，随风飘逸。髻上一般插戴各种花和宝钿花钗。魏文帝时的宫女莫琼树创造了一种传奇氏的蝉髻，因此得宠于皇帝。蝉髻“望之漂渺如蝉翼”，如果不借助某种材料，是无法随意梳成的，估计是用一种胶类物质涂在髻上，使之薄而齐，定型拢成蝉翼状。后世皇后的礼妆两博髻，也许用了类似的方法。缓髻是宫女们常用的髻式。

四、后妃头饰

发髻梳成后，还需要插戴各种发饰。戴花纯是为了美观，而簪、钗等具有美和用双重功能，首先是用。

簪，是用来固定头发的工具，古代男女都用簪。杜甫有诗句“白发搔更短，浑欲不胜簪”。皇帝常在节日赐给大臣用珍奇物品制作的簪子。罪犯一般要被迫摘下簪子，脱簪后头上只有一个囚髻，后妃有过失，在皇帝面前也要脱簪、摘下耳环。簪有玉制、骨制、犀角制、象牙制、金银及其它金属制。东汉太后礼服中规定的发簪长有一尺，以玳瑁为簪股，一端为华胜（华胜是一种饰物、又寓吉祥祛邪之意），上立一只凤凰，以翡翠为毛羽，下嵌白珠，垂以黄金饰物。

步摇。步摇这种发饰据古人考证是纣发明的。步摇插在头上，会产生一步一摇的妩媚状。宫中后妃的步摇一般用金作梁，垂以白珠。

钗，具有两条尖枝。宫中有金、玉、玳瑁等珍奇物品制作的钗，而贫家女子只能戴荆钗，“拙荆”便是男人对外称自家妻的谦词。后妃钗上的装饰花样有凤、燕雀、鸾及花卉。魏文帝新宠薛灵云时，异国献火珠龙鸾钗，文帝拒不受，说：“珠翠都无法戴，何况龙鸾这么重的东西？”唐代一支玉钗在当时市场上高达七十万钱。唐代一位公主头上戴的九玉钗上刻九鸾，五色并呈，她发现钗上刻着“玉儿”二字，料知是南齐东昏侯宠妃潘玉儿的宝钗。当年潘玉儿慷慨地用数倍的价钱买民间宝物，一只虎魄钗出价一百七十万钱，而晋元帝要封某女为贵人时，却因雀钗太贵而不肯出钱到市上买，为此夏侯湛作了一篇《雀钗赋》。

宋仁宗的母亲李宸妃怀孕时，与真宗一起游砌台。忽然玉钗从头上堕下，李宸妃唯恐不祥，真宗估算，如果钗未摔坏一定生男孩，侍从们把钗拾起，果真无损，真宗非常高兴，不久果真得了儿子。事属巧合却被传诵开来，好似玉钗有灵。

钿，是金属制成的发饰，图案以花为主，常称为金钿或花钿。钿和步摇都不起固定头发的作用。宫中女子将上述各种发饰相调配，戴在头上，与发髻一同显示美和富贵。

花，是最为鲜艳、随意又实惠的头饰，宫女游春时，无不将喜爱的花戴在鬓上。隋唐时流行花冠，皇后的礼冠就受了这种影响，礼冠上树十二支花，应算作最华贵的花冠。明代宫女正规的冠服中就有帽上饰花的规定。

后妃宫女们不会忘记寻找护养头发的方法。不知从何时开始，出现了叫做香泽的护发剂，涂在发上以防干枯。汉成帝宠妃赵合德沐后用九回香膏润发。隋炀帝时，宫女朱贵儿“插昆山润毛之玉拨，不用兰膏而鬓鬢鲜润”。由此可知，隋时宫中已普及兰膏为润发之物。明代宫女们常用青纱罩在发髻外面，再插簪钗。她们发现桑汁可以润发，于是将桑叶捣成汁，和香料配在一起，装入小银盂，经常沾一些涂在头上，效果不错。明嘉宗的乳母客氏霸道又爱美，常令一群宫女手持梳具环侍左右，一旦她想润一下头发，宫女们就得一一用口中津液把梳子沾湿，为她梳发，此法叫群仙液，据说是从岭南传入宫中的，可以令人黑发永驻，客氏用此法十分灵验，配上面妆、衣妆，四十多岁时仍如二八姑娘般鲜丽。

五、美女面妆

宫中女子无时离得开胭脂、粉黛。“毛嫱天下之姣人也，待脂粉香泽而后容”。天生丽质仍需要借助脂粉展现光彩。脂粉费成为后宫费用的一大项目，隋炀帝宫中争画长蛾眉，有关部门每天向后宫提供五斛产自波斯的螺子黛粉，明末宫中脂粉钱一年需要四十万两银子。

古代女子粉妆不足为奇，无所不为的皇帝不仅欣赏后妃宫女傅粉，有的也会把自己粉饰起来。南北朝时期，南朝皇帝被称为傅粉郎君，金代自金章宗后的几个皇帝，都有傅粉的嗜好。明代皇帝在上朝前，必用粉傅面及颈，以显示容光和肃穆，如果不是宦官把此事透露出来，外间不会有人知道皇帝的面部需要粉饰，但未详是否用胭脂妆点两颊，估计胭脂会用上一些，否则面白无血色更显憔悴。

自三代开始，铅粉被用来作为女子的化妆品，《博物志》中说，纣最先烧铅锡作粉。铅粉可以使皮肤显得润滑。秦穆公的女儿弄玉与萧史相恋，萧史教她烧水银作粉，叫做飞云丹。几千年中，古人未能发现上述粉质是有毒的。

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讲述了用大米为主要原料作粉的方法。用白米英粉三分加胡粉一分合匀，调取葵子蒸熟，再用布绞汁，与粉调和，晒干。然后再蒸取汁，重复一遍，则粉末精细。粉做好后可以加香料，一般用丁香花揉于粉中，经过一段时间后就成了香粉。不知香粉中是否还需要加上铅粉。

明代后妃宫女用紫茉莉的种子，捣取其仁，蒸熟制粉，称之为珍珠粉，这是一种。另一种是用玉簪花制粉，方法是，玉簪花（即白鹤花）开后，剪去花蒂，即成小瓶状，灌入民间常用的胡粉，再蒸熟制成粉，叫做玉簪粉。宫女们在春天用珍珠粉，珍珠粉在秋天容易干燥，宫女们转用玉簪粉，而玉簪粉在冬天快尽时香味就不再持续了。宫女们喜欢用早晨结在荷叶上的露珠，与粉调合以饰面。上述制粉的方法先是在民间产生的，后来传入宫中。

胭脂又叫燕支，取自一种花，燕北民族称为燕支花，汉人称为红蓝花。古人也考证出胭脂始创于纣，看来纣是中国美容界的鼻祖，纣以红蓝红汁凝作脂。女子在化妆时，先施白粉，然后将胭脂在手心调匀，搽在两颊，浓者叫做酒晕妆，淡者叫做桃花妆，如果先薄施胭脂，再涂上一层白粉罩上，叫做飞霞妆。

胭脂分作用来饰面和点唇的两种，搽在颊上的胭脂可以制成粉状，而点唇的胭脂一般为脂状，叫做口脂、唇脂。唐末点唇用的胭脂有许多品种，如燕脂晕品、石榴娇、大红春、小红春、嫩吴香、半边娇、万金红、圣檀心、露珠儿、内家园、天宫巧、洛儿殷、淡红心、猩猩晕、小朱龙、格双唐、媚花奴。

黛，是青黑色的颜料。黛的释义就是代，女子剃去自身的眉长，用颜料画上代眉。这种颜料，汉人一般都用书写绘画用的墨，加上麝香等香料，用毛笔画眉。西域人制作黛的方法比汉人多而且质量好，隋炀帝时，西域进贡螺子黛，宫中称为蛾子绿，宋时西域进献青雀头黛。

后妃宫女的面妆随时代变化产生了不少风尚。桃花妆、酒晕妆这种一般性的妆法历代皆有，而时尚妆法则有多种。

东汉曾盛行啼妆，唐宋均出现过泪妆，安史之乱前，唐宫女仿效杨贵妃，在两颊涂素粉而不施胭脂，号称泪妆。宋理宗宫中用眼角点粉作泪妆。

古代女子妆法的变化主要是在额和颊，改换颜色和花样以及改变眉毛的浓淡和眉型。

额黄妆盛行在南北朝和唐朝，用黄颜料画月形，宫中尚鸦黄和蜂黄。与此相似的是在眉心或脸部搽成弯月或圆月状，颜色多为黄色，或为红色、翠色。

唐代出现了梅花妆，传说起自于南朝宋武帝的女儿寿阳公主。寿阳公主曾卧于含章殿檐下，一朵梅花飘落在她额上，印出五瓣花形，几天洗不下去，皇后发现公主额上的梅花印十分美观，让她留住。唐代宫中梅花妆的盛行，是由上官昭容（婉儿）再次掀起的，上官婉儿广闻博识，聪慧伶俐，应是她发掘了前代的梅花妆而倡行于唐宫。用金银锡箔制成梅花图案，贴在眉心，这种妆法延至宋代。

三国时期，出现了类似于今人涂饰两颊的妆法。曹、吴宫中盛行这种妆法均始于意外事故。某晚，魏文帝曹丕在灯下诵诗，殿中摆放着水晶七尺屏风，薛灵云初入宫不熟悉各种物品，走过来时面颊触在屏风边上，但伤得不重，面颊渗出的血如晓霞将散，益添妩媚，曹丕从灯下望去，觉得她比刚见面时更加迷人。宫女们很快模仿起薛灵云的伤妆，用胭脂涂颊，号称晓霞妆。吴大帝孙权的儿子孙和宠爱邓氏，孙和在月下舞水晶如意，误伤了邓氏，颊上流的血沾湿了裙裤，孙和急召太医诊治。太医用白獭髓杂以玉屑做成药膏涂在伤口上，伤好后，留下了斑斑赤点，孙和端详邓氏，认为更增美艳。从此孙和的姬妾们竞相用丹脂点颊。

佛妆在北方民族建立的宫廷中盛行，显然是受佛教的影响，也与寒冷地区的气候有关。燕地女子冬天用黄色的枯萎叶做浆涂面以防风吹，称之为佛妆。佛妆即是整个面部涂成黄色，以拟金色佛面，在辽代宫廷最盛。南唐中主李璟的女儿李芳仪被虏入辽宫，“也爱涂黄学佛妆”，似乎是出于她的自愿。

佛妆颜料的做法，这首宫词作了介绍：

夏至年年进粉囊，时新花样尽涂黄。

中官领得牛鱼鳔，散入诸宫作佛妆。

明清两代宫中的面饰，未见掀起新的时尚。

在面部化妆中，变化最多最微妙的应是眉样。后妃宫女们画眉时，不再考虑自身的眉样，而是按照时尚和自己的喜好去画。宫中实行最久的是八字眉，眉尖高而眉梢低。八字眉有长与短、粗与细之分，从古代画像上看，盛唐时宫中实行较短而粗的八字眉。各种眉中八字眉最能影响面部神情，显示出娇弱、哀怜之态，而唐代丰满的宫女面上的短粗八字眉则掬出几分憨态。其次蛾眉也流行较广，蛾眉较粗且长，画上后面部很有神采。远山眉则较为柔漫，眉细而淡，中间弯曲，汉成帝的宠妃赵合德喜画远山黛，十分妩媚。

六、宫禁时装

讲究美丽的古代中国女子的服饰较男子服饰随意而自由多变，服饰也同发型、面妆一样，随时代形成各种风尚。

汉魏以前，宫中的服装时尚未有足够的资料说明，南朝出现了宽袖热，直至隋唐，宽衣长袖仍是后妃宫女及贵族女子喜好的式样。但窄袖衣在北朝宫中流行，也影响到了隋唐，并且在唐初至盛唐时期超过了对宽袖的好尚。

窄袖衣在南朝是讲求节俭的皇帝所提倡的，但在隋唐盛行并不是为了节俭。窄袖衫是胡服中男装的式样，唐开元天宝年间，宫女穿男装成为时尚。当地宫女竞相骑马游乐，便于骑马的胡服被宫女们所喜爱。盛唐时期，整个社会充满豪爽之气，宫女们既好红装又好戎装，她们身穿男式的圆领袍衫、窄袖，有的还裹幘头，足登软靴，颇觉自得。

在盛唐之前，宫女骑马出外穿的是幂罽，幂罽是一种全身障蔽的衣服，宫人骑马身穿幂罽在隋以前的北朝就出现过。唐初，宫女骑马还是这身装束，以防被路人窥视。到武则天时，幂罽不再盛行，而代之以帷帽，帷帽状似雨笠，帽檐下黑网至颈，以遮挡面目。到玄宗时，宫女改戴胡帽或者幘头或不戴帽子，“靓妆露面，无复障蔽”。身上着的是窄袖圆领的男装。

安史之乱打击了唐宫胡服的盛行，此后，后妃宫女们抛却了窄袖袍衫，归入爱好宽衣大袖之列。

秦以前的女服是衣裳相连。秦始皇令作女式短衫。到唐朝，宫女的服装结构一般是上身衫襦，下生长裙。盛唐时期，由于观念的开化，宫女们穿上了开到半胸的窄袖或宽袖短衫。宫女的裙子种类繁多，隋至唐初的裙装尚窄，到盛唐时裙式愈加宽大，裙上折裯密布，飘动感加强。裙的颜色多为红、黄、绿鲜艳的原色，杨贵妃喜服黄裙。武则天的女儿安乐公主拥有两件百鸟裙，为旷世珍品。百鸟裙是由负责备办宫中衣物的机构尚方制作的，采百鸟毛织成。此裙的颜色令人眼花缭乱，不知其本色，从正面看是一种颜色，从旁看是另一种，在阳光下呈一种颜色，在阴影中又是另一种，裙上闪烁着百鸟图案，神奇而不可思议。

这种百鸟裙再好看也不可能普及，而隋宫中炀帝设计的花笼裙可供宫女们享受。花笼裙是用丝织成的薄而透明的裙子，上面加绣花鸟图案。

唐代后妃宫女喜欢肩搭披帛，披帛上绣着花卉。披帛及帔肩最早在秦代出现，秦始皇令宫女们披浅黄银泥飞云帔。唐代民女未出嫁时用披帛，出嫁后则用帔肩。唐玄宗开元年间，诏令二十七世妇及宝林、御女、良人等在随侍和参加后廷宴会时，披有图案的披帛。宫女们在端午节要披较为华丽的披帛，称为奉圣巾或续寿巾。

宋代，宫中服装以窄袖为主，但宽衣大袖仍被认为是豪华的标志，后妃礼服是宽衣大袖，礼服在礼仪活动中才被使用，日常则穿窄袖便装。宋代宫廷女子的时尚服装为两套式样，一套是上身为窄袖短衫襦，下身是拖地长裙。上衣的领子在宋以前多为交领，右衽，宋时对襟式样普及，对襟领可以露出里面的中单（内衣），这种式样更得宫眷们的喜爱。裙装以多褶为美，多褶在唐宫中已经盛行。宋代裙子的褶更多而细密，称为千褶裙。裙子拖地数寸也是继承了唐风。宋理宗时，宫中时兴前后不缝合的拖地裙，名赶上裙。另一套时尚服装是窄袖长衫外套对襟背子，背子是由中单加长发展来的，中单

在腋下缝合，下有交带，而背子在腋下不缝合，无带，长至脚面。

明宫规定，宫女的冠服沿用宋制，紫色，团领，窄袖，遍刺折枝小葵花，以金圈之，珠络缝金带红裙。其实明宫中有一件盛行的服装是从元宫中继承来的，即：比甲。比甲是由元世祖的皇帝创制的，无领无袖，后比前长，两侧开衩处各缀两个襟扣，设计比甲是为了便于骑马穿着，前胸后背得到保暖而臂肘活动自如。明宫中的比甲形似无袖的背子，比背子稍短，长至膝下。后妃宫女的常服就是宽袖衫外着比甲。

霞帔是皇后、嫔妃的常服，大衫霞帔即衫与霞帔的配套服装，衫为黄色，霞帔深青，上织金云霞龙文，或绣或铺翠图金，饰以珠玉坠子，龙文为凸出状。

明宫后妃宫女喜欢穿自己设计制作的新装，而且层出不穷。熹宗的张皇后心灵手巧，她用白绫配新桑色绫，制成鹤氅式新衣，称为霓裳羽衣。崇祯时，宫女们竞效周皇后，以穿素白色的纱衫为美，用半透明的白纱衫衬出里面的红袖腹，以增媚力。明末宫女十分喜欢穿海天霞色的衫子，似白而微红，雅中微艳，连爱美的宦官也穿上了这色衫子。明代宫女通常用纸做护领，一日一换，这种纸应是宣纸，由江西玉山县贡进。未知纸护领是谁发明的，用纸做护领盛行于明宫，其它朝代未见记载，所以纸领应该是明代宫女的新创，不过，纸衣在唐代曾出现过，唐代宗大历年间兵乱之时，“自赤水至潼关二百里间，畜产财物殆尽，官吏至有著纸衣或数日不食者。”可见当时服纸衣是救急之法，出于无奈，因此纸衣日后并没有畅行。

七、缠足源于宫中

缠足是中国宫廷中的一项独特的发明。自从宋代以后，盛行于宫中，波及民间，以至于裹足成为妇女自幼必行之事。缠足创始于五代十国中的南唐，李后主别出心裁，为宠妃窈娘缠足，用帛绕脚，还使之弯屈成新月状。李后主无比赞赏他的佳作，使得那些日夜盼望得宠的宫女们纷纷效法，也缠上了足并以此为美。宋明时虽然皇帝并未怎样欣赏纤足，而缠足似乎成为一种无可质疑的美深入人心，这之中有着文人墨客凑趣的功劳，连爽达的苏轼都在笔下赞美纤足，那么其它的骚客们对纤足的叫好文字就不计其数了。女子缠足后，站立、行走便成为累事，而以弱为美的审美观念立即肯定了纤足的美的价值。由于缠足，妇女们必须时常将两腿及盆骨肌肉绷紧，才能站稳、走好，这种样子在男人眼中更觉小巧、可怜，所以宋明两代皇帝至少不会拒绝这种美。而清代却严令禁止后妃宫女缠足，清统治者显然是认识到了汉民族以弱为美，导致体不强劲、战事败落的结局。

缠足后，宫中便流行起弓鞋，即尖头鞋。唐以前宫女的鞋是圆头或方头，唐时盛行重台履，履底较厚。履头高起最为常见，高起的履头是各种形状如花状、鸟状、笏状，露在裙袍外面。岐头履的形制也深受后妃宫女的喜爱，唐太宗长孙皇后所穿的岐头履，头向上翘起三寸左右，呈V状，用丹羽织成，履上镶嵌云状金钿。宋宫中也流行过翘头履和红靴，弓鞋也是在宋代出现的。北宋末盛行用两色布拼鞋的两帮，名错到底，不知是否为缠足尖鞋。宋理宗时，宫中盛行裹足，束足纤直，号称快上马，这时应该穿尖头鞋了。弓鞋一般为木底、缎面，面上绣花，女子缠足后常有脚臭，所以鞋中要放入一些香料。自穿上弓鞋后，妇女的鞋头不再露出裙衫外。清代后妃宫女不缠足，盛行穿花盆底鞋，木底，底高二、三寸或者更高，呈花盆状，袍的下幅将鞋罩住，显示身材高挑。

八、皇家起居器用

皇帝在宫内过着室居生活，生活中需用的器具品种一般民间也有，而表明皇帝身份的玺、印、绶及出外的大驾卤簿又不属于皇帝宫内日常生活的器具。然而，除了力行节俭的皇帝使用的一些器具较为朴素外，帝王们决不会使用与民间相同质料的器具。今人可以在现存的明清紫禁城的宫殿内及珍宝馆看到有关实物。

帐最初形如覆斗，施于床上，其形制似于今人的蚊帐。但后来的帐并不都是覆斗形。帐的四周用流苏为饰，一般春秋和冬季用夹帐，有里外两层，夏天用单纱罗帐。皇帝使用什么样的帐，凭其奢侈程度，自然大部分皇帝是好奢。在这方面最为俭朴的皇帝是汉孝文帝。《汉书》中说文帝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又有一说是文帝厌恶纨素的瑟瑟声，竟用装大臣上书的囊做帐，把几个囊拆开，连接成帐。如果皇帝用青布作帐，那就是向汉文帝看齐了，但这很难做到。

皇帝的各种奢侈的宝帐，在史书中记载得更多，较之汉文帝的囊有天壤之别。汉武帝曾用琉璃、珠玉做帐，珠玉在月夜下闪光，帐上还缀以各种天下珍宝，武帝将这座宝帐供给神仙居住，以示虔诚，自己在一旁用次之的乙帐。汉武帝还有玳瑁帐，在帐的四周嵌满玳瑁，与之相媲美的应是唐代同昌公主的珠帐，全部用珍珠连缀为帐。十六国中的后赵皇帝石虎，冬天用明光锦做帐，里层复帐用白缣为之，帐的四角安装纯金银铸刻的装饰物，帐顶是一朵灿烂的黄金制成的莲花。隋炀帝在扬州建造的迷楼，楼上设四宝帐，一曰散春愁，二曰醉忘归，三曰夜酣香，四曰迎秋月，各缀以宝物。唐玄宗时，用翠羽帐供皇后使用，王皇后被废，王譚为之作《翠羽帐赋》。

幄一种大帐，为四方形，《周礼》说幄四合象宫室。帐一般施于床上，幄则施于地上，幄的四周叫做帷。

帷幕、幔、帟与帐的形制大体相同。

屏风首先用来挡风，一般摆在座位后面，屏风又称扆，取依倚之意，《礼记》中说天子当扆而立。

屏风高八尺，除了挡风以外，作用很多，堂中议事，屏风后面可设旁听者，不为人知。如汉光武帝姐姐湖阳公主新寡，想再嫁宋弘，光武乃召宋弘议事，让湖阳公主躲在屏风后面，听他们的谈话内容。屏风上可雕可画也可书写文字，贪于淫逸的汉成帝命人在屏风上画绌与妲己的猥褻状，汉光武帝殿内的屏风上绘着美女图，宋弘一次和光武帝议事时，发现皇帝不时望一眼屏风上的美女，宋弘正色道：“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光武帝从善如流，立即令人将屏风撤去。唐太宗将地方官的姓名列于屏风之上，朝夕斟酌如何用人，后来又将魏征的“十渐疏”抄录于屏风之上，唐太宗的这种做法被子孙承袭，唐德宗命人在麟德殿的屏风上绘汉魏君臣，列其善言美事，唐代宗也将前代君臣事迹写于六个屏风上，宣宗则将《贞观政要》书于屏风上，经常神色庄重地拱手读屏风。不过，屏风更多的是装饰性的绘画、雕刻。

许多用珍贵材料制做的屏风被载入史册。汉武帝用白琉璃制作的屏风，光照洞彻。又有记载说，汉武帝造神明台，摆设着用玉片缀为龟甲的屏风。吴国孙亮用琉璃制做的屏风，镂刻着瑞应图一百二十种。汉代多用云母、火齐制成珍贵的屏风，云母是一种矿物，可剖为片，薄者透明，火齐与云母相似，也是一种矿物，色黄赤似金。翡翠是一种珍玉，制作屏风则用料可观。

唐玄宗曾赐给杨贵妃两件珍贵的屏风，一为水晶屏风，杨贵妃转赠给其兄杨国忠；另一屏风名虹蜺，雕刻着前代美人，美人的衣服和器玩都是用重宝星星点点嵌成的。这件屏风本是隋文帝赐给义成公主的，义成公主后来成为匈奴王的阏氏，隋炀帝的萧皇后在炀帝死后，辗转投奔了义成公主，贞观初年，萧皇后回归长安，也带回了这件屏风。

帘为户帟，也起障蔽的作用。在帝王宫中，金玉珠玑也被用来做帘。汉武帝为招致仙人，用白珠为帘，又制成翠羽麟毫帘，汉成帝宠妃赵合德所住的昭阳殿，户设珠帘，风来则发出细碎的鸣响。

床的释义为装，用以装载人。床对于古人，夜间则卧，白天则坐。当东晋元帝司马睿即位时，要辅臣王导与他一同坐在御床上接见大臣，王导坚决辞谢。北魏人魏收在室外读书，坐在板床上，几年后床板被坐坏。

皇帝的御床一般用柏木做成，也有用金属制成的。唐代内廷事务官尚舍负责掌管殿庭供设包括床，床有金铜行床。床栏用珍奇点缀。隋炀帝有五方香床，缀金玉珠翠。唐玄宗时，西域波斯进献玛瑙床，夏天皇帝如果怕热，可以用石床。南朝宋武帝刘裕曾患体热，有人献石床，刘裕没有用而是把石床打碎了，以防臣下为了献媚而劳民伤财。

榻榻的形状是长狭而单，离地较近。宋太祖赵匡胤准备伐江南时，江南国主（南唐）派使求饶，宋太祖说：“江南主有何罪？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乎？！”宋太祖此话用的是比喻，实际上榻很窄，很难挤下两个人，如果两人挤在一榻上睡，那么其中一个人肯定睡不好。皇帝的榻一般是用来坐的，或者临时性的躺下休息，但夜间不会睡在榻上，除非有繁重、紧急政务缠身。榻可以经常移动位置，也可以折起来放在一边。

簟是古人的床席。民间用的簟都为竹制，宫廷用的簟除了竹簟以外，还用珍奇的象牙等物制簟作为奢侈品，汉武帝曾以象牙簟赐李夫人，赵飞燕的妹妹赵合德所住的昭阳殿中也有白象牙簟。晋代太子纳妃的聘礼中有乌韬赤花双文簟。

梁简文帝萧纲作了一篇答谢定襄侯赠卧簟的诗文：“筠簟多品，筱荡杂名，校色比奇，独此为贵。自含苍紫，似久暴于柯亭，乍舒黝素，若屡沾于湖水，三伏余炎，九折成用，便可旅食南馆，高卧此牕。”描述了用了宝囊侯的卧簟如何惬意。

席也是竹制的。古人席地而坐，就是以席为地，坐在席上，孔子曾说：“席不正不坐。”汉时皇帝也经常坐在席上，汉文帝和贾谊谈话时，两人都是席地盘坐，汉文帝凑近一点听，就把席子向前挪动，再坐。唐宋以后，椅子通用，皇帝便很少坐在席上了，席多做铺床之用。

帝王后妃所用的席子中，恐怕只有汉文帝的莞蒲席最为廉价了。皇帝的席子至少有文饰和丝缎镶边。战国时燕昭王的席，编（或绘）成云雾麟凤图案，席上杂错宝饰，散荃芜香。汉代赵合德就有三种绝世之席，一为回风席，一为椰叶席，一为绿熊席。绿熊席毛长二尺余，人睡在其中，拥毛自蔽，望之只见绿毛不见人，坐时，毛长没膝，席上熏香，坐此席后，沾上的香气竟百日不歇。

褥古人的褥铺在床上的为承床褥，垫在座下的为独坐褥。

皇帝的褥子一般用丝中棉为里，外裹绸缎，加缘饰，魏武帝曹操讲求节俭，褥子只用来取暖，不加缘饰。宋代曾规定，大礼时御座的褥子金裹、装钉、施珠，宋高宗认为事天以诚为主，不必用珠子饰褥。金缕褥和裘皮褥属

于较奢侈用品。张易之因受宠于武则天，其母也分享富贵，张易之为母亲求得了牙席、犀簟、罽貂之褥。

《世说新语》中说，晋孝武帝十三四岁时习性古怪，冬日白天只穿一层单衣，而夜晚叠数层厚褥睡觉。谢安劝道：“体宜令有常，陛下昼过冷，夜热，恐非摄养之术。”孝武帝却说：“夜静宜温。”谢公出门摇头叹气。

枕中国古代民间很早就用杨花、柳絮或其它松软物质作枕。曹魏宫中皇帝用漆画韦枕，韦是熟牛皮，作为枕的外层。晋代皇太子纳妃聘礼有龙头髻枕，是指枕的外形，不知内层用的什么材料。从史书上看，古代财富拥有者们包括皇家爱用宝物作枕，而宝物们如琥珀、玛瑙都是硬物，不知如何消受。古诗曰“睡爱珊瑚枕上凹”，做成凹形大概可以解决后脑不舒服问题。南朝宋武帝刘裕北征时，有人献琥珀枕，光色堪丽，刘裕听说琥珀可疗治金疮，便将琥珀枕粉碎，分给将士们。古代曾出现过水晶枕，夏天用时非常凉爽，水晶应是水银，有首咏水晶枕的诗“千年积雪万年水，掌上初擎力不胜。南国旧知何处得，北方寒气此中凝。黄昏转烛萤飞沼，白日褰帘水在簷。蕤簟螭琴相对好，裁诗乞与涤烦襟”。唐代皇帝曾用水玉腰带祛暑，不知水晶枕是否在御用之列。不过传说玄宗年间龟兹进贡了一样奇特的枕，色如玛瑙，温润如玉，枕之则十洲三岛四海五湖尽在梦中，玄宗将此枕命名为游仙枕。古人认为磁石可以明目，皇宫中常用磁石制成盆枕，据说此枕可使人年老而眼不昏花。梁元帝时，太子献上宝枕，元帝作谢辞“泰山之药，既使延龄；长生之枕，能令益寿。黄金可化，岂直刘向之书；阳燧含火，方得葛洪之说。况复重安玳瑁，独胜瑰材，方松非匹，称榴未拟”。

被《论语》中说“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寝衣指的就是被。衾，则是大被。皇家用的被一般为锦被，有彩、丈、绣并饰以珍宝，但也有普通的被子，宋真宗北巡时，闻某臣病重，赐衾褥令其先归，真宗赐衾褥时说：“此朕常御者，虽故暗，亦足御道涂之寒。”可知宋真宗的这套被子质地很普通。某些皇帝为表明自己尚俭，常将宝物损弃，例如陈宣帝便将豫州进献的罗纹锦被当众烧掉。至少在汉代，鸳鸯就已成为被上的图案，赵合德曾赠给姐姐赵飞燕一件鸳鸯被。五代十图中的后蜀皇帝孟昶有鸳鸯衾，形制特殊，这件锦被宽有三幅，用一梭织成，被头有三穴，中间的圆穴扣于颌下如同衣服的圆领样，两侧的穴叠在颈后。孟昶聪悟明敏，这条鸳鸯衾应是他自己设计的。

九、皇家日常用具

杖皇帝手中经常持杖，以帮助行走。并非年老的皇帝需要这样做。皇帝使用的杖，杖首为龙头状。皇帝也常将御用的手杖赐给亲信大臣。汉武帝有玉箱杖，魏武帝曹操有银角杖。宋徽宗初即位时，接受了江公望的谏言，将内苑畜养的珍禽奇兽驱遣走，其中有一只白鹇眷恋此地，徽宗以拄杖挥之，仍未能赶走。后来徽宗将江公望的谏言刻于杖首。

扇最早的帝王用扇应是舜的五明扇，舜为了广开视听，求贤人以自辅，乃作五明扇。宫廷所用的扇为竹、羽、毛、绢制成。西汉皇帝夏用羽扇，冬用缙扇，不过冬天的扇实在是摆设。竹扇在晋代曾是太子纳妃的聘礼，隋唐以后竹扇则不多见。羽毛制成的扇为皇帝经常使用之扇。梁简文帝赋白羽扇诗曰“可怜白羽扇，却暑复来氛。终无顾庶子，谁为一挥军？”。唐以后用绢、绫、纨制扇较流行，唐太宗曾多次在扇上题字、作诗赐给臣下。

后妃宫女经常使用的扇子叫团扇，又称合欢扇，扇圆如满月，用纱或帛制成。团扇的形状、颜色以及上绣的花鸟蝴蝶十分惹人喜爱，夏季宫女们手中离不开团扇。汉成帝的班婕妤最先将团扇入诗，用团扇比喻自己由受宠到遭冷落的过程：“新裂齐纨素，鲜洁如霜雪。裁成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飏夺炎热。弃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绝。”此后，团扇成为多愁善感的文人们抒发伤情的重要题材。

明永乐年间，朝鲜进赠明宫折扇，明成祖见此扇折、展十分方便，甚喜，称之为撒扇，命工匠仿制。折扇时兴以后，团扇不再独领风骚。清代宫中喜用的是丰润、杭州生产的折扇，做工精细，图画也很优雅，扇骨六十根至一百二十根不等，清末宫中摆上了欧洲的电气扇，然而并没有捐弃传统扇子。宫眷们更喜欢随手的传统扇子，一般初夏用折扇，仲夏用芭蕉扇，盛夏用雕翎扇，雕翎以叶越少价值越高。宫词有“丰润杭州便面娇，内官舒卷嫩凉招。殿头电气虽清暑，适手终输五叶雕”。

如意如意作为搔痒用品不知起于何时，如意的梵语为阿那律。南北朝时期如意在中原成为士大夫们不离手的東西。如意的形状是长柄，柄端呈手指形或心字形。王恺和石崇斗富时，石崇以铁如意击碎了王恺的珊瑚树。梁武帝持有金如意和犀如意，有次附马殷钧被永兴公主欺侮，梁武帝把公主召来，用犀如意打在她的背部，如意立即打碎，武帝犹未解气。梁武帝的犀如意如此不结实，应是犀镂竹节如意，柄是用竹节做成的。唐代有能够辟暑的犀如意，不知如何制成，唐文宗曾赐给李训此物。唐玄宗有次背部奇痒，罗公远折了根竹枝杈当玉如意供玄宗急用，而金刚三藏却从袖中取出七金如意献上。

用珍奇物品制作的如意也是一种玩物，早在三国时，东吴的孙和就持水晶如意在月下挥舞，如同舞剑。到了清代，如意更成了珍贵的礼物和吉祥物，制作也更加精巧，其端多呈芝形或云形。手巾、香囊古人常将手巾带在身上，以备试手用，帝、后、宫女也是如此。《英雄记》中说“尊者前宜各具一手巾，不宜借人巾用。”西汉时外戚王莽斥出王闳，王闳到王太后前面哭泣，太后掏出手巾为其拭泪。孙权也曾用手巾为人拭泪。

香囊内中置香料，后妃们常将香囊别在腰上，携带一身香气。香炉梁孝元帝曾作《香炉铭》：“苏合氤氲，非烟若云。时浓更薄，乍聚还分。火微难尽，风长易闻。孰云道力，慈悲所熏。”古代宫廷中的香炉主要用来熏衣

服，也是一种欣赏物。早期的香炉象征海中博山，以蒸气飘香，水雾象征海之四环。后来香炉用以焚香。皇宫中的香炉都用贵金属制成，曹魏宫中供皇帝用的是纯金香炉，贵人、公主用纯银香炉。明宫中的香炉以黄金为圆炉，大口细颈巨腹，三足饰以钹花，有盖为蹲龙形，两耳为飞凤。

香团，为被中香炉，冬日放在被中取暖，是由西汉长安巧匠丁缓发明的。香团外层是金属镂空圆罩，内设机关三层，中部是烧灼的火球，火球可在内面转动。

暖手、辟寒古代宫中用有暖手的東西常见的是雄黄，雄黄是一种矿物，桔红色，半透明。宫中将雄黄磨成圆饼状，冬天暖手。明崇祯帝待下人很温和，某日无气极冷，宦官钱守俊在旁侍立，崇祯问他：“汝寒否？”对答：“寒。”崇祯将一块暖手赐给他，告诉钱：“合此于掌中以笼袖，则通体俱暖矣。”

唐宫中有样奇异的暖杯，青色，有纹如乱丝，杯薄如纸，将酒注入杯中，便自然沸腾，冒出蒸气。皇帝命将暖杯视为珍品藏于内库。

汉武帝时，异域进贡一种辟寒香丹，冬天在殿内焚之，则暖气发散，室中升温，从外进来的人都要减衣。唐代交趾国进贡辟寒犀，放入金盘中，就暖气袭人。不过这些辟寒奇物并不常有也不常用，用火取暖则属常规。秦咸阳宫冬天用火盆、火炉取暖。到北魏时已有火地，在地面下烧火，通过烟火道传烟于室外。北京故宫有许多设置火地的宫殿，而坤宁宫则有火炕，连接锅台。壁衣，紧贴于墙上的厚布，也有一些防寒作用。故宫藏品中的明清手炉，呈长方体，长二十厘米，宽十二厘米，上有提手，炉中盛炭火散热。

唾壶皇帝使用的唾壶也是用贵金属制成的，金、银唾壶较常见。如曹魏宫中皇帝规定用纯金唾壶，贵人用纯银唾壶，其他朝代大多如此。如果皇帝讲求节俭，则用金粉涂饰的唾壶。汉魏时，由侍中掌管皇帝的唾壶，晋孝武帝时儒臣孔安国为侍中，在孝武帝身边持唾壶奉御，而朝廷之士和他的朋友们都认为他很荣耀。其实历史上这项工作大多是由宦官担当的。

澡盆中国古代皇室及民间的浴具都是盆，而没有淋浴。盆的材料和制作当然不同，民间中上人家用铜盆，宫廷中常用金、银盆。澡盆又称澡盘，盛洗澡水的用具称为澡灌。晋代太子纳妃的聘礼中有两件澡灌。澡灌有提手，小口巨腹。古人用豆末与药物配制成洗粉，称为藻豆，可以令皮肤光润。

溺器溺器又称为虎子或伏虎。皇帝的虎子汉魏时由侍中执侍，后来改由宦官负责。皇帝的溺器随时为皇帝服务，外出时也随行。皇帝溺器也身价不凡，西汉的虎子用玉制成，五代后蜀皇帝孟昶的七宝溺器更是价值连城。而宋仁宗用漆器作虎子，难能俭朴。镜古人将铜磨制成镜，镜又称为鉴。皇帝日常用的镜子边长一尺余，镜框杂饰以金。后妃们则有稍大些的穿衣镜。唐玄宗曾对镜自怜，发现自己一天天消瘦，当时韩休在相位，对皇帝很不客气，有人趁机请玄宗贬斥韩休，玄宗说：“吾虽瘠天下肥矣。”这种褒奖真正难得。

魏宫中始出现带支架的镜台，供梳妆用。晋时已能够制造一人高的大镜，晋宫仁寿殿前摆着一张高五尺余，宽三尺二寸的大镜，清莹耀目。武则天建议高宗造镜殿，镜殿四壁皆树大镜，室内光线闪亮。大臣刘仁轨进殿奏事，见殿内坐着好几个同样的皇帝，吃惊不小，于是进谏：“天无二日，民无二王，适四座有数天子不祥。”高宗命将四大镜撤去。

十、皇室御厨

古代君主的膳食及其烹饪从来就是一件不可苟且的事。在世界范围内也只有中国宫廷把吃饭搞得那样大张旗鼓，有众多苛繁的讲求。在“民以食为天”的中国古代，如果全国的百姓都有饭吃就是太平盛世了。最基础的事务也就是最重要的事物，所以帝王们不能不讲究饮食。“王者食所以有乐何？食天下之太平富积之饶也。”如果天下饥荒，饿殍满路，帝王就应当有撤饌之举，以显示与天下同心、体谅民情。

先秦时，君主的厨师已经列为职官。宰，原本是君主的厨师，后来才成为最重要的辅臣，例如伊尹就是商汤的宰，司马迁说，伊尹扛着鼎，端着俎，用美味令商汤心悦，然后向汤传述王道。从伊尹与商汤的对话中，可以看出伊尹确实是一位高明的厨师，他对汤说：“水居者腥，肉攫者臊，草食者膻，臭恶犹美，皆有所由。风味之本，水最为始。五味之材，九沸九变。火之为纪，时疾时徐。灭腥去臊除膻，必以其胜，无失其理。调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先后多少，其齐甚微，皆有自起。鼎中之变，精妙微纤，口弗能言，志弗能喻，若射御之微，阴阳之化，四时之数，故久而不弊，热而不烂，甘而不啗，酸而不酷，咸而不灭，辛而不烈，淡而不薄，肥而不腴。”

自从宰不再在御厨中操作以后，御厨中的首领就是膳夫了，还有庖人、食医、内饔、外饔、笱人、酒正、醯人等分工合作。秦汉时御厨的首领叫做大官令，下有大官丞、胞人长、丞、大官献食丞、汤官令、丞。

从北齐开始，负责宫廷饮食的机构为光禄寺，沿至清代。隋唐又开辟了第二个御膳机构——殿中省尚食局。从此各代的膳食机构为两个，其一的光禄寺主要负责祭祀食品、宫廷朝会宴享和京官的膳食。唐代光禄寺下设太官署、珍膳署、良醢署、掌醢署（这种设置延至清代）。太官署除令、丞、府、史等负责人员外，供膳二千四百人，主膳十五人。负责皇帝日常膳食的殿中省尚食局，长官为奉御，督办御膳，保障遵守春肝、夏心、秋肺、冬肾的食禁，呈给皇帝的食物，由奉御先尝。此制延及宋辽。

明清的御膳由宦官机构主办。明代宦官十二监中的尚膳监是负责御膳造办的，而实际上御膳由司礼监掌印、秉笔、掌东厂者轮流按月率属造办，只是在崇祯年间一度由尚膳监负责，意在省事，然而崇祯十三年后仍回到以前的做法。尚膳监则办理宫眷和典礼上的食品。清代御膳由内务府下属的御茶膳房办理。御茶膳房设总管大臣，下设各局：荤局、素局、饭局、点心局、挂炉局。慈禧在位时，设西膳房，专为她做各类食品。

清代在制度上规定了帝、后及其以下各等级的饮食供御。每日供给皇帝的膳食原料有：盘肉二十二斤，汤肉五斤，猪油一斤，羊二只，鸡五只，鸭三只，白菜、菠菜、香菜、芹菜、韭菜共十九斤，大萝卜、水萝卜、胡萝卜共六十斤，包瓜、冬瓜各一斤，苜蓿、干闭薤菜各五斤，葱六斤，玉泉酒四两，酱、清酱各三斤，醋二斤，牛乳一百斤，玉泉水十二罐，乳油一斤，茶叶七十五包（十五斤）。

皇后的膳食日用是：猪肉十六斤，羊肉一盘，鸡、鸭各一斤，新粳米一升八合，黄老米一升三合五勺，高丽江米一升五合，粳米粉一斤八两，白面七斤八两，麦子粉八两，宛豆三合，白糖一斤，盆糖四两，蜂蜜四两，核桃仁二两，松仁一钱，枸杞二两，晒干枣五两，猪油一斤，香油一斤六两，鸡蛋十个，面筋十二两，豆腐一斤八两，粉锅渣一斤，甜酱一斤六两，清酱一

两，醋二两，鲜菜十五斤，茄子二十个，王瓜二十条。

十一、进膳制度

帝王们每日进膳颇有讲究。《周礼》中规定，王在进膳的同时要有音乐陪伴，以乐侑食，助食兴。后世虽然没有把音乐与日常进食联系那么紧，但增添了显示皇帝尊贵的各种规矩。皇帝单独进食，如果他高兴，可以恩赐别人一同进餐，包括皇后、妃嫔、皇子女甚至宠臣。

办理皇帝进膳的程序以南宋为例：在皇帝即将进膳的时辰，殿中省的御厨与皇帝进膳之所嘉明殿之间，禁卫成列，设栏杆不许闲人过往。殿中省门上有一人呼唱：“拨食！”随即出现身穿紫衣头裹幞头的“院子家”十余人，右手托一盒用黄色的绣龙布罩着，左手携一条红罗绣手巾，将食盒摆放在嘉明殿膳桌上，然后又托金瓜盒进来摆放，这样皇帝的膳桌上就有二十几盒食物。然后皇帝开始进膳。

清代皇帝一日两餐，早餐在六一八点，晚餐在下午二一四点。每餐品种一般在十五至二十五之间。每日在传膳前，先要进膳单，膳单上写明某人调某样，某人烹某样，以备查核，膳单的另一张写着每膳菜目，以备点菜。根据皇帝所点的食样传膳，如果皇帝下次未说明撤换某样，则每次都要预备。在皇帝的膳桌旁还要另设一几案，以备赏赐。皇帝用完膳后，剩下的分赐给各宫眷或其他人。

十二、美食和珍味

先秦时，古代宫廷就很讲求肉食，王的平日膳食多取用六牲，即：马、牛、羊、豕、犬、鸡。还总结了美味八珍，即用牛、羊、麋、鹿、麋、豕、狗等原料制成的淳熬、淳母、炮豕、捣珍、渍熬、糝肝、膾炮、牂盖。春秋战国时又将八珍衍化为：龙肝、凤髓、豹胎、鲤尾、鸮炙、猩唇、熊掌、酥酪蝉（羊脂）。不知龙肝凤髓是由何物取代的，已知的明代宫廷大宴上的鱼凤烹龙，是用雄雉代凤、白马代龙。不过这些珍奇不是帝王平日常能吃到的。

《周礼》中将王的膳食称为玉食，并不只是形容。古人认为玉是阳精之纯者，食玉可以御水气。所以玉还有食用一途。不过玉实在太珍贵了，也谈不上味美，把玉屑配成食物摆上膳桌的事很难出现。把玉粒含在死者口中则是丧礼中的一项。

传说黄帝发明了蒸谷为饭，此后，饭成为贵贱均受用的主食。《礼记》中说，武王陪父亲文王进餐时，为表示孝敬，文王吃完一碗添饭，武王也同样再添饭，不使父亲感到吃得比儿子多。古人赞颂周公求贤时，常说周公一饭三吐哺，可见当时饭便是日常主食。

在未用麦磨面时，麦是用来蒸食的。麦饭是民间常用食物，对于君主来说，食麦饭则意味着俭朴，有时匆忙或不得已只能用麦饭充饥。东汉光武帝一次外出遇大雨，冯异侍从光武帝，把车驾引至路旁空舍前，君臣躲进空舍，烧灶烤干衣服，冯异煮好麦饭，端来请光武帝食用。

王充生活在汉代，在《论衡》中讲到当时粟饭的做法，粟是小米，“舂于臼，簸去糠，蒸于釜甑，举之以火，成熟为饭，乃甘可食也。”其实粟饭在春秋战国时已成为粗饭。粱是上等的谷子，膏粱是指肥肉加粱米饭，为富贵人家的膳食，那么宫廷中自然多用粱加工为饭。古人将麦以外的脱粒后的谷物都称为米，“粢”和“精”指的是上等米。糯米早就出现，但并不普及。自宋代引入占城稻以后，粳米成为人们的主食，尤其在南方，宫廷也不例外。“为稻粱谋”一语出现在唐以后，指的是谋一份不错的饮食（生计），可知稻、粱为较好的食物。到明清，稻米成为细粮中唯一的米类，小米、高粱已没有资格进入御厨，清代康熙皇帝还潜心研究稻种，培植了优良品种的稻米，在全国推广，在京西用玉泉山水灌溉的优质稻，为宫廷专用。清末宫廷用米除玉泉山米以外，还有紫、白、黄三色米，由河南产，因颜色奇特，受到两宫太后的欢迎。

大概从西汉开始，人们将麦磨成面，加水成团、压扁，烤或蒸熟，叫做饼。馒头是由蒸饼发展过来的，面和米成为主食中的两类。在宫廷，主食应算是肉而非谷物。

经常出现在御食中的汤饼，是煮熟的面食。饼又是面食的通称。汉代汤官负责供应御膳中的饼类。魏文帝曹丕曾怀疑何晏面色是涂粉之故，为验证此事，文帝召何晏来，赐食汤饼，何晏脸上冒出汗，文帝用朱衣拭其面，面仍皎白。唐代御膳中有“银饼馅”，用乳酪和面、膏腴作馅，皇帝有时将此饼赐给大臣食用，品尝到这种饼的大臣觉得美味无比。

五代时后唐明宗命人按他的意思做饼，用碎肉与面揉在一起，做成臂状，用刀截成每只二寸厚，蒸熟食用，称为“同阿饼”。北周宫中有种莲花饼，内有十五层，每层夹一朵莲茶，共十五色，宫中将此饼称为“蕊押班”。北宋宫中御膳的饼类有鸞鹑饼、天喜饼、密云饼，外面还进贡龙团凤饼。餠也

是一种饼，宋御食中有驰蹄饊、春分饊。

可知唐以后御膳用的饼越来越精细、考究，别出心裁，普通的饼在御膳中失去了地位，只是在刻意锻炼节俭风尚和困顿无奈时才食用。唐玄宗和太子之间曾在饼的问题上发生了一则微妙的事情：一次，玄宗与太子共进餐，太子用刀切割熟羊肉，刃上沾满了油渍，太子用一张饼把刀擦干净。玄宗观察着太子的举动，见他饼洁刀，面露不快之色；太子正不知怎样处理这张饼，象抹布一样扔掉当然痛快，发觉了父皇的脸色后，太子只好慢慢把饼送到嘴里。玄宗立即有了笑容，并说：“福当如是爱惜。”唐僖宗避战乱逃到蜀地的那段日子十分狼狈，粮食匮乏。到几乎断粮的那天早晨，有位宫女拿出方巾包着的半斤面，用村人进献的酒和面做饼，烙成后请皇帝进用。嫔妃捧着饼哭着请求道：“此消灾饼，官家若以社稷生灵为意，乞强进半枚。”

至少在南北朝时，宫廷就已出现发面饼。南齐时曾用“面起饼”作祭品。发面食品无疑也加入了御膳之列。宋代馒头的价值和美味被皇帝所承认，宋神宗视察太学时，对其伙食中的馒头十分满意，并说：“以此养士，则无愧矣。”御膳中也有子母馒头。

馄饨估计是由汤饼发展来的，宋御食中有五色馄饨。而饺子与馄饨做法相似，唐代已有水饺饵，又称为汤中牢丸或粉角。但未见唐宋皇帝如何赞赏它的美味。

一生向往先贤的孔子，从古书上得知周文王喜食菖蒲菹（用一种有香气的水草制成的酱），孔子也试图对菖蒲菹感兴趣，每日把菖蒲菹摆上食桌，缩着鼻子吃下去，三年以后才适应了，孔子是个讲求美食尤其喜好肉食的人，必知先贤的嗜物并不甚佳。

其实三代、秦汉乃至南北朝的宫廷膳食都远不能和后世相比。

魏晋南北朝有特殊的政治、社会格局，当时皇帝的膳食居然不如门阀贵族，皇帝经常对富臣的美食垂涎。晋武帝曾到王济宅中做客，王济之父王浑是晋朝大将，王济是名士兼附马。在王家，晋武帝发现这里的佳肴自己从未尝过，其中一样用琉璃器皿蒸熟的食物美味无比，武帝问王济此菜如何做法，王济答曰：“以人乳蒸之。”武帝脸上出现不平之色，未进完餐就起身离去了。宋文帝常到大臣谢弘微家求食，谢弘微是个理膳能手，文帝光临其家，谢弘微忙与家人在厨中烹制，呈上，文帝得以美餐一顿。南齐武帝向祠部尚书虞悺求扁米糲，虞悺献糲及杂肴数十^器（器具），太官御厨愧然不如。武帝亲自向虞悺求其饮食秘方，虞不肯献出。武帝某次醉酒，周身不适，虞悺仅拿出醒酒鲭鲈一方。武帝仍无怪罪之意。以贪吃肥胖著称的宋明帝，尤其好食逐夷，即用石首鱼、鲨鱼、鲑鱼的肠肚制成的酱，明帝将此物由银钵盛蜜浸渍，每餐吃上数钵。一次明帝对扬州刺史王景文说：“这是奇味，你有吗？”王景文答：“臣一直很喜欢吃，但家贫很难得到。”明帝听了十分得意，更加嗜好此物。由于贪吃，五脏难以负荷，胸闷腹胀，以至透不过气来，复又大量饮酒以助消化，最终困于饱食而死。

隋唐以后皇宫的膳食跃上了新的台阶，尚食局集中了全国一流的厨师，其手艺在朝廷外很难找到对手。皇帝便可享受天下至美的食品，南北朝的困境不再复现。

唐代的御食用装饰华贵的牙盘盛装，日常膳食每餐用九个牙盘装食味。

唐代尚食局的手艺被人们传为佳话。中书省的冯给事曾帮过新提升的尚

食令的一点忙，尚食令提出要去冯家献点薄艺。这位尚食令是位造¹馎²子（薄饼）手，他在冯家厨房操作，冯氏一家人在帘后观看。只见他极为利落地团面，旋即一张薄饼置入铛（三爪锅）中，将熟，又渡出入水中，良久，忽又投油铛中，取出抛在台盘上，饼仍旋转不止，冯给事一家人品尝，其味脆美，不可名状。这不过是略施小技。制作珍味御膳要比这复杂得多，如“浑羊殄忽”的做法是：取鹅，去毛及五脏，内中置肉及糯米饭，五味调和。取羊一只，去毛及肠胃，置鹅于羊中，将口缝好，放在火上烧制。羊肉熟时，取出肚中之鹅食之。皇帝经常将这种美味赐给翰林学士。

唐玄宗曾设计了一种食样，用刚射来的鲜鹿（幼年的鹿），取血、剖肠，用鹿血加热煎鹿肠，趁热食之，叫做热洛河。玄宗还将此味赐给安禄山和哥舒翰。

唐敬宗时，内廷新出一种供暑食的清风饭。用水晶饭、龙睛粉、龙脑末、牛酪浆调和，放入金提缸，垂下冰池，待其冷透，供为御膳。就是一种凉粥，只是原料除牛酪浆外，令人难以确认为何物。

很多物质名称上古今不同，使人迷惑，古人给食物起的名称多很奇妙。唐代皇帝的早膳有一种叫“玉尖面”，用“消熊栈鹿”为肉馅，就是今人的包子，玉尖面指的是馒头，熊之极肥者叫做“消”，鹿以倍料精养者叫做“栈”，所以这种包子的馅用的是熊和鹿肉，主要是肥肉。古人以肥肉为美味，“熊白”便是一项，取用熊背部的肥肉。

唐御膳中有很多食样，世人从未见过、尝过。御厨的绝艺也秘不外传，人们只能从皇帝恩赐的食样中管窥其豹。如唐懿宗的女儿同昌公主下嫁时，懿宗所赐的御馔中有灵消炙、红虬脯，颇为奇特。灵消炙是从一羊上取下的四两肉烤制成的，经酷暑而终不见腐败。虬脯大概是用牛或其它牲畜筋做成的，位于盘中健如虬，红丝高一尺，按倒可再弹起来。没有人能看得出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唐代御食中很多食品是制好后可以久存的熟肉，调料中有较多的盐和糖，经烧烤去掉大部水分，因此可以久存。炙的品种很多，其中有一样逍遥炙，不知用何种原料，逍遥炙用九龙食³盛装，一定是炙中的佳品。其实炙这种熟肉制品先秦就已有之。

唐代皇帝为了广揽美食，制定了一项新规定，凡新升任的公卿大臣，都要向皇帝献食，称为“烧尾”。烧尾之意，意为新羊入群，多有不顺，必火烧其尾，才可窜入群中。烧尾本是士人新登第或升迁时的贺宴，被皇帝取用来，可见皇帝之贪婪饕餮。

韦巨源拜为尚书令后，大献烧尾，留下一本食帐，可供后人一睹当时饮食之盛。《清异录》中转载了其中奇异者，今再加转载：“单笼金乳酥”（饼但用独隔通笼，欲气隔）

“曼陀样夹饼”（公厅炉）

“巨胜奴”（酥蜜寒具）

“婆罗门轻高面”（笼蒸）

“贵妃红”（加味红酥）

“七返膏”（七卷作回花，恐是⁴糕子）

“金铃炙”（酥揽印脂取真）

“御黄王母饭”（遍镂印，脂盖饭面，装杂味）

“通花软牛汤”（胎用羊膏髓）

“光明虾炙”（生虾则可用）
“生进二十四气馄饨”（凡形馅料各异，凡二十四种）“生进鸭花汤饼”
（厨典入内下汤）
“同心生结脯”（先结后风干）
“见风消”（油浴饼）
“金银夹花平截”（剔蟹细碎卷）
“火焰盏口餠”（上言花下言体）
“冷蟾儿羹”（冷蛤蜊）
“唐安餠”（斗花）
“水晶龙凤羔”（枣未蒸破见花乃进）“双拌方破饼”（饼料花角）
“玉露团”（雕酥）
“汉宫棋”（钱能印花煮）
“长生粥”（进料）
“天花铍锣”（九练香）
“赐绯含香粽子”（密淋）
“甜雪”（密监太例面）
“八方寒食饼”（有木范）
“素蒸音声部”（面蒸象蓬莱仙人凡七十事）“白龙臠”（治鳊肉）
“金粟平餠”（鱼子）
“凤凰胎”（杂治鱼白）
“羊皮花丝”（长及尺）
“逡巡酱”（鱼羊体）
“乳酿鱼”（完进）
“丁子香淋脍”（醋别）
“葱醋鸡”（入笼）
“吴兴连带酢”（不发缸）
“西江料”（蒸彘肩脍）
“红羊杖杖”（蹄上裁一羊得四事）“升平炙”（治羊鹿舌拌三百数）
“八仙盘”（剔鹅作八副）
“雪婴儿”（治蛙豆荚贴）
“仙人齏”（乳沦鸡）
“小天酥”（鹿鸡糝拌）
“分装蒸腊熊”（存白）
“卯羹”（纯兔）
“青凉臠碎”（封狸肉夹脂）“筋头春”（炙活鹑子）
“暖寒花酿驴蒸”（耿烂）
“火铍犊炙”（尽火力）
“五生盘”（羊兔牛熊鹿并细治）
“格食”（羊肉肠脏缠豆荚各别）
“过门香”（薄治群物沸治烹）
“缠花云梦肉”（卷镇）
“红罗钉”（膾血）
“遍地锦装鳖”（羊脂鸭卵脂副）

“汤浴绣丸”（肉糜治，隐卵花）

“蕃体间镂宝相肝”（盘七升）

不仅大臣们“烧尾”，皇室贵族也争相献食，以博取皇帝的欢心。唐玄宗对献食的接收尤为认真，专门派宦官袁思艺为检校进食使。中书舍人窦华某次退朝时，正逢公主献食的队伍拥来，道路为之堵塞，窦华心怀不满，按辔在其队中穿行，宫苑小儿数百人举捧向前，窦华只得快速逃走。

在食品上镂刻，是隋唐以来（或许更早）御膳制做中的一道手艺，使膳品艺术化。隋代大业年间晋阳进献的镂金凤蟹，美味又赏心悦目，被认为食品第一。宋代御食上镂刻龙凤图案十分常见。五代十国中的后蜀只存在了三十一年，而尚食机构却有食典一百卷，可见该国君主对玉食的讲求已经到如火如荼的程度。也有在饮食上注意俭德的皇帝，当然不可能想象哪位皇帝能始终粗茶淡饭，偶一为之，就已经被臣民赞叹，被史家记述了。例如南齐明帝某次在进食“裹蒸”（有馅的蒸饼）时，对待者说：“我食此不尽，可四片破之，余充晚食。”唐德宗初即位时，曾召韩王与他共进马齿菜羹，不加盐酪。宋仁宗在一次内宴时，见馔中有新蟹一品二十八枚，便问：“吾尚未尝，枚值几钱？”旁人回称一枚值一千钱。仁宗生气地说：“数戒汝辈无侈靡，一下箸为钱二十八千，吾不忍也！”置蟹于一旁不食。宋仁宗的俭与仁确实难得，他曾告诫内臣不得烹制活着的动物，等于减少了自己饮食上的一大享受。明太祖初定天下时，每早晚的膳桌上必列豆腐，以示不敢奢侈。这种作法子孙无法继承，不知从何时开始，豆腐换成了百鸟脑浆，成为珍味一品。宫词有道：“来其旧品何时换，鸟脑新蒸玉一盘。”

宋代的上等御膳食样，可以从某次宴请金国使臣的膳席上略窥一二：第一盏，肉臠鼓；第二盏，爆肉双下角子；第三盏，莲花肉，油饼骨头；第四盏，白肉胡饼；第五盏，群仙炙、太平毕罗（有馅面食称毕罗）；第六盏，假圆鱼；第七盏，柰花索粉；第八盏，假沙鱼；第九盏，水饭、臠鼓、旋鲜瓜姜，看食枣、镏子髓饼、白胡饼、环饼。

辽代皇帝喜食的佳肴是一种大鼠，名毗狸，足短体肥，从洞穴中捕来，用牛乳饲养，然后随时供应御膳，味极肥美。皇帝独享外，有时让王公卿相尝尝鲜，公、相以下的官吏无资格染指。羊，则是皇帝的日常膳食，每日例有五只羊被投入御厨，供皇帝一人进用。用玉板笋与白兔胎做成的羹，味道极佳，称为“换舌羹”。

元代的饮食八珍是：醍醐（乳酪酥油）、麇沆（马奶酒）、野驼蹄、鹿唇、驼乳糜、天鹅炙、紫玉浆、元宝浆（马奶子）。

明清两代尤其是清代，宫廷膳食品种繁多、制作精细，并在全国几大菜系（鲁、苏等）基础上形成了宫廷菜肴的风味和气派，这是前此千余年帝王梦寐以求而不能企及的。

各种珍味御膳的做法，是密不外传的，以确保皇家独享。如明宫甜食房造的丝窝虎眼糖、裁松饼减煤等样，不许外人观看制作过程，外廷官员既使能够尝到也悟不出其秘方。自然内廷食单也不能传外。阮葵生的《茶余客话》中仅录了一则漏传于外的明大内食单“一了百当”，名称很奇特，做法也同样：用牛、羊、猪肉共三斤，剁烂；虾米半斤，捣为末；川椒、马芹、茴香、胡椒、杏仁、红豆各半两，俱为细末；生姜切细丝十两，麦酱一斤半，腊糟一斤半，盐一斤、葱白一斤，芫荽细切二两，用好香油一斤炼热，然后将上件肉料一齐下锅炒熟，候冷装入磁器内封贮，随食取用，亦以调和汤汁为佳。

皇帝在饮食上有各自的偏好，有的养成嗜好，其嗜好的膳品也未必考究。明熹宗喜欢将炙蛤、鲜虾、燕菜、鲨翅诸海味十余种，共脍一处食之。明穆宗喜欢吃果饼，在藩邸时就常派人到东长安大街买食。即位后某日穆宗极想吃果饼，很快尚食监和甜食房开价数十两到外面去买原料制作，穆宗吃到饼以后告诉他们，这种饼只需五钱就可买一盒，内臣们心虚，缩着脖退下去了。崇祯帝则雅好燕窝羹，厨师们调制时非常小心细致，做好后先让负责人尝，再递尝五、六人，参酌咸淡，然后进御。

清代帝、后的饮食可称得上中国宫廷之最了。在食物的色、香、味、美观及数量上都达到了巅峰。这种人间天堂的膳食享受主要体现在清末帝、后上。清圣祖康熙对饮食看得很淡，食不兼味，他曾说：“朕每食仅一味，如食鸡则鸡，食羊则羊，不食兼味，余以赏人。”受制于慈禧太后的光绪皇帝，饮食粗糙而不新鲜，光绪曾在慈禧太后面前请求改善饮食，慈禧则声色俱厉地说：“为人上者亦讲求口腹之末耶？奈何独背祖宗遗训！”在被软禁期间，光绪的餐桌上竟摆有腐臭食物，或者干、冷，以至于光绪吃不饱饭。

清宫中饮食享受最尽情的无疑是慈禧太后。一餐之食，竟有一百多品种，食器也非常考究。饭前，先进瓜果、饮茶。一餐食品中，猪肉类约有十种，鸡、鸭、羊肉各具数种，烤、蒸、炒各色花样，及制成龙、凤、蝴蝶、花卉各种图案和吉祥字样。清代御食经厨师们绞尽脑汁、翻新的花样层出不穷，可用菜肉的丝、块、色拼成“福”“寿”“万”“年”“如”“意”等字，这是前代未能做到的。

清代帝、后每次进餐的膳单，都按规定填写、保存，形成档案，给后人留下了查考和研究的资料。这也是清宫膳食工作制度与前代不同的地方，也表明了清宫对吃的重视，以对待要务的方式对待。

兹举一则清帝早膳：

乾隆五十三年七月初七日，上午卯时早膳：燕窝扁豆锅烧鸭丝一品，酒炖鸭子、酒炖肘子一品，燕窝肥鸡糊丝一品，羊肉片一品，托汤鸭子一品，清蒸鸭子、烧狗肉攒盘一品，糊猪肉攒盘一品，竹节卷小馒首一品，孙泥额芬白糕一品，巧果一品，菜一品，奶子二品。

这在清前朝是一桌奢餐，对于清末慈禧和同治来说，应算常餐。

十三、宫廷美酒

中国古人用粮食酿酒开始于传说时代。葡萄酒则产自西域。古人在造酒时，根据其浓、淡、浊、清与酿制方法，为酒取了很多以西为字旁的名字。

古人称酒为天之美禄，显示出对酒的重视和喜爱。《周礼》中规定，国家设酒府，以酒正为长官，负责按日、月、年统计朝廷饮酒之事，酒人、酒才负责造酒、品其厚薄并将酒提供给君主的宴席。

汉武帝宫中有九丹金液、紫红华英、太清红云之浆，浆属于淡酒。兰生酒是汉宫中的名酒，百末旨酒是采百草花末杂于酒中，旨，美也。马酒即是马乳，马乳也有酒的味道，多饮也会醉。汉时西域大宛国用葡萄造的酒，被带入中原，深受帝王们的喜爱，视为珍品。汉武帝就以葡萄酒迎接西王母的降临。魏文帝曹丕曾对群臣说：“葡萄酿以为酒，过之流涎咽唾，况亲饮之？”葡萄酒较之中原的米酒，味道甘甜还容易使人醉，所以曹丕又说“葡萄酿以为酒，甘于曲米，善醉。”

南北朝时，有蒲桃酒、千里酒、桑落酒、缥醪酒、河东酒、菊花酒。其中桑落酒和菊花酒是用桑叶和菊花加进酒浆中酿制的，或说桑落酒是桑叶落时取井水酿成的。缥醪酒则是精酿酒。

唐人喜欢用“春”字为酒取名，当时有富水春、若下春、土窟春、石冻春、松醪春、竹叶春、梨花春、罗浮春、瓮头春、曲米春、抛青春。绍兴造的酒名蓬莱春酒。

魏征有造酒的手艺，他所造的酒有醪醕、翠涛两种最为珍奇，将上述酒置于罐中贮藏，十年不会腐坏。唐太宗非常欣赏魏征的酒，题了一首诗赐给魏征：“醪醕胜兰生，翠涛过玉蕤。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败。”玉蕤是隋炀帝时宫中的名酒。唐太宗的诗作得不甚有韵味，但说明了唐人的造酒技术有了很大提高。以往的米酒，酒精含量不高，一般是现酿现饮，不易长久贮存，魏征造的酒显然是酒精含量高，容易醉人且能贮存长久。葡萄（亦写做蒲桃）酒也较中原的米酒贮存时间长，有较高的酒精含量和甜度。西域人造葡萄酒始终是拿手的，五代时，于阗能用葡萄造出紫酒、青酒，其味尤美，大概就是红、白葡萄酒。

光禄寺下设良醕署，隋唐至明清一贯，良醕署负责酿造和供应祭祀用的酒以及进贡宫廷饮宴用的酒，进贡宫廷的有醪醕、桑落等酒。

唐宪宗时，李化酿制了一种酒，名叫换骨醪，不知用何法，宪宗将此酒视为上品，当晋国公平淮西之乱后回京时，宪宗将贮于金瓶上盖黄靶的换骨醪二斗，赐给晋国公。唐宪宗对仙术很是好奇，同时也喜欢奇异的酒，其宫中有乌戈山离国进献的龙膏酒，酒黑如纯漆，饮之令人神爽。

南唐时又有龙脑浆，为高级补品，南唐元宗李璟试图用酒调制龙脑浆，然后饮用，这时异人耿先生说：“未为佳也。”于是他用更高明的办法，制成了香气馥烈的龙脑酒。

北宋宫中有珍奇名酒鹿胎酒，皇帝在内廷饮宴时常饮此酒，某次宰相韩琦承恩到御榻前，接受了仁宗为他酌的一大杯鹿胎酒。

南宋宫中名酒有蔷薇露，皇帝常将另一种酒——流香酒，赐给大臣。

元代皇帝在宴席上常饮琼华汁、玉团春等酒。“沉沉宫宴醉流霞”，流霞也是一种名酒。宫中还有枸杞酒，即用枸杞泡在酒中，枸杞酒被视为补酒，元仁宗曾将此酒赐给大臣察罕，说：“以益卿寿。”

明代宫中用酒不再由光禄寺提供，而是由宦官机构御酒房酿造。御酒房所造的酒有荷花蕊、寒潭香、秋露白、竹叶青、金茎露、太禧白。崇祯帝喜欢金茎露、太禧白，称这两种酒为长春露、长春白。魏忠贤把持内廷时，常在宫外造酒，然后通过御茶房进献于皇帝，酒的名目很多，有金盘露、荷花蕊、佛手汤、君子汤、琼酥、天乳等。宫词中说：“但看御酒供来旨，录得嘉名百十余。”

清代中国的造酒业有了长足的发展，至今许多声名遐迩的名酒均创于清代。但是清宫中却有康熙皇帝的酒戒，康熙的御制诗刻于元朝遗留下来的黑玉酒瓮上。所以皇帝的膳桌上按规定不许摆放酒具。康熙律己甚严，能够做到终生放弃饮酒之乐，但他的子孙对于饮酒的戒令并未认真执行，不过终清一代确实不曾有嗜酒的皇帝。

乾隆在位时，大臣张照曾献松苓酒方，乾隆命人按此方制酒，在山中觅古松，深挖至树根，将酒瓮开盖，埋在树根之下，使松根中的液体渐渐被酒吸入。一年以后挖出，酒色如琥珀，松苓酒便制成。乾隆皇帝经常有节制地饮用此酒，清人说，乾隆寿跻九旬，康庄日健，有松苓酒的作用。

光禄寺下属的良醞署为正式的酿酒部门，每年春秋两季取京西玉泉水酿酒。用糯米加豆、麦曲、花椒、酵母、箬竹叶、芝麻制成的玉泉旨酒，是皇帝日常的御用酒。乾隆皇帝每晚饮二两玉泉酒。嘉庆皇帝的酒量比其父要大，每天饮六、七两酒为常事，遇节庆或兴致高时，可饮十四、五两。较之历代豪饮的皇帝，嘉庆不能算为嗜酒。

古代风俗于正月一日饮屠苏酒，以驱除瘟疫。端午节则饮雄黄酒，以驱除蛇虺等毒物。清宫例于节前造上述酒。清宫屠苏酒，是将大黄、桔梗、白术、肉桂、乌头、菝葜研为细末，裹于布中密封好，在腊月三十日中午悬入井内，距水面三尺，正月初一日子夜取出。将上述物品与木瓜酒、水糖面按剂量一同煎熬，经四、五开，制成屠苏酒。雄黄酒则是将雄黄调入玉泉酒或太平春酒中制成。菊花白酒、莲花白酒是清末宫中两大名酒，由于受到慈禧太后的喜爱而身价倍增。莲花白酒用昆明湖产的莲花配酒酿成，菊花白酒用滋补药材入酒中浸泡，酿成。

清末宫中的宴席上，出现了香槟等洋酒，香槟酒“气香烈，开时不慎，则酒气上冲，淋漓满地，而瓶无余滴矣。先以小锥锥瓶，以泄气。”洋酒的这种特点与国酒大不相同，用小锥凿瓶盖的做出气孔，颇有些滑稽，显示了宫眷们好奇、喜爱之心和洋酒的魅力。

十四、皇家酒宴

晋代文人江统在《酒浩》中说“历代悠远，经史弥长，上自三皇，下逮五帝，虽曰圣贤，亦咸斯尝。”意即帝王和圣贤早就与酒有缘份。嗜酒的诗人皇帝曹丕则挥笔写道：“盖闻千钟百觚，尧舜之饮也；惟酒无量，仲尼之饮也；姬旦酒肴不撤，故能制礼作乐；汉高祖婆娑巨醉，故能暂蛇鞠旅”。这是说帝王与圣贤对于酒有大量的需要，有多大的气魄就有多大的酒量，酒能够帮助帝王和圣贤缔造大业。其实，这不过是曹丕在赞颂饮酒之行时的一种联想，完全是侍人语言。酒虽然能带给人豪气，但圣贤之君和圣贤之臣多把酒视为不祥之物。当仪狄造酒，献给禹品尝时，禹饮了一口，觉得甘美、心脾舒畅，但马上警觉，说：“后世必有以酒亡国者。”从此疏远了仪狄。

酒是其它物品所不能替代的享受物，酒带给人的畅快简直难以言表。唐穆宗是嗜酒贪杯的皇帝之一，夏初，樱桃盛开，穆宗在临芳殿赏樱桃。美人在侧，酒杯在手，连饮三杯西凉葡萄酒，穆宗对左右的人道出感觉：“饮此顿觉四体融恬，风味如仙，真太平君子也。”

以建立大功业为己任的君主，对于酒很是谨慎。勾践卧薪尝胆时，拒绝饮酒，有人献上酒来，勾践命令把酒流之于江，以示与民同甘共苦。齐桓公某次饮酒过量，醉后失态，把冠掉在脑后。桓公清醒后感到羞耻，三日不上朝。管仲建议他雪耻，发仓济贫，将罪轻者放出囹圄。唐玄宗因酒醉后误杀一人，从此不再饮酒。

不过，既已沾上酒瘾想要戒酒决非易事。元太宗窝阔台酒瘾很大，晚年尤甚，日日与大臣们酣饮。大臣耶律文正屡屡进谏，窝阔台如若无闻。一天，耶律文正手持装酒的铁器对窝阔台说：“此乃铁耳，为酒所蚀，尚致如此。况人之五脏，有不损取！”窝阔台听了，有所警悟，命令左右，每天只进三钟酒。可以料想他原来的酒量有多大，而三钟酒仍算豪饮，离戒酒差得远。虽然明明看见金属物都经不住酒的腐蚀，但没有什么力量可以使陷于酒瘾的皇帝放弃酒的享受。

汉灵帝除了享乐以外，没有别的兴趣，夏日在裸游馆避暑，长夜饮宴，聊醉在酒酣、色迷之中，汉灵帝美美地叹息道：“使万年如此，则为上仙矣！”

儒雅而开明的金章宗，在夜饮中神怡，尝到了无与伦比的享受，章宗将橙子掏空，当作酒杯，称软金杯，悠然自娱。他命侍饮的翰林待制朱澜作夜饮诗，诗中的境界雅致而浪漫：

夜饮何所乐，所乐无喧哗。

三杯淡醺醺，一曲冷琵琶。

坐久香成穗，夜深灯欲花。

陶陶复陶陶，醉乡岂有涯。

章宗认为此诗道出了他心境，赐给朱澜软金杯。

宫廷宴饮是君臣们常有的聚会，在这种非政务性的聚会中，君臣之间的情义能够得到增进。在酒宴中畅饮是做臣子的正常表现，不饮或少饮则有不敬之意味。在酒宴上，“酒使”负责督察每个人的饮酒情况。汉代吕后执政时，宫中设酒宴，刘章被指定为酒使，刘章提出按照军法执行使命，被许可了。酒宴进行中，刘章发现某位吕姓贵戚逃酒，当即捉住，斩了首，吕后也无可奈何。吴末帝孙皓每宴会群臣时，要求坐席中人无论能否，一律喝完七斗酒，设置黄门侍郎十人与酒令共同监督大臣们饮酒，饮宴结束时，向孙皓

奏告犯有缺失者，然后随罪过大小加刑。

对于皇帝亲自劝的酒，大臣是不能拒绝的。北宋大臣王审琦本不能饮酒，宋太祖在后苑设酒宴，饮之前，太祖为王审琦祝曰：“酒者天之美禄，可惜不能饮之。”然后说：“天必赐卿酒量，试饮之。”王审琦唯恐令太祖不快，鼓足勇气，连饮了十几爵，太祖为自己的祝词灵验而得意，从此每次饮宴，王审琦便充作酒囊，回到家则仍旧没有酒量。宋徽宗在内廷摆酒，蔡京之子蔡攸承恩侍饮，蔡攸不学无术，在朝中结党营私，徽宗对其父子颇存厌恶。在酒宴上，徽宗手持巨觥，频频劝酒，蔡攸力不从心，连连表示再喝不下去了，而徽宗一次次把巨觥伸过来给他酌酒，以至蔡攸脚步颠簸、跌倒，徽宗看着他的丑态说：“就令灌死，亦不至失一司马光也。”

帝王们对酒的兴趣，与色并齐，酒色相互提携，有些帝王对酒的依恋甚至超过了对色的需要。明福王有一则名句“万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几见月当头。”道出了酒对帝王们是何等重要。酒对帝王们是最基本的享乐也是最后的避难所。而色，最能助酒兴，驱使帝王投入醉乡，酒酣则助长色欲。

如果某个帝王沉溺于酒色，就很难自拔了。不仅朝政紊乱，他自己也会付出代价——健康、寿命乃至祖先拼来的政权，都会象酒杯一样倾倒。当夏桀沉溺于酒色之时，荒唐的行为也伴随而来。史书上说，桀开凿的酒池大得可以行舟，桀不是在夜宫中令男女杂处，就是召三千人在酒池边象牛一样饮酒。商纣与夏桀的行为极为相似，以酒为池，悬肉为林，男女裸逐其间，宫中设九个热闹场所。供纣作长夜之饮。

南北朝时，北朝的不少皇帝，以酗酒为务，长期酗酒使能性情暴戾，喜怒无常，动辄杀人。前秦君主苻生本性狂暴，加上酗酒，更无人情，他在太极前殿大宴群臣时，要求在场的每位大臣都必须喝醉，命令尚书令辛牢劝酒，众人只得拼命灌酒，然后东歪西倒，苻生忽然发现席中尚有未醉的，便责问辛牢，不及辛牢作出反应，猛然搭箭射去，辛牢中箭而死。大臣们心惊肉跳，为了保命赶快灌酒。于是在场的大臣全部“醉”倒了，丑态百出，苻生见状方开怀大笑。

苻生狂虐数载后，苻法、苻坚兄弟发动政变，苻生落入缧绁。在被赐死前，苻生要求一醉而死，将数斗酒一饮而尽，醉倒被杀。

北齐文宣帝高洋在初继位的五、六年中，政绩十分出色，富于谋略和果敢。自从陷入酗酒以后，便逐渐失去了理智，或歌舞狂闹或杀人取乐。杀人后或将尸体焚之于火或投之于河。由于酒精作祟，精神恍惚。高洋常自称见到了鬼，或听到怪异的声响，这种毫无人性的生活即使无人夺命，也会自毙，高洋到三十岁时，已经生命垂危了，不能正常进食，每天只能喝酒度日，酒又加快了奔向死亡的速度。高洋被酒魔夺命时只有三十一岁。

第八章 深宫珠宝略说

一、宝石王国

亚洲是世界上宝石最为丰富的地区，尤以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中国所产宝石最为珍贵。历史上，东南亚至印度这些盛产宝石的国家都臣服于强大的中国，时常将所产的珍稀宝石进贡给当时的帝国宫廷，所以，中国宫廷中宝石盈庭，灿烂夺目，以至于帝王们不知道该拿这些宝石干什么？五代后蜀皇帝孟昶别出心裁，在撒尿的溺器上装饰七种珍宝，后来北京军队攻灭后蜀，搜出了这件宝物，谁也猜不出是做什么用的。

亚洲以盛产宝石驰名世界的国家是紧邻中国的缅甸，不仅宝石多样，产量丰富，而且历史十分悠久。缅甸有三大宝：宝石、琥珀、翡翠。在很久远以前，勤劳的缅甸先民便采出了各种宝石，尤其是红宝石，从而扬名天下，其抹谷和鸡打城便是人们所羡慕的宝石城。缅甸宝石种类很多，珍贵的有几十种，主要包括红宝石、蓝宝石、白宝石、宝石、尖晶石、吕宋绿。缅甸的红宝石是世界红宝石中的稀世奇珍。

斯里兰卡（古称锡兰）是亚洲遍地宝石的国家，山地、丛林、河床、田野以至橡胶、可可、肉桂种植园中随处都可以找到宝石。斯里兰卡以猫眼石驰名历史，其它的宝石则多达三十余种，名贵的包括吕宋绿、亚历山大石、红宝石、蓝宝石、石榴石、月长石、碧玺、玛瑙。斯里兰卡宝石丰富，可謂是宝石海岛。

柬埔寨以产蓝宝石、红宝石著称。柬埔寨宝石很早就享誉中国，进入中国宫廷。泰国除盛产红宝石、蓝宝石之外，还产珍贵的黑星石，并以黑星石驰名历史。印度是出产金刚石历史最悠久的国家，其钻石也在历史上久负盛名。印度其它宝石主要有猫眼石、吕宋绿、红宝石、蓝宝石。吕宋绿则首推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主要出产金刚石。苏门答腊盛产晶石、琥珀、碧玉、玳瑁、珊瑚。

中国的宝石也十分丰富，分布面积广，种类多，开采历史悠久。驰名中国历史的宝石主要有松石、白玉、紫晶、翡翠、水晶、玛瑙、琥珀、金刚石。中国松石主要出产在湖北省。江苏、海南盛产水晶。紫晶以山西省的最负盛名。云南翡翠、新疆白玉、东北玛瑙、抚顺琥珀都是中国边疆地区的著名珍宝，异常名贵。

中国历代宫廷是中国各个时期宝石的聚集中心。中国各地的宝石一旦发现，便会通过各级官员层层上达，送入深宫。周边国家和边夷首领为了求得本国、本地区的安宁，往往将特产珍宝进贡给强大的中华帝国，这些珍宝自然就藏于深宫。

中国历代宫廷珍宝琳琅满目，宝石种类繁多，数不胜数。中国历代宫廷无愧为珍藏宝石的真正的宝石王国，每一件宝石都价值连城。

红宝石历来被视为宝中之宝，是宝石中的珍稀品。红宝石主要集中在东南亚紧邻中国的一些国家，包括缅甸、泰国、柬埔寨、斯里兰卡等国，以缅甸红宝石最为珍贵。红宝石不仅限于气候、地理条件独特的东南亚国家，而且产量都极为稀少，一颗红宝石自然便是价值连城。

缅甸从古时候起就出产宝石，并以红宝石驰名历史。缅甸的红宝石以中部瑞巫当山所产最为有名。红宝石隐藏在古老岩石之中，开采挖掘都须十分小心。采到矿石以后，先洗磨精选，再小心地剖开岩石，从岩石筋络中寻找宝石。

红宝石以颜色鲜艳、清纯而区别高下，尤其是色彩最为重要。上好的红宝石颜色鲜红，其次是红中带点橙色，再其次便是紫红色，棕红色则是最差。红色中，以大红鲜亮的红宝石最为珍贵。红宝石缅甸分为十四等，其第一等最上乘的红宝石便是大红红宝石。这种红宝石很早就进贡到中国，中国称之为鸡血石、鸡血红。鸡血红光艳四射，耀人眼目。鸡血红在缅甸也视为至宝，地位十分崇高。缅甸人称鸡血红为红玉。梵文中则称鸡血红宝石为宝石之王，红如莲花。

缅甸出产的是世界第一流的红宝石：鸡血红。柬埔寨的红宝石晶莹透亮，红中略带微黄。泰国红宝石红中带紫。色泽纯洁鲜亮的上好红宝石是十分稀少的，因而红宝石更显得珍贵，也更容易作为贡品进献到宫廷。精美绝伦的红宝石通常很小，一般都不超过五克拉，超过五克拉的则被视为稀世之珍。

世上最珍贵的红宝石出自我国西藏，达二千克拉，这在世间是绝无仅有的。世上最大鸡血红红宝石重量是五十五克拉，是二战时在缅甸发现的，名为和平红宝石，寄托着战火硝烟中人们对和平的向往。而各国最好的红宝石往往藏在深宫，有些稀世之珍的红宝石则嵌在皇帝、皇后的宝冠中或其它珍爱的宝器上。

中国宫廷中究竟有过多少红宝石，史料缺乏记载，谁也无法统计。不过，中国历代宫廷都拥有众多的红宝石，并主要用于皇冠、器物的装饰以及用于精巧的手饰。

清代皇后的朝冠都缀宝石。金累丝嵌珠的五凤钿、长为三十厘米，通身十四只金累丝凤，每只凤都口衔珠玉流苏，其中有五串流苏中有红宝石。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收入宫中的银镀金点翠条，中嵌一颗很大的红宝石。长达三十厘米的玳瑁镶珠石珊瑚松鼠葡萄扁方，宽仅二点八厘米，上有红宝石十二颗。嘉庆二十四年十月收入宫中的长十厘米的铜镀金凤簪有两颗很大的红宝石，嘴衔的珍珠串上，以一颗大红宝石坠角。同治元年三月入宫的另一只铜镀金凤簪长十六厘米，中镶一颗色泽极佳的红宝石，十分美丽。

清道光十二年四月收入深宫的银镀金凤簪，凤头上、凤肚上、凤尾上各有一颗红宝石。同治元年三月入宫的银镀金嵌珠宝凤簪，长十六点六厘米，十二颗小红宝石镶边，中间嵌一颗大红宝石。乾隆六十三年二月入宫的银镀金福寿簪，长八点八厘米，呈椭圆形，嵌硕大的红宝石。嘉庆十年十二月入宫的银镀金福寿簪，灵芝形的银镀金累丝上嵌红宝石九颗。凤形的银镀钿花，银镀金托，累丝点翠嵌一颗很大的红宝石。这些红宝石本身就价值连城，再加上镶嵌在精巧绝伦的珠宝手饰上，更是无价之宝了。

宫中还有许多红宝石戒指。外径仅二点二厘米的金托镂空花瓣金戒指，镶光泽诱人的红宝石两颗，上有戳记：法华足金。另一枚外径二点四厘米，镂空托，光素地，镶一颗极大的鲜艳光润的红宝石。还有马蹄形白金托金戒指，内镶有三角图形的红宝石一颗，十分迷人。镶珠宝青钿，钿高十七厘米，青钿嵌珍珠一百四十六颗，红宝石一百一十三颗！

蓝宝石蓝宝石色泽柔和、典雅，十分高贵，人们都很喜爱。蓝宝石产地很广，也很丰富，而且大颗蓝宝石较之红宝石易于得到，这就决定了蓝宝石的身价低于红宝石。

世界上最为珍贵的蓝宝石出自中国喜马拉雅山脉的喀什米尔山谷。这里海拔高达近 4500 米，一年中有九个月大雪覆盖，蓝宝石便贮藏在这积雪下的山岩中。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约清穆宗同治光绪年间，这里大规模开采

蓝宝石。最上乘的蓝宝石是蓝色蓝宝石，次等的是蓝白色蓝宝石，再次的是蓝灰色蓝宝石。蓝宝石中最珍贵的是矢车菊蓝蓝宝石。

缅甸北部的抹谷是缅甸出产蓝宝石的著名产地。这里的蓝宝石色泽纯正、典雅高贵，可以和矢车菊蓝宝石媲美，透明度很高。缅甸的蓝宝石含杂质少，瑕疵也很少有，因而十分珍贵。蓝宝石和红宝石、黄宝石等二十余种宝石共同构成缅甸久负盛名的珍宝特藏，驰名国内外。

泰国是盛产蓝宝石的国家，产量很高，主要则集中在千塔城。

泰国的蓝宝石虽然数量众多，但上乘的却很少，大多数颜色很深。柬埔寨马德望省派麟山盛产蓝宝石和红宝石。柬埔寨的蓝宝石质量比泰国的好，产量又多于缅甸，但柬埔寨蓝宝石颗粒都较小，大颗的则极为少见。

斯里兰卡是出产宝石十分丰富的国家，不仅种类多，而且数量惊人，包括蓝宝石、红宝石、黑宝石、棕色宝石等，应有尽有。斯里兰卡的蓝宝石呈淡蓝色，有的略带浅灰，杂质和瑕疵都很少。斯里兰卡南部穆瓦省是其著名的宝石出产地，省会拉特内巴拉意思就是宝石城。

中国宫廷的蓝宝石同样十分丰富，不在红宝石之下。中国宫中的蓝宝石主要用于皇冠、器物的装饰，更大量的是用于镶嵌在各种珠玉手饰上。

清嘉庆十六年二月收入深中的银镀金福寿簪，蝙蝠形，直径九点三厘米，银镀金累丝上，嵌一颗奇大的蓝宝石。嘉庆十九年十月入宫的银镀金葫芦簪，长凡九点五厘米，呈椭圆形，中间的葫芦两节肚上为蓝宝石，下为红宝石，十分可人。长达十九点五厘米的银镀金蜻蜓簪，银针，蜻蜓翠翅，碧玺嵌珠为蜻蜓头，蜻蜓身则由蓝宝石、红宝石、碧玺、翠组成。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入宫的银镀金灵芝簪，上有硕大的蓝宝石两颗。银镀金蝓蝓簪长二十二厘米，宽四厘米，银镀金针，蝓蝓头为银镀金点翠，累丝为触须，蝓蝓肚子是一颗巨大的蓝宝石，这可谓稀世之珍了。能与之媲美的是外径仅二点八厘米的金嵌蓝宝石戒指，金箍，光素地，镶一颗硕大的蓝宝石，赏心悦目，光泽照人。

祖母绿绿宝石是指绿色的宝石，这一类的宝石颜色较为复杂，其最上乘的是无色透明的绿色结晶体。绿宝石通常包括：祖母绿、绿宝石、红绿宝石、蓝绿宝石、黄绿宝石、白绿宝石、棕绿宝石等。绿宝石是指纯绿宝石，但它的纯绿不如祖母绿鲜艳。蓝绿宝石又叫水蓝宝石，有的称之为蓝晶，是海水蓝绿色的宝石，十分美丽珍贵。蓝绿宝石通常有两种：一种是天蓝色宝石，偏重于蓝；一种是蓝绿色，绿色较重。蓝绿宝石在绿宝石中仅次于祖母绿，比绿宝石还美丽、珍贵。

祖母绿是绿宝石中最为珍贵的宝石，又称子母绿、吕宋绿。祖母绿宝石晶莹透明，呈翠绿色，翠绿中又略带点蓝。祖母绿被人类发现的历史十分悠久，早在石器时代时人们便知道了它的美丽、珍贵。大约在公元前四千年，文明久远的古巴比伦人就发现了祖母绿，并视为奇珍。古巴比伦人十分爱惜祖母绿，有的人将祖母绿以珍稀重礼进献给爱和美的女神，这一举动在距今约六千年的巴比伦尼亚首都巴比伦异常神圣，古巴比伦人对此由衷敬仰。而在古迦勒底，祖母绿深深吸引着波斯湾沿岸爱美的女人，她们以祖母绿装饰、比美。

古埃及在距今约四千年前便有了祖母绿的记载，这在世界上是最早的。埃及靠近红海的地方当时发现了光彩照人的祖母绿，此后不断开采，形成矿场。埃及著名的妖后也是最著名的埃及美人克里奥帕拉就曾拥有一个私人祖

祖母绿矿场。埃及宫廷中祖母绿丰富多彩。

伊朗宫廷中也有十分可观的祖母绿，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还有不少形体很大。伊朗最大的一件祖母绿长约八厘米，宽、高分别为六厘米、五厘米，四周围都镶嵌着钻石。伊朗的这颗祖母绿自然不是最大的。祖母绿虽然珍贵，但大的祖母绿却有不少。美国纽约自然博物馆中有一颗祖母绿重达一千二百克拉，这是一颗巨型祖母绿。哥伦比亚的祖母绿原石更大，达二千六百八十九克拉，这恐怕是祖母绿之最了。据说，意大利一位大师将哥伦比亚祖母绿原石为皇宫雕琢成了一个美丽的小壶罐。宫廷中还有祖母绿的茶杯。这些祖母绿自然都是稀世奇珍。

中国很早就知道祖母绿。中国先民称祖母绿为透水绿。他们将祖母绿放在杯中，杯里注满水，祖母绿绿色透水，故称透水绿。中国很早就认识了晶莹透亮的祖母绿，视其为无价珍宝。中国人这样认识祖母绿：宝石中有祖母绿者，形似玻璃，而晶莹过之。元末学者陶宗仪著《南村辍耕录》，凡三十卷，杂记元代掌故、文物、典章、时事，兼及历史、地理、文学艺术。陶宗仪在书中谈到了祖母绿：向之石头极多，有助木刺者，明绿色，即祖母绿。明代的另一部重要著作也谈到过祖母绿：祖母绿，一名助水绿，以内有蜻蜓翅光耀者贵。

早代中国称菲律宾为吕宋，吕宋很早便有祖母绿。手持祖母绿的吕宋人来到广东，炫耀珍宝，令广东人称奇惊羨，赞叹不已。广东人称之为吕宋绿。后来，以讹传讹，称之为吕宋玉，渐传渐广，以至中国人常称祖母绿为吕宋绿、吕宋玉。

猫眼石猫眼石是一种十分奇特的宝石，能变幻光亮，神秘莫测，历来视为宝石中的珍品。猫眼石不论大小，都是一种凸圆形的宝石，中间是变幻奇特的活光，如同猫的眼睛一样，在光照下更为动人，故称猫眼石。猫眼石不断变幻光亮，闪闪生辉，古希腊人称为波浪，十分珍爱。

猫眼石确实如波浪一样变幻奇特，闪着活光。猫眼石从色泽上看颜色很复杂，以黄色为主，兼具多种颜色。金绿色猫眼石是猫眼石中的上品，最为名贵。能与之比美的是乌黑发亮的黑猫眼石。猫眼石在中国历史也很悠久，有一种称为金漆地的猫眼石是珍品中的珍品，一直被中国人所珍重。

猫眼石中最好的是金黄色猫眼石，其次是银白色，再次为绿白色、蓝白色。蜜糖黄和皮蛋青都是猫眼石中的佳品。颜色愈浅便价值愈低些。灰色的猫眼石不透明，是最差的一种猫眼石。上品猫眼石活光性十分好，就是指宝石中含有丰富而细微的平行针状物，通常是纤维状的晶体，光亮照上后产生奇异的反射效果。

猫眼石依据活光、色泽、质地、形状判别高下，以活光为主。猫眼石活光的强弱、变幻位置等都是确认品质优劣的重要方面。上品的猫眼石活光性能极好——活光强烈，变幻灵活活光幼细，除此之外还包括色泽美丽光润均匀，质地好，形状对称。和猫眼石不一样具有活光特性的珍宝还有水晶虎眼石、水晶猫眼石、鹰眼石、碧玺眼石等，但它们无论从活光到色泽、质地都和猫眼石相差甚远，无法相比。

猫眼石以乌拉尔出产的最为著名：活光好，色泽均匀，质地极佳。斯里兰卡和巴西的猫眼石也久负盛名。中国的猫眼石十分稀少，但藏在深宫的却异常珍贵。中国皇宫中的衣冠、器物中有许多地方都有猫眼石的踪影，尤其是妇女饰物方面，猫眼石独领风骚，诱人而迷人。

中国宫廷拥有许多珍贵异常的猫眼石，在尊贵无比的皇冠和日常宫廷用具以及后妃的首饰上都能见到猫眼石的踪影。清代皇后朝冠上有一颗很大的猫眼石，活光性极好，色泽均匀，是上品猫眼石。通高三十厘米的皇后夏朝冠，圆冠式，青绒为地，上缀朱纬，顶部凤压三层，后缀一翟，背部饰一颗变幻莫测的猫眼石。清嘉庆二十四年十月收入深宫的铜镀金凤管，长凡十厘米，宽五点三厘米，铜镀金累丝凤，通地点翠，其头、身、翅、尾镶红宝石、猫眼石、珍珠，十分迷人。

水晶中国先民很早就发现认识了水晶，并视这种透明的晶体为水之精华，称为水精。到唐代时，已有史书记载了中国先民用水精制作饰物。中国水晶贮藏十分丰富，分布面很广，许多的地方都出产这种水之精华。

中国古代盛产水晶的地方，人们很珍爱这种晶莹透亮的宝物，并小心谨慎地将水晶雕琢，制成实用而美观的器物、用具。中国很早的史书就记载说：宫室皆以水精为柱，食器亦然。这是中国汉族学者对西域的描述，这是根据真实的见闻记载下来的西域的生活景况，由此可见当时的西域十分繁荣，人民勤劳、聪颖，建筑的宫殿富丽堂皇，连大柱都用水晶制作，金碧辉煌；宫中食器也是用水晶做成，可见其豪华奢侈，令人咋舌。

元人对于水晶也是特别珍爱，皇帝、权臣都以水晶造第、雕镂器物，以此示富。燕帖木儿是元末代皇帝顺帝时的权臣，元顺帝答纳失里皇后钦察氏是燕铁木儿的女儿，元顺帝自然就是燕铁木儿的女婿。燕铁木儿官至太师，封太平王，权倾朝野。燕铁木儿纵情声色，穷奢极欲。史书称：燕铁木儿在第中起水晶亭，亭四壁为水晶，镂空贮水，内中养五色鱼，剪彩绢做成白苹红蓝花，放入其中。燕铁木儿真是奢侈，穷奢极欲之下，燕铁木儿在至顺四年女儿立为皇后不久，便因纵欲而撒手而去，他的水晶亭中尽管五色鱼儿游曳，红蓝彩花五色缤纷，但这一切都无法挽回他那虚弱的生命，终至呜呼哀哉，将无穷享乐留在红尘。

水晶在中国发现很早，也很快便以珍物用于权贵的装饰，在宫中大放异彩。可是，中国古人对于水晶的认识十分可笑，其说法令人忍俊不禁。中国史书称：千年冰，化为水晶，性坚而脆，力刮不动，色白如泉，清明而莹，无纤毫瑕玷击痕者为佳。水晶白色、透明，又坚又脆，刮都刮不动，难怪中国不求甚解的文人要臆断为水晶是古冰化成，冰正是半透明白色，看上去与水晶无异。

不过，《古今事物考》关于水晶的记载也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史料。书中记述说：“倭国水晶第一；南水晶白，北水晶黑，信州水晶浊；凡器四贵素，但碾花者必有病处；假水晶用药烧成者，色暗青，有气眼，亦有白色黄青色，但不洁白明莹，谓之硝子”。由这段记述看，倭国的水晶胜过中国本土的水晶。倭国就是当时臣服中国的日本。中国本土的水晶千差万别，各地色泽不同，大至是南白北黑，而以信州所产的水晶最差，混浊不透明。不仅如此，古时中国已有人工水晶，就是假冒水晶，看来中国人作假古已有之，而且涉及各个领域，连古冰化的水晶也敢仿制，可惜的是连假冒也不制精细，做到不露痕迹，而是粗糙丑陋，一眼便能视破，这等低劣，何必费这份神？

中国也有聪明的知识分子对水晶系古冰化成的说法提出质疑：水晶云为千年老冰所化，果尔，则宜出于北方冷寒之地，而南方无冰，却有水晶，可知其说之无稽。作者是从水晶的产地提出问题的，水晶产自南方，如若千年老冰化成，宜在北方，由此可见古冰化成之说的荒谬。可是，不为古冰化成，

又是如何形成的呢？作者便没有下文。

水晶在中国历史很悠久，在唐代时已为广大文士所知，以至文人们以家喻户晓的水晶来比于玻璃，玻璃是从国外传入中国的，透明，结实，闪闪发光，十分迷人。于是便有了这样记载：玻璃出南番；有酒色、紫色、白色，似水晶，器皿背多碾两点花儿；其药烧者，入手轻，有气眼，似玻璃。这是记载唐代的事。唐诗人有一首有趣的玻璃诗：

有色同寒冰，无物隔纤尘。

众筵看不见，堪将对玉人。

中国海南岛盛产水晶。中国很早便有了水晶矿。水晶晶莹剔透，秀雅美丽，中国古人便将这种水似的晶体称为水玉，水晶从色泽、透明度、杂质诸方面划分，可分为多种：无色透明水晶、茶晶、紫水晶、黑茶晶、黄水晶、玫瑰水晶、泡晶、彩虹水晶等等。

无色透明水晶光滑明亮，十人美丽。中国古人就曾用这种无色透明水晶制成花瓶，插花、摆设，都极典雅，使室内生辉。紫水晶又叫紫晶，色泽不规则。中国先民曾将水晶加磨切割，制成眼镜，可见眼镜并不一定是西人先发明的。中国先民还把水晶制成各种装饰品，有的制成水晶图章，有的制成精美的工艺品摆在厅堂，以示富贵。

中国和巴西是世界上贮藏水晶最丰富的国家，其次便是马达加斯加、乌拉圭、斯里兰卡、朝鲜、乌拉尔。无色、透明、光洁的水晶通常出自中国、巴西、马达加斯加。紫水晶通称水晶之王，希腊文的意思是不醉，意即拥有紫水晶，喝酒就不醉。西方人都接受了这一美好的说法，而且还加演绎：戴了紫水晶，能永保平安，不会中毒，不会受伤，不会瞌睡，增添智慧。紫水晶的神奇传说给这水晶之王增添无穷荣誉。

水晶之王的紫水晶主要出产于中国、巴西、斯里兰卡、朝鲜、乌拉圭、乌拉尔。紫水晶因产地不同，颜色、光泽度、透明度千差万别，颜色有纯紫、蓝紫、红紫多种。最好的紫水晶色泽光亮，颜色纯正，色调均匀，紫、紫红、微紫红均佳。中国的紫水晶是最好的。南美乌拉圭北部、巴西南部的紫水晶也能与中国紫水晶媲美。黄水晶、茶水晶也主要产自中国、巴西、马达加斯加、英国。

中国深宫的水晶丰富多彩。中国进入宫廷的水晶大量用于后妃美艳的首饰。清嘉庆六年十月收入敬事房的银镀金嵌宝福寿簪，长五点五厘米，呈葫芦形，银镀金累丝蝙蝠，上嵌水晶。道光二十年三月进入深宫的银镀金福寿簪，长十六厘米，银镀金针，银镀金点翠蝙蝠，累丝嵌翠葫芦叶，葫芦上嵌红宝石和紫晶。清嘉庆十年十二月收入宫中的银镀金福寿簪，长十三厘米，宽六点五厘米，灵芝形状，银镀金累丝上嵌水晶珠，美艳动人。

宫中的妇女钿花也常用水晶作装饰。金镶宝石蝙蝠钿花，长七点三厘米，宽三厘米，蝙蝠形状，金累丝点翠嵌宝石，蝙蝠由蓝晶制成。银镀金嵌珠宝钿花，一组三只，花束形状，银镀金点翠嵌宝石、晶石灵芝。金镶珠翠挑簪，簪长十二点一厘米，坠长七点五厘米，金针镶翠雕手握如意钩环，系六颗珍珠，以蓝晶石坠角。

青金石青金石就是琉璃，它的历史十分悠久，很早就被人类发现和利用。上品的青金石颜色呈蓝色，或略带深紫，鲜艳、光润、均匀。其次的是靛蓝色略带绿色青金石。最次的是带灰色的青金石。蓝色的青金石色泽很美，尤其蓝色赏心悦目，十分迷人。

最上品的青金石一直出自阿富汗，中国人惯称其为波斯青金石。中国北部相邻的贝加尔湖一带也盛产上好青金石，称西伯利亚青金石。中国新疆出产的青金石久负盛名，称密尔岱山青金石。

中国使用青金石历史悠久。青金石这类名贵难得的宝石自然限于皇宫贵戚和豪门、权贵。中国官方史书称：清代皇帝朝珠杂饰，各有讲究，天坛用青金石，日坛用珊瑚；皇帝朝带，天坛用青金石饰带。青金石色如苍天，皇室使用以祀天，专门在祭祀天坛的大礼时使用。

清代皇后的朝冠上，装饰着上品青金石。通高三十厘米的皇后夏朝冠，后护领垂明黄绦二条，中饰青金石和珍珠。金累丝嵌珠五凤钿，十四只累丝凤，凤口衔青金石绸贯串的流苏。直径二十厘米的宫中珍藏金镶青金石金约，系金累丝云纹结片，上嵌上好的青金石和珍珠。玳瑁镶珠嵌玉石花卉扁方，长三十二厘米，宽仅二点九厘米，玳瑁质地，头尾为银镀金累嵌碧玺、珍珠和青金石海棠花图案。

绿松石的历史也是十分悠久，人类很早就发现了松石，并视为珍宝，广为使用。松石颜色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绿色，一种是蓝色。质地纯正、品质优良的松石颜色是蓝色；松石内含杂质，蓝中便带有绿色，有的则是苹果绿或黄绿色。往往绿色松石更易得到，因而更易于被人认识，因而松石又被人们称为绿松石。

蓝色的松石实际上是品优质良，十分美丽的，也极得人们的喜爱，只是出产稀少，很难得到，其价值十分惊人。次于蓝松石的是绿松石。再次的是微绿蓝、微蓝绿松石。最次的便是微黄绿松石。

中国称古伊朗为波斯，这里的松石久负盛名，品质优良，光泽柔美，色调均匀，价值十分昂贵。中国湖北省也盛产松石，品种多，颜色美，质地极佳。中国紧邻湖北的四川和紧邻四川的西藏也都出产松石。埃及蓝绿色的松石出产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其木乃伊墓室中就发现了许多松石饰物。

中国的深宫中收藏有众多的松石，并用于装饰衣服、王冠、器物、首饰。中国皇帝朝珠装饰上，上日坛祀日时用珊瑚饰，上月坛祀时，用绿松石饰；与此配用的，便是朝带用白玉。中国清代皇后朝冠，金约、缕金云十三，饰东珠各一间，以青金石、红片金裹，后系金衔绿松石结，贯珠下垂。领部也饰两枚绿松石。

馆藏金累丝嵌珠五凤钿，十四只金凤口中，各衔有绿松石贯串的流苏。金镶宝石菊花簪，长六厘米，宽五点八厘米，菊花形状，银镀金累丝菊花、戟、磬，怔卐字、盘肠，镶红宝石和松石，取意吉庆万年。银镀金镶珠娃娃瓶簪，长十三点五厘米，宽五厘米，厚一点八厘米；银针，金镶奇珍珠为一小书童，书童手持金爵杯，脚穿点翠金鞋；花瓶金镶水晶，瓶座是绿松石；累丝掐成如意，取意平安如意。

清宫银镀金寿字流苏，一对，各长二十三点五厘米；银镀金挑杆镶翠镂雕双面蝙蝠挑头，系银镀金累丝长寿字，三串流苏，上有七十五颗小珠，间串绿松石、青金石、珊瑚、白玉。银镀金吉庆流苏，长五点五厘米，针长凡十八厘米；银镀金点翠累丝龙形挑杆，两串珍珠共十六颗，以绿松石、珊瑚蝙蝠结珠。

碧玺碧玺又叫做碧玺，科学定名是电石。碧玺颜色多样，大多数碧玺十分美丽。碧玺主要有红碧玺、黄碧玺、蓝碧玺、黑碧玺、棕碧玺、绿碧玺。各色碧玺中又因颜色深浅、杂色不同分出多种，如红碧玺就有紫红碧玺、粉

红碧玺、大红碧玺。

碧玺是一种多色性强具有双折光性能的宝石。从不同的方位、角度，在不同色泽的光照下，碧玺会呈现不同的颜色，而且颜色会发生变化：黄色变成绿色；棕色变成红色；黄色又变成玫瑰色。能变幻颜色的碧玺十分珍贵，历来被权贵所喜爱，碧玺便堂而皇之地进入深宫，成为皇室的所有物。

碧玺分布十分广泛。中国出产的碧玺历史悠久，种类繁多，而且质量上乘，极其名贵。西伯利亚盛产红色的碧玺，大多数是大红碧玺、紫红碧玺，还有一些蓝碧玺。中国南部紧邻的缅甸出产的大红碧玺素负盛名。斯里兰卡出产黄碧玺、棕碧玺。马来西亚碧玺丰富，几乎各色碧玺都有。

中国历代宫廷都拥有当时最上乘的能变幻颜色的碧玺，并将这种碧玺用于衣冠和首饰之中，增添身价。

宫中所藏镶珠翠青钿子，钿顶宽二十七厘米，以铁丝缠绕黑色丝线为胎编织成方格纹，形成长寿字，顶子正中形成聚宝盆形，钿身排列翠花边，翠托嵌东珠、碧玺双喜作为装饰，威严富丽，价值连城。长达二十九点七厘米的翠镶碧玺花扁方，翠质地，头部嵌碧玺蝙蝠、寿字，顶端两侧各为碧玺梅花，尾部嵌碧玺蝙蝠和长寿字，取意吉祥长寿。碧玺在绿翠衬托下更加迷人。还有一柄白玉扁方，长三十一厘米，宽二点七厘米，白玉质地，上嵌粉色碧玺荷花，翠做荷叶，红宝石做花蕾，头两边嵌珠，用碧玺做梅花。

宫廷中有众多的扁方都嵌变光变色的碧玺，十分诱人。长二十一厘米的金鏤花镶碧玺翠珠扁方，宽二点六厘米，金质地，周边鏤梅花，中间是锦地镶翠花卉，碧玺做成蝴蝶，在金色衬托下栩栩如生。另一枚长三十二厘米的玳瑁镶珠嵌玉石花卉扁方，宽二点九厘米，玳瑁质地，头尾均是银镀金累丝嵌碧玺、珍珠等海棠花图案。与之结构相近的是玳瑁镶珠石珊瑚松鼠葡萄扁方，长三十点四厘米，宽二点八厘米，两端嵌红珊瑚松鼠四只，红珊瑚松鼠跃上葡萄架，用红宝石、绿宝石、珍珠和名贵碧玺装缀成葡萄枝叶。

清道光十二年四月收入延禧宫的银镀金嵌宝穿珠凤簪，长十四点三厘米，宽十二厘米，银针，银镀金点翠穿珠凤，嵌碧玺、红宝石和迷人的米珠兰花。同治元年三年入宫的长十六点六厘米银镀金嵌宝凤簪，宽十四厘米，银针，银镀金点翠穿珠凤，嵌红宝石、红珊瑚、碧玺花蕊。银镀金嵌宝凤簪，长二十四点三厘米，宽九点七厘米，银镀金针，银镀金点翠凤，嵌红宝石、珊瑚、珍珠流苏，以红宝石、蓝宝石和碧玺坠角。

宫中后妃使用的众多簪子都用变幻颜色的碧玺以增光添彩，更显主人楚楚动人。嘉庆十六年二月入宫的银镀金嵌宝石福寿簪，呈蝙蝠形，银镀金累丝，卐字叶，团寿卐字，嵌碧玺、红宝石、蓝宝石、珍珠。长七点七厘米的银镀金福寿簪，道光十二年四月收入延禧宫，由太监首领马进忠进呈，呈蝙蝠形，银镀金累丝云朵、蝙蝠身、翅，点翠，嵌红宝石和碧玺。

银镀金镶珠宝松鼠簪小巧玲珑，长十五点七厘米，银针，银镀金累丝松鼠，点翠花叶，嵌碧玺、珠、翠、紫晶、红宝石。长二十三点五厘米的红宝石穿珠点翠点簪，银镀金针，点翠花叶，上有用碧玺、蜜蜡、红宝石制成的葡萄、松鼠。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入宫的银镀金事事如意管，长十九点五厘米，长方形，银镀金柿子、如意、卐字，点翠嵌珠、宝石、碧玺，取意万事如意。银镀金嵌翠花碧玺佛手簪，长二十二厘米，银针翠叶，碧玺佛手。银镀金灵芝簪，银镀金兰、竹、寿字，点翠，嵌珠翠、红宝石、蓝宝石的名贵无比的碧玺。

琥珀是松柏树脂的化石，是一种非结晶的宝石。除了松树、柏树分泌出的树脂能在经年累月的衍化变成琥珀之外，白果树、铁树、水杉等树脂也能形成琥珀。琥珀透明，黄澄澄的，光泽较淡，有些象脂肪，大多黄色、脂黄色、蜜黄色甚至是赤褐色。

琥珀因是松柏幽香的树脂化成，所以团块状的琥珀中透过这透明或半透明的晶体常能看到昆虫或草叶或整条的蜥蜴，婉然如生。珍贵树脂化的琥珀十分珍贵，如果内中有蜘蛛、蚂蚁、蚊子、蜥蜴等小虫或小树叶，琥珀更会身价倍增。

琥珀的形成比起其它宝石来要简单得多，所经岁月也要短暂一些。大约在距今四千万年前，人类所居住和生活的地球森林茂盛，成群动物出没其中，草木争荣，雨量充沛，气温很高。高达数百尺的松、柏蓬蓬勃勃地沐浴着雨露阳光、茁壮成长。高大的松柏分泌着清香的树脂，吸引着许多的昆虫。树脂顺着粗壮的树干向下流淌，淌进大地，沿着大地的缝隙流进地层。嬉戏的昆虫和飘落的树叶、花瓣被树脂粘着之后慢慢被包裹进去。又浓又稠的树脂渐渐凝固，凝固以后密度更大，空气难以进入其中，包裹的昆虫、树叶、花瓣便被完整的保存下来，栩栩如生。经过数万年乃至数十、数百万年的地质变迁，松柏植物连同它们的树脂在沧海桑田的转换中被深深地埋进地下。泥沙土石掩埋了树脂。地下水中的矿物质滋润着树脂。经过大冰河的寒冻之后，树脂硬化，形成化石。琥珀就这么形成了。

暴雨成河。湍急的水流将泥沙连同一些琥珀带进了大海。海流疯狂地涌动，许多琥珀随着海流漂流到北欧、西欧沿海和波罗的海沿岸。琥珀是半透明，因长期在海水中浸泡，色泽变得腊黄或赤褐，通体透明，看上去象黄金一样，在海水中半沉半浮，人称海琥珀、海石、海金、波罗的海之金。

琥珀在世界上分布很广，主要产地包括欧洲、北欧波罗的海、东南亚、中国。

古人很喜爱琥珀，认为这种珍物能够祈福镇邪。古人将琥珀做成各种珍稀装饰品，带在身上，或放在家中，以珍贵的宝石加以看护和收藏。

中国是琥珀盛产的国度，历史十分悠久。中国古代许多珍贵史书都详细记述了琥珀，包括《博物志》、《海药本草》、《天工开物》、《西阳杂俎》等等，这些都是极其珍贵的史料。早在汉代时，琥珀便已风行中国，以珍稀异宝的身分进入了人们的生活。汉著名学者班固在《汉书》中记载说：严宾国出产珠玕、珊瑚、虎魄、壁琉璃。这里的虎魄自然是琥珀。学者郭璞发现了琥珀的美丽之外能吸附小物体。郭璞在图赞中称：琥珀拾芥。

中国学者认为琥珀是由松脂入土而形成的。这在上述的史书上有明确的认识和细致的探讨。明代学者对于琥珀的形成了知得更为透彻：木脂入地，岁久皆化，但不若松、枫之多脂而经年岁。琥珀形成因树脂流淌和凝结不同而各异其趣，千姿百态，有圆的，有扁的，有块状的，有颗粒的。琥珀由于树脂的不同以及时间长短、矿物渗透深浅各异，颜色也各不相同。中国先民依据不同的琥珀颜色分别给这些珍贵的透明、半透明宝石定名：红色琥珀称为血珀；黄色琥珀光泽极好个头又大的称为腊珀；红纹黄纹相间的琥珀称为花珀；黑色琥珀称为翁珀；明净如水晶的琥珀称为金珀；红黄色琥珀称为明珀；浅黄色琥珀表层糙而多皱的称为水珀；近乎黑、白、黄之间色的称为不珀。

中国先民依据不同类别的琥珀制成各种不同的巧夺天工的琥珀艺术品、

装饰品以及日用的烟嘴、印章等。中国人喜爱琥珀，更喜爱琥珀装饰品，认为有了这样宝物，便可以避灾祛邪。琥珀一直是中国宫廷的宝物，价格十分昂贵。琥珀器皿历来被中国的皇帝和宠妃所珍管。汉成帝宠爱美女赵飞燕，两人曾共枕一个琥珀枕，做一宵春梦。

南朝时期，宋武帝刘裕北征前夕，有人进献一只琥珀枕。琥珀枕十分精美，光泽艳丽。侍臣说：琥珀枕能治病，尤其是治金疮有奇效。刘裕听说有这等功效，便一下子将琥珀枕打碎，然后将一块块琥珀分给众将士。将士们非常感动，一个个奋战疆场，为刘裕创建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

唐代时，一位受宠的皇家公主极好戴一只九玉钗，钗上刻了九鸾，五色缤纷，很是美丽。有一天，细细赏玩宝钗的公主发现了钗上有两个字：玉儿。原来，这是齐东昏侯的宠妃潘玉儿的爱物。当年，潘玉儿以数倍的价钱买了许多民间珍宝。据史书记载，潘玉儿买的一只琥珀钗出价竟高达一百七十万钱。

中国汉以后的历代深宫都有大量的琥珀珍品，其中有不少载于史册，流传千古。据史书记载，汉代汉高祖刘邦在位时，宫中有两根晶莹透亮的玉柱，玉柱顶端分别用水晶、琥珀雕刻着日、月图形。宋代时，皇帝的冕上缀着玉星，玉星共七颗，周围都镶上琥珀，很是英武。

玛瑙玛瑙是一种混合物，由石髓、蛋白石、结晶石英石混合而成。石英石、蛋白石、石髓依附在高山岩石之中，经含砂酸的胶体溶液渗透、沉淀，最终形成玛瑙。玛瑙十分坚硬。由于玛瑙是胶体溶液沉淀生成，所以它层状的晶体层层重叠，是波纹形，中心部位常有少许空隙，形成石英结晶。

玛瑙呈半透明或不透明状，象蜡烛一样。玛瑙的颜色却十分丰富，秀丽动人。玛瑙有红色的、白色的、绿色的、紫色的、淡蓝色的、黑色的、褐色的、灰褐色的多种。玛瑙制成的日用品和装饰品自然也是楚楚动人。玛瑙因地域的不同，其质地、品级、颜色也各不相同，情趣各异。

据史书称，南方的玛瑙颜色近乎红色，没有瑕疵；西北方的玛瑙色呈青黑色，人称鬼面青；有的玛瑙内有枝叶，象柏树枝脉，称为柏树玛瑙；有的玛瑙黑白相间，称为金子玛瑙；有的玛瑙颜色纯黑，中间间杂白线，称为合子玛瑙；有的玛瑙正看发白光，侧视如凝血，称为夹胎玛瑙。

玛瑙种类很多。从颜色上看，能分为二、三十种。紫红色的称酱斑玛瑙。黑白相间的称截子玛瑙。珊瑚状的称珊瑚玛瑙。内有天然草叶的，称水草玛瑙。形状如同星、月，楚楚动人的称星月玛瑙。内有竹叶花纹的称竹叶玛瑙。色彩五彩缤纷的称锦犀玛瑙。色泽如锦花的，称锦红玛瑙。红白相间内有游丝的称缠丝玛瑙。青黑相杂的称鬼面青。白黑筋状起伏的称缟玛瑙。内有条状鸡血红的称红缟玛瑙。绿中带红点的称血点玛瑙，又叫血石。

玛瑙最著名的产地是中国。中国地域辽阔，玛瑙分布十分广泛。中国出产玛瑙的著名省份包括：湖北、江苏、安徽、河北、山东、山西。中国古时候便发现了玛瑙，称玛瑙为琼，视为奇珍。又细又圆象珠子似的玛瑙中国先民称之为璿珠、琼块。

中国许多可信的古老的史书都谈到过奇珍的玛瑙。史书说：天子之璿，玉果璿珠烛银黄金之膏是也。还有史书记载了这样一段有趣的故事，有点神乎其神。黄帝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只玛瑙瓮。尧在位时这只玛瑙瓮曾为尧贮存过甘露。舜即位后，迁玛瑙瓮这只国宝到衡山，隐藏起来。舜南巡，将玛瑙瓮迁到零陵。舜在南巡时去世，玛瑙瓮突然间又自行消失，沉入地下。

秦始皇好大喜功，下令打通汨罗江为一条小溪，从长沙通过零陵。在零陵的地下挖地时发现了一只赤玉瓮，但谁也不认识。汉代伶人东方朔广闻博识，认得这只瓮就是当年的玛瑙瓮，又叫赤玉。故事虽然近乎神话，但玛瑙瓮确实存在过。魏文帝曹丕曾著文说：玛瑙文理交错，有似马脑，盖言其文采也。

文帝曹丕所说的玛瑙有文采，文理交错，有些象马脑——玛瑙之名由此而来。宋学者称：唐大臣裴行俭有玛瑙盘，广二尺，文采集然。有一次，军士不小心将玛瑙盘摔碎，吓得浑身哆嗦，跪伏叩头请罪。裴行俭说，没关系，你不是有意的。裴行俭面色依旧，十分平静，从容对待此事，士大夫无不佩服。

公元八世纪时期，中国进入辉煌灿烂的盛唐时代。宫廷被奢侈之风所笼罩，歌舞升平，奇珍异宝琳琅满目。宫中有许多的玛瑙装饰品，许多来自中西、西亚、南亚的珍稀玛瑙饰品争妍于豪华、开放的大唐宫廷，为美女们增辉添色——其中一件镶金牛首的玛瑙杯在一九七一年时于中国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窖中发掘，正是当时波斯或阿拉伯商人通过贸易带到长安的玛瑙奇珍。

云南是中国出产玛瑙的素负盛名的地方。古代史书对此多有记载：今世之所宝者，有猫儿眼、祖母绿、颠不刺、蜜腊、金鸦、石蜡子等类，然皆镶嵌首饰之用；惟玛瑙、琥珀盛行于时，皆滇中产也。这是说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猫睛石、祖母绿等都是奇珍，主要是用于装饰；奇珍中的玛瑙、琥珀则以自身的价质，风行于世，而这些玛瑙、琥珀又都是产自云南。中国人欣赏玛瑙的文采，常称玛瑙为文石。

明代末年，西洋进献了一些玛瑙给中国宫廷。中国宫廷中的产自中国的玛瑙则主要还是云南玛瑙。中国史书有这样的记述：玛瑙西洋为贵，其出中国者，则云南之永昌府；以色红者为上；红白相间者缠丝，品最下，制为酒杯书镇之属；凡市骨董者，俱云宋作，盖本朝此石最少，故属之宋，以昂其价；二十年西洋玛瑙遍行天下，其值不过玉之十一，而色之奇幻，质之莹润，远胜旧物，闻出辽东宣府一带，每块至有重百斤者；按宋政和四年，当汝蔡等州上言，石多变玛瑙，地石爱宝，圣瑞非常，乞下诏封禁，以供御用；后数十年，果不复再见；今偶尔盛产，他时去绝，必更踊贵，亦理势使然也。

从上述记述看，当时著名的玛瑙产自云南永昌府，以色玛瑙为上品，红白相间玛瑙为下品。红玛瑙制成艺术品、装饰品，送进深宫。下品玛瑙制成酒杯和镇书用的书镇。辽东、宣府也产色泽奇幻、质地莹润的玛瑙。可惜一发现奇珍，地方官便以圣瑞非常，请求皇帝下诏封禁，以供御用，成为皇家的专有物，谁也不许染指。

中国历朝历代的玛瑙制品十分丰富，其稀世之珍，精巧绝伦，巧夺天工，令人瞠目。红玛瑙蟠桃洗是留传下来的传世玛瑙珍宝，洗深洗壁，底部平坦，洗身是雕镂的一段树干，树干边沿浮雕着生动别致的树叶；蟠缠绕树身，转到洗侧枝上结着一枚大桃；洗口缘有一只蝙蝠，蝙蝠很逼真，口里衔一枝灵芝。红玛瑙蟠桃洗用红玛瑙精制而成，通体为红色，莹润纯正，而洗口缘的蝙蝠为白色蝙蝠，红白辉映，美艳绝伦。还有一件传世的玛瑙奇珍便是用玛瑙雕制而成的一套灰色间杂红黑斑点的磨圆式磨具，也是价值连城。

珍珠珍珠产自于蚌内。蚌、螺等河中动物身体构造很奇特，都是十分柔软的身子外罩一个坚硬贝壳。贝壳分内层、中层、外层三层。内层是珍珠层，由角质、石灰质的许多小薄片重叠而成，光洁度很好，很光亮润滑。中层是

贝壳最厚的部位，呈白颜色，由众多的角柱状碳酸钙组成，称棱柱层。外层由很薄的有机物组成，称为角度层。这三层贝壳是由紧贴内层的上皮细胞分泌液构成。珍珠便是在蚌内珍珠层中间产生的。

人类发现珍珠的历史十分久远。中国南海、波斯湾、东南亚、印度等都是盛产珍珠的著名地区。远古的欧洲先民极好珍珠，许多珍贵异常的珍珠都被收入深宫。两千多年以前，古罗马皇帝加里古拉宠爱一个美丽的妃子罗丽亚·波里娜。罗丽亚美艳动人，对珠宝十分热心，尤其沉迷于珍珠，把玩终日，爱不释手。罗丽亚不仅爱在深宫玩赏珍珠，还喜欢在一定公开场合佩戴珍珠，容光焕发，丰采照人，令皇帝由衷倾倒。珍珠在罗马帝国广为风行，衣服、帽冠、器用上到处能见到珍珠的身影。珍珠随着十字军东征而足迹踏遍欧、亚、非，更为广泛地流行。这是珍珠风行的时代。

波斯湾出产大量的天然珍珠，产量之丰富，自古以来就令世人瞩目。巴林群岛是世界上久负盛名的珍珠产地，许许多多著名的天然珠便出自这里。波斯湾、红海是世界出产珍珠极有名的地方，波斯湾被称为东方明珠，其天然珠被称作东方珠。斯里兰卡的珍珠也很有名，其海湾盛产白色、奶白色和略带蓝色、绿色、紫色的珍珠。其他著名珍珠包括：缅甸珍珠、澳洲珍珠、俄罗斯珍珠等。

珍珠的形成对于古人来说是个不解之谜。十七世纪时一位生物学家提出是沙粒进入蚌壳从而长成珍珠。两个世纪后，有科学家将珍珠剖开，发现其中有无机化合物、寄生虫和寄生虫卵。一直到二十世纪初叶，法国科学家发现：是寄生物进入蚌壳，产生珍珠。

实际上，珍珠在贝类、螺类动物体内的形成，主要是因疾病、受伤以及寄生虫进入，导致壳内外套膜分泌液体，发生水泡，渐渐水泡液体凝固成胶质状，因钙质的补充而日益变硬，天长日久，外套膜分泌的珍珠质一层层将之包围，这便形成了珍珠——这种珍珠品质极佳，圆润、饱满，光泽极好，但由于有水泡，因而常有很小的空心。

十七世纪科学家提出的沙粒进入蚌壳内形成珍珠的说法很有科学性，这实际上也是形成珍珠的一个重要途径：沙粒之类的物体进入壳中的外套膜内，使母体受到刺激，母体就用皮膜去挤、磨、擦这一外来入侵物，并分泌珍珠质一层层将它包裹起来，以此减轻体内的痛苦，日久便形成珍珠——这类珍珠是实心的，其形状和入侵的沙粒的形状一致；沙粒很少有正圆形的，而是不规则的颗粒，珍珠便是不规则形状。

中国是出产珍珠历史最悠久的国家。早在三千多年以前，中国就有关于珍珠的文字记载，其最负盛名的地方便是广东合浦，不仅盛产珍珠，而且品质优良，都是上乘珍珠。史书称，在汉代时人们便蜂涌到合浦开采珍珠。

广东合浦古属廉州，喜欢这里珍珠的人们便称这里的珍珠为廉珠。有的则因广东在中国南部，称合浦珠为南珠。南珠实际上可指广东所产珍珠。廉珠饱满结实，光泽鲜润，晶莹透彻，浑圆美丽，因而人称廉珠为世界珍珠之王。廉珠的精美是易碎的洋珠、黯淡的东珠、西珠等珍珠所无法相比的。

中国早在公元前五百多年前的《诗经》中就有关于珍珠的记载。南朝史学家范晔在《后汉书》中记述了合浦盛产珍珠。唐学者房玄龄称合浦产珠而不产粮食，居民用珍珠换取粮食等日常生活用品。由此可见合浦采珠业不仅时间早，而且规模很大，使许多人能以此为生。但是，古时候开采技术十分落后，工具简陋，珠民入海寻珠往往出生入死，异常艰辛：他们在腰间系一

根绳索，潜入大海深处，在岩石中寻找贝类动物；相伴而来的常常是凶残的海鲨巨鲸，珠民因此而眨眼之间，葬身鱼腹。

死里逃生的珠民上岸以后又要逃避官府的拘捕和地痞恶霸的盘剥。珍珠一直被视为奇珍，皇室据为己有，下令民间不许开采。许多奉旨而来的太监严申珍珠禁令，不准百姓到珠池作业，同时对为官开采的珠民和私下开采的珠民横征暴敛，恣意勒索，从中牟取暴利，许多珠民因之而丢掉了性命，家破人亡，十分凄惨。史书称：明命内监分守珠池，雷州廉州遭空前大劫；嘉靖八年，一次采珠珠民死以万计，而得珠仅仅八十两。

明代是中国开采珍珠最为繁荣的时代，尤其是明第九代皇帝孝宗朱祐樞在位的弘治时期最为兴隆。弘治十二年，公元一四九九年，竟动用雷州、广州、潮州各地帆船一千余艘，役使成千上万的珠民入海采珠，一年产珍珠达二万八千两，悉数运送皇宫。廉州东南四十公里的白龙海域是明宫钦定的御用珠池，早在明太祖朱元璋在位的洪武二十九年时，便已开始派遣心腹太监坐镇这里，监督开采珍珠，人称其为珠池太监。这里的白龙城也称珍珠城，它既拥有了无数稀世珍珠而光耀史册，也国有了这些珍珠而演出一幕幕血泪斑斑的人间悲剧，令人感叹！

中国明代学者宋应星是位研究和探讨自然科学的科学家。宋应星字长庚，江西奉新人。明神宗万历年间中举人，历任江西分宜教谕、福建汀州府推官、南京亳州知州等职。明崇祯十七年，耻于国破君亡，弃官回乡，不事新朝，后一度出任南明王朝。宋应星学问渊博，讲究实学，对士大夫轻蔑生产深恶痛绝。明思宗崇祯七年，宋应星出任江西分宜教谕，著《天工开物》一书，详记各地生产技术，对当时和后世影响极大。

宋应星在书中详细地谈到了珍珠的开采和各种开采工具，记述了当时采珠是人直接潜入水底，采集珍珠贝类动物。书中这样记载：舟中以长绳系没人，携腰篮，投水。与没人以锡造弯环空管，其缺处对掩没人口鼻，令舒适，呼吸于中。别以熟皮包络耳、项。极深至四、五百尺。拾蚌篮中，气逼则撼绳，其上急提引上。很显然，当时的开采设备十分简陋。没人就是潜水人，就是珠民。珠民用长绳系腰，带只腰篮，还带一只锡造的弯环空管，相当于今天的氧气瓶。耳、项还用熟皮包严。入水四、五百尺深，将蚌捡入篮中，空管没气时便摇绳子，上面的人迅速将他提出水面。

明太祖死后，孙子朱允炆即位，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夺了江山，为永乐皇帝。成祖朱棣永乐年间，重视采珠业，大力改进采珠技术，以铁为构，木柱板口，两角坠石，用麻绳作兜取蚌。这相当于用网捞珠贝而取代人工。明永乐年间虽改进了一点采珠技术，但始终没有大的突破。不求甚解、心浮性躁的毛病充分表现出来——皇宫需要那么多的珍珠；珠池藏珠量十分丰富；可始终没有人想出好的办法改进开采技术，始终用于可怜的人海战术捞蚌，一直到清代。

珍珠的开采在中国历史悠久，中国历代帝王便一直将这些珍珠视为奇珍，据为皇家私有。所以，中国历代宫廷中，珍珠不计其数，而且每朝每代都拥有许多稀世的珍珠。珍珠在宫廷中主要用于装点富丽的宫室和装饰美艳动人的后妃，让宫室生辉添彩，让后妃光艳照人。

中国皇帝、后妃们的衣冠上都爱用珍珠装饰，尤其是清代后妃。清后朝冠上有许多珍珠：顶三层，贯东珠各一颗；都承以金凤，饰东珠各三颗，珍珠各十七颗，上衔大东珠一颗；朱纬上缀金凤七只，各饰东珠九颗，猫睛

石一颗，珍珠二十一颗；后有金翟一只，饰猫睛石一颗，珍珠十六颗，翟尾垂珠；用珍珠三百零二颗，分五行，每行一颗大珍珠，中间一条金衔青金石结，各饰六只东珠珍珠。

宫中的镶珠翠青钿子，钿身排列翠花边，翠托嵌东珠、碧玺双喜字为饰。钿高十七厘米、顶宽二十八厘米的镶珠宝青钿，以铁丝缠黑丝线为胎，组成方格纹、钱纹、盘肠、长寿字，钿子正面顶和边部用翠托珍珠、宝石组成栩栩如生的松、竹、梅岁寒三友图。青钿上共用珍珠一百四十六颗，红宝石一百一十三颗。这顶青钿，能不价值连城？

清嘉庆二十四年十月入宫的铜镀金凤簪，长十厘米，铜镀金累丝凤，通地点翠，凤头、身、翅、尾镶红宝石、猫眼石和珍珠，凤嘴衔珍珠一串，凡珍珠十一颗，间以珊瑚喜字，以红宝石坠角。同治元年三月入宫的银镀金凤簪，银针，点翠地饰，银镀金凤，嵌以翠、红宝石和珍珠。

二、帝后墓中珍宝

君临天下的中国帝王们不仅在生前要享尽荣华富贵，连死后安乐的生活也要在生前料理停当——中国几乎每一个皇帝都要在生前营造墓地，将无数的珍宝放入墓中。墓室实际上成为帝王们死后生活的天堂，至于死后能不能享受，帝王们则不考虑，因为那是死以后的事。可帝王们却没有想到，他们将无数珍宝藏入墓中，不仅没有确保自己能在冥世中享用，甚至连他们的尸骨都无法得以安宁——一代代的盗墓者想方设法进入墓中，一旦成功，珍宝遭洗劫，连口含珠玉的尸体也被蹂躏和毁坏。

中国历代帝王陵墓中的珍宝都是十分珍贵的，而且琳琅满目，数不胜数。明清两代的帝陵陪葬品就十分典型。

一九五六年五月，中国考古工作者对明代明神宗万历皇帝的定陵地宫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地宫布局神奇莫测，宫内的陪葬品丰富多彩，包括珍宝、首饰、金器、银器、玉器、瓷器、织品、服饰等等。有三千余件出土，而这仅仅是地品中的一部分。这三千余件出土的文物，每一件都价值连城。

清东陵曾在一九二八年发生了一起震惊世界的盗陵案，东陵中的惠妃陵、裕陵、普陀裕定东陵无数陪葬品被洗劫一空。盗陵案发生在这年六月，奉军三十八军岳兆麟部下马福田团长统兵进入马兰峪。军阀孙殿英得讯后，以剿匪为名，令第八师师长谭温江带一个团突袭马福田，随即在马兰峪大肆抢劫，然后直奔东陵。深夜时，工兵爆破墓室，炸开慈禧太后明楼下洞门里的金刚墙，打通了进入地宫的通道，撞开石门后进入墓室。孙殿英下令：先由师、旅、团、营长官入内抢劫宝物，然后才许士兵入内。慈禧尸体周围的大件珍宝：翡翠西瓜、蝓蝓白菜、玉石莲花、珊瑚树等下落不明。其它珍宝不计其数，均去向不明。慈禧太后的牙被撬开，口中所含的稀世明珠被劫。

孙殿英部谭温江师长盗墓的同时，孙殿英部韩大保旅长也以军事演习为名，直奔裕陵，炸开地宫入口，撞开两扇菩萨立像浮雕的石门，进入地宫。乾隆皇帝的棺椁、两个皇后、三个皇贵妃的棺椁都被打开，许多稀世珍宝被抢掠一空。

盗陵案被报道后，举世震惊，各地各界爱国人士纷纷通电，强烈谴责这一罪恶行径，要求严惩凶首孙殿英，追回珍宝。外号孙大麻子的河南永城人孙殿英，斗字不识，好赌好乐，但却圆滑世故，因而从伙夫而为特务长直至做到了安徽省主席、国民革命军十二军军长。孙殿英知道犯了众怒，也知道该如何收场：他将乾隆皇帝颈项的108颗朝珠中最大的两颗朱红朝珠送给特务头子戴笠，再托戴笠将一柄九龙宝剑送给国民政府领袖蒋介石；孙殿英又将慈禧太后枕头——翡翠西瓜送给宋子文；将慈禧口中的一颗夜明珠送给蒋介石夫人宋美龄。这些都是稀世奇珍。据说，慈禧口中的那颗夜明珠，分开时是两块透明无光的珍珠，合拢时就是一个圆珠，射出一道绿色寒光，夜晚百步之内可以照见人头，十分清晰。孙殿英一番打点，便逍遥法外，照样做官。

第九章后宫娱乐生活

一、深宫博戏

博戏由于其轻松自如、规则简单和变化多样，因而在中国历代的宫廷中广为流行。博戏在中国起源很早。《说文》释义说：博，局戏，六箸，十二棋也，古者鸟曹作博。《孔子家语》所记载的鲁哀公问博，更有深意。哀公问孔子：吾闻君子不博，有诸？意思是说：我听说有德行的人不玩博戏，是这样吗？孔子回答得很肯定：有之，为其兼行恶道也。意即：是这样的，因为它包容有不良习气。

博戏在中国不断的丰富和发展，分为许多种。有掷骰或掷骰后行棋决输赢的博类，如六博、樗蒲、纸牌、叶子戏；有猜谜一类的博戏，如射覆、藏钩；有游戏一类的博戏，如投壶、触铃。

六博又叫陆博。这种游戏在中国相当古老，和棋的玩法相近似：先掷采，后行棋，棋子每人六粒，所以称为六博。六博和弈常常并论，通称博弈。博在中国的宫廷很流行，它不仅轻松自如，简洁明了，还具有赌的刺激性，即博胜者要赢一定数量的钱，所赢的钱称为进。

西汉宣帝刘询，少年时在民间度日，常与陈遂交往，一起博弈，陈遂聪慧过人，每次博弈，陈遂赢多输少。刘询每次博输，便须向陈遂交纳规定的博进。可是，刘询放逐度日，囊中羞涩，哪里有钱交纳博进？刘询只好赊帐。刘询后来贵为天子，四海一切皆为天子所私有，刘询这时便想到了还清陈遂多年赊欠的博进：委陈遂太原太守之职。宣帝刘询在委任玺书中郑重其事地表白说：官尊禄厚，可以偿博进矣。汉宣帝的温情尔雅、性格清柔，由此可见一斑。相比之下，宣帝的玄祖汉景帝就流于偏颇，欠缺广博宽容的心胸：景帝做太子时，和分封郡国的吴太子玩博戏，屡战屡输，景帝不禁大怒，操起棋盘，一下砸在吴太子头上，脑浆崩裂，吴太子当场毙命。

随着汉室的灭亡，六博日渐衰落，代之以双陆和樗博的盛行。双陆器具是用黑白小棒槌各十二枚，放在木制的四方盘上，盘中彼此内外各有六梁，骰子两只；掷骰后，依点数行进，最后用计胜负。

唐代不可一世的则天皇后武曌曾做梦和人下双陆，可始终无法获胜，醒来以后，武则天大为奇怪，便心存疑虑地召问大臣狄仁杰，询问原因何在？当时，武则天大权独揽，刚刚废黜中宗，总揽朝政，并改国号为周。狄仁杰乘机一语双关地说：宫中无子。则天一笑，不置可否。

双陆最初产生于天竺。在古老的《涅槃经》中，双陆称为波罗塞戏。曹魏时，双陆随着白马东来，传入中原，经过梁、陈、魏、齐、隋各代的广为流传，到唐时进入极盛。唐代的双陆略有创新，和最初传入中原的双陆有所不同。元学者虞裕考证说，唐代双陆是用黑、白各六子，有首对联写得明白，可以为证：三个半升升半酒，两行双陆陆双棋。

儒学自汉代以后渐渐成为中国一统天下的国学。儒家崇尚孔子，孔子说博戏兼行恶道，所以儒家历来倡导的是君子不博。但是，由于博戏在宫中极为流行，博学通才以入世出仕为目的并望仕途通达的儒臣没有一个人会忽略博戏的存在，他们中的许多人研习博戏，以便在适当的机会展露才华，博得天颜一喜，从而顺利进迁，平步青云。

唐朝驰名历史的大臣狄仁杰就是一位博戏的行家里手。狄仁杰被武则天倚重，经常出入宫廷，参与宫中博戏。从这一点看，唐代的博戏之盛，化解了传统儒臣对于博戏学究式的偏见。当然，博戏虽然兼行恶道，比如具有赌

的性质，但它毕竟从容闲雅，尤其是双陆，在博中有雅戏之称。狄仁杰出入宫禁参与双陆的游戏，大概正是看上了它是一种雅戏。

双陆在武则天时最为昌盛，几乎宫中无人不会双陆游戏。武则天和她的宠幸张昌宗等对双陆非常着迷，而且造诣极深，尤其是张昌宗，武则天认为无人能敌，因而更是爱幸不已。有一年，南海进贡了一袭集翠裘，豪华珍贵，价值连城。武则天由于爱幸宠信张昌宗，便将这件集翠裘赐给了张昌宗。恰恰凑巧，这时狄仁杰入宫奏事，看到了这一幕。

武则天兴致极高，早听说狄公的双陆技艺高超，何不让两人一较高下？武则天便命狄仁杰和张昌宗对垒双陆。狄仁杰欣然应允。武则天自然高兴，便问：赌以何物？狄仁杰说：以臣朝服紫拖袍为对，赌昌宗翠裘。武则天摇头，认为这样不太公平：一袭朝服紫拖袍，哪里比得上昂贵珍稀的集翠裘？武则天便说：此裘价逾千金。狄仁杰从容不迫，理直气壮，回答说：臣的朝服紫拖袍是大臣朝见之衣，而集翠裘不过是嬖幸的宠遇之服，以翠裘对臣袍，臣犹怏怏，心中觉得不公！

武则天听这一说，无言以对，一旁的宠幸张昌宗也一时语塞，只好全力以付对垒。张昌宗不过是太后的花瓶而已，哪里下得过狄仁杰？累局连连败北，张昌宗垂头丧气。狄仁杰一言不发，离席拿起集翠裘，扬长而去。天下至尊的武则天也无可奈何，哭笑不得，只好安慰自己那无能的心肝。

武则天为了称帝，废了中宗。韦皇后随着中宗流落房陵，两人相依为命，苦苦度日。每当朝廷使者到来，中宗都吓得心惊肉跳，每每准备自杀。中宗身处逆境的日子，韦皇后给了他无穷的安慰，中宗对韦皇后发誓：一旦重登帝位，你便随心所欲。苦难的日子终于结束，中宗重为天子，韦皇后入主后宫。韦皇后真的放情纵欲，和武三思私通。武三思随意出入皇后寝宫，而且当着中宗的面，公然在内殿床上玩双陆，中宗不仅不加怪罪，反而陪在一旁，看他们对垒，然后帮他们点筹。唐玄宗是位性情中人，也是一位极好双陆的皇帝，但可惜他的双陆技艺远不如他的音乐天赋。天宝时期，岭南进献给宫中一只白鹦鹉，极为美丽，聪慧可爱，宫中呼为雪衣娘。玄宗每次和宫嫔御女对垒，或者和诸王博戏，雪衣娘总是不离左右。一旦博局不利于玄宗，侍从轻呼，雪衣娘便应声从天而降，搅乱博局，这一盘便只好作废，从头下起。玄宗博戏的技艺不高，但却极为喜好，他尤其爱和宠妃对垒。史称玄宗有一次和贵妃对垒时，转败为胜，龙颜大喜，便命高力士赐赏四绯。

唐代宫中的博戏活动成为后世文人墨客的有趣谈资，文士们便对此留下有描摹入微的描述。其中，著名的有元谢宗可的《双陆诗》：

彩骰清音押盘飞，曾记唐宫为赐绯。

影入空梁残月在，声随征马落星稀。

重门据险应输掷，数点争雄莫露机。

惟恨怀英夸敌手，御前夺取翠裘归。

明代郭登的《双陆诗》也记述了此事，写得富于情趣：

一笑承恩便赐绯，论他当局却全非。

平生学得檀公术，打马沿边走似飞。宋学者洪迈研究双陆，认为双陆最近古号雅戏。洪迈考证说，双陆兴于西竺，曹魏进入中原以后，先后有四种称呼：掘槊、波罗塞戏、双陆、长行。长行兴起于唐代，其玩法与双陆近似。武则天还在双陆的形制上发明了一种新的有趣的博戏，称为九胜局。九胜局头加千万二彩，棋子凡三十。武则天别出心裁，在宫中玩不尽兴，又将这种

博戏传授给朝廷大臣：她命文武大臣分成两队，以九胜局进行角逐，胜者给予重赏。

樗蒲汉代时即有，到晋代时开始流行，樗蒲这种博戏十分精彩，引人入胜。其玩法史书有这样的记载：三分其子三百六十，限以二关，人执六马，其骰五枚，分上为黑，下为白。黑者刻二为犊，白者刻二为雉。掷之全黑者为卢，其采十六；二雉三黑为雉，其采十四；二犊三白为犊，其采十；全白为白，其采八；四者，贵采也。开为十二塞，为十一塔，为五秃，为四撇，为三泉，为二。六者，杂采也。贵采得连掷，得打马，得过关。余采则否。

晋武帝司马炎酷爱樗蒲，常爱和宠妃以樗蒲消遣时光。岂料武帝的宠妃胡贵嫔恃宠而骄，在樗蒲时竟和武帝争强好胜：武帝为了输赢面红耳赤，胡贵嫔据理力争，毫不逊让，结果在一次棋局上，武帝和贵嫔竟然争执起来，以混乱之中，弄伤了武帝的手指。

宋武帝刘裕在登基以前也是一位激情荡漾的博徒。刘裕有许多情趣相投的博友，刘毅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刘裕和刘毅多次较量，常常技艺相当，难分胜负。即位以后，刘裕还常召刘毅入宫相博，刘毅家境清贫，家无担米之储，但在樗蒲时却常是一掷百万，数目惊人。有一次，刘裕、刘毅再次聚博，赌注数百万，刘毅从容沉着，掷骰得雉，刘毅不禁大喜，绕着床桌，欢呼雀跃。刘裕深感厌恶，但依旧沉着应战，徐声说：老兄试为卿答——露一手给你看看！刘裕从容掷骰，四子俱黑，也是博戏一绝。第五子时骰子转跃不止，刘裕厉声断喝，其子恰好停止成卢。

刘裕、刘毅棋逢对手，博局耗尽心血。又有一次，一场博局下来，两人疲惫不堪，结果却两人各赢一半。刘毅是赌兴勃勃，大嚷着要武帝将两人的钱并在一起，再较胜负，刘毅先掷，再次得雉，胜利在握。刘裕本不愿意，但经刘毅一激，不免赌兴又起，运足内气，一较高下：刘裕拖延了半天，四座侍从捏一把汗，个个心中紧张。刘裕一掷却两次得卢。刘毅又一次大失所望，对武帝刘裕说：知公不以大坐席与人。刘毅这位武帝提携的骄纵大臣其野心跃然而出，在博局上充分显露。后来，刘毅果然由博局变而为武帝政治上的对手，最后被武帝征讨，以至败亡。

北周开创者宇文泰后来被追封为北周文帝。宇文泰喜爱把自己看重珍贵物品赐赏部下，以此增进情义，以便部下效力——其中樗蒲便是宇文泰赐赏的珍爱物品之一。南梁余绪和后梁主萧察向宇文泰进献了一只玛瑙钟，宇文泰看钟极为精美，便对待从郎丞们说：谁能掷樗蒲先得卢，便赐与玛瑙钟。侍从郎丞们欢呼雀跃，一心力争得卢，但由于技艺欠佳，不免一一败北。轮到了薛端，薛端先说了两句漂亮话：并不是为钟，只是展露赤诚。结果，连掷五子，皆黑得卢，薛端由此既表露了忠诚，又获得了价值连城的玛瑙钟。

宇文泰意犹未尽，当即又解下身上所服的金带，对待臣们说：先得卢者，即赐金带。侍臣又一次磨拳擦掌，兴致勃勃，志在必得。但一轮将遍，还是无人得卢。最后轮到了王思政，王思政孤注一掷，竟以性命为赌注，当堂发誓说：正愿尽心效命，上报知遇之恩；如果上感至诚，便掷为卢；如果至诚不尽，神灵当明，便以杀身谢罪！说罢拔剑横在膝上，接着，拿过樗蒲，从容投掷。宇文泰很为王思政的至诚感动，刚想阻止，局上的卢已形成，君臣便一片欢呼。樗蒲在唐代也是帝后妃嫔们的日常博戏。唐武则天就极好和幸臣樗蒲。唐风流天子唐玄宗，在讲论经义，娱情音乐之余，也常和诸王欢笑于樗蒲局中。宋、明以后，樗蒲失传，然而宫中却出现了许多新的博戏。新

的博戏更加明了，也更加简单，樗蒲从此寿终正寝，不再流行。

二、宫室投壶活动

投壶是中国古代宴饮聚会时的一种很有趣味的游戏。每次宴饮时，主人备好精美的壶的一捆投壶的箭。投壶活动时，主人站在一边，宾客依次手拿着箭，投向壶中，投中者以多为胜，最少者罚其饮酒。投壶一次接一次地进行，即便嗜酒如命的酒徒也挡不住一次次的罚饮，最后便会烂醉——任何有身分的人都不愿在此出乖露丑，都想在投壶中争胜。

中国的宫廷宴饮中也极盛行投壶。即便不是宴饮聚会，闲暇无事的宫女嫔妃时或以投壶自娱，消磨光阴。宫中的壶和箭都很精美，制作细致绝伦。身穿龙袍的皇帝有时也会禁不住韶光美景的诱惑，在殿中、室外和庭除，小试身手，以投壶寻点开心。当然，更多的时候，至尊至贵的帝后主子们是坐在龙凤宝椅上，品着美酒，欣赏着伶官、侍从和窈窕宫女的投壶。

投壶这一娱乐活动在中国历史很悠久。中国最古的典籍之一《礼记》就曾详细地记载了古时的投壶活动。《礼记》上说，投壶是一种古礼，是古代待宾娱宾的一种方式，主人捧着一束箭，恭候一旁，请宾客依次持箭投壶。开始投壶时，主人还要恭词相请，说家中备有“枉矢哨壶”，藉以娱宾。枉矢哨壶当然是一种谦称，是指粗鄙简陋的壶和箭。事实上，主人备办的壶和箭都是至精至美的。

中国古代的投壶活动富于情趣，又讲究极多。宾客按照顺序持箭投壶，决出胜负后，负者便责无旁贷地按规定饮酒，而且决不苟且。饮酒时，一旁助阵的乐工还要兴致高昂的齐奏古乐《狸首》，场景极为热烈。饮酒的人要恭恭敬敬，跪奉酒杯，而后一饮而尽，称为赐灌。投壶赢者也要郑重其事地跪在一边，称为敬养。当然，这些是古时的规定，到进入宫中，仅仅是出于娱乐助兴，便也没有如此的繁文缛节。

中国用作投壶的箭，场所不同，规格也有别，所谓“筹，室中五抉，堂上七抉，庭中九抉”，筹即是指箭；四指称为一抉。投壶的壶中一般装些小豆，以免箭入壶中又反弹出来。壶离投箭的席约七尺，做箭的材料也极考究，即：矢以柘，荆棘母，去其皮。

古人投壶的时间和地点是随着光线的明暗有所不同。《礼记疏》说：投壶有三处，日中则于室，日晚则于堂，太晚则于庭。史书中还详细的记述了投壶的术语和规则：司射执算，左右卒投请数，二算为纯，一算为奇，遂以奇算告曰某贤于某若干纯；奇则曰奇；钧则曰左右钧。这里的纯即是全，二算为纯，即指二算合为一全。奇是指只，即不满纯者。贤即胜。双数即称若干纯，如十算称为五纯。单数则称若干奇，如九算称九奇。钧是指等。

北齐黄门侍郎颜之推在其《颜氏家训》中记载说：投壶之技，近世愈精，古者实豆，今惟欲其骁，益多益善，乃有倚竿、带剑、狼壶、豹尾、龙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莲花骁。《艺经》说，投壶以十二筹为限，像一年中的十二月。到宋时，据《太平御览》记载，投壶娱乐中讲究声势，投壶以击鼓为节。《正学通》还记载说，投壶的壶也有规格：壶颈七寸，腹五寸，口径二寸半，容斗五升。

投壶在汉时是一种儒雅的活动，极得通经博学的儒士的喜爱。《东观汉记》记载说，大臣祭遵去世，博士范升沉痛地向皇帝上疏，称遵为将军取士，皆用儒术，对酒娱乐，必雅歌投壶；又建为孔子立后，奏置五经大夫，虽在军旅，不忘俎豆。祭遵虽一个武夫，但尊重儒术，崇尚雅歌投壶，因而赢得

了儒生博士的敬爱。

投壶不仅儒雅，还很有技巧，因而极有趣味。汉武帝时，宫中流行投壶，因为有一个无与伦比的投壶怪杰，武帝引为自得，几乎每宴必定投壶。这位怪杰便是和东方朔齐名的戏谑之臣郭舍人。郭舍人比所有的投壶者技高一筹：一般人投矢入壶，为使矢不致反弹出来，壶中都得实以小豆；郭舍人则不同，他不仅能准确的投矢入壶，还能让竹矢落入壶中再反弹回到手中，而且百投百返，没有一次落空。武帝对郭舍人的这种儒雅和技艺极为赞赏，每次宫廷宴会，武帝便命郭舍人代他投壶，郭舍人每次必胜，武帝就厚赐金帛。

投壶随着在宫中盛行，渐渐也被达官、显贵和儒雅博学的士大夫所接受，甚至于武臣宿将也迷上了投壶。汉献帝时，袁绍领兵起事，以邺城为大本营。有一次，袁绍和侍从投壶，听说魏郡兵谋反，和黑山贼以数万之众围攻邺城，袁绍依旧谈笑风生，引满投壶。袁绍的这种临危不乱、处变不惊赢得了部下的崇敬。

三国时有位邯郸淳，字元淑，对投壶极有研究，写了一篇千余言的《投壶赋》，上奏魏文帝。文帝喜文好娱乐，觉得《投壶赋》写得很有功力，便赐赏帛一千匹。魏晋时的玄学大师王弼生性豪迈，放荡不羁，史称他生性和理，喜游宴，善解音乐，尤其长于投壶。流行一时的《神仙传》也记述了当时的投壶时尚，谓玉女投壶，天为之笑。

南北朝时的汝南周璜、会稽贺徽也是一代投壶高手，他们能一箭四十余骁。贺徽还在壶前设障，隔障投壶，十拿九稳。齐竟陵王也是一位喜好娱乐的人物，投壶在他的王侯生活中增添了无穷的乐趣。史载竟陵王有次上朝时，见大臣柳惔投壶骁兴不绝，停舆观赏太久，因而耽误了上朝。齐武帝斥问竟陵王何以迟来？竟陵王如实相告。齐武帝勾起了兴致，吩咐在堂上表演，果真技艺叫绝，齐武帝很高兴，便赐赏美绢二十匹。

唐时的投壶更为兴旺，连周边国家也受到感染。《唐书》记载说，高丽国追慕大唐，极喜弈棋、投壶和蹴鞠。唐大臣卢藏用博学通才，工于文章，长于草隶，却也是一位投壶弹琴的国手。薛^平甘感更是技高一筹，他能背后执矢投壶，龙跃隼飞，百发百中。唐宰相上官仪、大臣裴宽等也都长于投壶。上官仪还写有《投壶经》一卷，在唐代广为流行。《投壶经》确定了投壶的规则和格局，并进入了宫中。《投壶经》一直盛行到宋代，宋司马光住洛阳时，常聚客谈诗说赋或以投壶自娱，司马光觉得《投壶经》不合礼意，便重新改写，更定新格，成为此后投壶的经典之作。

投壶作为儒雅的娱乐活动一直在中国的宫廷中盛行。养尊处优的帝王、后妃们对投壶很有雅兴，但更多的时候，帝王、后妃们只在一旁观赏，具体投壶的则是优伶、侍从和宫女，尤其以宫女代为投壶助兴的情况居多。大学者和诗仙李白就有名诗描写宫女投壶的情景：帝前投壶多玉女，三峙三笑开电光。

中国有一首流传甚广的投壶古歌，宫女们闲暇时会即兴吟唱：

上金殿，著玉尊，延贵客，入金门，入金门，上金堂，东厨具肴膳，椎牛烹猪羊，主人前进酒，琴瑟为清商，投壶对弹棋，博弈并复行。

梁以后又流传另一首投壶歌：

夜相思，投壶不停箭，忆欢作娇时。

中国历代的文人墨客对投壶也多有描述，唐曹唐有诗云：

北斗西风吹白榆，穆公相笑夜投壶；
花前玉女来相问，赌得青龙许赌无。
明大臣、学者丘浚也写了一首著名的《投壶诗》描写了明时的投壶活动：
玳瑁筵开宴玉楼，哨壶枉矢请相投。
力期一中端倪巧，语重三辞礼数优。
罚盏饮来分胜负，倚竿正处送赍酬。
山翁不管淹淹醉，只倚银瓶漫数筹。

三、帝王棋弈之娱

弈棋是中国很早的一种智力游戏。崇尚机智和谋略的中国古代先民把人生的斗智场缩小在一方小小的棋盘上，纵横其间，奔突冲杀，趣味无穷。中国的棋类活动中出现最早也最为普及的便是围棋，古时称为弈，棋的本义则是指棋子。中国文学的经典作品《说文》中就说，弈，围棋也。

围棋自产生以后，在中国的士大夫和士子中历来被视为情趣高尚的雅戏。中国可信的史书记载说，远古时的一代圣主尧发明和创造了围棋，尧以此教导愚子丹朱。后来，丹朱果然开窍，长于对弈。中国的至圣先师孔子曾教导弟子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孔子在这里说的是，博弈比饱食终日要有益些。

博和弈在中国古代经常连称，原因是博和弈的游戏方法极为相似，但两者也有所不同：博是先掷采即骰子，然后行棋，弈则是只是行棋。后来，经过长时期的演化，博只掷采，不再行棋，博和弈就此分家，博、弈的游戏方法相差甚远，也就有了高雅和鄙俗的区别。

博的发明人据说是暴君殷纣王。鲁哀公问孔子博，孔子对之嗤之以鼻，认为其兼行恶道。但作为雅戏的弈，具有消遣性和娱乐性的同时，沉溺其间，不免也耽误正事。吴主孙权的太子孙和曾说：当世士人宜讲修术学，校习射御，以周世务，但交游博弈，妨碍事业，不是进取之道。孙和认为博弈妨碍事业，北齐学者颜之推对此也有相同的看法。颜之推说：围棋有手谈坐隐之名，颇为雅戏，但令人耽愤，废丧实多，不可常也。

围棋虽然不可为常，但它的闲雅却一直赢得了儒臣雅士的由衷赞赏。魏学者王粲写有一篇著名的《围棋赋》，其序称：清宁体道，稽谟元神，围棋是也。文坛大家左思也称：顾非累卵于累棋焉，至观形而怀怛。甚至于有不少的明达之士将一局围棋看作是统驭天下，所谓：弈者之思尽于一局者也，圣人之明周于天下者也；苟一局之势未尝尽同，则天下之事岂必相袭哉！从这点看，围棋对于开聪明智，广博胸怀，筹谋万方，实在是功不可没。

中国富贵优雅的宫廷中，闲暇无事的帝王和后妃对于博、弈极为欢迎。弈需要劳思伤神，不如博简洁明了，具有趣味性和消遣性，富于刺激，能调动人的情绪。博的种类和玩法也比弈多，好事又无所事事的帝王后妃们喜欢增添博的花样，寻找乐趣。博盛于宫中，常在酒宴中进行，称为饮博。但无论博如何风行，它始终不能取代弈，因为它浅陋，直接明了，不如弈深奥，也就是不如弈雅。所以，历朝历代，举凡有些风雅或附庸风雅的帝王后妃，便喜欢对弈，也长于对弈，常常是一弈便是半个时日以至日以继夜。

古时称为弈的围棋在中国宫廷中最盛的时代莫过于以风雅相尚的南朝。中国南朝的绝大多数皇帝都爱好围棋，尽管棋艺平平，甚至于有点拙劣。南朝的第一代皇帝中的宋明帝是位有着贪吃嗜好的美食家，可就是这位饕餮者，却对十分雅致的围棋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喜好。但遗憾的是，贪吃贪睡的明帝智商并不高，他酷爱围棋，却棋艺低劣，他的臣僚们私下品评他的棋艺，说充其量只能是三流水平。

明帝的自我感觉却出奇的良好。他对自己的棋艺水平并不清楚，或者说他根本不在乎棋艺的高低，只是出于爱好，乐在其中而已。因此，明帝以自己帝王之尊常召天下第一流的棋手和他对弈。其中，经常召入宫中的是一品棋手王抗。王抗技高几筹，对弈时自然是饶明帝几着，但表面上又不露痕迹。

王抗下棋时常常说：皇帝飞棋，臣抗不能断。明帝品不出王抗的意思，情绪高涨，乐不可支，心里愈发美滋滋的。明帝在与一流棋手的对抗中有惊无险，有滋有味，愈发对围棋充满兴趣。

明帝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个货真价实的棋迷，在对弈之余，还别出心裁，特设了一个围棋州邑，按选拔入仕人才的九品中正制实施选士和管理。在明帝特设的围棋州邑中，州邑的各级长官大中正、小中正等都是不同级别的围棋高手。明帝对围棋如此酷爱，与他的父亲宋文帝刘义隆对围棋的喜爱有一定关系：文帝当年和神棋手羊元保赌棋，赌注是一个郡，结果神棋手对弈获胜，赢得了这个郡，做了文帝治下的宣城太守。

齐高帝萧道成统治时期，围棋高手王抗仍然是第一品棋手，第二品棋手是褚思庄、夏赤松等，高帝和他们都是趣味相投的棋友。有一天，齐高帝命褚思庄和王抗对弈，双方摆开战场，展开厮杀，自晌午直至日暮才完成一局。齐高帝一直在一旁观战，最后终于支撑不住，先回寝殿暂寝，等候胜负的消息。到达一夜的五更时分，双方才决出胜负。一场长时间的酣战终于结束了，王抗从容不迫地到休息室睡觉，棋艺略逊一筹的褚思庄却因用心费神良久，情绪澎湃，无法平静，以至达旦不寐——他一直坐在棋室，回味棋局，迎来了又一个曙光四射的黎明。褚思庄的个性是谨严认真，不容苟且的，他和王抗不同。王抗知道权变，知道皇帝爱好围棋不过是出于娱乐而不是决出高下，切磋技艺。褚思庄却不同，对围棋极其认真，决不一丝苟且，因而和皇帝对局，是从不礼让的，他甚至于不容皇帝悔棋：当高帝落子以后，想取子易行，褚思庄会毫不客气的把高帝的手挡回去！好在高帝爱棋，也爱棋艺高超的棋手，他宽厚仁爱，不加争执，因而也没有将褚思庄治罪。

历史上爱棋的皇帝中有虚怀若谷，性情宽厚的，同样也有心胸狭隘，为人暴躁的。皇帝和太子和大臣之间对弈，为了争棋、悔棋恼羞成怒而将大臣处罚的事在中国宫廷历史上是时有发生。汉代的太子师傅倪宽因为和太子争棋，结果被免去师傅之职。晋代的外戚贾谧有一次和太子争棋，一旁观战的成都王司马颖当即正色斥责贾谧：太子，国之储君，贾谧何得无礼！作为娱乐的对弈弄成这样，这棋该如何下？

梁武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位博学通才的皇帝，同时也是一位兼通释道和艺术的悟性极高的才子。梁武帝精通文墨，对于琴棋书画，可谓无所不能。梁武帝对于这些雅事的喜爱，达到了魂牵梦绕的程度，而且神心向往，精力极为旺盛。武帝沉迷于对弈是长年累月的，并乐此不疲。他经常通宵达旦地下棋，以致毅力坚强、身强体壮的侍从们哈欠连天，一个个东倒西歪的——宫中明文规定，皇帝没有入寝，任何侍从是不准就寝的，而且须保持高度清醒。困倦不堪的侍从们身不由己，大多失职，只有一个叫陈庆之的近侍，始终保持警醒，每当武帝召唤，他便应声领命，于是武帝对他格外的倚重和赏识。

武帝在棋局上持久盘桓的过人精力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侍中到溉开始不大信，较量以后便心服口服，目瞪口呆。到溉的棋艺是造诣很深的，他作为武帝的棋友之一，很得武帝的赏识，但就是精力上无法及于武帝。到溉和武帝的较量实际上衍而为精力和体力的对抗，最后，总是到溉在极度疲劳中，风雅之态丧失了，一头冷汗，双眼迷离，一副恍恍惚惚、昏然欲睡的样子，到溉败北就成为定局。武帝每次见到溉这样，觉得可笑之至，便作了句诗，嘲弄自命风雅的一代棋手到溉：状如丧家狗，又似悬风槌。到溉对弈下的疲

倦之态可想而知。

沉迷于棋盘对局的武帝萧衍，有一次在无意之中却误杀了一个难得的僧友。这位武帝的僧友是名闻佛界的磕头师——他的道行极高，高行神异，武帝对他极为钦佩。武帝奉信佛教，曾经多次舍身同泰寺，想出家为僧。武帝对于法师一直是诚心敬重的，并经常召他们入宫。磕头师是高行法师中的优秀者，武帝常派中使请他入宫，一同讲论佛法。这天合该有事，也是磕头师命数该尽。中使奉命带磕头师进入后宫，来到武帝座前，进奏说：磕头师至。就是汇报说：磕头师到了。武帝适时正与棋手对弈，杀得如火如荼，难解难分，弈局正进入高潮。武帝一时杀得性起，正准备要杀子一段，便应声出口道：杀！中使大惊失色，可是，皇帝金口玉律，出口便是圣旨，中使只有奉旨退下，将高行法师拖出斩首。磕头师大惑不解，不明白犯下了什么死罪？缘何好端端的要推出宫外，斩首了之？临归西天，法师只好解嘲说：我是无罪的，只因前生是沙弥，用锄误杀了一条蚯蚓，皇上正是那蚯蚓，今天是来报仇的！磕头师死了，武帝的这盘难解难分的棋也很快结束。武帝以为法师等在外面，命中使请法师入殿，不料中使跪伏奏道：刚才，陛下吩咐杀死，磕头师已被处斩！

唐代的待诏是皇帝选拔为宫中所用的有各种才艺的文人雅士，能够自由地出入宫禁。唐玄宗设立棋艺待诏，搜罗天下围棋高士，直至宋代，宫中还有棋艺待诏。唐顺宗时，倚重王叔文等实行新法。王叔文棋艺高超，极得顺宗的赏识，在宫中出任棋艺待诏，从而得以自由出入后宫。多才多艺的唐玄宗当然是位围棋的爱好者，但作为一国至尊的皇上却是只赢得起，而输不起。对弈中，输赢本来是极平常的事，但皇上是怎么也不能输，因而对玄宗至亲至爱的杨贵妃总是在玄宗对弈快输时就帮玄宗一把。她每见弈局上玄宗败局已定，便让怀里的小狗跑过去，爬上棋盘，搅得一团糟。棋子四处散乱，自然无从下起，只好重来。玄宗此时喜出望外，觉得美滋滋的。

唐代的中国经济繁荣，文化鼎盛，都城长安成为各国使者慕名求学的圣地。围棋在中国盛行的同时，也传到周边国家。唐时日本的围棋发展也是相当惊人的。唐玄宗在位的大中年间，日本王子来到唐都长安交流文化，联络友谊。日本王子在日本是棋艺卓越，无人能与匹敌的。王子出行中国时，还特地随行带来了日本出产的珍奇棋具。王子介绍说：日本东部三万里处有个集真岛，岛上有座凝霞台，台上有一泓手潭池。手潭池中出产玉子，玉子黑白分明，冬暖夏凉，人称冷暖玉。这种自然天成的冷暖玉便做成了这副珍奇的棋子。棋子是天然冷暖玉做成的，棋盘一直是由珍贵的楸树木材制成，称为楸枰，但王子带来的棋盘不是楸枰，而是一种状如楸木的玉石制成，称为楸玉，雕琢以后光洁明润，如同镜子。日本王子所带的珍奇棋具并非是不实的传说，一直到明末崇祯年间，日本还在向中国朝廷进贡这种冬暖夏凉的冷暖玉。明崇祯皇帝就常和田妃用这种冷暖玉制成的棋子在后宫对弈。

日本王子自视甚高，在国中所向无敌的战绩使他目中无人、忘乎所以。他急于想和中国的一流棋手较量，并陶醉在战胜中国一流棋手的幻觉里。王子咄咄逼人的挑战，作为天朝大国的唐王朝当然不能漠视。唐宣宗经过考虑，敕令待诏顾师言出场对阵。顾师言是当时的国手，朝中没有人比他更具有实力。顾师言接受了皇上的敕命，同时也肩负起了泱泱大国的尊严和荣誉——老师出场，别无退路，肩上所负的重任可想而知。顾师言诚惶诚恐，惟恐有负君命，但出场对弈，又极为镇定从容，嘱咐自己一定要竭尽全力，赢得这

场棋艺，也是国力和才智的抗争。

顾师言和日本王子在宫中对弈，宣宗等观战。对弈中下到三十三下，双方势均力敌，还没有显出任何一方的优势。这时的顾师言已经是双手汗水淋漓。顾师言不敢松懈，继续殚精竭虑，每一回合，每次落子，都是经过苦苦凝思，反复权衡。最后，顾师言精心设计，终于摆出了令人惊骇的镇神头局势，日本王子瞠目结舌，只得承认无法取胜。

日本王子擦擦汗渍，回过头来，惶然地询问立在一旁的负责外交礼仪的鸿胪寺官员：待诏是第几品棋手？回答说：是第三品。日本王子惊诧，缓过神后请求说：请会一下第一品。鸿胪寺官员微笑着摇头：王子如果胜了第三品，方可见第二品；胜了第二品，方可见第一品；王子如今没有胜第三品，却想会第一品，不合适吧？日本王子无限惭愧，只得掩着棋局感叹说：小国第一，不如大国第三，令人佩服！日本衷心认输，为人也很诚实——实际上，心虚的是泱泱大国极好面子又极其怕输的唐朝棋手，他们是为皇上争荣誉，为威服四海的大唐帝国争荣誉，一场较量以后见好就收，谁还会过分自信，在不测的棋局上冒险显身手？

棋艺待诏一直到宋代宫廷中还依然存在。宋太宗赵光义是位多才多艺的皇帝，尤其在琴棋方面的技艺，都是有相当高深的造诣。当时，供职于宫中的待诏贾玄，独步当世号称围棋国手数十年，无人能与匹敌。太守喜好围棋，贾玄便以无人替代的国手身份侍从在太宗身边，并在日常的对弈中向太宗传授了变幻莫测的围棋技艺。有了这样一位一流水平的国手陪练，太宗的围棋水平自然日有长进，步步高深。

当然，贾玄和太宗在棋艺水平上不在一个层次，无法同日而语，因而贾玄一直不曾在太宗面前显露自己的真实水平。贾玄和太宗相处久了，或许是想讨太宗的喜欢，或许是出于授艺已久想试探一下太宗是否有点长进，贾玄便玩了一场故意输棋的把戏。有一次，太宗依旧召贾玄在宫中对弈，太宗觉得自己是技艺非凡，口吐狂言，声称饶他三个子。结果，贾玄输了一路，真的败北。太宗对这种结局当然是无法相信的，他从中看出了这位国手的狡黠，并感到这位国手轻慢自己，不愿使出真技艺。

一战贾玄败北。收盘再战的时候，太宗警告贾玄：这局你要是再输了，就榜斥你，以示惩罚。经过一场厮杀，满局不生不死，难分胜负。太宗于是说：再围一局，你要是胜了赐你绯衣，输了就把你投入泥中。又是一场苦战，结局依旧是不分上下，平局言和。很显然，一流国手的贾玄是胸有成竹，故意如此的。太宗不管贾玄是否是有意，决定教训一下他。太宗对贾玄说：我饶你一个子，如今是平局，应算你输。于是，太宗吩咐侍从抱起贾玄投入泥中，近侍们应声上前行动，贾玄慌忙喊道：陛下且慢，臣手中还握有一子！太宗听后不禁开心大笑，只好确认贾玄赢了这一局，并应诺赐赏绯衣。

宋太宗时另一位精通围棋的有名高手是潘慎修。潘慎修字成德，供职宫中，长于对弈。太宗屡屡召进潘慎修陪他下棋。潘慎修因作《棋说》进献，将深奥微妙的棋道和定为国学的儒学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联系起来，讲得头头是道。潘慎修说：棋之道在乎恬默，而取舍为急，仁则能全，义则能守，礼则能变，智则能兼，信则能克；君子知斯五者，庶几可以言棋矣。潘慎修列举十要详细阐述，说得玄乎其玄，太宗没法不高兴、不佩服，便大加赞赏。于是，潘慎修的十要和《天中记》的九品就成了中国围棋的经典性典故。所谓九品即指围棋品级；入神、坐照、具体、通幽、用智、小巧、斗力、若愚、

守拙，实际上，是九种境界。

宋太宗时的潘慎修和贾玄比较起来，潘慎修注重于理论上的总结，并和治道联系起来，提醒皇上不要沉溺于棋局，不要荒政。贾玄则不同，贾玄向太宗传授的尽是一些纯技术性的围棋法则，并随时对弈，对太宗产生了极大影响，使本来爱好围棋的太宗越发沉迷和求乐其中。朝廷的言官谏臣发现太宗迷恋于棋局对弈，有些不能自拔，便个个愤然，他们不能再保持沉默了，于是，进谏的奏章一封封递到御前。有的谏章直截了当，怒斥贾玄乱政，奏请太宗大奋乾纲，将奸臣贾玄流放南州。奏中称贾玄阴险奸诈，每每进献新图妙势悦惑圣主；圣主万机听断，由此壅遏；结果坐驰睿襟，神气郁滞。太宗看罢奏章，觉得言官小题大作，夸大其词，太宗批复说，朕非不知，聊避六宫之感耳，卿等不须上言！

中国一些较为出色的皇帝大都喜好围棋。皇帝喜好围棋，精通棋道的围棋高手自然三生有幸，生逢其时。皇帝礼敬和爱重一流棋道的一代国手，国手荣宠有加，被世人所羡慕。但是，要想持久地保住国手的地位，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时为此要费尽心机，甚至于不惜为人卑鄙。

南宋高宗偏安江南，不思收复失地，却日夜歌舞升平，尤其喜好对弈。高宗在位时，有位所向无敌的关西棋手声名远播，被推荐到朝廷，高宗大为欣喜。关西人棋艺精湛，高宗希望他能和供职宫中的国手对弈，这场对弈自然是异常精彩的，高宗为此兴奋。关西人的棋道造诣很深，技艺可谓炉火纯青，他私下和宋宫国手对弈，几乎是每战每胜。推荐人很有把握，知道正式对阵，关西人肯定能战胜国手，便请求高宗亲自临阵观看二人对弈，让他们有御前一决胜负。高宗乐于观阵，就欣然接受了一这请求，并吩咐次日在御前一决胜负。

高宗是极为看重国手的，他极想在煌煌的圣殿看见所倚重的国手将关西人一举击败的情景。但国手经过私下较量，是深知自己远远不及关西人。怎么办？次日如果在御前失败，那是再也不会再有立足之地，国手惶惶不安。很快，国手想出棋艺之外的一着妙计。当天晚上，国手恭恭敬敬地来到关西人的住处，并带着一个十分娇艳美丽的女子。国手客气一番以后，诚恳地对关西人说；这是我的女儿，送给你做妻子；但明日在御前下棋时，你需让我第一局，第二局时我会让给你；这样，我和你永为翁婿，供职在宫中，随侍皇上左右，不是很好？你要是不信我说的话，我怎么会轻易将女儿许配给你？

关西人一眼就看上了这位美丽动人的女子，关西人质朴豪爽，生性直率，当即便赞同了国手的安排。关西人不知道这是一计：事实上，国手并没有女儿，这位美丽的女子，不过是教坊的一位艺妓，是用重金临时拉来的。第二天，两人在御前对阵，关西人果然如约败给了国手。高宗观战中一直是兴致勃勃的，而且毫不怀疑国手的取胜。第一局果然关西人败北，高宗在为国手自得之余，对关西人和推荐者不免极度失望，便拂衣而起，对推荐人徐徐地不无鄙夷地说：毕竟是外道人，怎么能敌得过国手？关西人胸闷气短，有口难言，知道自己被国手出卖，只好垂头丧气，离开皇宫。关西人回到住所，神思恍惚，终日不思饮食，闷闷不乐，最后，终于忧郁而死。

南宋孝宗也是一位酷爱围棋的棋迷。当时的宫中，也网罗了一批围棋高手，出任内廷供奉。当时国手是一流棋师赵鄂，赵鄂不满足于只作一个内廷供奉，希望授给官职。孝宗推重围棋，他对国手赵鄂很看重，君臣二人的关系一直很好。孝宗授赵鄂武功大夫、浙西路钤辖。但宋代官制是较为特殊的：

有实职和虚衔之别，仅有虚衔并不能领实事，必须补缺方可。赵鄂的官职只是虚衔，因此，赵鄂请求孝宗补他实缺。孝宗这一关是很好过的，问题是朝臣廷议时来必能通过——如果廷议时不能通过，也是白忙乎一场的。所以，孝宗只好如实地对国手赵鄂说：降旨不妨，恐外庭不肯放行耳。

比起宋太宗赵光义来，七百年以后的明成祖朱棣就缺少气量，心胸狭隘得多。成祖即位之前，是镇守北方的燕王。他在燕王位上时，曾和待臣刘璟对弈，刘璟屡战屡胜，朱棣感到十分难堪，最后竟愤然地感叹说：你难道不能让一下我？！

连明成祖朱棣气量都不如的是清末皇太后叶赫那拉氏·慈禧。慈禧统治中国长达四十八年，唯我独尊，至高无上，对弈当然也是绝不能输的。慈禧又极喜好下棋，至今故宫博物院还保留有慈禧在后宫中下棋的石凳、石桌和棋盘、棋子。慈禧喜爱下棋当然得时常有围棋高手陪着。慈禧又不能输，又要下得煞有介事，陪着下棋的国手自然一个个是诚惶诚恐而又不露痕迹地输给她，有了这位太后的欢心，陪同对弈的人才会放下心来，庆幸自己保住了一条小命。

如上所谈的只是中国宫廷中一些有关皇帝和围棋的有趣的故事，而且都是有史可查，有书为据的。除此之外，中国宫廷中还有许多的有关棋弈的活动。如汉高祖时，宠妃戚夫人日夜侍侧。有年八月四日，戚夫人侍从高祖，在雕房北户一片幽静的竹林中对弈，戚夫人的美艳、睿智深深地打动着高祖，高祖万分高兴，对这场对弈久久萦怀。《天中记》记载说，唐僖宗从普王即位，一直不通围棋，也谈不上喜爱。有一天，僖宗做了一个梦，梦中有人烧《棋经》三卷，让僖宗吞食。醒来以后，僖宗命待诏对弈。结果，僖宗的布局指画，出人意外，在场人人无不惊诧。《从信录》记述说，明宣德年间，宣宗召用旧人。蹇义等大臣皆应命承旨，惟独黄福持正不阿。宣宗命对弈一局，黄福说不会对弈。宣宗问他何以不会？黄福回答，说：微臣幼时，父师管得很紧，只让读书，不教无益的事！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上千年的宫廷历史中，有不少的诗文词赋吟咏围棋。梁武帝写有《围棋赋》，梁宣帝也写有《围棋赋》，宣帝在赋中这样写道：引如征鸿赴沼，布若群鹤依枝，类林麓之隐隐，匹星汉之离离，蜂起百涂，纵横万制，或无厌而反走，或先赢而后济。宋太宗留意艺文，在琴棋诗赋上造诣极深。当时，从巨应制诗赋都用险韵，结果大多不能成篇，从臣们只得纷纷上奏请免。王元之为此有这样一诗：分题宣险韵，翻势得仙棋。皇上太聪明了，真是难为了一群伺候皇上的侍从。

弹棋在古代中国极为普及，唐以前的中国皇帝对于弹棋非常喜爱。中国棋艺的经典著作《艺经》上记载说，弹棋是二人对局黑白子各八枚，先列棋局，下呼上击。弹棋的游戏历代有所不同，其规则语焉不详，今人难以描述。说玄一点，说弹棋是仙家之戏。魏时弹棋的玩法较为特别，是在局中先立一棋，余者间以黑白围绕。《梦溪笔谈》的描述则又是一番情景：棋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盆，顶部为小壶，四角微微隆起。

弹棋虽然规则模糊，难于描述，但它确实是一种富有情趣，惹人喜爱的娱乐活动。中国历代有许许多多的文人墨客都把弹棋录入诗中，其中有名的是大诗人被文坛称为诗史的杜甫所写的弹棋绝句感怀。唐代的宫词大家王建也用生动的笔墨为后人记述了宫女玩弹棋的情景：

弹棋玉指两参差，背局临虚头打危。

先打角头红子落，上三金字半边垂。

从这一宫词的描述上看，弹棋不完全属于智力游戏，而是趣味和活动占有相当大的比例，难怪在中国的宫中，帝王、后妃和宫女玩起弹棋来都是百玩不厌，乐此不疲。唐代的杰出词人和学者韦应物写有一篇《弹棋歌》，描述了当时风行天下的弹棋的格式和玩法：

圆天方地局，二十四气子。

刘生绝艺难对曹，客为歌其能，请从中央起。

中央转斗颇欲阑，零落势背谁敢弹？

此中举一得六七，旋风忽散霹雳疾。

履机乘变安可当，置之死地翻取强。

不见短兵反掌收已尽，唯有猛士守四方。

四方又何难？横击且缘边。

岂知昆明与碣石，一箭飞中隔远天。

神安志愜动十全，满堂惊视谁得然。

弹棋作为一种富于情趣又不复杂的游戏活动，自然对性嬉游乐的皇帝具有无穷的吸引力。在中国历史上，汉成帝是一位喜好美色和游乐成性的皇帝。成帝曾一度沉溺于蹴鞠，结果，政务不修，御案上待批的奏章积如山丘，而且每天都呈递增之势。面对这种局面，大臣们唉声叹气，一个个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大臣们忍无可忍，最后以措词激烈的进谏表达自己的忠心。大臣们在进谏的奏中称：蹴鞠劳体，非尊者所宜。就是说，蹴鞠活动是一种劳损体力的活动，这种活动是皇上所不宜参与的。成帝对大臣的谏章一笑置之，答复说：朕好之，可择似而不劳者奏之。成帝这是把球又踢了回来：不是说这种活动不宜圣体吗？不宜却又喜欢，怎么办？就请提供一种相似蹴鞠又不劳圣体活动看看。

御批就是圣旨。大臣们本想奏请皇帝潜心政务，收敛游玩，没想到却揽来了这宗麻烦。好在大臣们都是才高八斗、聪明绝顶的。博学多闻的学者刘向就发明了富有情趣又不劳圣体的弹棋进献给贪玩的成帝。成帝喜出望外，迷恋上了这种新鲜玩意的弹棋，喜欢得无以复加。从此以后，成帝沉迷于弹棋，再也无暇于蹴鞠。成帝进而对发明弹棋的刘向格外青睐，破例赐给他稀见的珍品青羔裘、紫丝履。

从西汉进入东汉，弹棋在宫中极盛而衰。到东汉冲帝、质帝以后，弹棋不再流行，渐渐在宫中绝迹。东汉末年的汉献帝建安时期，博弈、弹棋再度在宫中复兴，史称博弈具皆得置宫中，宫人以金钗玉梳戏于妆奁之上，可见博、弈、弹棋之类在当时的宫中是何等兴盛。从史书的记载上看，汉献帝时的宫中宫女们都玩上了弹棋，她们为了更好的也是更有趣的消磨时光，还对弹棋的内容和规则有所变更，玩出新的花样，加入了金钗玉梳，称为妆奁之戏。由于建安时期宫中玩弹棋的所谓妆奁之戏极为流行，对曹魏和而后的弹棋风行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因而有一说认为，中国的弹棋不是始于汉时的刘向，而是始于汉宫宫女们发明的妆奁之戏，意思是说，刘向发明的弹棋只是一种简单的游乐规则，而真正在宫中盛行起来并具有娱乐和消磨时光，极具宫廷色彩的真实意义上的弹棋是建安时的妆奁之戏。

魏文帝建魏代汉。文帝虽在诗才上逊于其弟曹植，但他的文才却也是出类拔萃，非同凡响的。文帝在他的著名作品《典论》中记述说，他对于其它戏弄之事很少喜爱，却唯独偏爱弹棋，少年时刚刚明了弹棋的玄妙，就特为

写了一篇《弹棋赋》，很为得意。当时，京城中有两位弹棋高手，一个是东方世安，一个是张公子。东方世安是合乡侯。少年的曹丕无法与这两位名手较量，即位以后成为文帝的曹丕便对当初未能与这两位名手较量而深深遗憾。从这记述中可见文帝对于弹棋确实是由衷喜好，而且对于弹棋高手极为敬佩。

文帝酷爱弹棋。文帝的弹棋技艺出神入化，炉火纯青。文帝高超的弹棋技艺屡战屡胜，在宫中再也找不到能与匹敌的对手。文帝过人的弹棋技艺《世说新语》中有这样的记述，说弹棋始自魏宫，文帝于弹棋尤为精妙，其用手巾角拂棋子，几拂几中。文帝在宫中找不到对手，就亟于在宫外找弹棋高手较量。有位客人毛遂自荐，自称弹棋天下无敌，技艺甚高。这位客人被引进魏宫，面见文帝，并排阵对垒。客人确实比文帝技高一筹：客人用头上所戴的葛巾角低头拂棋，几拂几中，成功率还高于文帝。文帝有了这么一位棋艺高超的对手当然很高兴，但对手又高出自己，作为至尊又不能虚怀若谷的文帝心中自是另有一番滋味。

唐顺宗李诵也是一位少有的弹棋爱好者。李诵是德宗李适的长子。李诵立为太子以后，在东宫时就极好弹棋。他的身边聚集着当时一批名闻天下的弹棋高手。有名的一流棋手即有吉达、高钺、崔同、杨同愿等，他们都是名噪一时。仅次于他们的棋手还有窦深、崔长孺、甄偶、独孤辽。顺宗对于弹棋的喜好，《天中记》有较详的记载。

弹棋在中国的宫廷中何时销声匿迹？史书没有确切的记载，无从查考。但自唐以后，中国宫中就绝少有关于弹棋活动的记述。《帝京景物略》是记载中国古代典故和史迹的书，书中记述说，北京西山碧云寺后有一处石弹棋盘，是金章宗留下的遗物。由此看来，弹棋自唐以后在汉王朝宫室中被别的娱乐活动所取代，渐渐消失，几经流传，却在北方王朝的宫中落了户，并流传下来。

中国古来关于弹棋的诗文歌赋也很多。周王褒曾写有一首有名的《弹棋诗》，诗云：投壶生电影，六博值仙人；何如镜奁上，自有拂轻中。大诗人杜甫有两句著名的诗句写的就是弹棋：玉局他年无限笑，白杨今日几人悲。

四、藏钩戏

藏钩戏是汉宫中极流行的近似于射覆的一项游戏。藏钩戏起自于汉武帝时代，据说武帝暮年的时候，他所宠爱的最后一位夫人是汉昭帝的母亲钩弋夫人。钩弋夫人进宫时，一直把拳头攥得很紧。武帝亲自展其玉手，发现手内有一小钩，武帝觉得十分有趣。后来，藏钩在宫中发展成游戏，极得宫中女子们的喜爱，通常的玩法是：众人分成两队，每队有一只小钩在众人手中传递，双方互射小钩所在，猜中率高的即为获胜者。

中国古代的风俗习惯中也有腊日饮祭之后叟、姬、儿童作藏钩之戏。这种风俗流传很广，也富于趣味，恐怕和汉宫中流行的两队射钩有渊源关系，因为其玩法是十分相近的：参加游戏的人分成二曹，比较胜负。人偶即敌对，人奇即人为游附，或属上曹，或属下曹，称为飞鸟。一只小钩在众人手中传递，曹人射知藏在何处，一藏为一筹，三筹为一都，总计射中率高者获胜。

《彩兰杂志》记载说，古人尚阴阳，九是阳数，每月二十九日为上九，初九日为中九，十九日为下九。每月下九即置酒宴乐，为妇女欢，称为阳会——所谓盖女子阴也，待阳以成，故女子于是夜为藏钩诸戏，以待月明，至有忘寐达曙者。藏钩虽然以其闲情雅致为世人所喜欢，但一些讲究的禁忌的家族却是禁绝此戏，因为它不吉利。俗称：藏钩令人生离。据说，晋代的时候，海西公时，高朋贵戚会饮，席间玩藏钩戏，在众臂之中人们发现有一只奇特别样的手：修骨巨指，毛粗色黑。这是异象，举座皆惊。不久，这人即被桓大司马所杀。

藏钩戏随着从宫中到民间的广为流传，渐渐引起了雅士文人的注意。晋诗人庾阐写有一篇《藏钩赋》，写得格调高雅，生动别致，有滋有味的：

叹近夜之藏钩，复一时之戏望。
以道生为元帅，以子仁为佐相。
思朦胧而不启，目炯冷而不畅。
多取决于公长，乃不咨于大匠。
钩运掌而潜流，手乘虚而密放。
示微迹而可嫌，露疑似之情状。
辄争材以先叩，各锐志于所向。
意有往而必乖，策靡陈而不丧。
退怨叹于独见，慨相顾于惆怅。
夜景灿烂，流光西驿。
同朋海其夙退，对者催其连射。
忽攘袂以发奇，探意外而求迹。
奇未发而妙待，意愈求而累僻。
疑空拳之可取，手含珍而不摘。
督猛炬而增明，从因朗而心隔。
壮颜变成衰容，神材比为愚蒙。

藏钩戏发展到辽代，衍而为藏阄戏，流行宫中，辽代的藏阄戏常在宴饮时游玩。这一游戏还郑重其事地编入了辽代的礼制之中，成为宴席必备的法定节目。藏阄戏的玩法和藏钩戏相似：这一日，北、南朝臣常服入朝，皇帝临御天祥殿，朝臣依位赐坐；契丹人面向南，汉人面向北，分成两队行阄，或五筹，或七筹；赐膳，食毕，全体起立；接着，又坐下行阄如初；到入夜

时赐茶。如果皇帝得阍，臣下向皇帝进酒，皇帝赐酒众人共饮。当然，这套玩法是礼制的规定，不免生硬枯燥，毫无生气。实际上，席间的藏阍戏充满乐趣，欢声荡漾，笑语连天，韵味无穷。有《辽宫词》为证：

君臣团坐笑藏阍，宴上分明共几筹。

目过金铺茶酒罢，天祥宝殿瑞烟浮。

五、射覆戏

射覆是指猜测覆盖着的東西。从广义上说，古时的猜谜也可称为射覆。覆盖的东西密不透风，无由得知，又没有任何线索，没有特殊的感应一般来说是很难猜中的。但中国的宫廷中却历来有一些高手，屡猜屡中，令人称奇。真不免有几分神秘，不知是出自天意神助，还是真的有透视神力，特异功能？这之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汉武帝宫中的幽默大师东方朔。

东方朔字曼倩，是平原厌次人。武帝初即位时，广征天下贤良之士，东方朔自许具备了贤良之士的各种才能和美德，毛遂自荐，请求录用。东方朔的自荐书文辞不逊，高自称誉。武帝大为奇怪，征入宫中。一段时间冷遇以后，东方朔略施才智，很快引进了武帝的注意，渐渐大得宠信，不离左右。

当时在汉武帝身边，除了东方朔以机智、幽默受宠以外，还有一位巧思、狡黠的郭舍人，两人又同是射覆高手。有一次，在宫中游玩，武帝一时心血来潮，想试试两位享誉宫中一流高手，看是否真的射覆如神。武帝把一只守宫（壁虎）盖在盂下，召几个善卜者一一试射，结果都没有射中。东方朔自请试试，理蓍布卦，然后悠然说道：臣以为龙又无角谓之蛇，又有足跂跂脉脉，善缘壁，是非守宫即蜥蜴。武帝龙颜大悦，当即赐帛十匹。

东方朔射覆成功，踌躇满志。武帝随兴又盖了几样东西，东方朔又一一射中。武帝又惊又喜，大加赏赐，东方朔出尽风头，一直争宠、较量的郭舍人当然不服气，郭舍人妒火中烧，进奏武帝：朔幸中耳，非至数也，臣愿令朔覆射，中之臣榜百，不中臣赐帛。郭舍人这是和东方朔较劲，说东方朔射中不过是瞎猫碰死老鼠罢了，要亲自让东方朔射射，射中了甘愿挨一百棍！武帝面对这样的场景，当然兴趣盎然的，当即允准。郭舍人巧妙地用盂扣住树上的一种寄生物，让东方朔射。东方朔脱口而出：窠藪（蚁窝）也！郭舍人心中惊诧，心悦诚服，但口头上却还不认输：果知朔不能中也。武帝吩咐开旦验看，果真是窠藪。郭舍人只好自食其果。

汉代以后，射覆广为流行，高手辈出。魏时的射覆高手当推管辂。有一次，新兴太守诸葛原取燕卵、蜂巢盖在器上，让管辂射覆。管辂布卦从容说：第一物含气须变，依乎宇堂，雄雌以形，翅翼舒张，此燕卵也；第二物家室倒悬，门户众多，藏精育毒，得秋乃化，此蜂巢也。管辂名声大噪。平原太守刘钺取印囊和山鸡毛藏在器中，让管辂射覆。管辂说：内方外圆，五色成文，含宝守信，出则有章，此印囊也；高岳岩岩，有鸟朱身，羽翼元黄，鸣不失晨，此山鸡毛也。清河令徐季龙依旧不信，取十三物件放在大筐中，盖好后让管辂射覆。管辂说：器中籍籍，有十三种物。随即先说鸡子，后说蚕蛹，一一指出，只将十三物中之一的梳说成篦。在场者无不目瞪口呆。

梁元帝在《洞林序》中说，河东郭璞极善射覆。《白帖》也称，宋大臣蔡铁也是一位善射高手。有一天，刘义宣将一只白鼠放置函中，召蔡铁射覆。看宗卜兆后，蔡铁笑说：知道了。刘说：描述一下。蔡铁说：兑色之鼠，背明户弯，弧射之绝，左股，鼠孕，三雄而两雌，若不见信，剖腹而立知。蔡铁说得如此细致，在场者人人难以置信。刘义宣吩咐剖鼠，结果和所说一致。刘义宣莫名惊诧，赐钱一万。《玉壶清话》还记载说，赵晋公在中书，听说了文杲善射覆，装好一物召丁文杲射。丁文杲立书五言四句：太岁当头坐，诸神列两旁；其中有一物，犹带洞庭香。开函一看，果然是用历日第一幅包裹绿橘一枚。

六、豆叶戏

豆叶戏又叫掉城戏，是明朝第十三代皇帝明神宗朱翊钧在宫中发明的。朱翊钧生于嘉靖四十二年，是穆宗朱载堉的第三个儿子，母亲是李氏。隆庆二年，朱翊钧五岁，立为太子。朱翊钧幼时聪慧，智识惊人。有一天，穆宗驰马宫中，朱翊钧进谏说：陛下天下主，独骑而骋，宁无衔橛忧？穆宗大喜，立即下马慰劳这位聪明的太子。陈皇后病居别宫时，身为太子的朱翊钧每天清晨便陪母亲李氏前去探望。皇后随手取出经书考问学业，朱翊钧总能对答如流，声音洪亮，优美动听。从此，两宫益和。

穆宗在位六年去世，朱翊钧即皇帝位，年方十岁。穆宗在位时，大学士高拱专权用事，排除异己。朱翊钧即位后，大学士张居正结交险被高拱驱逐太监冯保，以皇后、贵妃和皇帝的名义，下旨罢逐高拱，张居正出任首辅，接着便是规模空前的十年改革，结果，国富民强，库存粮可食十年，积金达四百万两，史称万历中兴。朱翊钧在这国家蒸蒸日上时候，也慢慢由一个孩子成长为一个熟谙经史和政务的少年天子。

朱翊钧是在张居正的威势下一天天长大的，对这位严如父兄的首辅又敬又畏。即位之初时，朱翊钧读《论语》，将色勃如也的勃字含成背，张居正便声色俱厉，予以纠正，从此，朱翊钧对这位首辅由衷畏惧。万历十年盛夏六月，张居正这位令多少贵戚贪官惶惶终日的改革家溘然长逝，他的十年功业也就从此终结。神宗朱翊钧亲政，废弃一应改革，将张居正削尽官职，抄没全家，家属戍边，改革时遭到贬逐的贵戚又一一重见天日。

朱翊钧亲政以后，终日沉溺于声色，朝政每况愈下。后宫美人成千上万，朱翊钧少年气盛，终日与美人纵酒淫乐，几乎是每夕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怒时侍从稍有不慎，便命丧黄泉。朱翊钧又贪食鸦片，朝政尽委宦官。宫中所用器物，极尽侈丽，日新月异，仅一次采办珠宝，就用银二千四百万两。朱翊钧就这样纸醉金迷，大肆挥霍着张居正十年改革的艰难积蓄，在这种情况下遂发明了赌钱玩乐的掉城戏。

掉城戏的玩法简捷、明了，以赌钱玩乐，富于刺激。掉城戏玩法十分简单，分大、小两种规模。小规模玩法是用色罗一方，乡出个井字，界作九营，中一营为上营，四方四营为中营，四角四营为下营。玩的时候，宫女用银钱或者小银珠投掷，落在上营赏银九两，落在中营赏银六两，落在下营赏银三两；双抛双赏；落在营外和压着进字，则均罚银六两。

掉城戏大规模的玩法是在御前进行：御前十步开外，界画成一座方城，城内用数个十字分成八个部分，即方城八城，每座城中分别写上银十两至三两不等。玩的时候，太监用银豆叶，即豆叶大的银子，或者八宝，唱着投掷，落在某城就照数赏赐，落在城外或者压着井字，则收其所掷银豆叶或八宝。

明神宗朱翊钧奢华淫逸，极喜欢掉城戏这种不用费神劳力的游戏。这种游戏实际上就是一种赌戏，这种赌戏以赌钱为乐，没有什么博的成分，不存在双方对垒，较智较勇。因这种赌戏是以掉城来决定赏罚的，所以内臣常称这种游戏为掉城戏。又因这种赌戏常以银豆叶为赌具，因而又称为豆叶戏。神宗玩掉城戏八年后，北边边城抚顺、开原等被满人攻陷，宫人惊惧之余认为是掉城戏带来的灾难，从此，宫中视掉城戏为不祥之戏，于是，掉城戏如昙花一现，自此在明宫中消失。但明王朝自神宗万历以后，却并没有因掉城戏的消失而收复失地，反而失去了一座又一座的城池，最终丧失了江山社稷。

七、玩仙图

玩仙图是清高宗乾隆皇帝弘历发明的。乾隆生于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二日，是清世宗雍正皇帝的第四个儿子，母亲是钮祜禄氏。有史书记载说：乾隆并不是雍正的儿子，而是其好友海宁人陈氏的儿子，因两家孩子所生年月日相同，一男一女，于是窃易之，即偷桃换李。弘历长身隆鼻，容貌俊伟，二十五岁时入继大统，为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四年。

乾隆天性敏慧，六岁时就学，过目成诵。他在宫中接受最良好、最完备的教育，修文习武，文武兼通。乾隆贯通经、史、诸子百家之说，对古来神仙人物极为熟悉，于是创制了吉祥如意、玩法简单的玩仙图。玩仙图取材于古代神话和传说的列仙传，将赤松子、容成公、彭祖等各路神仙绘成一幅神仙庆寿图，每位神仙代表一种吉祥。玩的时候，用骰子投掷，每年新年时游玩，取吉祥如意。西太后也极喜欢这种既吉祥又娱乐的游戏，并对游戏的内容有所改进，重新绘图，新年时在宫中游玩。

八、纸牌戏

扑克又叫纸牌。纸牌制作简单，玩法多样，可复杂可简单，自问世以后深受人们的喜爱，尤其是在无所事事的后妃宫人中广为流传。纸牌在中国历史很悠久，源远流长。它最早产生在唐代，唐时称为叶子戏。《世物纪源》说：唐末时有叶子戏，唐贺州刺史李合撰叶子格。史称：唐李合出任贺州刺史，和妓人叶茂莲在江中慢行，因撰骰子选，谓之叶子戏。

叶子戏产生以后，在士林中广为流传，渐渐影响日广，风靡一时，备受士庶一百姓的喜爱。人们在劳作之余和茶余饭后，便都要一试身手，玩玩这种锻炼智能又富于情趣的游戏。这种游戏可以因人、因地、因时、因物的不同而可繁可简的游玩，既可以赌钱增加刺激，又可以以输赢竞争取乐。因此，叶子戏产生以后，这一娱乐形式历千百年来，长盛不衰。

唐末产生了叶子戏，到宋时便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朝野都喜欢这种游戏。宋太祖赵匡胤就极喜欢叶子戏，而且精于此道，赵匡胤于是在深宫中和宫人玩这种游戏，且乐此不疲。赵匡胤还制有叶子戏消夜图，让宫人习此借以消夜。《茶余客话》中即有叶子戏消夜图。宋学者吴处厚在《青箱杂记》中记载说，宋大臣杨大年醉心叶子戏，有一次他和朋友们玩此戏正酣，有客人登门造访，熟悉杨大年脾气的门人竟不敢上前通报，直到他们尽兴为止。

叶子戏不仅在中原汉人地区流行，还传到了北地广大地区。辽宫中的宫人后妃就极喜好叶子戏。《辽史》记载说，辽穆宗好以叶子戏为乐，不仅和后妃宫人玩这种游戏，还和群臣以此游玩。史载穆宗十九年正月朔日，穆宗大宴宫中，不受朝臣拜贺，吃饱喝足以后，和群臣玩叶子戏。辽代宫中的宫女们迷恋此戏，有首宫词对此作了极生动的描述：

脱却鸾鞋换凤鞋，深宫女伴笑相偕。

闲铺叶格花间戏，输去同心七宝钗。

叶子戏在明代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明在叶子戏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种新的游戏：马吊戏。马吊戏和叶子戏有许多相同的地方，玩法大同小异，都是纸做的。马吊戏和叶子戏同时在明宫中流传，深受后妃宫人的喜爱。明代朝野对于叶子戏和马吊戏的喜爱超过了明以前的任何一个朝代，他们在牌场上争胜，一较输赢得失，玩得有滋有味，明代的文人墨客还将这一游戏著书立说，更使这一游戏传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明代的《叶子谱》、《马吊牌经》等叶子戏专著对于这一游戏的传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到了清代，纸牌的游艺斗胜便种类繁多，热闹得无以复加。清时的纸牌游戏包括叶子戏、马吊戏、游湖戏、麻雀戏、混江戏等多种多样，不一而足。清代宫中的许多纸牌流传了下来，保存至今。故宫博物院所藏清宫纸牌极多，制作十分精巧、质地异常精良，包括人物、花鸟、故事、小说人物等种类。

清代的帝后嫔妃和宫女、太监都喜好纸牌，借此消磨时光。清代喜好纸牌这种游戏蔚然成风。清代宫中流行纸牌游戏，超过了明代。不仅宫中如此，朝野文人士大夫也嗜好成性。康熙时，文人士大夫就喜马吊戏成风。雍正时，纸牌戏更是风靡一时。《啸亭杂录》记载说，雍正初年，殿元王云锦元旦时和朋友们玩叶子戏，玩得忘乎所以，后来，丢失了一叶，怎么找也没有。第二天，王云锦上朝，雍正问他：夜间以何为欢？王如实回答，雍正笑着说：不欺暗室，真状元郎。说着，从袖中取出一叶，正是王云锦夜间所失。

麻雀戏是由明代的马吊戏发展而来。麻雀戏起于宁波沿海一带，后风行各省，最终传入京师和宫廷。史称：肃亲王善耆，贝子载振皆以又麻雀为自豪。清末统治中国达四十八年之久的慈禧太后也极好纸牌戏。史称：孝钦后尝召集诸王福晋、格格博打麻雀戏。慈禧晚年时，静坐深宫无事，常以麻雀戏为乐：奕劻遣两女入侍慈禧太后，每日挟金数千和太后博戏。

清宫的《水浒》人物纸牌，每套一百二十张，每张上绘人物图像，上方、下方标有万万贯、千万贯等字样。晚清时，西洋扑克牌传入清宫，宫人们又多了一种新的纸牌花样。

第十章 宫中游乐活动

一、百戏纷呈的游乐场景

中国古代的百戏包罗万象，内容极为庞杂，包括歌舞、杂技、角力、幻术等等。甚至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就有百戏的一些科目产生。中国权威性的古书《庄子》《列子》《国语》《史记》等都曾记载了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侏儒抉卢、优倡侏儒为戏、弄七剑、弄丸等。但这个时期只是百戏的形成时期，而且这时的技艺还是初始的摸索阶段，还没有臻于成熟，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中国百戏的初具规模大约是在秦汉时期，尤其是到了汉代，基本上自成体系。

汉时的百戏称为角抵戏、角抵奇戏，简称角抵。角抵戏来源于战国时期，史称秦武王作角抵。《汉武故事》中说：未央庭设角抵戏者，六国所造也。秦统一中国以后，角抵戏的范围有所扩大，包括角力、角技艺、射御。角抵戏发展到了汉代，内容范围上进一步扩大，实际上相当于后世所称的百戏。汉代经过上百年的休养生息，发展到中期以后，百戏便十分繁盛。民间以百戏戏倡舞象和倡优奇变之乐招待客人，以示隆重，甚至于在丧葬白事时也要有歌舞俳优、连笑伎戏的演出。

汉代的帝王们对于百戏很热衷。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就是一个热心百戏的戏迷。史称元封三年春日，武帝在宫中作角抵戏，三百里内的臣民百姓皆热热闹闹地前来观看。元封六年夏日，武帝又在上林苑平乐馆中举行盛大的角抵戏，京师臣民观赏游览，络绎不绝。汉代的帝王们不仅在宫中作角抵戏让臣民观看以示君民同乐，还将百戏用以招待各部落首领和外国使节。百戏出现在外交场合，可见百戏在汉代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地位很高，备受尊重。

纪传体史书《汉书》记载说：汉武帝时，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作巴俞、都卢、海中矲极、漫衍鱼龙、角抵之戏以观视之。巴俞即指巴俞舞。海中矲极是一种乐曲名。都卢就是缘竿、爬竿戏。漫衍鱼龙是汉时假形戏曲。汉武帝一次巡狩时，曾在巡狩地接见了外国客人，武帝赐赏了珍贵的礼品，又吩咐演出角抵戏，出奇戏诸怪物，令客人惊叹不已。

汉昭帝刘弗陵、汉宣帝刘询和东汉顺帝刘保都喜好百戏，并曾以百戏隆重地招待外国客人。百戏沸沸扬扬地在宫中和京师流行，引起了一些恪守中庸、反对炫耀和侈糜的儒生士子的忧虑。昭帝用百戏招待外国客人时，就曾有一些贤良文学之士对此提出非议：今乃以玩好不用之器，奇虫不畜之兽，角抵诸戏，炫耀之物陈夸之，殆与周公之待远方殊。贤良儒士们追慕周公，以周公的平易待客来说服夸富争胜的汉代皇帝，但这些意见并不为帝王们所重视。

角抵戏就其狭义意义上讲是指角力一类的活动。角力、摔跤这种游戏起码在战国时期即有。古代宫廷宴会和招待客人等活动中都要有角力一类的表演助兴。民间富裕人家的节宴也要请角力士来表演。湖北江陵凤凰山一座秦墓中出土了一件木篋，木篋上部弧形背面上有一幅角抵的彩色漆画，画面极其生动；画上有三个男子，都是上身赤裸，下穿短裤，腰间系带，足穿翘头鞋：右边两人正角抵竞胜，紧张热烈，左边一人平伸双手，密切注视，显然是角抵裁判；画面的上部还垂挂着一条飘带，可见这场赛事是在帷幕内进行。

百戏在中国古代除了指角抵戏以外，还包括履索、缘竿、弄丸、使剑、扛鼎、转石、冲狭、燕濯等。履索就是高绳、绳技。学者张衡在《西京赋》

中说：走索上而相逢。李尤《平乐观赋》称：阮高履索，踊跃旋舞。这就是文人学者关于履索的描述。后汉时，正旦节日，天子要登临德阳殿接受百官的朝贺，受朝后，便有履索的精彩表演：用两根大丝绳系住两柱头，两柱相去数丈，一对倡女对舞，行走于绳上，相逢时切肩而过，没有倾斜、下坠，十分惊险。沂南汉墓出土的石刻绳技图就生动地再现了汉代的履索技艺，图上所展示的比上述《晋书》中的记载更为惊险；绳上行走三人，一个倒立而行，绳下仰植四把寒光四射的刀剑。这可真是如临深渊，如履刀山。

缘竿又称为都卢、都卢寻橦。秦汉时的缘竿活动是从战国时的扶卢技术发展而来。缘竿、扶卢都是在竖立的长橦或竹竿上由体轻善缘者在橦竿上做各种惊险的表演。橦或竿可以竖在地上，也可以放在车上，或顶在一人的额上。额上缘橦、缘竿又称为戴竿。车上表演的缘竿则称为戏车。沂南东汉石刻上的戴竿图清晰地再现了汉代的缘竿活动：图上一个身材魁梧健壮的男子额上顶一个长橦；长橦上又有一根横木，横木左端一个小孩表演跟卦倒绝，横木右端一个小孩表演虬萦龙蟠，长橦顶端又有一个小孩表演旋腹。这幅东汉的戴竿图真可谓惊险绝伦。这种游戏自汉后便进一步发展。傅玄写有《正都赋》，生动的描述了晋时的缘竿活动。宋时的缘竿长度一般在三丈以上。宋仁宗有一次观赏百戏，一位缘竿艺人从竿上坠地，碎首身亡。仁宗恻然心动，诏令此后橦竿长度减去三分之一。于是，宋以后宫中的缘竿都不超过两丈，比民间的缘竿要短。

唐玄宗时，教坊艺人王大娘以长于戴竿著称。王大娘在百尺竿头安设海中三神山的瀛洲、方丈木山，教坊小儿手持绛节，出入山中，歌声不辍。有一次，王大娘在宫中御前表演这一精彩的绝技，恰逢十岁的神童刘晏奉召在此观看。刘晏正坐在杨贵妃的膝上，和玄宗、嫔御们正一同观赏，一时兴奋异常的杨贵妃命刘晏即兴作诗，吟咏王大娘的竿技。刘晏出口成诗：

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

谁得绮罗翻有力，犹自嫌轻更著人。

唐敬宗时，宫中又有一位缘竿高手的女艺人石火胡。石火胡是幽州人，长于戴竿，有养女五人能在竿上做各种惊险的动作，观者无不惊骇。石火胡是在为敬宗祝寿时在御前作精彩的表演，她的五个养女都才八、九岁。百尺竿头，张五条弓弦，五女各居一条弦上，身穿五色彩衣的五女在弦上执朝持戈，随《破阵乐》曲的节律展开舞姿，俯仰起合，左右飘移，翻飞起舞，如同五只彩蝶。这等惊险的舞技之下石火胡依旧稳如泰山，保持着平衡，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石火胡母女在御前表演的另一个惊险节目更是令人心怯目眩：她将十张床子层层重叠，最大的床子边长仅一尺有余，石火胡稳稳地立在床顶，诸女攀缘而上，每人手持五彩小旗，在上手足齐举，应节而动，口唱动人的《浑脱曲》，歌声抑扬清越，神态从容。石火胡惊险绝伦的表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敬宗惊叹之余，厚赏了她们母女。后来，唐文宗即位，认为这项技艺险而伤神，不让继续表演。此后，石火胡母女便没有再在宫中施展这种绝技。

缘竿筋斗也是唐代宫中的一项表演绝技。唐玄宗时，有位筋斗绝伦的教坊小儿，而他的教练正是唐玄宗。玄宗想使这位高徒精彩的表演出人意料，命他在宫中秘密操练，集会演艺时夹杂在内伎之中，突然缘长竿噌噌而上，直到竿头，一个潇洒自如的空中倒立，忽地松开握竿的双手，然后垂手抱竿，在空中连翻筋斗而下。这一险象环生的动作在转瞬间完成，惊得在场的人目

瞪口呆，连艺人们都难以置信。惊诧惊愕之余，人们回过神来，丢下手中的器械，兜圈乱跑，山呼万岁。一同观赏的百官也纷纷上前拜贺。玄宗无限得意，这才派中使宣旨：此伎尤难，近方教成。

弄丸使剑之戏源自战国，发展到汉代以后，又增加了不少花样。通常的玩法是：将数丸或数把短剑飞往空中，以手递抛递接，循环不绝。有的技艺高超的艺人丸、剑并用，抛得如流星追月。丸、剑之戏中最精彩的是飞丸跳剑和飞剑跳丸。安村、沂南汉墓石刻中都有飞剑跳丸的生动描绘。沂南汉墓中的一块画像石上，一个人两手抛接四剑，同时又有五丸在身后跳跃，似乎是用双脚在控制五丸。安村的石雕上艺人是弄三剑八九，也是手脚并用。

转石、扛鼎同样是古代百戏中的一个重要项目。张衡在《西京赋》中称：复转重阁，转石成雷，噤砺激而增响，磅^𠵼象乎天威。这是描写转石戏的音响天威。出土的汉百戏画像石中流存有汉代转石戏的形象：图中一个大力士赤膊身体，跑动着将五个大石滚转动起来，石滚发出隆隆的声音。扛鼎又叫鼎力、举鼎。战国时，秦武王就喜好扛鼎运动，大力士乌获因常同武王一起举鼎，极得武王的看重，并委以高官。秦武王时，有不少大力士因扛鼎而一步登天。秦汉时期，乌获扛鼎成了扛鼎戏的别称，这一描述也见于《西京赋》。

冲狭相当于透剑门和钻刀圈。唐学者李善说，冲狭是卷簾席以矛插其中，使伎儿以身投，从中过。张衡在《西京赋》中描述为：冲狭燕濯，胸突铄锋。燕濯是一种跪式的鱼跃动作，身体轻盈自如的从水面跃过，如同燕浴一般，故称燕濯。唐李善描述燕濯：以盘水置前，伎坐其后，跃身张手跳前，以足偶节逾水，复却坐，如燕之浴也。

北宋东京每年在正月十五这一日，皇宫大内前的御街廊沿下都要举行盛大的百戏活动，所谓奇术异能，麟麟相切。这一日的百戏包括击丸、踏索、上竿、赵野人倒吃冷淘、张九歌吞食铁剑、小健儿喷吐五色水旋浇泥丸子和各式各样的杂耍绝技，如鱼跳刀门，猴呈百戏，追呼蝼蚁，沙书地谜，使唤蜂蝶，真是花样百出，美不胜收。清代宫中的小太监们也学习一些杂耍节目，称为玩艺。清宫中表演玩艺，种类也很多，包括杠子、秧歌、大鼓、跳狮子、童子棍、耍钢叉、说相声、变戏法、高丽筋斗、设法取水等。

百戏中的魔术幻法也时常进入宫廷，出现在御前。但中国很少有皇帝喜欢戏法、魔术这一类的技艺，因为这类技艺太险、太神奇、太可怕，属于历来被鄙薄的奇技淫巧一类，中国的宫廷中因而始终没有过专职的魔术艺人，东汉时，西南禅国进献幻术师，幻术师在元旦皇帝朝见群臣的盛会上曾表演吐火、支解自身和取下自己的人头换上牛头马首。这场表演以后，谨守礼法的儒士大臣们当然不乐意，纷纷文章进谏此事，隆重热烈的一场元会结果却招致政议汹汹。唐代的时候，大量身怀绝技的印度魔术师来华献艺，但被宫中拒之门外，这些人便行走于京师，在民间卖艺。唐高宗为此又发布了一道禁幻戏诏，严厉谴责：如闻在外有婆罗门胡等，每于戏处，乃将剑刺肚，以刀割舌，幻惑百姓，极非道理，宜并发遣还蕃，勿令久住，仍约束边州，若更有此色，并不须遣入朝。魔法幻术自汉以后就没有再进入皇宫。

百戏中影响最大也最受中国宫廷尊重和偏爱的是宫廷乐舞。中国宫廷乐舞分为礼仪性的和娱乐性的两类，音乐因而有雅乐、燕乐之分，和乐相配的舞也是如此。礼仪性的乐舞在朝廷、宫中的重大仪式时使用，主要用于祭祀。娱乐性的乐舞则用于宫廷宴会。燕乐歌舞就是百戏的范围。

汉武帝时，汉宫中的著名燕乐歌舞是鱼龙漫延，该戏熔歌舞、杂技、魔术于一炉，内容浪漫而神奇。鱼龙是由人装扮的一种怪兽，先在殿廷四周游戏，然后跃入殿前的水池中，化作比目鱼，跳跃漱水，作雾障目，在雾中再化成黄龙八丈，跳出水池，游逛戏耍于殿廷，龙体上水珠闪烁，和日光辉映，威风凛凛。这个节目传自西域，宫中奉为奇珍，举凡节庆仪式等重大活动，都要表演。流传到隋时，改名为黄龙变。

鱼龙漫延又称鱼龙曼衍，这实际上是一种假形戏舞。这一类节目除了鱼戏以外，还有龙戏、虎戏、龟戏、豹戏、熊戏、黑戏、象戏、狝狝戏、大雀戏。这些动物，有的由人扮演，有的由马扮演，每一种假形戏都有一套相应的服饰道具。上场表演时，所演动物一边舞蹈，一边前进，喷吐彩焰的火树在前面引路，旁边还有一些小演员怪模怪样、戏乐逗弄动物，还有时有伎人立在动物背上耍弄长槿，玩耍杂戏，旁边还伴以幻术串演。秦汉三国至隋唐时，和鱼龙假形戏齐名的还有在奔驰的马背上表演的骑术；五张案桌上翻筋斗、拿大顶的安息五案和掷倒十二叠案的掷倒叠案伎。

汉宫中燕乐歌舞的名目极多，著名的舞蹈便是巴渝舞、七盘舞、长绸舞、折腰舞等。巴渝舞是四川巴渝地区賸族人的舞蹈，此舞粗犷、矫健，舞步生风。賸人帮助汉高祖刘邦平定关中有功，建汉以后，其舞蹈受到了刘邦的看重，进入了宫廷，直至晋唐时期，巴渝舞在宫中仍旧流行不衰。七盘舞就是盘鼓舞，在地上分两排倒置七盘，并置一鼓，舞者在鼓上腾跃，以此发出节奏鲜明的鼓声，且要在盘上纵蹶，完成一个个高难动作。长绸舞又叫公莫舞、巾舞，舞者双手各执一条长绸，长绸一端竖裹短棍，起舞时长绸翻卷，呼呼生风。折腰舞是腰部为主的舞蹈形式，一般和翘袖舞并用。汉高祖戚夫人就善翘袖折腰舞。

汉宫中还有一些歌舞别具魅力，包括剑戟舞、蹋鞠舞等。剑戟舞是舞蹈和武术相揉合，可以说是舞蹈化的武术。出土的汉代画像砖上有关于剑戟舞的描绘：画面上有两个人各执一柄剑、戟，彼此攻防为戏，这便是剑戟舞。蹋鞠舞是舞蹈和蹋鞠相结合。河南方城东关汉代画像石墓中，有生动的描绘蹋鞠舞图：图中有两人，均头戴汉冠，身穿紧身衣，相向蹋鞠起舞；下有一球物和鼎形器，一人甩袖叉腰，脚尖踢球；一个舒展长袖，箭步上前，紧张激烈的防御情态似乎是惟恐球物落入鼎形器中。

汉代以后，宫廷的乐舞机构专设象人，充当百戏中由人扮演的动物角色。宫廷娱乐活动中头戴假面具的游乐，面具上也要画着象人扮演的动物画面。同时，也有扮演人的时候，男扮女装时也要头戴面具。后世将这种游戏渐渐衍变成将假面用色彩直接画在脸上，后来便发展成戏剧脸谱。

中国百戏的发源地是民间，兴盛和繁荣也在民间，只是偶尔进入宫廷作节庆表演，藉以助兴。中国宫廷中只有一些零星的擅长百戏技艺的演员，因此，相对于占重要地位的宫廷乐舞来说，其中的百戏乐舞只属于杂舞和俗艺，但这些杂舞和俗艺却正是中国古代丰富多采的戏曲的源头。可以说，中国戏曲艺术的繁荣是从古代的俗艺发展而来。百戏中的歌舞后来衍而为以表演故事为主，再由表演故事过渡到杂剧，成为中国戏曲的雏形和前奏；与此同时，杂技和魔术成为另一支单独发展的艺术。

魏晋时期，中国便出现了具有人物、情节和剧情发展的歌舞。其代表性的歌舞便是表演鸿门宴的公莫舞。公莫舞在南朝宫廷中十分流行，北朝则产生了另一出脍炙人口的歌舞戏：踏摇娘。踏摇娘以丰富感人的故事情节表达

了人生不平际遇的无限哀叹，它直接取材的便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苏姓的男子，自号郎中，相貌丑陋，酒糟鼻子，瘦骨嶙峋，面如瘡尸。这位男子表面上老实，愁闷下喜好喝酒，每饮必醉，每醉必痛毆其妻。苏姓男子的妻子温柔美丽、善歌善舞。她不堪丈夫的虐待，经常顿首摇身，唱起哀怨动人的忧伤曲。因此，人们感叹之余，渐渐将这个故事编成剧目，定名为踏摇娘。剧中的丈夫是一位丑角，难看的酒糟鼻，蓬头赤面，活脱脱一副醉鬼模样。剧中的妻子由男子扮演，画上假面，涂脂抹粉，美丽动人，且歌且舞。每唱一段，末尾都有和声，和者齐唱：踏摇和来！踏摇娘苦和来！这种和声便是后来的帮腔和旁白。踏摇娘这个剧目在唐宫中是最为著名的保留节目，三百年间长盛不衰。唐宫中最擅长演踏摇娘的教坊艺人是张四娘。踏摇娘后来改名为谈容娘。唐宫中以诙谐的表演见长的优伶们有一出拿手的节目，便是讽刺戏参军戏。参军戏没有歌舞，只是用语言充分表达。参军戏旨在讽刺贪官，其典故出自汉代。东汉和帝时，馆陶令石耽犯赃，和帝惜其才，免予治罪，但为了让他汲取教训，命他穿上白夹衫，在宴饮时被优伶玩耍、戏弄和羞辱，一年以后才结束这种处置。后赵石勒在位时，参军周延任馆陶令时贪污官绢数百匹，被捕入狱，但因是皇帝石勒的属官而宥罪。后来，周延在内廷便成了伶人嘲弄的靶子。宴饮席前，优伶们头戴介帻，身穿黄绢单衣，周延夹役其中。优伶问：汝为何官，在我辈中？周延按规定回答：我本为馆陶令。然后，指着优人的黄绢衣说：正坐取是，入汝辈中。众人大笑。由贪官直接扮演的这类宫廷讽刺戏，后来便由伶人扮演，参军就成了贪官的代名词，故称参军戏。参军是丑角，嘲弄参军的角色叫苍鹅，是一种凌厉的鸟名。唐宫中擅长参军戏的优伶有黄幡绰、张野狐、李仙鹤、曹叔度、刘泉水等。宋时，参军戏叫加官戏、跳加官。

宋元时期的戏剧活动走向成熟，由于产生于民间，而且包括歌、舞、说、做等多种形式，因而称为杂剧。宋代宫廷中，歌舞音乐渐渐让位于杂剧，杂剧进入了帝王后妃们的生活。南宋教坊十三部中，唯以杂剧为正色。宋代杂剧中的戏头称为末泥，就是男主角；然后是副净、副末、孤。副净的职责是装痴卖傻，作各种滑稽表演。副末是由苍鹅的形象演化而来，帮助副净作滑稽的言词动作。孤是指官员，装孤便是装扮、扮演官员。女主角称为旦。每一场杂剧演员凡四、五人。演出时，引戏人先说一段寻常熟事，把话题引上该戏，称为艳段；接着，开始演出正剧，由两段构成。全剧表演的故事追求一种令人发噱喷饭的效果，尤其是在御前表演，更要以精彩的演技和幽默的对答博得龙颜大悦。

杂剧到了金代深受宫廷帝后美人们的欢迎。金代宫廷中的杂剧之盛宫词有这等描述：传奇杂剧竞排场。末旦装成出教坊。元代时的杂剧活动是中国戏曲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杂剧在元宫的繁荣和兴盛，有一首宫词作了生动的描述：初调音律是关卿，伊尹扶汤杂剧呈；传入禁垣宫里悦，一时咸听唱新声。元代宫中的演艺机构是教坊，教坊艺人达几千人，杂剧的角色行当至此基本齐全，包括末、旦、净、外、杂、丑。元杂剧时人称为传奇戏，大剧作家关汉卿等创作了许许多多前所未有的情节生动曲折的剧目。

明代宫廷戏班是由一色的宦官组成，即宦官机构钟鼓司的成员。学艺太监凡二百余人，剧目多是金元时期流传下来的院本。明代宫中演出剧目，很少是整场演出，在大的节庆仪式上一般只演一部戏的几回几出。明宫中的钟鼓司太监经常在御前奉命执板，有板有眼地打逗清唱。钟鼓司的演艺水平比

不上在宫外竞争中占优势的戏班子，因此，在有些时候，宫外的戏班子会奉召进宫献艺，崇祯年间皇后生日时，沉香班优人就曾入宫演出《西厢记》《玉簪记》。

明代钟鼓司在御前演戏不光起娱乐作用，还可通达民情，开启圣聪。明代宫中规定，秋收时节，钟鼓司要演出打稻戏，以使皇帝知稼穡之艰。皇帝每年秋日时驾幸旋磨台无逸殿，观看打稻戏。打稻戏由宦官扮演，农夫、村妇收割打稻，管田官吏前来征租，纳租时双方发生口角，演得生动，逼真，村庄和稻田的真实场景也奇迹般地再现于深宫。

除了打稻戏以外，帮助皇帝在九重深宫中了知世态百相、博闻广识以顺天恤民，还有一部重要的戏剧：过锦戏。过是指一一登场。锦是指各色人物、事物的典型。明宫的过锦戏约有一百回，每回上场七余人，各有引旗一对，锣鼓送上。戏中扮演的各色人物极多，包括少女、妇人、平常男子、市井工匠、流氓无赖等，用故事情节展示他们的生活和冲突，备极世间骗局百态；同时，又穿插杂耍、百戏；结尾时极尽滑稽，使观者在笑声中收场尽兴。

明神宗在万历初年，为了孝敬西宫太后，特在宫中设立四斋，集中宦官艺人，演习传奇戏。后来，明代皇帝又在玉熙宫开辟演剧场所，专习民间发展起来的戏种。从宋以后，南戏日渐壮大，成就很快超过了包演过元代杂剧的北曲。南曲是由唐宋大曲发展而来的，是结合宋词和南方民间曲调发展而成。用南曲演唱的南戏在明代民间声势浩大。明万历时，南曲有几个著名的分支，包括弋阳腔、海盐腔、昆山腔等。明宫玉熙宫中的三百名宦官演员职在学习上述流派，在宫中演出。

清顺治帝福临在顺治十六年裁革教坊女乐，女乐职责全由宦官担任。到清乾隆时期，宫中女伎已无一人。清代内务府的习艺太监称为内学。乾隆皇帝以风雅自居，仿唐明皇梨园教演弟子的故事，将宫中习艺太监安置在长街南口植物花草茂盛的所在，称为南府，习艺太监人数约有一千五百人，清嘉庆时，将内学和随皇帝出行演艺的外学移至圆明园。道光七年，将在景山习艺的太监并入南府，改名升平署，仍在南府旧址。

任何一个新入署的习艺太监都由总管首领等人审视其材质，看在哪一方面可堪造就，适合演学哪一种角色，便令其拜相应的年长艺人为师，随师父住在一个房内学习。学艺时，每天有早、晚两次课程，酷暑时并为一次。上课时，以场面人打鼓为号，称为点鼓，然后学生各从其师学艺：先念本子，念熟后再教白口唱法、身段，称为上散学。学生分别按各自的角色将一出戏中个人所唱的身段、唱白练熟以后，再聚在一起，相与对白对唱，称为唱对某戏。唱对时，师父点说其间过渡的过场。然后，再按程序，由其师父口念锣鼓，带说过门，指示学生在何种锣鼓点内出场，直到唱、做完毕，称为过某戏、说排。一段时期后，师傅请首领临视学生表演，经认可后方加以锣鼓、带髯口、穿靴子、手执道具，实地排演，但面部不上妆，称为响排。最后阶段便是站某戏，全按演戏规定实地操练，完成各项。总管鉴定通过以后，则书此戏在进呈单上，称为安单，可备承应。

清宫的戏曲承应节目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月令承应，一类是庆典承应。月令承应包括元旦、立春、上元各节承应和花朝、浴佛、赏荷等特殊承应。元旦承应主要是演祥瑞例戏，包括寿山福海、椒柏屠苏、开筵称庆。立春承应则是早春朝贺、对雪题诗一类。上元节戏目是伴随欢筵助兴的，包括嘉夜戏游、灯月交辉、紫姑点福、海不扬波、御花献瑞。特殊承应针对性较强。

花朝日演万卉呈祥、千春燕喜；浴佛节演佛化金神、光开宝座；重九演九华品菊、众美飞霞。庆典承应包括法官雅奏和九九大庆两类。法官雅奏是指内庭各种喜庆承应，如皇帝定婚、大婚、册立后妃、皇子降生等。九九大庆是指帝后的寿节承应，是群仙贺寿之类。

二、帝王骑射功夫

射的历史可谓古老而悠久，它伴随着人类的进化，是人类的文明象征之一。中国有著名的后羿射日的神话传说。羿是中国古代的射箭能手，射法高明，百发百中。传说圣主唐尧时，天上有十个太阳，轮流照射。天下大旱，地上的庄稼都一一枯死了，凶猛的禽兽穷凶极恶，危害人民。唐尧派人请来了羿，羿射落了九个太阳，消灭了危害人民的野兽，万民安居乐业，于是，天下举尧为天子，羿成了尧治下的一个部落首领。

羿是古代的民族英雄，但他的弟子逢蒙却是一个心怀邪恶的奸人，逢蒙是羿的众多弟子中射术最好的一个，他嫉妒羿，以为除掉羿便可以取而代之，成为全国景仰的射箭英雄。逢蒙射术高强以后，日夜想除掉羿。一天，羿打猎归来，逢蒙躲在树林里，一连向羿连射十箭。事出突然，暗箭难防，射艺超人的羿神奇地躲过了九支箭，到第十支箭射近咽喉时，羿一低头咬住了箭簇。这等出神入化的技艺连逢蒙也目瞪口呆，不得不低下了头。这便是盛传古代的逢蒙学射。中国的古代史书《列子》中还记载着著名箭师飞卫教授高徒纪昌学射的故事。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骑射便在一场场征战、厮杀中进入了日常生活，成为古代重要的军事技术。春秋、战国时期的射箭活动蔚然成风，善射高手因而层出不穷。在这个才人辈出的英雄时代，最著名的就是楚国养由基的百步穿杨的射穿七札。《左传》记载说，养由基是楚国的一位小军官。晋楚鄢陵大战时，他一箭射死了晋国大将魏犄，从而阻止了晋军的凌厉攻势，受到楚共王的厚赏。楚军中另有一位神射小将，名叫潘党，不服养由基的射艺，找养由基一比高低。射圃中立起了靶子，两人站在百步之外，各射十箭，都是箭箭中的，不分胜负，靶场边有一株杨树，有人染红一片树叶，让两人射这片红叶。结果，潘党没有射中，而养由基却一箭穿杨。潘党认为这是凑巧，提出比射胸甲。潘党叠五层胸甲，一箭洞穿；养由基叠七层胸甲，也是一箭穿透。

中国自西周以后，学校教育中专设射御以教授皇子和贵族子弟。但皇子和贵族子弟习射主要是用于健身的，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后来有部分贵族子弟担任武车士、武骑士，指挥战争，军中骑射也渐渐发展到民间，成为一项广泛的富国强兵活动。古代学者墨子提倡射御，他说：欲众其国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将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善射御之士，将可得而众也。古代中国很重视射御，当时挑武车士的条件十分苛刻：选车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长七尺五寸以上，走能逐奔马及驰而乘之，前后左右上下周旋，能缚束旌旗，力能馘八石弩，射前后左右皆便习者，名曰武车之士，不可不厚也。

天子习射在中国一直被赋予很高的意义。中国史书《射义》上说：射者，仁之道也，求诸正己，己正而后发。著名的书籍《白虎通》也说：天子所以亲射，何？助阳气达万物也。中国的皇帝一般都有过硬的马上功夫，善于骑射，即便文治和平时代，皇帝们也不敢将武艺坐废。创业的皇帝长于骑射和能从容的驾驭武士这是毋庸置疑，而生活安逸的守成皇帝被中国繁重的礼制所约束，礼制要求射御是皇帝们的必修课，是君临天下的必备修养，被纳入礼仪，被认为是中国皇权中雄威的象征。在春风吹拂的禁苑后宫，闲暇中的帝王在侍从的簇拥下练习骑射也是一种十分有趣的健身活动。

秦始皇豪情盖世，以摧枯拉朽之势剪灭群雄，荡平中国，获得了空前的大统一。秦始皇志满踌躇，造高台四十丈，在台上装饰华丽，射猎飞鸿，称为鸿台。四十丈的高台依旧容不下那颗高傲的心，秦始皇带着浩大的车队，四出巡游。终于，在沙丘的荒漠尘沙中，秦始皇和他的威武车队走到了尽头，江山易手汉室。汉时的鸿台虽然依旧傲视苍天，但不过只是一座曾经显赫过的土丘。

汉高祖刘邦困于白登，三十万精兵覆没，匈奴的铁骑自此令汉室闻风畏惧，强大的汉王朝在无奈之下，只好用皇室的美女和亲，以换取安宁。在这种屈辱下，皇室的热血男儿自然发愤图强，苦练骑射。皇室中长于武艺的刘彻脱颖而出，成为一代文才武略的圣主汉武帝。汉武帝雄才大略，在他的麾下有许多杰出的骑射高手。第一个当推飞骑将军李广。

东汉也是一个开疆拓土的英雄时代。流传至今的东汉铜车马武士俑群依旧重现着当年所向无敌的威风。东汉末年，曹氏父子曹操、曹丕开创曹魏江山，骑射成了他们的看家工夫。曹丕的射艺胜过曹操，不同凡响。他曾同父亲曹操一同出猎，不期当头遇上了一只饥肠辘辘的饿虎，饿虎四蹄生风，迫扑这两位不可一世的天子。曹氏父子纵马飞奔，落荒而逃。曹丕处变不惊，策马奔逃的时候及时张弓搭箭，回身满弓射出，风声嚯嚯，一箭中的，饿虎应声倒地，一场灾难就这样避免了，惊魂稍定的曹操感念儿子的挚勇，命曹丕统领骑兵。曹丕即为后来的魏文帝，他曾得意地自述：少好弓马，逐禽辄十里，驰射常百步；于邺西猎，终日获獐鹿九、雉兔二十。

中国组建大规模骑兵部队的皇帝是赵国的第六代国君赵武灵王。赵武灵王即位时，赵国国力虚弱，处于强国的包围之中，处境十分不妙。赵国不仅遭受大国的威胁，甚至于北方的游牧民族的胡人马队也时常入境骚扰，其精锐的骑兵确实威风凛凛，锐不可挡。最令赵国感到屈辱的，是弹丸之地区中山国，也敢无视赵国的存在，公然耀武扬威，向赵国挑衅。

赵武灵王是刚毅决断、体察民情的皇帝。他直视现实，发现赵国财乏兵弱，而兵弱直接导致邻国的欺凌。赵国的兵力是沿袭西周以来的古老格局，以步兵和战车相结合，兵士身穿长袍铠甲，簇拥于战车左右，而骑兵寥寥可数，但强悍的北方军队却不同，拥有强大的骑兵，来去倏忽，如天兵天将，个个骁勇：他们身穿胡服，动作灵活，行动快捷，尤其是丘陵河谷作战，更是纵横驰骋，神勇无比。

赵武灵王决心富国强兵，建立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他说服一些顽固的权贵，强令改变国俗，国人需胡服骑射。赵武灵王率先身穿胡服，纵马骑射。很快，赵国组建了一支精悍的骑兵队。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改变了赵国虚弱的国力，赵国迅速强大。这项军事改革对中国影响很大，汉唐以至明清的帝王们由此得到启示，都很注重纵马骑射。

北周武帝的姐夫窦毅有个相貌奇特、机智过人的女儿。窦毅认为这个女儿非同一般，将来一定前途无量。窦毅说：此女有奇相，何可妄与人？但色艺具佳的女儿遐迩闻名，求婚者络绎不绝。为了选择乘龙快婿，窦毅在自家门上画了两只孔雀，公开征婚。求婚者须射出两箭，但入选的标准他没有点明，是射中哪里方可？他心里当然清楚，只能射中孔雀的两只眼睛。数十位应征者一一试射，都不中意。最后，来了一位深沉勇武的青年人，他不发一语，搭箭开弓，两箭各中孔雀一目，这位青年入选了，他便是后来的唐高祖李渊，窦氏便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母亲。

唐太宗李世民的勇武善射超过了他的父亲。这位虬须隆鼻、有着北方民族血统的皇帝对于骑射非常沉醉。在唐太宗的生活中，骑马射猎是一件无可比拟的开心乐事。闲暇的时候，他便常常张弓挂矢，用特大号的箭，以后苑小门的门扇为靶，射箭取乐。唐太宗长于骑射，他也希望他的大臣精通此道。文臣萧瑀以文得宠，却素来不会射箭。有一天，太宗忽发奇想，想戏弄一下这位疏于骑射的宋国公。他把萧瑀召入宫中，给他一筒箭，让他试射。君命不可违，萧瑀奉旨从命，勉强完成了射箭动作，但没有一支箭射到了不远处的箭垛。侍从一旁的文臣欧阳询才思奔涌，忍不住写了一首诗，嘲讽萧瑀：

急风吹缓箭，弱手驭强弓。

欲高翻覆下，应西复更东。

十回俱著地，两手并擎空。

借问谁为此？多应是宋公。

唐太宗骑术高超，箭术出众，经常自恃武艺冒险狩猎。中国汉代和唐代都设有专养禽兽的皇家苑圃，苑圃狩猎自然动辄涉险。汉元帝曾在虎圈斗兽时，突然有一只熊逸出，攀槛而上，元帝吓得魂飞魄散，惊恐万状，好在沉着冷静的冯婕妤临危不乱，处变不惊，从容地将元帝挡在身后，众侍卫抢上救驾，一场险事才变为一场虚惊。唐太宗在后苑中射猎，也经历了一场在生死中徘徊的令人后怕的险境。

有一天，唐太宗游猎后苑，追杀一只猛兽。不意从斜刺的丛林里窜出一群惊惶失措的野猪。野猪毛发直竖，双眼血红，拼死地向拦住去路的唐太宗扑来。唐太宗镇定自若，张弓搭箭，四发四中，连续射杀了四只野猪，但毫不畏惧、近于疯狂的一只雄性野猪却依旧如狂风一般地向唐太宗袭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随从狩猎的武士唐俭翻身下马，徒步和疯颠的野猪搏斗，唐太宗也驰奔过来，挥起一剑，结果了这只胆大妄为的野猪。唐俭作为一位侍从御驾的赳赳武夫，经历了这场险境，也惊出了一身冷汗，这场事故以后，唐俭等侍臣对太宗的狩猎忧心忡忡，太宗看出了唐俭的心事，笑着对唐俭说：天策长史，不见上将击贼耶？何惧之甚？唐俭回答说：汉祖以马上得之，不以马上理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岂复逞雄心于一兽！太宗听后觉得有道理，便决定不再狩猎。

唐玄宗李隆基是位仪容俊伟的皇帝。他多才多艺，长于书法，熟谙音律，尤其精通骑射。武则天极喜爱李隆基，但武氏危害唐室，李隆基心怀大志，便阴结才勇之士，厚交万骑豪杰，秘密图谋匡复社稷。经过一番拼杀，李隆基终于登临宝座，为唐玄宗。玄宗退朝后便与兄弟们饮宴博弈，斗鸡走狗，击球骑射。玄宗好动多能，骑马能射杀走兔，虽经常骑射游乐，但没有一次像他的曾祖父那样冒过生命危险。唐肃宗也是一位骑射高手，能三发三中。唐玄宗更是一位了不起的骑手，他能在百步之外一箭穿竹。

宋太祖行武出身，日夜在鞍马上奔波，骑射技艺超群。登基以后，太祖射艺不减，裁政之暇还偶尔在大臣面前一逞雄姿，往往七发连中，其射艺不亚于一个神射手。宋太宗也是一个雅好骑射的皇帝，习射和观射是太宗日常生活的一大喜好，后宫玉津园就是他常去习射的地方。宋代的后苑、琼林苑经常由卫士表演射柳，尤其在景致宜人的琼林苑中，太宗常摆酒设宴，和进士们共饮，酒宴旁由卫士身着劲装，表演射柳技艺，体现所谓文武并举、风雅长存的古意。

宋代后宫中美目盼兮的宫女习射可能是一件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事，但

却是历史的事实，不过，这一“壮举”恐怕创自风流多情的宋徽宗。徽宗政和五年，首辅大臣们有幸目睹了宫女射箭的风采，这些文采风华的大臣便将这一盛景用华美生动的文字记载了下来。徽宗赵佶嬉游无度，终日耽于游乐。政和五年，徽宗心血来潮，在宣政殿举行规模盛大的后宫宴会，在宴会上又出人意料地召集宫女，排列殿下，一展她们精彩绝伦的射技：她们鸣鼓击柝，跃马如飞，以矫健的身姿剪柳枝、射绣球、击丸弄剑，据鞍开神臂弓，令人叹为观止，眼花缭乱，以至于侍立一旁的赳赳卫士也都面现愧色，喟叹弗如。骑射打猎也是宋代宫女们一项重要的内容，她们打猎的迷人风姿更令大臣们目瞪口呆。大臣王珪为此写了一首宫词，生动地赞叹着这群出类拔萃的女中豪杰的飒爽英姿：

数骑红妆晓猎还，销金罗袜镂金钿。

佯佯走马穿花过，拂试雕弓对御弯。

宋代宫女们骑马游猎当然不是真正的奔突射杀，而是游戏性的。她们身穿猎装，手挽雕弓，在从容悠闲中更注重的是骑马游猎的迷人风姿和新鲜感受，而不在于是否收获猎物。宋代宫女们游猎的范围仅限于宫禁，不会超出后苑。宋代宫廷御苑中依山傍水，树木丛生中蓄养着无数的珍禽异兽。宫女们踏着晨雾，在苑囿中飞马拉弓，自有一番惬意和情趣。

北方少数民族的君主无一不是在赫赫武功中建立自己强大的国家，他们弓马娴熟，无一不是以武艺卓越、骑技超群而赢得下属的拥戴。匈奴人刘曜武艺过人，曾以强悍的兵力扫荡西晋，成为前赵的君主。刘曜膂力出众，能将一寸厚的硬铁一箭洞穿，被称为射神。北魏孝文帝聪敏好学，一心向往汉族文化。孝文帝少年时就长于骑射，且膂力不凡，年仅十余岁便能以手指弹碎羊髀骨。胡太后以母后的身分临朝听政，还居然能在群臣面前表演射针孔、象牙簪。

北部辽、金君臣都善骑射。辽兴宗耶律宗是一位骑射高手，有一次在黄花山游猎，射熊达三十六只之多。回宫以后，兴宗临御元和殿，出试题：日射三十六熊赋，考试进士。清代的帝王们来自白山黑水之间，他们的祖先就是以游猎为生。他们入主北京以后，除在紫禁城和后宫苑囿骑马习射，还在热河围猎，兴致不减当年。

三、水上秋千

水嬉指水上活动，是古代越深水渡江河的技能，也就是游泳。游泳源于远古时期的渔猎生活。中国最古的诗歌总集《诗经》即有关于游泳的诗句：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中国古时的思想家庄子说：夫水行不避蛟龙者，渔父之勇也。列子也记载说：孔子观于吕梁，悬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鼃鱼鳖之所不能游也，见一丈夫游之。管子也称：齐民之游水，不避吴越。《晏子春秋》记述白公曾问孔子：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说：吴之善囚者能取之。从这些中国古书的记载上看，游泳在中国不仅地域广泛，而且源远流长。

现藏故宫博物院的一只战国铜壶，壶上有纹饰宴乐渔猎攻战图。图上有入、鱼共游，人的游姿很秀美，相当于自由泳。古代有所谓以足蹶，以手播的说法，说的是游泳的动用，是手、脚划水。史称晋代的周处泳技过人，进入水下三日三夜，最后杀死蛟龙才出。唐著名诗人李益写有一首著名的五言诗：嫁与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如潮有汛，嫁与弄潮儿。《武林旧事》记述说，吴儿善泅者数百，皆披发文身，手持十幅大彩旗，争先鼓勇，溯迎而上。出没于鲸波万仞之中，腾身百变，而旗尾略不沾湿。可见在中国民间，游泳十分普及。

水上活动在中国历代宫廷中主要的形式是游湖。中国几乎每一代皇宫都有苑囿，每一代皇宫苑囿中几乎又都有湖泊，其最常用的湖泊名字便是太液池。中国自汉代到清代，宫中都有太液池，水嬉也一直在宫中流传着。中国的历代帝王后妃们大多喜欢在湖上泛舟，这是他们闲适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帝王们泛舟湖上，划桨一般由侍臣或宦官负责。汉代的皇帝游湖时，为之划桨的小吏称为黄头郎。有的时候，皇帝心血来潮，会亲自操揖划桨，但不过是尝试一下而已，而且舟中自会有辅臣相助。绝大多数情况是，皇帝不敢独自划桨湖上游玩，这比骑马、奔跑都有生命危险。

汉武帝是位雄才大略，好大喜功的皇帝。元狩三年，武帝二十岁，发流放犯人建造昆明池，以习水战。史称建成后的昆明池中，有戈船楼船各数百艘。楼船上建有楼橹，戈船上建有戈矛。四角悉垂幡牝施葆麾盖，照灼涯涘。《西京杂记》说：武帝作昆明池，欲伐昆吾夷，教习水战，因而于上游戏；养鱼，鱼给诸陵庙祭祀，余付长安市卖之；池周回四十余里。

汉太液池位于未央宫西南，建章宫北。池中用石头雕刻成鲸鱼的形状，长约三丈，游于水中，池里精巧别致的造起了三座石山，烟雾缥缈，如同仙境，正是传说中仙人所居的三神山：蓬莱、瀛洲、方

汉昭帝时，建造淋池。昭帝是武帝有幼子，八岁时即帝位。昭帝天资聪颖，但未及建功立业，便在二十一岁溘然长逝。淋池则留下了昭帝聪慧过人的青春身影。淋池水质清盈，池水中生长着一种奇特的荷花。荷花一茎四叶，形如骈盖，日光照射时，叶片低首，宫人称之为低光荷。荷花的果实如同佛珠，可以佩带。花叶入嘴咀之，清香氤氲，沁人心脾，宫女们十分喜爱。

汉昭帝终日在淋池中携美人嬉游。宫女们侍游时，口含花叶，有的折枝硕大的荷叶蔽日，有的则折菱荷为绿衣。昭帝以文梓为舟，木兰为桨，船首雕绘翔鸾飞鸟，在阳光照耀下，五彩缤纷。昭帝和宫人在池中游玩，昼尽继液，通宵达旦，醉生梦死。月夜清风，昭帝兴致盎然，轻悠地摇着兰浆，听宫人们嗓音甜润的欢歌：

离秋素景泛洪波，谁云好手折芰荷？
凉风淅淅揭棹歌，云光开曙月低河，
万岁为乐岂为多？

东汉定都洛阳。洛阳城外散布着众多的供皇帝游乐的苑囿，包括西苑、显阳苑、显明苑、灵昆苑，以西苑最大，游乐设备也最齐全。耽于淫乐的汉灵帝在西苑中起造裸游馆十间，馆前台阶上以绿苔为被，馆的四周引渠水环绕。汉灵帝挑选十四岁以上、十八岁以下的美女在裸游馆作彻夜宴饮。白天，汉灵帝乘着小舟，在绕馆的渠水中漫游，选肤色如玉、美丽无比的宫女侍从左右，并挑其中轻体者为之划桨。时值盛夏，烈日炎炎。灵帝故意将小舟弄翻，宫女赤身裸体，纷纷落水。灵帝在一旁嬉笑，观赏着美人们在水中的肌肤玉色。汉灵帝嬉游无度，还兴致勃勃地写了一首《招商歌》：

凉风起兮日照渠，
青荷昼偃叶夜舒。
惟日不足乐有余，
清丝流管歌玉鳧，
千年万岁嘉难逾。

隋唐时期的水战愈演愈烈，水上训练也如火如荼。三国时江东刘表就有千条斗舰。赤壁之战也是先以水师拉开战幕。晋武帝曾命王浚用水师伐吴。唐代在洞庭湖畔，大规模地训练水师。金在北部黄汉地带，也建造巨舰，用于运输和水战。

北宋初年，为了统一南方，朝廷大力提倡水上练兵。宋代后宫中的水嬉活动也热闹非凡。当时，皇宫御苑的金明池是训练水军的主要场所。宋太宗在淳化三年三月，在金明池中，曾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游泳活动，并特地投掷金瓿于水中，令人泅渡取赏。

宋代水嬉中的主要项目是赛船和水上杂戏。宋真宗咸平三年，真宗赵恒曾到金明池观赏水嬉。当时，施旗猎猎，鼓乐齐鸣。赛船分两队比赛，每队出一艘船，在鼓乐声中角逐，谁先到达系着彩绸的终点，谁就获胜。《东京梦华录》记述了用赛船划桨来训练水军，认为效果极好。宋代宫禁中的武士也严格训练，禁军中就有水军。

三月三日是中国传统的水节。唐宋时对于水节极为重视，所谓“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描绘的正是水节的盛景。水节这一天，男女老少，都要到水边洗濯，象征着洗去一年的尘垢和疾病。水节据说始自晋武帝。唐宋以后，赐宴曲江，三月三日便是君臣曲水流觞的佳会。水节这天，宋宫开金明池、琼林苑、金水河。

宋金明池在顺天门外街北，周围约九里，入池门内南岸一百余步，池西直径达七里。池边北部有一座临水殿。皇上车驾临幸时，看池中争标，都在临水殿赐宴。往西再走数百步，是一座精巧别致的仙桥，桥南北向，长约数百步，桥面三虹飞架，朱漆栏杆，下面一排雁柱，中间隆起，称为骆驼虹。仙桥尽头，有五座大殿，伸入池水正中。桥南是棖星门，门里对立着彩楼。每次争标作乐，总要立妓女于彩楼上。门对街南面有砖石砌成的高台，台上有楼观，名宝津楼。楼前接池门，下瞰仙桥水殿。皇上驾临时，在这里观看骑射和百戏。池岸正北，对应五座大殿，起造大屋，用以贮藏龙船，称为奥屋。皇上临幸金明池，前后二十日，热闹非凡。

宝津楼在金明池内，邻近池门。楼南有宴殿。皇上驾幸时，嫔御的车马

停息在这里。所有闲散人员不得入内。殿西是射殿，殿南一条横街，牙道柳径，是闲适时击球的所在。皇上驾临时，苑门高搭彩棚，张置黄盖。皇上临池观赏，鞭声裂空，龙船竞出，百戏在楼前纷呈。皇帝登宝津楼看竞船和百戏。百戏在楼下献艺，先列鼓手十余人，一人摇双鼓子，近前跪拜。随后执旗的武士跳跃旋舞，然后是登竿、筋斗、踏球、蹴球、踏桥、藏挟、杂旋、弄枪、龕剑、踏索、拗腰、透剑门、飞弹丸、女伎等。

跳水称为水秋千。秋千架在船头，军士们先在秋千上悠荡，借着荡起的高度飞离秋千，跃入水中。技艺高超的表演者还能在跃离秋千的瞬间连翻筋斗，然后入水。水上比赛极能激发水嬉的热情，展示超绝的技艺，事实上，水上竞赛在中国宫苑中也经常进行。宫女们难得观赏到这样精彩的场面，观看时自然心情兴奋，于是有这样一着诗：

内人稀见水秋千，争擘珠帘帐殿前。

第一锦标谁夺得？右军输却小龙船。

宋人《金明池夺标图》生动地描述了当时水秋千比赛的盛况。

明代宫中的水嬉活动主要是在玉熙宫。玉熙宫在西安门北、金鳌玉虬桥西。明宫水嬉还真是水中之戏，而不是游水和泅渡。明宫水嬉戏是用轻木雕成海外诸国和先贤文武男子像，像高约二尺，彩画修饰，栩栩如生，有臂无足，底部平整，下又安卯榫，以竹板承接。这显然是傀儡戏的道具人物。明崇祯时，汗梁失守，亲藩被害，从此罢废水傀儡戏。

清代宫中的水嬉活动也十分可观。每年端午节，宫中就有龙舟竞渡之戏。清宫的龙舟竞渡大多在圆明园福海举行。清高宗乾隆皇帝极爱看龙舟竞渡。乾隆十一年看罢龙舟竞渡后，乾隆感慨万端。写下了《竞渡》诗：

此俗始荆楚，特以纪岁时；

初因吊忠愍，相沿竞水嬉。

既闹旋亦寂，凭观有所思；

我观竞之义，所包未可涯。

四、冰嬉

宫廷的溜冰活动称为冰嬉。冰嬉是古代冰上活动的总称。中国北部寒冷地区，冰天雪地，有许多丰富多彩的冰上活动。关于冰嬉的记载，宋以前极少。宋学者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有关于凌床的记载。

明朝定都北京。明宫中冰嬉活动长盛不衰。明万历太监刘若愚在《明宫史》中记载说：阳德门外，冬至冰冻，可拉拖床，以木作平板，上加交床或藁荐，一人在前引绳，可拉二、三人，行冰上如飞。明世宗嘉靖（壬寅）三年正月十六日，皇太子自宫中往见，即绝河冰坐拖床而过。明宫词中有关于冰嬉的描述：

琉璃新结御河水，一片光明镜面菱。

西苑雪晴来往便，胡床稳坐快云腾。

拖床类似于北方的雪橇，所以又称为胡床。皇帝坐的拖床十分考究，是用两边各一块两端上翘的厚木板，下安铁条，用横木连接，铺设平板，四角立柱支撑顶盖，四周再挂以帷幔，里面放置坐榻。行进时，宦官用绳子在前面拉，用竿子在后面推。

晚明时期，清太祖努尔哈赤举兵反明，在关外即拥有一支善于滑冰并配有冰橇、装备精良的作战部队。天命年间，巴尔虎特部围攻墨根城，形势危急。努尔哈赤部将费古烈所部兵皆着乌喇滑子，在冰上飞行，以炮架爬犁，沿脑温江冰层驰往救援，一日一夜行七百里。当时，城陷垂危，满洲兵从天而降，巴尔虎特还一无所知。等满兵发炮进攻时，巴尔虎特部队以为天兵降临，溃逃而去。

清初注重军队的冰上训练，并将冰嬉的习俗带进中原。每年冬月，清宫要在太液池表演冰嬉，所谓习劳行赏，以简武事而修国俗。西苑太液池，每冬冰合，便有冰嬉活动，借以习武，皇上亲临观看。因此，诗人顾森有诗描述：

太液冻初坚，冰嬉队连连；弯弧兼津武，仰射彩球圆。

冰嬉是满人的习俗。清代皇王们对于冰嬉十分重视，每年还要举行大典，亲临检阅。参加冰嬉的人员是从八旗和前锋统领、护军统领以及训练有素的士兵中挑选。选拔工作始于每年十月。每旗照定数各选善于走冰的二百人，内务府预备冰鞋、行头、弓箭、球架。冬至后第九日，皇帝驾幸瀛台等处，陈设冰嬉和较射天球等伎。分兵丁为二翼，每翼头目十二人，身穿红、黄褂，其余穿齐肩马褂。射球兵丁凡一百六十人，幼童四十人，均服马褂，背插小旗。按八旗分色，以次走冰、较射。陈伎完毕后，恩赐银两。

皇帝每年十二月在西苑三海检阅冰嬉。御前侍卫率八旗兵队在冰上练武献艺。士兵们脚穿冰鞋，冰鞋是用一直铁条嵌于鞋底中央。冰嬉开始时，在皇帝所坐的拖床三里外，树一张大纛，众兵肃然排列。皇帝坐上冰床时，响一声礼炮，大纛处也以一炮相应。道光皇帝观冰嬉时，有这样一句诗：爆竹如雷殷，池冰若砥平。礼炮以后，众人向御前飞驰而来，按先后到达，分为头等、二等，分等赏赐，称为抢等。

抢等冰嬉以后，接着是抢球。兵士分成左右队，左队衣红，右队衣黄，御前侍卫将一只皮球猛踢过去，众兵争抢，得球者为胜。抢球之后，便是转龙射球。参加这一活动的军士脚穿细密的铁齿鞋，以防打滑，蜿蜒曲折的龙队由上百个小组连成，每组一人执小旗前导，二人执弓矢随后，因此，龙队

中执旗者有一、二百人。旗分别为八旗颜色。龙队盘旋曲折，飞行在冰上。靠近御座的地方，设一个旌门，上面悬挂一球，称天球；下面置一球，称为地球。转龙之队，疾趋而来，每个小旗后面两位队员分别拉弓，一射天球，一射地球，射中者得赏。然后，他们转回去，由原路疾驰而归。每一小组都如此进行，最后出现的便是龙尾。龙尾由一名幼童执旗。转龙射球之嬉到此告成。

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幅乾隆时期内廷供奉所画的《冰嬉图》，冰嬉者都是一身戎装，做各种项目的精彩表演。图中成单行沿一米宽的冰道做滑行表演的队员，前后距离相等；他们千姿百态，各展雄风，包括凤凰展翅、果老骑驴、燕子戏水、金鸡独立等；悬挂天球的地方，设有旗门三座，高高悬挂着彩穗的天球，队员们在滑行中张弓射球；图中还有身背彩旗的队员，握幡前行。

冰嬉活动中还有冰上蹴鞠，简称冰球。冰球活动时，每队由数十人组成，选出统领，分位站立，用革做球，抛于空中，待球快落地时，群起扑球争逐，以得球者为胜；或是此队人得球时，彼队人飞起一脚，踢得老远，两队欢腾追逐，以便捷勇敢的为能。京师中的将士们往往以冰球活动习武。

高坡滑冰是又一项冰上活动，称打滑挞。清宫中冬月玩打滑挞，先汲水浇池，做成冰山，高约三、四丈、莹滑无比。勇健的冰滑手脚带着毛猪皮履，从冰山上向下飞驰，猪皮履使滑行速度更佳，从顶上一路挺立而下，以到地后不扑倒者为胜。

冰上表演各种杂戏也是热闹的冰嬉活动之一，而且使冰上活动更加撩人眼目，丰富多彩。冰上的杂戏活动包罗万象，主要的舞狮、舞龙、弹弓、旱船等常见项目。表演人一身劲装，脚蹬冰鞋，在滑行中演出各种精彩的技艺，无不令人叫绝。清宫帝、后每年常去圆明园福海看太平灯，就是冰上的舞龙、舞狮活动，称为舞龙灯。

冰床流行于明代宫中，到清时，宫中依旧流行。清代文人墨客有咏酒冰床的诗文。文昭在《京师竹枝词》中称：城下长河冻已坚，冰床仍着缆绳牵；浑如倒拽飞鸢去，稳便江南鸭嘴船。清高宗乾隆皇帝就有一座特制的冰床，供他在太液池上冬日时乘坐滑行，观赏银装素裹、苍茫浩渺的雪景。清乾隆皇帝冬季时常在西苑大液池举行冰嬉活动，分队争球，以决胜负。乾隆二十五年，乾隆坐冰床前往琼华岛上的悦心殿，观看冰嬉。乾隆为此写有《坐冰床至悦心殿》诗：

筠冲赐宴有余闲，琼岛韶光暖镜间；
尚可翠鸾轻舵试，徐过玉虹一桥弯。
冻酥岸觉看波漾，春到物知听雁还；
今日悦心真恰当，窗凭积素慰开颜。

清宫御林军中的健锐营专有一种溜冰部队，编制为一千六百人。清仁宗嘉庆时期，这一溜冰部队隶属于精捷营，编制缩减为五百人。冰嬉活动在清代京师和民间也广泛盛行，包括冰球、冰床、跑冰等各种活动。《燕台口号一百首》有这样一首诗：

河头冻合坐冰床，偷得舟行陆地方；
更有抛球人夺彩，一双飞鸟欲生芒。

五、中国帝王与足球

蹴鞠又叫蹋鞠，可称得上是中国古代的足球。如果论发源之古老和流传之长久并历数千年长盛不衰，恐怕没有哪一项活动能比得上蹴鞠。西汉学者刘向记述说：蹴鞠者，传言黄帝所作，或曰起战国之时。黄帝是传说中中原各族的祖先，姬姓，号轩辕氏、有熊氏，是少典的儿子，距今约五千余年。黄帝时期没有文字，黄帝蹴鞠也就靠历代口耳相传，沿袭下来。黄帝当年游牧的地区在今陕西、山西一带。近年在这一地区考古发掘出了很多磨制光滑的石球，这恐怕就是当时创造的简单的踢石球球具，供游戏和训练武士时使用。

中国最早记载足球活动的古书是《战国策》。书中有这样的记述：苏秦以不屈不挠的毅力和出众的才华做上了赵相，他分析了当时的局势，主张联齐抗秦。苏秦对齐宣王说：齐是一个广大的国度，有土地二千余里，军队数十万，仅临淄一城，就有七万户之众；国家富裕，人民殷实，人皆喜吹竽弹琴、斗鸡走狗、六博航鞠为乐；象齐这样富庶的国家，怎么能俯首贴耳，听命于秦？这说明齐地广泛存在六博、蹴鞠活动。

《西京杂记》记载说，汉高祖刘邦的父亲刘太公，原是楚国沛县丰邑的一个庶民。刘邦做了皇帝以后，把刘太公和刘媪夫妇接到京师长安，住进了宽敞、舒适、富丽堂皇的未央宫。刘太公夫妇在宫中吃山珍海味，穿绫罗绸缎，住豪华的宫室，看燕乐歌舞，享不尽的荣华富贵。然而，出身微贱的刘太公却享受不了这些，终日闷闷不乐。刘邦得讯以后，十分奇怪，派亲信前去寻问缘由？原来，刘太公发迹前生活在下层，每天和贩夫走卒、屠户牛信为伍，日常玩的就是斗鸡、走狗、博戏、蹴鞠。到了未央宫，就像关进了笼子，没有了过去的老朋友，又不能斗鸡、蹴鞠，如何能快活？于是，刘邦下一道旨，在长安城东百里的地方，照原来沛县丰邑的规模，造起了一座新城，把原来丰邑的居民全部迁到这里，刘太公夫妇也住了进去。从此，太公又与故人斗鸡、蹴鞠，开心游乐。

蹴鞠在汉代已经广泛流传，尤其是皇亲贵戚、达官仕宦非常喜爱。学者桓宽说，西汉社会承平日久，贵人之家，蹴鞠斗鸡为乐，一般庶民也是康庄驰逐，穷巷蹋鞠。蹴鞠活动最盛的当然要数宫中。汉武帝经常在宫中举行斗鸡、蹴鞠比赛，称为鸡鞠之会。汉武帝的男宠董贤家中，还专门养有长于踢球的鞠客。蹴鞠在汉代普遍受到人们的重视，在于它舒筋动骨，能增强体力和耐力，军队中也将这一活动视为上乘的训练项目。

汉学者刘歆在《七略》中说：蹋鞠，其法律多微意，皆因嬉戏以讲练上，今军士羽林无事，使得蹋鞠。玄学大师何晏也说：蹴鞠将以行令，岂唯娱情。汉代学者还写有一部《蹴鞠二十五篇》。这是中国最早的一部体育专著，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体育著作。汉代时期，兵部包容甚广，兵类书籍主要有四个方面：战略战术权谋类；军事训练技巧类；阴阳成败阴阳类；军事指挥形势类。《蹴鞠二十五篇》被列入《汉书·艺文志》中兵书技巧类。唐学者司马贞说：《蹴鞠二十五篇》有《域说篇》。域说指的就是球门规格。

东汉学者李尤写有《鞠城铭》。鞠城就是球场。汉代的足球场很有讲究：球门是一座小型建筑，像个小房子；正面有看台，有台阶；球场四周围有矮墙。鞠城铭是刻在鞠城墙上的铭文，全文共十二句，意思是：圆球方场，仿自阴阳，天圆地方；球场两边各有六门；一队十二人上场；比赛竞胜时，裁

判长和副裁判要执行规章，不怀私心，不论亲疏；完全公平合理，谁也无怨；球赛尚且如此，执政更应这样。《鞠城铭》文字不多，仅十二句，但涉及了蹴鞠竞赛的各个方面，包括场地、球具、领队、裁判、规则、队员等。

《汉书·外戚传》中谈到了吕后残害刘邦的宠妃戚夫人时，曾提到鞠域。学者颜师古注解：如蹴鞠之域，谓窟室也。《汉书》又记载说：汉武帝游观三辅离宫馆时，临山泽，弋猎、射驭、狗马、蹴鞠、刻楼，每有所感，即命枚皋作赋，以为游乐助兴。汉武帝、汉成帝是汉代皇帝中较迷恋蹴鞠活动的两个。《古今图书集成》记载说：汉武帝平定西域，得胡人中善于蹴鞠的人，尽衔其便捷跳跃，武帝好而为之。《西京杂记》称：汉成帝好蹴鞠；群臣忧心忡忡，认为蹴鞠有劳圣体，纷纷进谏，称非至尊所宜，劝成帝改行别的娱乐。魏武帝曹操也好蹴鞠，随侍他左右的孔桂就是一位蹴鞠高手。

唐代学者颜师古说：鞠是用皮做成的，中间塞以毛发，成为圆球，用脚踏踢为戏。唐代以后，鞠的结构发生了变化，鞠囊内不再充以实物，而是用动物的尿泡为里，吹满气，鼓涨后再封住。这种球球体轻巧，富于弹性。从总体上看，唐代的足球有两大改进：一是把球囊内充塞毛发改为放进一个动物尿泡，嘘气吹成气球；一是把由两片皮合成的球壳，改为用八片尖皮缝成的圆形球壳。

唐时由于球体有重大的改进，蹴鞠上进而发生了一系列变化。球体轻盈活泼，可以踢高，因此，球门就设在两根三丈高的竹竿上，称为络网为门以度球。踢球方面，汉是直接由两队对抗，所谓僻脱承便，盖象兵戎；唐代则是分队比赛，中间隔一个球门，双方各在一侧，以射门数多者为胜。唐代宫中流行的蹴鞠游戏有白打、官场等术语，两人对踢称为白打，三人角踢称为官场。王建宫词即有：寒食内人常白打，库中先散与金钱。

唐代由于球体变轻了，弹性极好的球不用过分激烈的竞争奔跑，于是，女子喜好足球的越来越多，以至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女子足球。唐代女子蹴鞠不用球门，而是以踢高、踢出各种花样为能事。两人对踢的白打就是其中的一种。唐代诗人王维曾在《寒食城东即事》诗中描述过蹴鞠：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诗人中有诗史之称的杜甫也在《清明》诗中称：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

唐代女子不仅喜好足球，而且踢球技术十分高超。唐学者康骞曾对唐代女子蹴鞠作过精彩生动的描述：京兆府一位小吏名叫王超，有一天，王超路过长安城胜业坊北街，目睹了女子踢球的一幕：当时，正是春雨初霁，有一位三鬟的女子，年约十七、八岁，衣衫褴褛，穿一双木屐，站在道侧槐树下；刚好军中少年在鞠场蹴鞠，一球飞来，少女飞起一脚，踢高数丈；少女惊人的表演，令人喷舌，观者渐众。

蹴鞠最为鼎盛的时期是宋代。宋代宫廷中经常举行蹴鞠比赛：围地为球场，分两队竞胜负。汉代的球场称鞠域，设立球门，以踢入球门决定胜负。唐时采用球场两端设立球门。宋时由于蹴鞠趋于激烈，而且直接对抗，于是，改为在球场中央竖立球门，两队分别称左、右军，在球门两侧进行间接性对抗。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说：立在球场中央的球门，高约三丈许，扎彩结络，留门，尺许；参加竞赛的左、右军各十余人，其中一人为球头，二人为次球头，球员中包括跷头、正挟、头挟、左竿网、右竿网各一人，散立六至十人。双方各穿统一的服饰，以好辨认；比赛时，球头均头戴长脚幞头，余则戴卷脚幞头；左军身穿红锦袄，右军身穿青锦袄。南宋时，球员各为十

二至十六人。元时，左、右军分别着红、绿色锦袄。

宋代宫廷中设有专门的蹴鞠球队。每队队员经常竞技，比出优劣，按技术高低分为球头、次球头和一般队员；球门则称为风流眼，悬在三丈多高的去处。宋代的蹴鞠和现代足球所不同的是，那时的赛场上没有两队争球的激烈场面，而是左、右队轮流上场，队员把球传给次球头，次球头再把球传给球头，由球头飞脚射门，射门不中的则下场，换上另一队上场。几番轮赛，最后计算得分。

宋代蹴鞠除了设球门的以外，还有不设球门的活动，包括分班、不分班两种。不分班有一人场至十人场的十种踢法。一入场比赛时，参加的人逐一轮流表演，称为井轮。表演时，除用足踢以外，头、肩、臀、胸、腹、膝等都可以使用。使球高起落下的，称为飞弄；使球在身上缠绕起伏的，称为滚弄。飞弄的球越高越难承接，有的高及半塔。滚弄的球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甚至绕身滚荡不坠。一人场比赛以表演花样的多少来决定胜负。二人场是二人对踢，称为打二。其它类推。

宋代皇帝对于蹴鞠的爱好是宋代蹴鞠繁荣昌盛的一个重要原因。宋代皇帝中，宋太祖赵匡胤开蹴鞠风气之先。元代钱选作《宋太祖蹴鞠图》，生动地描述了宋太祖赵匡胤和大臣赵灵、赵普等人踢球的情景。北宋有两位宰相以长于蹴鞠驰名：一个是以踢尽天下球自诩的宰相李邦彦；一个是因球艺高超而青云直上的宰相高俅。

高俅在作家施耐庵《水浒传》中是一个踢球发迹而官至太尉的蹴鞠高手。施耐庵虽然在人物事迹和故事情节上作了艺术加工，但蹴鞠的规模和风靡程度基本上是宋代的事实。北宋时，确实有一位圆社高俅，也确实是因为陪侍宋徽宗，因踢一脚好球而倍受赏识，进而被超拔提升为殿前都指挥使。高俅因一脚球技而发迹仕途，可见宋时朝野对于蹴鞠极其喜好。上之所欲，下必甚焉，只有皇帝和官僚们过分痴爱，才会造就出一代蹴鞠高手，争奇斗胜。

宋代宫廷宴会时，一般都有蹴鞠表演，以助酒兴。宋代礼仪规定，朝廷较大的喜庆节宴，在喝到第六杯酒后，足球高手便要上场表演球艺，有的时候则是边进行酒宴，边观看蹴鞠比赛。王公大臣们也都是陪皇帝在殿前观赏表演。比赛这样进行：左、右军双方队员入场时，乐队奏乐，先由球门左边的一队发球先踢，队员们互相传递，适时再传与球头，球头以大砍即拉开腿用力将球踢射入门；球入球门便得一筹；球未入门则由对方队员如法上场传递进攻。如此反复，几番较量，以得筹多寡决定胜负。优胜者得锦彩、银碗等奖北宋都城汴京和南宋都城临安蹴鞠高手如云，仅参加皇宫宴会表演的高手，见于记载的著名人物就有苏述、孟宣、张俊、李正。市井中的蹴鞠高手包括张明、蔡润、小孙、范老儿、黄如意等。宋代由于蹴鞠的被看重和繁荣，因而有一些专以球技为生的踢球艺人。学者刘侗在《中山诗话》中记述了一个高俅式的蹴鞠高手柳三复。柳三复是个穷秀才，却踢得一脚好球；他文墨不大通，人道、官道因而也不畅达，每次铨选，总没有他；他知道宰相丁渭喜好踢球，便走这一门径，但又苦于没有钱财贿赂丁渭的手下，没有他们，又如何见得了丁渭？于是，三复天天守候丁渭家的球场墙外；这一天，丁渭踢的球飞出了墙外，三复捡到了，喜滋滋地抱了球，送呈丁渭，门卫见这样，只好让他进去；三复见到丁渭后，把手中的球抛向空中，一面跪拜，一面用肩、背、头顶球，而球一直未曾落在地上；丁渭看了这一表演，喜出望外，

不禁大笑，当即赏了他一个小官。

宋代宫廷中踢球的花样极多，所谓脚头十万踢，解数百千般，就是指花样动作共有几百种。《水浒全传》中写高俅陪徽宗赵佶踢球，使了一个鸳鸯拐。这鸳鸯拐便是一个花样动作，是用左右外脚踝踢球。高俅给徽宗表演球技时，使尽了浑身的解数，令徽宗眼花缭乱：球似膘胶一样，任意在身上来回滚动，听从使唤，并使出头、肩、背、胸、臀、腿、脚等不同的套数，以至使球终日不坠。

宋代制球的技术又高于唐代，球壳由唐时的八片尖皮发展为由十二片香皮砌成，用材是熟硝黄革、实料轻裁；球体密砌缝成，不露线角。宋代的球正重十二两，弹性极好，也十分美观。宋代手工作坊能做出四十多个不同品种的足球，每个品种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南宋时出现了大量的蹴鞠组织，包括齐云社、圆社之类。古代史书《事林广记》中有一首《满庭芳》词，描述了宋代蹴鞠盛事：

若论风流，无过圆社。拐掀蹬躡齐全，门庭富贵，曾到御帘前。灌口二郎为首，赵皇风流上下传，人都道齐云一社，三锦独争先。

花前并月，全身绣带，偷侧双肩。更高而不远，一搭打秋千。球落处，圆光欣，拐双佩剑，侧躡相连，高人处翻身结伴，天下总呼圆。

明代政治稳定以后，经济日益发展，物质产品极大的丰富，明代的各种球戏活动广泛流传，在盛行规模上因而不亚于宋代。明代学者黄一正辑《事物纪原》，始将历来统称为蹴鞠、蹋鞠的足球分为二类：踢球、蹴球、打球。打球又包括击球、捶丸两类。这是明代最为流行的球戏活动。

明代的踢球十分风行，其踢球规则和宋、元时不设球门的蹴鞠游戏基本相同。元代以前，中国还没有关于男女对踢足球的文字记载，到了元时，词曲大家关汉卿等人在散曲中记述了男女对踢足球的情景。元代男女蹴鞠，不是出于游戏和刺激，而是为了谋生，尤其是元时的女子蹴鞠，是作为一种技艺供人欣赏。元代蹴鞠表演是在宴会上进行，以增酒兴。诗人萨都刺在《妓女蹴鞠》散曲中说：毕罢了歌舞花前宴，习学成齐云天下圆。占场儿陪伴了英豪的美女，都是秦楼巷里的绝色蝉娟。若道是成就了洞房惜玉怜香愿，六片儿香皮做烟眷。很显然，六片儿香皮是指足球。由此可见，元代女子蹴鞠不过是妓女娱客助兴的一种手段，但可见出几乎市井炊烟之处便有足球活动，尽管这个时期的足球健身娱性的功能缩小了，渐渐走向陪伴着放荡和淫乐。

元末拥兵三吴、手握重兵的吴王张士诚，其弟张士信就沉迷于三种游乐：樗蒲、蹴鞠、美女酒宴。创建大明江山的明太祖朱元璋，鉴于元末以来，蹴鞠和淫乐分不开，下令严禁军人蹴鞠。此时，蹴鞠作为一种军事训练的重要项目已经不复有昔日的风采，蹴鞠活动随着太祖的圣旨下达，在军中日益绝迹。但民间却不在禁令之中，明代皇宫和民间都还流行着这一活动。

明代踢球活动中，下场比赛竞技的人数一般为一至十人：一人场杂踢称为厮弄、滚弄；二人场对踢称为白打；三人场轮踢称为小官场；四人场同踢称为下火；五人场同踢称为小出尖；六人场同踢称大出尖；七人场同踢称落花流水；八人场同踢称凉伞儿；九人场同踢称踢花心；十人场同踢称全场。较为普遍的玩法是一至三人场。

明代的踢球不设球门，也不分队竞赛进行激烈的较量，而是以个人的技艺计筹得分，决出高下。明踢球由于讲求个人球艺，因而花样繁多，内容套

数十分宠杂，主要可以分为两种：单个解数和成套解数。单个解数包括上截解数、中截解数、下截解数、坐地解数。成套解数凡十一套。每种解数中又包括十至三十多种踢法，包括脚面、脚头、脚侧、头顶、额间、鬓角、项下、肩背、胸背、腰腹、大腿、膝界等各个部位踢拐、环绕、承击、滚弄，可谓极尽奇巧活泼之能事。史称明代踢鞠高手，能踢活解数，一身俱是蹴鞠，旋转纵横，无施不可。

明代女子踢鞠也十分风行。明初洪武年间著名的女艺人彭秀云就长于踢鞠。史称彭秀云挟是技游江海，问之，谓有解一十六。文人詹同文很惊叹彭秀云的技艺，赠她一篇《滚弄行》，称赞她是女流清芬。明代的女子好蹴鞠成风，文人们又极爱观赏女子蹴鞠和踢鞠，文人的诗文歌赋中自然就有大量女子蹴鞠的描述。文人袁华在《蹋鞠篇》中称：

冶家女儿髻偏梳，教坊出入不受呼，蹙金小袜飞双凫；飞双凫，拽双袂，玉围腰，珠络臂。

词作家和剧作家李渔的描绘更为生动，栩栩如生。他在《美人千态词》中称：

蹴鞠当场二月天，香风吹下两婵娟。
汗沾粉面花含露，尘拂蛾眉柳带烟。
翠袖低垂笼玉笋，红裙拽起露金莲。
几回踢罢娇无语，恨杀长安美少年。

明时的文人不仅爱看女子蹴鞠，而且也都好此活动。明《三才图绘》中蹴鞠活动的图上就有宽袖长袍的人物，这当然是风流文士。明崇祯时的进士南生鲁史称好和两位少年玩蹴鞠戏，并画进了他的生活写真图中：《南生鲁六真图歌并引》。明嘉靖、隆庆年间，宛平显灵宫道士郭从敬就时以踢球自娱，久而久之，球技惯熟，成一时绝技。史称他自弄一球，能使球沿身前后上下终日飞动不堕；或者兼应数球，能随诸敌人缓急轻重，应接不谬。

明代宫中的踢鞠活动十分繁盛，皇帝、皇子、皇后、嫔妃和宫人们都喜好踢鞠。《明宣宗行乐图》长卷，生动地描述了明宣宗朱瞻基观赏侍臣踢鞠的情景。明代的嫔妃、宫女也参与踢鞠，其中有名的便是崇祯皇帝的田贵妃。学者王誉昌在《崇祯宫词》描述了嫔妃宫人们踢鞠的情景，而且还有自己的组织齐云社：

锦罽平铺界紫庭，裙衫风度压娉婷。
天边自结齐云社，一簇彩云飞便停。

明代著名的艳情小说《金瓶梅》有一段生动地描述了丽春院前西门庆观看妓女李桂姐踢球：西门庆正喝在热闹处，见三个圆社向前来打个半跪，西门庆平昔认的，一个唤白秃子，一个唤小张闲，一个是罗回子。因说道：你们且外边侍候，待俺们吃过酒，踢三跑。西门庆吃了一回酒，出来外面院子里，先踢了一跑，次教桂姐上来，与两个圆社踢。一个捎头，一个对障，拗踢拐打之间，无不假喝采奉承，就有些不到之处，都快取过去了，反来西门庆面前讨赏钱，说：桂姐行头，比旧时越发踢熟了，撇来的丢拐，教小人凑手脚不迭；再过一、二年，这院中似李桂姐这行头，就数一数二，强如两条巷董官女儿数十倍。

明代的蹴球是一种设立球门的分队表演的游戏。明学者黄一正记载说：蹴球植竹高数丈，结网于上为门以度球，球工分左右朋角胜负。学者汪云程在《蹴鞠图谱》中记述得更加生动详细：蹴球参赛的球门人数包括都部署校

正、社司、知宾、正挟、副挟、解蹬、球头、挟色、主会、守网、节级、骁色、会干、都催、左军、右军、出尖、斜飞等。还按球技高下，分为正蹴子弟、蹴过子弟、未蹴子弟。

明代还有郑重其事的球门社规：初起，球头用脚踢起与骁色，骁色挟住至球头右手，顿在球头膝上，用膝筑起，一筑过。不过，撞在网上撻下来，守网人踢住与骁色，骁色复挟住，仍前去顿在球头膝上，筑过。左右军同。或赛二筹，或赛三筹，拈阄分前后，筑过数多者胜，众以花红利物酒果鼓乐赏贺焉。这是明代单球门蹴球比赛规程。

清代球戏活动急剧衰退。宫廷中，帝王、后妃们很少喜欢蹴鞠活动，这类活动渐渐在宫中绝迹。清圣祖康熙三十二年，袁启旭纂刻《燕九雅集》，书中记述了当年正月十九日白云观庙会时的球戏活动，两位诗人有关于球戏的诗句描述。王位坤咏燕九诗称：笙歌队里击球社，珠箔丛中走马场。陆又嘉诗：偏是醉归人似蚁，太平鼓闹蹴球场。

六、马球天子

击球是一项需要高超的马上功夫的马上活动，又称为马球。马球在中国的宫廷中十分流行。王珪的《宫词》就曾生动地描述了北宋宫女击球的活动：
内苑宫人学打球，青丝飞控紫花骝。

朝朝结束防宣唤，一样真珠络辔头。

马球古称击鞠，是古人在马上或驴上的一种游乐活动。骑在马上打球，既要马匹训练有素，又要有娴熟的马上功夫，人和马巧妙的配合，才会打出精彩的马球。马球在中国历史很悠久。东汉末年，魏的开国皇帝文帝曹丕曾写有一篇《名都赋》，赋中有关于打马球的描写：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宝剑值千金，被服光且鲜。驰骋未能半，双兔过我前。揽弓捷鸣镝，长驱上南山。左挽因右发，一纵两禽连。连翩击鞠壤，巧捷唯万端。

南北朝时期，中国正式兴起了马球运动，到了唐代便繁盛起来。马球是木制的东西，中间掏空，外面饰以朱漆。用来击球的球杖也是木制的，杖头一般是呈月牙状。唐代风流女诗人鱼玄机描述马球：坚圆净滑一星流。文学家韩愈也称：霹雳应手神珠驰。马球是骑在马上，同球杖击球。球杖长约数尺。月牙状的杖头有人形容：初月飞来画杖头。比赛马球时，人们不用约定，就能密切配合，训练有素的马匹也是不用鞭打，疾驰如飞。真所谓：人不约，心自一；马不鞭，蹄自疾。

宫廷中设有专门的训马机构，称为天厩院、马廄院。所有使用的马匹都经过专门训练，都经过认真挑选，而后才用于比赛和表演。古时的中国马球比赛一般分为两种；单球门比赛和双球门比赛。参加比赛的人数没有限制。球场一般设在宽阔的地带，场地周围树二十四面红旗。比赛中得一分称为得一筹。裁判员称为唱筹。得一筹者增一面红旗，失一筹者拨去一面红旗。比赛结束时，双方以旗帜的多少决定胜负。这就是诗文所描述的：筑场千步平如削；击鼓腾腾树赤旗。

中国的马球球场一般集中在宫廷、京师和军队驻地。著名的皇室马球场包括唐代的球场亭、宋代的大明殿、元代的常武殿和明代的东苑。这都是皇室和皇亲贵族游玩击球的所在。马球作为强军练兵的一项军事训练项目，随着军队遍布中国各地。南宋著名诗人陆游戎马一生，曾在陕甘等地驻守。他在《冬夜闻雁有感》诗中，记述了驻地的击球活动：

从军昔戍南山边，传烽直照东骆谷。

军中罢战壮士闲，细草平郊恣驰逐。

洮州骏马金络头，梁州球场日打球。

唐代是中国马球极为繁荣的时代。唐代的宫中十分流行马球。唐玄宗李隆基是一位马球爱好者，而且沉溺其中，十分着迷。玄宗对于马匹的挑选和训练近于苛刻，但适合其意的良马实在难于找到，玄宗为此费尽心机，但仍一无所获。一个时期中，玄宗辗转于内厩，对厩中的膘肥体壮的骏马认真测试，但却始终没能挑出一匹合意者。后来，玄宗和伶官黄幡绰谈到此事时，玄宗忧愁地说：吾欲良马久之，而无人通于马经者。黄幡绰应声答道：臣能知之。玄宗闻言不禁大惊，喜出望外。黄幡绰说：今三丞相悉善马经。玄宗甚觉奇怪，想不到自己日夜寻找的相马师，竟就在身边，但玄宗将信将疑：吾与三丞相语政事外，悉究其旁学，不闻其能通马经。黄幡绰从容地回答：臣卜于沙堤上，日日见丞相乘良马。玄宗至此才悟出这是聪明伶官的幽默。

玄宗精选良马，醉心马球，这当然是他入主大位以后的事。但事实上，玄宗在即位之前，他的精湛绝伦的马球技艺就已经享誉内外。公元八世纪初，吐蕃使者到长安迎亲，中宗请他们到梨园亭子里观看马球。使者赞咄进奏中宗：随同的部下中，有会打马球的，可否让他们在御前表演，和这里的球队赛一场？中宗以泱泱大国的天子之尊，当然允准这一请求，吩咐让宫中的马球队和吐蕃的马球队比赛。客队吐蕃队险些取胜。

当时，陪中宗一起观看比赛的有时为临淄王即后为玄宗的李隆基。宫中马球队和吐蕃队交手后，宫廷队失败。中宗心里很不是滋味，堂堂天朝的马球队怎能在朝拜的客队面前败北？中宗知道临淄王擅长马球，就叫他约几个人和吐蕃队交战。李隆基于是找好友王邕、武秀、杨慎交四人，和吐蕃队十人入场比赛。李隆基纵马冲突，驰奔如电，挟无穷的勇力和变幻不定的速度所向无敌。吐蕃队员们惊叹不已，无人能及，吐蕃队终于失利。唐队四人战胜吐蕃队十人，获得了令人叹服的胜利，中宗万分高兴，下令赐临淄王绢数百匹。学士沈佺期、武平等为此献诗祝贺。沈佺期《幸梨园亭观打球应制》诗云：

今春芳苑游，接武上琼楼。
宛转萦香骑，飘飘拂昼球。
俯身迎未落，回辔逐傍流。
只为看花鸟，时时误失筹。

唐中宗也是一位马球爱好者，马球在中宗时期，风行朝野，在宫中也是蔚然成风。史称上好击球，由是风俗相尚，驸马武崇训、杨慎交洒油以筑球场。

击球是在马背上颠簸奔突，因而比起在实地上蹴鞠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唐玄宗即位以后，常在殿阁楼台上观看宫中球队的比赛，品尝那紧张较量中竞胜的滋味。球艺高超的队员往往自恃艺高，胆量很大，玩耍各种新奇的动作，献艺御前。然而，从马上坠落、摔成重伤的情形时有发生，也有的不幸毙命。有一天，玄宗和诸王在三殿麟德殿前打球时，荣王忽然坠下马来，闭过气去，几个时辰后方才苏醒，玄宗为骨肉的受伤所动，心中惶惶不安。

这时的玄宗已经不是争强好胜的年龄，而是正迈入老年。年迈和体弱并行，不宜于从事激烈竞争的活动。伶人黄幡绰乘机进言说：大家（皇上）如今年纪不为小，圣体又重，不宜自劳。何不看女婿等与诸人为之？如臣坐对食盘、口眼俱饱，此为乐耳。玄宗点点头，觉得言之有理，因而能从善如流。玄宗回答说：尔言大有理，不复自为也。玄宗此后是否还玩过击球或观赏过击球？没见到史书记载，不得而知。

玄宗以后一百年，宣宗李忱在位。李忱是唐宪宗李纯的第十三个儿子，于元和五年六月二十二日生于长安大明宫，母亲是郑氏。李忱小的时候，宫中都认为他不聪明。等稍长大了一些，他又装傻学痴。皇子们在一块玩耍，他从来就是沉默寡言。穆宗是宪宗的第三个儿子。穆宗的长子李湛后为敬宗；二子李昂继为文宗；五子李炎再继为武宗。文宗李昂好与李忱玩乐，常想尽法子，让李忱说话，诱言取乐。武宗李炎生性豪迈，不拘礼法。宦官为了控制朝政，在会昌六年三月，趁武宗病危，拥其皇太叔李忱代理国政。李忱怕见百官，忧容满面，但裁理政务却有条不紊，至此人们才发现他是装痴。

武宗死后，李忱即皇帝位。李忱厌恶太尉李德裕专权弄事，对左右说：每顾我，使我毛发洒淅。旋罢李德裕相职，委以翰林学士白敏中。李忱在位

时，大兴佛教，并乐闻规谏，礼待群臣，明察沉断，从谏如流，人称小太宗。小太宗李忱生性俭约、仁孝。他不居别宫，朝夕奉养郑太后；和兄弟们相处和睦，数临诸王宅第，和他们置酒尽欢，击球作乐。李忱的击球球艺不在玄宗之下，但可惜他们无法较量。李忱为人朴实，他的马除衔勒以外，不加任何雕饰，但马却是上乘好马，非常矫健。宣宗李忱经常活跃在击球场上，手持鞠杖，乘马奔跃，运球于空中连击至于数百而马驰奔不止，迅若闪电奔雷。连左右神策军的击球老手，也无一不佩服皇帝高超的球艺。

唐僖宗李儂是宣宗李忱的孙子、懿宗李漼的第五个儿子。懿宗去世时，李儂在灵前即位，为唐僖宗，时年十二岁。李儂做晋王时，小马坊使田令孜有宠。即位以后，使田令孜知枢密，拔为中尉，呼阿父，尽委政事。李儂自此专意于游戏。他好骑射、剑矛、法算、音律，精通赌博，喜蹴鞠、斗鸡，长于击球。他曾得意地说，朕若应击球应士举，须为状元。有一次，李儂命陈敬瑄等四人击球，以三川为赌。陈等四人纵马驰逐，在球场上驰骋奔突，最后，陈敬瑄得第一筹，当即被任命为西川节度使。当时，右神策军中的两名击球高手周宝、高骈，都是击球高手，僖宗赏识他们的球艺，破格擢升为将军。

南唐中主李璟也是一位击球好手，而且沉溺其中，不能自拔，竟至前线战事紧张，正有几万兵马惨败，作为皇帝的李璟却依旧在宫中击球取乐，歌舞升平。南唐于是历近四十年到后主李煜时便烟消云散。

宋代的皇帝们也喜好击球。宋神宗赵顼曾和两位亲王击球赌物。当时，他们在宫中打球，神宗问他们：欲赌何物？不料徐王回答：臣不别赌物，若赢时，只告罢了新法。此言一出，局面十分尴尬。神宗是执意要改革下去的，罢废新法岂非要了他的老命？这场球无法进行下去。

南宋孝宗赵昚是一位富于责任心的皇帝。当时，赵宋只剩半壁江山，大片领土拱手让人，这无疑赵氏血脉的耻辱。孝宗继承大统的同时，也就肩负了复兴社稷的重任。孝宗喜欢击球，而且风雨不辍，因为，他视击球为自己习武战备的一种积极的方式。孝宗躬御鞍马发生在公元1163年。当时，他从高宗手上接过残破河山，和武力鼎盛的金国对峙。他志在收复失地，统一中国。他视安逸的宫廷生活为消磨意志的毒酒，大力击球倡武。

那时，孝宗经常召一些体格健壮的武士到殿前广场击球。遇到风雨时，支起油布帐幕，地铺沙上，击球不止。孝宗的这一举动显然超出了强兵习武的界限，似乎更在于游乐。朝臣们以皇帝承宗庙之重，不应荒政，戒逸戒乐，议论纷纷，但孝宗不当一回事，置之不理，对堆积如山的奏章视而不见。丞相周必大忧心忡忡地对孝宗进谏，不要再参与这种活动，击球十分危险。孝宗不以为然。

有一次，孝宗打马球打得太久了，马经不住奔波劳累，以至突然间离开球场，窜向殿旁的走廊。廊檐低垂，檐上的彩绘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十分夺目。但骑在马上的孝宗一旦被马拖进走廊，势必碰上廊檐，造成坠马受伤的危险。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孝宗情急生智，从容地举起双手，敏捷地抓住了廊下横梁，使身体悬空，从而脱离了危险。事后，众人惊恐不已；孝宗泰然自若，指着马跑的方向，吩咐随从快去追回坐马。

和孝宗处于同一个时代与南宋对峙的金国君主金世宗完颜雍也是一位击球好手，而且终日以击球习武为乐。大定八年，金世宗在常武殿击球游玩。大臣马贵中谏阻，说：陛下为天下主，守宗庙社稷之重，围猎击球，皆危事

也；前日皇太子坠马，可以为戒；臣愿一切罢之。金世宗听了这番话，对他说：祖宗以武定天下，岂以承平遽忘之耶？皇统尝罢此事，当时之人皆以为非，朕所亲见，故示天下以习武尔。常武殿就成为金代皇帝击球的处所。

辽国的南京（北京）、中京（辽宁宁城）、西京（山西大同）都设有击球场，供皇帝和皇亲国戚们游乐时使用。金扩修原辽所建场地，在上京设相当规模的马球场。元在宋、辽、金旧场之外，又在宫中常武殿和军队驻地新建了新的马球场所。

马球击球的木棍称为球杖、鞠杖，杖长数尺，其端为偃月。金代的球杖是由工部供应。史称金贞佑三年七月，工部令开封市白牯取皮，备御用取鞠杖。就是说取白公牛的皮制作球杖，可能是在木质球杖外裹上一层白公牛皮。击球活动在辽、金、元时期十分活跃，广为流传。太平兴国时期，宋太宗曾令有司制订仪式，明文规定每年三月会鞠大明殿。比赛时，左右分朋主持，以承旨二人守门，卫士二人持小红旗唱筹，御龙官手持哥舒棒守卫球场，负责治安，教坊乐师则在场外演奏。皇帝观赏时，王公大臣和近侍陪同，如果皇帝参赛，情形更为热闹。皇帝击球时，鼓乐齐鸣，助威呐喊。皇帝打进了球，掌声雷动，山呼万岁。大臣进球则唱声好，得筹人下马后称谢。辽、金、元皇帝举行拜天典礼时，都有击球表演赛，赛时，球门、四周遍插彩旗，球门旗下置鼓数面，场外也有乐队，比赛时鼓奏乐助兴。

这一时期的击球活动也有一套游戏的规则，大体上讲：击球分成两队竞赛；每队人数不固定，各十几人到五十几人；每队设队长一人，统率全队；每队各穿一种服装，式样、颜色一致，以便区别；球抛至场中央即开始比赛；单球门赛以击球入网囊为胜，双球门赛以击球入对方球门为胜；比赛时，有守门员、记分员、裁判员、队员。

击球活动进入明代继续风行，在宫中长盛不衰。明成祖朱棣曾多次到东苑阅视击球。史称永乐十一年重五日，分击球官为两朋，驸马都尉广平侯袁容领左朋，宁阳侯陈懋领右朋，自皇太孙以下，诸王大臣以次击射，中者赐彩帛复布有差。明代皇帝阅视击球活动时，还诏令文武群臣、四夷朝使和在京耆老前往陪观。明代的击球活动一般在重五、重九举行。

文人们陪伴皇帝看球，当然是一种恩宠和荣幸，文人的诗文中就常有观赏击球活动的记载和描述。王绂是元末明初的一位有名的文人，未入仕时，和吴人韩奕为友，隐居九龙山，自号九龙山人。王绂博学多才，工于书法，常以古人自期，动辄酒酣握笔，长廊素壁淋漓沾洒，是一代真正豪士。洪武时期，这位妙绝一世的九龙山人以罪坐累遣戍朔州。永乐时，荐举入仕，以善书供事文渊阁，旋受成祖看重，委为中书舍人。王绂一次陪成祖朱棣到东苑观赏击球，即兴作《端午赐观骑射击球侍宴》赋，赋称：

忽闻有诏命分朋，球先到手人夸能。

马蹄四合云雾集，骊珠落地蛟龙争。明成祖以后，皇帝定时观看击球成为定制，到宣宗宣德年间时依旧奉行。《明宣宗行乐图》长卷中生动地描绘了宣宗朱瞻基观赏击球的场面。历仕仁宗、宣宗两朝的大臣王直，曾写有《端午日观打球应制》诗，描述了当日击球的情景：

玉勒千金马，雕文七宝球。

鞞飞惊电掣，伏奋觉星流。

欸过成三捷，欢传第一筹。

庆云随逸足，缭绕殿东头。

明代宫廷，宦官喜好马球，马球在京师、民间也十分流行。学者吴宽在《匏翁家藏集》中描述了庙会时庶民玩乐击球的情形：

京师胜日称燕九，少年尽向城西走。

白云观前作大会，射箭击球人马蹂。

到了清代，由于皇帝禁绝人民练马、养马，马技和马球戏便渐渐绝迹。

七、摔跤与相扑

角力就是摔跤活动。中国古代的摔跤活动名称很多，包括角力、摔胡、相扑、角抵、布库、厄鲁特、攒跤、相搏等。摔跤在生存环境较为恶劣的古代，是训练和军事作战的一种技能，实际上就是徒手相搏。人类在最初时还不知道充分利用工具来改善生存条件，但环境是那样恶劣，只能靠自身的臂力和体能来艰难生存。人类在与凶禽猛兽的争斗和向大自然索取衣食的耕作劳动中，渐渐练就了一身壮健的体魄，休闲活动中对相搏和耕作活动的模仿、追忆以及有意识的训练，便产生了中国源远流长的角力活动。

追溯起来，角力在中国起码有五千多年的历史。《述异记》记载说，相传在五千多年前的氏族历史时期，黄帝部落和蚩尤部落在涿鹿一带展开了大规模的激战。蚩尤部落的战士每人头上戴了各式假角，以角抵人，人莫能御。当然，最后的结果是黄帝击杀了蚩尤，黄帝以过人的勇力和超凡的胆略以及令四野望风归服的威名由部落首领进而被拥戴为部落联盟首领。

三代以后，随着征战的不断加剧，摔跤成了中国古代军事训练的一个重要项目。《礼记》上记载说：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角力。可见角力和古代君主王侯看重的骑射、驾驭成为当时必备的并重的训练项目。训练角力的方式很多，古时的训练较为原始，一是训练弹跳，一是训练旅力。训练弹跳是在横杆跳跃而过或先退几步助跑然后一跃而过。训练臂力则是用一根木竿，利用双臂支撑，做撑竿跳跃。训练弹跳和臂力在古时无非是以利于捕捉野兽。后来，训练转入专门化，角力讲求方法和规则，角力活动由军事需要渐渐衍而为健身娱乐活动。

角力通常的情况是两个人对抗。角力时，事先选一根牢固的木棍，放在两个人中间。然后，两人平坐在地上，双手握棍，两腿用力蹬直。角力开始以后，各自用力向后拉，谁的屁股离开地面，谁就算输。春秋战国以后，角力广为流传，而且丰富多彩，君主王侯甚至以高官厚禄吸引各国的角力大力士。

《帝王世纪》记载说，秦武王好多力之人，齐孟贲之徒立归焉。秦武王以好贤礼士之心和待遇优厚的重礼笼络天下力士，并许以高官厚禄。太史令司马迁称，秦武王手下，大力士如云，著名的即有任鄙、乌获、孟说等。相搏是角力中的一种，是集摔跤、擒拿、拳搏于一炉的一种搏斗。相搏在这一时期十分盛行。《谷梁传》记述说，鲁僖公元年，鲁公子季友帅师在丽地大败宫师，活捉了莒拿。公子季友对莒拿说：吾二人不相悦，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意思是说：我们二人不大对付，浴血奋战的士卒有什么罪？屏退左右侍从，让我们相搏以决高下！《左传》也曾记载说，僖公二十八年，晋侯和楚子相搏，楚子伏已，而盬其脑。

大约三千多年前，青铜兵器处于初级阶段，各类武器都不十分锐利，战争中兵器折断损毁是常有的事，而徒手相搏在这种情况下就显得十分重要了。春秋时期，吴楚的柏举之战是一场十分有名又十分残酷的战役。这场战役中，楚国的军队被击败。楚国大夫莫傲大心骁勇无比，然而兵器不济。他在兵器折断，无法再战的险恶情势下，勇敢地只身闯入敌阵，徒手打死、摔伤了好几个人，最后终因寡不敌众，血洒沙场。

大约在春秋末年，中国就有了角力的比赛活动，有了比赛，自然就有了一套相应的比赛方法和比赛规则。见于史料的最早有角力比赛的国家是晋

国。晋国的中军元帅是后来三家分晋的赵襄子的父亲赵简子。赵简子的戎右少室周是一位善于徒搏摔跤的高手。古时作战，战车上必备三位甲士：中间是驾车的驭手，左边是远距离射敌的弓箭手，右边是近距离搏杀的戈矛手。元帅战车上则只有旗鼓，听元帅号令指挥全军进退。元帅车上设有弓箭手，戎右是元帅的近身护卫，自然要求武艺高强，膂力过人。

少室周任赵简子的戎右，责任重大，当然不敢掉以轻心。他虽然武艺高强，勇力超人，但还是在闲隙时寻师访友，切磋武艺，提高制敌、擒敌的摔跤技术。晋阳城盛传有一位武艺高强的人，名叫牛谈，出身奴隶，长于摔跤，而且几无敌手。少室周得悉以后，来到晋阳，找到牛谈，提出和他进行摔跤比赛。少室周自负很高，但一看这位敌手知道不是一般人物。第一局少室周被牛谈摔了个嘴朝天。第二局，少室周又被牛谈摔了个背着地。一连几场，都是少室周败北。少室周是一位虚怀若谷的君子，比试之后，很敬佩牛谈，便鼎力向赵简子推荐，愿意将自己的戎右高职让给牛谈。赵简子拥有了这两位不可一世的武士，自然满心欢喜，把两人都留在身边。

秦始皇扫荡列国，统一天下。秦律令规定，皇上检阅大军时，一项重要的内容便是角抵。古时狩猎和战斗要出动战车，要骑射击刺和徒手拼搏，检阅时狩猎便是一场全面体现实力的实战演习。战国时期，南方盛行水军，北方多用马队，中原地区则是多兵种的集团作战。秦统一以后为什么不检阅军事盛况却要检阅角抵？这一点《文献通考》说得十分清楚：秦并天下，分为三十六郡。郡县兵器聚之咸阳，销为钟镮，讲武之礼，罢为角抵。原来，兵器都收缴销毁了，但又不能从此罢武，于是，代之以角抵。当然，真正的原因是秦帝国统一中国以后，军事方面是以步兵为主，步兵的首要技能要求便是徒手搏斗，角抵自然就要成为检阅大军时的重要内容。

角力到了汉代，由于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日益丰富，角力便开始分支，形成了各种不同形式的摔跤的活动。史称汉武帝刘彻在徒手对打的基础上并四夷之乐，杂以童幼，有若鬼神。这是开创了音乐伴奏的角抵形式，是一种有节奏、有情节的武打角抵戏。角抵在汉代的兴盛发展，产生了一些有关角抵的专著。汉代《手搏六篇》著于《汉书·艺文志》的兵家技巧类中。手搏又叫做牟、卞，是一种纯粹踢打擒拿的军事技术活动。汉武帝时，甘延寿以精通武艺被选入羽林军中，后来，又以长于手搏而被提升为期门，渐渐以军功成为汉代有名的大将。

汉武帝在中国历史上是位文才武略的皇帝。尚武的汉武帝身边自然是一些武艺超群的近侍随从。汉武帝的寝宫中有一位侍卫名叫金日碑。有一天，武帝还沉浸在温馨美妙的梦乡中，近臣江充、莽何罗却秘密谋反。莽何罗携带武器，闯入寝宫，准备刺杀熟睡的武帝。守候在一旁的近侍金日碑发现了，金日碑猝胡投莽何罗于殿下，当即擒拿。猝胡是什么？就是抓住脖子，摔倒在地上，这是一个地道的摔跤动作，金日碑干得十分出色。金日碑原是敌手匈奴族休屠王的一位勇武的太子，汉军大溃匈奴，俘获了金日碑，收入宫中，充当马夫。金日碑为人忠厚，干事勤勤恳恳，被汉武帝发现，提拔为负责皇帝身家性命安全的贴身侍卫。轻捷巧妙的擒拿了刺客莽何罗后，金日碑以功升为车骑将军。后来，金日碑成了汉室的支柱，和大臣霍光共同成为汉武帝的托孤之臣。

金日碑的猝胡动作显然是驰骋北疆的北方民族的摔跤绝技。三国时大学者孟康在《汉书注》中说：猝胡，若今相辟卧轮之类也。到了南北朝时，猝

胡又称为相扑，是一种摔跤为主的搏击技术，严格的说，它和手搏、角抵戏又略有不同。陕西洋西客省庄发掘的一座战国墓中，有两块透雕铜牌的殉葬品。铜牌透雕的花纹图像中，有两匹矫健的战马，战马间是一对长发、高鼻、上身赤裸、下身长裤的人，正互相弯着腰、搂抱在一起，作激烈的较力摔跤。这是中国北方匈奴民族的摔跤的图像。由此可见，大约在汉朝时期，由于强大的汉民族对北方民族的征服，北方民族的摔跤活动传入了中原，进入了禁备森严的宫中。

湖北省江陵县凤凰山一座秦墓中，出土了一件木篋殉葬品。木篋的篋背呈圆拱形，背两面各有漆绘的人物。其中一幅人物画便是一幅生动别致的摔跤图：右边是两个人徒手对搏，左边一个人正凝神观看；三人装束一样，都是上身一丝不挂，下身穿三角短裤，腰间系一长带，带在腰后打一个结，带端飘垂在臀后。徒手对搏的两人正铆足了劲相向扑来，扭在一起。左边观看的一人两臂前伸，全神贯注，应是裁判。图的上部有一帷幕飘带从空中垂下，显然这是在台上较武。比较一下可以看出，透雕铜牌摔跤图、漆绘摔跤图和吉林集安县洞沟高句丽墓壁画摔跤图在场地、服饰、动作等各方面都有不同，可见秦汉时期的角力活动已有多种形式，但都是以力量来较胜负。

晋代以后，中国进入了各民族大融合时期。北部、西部各少数民族纷纷挟着武力进入中原，各民族文化又一次大汇合。这个时期的角力活动通常称为相扑、相掇。相扑依旧是习武和饮宴表演中的重要内容，也是一项易于流行的场景热烈的竞技活动。学者葛洪在《抱朴子》中说，贵胄子弟计渔猎相掇之胜负。可见相扑活动在晋时已经广为流传。但值得注意的是，南北朝时期是个极度自由的时期，这个时期按儒家正统的观点来看，已是礼坏乐崩，儒籍焚荡无余。士子们在学业的无所适从和政治的自由宽松中，纵酒谈玄，以空灵相高。相比之下，相扑之类的活动便只能被视为下技。史称颖川、襄城二郡班宣相会，累欲作乐。襄城人首责功曹刘子笃说：卿郡人不如颖川人善于相扑。刘子笃应声回答：相扑是下技，不足以判别两国优劣，请使两国竟论经国大典、人物得失。

相扑虽然被人们视之为下技活动，遭到漠视和轻蔑，但这类活动毕竟是一种竞技，其比赛往往能代表一个地区和氏族的荣誉和尊严，因此，在统一的时期，则常常对此十分看重。礼坏乐崩的南北朝之前的晋代，就发生过一场因相扑竞技而导致的人命公案：当时，有位西域健胡，矫健勇武，相扑无敌，晋国人无人能和他比试。晋统兵大将军司马炎大为恼火，这不是欺我晋国无人？司马炎于是张贴榜文，厚赏召募勇士。大臣厦闾的父亲庾东揭榜应募。庾东和胡人进行相扑比赛，结果，怀着强烈复仇心理和身怀高强武艺的庾东一举将胡人战败，并一气扑杀。庾东虽然为晋人争得了荣誉，使晋人扬眉吐气，并因此而名震殊俗，赏赐了高官，但终究心胸有些狭窄，竞技切磋，又何至于要置人于死地？

南北朝时期，中国的一些北方地区，流行一种游戏：蚩尤戏，就是民众们三三两两的，头戴牛角相抵。这是仿照五千年前黄帝和蚩尤在涿鹿大战时蚩尤部落将士们以头角冲撞作战的一种游戏，这种游戏在民间和上层社会中，广为盛行。北方民族尚武相高，尤好角力。北齐文宣帝高洋对角力十分着迷，史称他常到贵戚家角力批拉，不限富贵贫贱。北齐后主则卑鄙得多，他令胡人何猥萨在相扑的时候暗害自己的政敌。

隋唐时期的角抵戏归入百戏杂技之中，但壮士裸袒相搏而角逐胜负的角

力、相扑，却仍是独立的行当，称为角抵，和角抵戏略有不同。隋初时，角抵依旧广为盛行。史称近代以来，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之戏，递相夸竞。这里所说的正月十五日的角抵之戏是指归于杂技百戏中的角抵戏，当然，十五日这个最隆重灯会的上元佳节，角力也是一项必备的节目。

《续高僧传》中，记载了一则这样的故事，十分有趣：隋时有一位和尚，名叫法通，相扑技术十分了得。当时，西番进贡一位番人给隋朝，这位番人名叫大壮，真的十分壮硕，在北门和隋朝力士比试相扑，无人能敌。隋高祖杨坚万分恼火，对待从恨恨地说：堂堂大隋国，难道没有健儿？！有人便向高祖推荐和尚法通。高祖马上派人请法通入宫，当即召见，并命他和大壮相扑。结果，法通赢了大壮，举朝欢庆。法通为大隋赢得了荣誉，隋高祖刮目相看，心中也是十分欣喜。

进入唐代以后，角抵正式列入了宫廷观赏和娱乐项目，而且几乎是每宴必有角抵。角抵在唐代倍受重视，差不多在宫廷娱乐和游戏活动中成为公认的压轴戏。唐宪宗时，角抵和击球是宪宗最为欢迎的两项节目。《旧唐书》记载说，唐穆宗曾经三日一幸左右军，御袁晖、九仙等门，观看角抵、杂戏。由于皇帝对于角抵的偏爱和欢喜，角抵便在唐代宫廷中风行起来。唐敬宗时，角抵进一步盛行，竞赛尤其激烈，史称有碎首折臂者，至一更二更方罢。

唐代的皇帝们大多喜欢体育活动，尤其是马球、狩猎和摔跤。唐代的摔跤称为角抵，所谓角抵者，相扑之异名也，又谓之争交。唐代的宫廷中皇帝爱到两个地方去寻欢作乐，一是教坊，一是内苑。教坊司是宫廷音乐、歌舞伎娱乐的地方。内苑则是供嬉戏和游乐。《新唐书》说：内园恒备角抵之徒。角抵之徒自然是专门供皇帝观赏的摔跤高手。唐代皇帝在内殿中观赏角抵，可谓不绝于书：玄宗每赐宴大酺，大陈山车、旱船、寻橦、走索、飞剑、角抵；唐宪宗李纯临御麟德殿，大宴群臣和公主，观击鞠、角剑之戏，大合乐，极欢而罢；唐穆宗李恒幸左神策军，观角抵及杂戏；唐敬宗李湛，在宝历二年六月甲子，观驴鞠、角抵于三殿；唐文宗李昂临幸勤政楼，观角抵、蹴鞠；唐懿宗李漼咸通中选隶小儿园，寻八相扑朋；唐僖宗李儇，弱冠登位，为宦官所押，内园恒备角抵之徒，以备卒召。唐以后的后唐庄宗李存勖，在藩邸时每宴必与王郁角抵斗胜，王郁频频败北，庄宗自矜其能，对孝贤说：与尔一搏，如胜，赏尔一郡。这就玩真格的了，存贤和庄宗当即角抵，存贤获胜，庄宗赏他蔚州刺史。南唐中主李昪，后主李煜，不仅是著名诗词大家，而且也是角抵游乐的积极喜爱者和参与者。

唐代的宫廷中有一支专门的摔跤队，称为相扑朋。《角力记》记载说，唐朝末年，有一个摔跤能手，外号称蒙万赢，历经唐懿宗、僖宗、昭宗三朝，累累供奉，专事摔跤达数十年之久。他拳手轻捷，擅场多胜，受赐丰厚，万赢之名便由此产生，并不胫而走。蒙万赢不仅擅长摔跤，亲自参与这种活动，而且还乐于教人，传授摔跤技艺，史称五陵少年，幽燕任侠，相从诣教者达数百之众。极富历史价值的中国古代典籍总汇《文献通考》还记载了一则宫中娱乐活动中压轴戏角抵的精彩场景：摔跤手上场之前，左右军擂动大鼓。暴风骤雨般的急鼓声中，一个个赤裸上身的赳赳武夫绕场而入，寻对扭摔。两人一交上手，场外的观众便齐声呐喊，以助声威。决出胜负以后，万众欢呼，急鼓重擂三通。这等热烈的场面确实动人心弦。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皇帝对于摔跤的偏爱，摔跤盛行宫中，在京师和民间便更为广泛地流传。《吴兴杂录》说，唐代中元节，俗好角力相扑，云避瘴气也。避瘴气是古代中国

民众的一种禁忌和讲究，切实地说，中元节后进入农闲，角力便是回味农作的一种最有益也最有趣的活动。《角力记》称，五陵、鄱阳、荆楚一带，五月盛集，水嬉则竞渡，街房则相攒为乐。而更为热闹的则是陕南、成都一带，相扑时往往设有擂台比赛，史称募桥市壮勇者，于山前平原作场，候人比赛，赢者出场赏之，彩马拥戴而去，其时观者如堵，巷无居人，从正月上元至五月方罢。

相扑极具娱乐性，同样在宋代宫廷中倍受欢迎，并成为宫廷宴会娱乐中令人期盼的压轴节目。《宋史》记述称，宴会热烈的场合中，第十九项表演节目便是精彩绝伦的角抵，角抵之后宴会便告结束。《东京梦华录》也说，天宁节时，酒宴第九盏御酒慢曲子，宰臣酒慢曲子，百官酒舞三台，左右军相扑；相扑毕后宴退，臣僚皆替花归私第。宋代皇宫中后宫饮宴和朝廷重大宴会一般都有相扑比赛，所谓使人到阙筵宴，凡用乐人三百人，相扑十五人，于御前内等子差。

内等子是宋代宫廷中皇帝御前的徒手侍卫，是由膂力过人的武士组成。《梦梁录》说：内等子，隶御前忠佐军头引见司所管，于殿步诸军选膂力者充应名额，即虎贲郎将耳。每遇拜效明堂大礼，驾前只顶帽，鬓发蓬松，握拳左右行者是也。可见这些选自殿步诸军的大力士个个都是摔跤能手，他们隶属于御前的忠佑军头引见司。宋代宫廷摔跤的内等子有规定的名额，包括上等、中等各五对，下等八对，三年比武一次，从本司中争拣上下名次入额。

宋代的宫廷饮宴和接待使臣时的表演主要有两项节目：相扑和剑棒。相扑表现实力，剑棒表现武功。皇帝外出时，则由这些武艺高强的内等子负责担任警卫。《梦梁录》说，南宋时的内等子编制有所扩大，为一百二十人，内有管押人员二人，相当于教练员的十将二人，上等、中等相扑手各十人，下等相扑手十六人，剑棒手十人。这些人按照不同的等级各支领相应的钱粮。在此之外，又有大约七十人的准备祗应，就是预备队员。

北宋时，制度规定，军头司每十天便检阅一次内等子相扑手、剑棒手的表演和格斗。南宋时有所变化，规定每三年对内等子成员进行一次大考核，最后选出优等的人员，在御前当殿呈试相扑，接受皇帝的检阅，皇帝满意，便大加赏赐。考核完毕以后，司中的大力士要重新调整，合格的留用或者转正，不合格的便被淘汰，并分发到各地军营，充当管营军头。

宋代商业和手工业极大的繁荣，京师和主要城市金粉楼台，十里香风。都城北都汴京、南都临安，人口增至几十万，城市中出现了供市民们娱乐、观赏的瓦子。瓦子包括各种娱乐表演项目，其中的相扑表演自然最具魅力，也最为精彩，深受市民的喜爱。相扑艺人在瓦子各类表演艺人中人数是最多的，市民对于相扑的偏爱导致了相扑空前繁荣。《都城纪胜》、《梦梁录》、《武林旧事》等史书不无生动的描述了当时相扑活动的盛况。

《梦梁录》记载说，若论护国寺南高峰露台争交，须择诸州郡膂力高强、天下无对者，方可夺其赏。如头赏者，旗帐、银杯、彩缎、锦袄、官会、马匹而已。露台手交当然是打擂台式的摔跤，优胜者既可获得丰厚的奖赏，运气好时还能得个一官半职，光耀门庭。当时，在京师瓦肆诸郡争胜的相扑高手中，著名的有赛关索、周忙懂、王急快、周急快、董急快、赤毛朱超。民间的相扑比赛中，随着相扑活动的普及，女子也纷纷参加，出现了器三娘、黑四姐、女贴赛关索等有名的女子相扑手。

宋代的相扑比赛规则称为社条，相扑比赛的裁判被称为部署。宋代从宫

廷到京师到全国，都有不同规模的相扑比赛。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中就描写了宋代相扑活动的流行盛况：浪子燕青和任原在泰山庙会上进行相扑比赛，台下的观众有数万香官，两边排得似鱼鳞一般，廊庑屋脊上都坐满了。这些观战的香客来自全国各地，一者烧香，二者乃为领略任原的本事，三来也要偷学他几路。比赛时，燕青再上献台来，要与任原放对。部署向他要了文书，怀中取出相扑社条读了一遍，对燕青说：你省得吗？不许暗算。燕青冷笑说：我单只这个水裤儿，暗算他什么？

南宋时，都城临安的南高峰比赛是全国最高级别的一种比赛，赢得头名的摔跤手奖品丰厚，载誉而归，令世人景仰。宋理宗景定年间，温州韩福夺得了大赛的相扑头名，不仅获得了丰厚的奖赏，而且还封了官，补军佐之职。泰山庙会的比赛在《水浒传》中也是栩栩如生：任原在擂台上目空一切地夸口说，四百座军州，七千余县治，好事香官恭敬圣帝，都助将刊物来，任原两年白受了。今年辞了圣帝还乡，再也不上山东了。东至日出，西至日没，两轮日月，一合乾坤。南及南蛮，北济幽燕，敢有出来和我争利物的吗？

宋代相扑活动的广泛开展，相扑的专著便纷纷问世。《角力记》是流传至今的一部相扑名著，是宋代署名调露子的人所写。《角力记》记述说：夫角力者，宣勇气、量巧智也。然以决胜负，骋赳捷，使观者远怯懦，成壮夫，己勇快也。使之能斗敌至敢死者，立教勇无勇不至，斯亦兵阵之权舆，争竞之萌渐。这是对角力的意义和价值作的客观的评述。

相扑虽然益处很多，但宋时的相扑可以用拳脚，因此遇到武力高强的，便会发生死亡事故。《水浒传》中就有这样的描述：王庆见她是个女子，又见她起拳便有破绽，有意耍她，故意不用快跌，也拽双拳吐个门户，摆开解数。那女子见王庆只办得架隔遮拦，没本事钻进来，她便觑个空，使个黑虎掏心势，一拳望王庆劈心打来。王庆将身一侧，那女子打个空，收拳不迭，被王庆就势扭擗定，只一交，把女子擗翻；刚刚着地，顺手儿又抱起来，这个势叫做虎抱头。这是以强打弱的技巧性相扑动作，宋时比赛，多是以摔、绊等技巧，摔倒对方取胜。《角力记》中记下了宋时一首《题墙上相扑画》诗：

黑汉勾却白汉颈，白人捉住黑人腰。

如人要辨输赢者，直须墙隙始一交。

宋代相扑表演中值得一提的还有一种乔相扑表演。乔就是假装。乔相扑是指由一个人俯下身来，穿着假外套，扮成两个人相扑，俗称两个小伙子摔跤。宋代女子不仅积极参与摔跤活动，而且还以此择婿。女子相扑在中国历史很悠久，起码在三国时期就已产生。三国东吴国主孙皓，史称曾使尚方以金作金步摇假髻以千数，令宫女们着以相扑，早成夕败，辄命更作。宋代的女子参与相扑很注重技巧，而且技艺娴熟，敢与男子争雄，即便输了也毫无愧色，反而称赞胜过自己的男子，虚心讨教。宋代相扑表演时，往往女子相扑挑在男子相扑之先，所谓先以女颯数对打套子，令人观睹，然后以膂力者争交。

宋仁宗嘉佑十年正月二十八日，仁宗在宣德门，堂而皇之地观看各种艺人的精彩表演，其中，包括女子相扑。大臣司马光知道这事后，大为愤怒，认为皇上观看女子相扑，有悖常道，成何体统！司马光便愤然写了一篇《论上元令妇人相扑状》，呈给仁宗。状中说：臣窃闻今月二十八日，圣驾御宣德门，召诸色艺人备进技艺，赐与银绢，内有妇人相扑者亦被赏赉。上有天

子之尊，下有万民之众，后妃侍旁，命妇纵观，而使妇人裸戏于前，殆非所以隆礼法示四方也。

辽代的相扑运动也十分可观，宫中这一活动极为盛行，而且还载入了法典。辽代制度规定，册封皇后时，呈百戏、角抵戏以为乐。辽代皇帝在宫中诞辰宴饮和宴请使臣以及各大型节日的宴会上，一般都有技艺精湛的相扑、角抵表演。史称天显四年，辽太宗耶律德光宴会群臣和各国使节，宴席上观看俳优和角抵。重熙十年十月，辽兴宗耶律宗真以皇太子库里噶里生、北宰相驸马音巴宁，迎帝至其府第饮宴，兴宗命卫士和汉人角抵为乐。

金代也十分推重相扑活动。金代皇帝往往从各类角力活动中，选拔武艺高强的武士来充任侍卫，以确保皇帝的安全。《金史》记载说，金太祖完颜_{兀术}曾经令数人两两角力，其宗弟完颜昂年仅十五，却在角力中连仆六人，屡战屡捷。太祖完颜_{兀术}非常高兴，对完颜昂说：自今勿远左右。几天后，太祖赐给完颜昂金牌，令他佩以侍卫。

元王室起自北方草原驰骋的蒙古民族，他们逐水而居，以游牧为生，习俗上注重骑马、射箭、摔跤三大项，称这三项是男子三项竞技，即是每个男子所必不可少的技艺。早在蒙古部落联盟时，只有这三项男子竞技项目的出类拔萃者才有资格被推举为部落联盟首领。成吉思汗手下的大将合撒儿、木华黎、别勒古台、哲别、苏别额台等都是这三项竞技的高手。由此可见，蒙古有推重摔跤的传统。

《蒙古秘史》是关于蒙古民族生活记录的最具历史价值的史书之一。书中记述了公元1218年成吉思汗远征前，曾商议将权力象征的汗位委托给皇子。此议一出，生性好斗的皇子拙赤和察哈台起而争夺汗位。书中称：拙赤起，揪察哈台衣领说，若远射败于汝，则敢断其拇指而弃之；若相搏败于汝，则自倒地勿起之，愿听汗父圣旨裁夺。从记述上看，蒙古汗位的继承人也必须是骑射、摔跤的一等高手。

蒙古的妇女在蒙古民族的游牧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蒙古妇女也可以参与男子三项竞技比赛，而且时或有技艺超人的女子胜过不可一世的武士。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海都女之勇力》中记载说，国王海都有一女儿，名叫阿吉牙尼扬，鞑靼语犹言光耀之月。此女甚美，甚强勇，其父国中无人以力胜之。其父数欲为女择配，女辄不允，尝说，有人在角力中能胜我者则嫁之，否则，永不嫁人。其父许之，听其择嫁所喜之人。一二九一年，有一贵胄，是一个富强国王的儿子，勇侠而甚健，听说此女角抵婚嫁一事，打算前去较力。贵胄携带千匹骏马，毅然来此国中。二人登上角场，相抱互扑，各欲扑对方于地，然久持不下，难分胜负。最后，此女将王子扑倒在地。这场比赛前，女子的母后和众大臣都看上了王子，敬重王子，希望阿吉牙尼扬能让漂亮的王子获胜，以便成全这次婚姻，但阿吉牙尼扬断然拒绝。她说，无论怎样，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我做任何不对和没有道理的事。阿吉牙尼扬在赛场上是能手，在战争更是一位勇武绝伦的勇士，史称其父远征，辄携女与俱，盖扈从骑卫中使用武器者，无及其女也；有时，女自父军中出突敌阵，手擒一敌人归献其父，其易如鹰之捕鸟；每战所为，辄如此也。

不过，元统治者出于江山社稷的考虑，严禁民间习武，摔跤也在禁绝之列。元代律令规定：凡民间习练角抵之戏，学攻刺之术者，师、弟子并杖七十七。元代皇帝禁绝民间习武，严重地阻碍了角力活动的开展。但也有个别

皇帝例外。元武宗海山就大力倡导角力。大德十一年，武宗以拱卫直指挥使马谋沙在武士的角力中获胜，超擢他为平章政事。至大三年，阿里在角力比赛中获胜，武宗赐阿里银一千两、钞四百锭。至治元年，元英宗也赏赐角力优胜者一百二十人，每人钞一千贯。

明代的摔跤活动依旧广泛地开展，到清代时达于极盛。摔跤一词，最初就产生于清代。明代宫中的摔跤活动只是供饮宴、游乐时助兴，而清代宫中则推崇摔跤，开展得轰轰烈烈。据传说，明太祖朱元璋在没有发迹时，有一次从大和进香回来，在路上，恰遇滁州陈也先登台坐擂，自称自己打遍天下，拳棒无敌。朱元璋一跃而上，与他角胜，不几个回合，朱元璋便把陈也先摔下了擂台。

明正德七年，喜好游乐的武宗朱厚照在西内练兵，令江彬等率兵入内，习阵营、校骑射，时或为角抵之戏。江彬是边镇的统兵官，他的部下大多为西北地区的边兵，一个个身材魁伟，孔武有力。江彬这支边镇兵入内随从武宗，极得武宗的欢心。武宗南下游玩南京时，江彬随驾，江彬的部下骄横跋扈，浪游市中，强取强卖，百姓怨愤。御史乔白岩对此十分不满，遂命在南方教师中选取其中最为矮小、精悍的一百人，每天专找江彬所领的兵士约到校场比试。史称南人轻捷跳越，行走如飞，而北人龌龊，方欲交手，被南人矮小者或撞其肋肋，或触其腰胯，北人皆翻身倒地，僵仆移时。

明代民间的摔跤活动盛于宫中。南方称这一活动为相扑，深受民众的欢迎。学者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记载说，清明时节，扬州郊外有各式各样的游乐活动，其中包括浪子相扑；另在西湖春、秦淮夏、虎跑秋等地也有类似的游乐盛况，与扬州清明活动差足比拟。和南方相扑不同的是北方流行的摔角：为了不裸露身体，着一件类似短马甲重叠粗布数层用线密密缝缀的摔角衣，露胸束腰带，场内铺设数寸厚的河沙；竞技比试时，可以相拽勾拌，可以劲提于足，而发于肩，但不允许冲撞扑打；凡是衣着摔角衣入场比试者，被摔伤甚至死亡时，对方一概不负责任。后世流行的摔跤规则大致源于北方的摔角。

清代的摔跤活动如火如荼。摔跤在清时又称布库、撩脚，比赛规则趋于完善，技巧也令人惊诧。清代是由满族建立的王朝，满清发迹于白山黑水之间，以武力入主中原。清代的皇帝几乎都尚摔跤。清圣祖康熙皇帝玄烨，八岁即位，曾在康熙八年，以习布库以为戏的小太监活捉了专权自恣、擅作威福的权臣鳌拜，从而夺回了皇权，南面亲政。清高宗乾隆皇帝史称其偏爱摔跤，最喜其技。

满语称摔跤为布库。清代皇帝们倡导布库，既为了训练士卒，所谓布库诸戏，以习武事，也为了和蒙古诸王联欢结盟。史称清太宗皇太极积极进取中原时，曾以各种方法和蒙古诸王联络感情，经常和诸王宴会，宴会上以布库为戏。满蒙都好布库活动，以此切磋竞技自然是最好不过的一种方式。

清代皇帝的御前侍卫都是挑选出来的一流布库高手，他们既护卫皇帝，又用于在饮宴随时出班比试。清康熙十六年，康熙扩大布库组织，将布库侍卫扩编为善扑营。康熙依靠习布库的小内监捉拿了鳌拜以后，便组建了善仆营，以领臣统领营事。清扈从皇帝的善扑营编制为二百人，人员都是从八旗中精选的勇士中挑选出来的。善扑营平时训练严格，任务主要有两个：大燕享时呈献技艺；和外藩角抵时争较优劣。史称清顺治年间，有喀尔喀使臣入宫，和顺治近臣角抵，俱莫能撻。惠顺亲王代善伪装成护卫入朝，杂在众侍

卫中，和这位使臣交手，应手将使臣掀翻在地。世祖大喜，赏赉无数。康熙以后的善扑营将士个个身怀绝艺，自然就没有了顺治皇帝的那种尴尬。《北京竹枝词》中有一首描述了善扑营武力的威仪：

布靴宽袖夜方归，善扑营中个个肥。

燕颌虎头当自笑，但能相搏不能飞。

清代的摔跤活动分为官跤、私跤两类。官跤是善扑营和官方的比赛。比赛时，跤场遍铺大绒毡，角力身穿褡裢，下蹬短靴，外套窄袖白布上装。出手时可以相互扭结，可以绊足，以对方倒地为获胜。胜者获赏，负者不挨罚。私跤则是民间的摔跤活动。《都门锁记》说：杂耍诸技，皆村民为之，北人好技勇，故俗使然也。寻橦、履绳、角抵之戏，不足为役。南方的摔跤活动见《扬州画舫录》等书，称两人裸体相扑，借以觅食，谓之摆架子。

清时蒙古厄鲁特部族流行另一种摔跤方式：袒裼而扑，虽蹶不释，必控首屈肩至地，乃为胜彼；而且必须是两肩着地，颈倒竖，方为取胜。史称清列圣巡幸木兰，蒙古诸台吉和四十八部盟长，例于出哨之后，恭进筵宴，习武合欢，有所谓塞宴四事者。清康熙、乾隆时，几乎每年都要在木兰举行围猎和塞宴。故宫博物院今藏有张文翰绘制的《塞宴四事图》，图中生动地描绘了满蒙塞宴联欢的情景。从总体上看，清代的摔跤比赛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布库，即脱帽短褡，两两相角，以搏拚扑地决胜负；一种是厄鲁特，即袒裼而扑，虽蹶不释，必控首屈肩至地为胜。

八、宫廷“马拉松”

中国古代的史书中，奔、跑、趋、驱、走、急行一类的文字比比皆是。中国古代的先民们在田猎、掠夺和征战中产生了早期的奔跑活动。所谓百夫荷罕旗以先驱，是指周王室每次出征时，都是以军中的小将官扛着战旗，跑在队伍的前面，既激励士气，又为开路先锋。

奔跑可以说是人类的基本生存能力之一。人类要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健壮的体魄和飞速的奔跑能力，尤其是飞禽猛兽充斥、危机四伏的古代。中国古老的史籍《山海经》、《淮南子》和《列子》等书中均记载一位古代长跑英雄的神奇传说：夸父逐日。

夸父是夸父族的一位民族英雄。夸父族部落居住在遥远的北方，他们在太阳照耀的土地上繁衍生息，但他们觉得，金灿灿的太阳每天走得太快了，还没有留下足够的温暖，就消逝在神秘的天际。太阳能不能停留一下呢？能不能呆一会儿？夸父族派出一位最优秀的健壮善跑的小伙子，去追赶太阳，把太阳捉住，让太阳留在天空。小伙子受命以后，即跟着太阳奔跑，从清早直到傍晚，才在嵎谷追上了太阳。由于长时的奔跑，小伙子感到口干舌燥，他就到渭河里去喝水，很快就把渭河水喝干了。接着，他又喝干了黄河的水。他想走回大泽去喝大泽的水，走到半路他便疲劳致死。他的毛发变成了草木，膏血化作了河流，手杖变成了桃林。他没有完成夸父族人的重托，死后就把他的骨血化入大地，献给了族人，让族人踩着他的骨血去完成未竟的愿望。

这实在是一个美丽的愿望，是先人们渴望征服自然的一种美好的空想。但这个神话却给人类用体能和长跑征服自然的想象力提供了基础。人类一代代繁衍，也一代代增强体魄，尽其所能的征服自然。人类在夸父逐日的神话激励下，产生了许多超乎寻常的长跑能手，他们是古人的骄傲。古代铭文《令鼎》的一段文字中就曾记载了周成王率领他的臣下和奴隶，到淇田场去春种，农事完成以后，进行射箭比赛。周成王在返回王宫时，跟着他的马车做护卫的有两个随从，一个小官吏名叫令，一个是奴隶名叫奋。成王春种、射猎以后，非常兴奋，对两个随从说：你们两人如果能一直跟上我的马车，跑回宫中，我就赏你们十家奴隶。成王的马车驭手谦仲得今后就快马加鞭，马车风驰电掣，令和奋两位随从跑步如飞，紧随其后，一直到了王宫。成王兴奋异常，当即如约赐赏十家奴隶，并赐钱铸了一个鼎，将这一经过记在这只鼎上。

战国时期，战争从车战衍而为大兵团步兵作战，兵贵神速，步兵的奔跑移动，以奇兵出奇制胜，主要是通过走跑来完成，因此，这个时期军事训练的主要内容之一便是长跑。吴王阖闾聘精通兵法的孙武为军师，孙武极重视长跑训练，他命令士卒穿上全副的甲冑，携带一应的作战武器，每次跑完三百里的路程方许宿营。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孙武选取其中三千名精锐，组成一支先锋部队，进攻楚国。因为运动速度快，乘其不备，出其不意，吴军五战五胜，很快占领了楚国首都郢城。

战国时的军制是征兵制度。各国在征兵时，为了征到素质好的兵员，就用奖励的办法选拔体质坚强的士卒，著名的军事家吴起在魏国招募士兵时，就曾以武装长跑作为选拔的标准。

长途奔跑不仅是古代军事活动的需要，在田猎、护卫、警戒等方面更需要兼具速度和勇力。古代文学名著《楚辞·招魂》中描述说：步及骤处兮骋骋先，抑骛若通兮引车右还。意思是说，在繁忙的田猎活动中，王公贵戚驾

乘马车，而他们的马前卒则车马之前，徒步奔跑，一面引车开路，一面驱赶禽兽。《国语·鲁语》中也记载：天子有虎贲，习武训也；诸侯有旅贲，御灾害也。这些虎贲、旅贲，都是些轻捷健壮、奔走如飞的勇士，他们在天子或诸侯出巡时，手持兵器，在车马前后奔行，以为护卫。

《左传》记载说，鲁哀公八年三月，吴国攻打鲁国，鲁国大夫微虎准备对吴军搞一次突然夜袭。为此，鲁大夫要精选一批精壮善战、能跑善跃的武士。鲁大夫在庭室帐前设置一个逾越的标志，常人很难能够越过，而只有能轻易的三次越过者方才入选。结果，在他的家兵中选出了善于跃越的壮士三百人，其中包括孔子的学生冉有。

秦始皇拥有雄兵百万，军中不仅有车士、骑士，而且长于奔跑疾走的甲士即便不戴头盔、不披甲胄而照样能冲锋陷阵、所向无惧的，更是不计其数。《史记》记述说：秦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虎贲之士跼踵科头贯颐奋武者至不可胜计。秦将王翦曾带兵和楚军对垒，坚壁自守。王翦终日休士洗沐，安排好饮食，和士卒朝夕相处。时间久了，王翦派人问军中情况，回答说：方投石超距。王翦点点头，说士卒可用。王翦是战绩辉煌的大将军，在他看来在那样的情形下士卒依旧勤于练习，这样的军队肯定能胜。

汉魏南北朝时长跑也是一项重要的活动。这个时期有位著名的长跑能手是氏族北魏将领杨大眼。《魏书》记载说，北魏太和年间，高祖自代将南伐，命尚书李冲典选征官。杨大眼自荐随征，李冲不许。杨大眼说，尚书不见知，听下官出一技。说着，便出长绳三丈许，系髻而走，绳直如矢，马飞驰尚不及，见者莫不叹为观止。李冲说，自千载以来，未有逸材若此者也，于是，杨大眼被选用为军主。要知道，一条三丈长的绳子系在发髻上，跑动后像脱弦之箭那样笔直，而且骏马飞驰尚不能赶上，这实在是常人难以做到，难怪骄傲的李冲也不得不叹服，委他为军主。杨大眼选为军主以后，跟随孝文帝、宣武帝南征北战，屡立战功。世人仰慕杨大眼的神勇智慧和奔行如飞，以至在宣武帝太平年间杨大眼从前线回到京师洛阳时，观者如市，为的是一睹这位神人的风姿。

魏晋以后，步兵虽然仍是军队中的主要兵种，但大兵团的步兵作战代之以步骑协同作战：长途追击由骑兵负责，步兵则主要在短距离追击。唐代的兵书《太白阴经》称：探报计期，使疾足之士。这是说侦察敌情，传递情报，要求迅速及时，这就需要奔跑飞速的人。

宋元时期的长跑引人注目。《梦溪笔谈》记载说，宋代的驿传有三种：一种是步递，一种是马递，一种是急脚递。急脚递就是长跑奔行，这种方式在三种驿传中最快，要求日行四百里。金章宗完颜璋在泰和六年设置急递铺，急递人腰铃传递，日行三百里。元世祖忽必烈时，也设置急递站铺，以利于公文迅速传递，当时的传递铺兵一昼夜急行四百里。《元史》说：凡铺卒皆腰系革带，悬铃，持枪，挟雨衣，赍文书以行。元时的急递站铺以十里、十五里为一站，沿途更换铺兵，这相当于在崎岖山路不便马行的地方的长途接力传递。

元代在军队中专设一种越野长跑，称为贵由赤。元世祖曾在他的禁卫军中，组织了一支善于长跑、武艺高强的快速反应部队，承担从大都（北京）到上都（滦京）之间的警戒任务。这些禁卫军，平时就注重长跑训练，每年还规定进行一次越野跑比赛，从大都出发，终点站是京东河西务、泥河儿，全程一百八十华里，所谓越三时，走一百八十里。三时即三个时辰，相当于

今天的六个小时，六小时走一百八十里，这是十分了不起的。比赛前三名奖给银锭和绸缎。

史书记载说，元至元二十四年，为了训练贵赤卫的长跑技艺，开始举行大规模的贵由赤长跑比赛。贵由赤蒙古语意思是快行者。元学者陶宗仪在《辍耕录》中称：在大都则自河西务（今河北武清县东北三十里北运河西岸）起程；若上都则自泥河儿（河北省宣化县东十五里）起程，越三时，走一百八十里。元太史杨瑀在《山居新话》中也记载说：大都，自河西务起至内中；上都，自泥河儿起至内中，越三时，行一百八十里。

从史书记载上看，元时的长跑分两条路线：一条以河西务为起始点，以大都（北京）皇宫为终点；一条以泥河儿为起点，以上都（今内蒙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皇宫为终点。比赛时，以皇帝所居的地方来确定用哪条比赛路线。元时的长跑距离，一般记载是一百八十里，但杨允孚在《滦京杂咏》中却记载为二百里。

元时的长跑比赛有详细的规程和规则：每次比赛都是从清晨黎明时出发，要求在三个时辰即六个小时内跑完全程。比赛前，起跑处用绳子横拦住赛跑人。统一号令，将绳子拉掉，比赛开始。赛跑人跑完全程到达终点时，皇帝在王公贵族的簇拥下，坐在宫中终点站的龙椅上，等待着冲刺的时刻。跑到终点的第一个优胜者在御前俯伏，高呼万岁、万万岁。赛跑只取前三名，其余的记录姓名，不记名次。第一名奖：白银一锭；第二名奖绸缎四表里；第三名奖绸缎二表里；其余各赏绸缎一表里。

元末学者陶宗仪说：贵由赤者，快行是也。每岁一试之，名曰放走。以脚力便捷者膺上赏。故监临之官，齐其名数，而约之以绳，使无后先参差之争，然后去绳放行。元诗人杨允孚专有一首诗描写贵由赤活动：

九奏钧天乐渐收，五云楼阁翠如流
宫中又放滦河走，相国家奴第一筹。

九、君臣拔河

拔河又叫牵钩、拖钩。唐学者魏征在《隋书·地理志》中说，拔河这种活动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楚国和吴国对抗，两国都在水泊地带用战船作战。楚国将领模仿水上拖船的背纤动作，用一条粗大的篾缆，上面系数百个小索，相向对挽，练习力气，所以又名牵钩。这种游戏后渐渐流行开来，以南郡、襄阳两地最为盛行。

隋唐时期，早期用作拔河的大篾缆改为大麻绳，长约四五十丈。学者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有详细的描述：拔河古谓之牵钩，襄汉风俗，常以正月望日为之。相传楚将伐吴，以为教战。梁简文临雍部禁之，而不能绝。古用篾缆，今则以大麻绳，长四五十丈，两头分系小索数百条挂于前。分二朋，两勾齐挽。当大绳之中，立大旗为界。震鼓叫噪，使相牵引，以却者为输，名曰拔河。

从学者封演的记载上看，拔河最早称为牵钩，兴起于襄汉一带。襄汉风俗，每年正月十五日举行拔河比赛。楚国曾用此法教练士卒，以旺盛的士气攻打吴国。梁简文帝觉得这一活动有伤大雅，曾下令禁止，但禁止不了。最初使用的是竹篾编的绳子，后来改用大麻绳。大绳长四五十丈，两头分系上百条小绳。比赛时，分成两队，一起将绳子拉紧。大绳中间，立一面大旗作界线，旁观者敲鼓、叫嚷。两队使用互相拉引，谁后退了，谁就为输。

唐代的宫中很盛行拔河游戏。《全唐诗话》记载说，唐中宗景龙四年三月一日清明，中宗李显临幸梨园，命侍臣为拔河之戏。唐宫中曾举行过一次大规模的高级拔河比赛：唐中宗景云元年春天的一天，中宗李显幸梨园球场，文武大臣侍驾。中宗命七位宰相、二位驸马为东队；三位宰相、五位将军为西队。东队贵人多，身体也强壮些，西队认为分派不公平，奏请中宗重新分配，中宗不同意。比赛紧张地进行，结果自然是西队战败。西队的老丞相韦巨源、唐休璟在败退时随绳跌倒在地，半天站不起来。中宗在一旁观战，见状大笑，忙命左右快快扶起。

拔河具有压邪去恶、兆示丰年的用意。《隋书·地理志》说，拔河兴起于南郡一襄阳二郡，是从军事训练中产生。比赛开始时，用鼓来指挥竞赛，观看的人们大声叫嚷，声震远近，这样可以压制邪气，使来年五谷丰登。

正是由于这种吉祥，因此，唐代的皇帝很喜欢这一活动，也大力提倡拔河。唐开元年间，玄宗李隆基曾在一次宫中举行的拔河比赛中吟诗助兴。诗前御制序称：俗传此戏，必致丰年，故命北军以求岁稔。因作《观拔河俗戏》诗：

壮徒恒鼓勇，拔拒抵长河。
欲练英雄志，须明胜负多。
澡齐山岌岌，气作水腾波。
预期年岁稔，先此乐时和。

唐武则天时，大臣张说观宫中拔河比赛，奉命写了一首《奉和圣制观拔河俗戏应制》：

今岁好拖钩，横街敞御楼。
长绳系日住，贯索挽河流。
斗力频催鼓，争都更上筹。

春来百种戏，天意在宜秋。

十、御苑鸟兽

在帝王后廷生活中，也少不了动物玩偶，有随身的猫、狗、异鸟，有豢养于苑囿的珍奇兽类。性格刚猛尚武的皇帝，苑囿畜兽可以供其射猎，例如汉武帝曾在上林苑自击熊彘、驰逐野兽；明武宗曾在宫内与猛虎格斗。然而大多数皇帝是赏玩各种动物，如宋徽宗在内苑畜兽，是为园林增添野趣，以助游兴。元代在北海万岁山（即琼华岛）畜养各类野兽，皇帝宴诸王大臣的大聚会日，有一项节目，就是将万岁山圈中的各类野兽放出，皇帝与王、大臣遥观、以助酒兴。只见虎豹熊象之属一一出现，然后狮子到来，在众兽中并不以身材硕大取胜的狮子却镇住了所有动物，诸兽见了狮子，皆畏惧俯伏，不敢仰视。《辍耕录》的这条记载也许有些夸张，但上述野兽唯有狮子不产于我国，而是来自外域，人也要对它另眼看待。古人对于稀有动物看得很神秘，龙、獬豸、麒麟各负使命，狮子则据于宫门之前。直至清代康熙时，西洋进贡狮子，还令大臣观后咏诗。

唐武宗喜好豢养各类动物，早在他作颖王时，邸园已有许多动物玩偶，他将其中可人者，列为十玩，绘十玩图，传播于世。十玩各有雅称：九皋处士——鹤、长鸣都尉——鸡、惺惺奴——猴、长耳公——驴、茸客——鹿、玄素先生——白鸥、灵寿子——龟、守门使——犬、鼠将——猫、辩哥——鸚鵡。唐昭宗避藩镇之乱逃往蜀地时，还有弄猴随驾。该猴能随班起居，昭宗赐以绯袍，称之为“供奉”。罗隐有诗：“何如学取孙供奉，一笑君王便著绯”。

唐代皇帝对鸟类多有偏爱，在闲殿使管理下的五坊中，鸟类就占了四坊：雕坊、鹞坊、鸢坊、鹰坊，另一坊为狗坊。开元年间，唐玄宗政事之暇，喜纵禽以自娱。在通往华清池的路上，长安父老们常能见到皇帝一路纵禽驰逐的情景。经安史之乱后，玄宗身心老却，步辇出行时，父老们问他何不纵禽，玄宗恻然：我老了，还能玩鸟？父老士女闻之，莫不悲泣。

玄宗盛年，对于爱鸟极富温情，称黄莺为金衣公子；长安城中有只鸚鵡破案立功，玄宗封它为绿衣使者，付后宫豢养；岭南进献的白鸚鵡，被玄宗和杨贵妃呼为雪衣娘。雪衣娘在宫中调教得伶俐异常、性情驯服，尤以言语能力惊人。玄宗诵近人的诗篇，几遍以后，雪衣娘就能记下来，讽诵无误。杨贵妃教授它《多心经》，雪衣娘记诵精熟，日夜不息地口念此经，似乎有所祈祷。雪衣娘在玄宗和贵妃身边几乎形影不离，玄宗常与贵妃或诸王博戏，每当玄宗快要输时，玄宗的侍从便呼雪衣娘，雪衣娘闻命立即跃上博局，脚、翅翻舞，局已散，对手们无法再争道。然而一天雪衣娘方戏于殿上，被猎鹰搏击，惨死。玄宗和贵妃惋惜不已，哀悯之情长久不能平复。雪衣娘被葬于苑中，特别立了冢，呼为鸚鵡冢。

明宫中有百鸟房，鸟中最多的是鸽子。翊坤宫中设放鸽台，饲养精选的鸽子。当风日晴朗，以一、二只系铃者领头，群鸽翔于紫禁城的上空。宫词赞道：

日霁风和试雪翰，盘空更上五云端。

外边认是宫庭鸽，依约铃声揭处看。

明武宗好养画眉鸟，极喜爱画眉的叫声。有人进言，以新出壳的小鹅脑饲之，则画眉叫声更巧而且长久。武宗纳其言，命光禄寺每日提供小鹅数十只。光禄少卿杨玮愤而抗谏：“天下民穷财尽，何处得许多子鹅？且伤残物

命，有乖好生之义”。武宗被触怒，谪杨玮为泸州知府。

在明宫中最受宠的动物是猫。专设猫儿房，由宦官三、四人，精心饲养在御前有名分之猫。皇帝所钟爱的猫，牝者称为“某小厮”、骗者称为“某老爹”、牝者称为“某丫头”，有的封以职衔，叫“某管事”或直称“猫管事”。嘉靖皇帝有宠猫名“霜眉”，微青色，唯双眉莹洁，故名霜眉。霜眉善解人意，熟知皇帝的习性，每当招呼它或将出宫行幸，它似乎先有所知，跑在皇帝前面作先导。皇帝每晚上床入寝后，霜眉也不离左右，卧在一边。嘉靖皇帝对这只猫怜爱至深，猫死后，命以金棺葬于万岁山阴，碑名“虬龙冢”，荐以斋醮（按道家方法设坛祈祷），善写青词（致天神的表章）的大臣袁文荣为之撰词，词中有“化狮为龙”之语。明熹宗的身边也常有三、五成群的猫，分享他的剩食。

明代皇帝养猫的初意，本是为了引发皇子的生机。然而猫儿房的众猫们出于本性，夜间争斗、嘶叫不休，宫中降生不久的婴儿有的被猫声惊得抽搐成疾，甚至因此而夭折。此事乳母、宦官又都不敢进言于皇帝，皇帝也未曾料到。

奇怪的是，明宫中不允许畜狗，其原因传说是与皇帝的姓氏有关。天启时有宦官潘某，私养小狗于殿之后街，因其阿付权贵太监，无人敢揭露此事。唐代虽有狗坊，总观各代皇宫也少有狗走动。宋仁宗庆历年间，有卫士谋变，震惊宫掖，后被捕杀。官员宋禧建言，为防患须养狗，推荐蜀地有一种罗江狗，赤而尾小，机警如神，请将这种狗养于掖庭。未知仁宗皇帝是否采纳了宋禧的意见，但宋禧却因此被同僚讥笑为“宋罗江”。“哈巴狗”在清宫成为宠物，以绛、白二色为贵，“绛如金液白如银”。这种狗自然不能担当警戒的任务。

清代宫女们在冬天争着养蝈蝈，以葫芦为宠，饰以锦绣。中午拿到太阳下取暖，蝈蝈在笼中嚶嚶争鸣，没太阳时揣于怀中，夜间藏在被中。正式养蝈蝈的工作是由奉宸苑花园的太监们干的，用秋天取来的蝈蝈卵，育之于温室。长成后，遇宫廷筵宴便承诏赴宴，以鸣叫为冬天的宴会添趣，乾隆在一首“上元宴群臣诗”中有句：“向筵花卉发，隔牖草虫鸣”。

比蝈蝈大千万倍的象，也是皇家喜好豢养的动物之一。象虽然是陆地上最大的动物，但古代中国朝廷从未将它作为威武的象征。象被驯服后很懂事体。晋武帝司马炎平吴后，南越人向晋廷献上驯象，司马炎命该象驾大车行走，使越人骑象，车上载鼓吹艺人，从此象车成了晋廷的大驾卤簿，皇帝出行，以象为前导，试以桥道。

北宋克复江南以后，也获得了一些象只，豢于后苑。元代宫中（顺帝时）有一只按照礼仪训导的象，能在皇帝宴饮群臣时，献上拜、舞之姿。“千官鹄立天颜霁、殿下徐牵舞象来”。

明代宫中的象只最多，也颇能参加政事活动。驯象机构有宫中的演象所和锦衣卫的驯象所，象初至京，先在演象所演习，锦衣卫专设指挥一员，提督驯象所。经驯象所教导出来的象，要在大朝会时出任角色，列入仪仗，有的驾辇或驮宝。间或三、五日举行的常朝，也须由六只象参加，某象如有疾病不如入朝则由下一班某象暂代。象的头脑反映灵敏，丝毫不象身材那样笨重，如果入朝迟误，便知道该接受廷杖了，自行伏地受捶如数，然后起立谢恩。象平日获得的薪水数额，按照武弁的等次来定。如犯大过失贬降；则退立所贬之位，不再敢站到原来位置上。象们排列定序，出入缀行，与经过宫

廷训练的人员没有什么差别。

象很快就能学会用鼻子吹鬻粟、击铜鼓，欲观此技艺的人到驯象所纳钱于象奴（管象人），象如教献技，但情绪并不愉快，有时斜视装钱满袋的象奴，而后昂鼻俯首，呜呜出声。在象房时，象也常常烦躁忿懣。发作起来，撒屋倒树，人畜遇之不免遭踏为肉泥之祸。

每年六月六日，宫廷照例晒书，宫中动物们也要浴洗更新。象只被牵到城外的水滨洗澡，一年只有一次这样的机会，群象在河中“因相交感，牝仰牡俯，一切如人，奸于波浪中。毕事精液浮出，腥秽因之涨腻”。居民要到远处汲水，十天以后河水始清。但有的史料否定了这一说。

游目极妙伎，清听厌宫商。
主人寂无为，众宾进乐方。
长筵坐戏客，斗鸡观闲房。
群雄正翕赫，双翘自飞扬。
挥羽邀清风，悍目发朱光。
嘴落轻毛散，严距往往伤。
长鸣入青云，扇翼独翱翔。
愿蒙狸膏助，常得擅此场。
——曹植《斗鸡篇》

斗鸡，是古代王孙公子们的一大乐事，帝王之家摆开的斗鸡场更是热闹非凡。

先秦时周宣王是较早的喜好斗鸡的帝王。斗鸡之风在汉唐达到极盛。汉高祖刘邦的父亲在民间时就有斗鸡之好，作太上皇以后，由于不能继续过去酤酒卖饼、斗鸡蹴鞠的生活而郁郁寡欢，刘邦知道了父亲的心思，便把父亲在家乡的故人迁至长安附近，太上皇又可以拾起斗鸡的爱好了。汉宣帝在民间生活时迷上了斗鸡，常和王奉光一起斗鸡为乐，王奉光之女后来应召入宫，先为婕妤，后立为皇后。

邺城，曹魏和后赵之都，也曾是枭雄们斗鸡的热闹场所。魏明帝筑造过斗鸡台，后赵皇帝石虎又再摆斗鸡的战场。

唐太宗、玄宗、文宗、穆宗都对斗鸡极感兴趣。太宗作秦王时，曾请御史大夫杜淹写过一首咏斗鸡的诗。玄宗为畜养斗鸡，专设鸡坊，搜集长安城中“金尾铁距，高冠昂首”的雄鸡上千只，养于鸡坊，又挑选六军小儿五百人“驯扰教饲之”，年仅十三的斗鸡神童贾昌被玄宗发现，立为五百小儿长。

明代天启年间，宫女们风行以斗鸡为戏。她们从宫外购进健斗的雄鸡，调习一段后，届期登场。先将五彩幔罩在鸡笼上，到场开笼，雄鸡跃出，然后厮杀开来。最后胜者以彩球分缠头旁，入笼迎归，而主人所赢得的珠翠绮罗，所值不下百两银子。

斗鸡自有斗鸡的学问。《列子》上说，纪醜子为周宣王驯养斗鸡，十天以后，周宣王问他：“鸡可斗乎？”纪醜子说：“未也。方虚骄而恃气”。十日又过，周宣王再问，纪醜子说：“未也。犹疾视而盛气”。总计过了三十天，周宣王再问时，纪醜子很有把握地说：“几矣。望之如木鸡，其德全矣。异鸡无敢应者也”，由骄而负气变成木鸡方算驯成，道理实在太玄妙了。唐代斗鸡神童贾昌，玄宗发现他时，他正在云龙门道旁弄木鸡，玄宗以为神异，召入为鸡坊五百小儿长。唐代斗鸡盛行于整个社会，平民有的买不起鸡，只能玩木鸡解馋。而贾昌是宫中卫士贾忠的儿子，算不得贫穷，他自七岁就

能感应鸟发出的信息，即能通鸟语。神驱鬼使，他由鸟类的知音自然成为斗鸡的导师。每年八月五日的千秋节（玄宗生日），贾昌都要在万乐俱举的盛会上一展风姿。他头戴雕翠金华冠，身着锦袖绣襦裤，手执铎铃，拂导群鸡，群鸡叙立于广场，眼光透出神气。顺着贾昌的指挥，群鸡刹时树毛振翼，砺吻磨距，抑怒待胜，进退有期。随鞭指低昂，不失节度，胜负既决，强者前，弱者后，随昌雁行，归于鸡坊。

这种群体的斗鸡，是表演性的。一般竞技性的斗鸡是一一出场相斗。斗鸡的主人须在鸡身上，装上一些助威的东西。如在鸡身上敷上一层芥粉，芥粉辛辣，用以伤害对方鸡的眼睛。在鸡距（爪）上，安设金属假钗，使鸡爪锋利更有攻击性。这两种方法是由春秋时鲁国的两家贵族发明的，季氏与槩氏斗鸡，“季氏芥其鸡，槩氏为之金距”。还有一种方法是在鸡头上涂狸膏，因为鸡的克星是狸（黄鼠狼），狸膏的气味可以迷惑、吓倒对方。这个方法早在春秋时也有了，庄子曾告诉惠子，羊沟之鸡非良鸡，而能屡屡获胜，是因为鸡头上涂了狸膏的缘故。

斗鸡以外，帝王的兴致扩展到斗鸭、斗鹅。斗鸭尤以魏文帝嗜好，他曾向东吴索要良种鸭，可知，东吴也有斗鸭之戏。斗鹅，是晋桓、灵二公所传之宝，由唐僖宗继往开来。唐僖宗经常在兴庆池与诸王斗鹅，一时鹅价飞涨，僖宗的鹅竟值五十万钱。

斗蟋蟀，明宣宗最为入迷，他曾密诏苏州知府况钟向宫中贡进千只蟋蟀，因东吴斗蟋蟀之风很盛，料知那里会有优良选手。苏州的武弁们有的以捕蟋蟀而立功，居然等同首虏而获世职。苏州有句民谣：“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到万历年间还在流传。据说明宣宗从江南选取的蟋蟀，每只竟贵至十几两银子，而宣宗的蟋蟀盆更是无价之宝，今故宫博物院仍存有宣德皇帝当年斗蟋蟀的宝盆。

十一、皇家围猎活动

宁可三日不食，不可一日不猎狩猎活动是伴随着人类的文明而产生的。它和人类的文明进化史一样源远流长。人类最初生活在荆棘丛生、凶禽猛兽出没的恶劣环境中，人类要生存，就得武装自己，和险恶的环境相抗争。人类的文明进化可以说是从和禽兽的争夺生存空间活动中开始的。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贵族阶层产生了。狩猎渐渐成为统治者的军事训练的需要和闲暇生活中游乐的一部分。

春秋战国以前，狩猎是一种严格的军事大典，是一种军事训练的综合演习。汉学者太史公司马迁记载说，赵国曾在边境上聚集重兵。边境另一边的魏王以为赵军要进攻魏国，便吩咐调遣重兵，以作防备。魏公子无忌消息灵通，进奏魏王，说赵王狩猎聚集重兵是在大规模的狩猎。战国以后，狩猎不再是一种严肃的阅军大典，而是帝王们的一种消闲和娱乐。

帝王们以田猎消遣生活，可谓由来已久。庄子说，桓公田于泽，管仲御。这是说春秋初期的齐桓公曾经在大泽中田猎，由大臣管仲侍驾。《诗经·郑风》中有这么一句：叔善射忌，又良御忌。这是指春秋时期，郑国的共叔段在田猎活动中不仅善于射猎，而且御术也是十分娴熟。

古代的史书《说苑》中记载说，楚庄王酷爱围猎。大夫谏奏说：晋国和楚国是你死我活的敌国，晋国不灭楚国，楚国必灭晋国；在这种形势下，大王还怎能耽于游乐？楚王从容地回答：我纵马驰猎，为的是选择勇猛的武士；在榛丛中能刺死虎豹的，我便知道他的勇武；能够和雄劲的犀牛一较高下并战胜它的，我便知道他力大无穷；田猎完毕以后，分其所得，我就知道他是否仁厚。很显然，楚庄王是位有头脑的国君，围猎在他不完全出于游乐，其意是在挑选能肩负重伤的勇猛仁智的武士。

汉武帝刘彻文才武略，在游乐中最喜爱的活动项目之一便是在山林草野间狩猎，以驰逐野兽为乐。武帝刘彻狩猎时，常有文学才士侍从。武帝一次狩猎，他的文臣大才子枚乘写了一篇赋《七发》，详尽地描述了狩猎时的娱悦情形：春天风和日丽；乘着轻快的马车，携带华丽的弓箭，沐浴着春风，浩浩荡荡前去围猎；白刃在阳光下闪闪，旌旗遮天蔽日，劲装的武士奔驰在山林草野之间；鼓乐震天，战马嘶鸣，飞箭如雨，手持刀、枪、剑、戟的武士在山林中呐喊奔走；最凶猛的飞禽走兽见了也吓破了胆；一番追逐猎杀，猎物如山，满载而归；日薄西山而夜幕垂垂，山林深处，篝火熊熊，举行着盛大的庆宴，野味香飘四野，大碗的美酒斟满，品尝着山珍野味，歌舞尽欢之后酣然入睡。

唐代的皇帝和皇族成员大多喜好围猎。唐高祖李渊夺得天下创建大唐江山以后，每年都要举行一、二次大规模的狩猎活动。唐太宗李世民也喜好围猎，曾在一次围猎活动中，亲手刺死了一只犯驾狂奔欲置他于死地的野猪，称之为天策上将击贼。太宗李世民的弟弟齐王李元吉曾宣称：我宁三日不食，不可一日不猎。唐玄宗李隆基风流倜傥，也是酷爱围猎。有一次，正值夏日，禾苗茁壮，玄宗游兴大发，准备出宫围猎，府司马躺在他的马前进谏说：今农在田，陛下何得非时以损下人。唐敬宗李湛好游宴，沉迷围猎。卜者苏玄明以敬宗昼夜求猎，多不在宫中，便和染工张韶等一百多人发动政变，杀向禁庭。宦官们惊慌失措。正在清思殿游玩的敬宗狼狈逃往左军。禁军开到后，合围染工，全部斩杀，尸体狼藉。好深夜捕捉狐狸的敬宗夜猎回来动辄肆虐

内臣。宝历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夜，敬宗夜猎回宫，和内臣刘克明、军将苏佐明等二十八人饮酒，酣饮之际，入内室更衣，忽然殿上灯烛全灭，敬宗终被内臣和军将苏佐明杀死。

四时捺钵制

辽代有四时捺钵制度。辽代皇帝每年在春、夏、秋、冬四个季节，都要带领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在选定的地区进行围猎，以示讲武、巡游，既练兵习武，商讨国事，又舒展筋骨，借以游乐。辽代的这一围猎活动有具体时间和具体地点，并形成制度，称为四时捺钵。辽代的四时捺钵制度是从辽太祖的四楼制发展变化而来。

《虏廷杂记》中赵志忠记载说，辽太祖所居的地方都设楼阁，常居四处地方，形成四楼，太祖常在四楼间游猎。太祖常居上京，设楼称西楼。太祖在南部木叶山设楼，称为南楼。西楼以东千里的地方又设楼，称东楼。再在北部三百里的地方设楼，称为北楼。辽太祖一年四季游猎在四楼之间，即四季在四楼间游猎，形成定制，称四楼制。

《契丹国志》记载说，太祖纵马游猎，弥旬不止。有一黄龙出现在太祖所住的毡屋上，太祖连发三箭皆中，黄龙坠于太祖前。后来，太子即继太祖之后的太宗耶律德光即位，在这里建州，这里就被定名为黄龙府。

辽代的春捺钵主要地点是在鸭子河。鸭子河在今长春城东北约三十余里的地方。河中鹅鸭成群，大雁翔集，鹅群、鸭群、雁群便是春捺钵纵鹰放鹞追捕的猎物。辽代皇帝每年正月出发，约两个月的时间到达鸭子河。这时正值初春，阳光灿烂，春光还未到来。因天气尚冷，鹅群、鸭群和雁群自然也在南方，正准备北飞。辽代君臣便暂时在冰上搭帐居住，凿冰捕鱼。春暖花开，冰雪消融，大批大批的鹅、鸭、雁群光临鸭子河。辽代君臣便开始纵鹰放箭，春捺钵活动开始。首获猎物的人先要将第一个猎物献给皇帝，皇帝赐赏，首获者喝着皇帝赐赏的美酒，得意非凡地佩戴上象征着荣耀的鹅毛。

夏捺钵的主要地点是黑山。辽代皇帝先要在黑山拜陵、游猎、赐赏，然后到鸭子河去避暑。六月上旬，辽代皇帝选择一处吉地纳凉，同时处理军国重事，居留五十天左右，一般由文武大臣全班侍驾，共讨国家大计。理政之暇，辽代君臣便在山林河谷间游猎，到七月中旬方才离去，夏捺钵结束。

秋捺钵的地点在伏虎林。伏虎林在今辽宁巴林右旗西北察罕木伦河源的白塔子（察罕城）西北。相传，辽景宗耶律贤曾率数骑在这里游猎，凶猛的老虎慑于景宗的皇威，伏在草中不敢动弹，因名伏虎林。辽代皇帝十月中旬出发，驰往伏虎林，在那里猎获花鹿和肥兔。秋猎时，侍从们埋伏在湖滨附近，午夜的时候，鹿寻盐水。猎人吹响号角，作鹿鸣声，以此吸引鹿群。鹿群来到以后，乱箭齐射，当时称之为舐碱鹿，又称呼鹿。

辽代皇帝的冬捺钵选在广平淀。广平淀位于辽宁永州境内，在今辽宁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合流处，东西凡二十余里，南北凡十余里。这里地势平坦，地多沙碛，榆柳成林，冬季气候较为暖和。辽代皇帝冬季常来广平淀过冬，既在此和大臣会议国事，接见各地各国使臣，又以游猎养性，借狩猎讲武，训练士兵。

辽代皇帝的四时捺钵制度显然不仅仅是出于游猎，而是兼具多种功能的处理国事，接见使臣，实地练兵，并在这一系列的围猎活动中切实考察随从军士的骑射、跳跃、奔驰、搏击和刺杀等多种军事技能，通过考察，选拔优秀人才，赐给官职，给予重赏，从而获大批武士为国效命。

辽圣宗开泰五年秋天，圣宗耶律隆绪带着卫队驰奔松山狩猎。圣宗在射猎猛虎时，四骏马驰速太快，圣宗一时之间来不及发矢，猛虎转眼间便风驰电掣般地怒扑过来。左右侍从目瞪口呆，惊醒之后皆四散奔逃。这时，兼掌猎场主事的陈昭衮却迅即舍弃坐骑，纵身跃上虎背，双手紧握虎耳。老虎惊恐至极，慌忙逃窜山林。圣宗命卫士追射。陈昭衮大呼不要放箭。猛虎狂奔着窜入山林，而陈昭衮始终骑在虎背上，紧攥虎耳，并趁机抽出佩刀，将猛虎杀死。圣宗惊叹陈昭衮的武艺，设宴慰劳备至，称赞他临危忠诚勇猛，并将筵席上的一应金银器皿，全部赏赐给陈昭衮，旋加赐节钺，不久超升他为围场都太师。

辽宫射兔

中国北部的游牧民族驰骋于广袤的草原，逐水草而居，终日以射猎为能事。马术和射艺的高低，便决定其在群体中的地位高下。其大小首领以及皇帝往往是马术、射艺的优秀者。辽、金、元三代的皇帝一般都好骑射，甚至连后妃和宫人也精于此道，能弯弓射雕。可以说，马术、射猎是北方民族借以保家卫国的看家本领，是他们一代又一代不可或缺的传世宝。

每年重三、重五、重九、腊尾都是北方民族法定的重要骑射竞技日。竞技后的优胜者荣耀无比。

辽代每年三月三日是他们传统的隆重热烈的陶拉葛尔布节。这个节日是辽代规模宏大、极被看重的竞技日，其中最引人注目也是最为精彩绝伦的表演便是射兔比赛。比赛时，先在一个地方设置木兔。参加比赛的人员分成两组，分别骑马竞射，先射中木兔的为优胜。每次往往优胜者威风凛凛，荣耀无比，而失败者则要俯首贴耳，恭恭敬敬，跪着给优胜者讲酒，以示心服、敬仰和祝贺，优胜者骑在马上，居高临下，接酒痛饮。

每年九月九日也是辽代的一个重要而特殊的节日。辽代皇帝在这一天率领群臣部族，驰奔山林围猎，射猎老虎。射多者为胜，射少者为输，输者罚重九宴。辽圣宗统和三年重九日，圣宗耶律隆绪在骆驼山登高，赐赏群臣饮菊花酒。第二年这一天，圣宗再次登高射猎。圣宗很高兴，在高水南阜祭天，择一处高地立帐，赐赏从臣和命妇，饮宫中精制的菊花美酒。有诗描述了这一情景：

重阳时节想题糕，射虎平原意兴豪。

叨赐天厨菊花酒，骆驼山上共登高。云州堡西北约一百多里的地方有一个鸳鸯泊，周围约八十里，泊水停积，景致美丽。《辽史》记载说，延芳淀方圆数百里，春时鹅鸭毕集，夏秋又多菱芡。这两个地方，辽代皇帝时常光顾。春天时，辽皇帝在这里射猎，随从侍卫都身穿墨绿衣，手持连锤、鹰食、刺鹅锥，布列水次，相距五步的距离。上风处擂动战鼓，惊动鹅群。鹅群惊慌奔逃，振翅高飞。这时，鹅群飞起时还没离开水面，皇帝和随即便放出凶猛的海东青，捕杀飞鹅。飞鹅被一一击落，有的没有死，下面布列的侍卫使用连锥将鹅刺死，当即就取出鹅脑，喂食海东青。这一活动中，谁得头鹅，皇帝就赏赐准银、绢等头赏。

海东青是海东的一种名鹰。海东本是地名，是指当时女真东北部和五国相邻的一带，五国东接大海。海东青体型较小，但却十分矫健，其捕捉鹅、鸭又狠又准。海东青中尤以爪白的最为珍贵。辽代皇帝酷爱海东青，每年都要派使巨前往女真去求取海东青。女真惧于辽国的威力，只好兴兵五国，抢夺海东青，然后献给辽主。女真和五国不胜其苦。

辽代的重三射兔；重九射虎；鸳鸯泊、延芳淀游猎和四季捺钵制度便是辽代皇帝的主要围猎活动，这些活动既给辽国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美味，练兵巡边，同时也是辽代皇帝在不同的季节选择最佳的地点处理政务、接见使臣、饮宴欢娱。

金宫射柳

射柳是金人每年重五的一个重要节日内容，金人有世代重五射柳的风俗。金人的重五射柳如同辽人的重三射兔活动一样，同样十分热烈而重要，不可缺少。重五祭拜天地以后，广场上插柳枝两行，分队比赛射柳。比赛时，先按尊卑长幼排列，分别在柳枝上系上自己的手帕，并在柳枝离地几寸的地方，削皮而白之。比赛开始时，一骑飞驰作为前导，然后，参赛者骑马飞奔，以无羽簇箭发射：既射断了柳枝，又能手接断柳而飞驰离去的为上等；断而不能接柳离去的为中等；断其青处或不能射断或没有射中的都是下等；上等、中等为胜，下等为负。竞技时，场上金鼓齐鸣，气氛十分热烈。

重五射柳是金代的重要节日，也是金众多游乐节日中的主要内容，天长日久，相沿成俗。《金史》记载说，五月五日、七月十五日、九月九日，拜天射柳，岁以为常，成为故事。金代承继辽俗，以重五、中元、重九行拜天大礼。重五在鞠场，中元节在内殿，重九在城外。拜天时，用木头割木为盘，像舟状，赤质木盘上画云鹤纹。做木驾高六尺，将盘放在架上，盘中放上荐食，全体跪拜。金代皇帝大多喜爱射柳，一般是在常武殿筑台拜天，拜天以后便开始射柳。

金泰和三年五月重五节，金章宗完颜璟隆重地行拜天礼，然后，亲自射柳。章宗完颜璟张弓搭箭，骑在马上奔驰，三发三中，射得干净利落，群臣山呼万岁、万万岁。章宗万分高兴，设宴鱼藻殿，大会群臣和侍从，君臣尽兴方散。大定三年五月重五日，金世宗完颜雍临幸广园射柳，皇太子、亲王、文武百官也都参与竞射，获胜者都有皇帝的厚赏。

金代皇帝醉心游猎，以至于关于狩猎的诏令花样百出。正隆六年，金海陵王下令，命自中都至河南府所过一应州县，限期调猎手两千人，帮助狩猎。大定九年，金世宗制定网捕走兽法，规定每年必须秋猎、冬猎，成为定制。明昌五年，章宗出猎胡白山，洒酒祭祀山神，王公大臣纷纷进酒。然后，章宗开始射猎。章宗在豁赤一箭射中两只鹿，君臣大喜。这一天，章宗共计猎获鹿二百二十二只，高兴之下，章宗厚赐侍驾的随从。三天后，章宗又射猎了黄羊四百七十一只。

元宫射狗

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有射草狗的习俗。每年年尾，在镇国寺内墙下面，扎制草人、草狗各一个，用杂色彩缎剪制五脏六腑，然后相约发射，直到草人、草狗被射烂为止，最后，设盛宴，以酒相祭，尽兴而罢。元代皇帝、皇族和上层贵族大多喜欢射狗活动。

辽人射兔，金人射柳，元人射狗，这些都是相沿成风的传统风俗，都反映了北方游牧民族对于骑射技艺的重视。元代宫中还专门设有鹰房，专管皇帝捕猎事务。元时在全国设打捕鹰房官，遍布全国的猎户计有四万多户。他们日常豢养猎犬鹰鹞，还经常练习骑射和抓捕禽兽的技术。每年冬季，他们在指定的地区内捕猎，各级捕房官带领自己属下的猎户，携带捕猎用的鹰、犬、弓、矛、刀、剑，围捕珍禽异兽，称为捕猎有户。捕获的猎物，选取奇珍、肥美者进献皇宫；所有捕获野兽的皮革、牙骨、羽毛等一律归入国库。

元代的狩猎围捕活动规模宏大，一次围捕活动参加围猎的人数往往超过两万，随同参战的有成千上万的训练有素的狮、豹、鹰、狗等。《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了元时的一次规模宏大的围猎活动，参与围猎的人数在两万以上，还有不可胜数的猛犬、凶狮、花豹、鹰隼；围猎时，狗吠狮吼，禽飞兽窜，人声鼎沸如潮，叫声震天，情景十分壮观。

清宫秋狝

围猎活动到朱明王朝时处于衰落时期。明末时，聚居关外白山黑水间素有狩猎习俗的满族日益强大，其部族首领极注重狩猎在练兵、强体方面的重要性，每年都要举行大规模的狩猎活动。清世祖福临入主北京、建立清王朝，仍看重满清赖以兴旺发达的狩猎，并将这一活动列入典制，永为遵守。

清太祖努尔哈赤是在明守辽大将李成梁的帐下长大成人的，努尔哈赤从这里认识了博大精深的汉族文化，并掌握了军事技术，学到了作战本领。他曾受命于明，为建州卫左都督。后来，他统一女真各部以至周边各部落，建立后金。《清朝通志》记载说，天命十年，太祖努尔哈赤率部自沈阳城出猎，严饬武备，申明禁令，训示行军之法。继太祖之后，继大统的太宗皇太极也踵行此法，并于天聪六年，敕谕诸贝勒大臣：夫搜、苗、狝、狩，古人原以之讲武，须有纪律，然后人不敢犯。这就明白地说，狩猎是值得提倡的，旨在练兵讲武，提高士兵的身体素质、作战能力和战斗力。

满清入关以前，军事方面是八固山制，因为各固山旗色有别，因而称为八旗。清八旗兵丁计有六万余人，他们出则为兵，入则为民，平时耕种狩猎，有事时征调出战。满清王室是女真族的后裔，女真族历来过着游牧生活，以狩猎为生。他们是以所谓弓马之利，以定天下的，因此，他们对于骑射、狩猎有着浓厚的兴趣，夺得天下以后更不会有丝毫的怠慢。

清入主中原的第一位皇帝是顺治帝福临。福临在君临天下的第一年就数幸南苑，令禁旅行围，并郑重其事的订立了大狩猎从例。圣祖康熙皇帝玄烨即位亲政以后，更是频繁地举行行围狩猎。康熙元年，清府在大狩猎从例的基础上制订了更为详细的车驾行围条例。康熙二十年，玄烨率领随从、亲军，驾幸塞外，狩猎南山，然后，出山海关，驻蹕乌拉，一路上玄烨都是亲御弓矢校猎。两年后，玄烨幸古北口外行围，木兰搜猎自此开始。康熙二十二年以后，便开始了每年一次的木兰秋狝，并在康熙六十一年时定为永制。木兰原意是哨鹿，后来解作围场。木兰在承德府北四百里的地方，属翁牛特旗。木兰方圆凡一千三百余里，极目之处，林木葱笼，水草丰茂，各类禽兽出没其中，是一处理想的围场。不过，清廷选定这里为长征行军和狩猎的场所，有会合蒙古族抵御有侵略野心的近邻沙俄的用意。清圣祖康熙皇帝曾说，一年两次行猎，专为讲武，和行军无异。

每年秋季，清代皇帝都要率领随从近侍、亲兵虎枪营和文武大臣到木兰行围；出行时，皇帝总要召集旧藩四十九旗喀尔喀青诸部，分班从围；左右哈萨克、东西布鲁特、安集延布哈尔，朝谒踵集，惟恐后至；土尔扈特部落也皆挈其部众，越数万里前来朝谒；八旗各驻防长官届时即选择材官赴京侍卫，蒙藩选一千二百五十人为虞卒护驾。清代皇帝每年木兰秋狝，随从人数都在一万人以上。

清木兰行围时，史称统围大臣莅于场所，按旗整队，中建黄纛作为中军，用以指挥四面军卒进入围场。军卒蝉联环布，自远而近，三五十里或七八十里，逐渐合围到皇帝所在的看城。合围以后，鸟图哩处虞卒脱帽，以鞭擎之，

高声传呼：玛尔噶。蒙古语指帽子。声声传递，直至中军。凡三次，中军知道已经合围，便拥纛徐徐前行。这时，皇帝自行营来到看城，对合围中的禽兽发矢殪之，围猎便宣告开始。御前大臣侍卫人等都张弓射猎，逃逸而出的由从官追射，直到合围中的禽兽全歼为止。如果合围中的禽兽太多，皇帝还命令网开一面，让部分禽兽逃逸，以待来年再猎。最后，皇帝仍据各部猎获禽兽的数量，分别赐赏。

康熙皇帝玄烨十分注重练兵讲武，他自己也积极地参与狩猎行围。《清朝文献通考》记述说，康熙在六十岁时曾向近侍称：朕自幼至今，凡用鸟枪、弓矢，获虎一百三十五只，熊二十只，豹二十五只，猓猓十只，糜鹿十四只，狼九十六只，野猪一百三十二只，哨获之鹿凡数百，其余围场随便射获诸兽不可胜记。

康熙四十二年，承德避暑山庄建成。这是清代皇帝避暑的行宫和木兰秋狝时驻蹕的行营。木兰秋狝为期二十天，大规模的围猎活动结束后，皇帝便住在避暑山庄，在这里处理朝政、接见王公大臣、各部族首领和外国使节，并在此举行盛大的酒宴和各族喜闻乐见的游乐活动歌舞、摔跤、赛马、跳驼、百戏等。故宫所藏的流传至今的《塞宴四事图》生动地再现了当时塞宴的情景。

清代木兰秋狝的用意有三：一是以武力示威，让有侵略野心的邻邦死了那份非分之想；二是练兵实战，习武尚武；三是驰奔游乐，增强体质。康熙皇帝玄烨曾说，今春颇苦头晕，形渐羸瘦，行围塞外，水土较佳，体气稍健，每日骑射，亦不疲乏。乾隆皇帝弘历也说，夫行围出猎，既以操演技艺，练习劳苦，尤足以奋发人之志气。

康熙皇帝一直重视狩猎，直到六十九岁高龄时，还坚持塞外行围。乾隆皇帝更有过之无不及，二十五岁即皇帝位后，对围猎就乐此不疲，直到八十岁高龄还率军木兰秋狝。乾隆皇帝因过分喜好，以至有的大臣竟上书劝谏，奏请暂停围猎，以免劳命伤财。乾隆皇帝看过奏章后，下旨严厉批驳说：古者搜苗狝狩，因田猎讲武；皇祖（康熙）行围，既裨戎伍，复举政纲，至按历蒙藩，曲加恩义，尤为怀远宏略；况今承平日久，人习宴安，弓马渐不如旧，岂可不加振厉？

侍女争挥玉弹弓

弹是一种历史很悠久的技巧性活动，以其轻巧便捷、富于新鲜感和刺激性，深受历代帝王、宫人们的喜爱。中国古代的弹和今世的弹弓原理一样，是拉满弓后发射丸，击中猎物。史书记载说，春秋战国时期，晋灵公是一位爱好弹射、沉溺弹射的君主，他不仅好弹射鸟雀，更喜好在台上弹人，以看人惊恐奔行，落荒逃窜。晋灵公因此而在历史上留下了恶名，史称：晋灵公不君。

弹人取乐的恶习不仅仅限于恶君之名的晋灵公，三国时的魏主曹芳也喜欢把弹射的目标对准人，而不是鸟雀。曹芳八岁即位，长大成人以后仍不理政事，终日一意游乐，荒淫无度，操弓挟弹，和妃妾在后园游宴。在位十六年后，曹芳终于被大将军司马师坐废，归藩于齐，为齐王。据说，汉武帝的男宠韩嫣也极喜欢玩弹，他常用金丸弹鸟，有时也会伤人。但金丸昂贵，以至到后来，都城长安的百姓不再射避韩嫣的金丸，反而都赶来争抢，于是流传于京师中便有这样一句谚语：苦饥寒，逐金丸。

弹是一种小型的个人娱乐性的狩猎活动，主要是在后苑林木中弹射鸟

雀，这要求射艺要精。弹在古人的眼里当然是微不足道的，不能和六艺之一的射相提并论，因此，皇帝挟弓击弹，游乐内苑，在大臣、学士们看来是一件不伦不类的事，是近乎无聊的一种举动，因而大臣往往会严肃劝谏，希望皇帝不要如此。

有一天，宋太祖赵匡胤在后苑中用弹弓弹雀。恰在这时，有一位大臣号称有急事，闯进了后苑，请求面见皇帝。赵匡胤得悉大臣有急事进奏，便放下弹弓，让他近前禀报，听完以后才知道是一件极为平常的事。赵匡胤有些恼怒，也大为扫兴，便不快地责问说：此事何急？！不料大臣火上浇油：亦急于弹。赵匡胤正在为这等小事扫了弹射的兴而心中不快，听这一说，更是怒火攻心，这不是贬损皇帝和蔑视皇帝吗？是可忍孰不可忍！赵匡胤随手操起一旁的斧子，用斧柄一挥，打在大臣的脸上，顿时鲜血如注，两颗牙齿被打掉。这位臣僚素养极好，临走前还从容不迫地把两颗打落的牙齿捡起，并小心谨慎的包好。牙打掉了是不能再粘上的，当时没有这种技术，可这位大臣何至如此？赵匡胤大惑不解，便质问他。大臣的回答令赵匡胤目瞪口呆，说他要把这捡回去，以两颗牙为证，让史官记下此事。赵匡胤忽然感到了事态的严重，认为以玩弹引起的这件事，咎在自己，如果被史官记下来，便会令人难堪。赵匡胤当即收敛怒容，厚赐该大臣。

有一次，赵匡胤到花蕊夫人房中，发现香气四溢的房中挂了一幅挟弹图，图中正有一位男性贵族，在拉弓击鸟。这位图中的风流男人正是喜好脂粉香陈的前后蜀君主孟昶。花蕊夫人入宋之前曾和蜀主孟昶有过一段醉生梦死、侈华淫逸的生活。入宋以后，花蕊夫人偶尔思念故主，便挂出此图，以慰相思，也借以悼念先主。不料，这一次正好给太祖撞上了。太祖好弹射如命，发现了这幅图，十分好奇，便问画中男子是何许人也？花蕊夫人乖巧过人，撒谎不打一点折扣，诡称：此蜀中张仙神也，祀之能令人有子。挟弹游乐渐渐风行宫中，被宫女、宦官所接受，宫中弹射便日益热闹起来。南朝时，陈宫的宫女们常在春天的树林中娱玩弹弓，以弹射为戏。后蜀花蕊夫人在宫词中也描述了弹射这一活动：回头索取黄金弹，绕树藏身打雀儿。宋学者王珪也写有一首宫词，生动地描述了宫中少女们挟弹游玩的情景：

侍女争挥玉弹弓，金丸飞入乱花中。

一时惊起流莺散，踏落残英满地红。唐代御前侍立的宦官中有的宦官还手持弹弓。唐代后宫中有这样一个不成文的制度，或者说是惯例：皇帝燕游时，宦官在御前击弹开道，以代替鸣鞭。唐玄宗的宠妃杨贵妃游玩御苑时，也曾仿效此法，让宦官以击弹开道。唐人所画的《杨妃上马图》中，便有两位内官挟弹开路，煞是神气。宋代的宫中也保存了这项制度。

明代宫中的宦官机构中专门设有弹子房。弹子房专为皇帝提供弹弓和泥丸。明代宫中的泥丸大小轻重各有等第，以黄布作袋盛装。明代弓的制作采用古制，大多以柘木作为材料。明宫中弹子房设掌房一人、佾书数人。明代皇帝要玩弹射时，掌房太监便应召呈进。

明武宗朱厚照好玩弹射，而且技艺不一般。有首《宫词》便作了生动的描述：

黄旗飘飏凤城开，回鹘新装小队来；

马上高弹白翎雀，十三弦底隐春雷。

明崇祯帝朱由检在政务之暇也喜欢挟弓弹射。弹弓也需要臂力，但弹弓所需的臂力是微不足道的，无法和射箭相比，并且简便、省力。弹弓对于臂

力不足的皇帝来说自然是一种有吸引力的健身游戏。崇祯帝身形单薄，喜欢弹弓，他的弹技并不逊于明武宗。有一次，他在西苑游乐，几发射下两只鸟，一旁的侍从纷纷庆贺恭禧，山呼万岁。

十二、皇帝的癖好

帝王的生活，实际上并没有牢不可破的规则；即使有，也无人予以监督、教训。在整个社会中，尤以皇帝最讨厌循规蹈矩，也最能打破规则，把个性发挥得淋漓尽致。

一个皇帝有一个皇帝的做法，不必先学会了如何做皇帝才来做皇帝，而既已做了皇帝就不必再学如何做皇帝。不过，大部分皇帝做法是近似的：政，总是要听，只是繁简勤惰不同，高明与低劣不尽相同；大的仪式总要参加，在外形上总要象个皇帝样子；后宫总少不了千百个女人。做皇帝的乐趣不在于能够管理国事，而是无人能阻碍他的随心所欲，凡世人能够享受的，皇帝大多要尽其极致，包括任意喜怒。皇帝可以杀无罪之人，可以封无功之将；可以做皇帝的性情、习性与常人不同，加上天资、气质、生理等因素，便生出很多怪癖。不太突出的、无伤大雅的怪癖不会引起史家的注意，也难以传播。因而怪癖的皇帝更显得非同寻常。

辽穆宗的行止可以称得上怪。他不理国事，对于游猎，则无论穷冬盛夏，不废驰骋；夜则酣饮，达旦方寝，日中方起，国人谓之“睡王”。嫔御满前，并不一顾，皇后空守中宫十九年，不纳妃，甚至恶见妇人，近侍、侍奉入寝者皆为宦官。

南北朝宋明帝忌讳特别多，回避的事物、语言有数十种。认为“白”字最刺眼，见屏风上书写的古来名文中有白字，都要改易，用玄、黄、朱、紫替代。

在重农抑商、商人不得衣锦绣、应科举的古代，汉灵帝、南齐东昏侯、明武宗却常常扮成商人、玩做买卖的游戏。汉灵帝在西苑设市，亦曾列肆于后宫，令后宫采女为客舍主人，灵帝身着商贾服，随便走到一舍前，采女为之摆酒食，灵帝召采女共进酒食以为戏乐。在后宫的市肆中，灵帝令采女有的贩卖、有的行窃，双方争斗，灵帝饮宴观赏为乐。患痴呆症的普惠帝曾在西苑卖葵菜、篮子、鸡面之属，被大臣指为亏败国体，贬损令闻。南齐东昏侯在苑中摆开市场，把太官每天早晨供进的酒肉杂肴拿来，令宫女屠酤。宠妃潘氏被任命为市令，东昏侯自命为市魁，买卖中争执者到潘氏面前，由潘氏判决，东昏侯负责执罚。明武宗开设固定、长期的皇店。宝和六店储宫中财物，分别是，一宝和、二和远、三顺宁、四福德、五福吉、六宝延。武宗经常到六店与宦官店主贸易，武宗身着商人衣，头戴瓜拉帽，自宝和至宝延，手持帐簿算盘，与店主大声讨价还价，宦官店主也毫不谦让，后来别立市正，负责调解纠纷。买卖完之后，则拥至廊下家，廊下家是宦官开设的酒家，内中极为热闹，宫女与外间的勾栏女艺人扮作酒妇，或弹弄筝、琴、琵琶，声音嘈杂。武宗坐在人群里饮酒，只见各种打扮的人杂出杂进，一杯茶的工夫，武宗溜跬到廊下，遍睹跳猿、骗马、斗鸡、逐犬各种游戏。酒醉则宿于酒家，有时连续几天乐于其中。

缘旌、担旌是一项危险的杂技，而商朝宋后废帝和齐东昏侯却对此入迷。宋后废帝五、六岁时就喜好缘竿，常常爬到离地一丈多高的旌竿上，达半食之久才下来，东昏侯少时颇有膂力，以担旌为能事。初学担旌时掌握不好平衡，旌竿每每倾倒，有时砸伤脚腕，但无损于他苦练的意志。后来又学担白虎旌，自制杂色锦伎衣，缀以金花玉镜众宝，增加旌竿的姿彩。白虎竿长七丈五尺，手担、肩担精熟后，东昏侯又练习用牙齿担，以牺牲牙齿为代价，

折齿而不倦，真是奇行异能。

东昏侯与明武宗等皇帝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不安于清闲，以练武、整军、骑射为乐事。东昏侯“乌帽豔褶，备羽仪，登南掖门临望。又虚设铠甲斋仗千人，皆张弓拔白，出东掖门，称蒋王出荡。”把闲聊无事的宫女们组为军队，后来又将宦官整军。在虚设的战场上，东昏侯亲自临阵，“战斗中”“受伤”，众人抬舆接护。在阅武堂设军官，每夜严警，东昏侯常在夜间骑马出入宫中；后来叛乱、战争真的出现，东昏侯属下皆不尽力，最后祸起萧墙。

明武帝自称威武大将军，设立“内教场”，以江彬等四人统领“外四家兵”，武宗自统一营，谓之中军。军士们每日早晚操练，武宗监督检校，名为“过锦”。王守仁剿灭朱宸豪叛乱，将朱宸豪押解至南京，武宗命人为其解绑，令其纵马，作为皇帝他要“亲擒”叛首，以享征战立功之乐趣。

皇帝中的能工巧匠往往是政治上的失败者。南朝宋后废帝刘昱，史载“凡诸鄙事，过目则能，锻银、裁衣，莫不精绝。未尝吹篪，执管便韵”。唐僖宗不仅是击麻上的运动健将，“剑槊、法算，至于音律、幽博，无不精妙”。

元顺帝孛儿只斤妥帖睦尔精通木工、机械，京城人称之为“鲁班天子”。元顺帝是位高水平的设计师，他曾设计龙舟式样，舟长一百二十尺，广二十尺，前瓦帘棚、穿廊、两暖阁，后庑殿楼子。龙身并殿宇用五彩金妆，前有两爪，行时龙首、眼、口、爪、尾皆动。顺帝还曾为近侍设计建宅，制出屋样，付匠者为之。又自制微型宫殿，用木条巧妙搭成，高尺余、栋梁楹榱，宛转皆具。元顺帝亲自设计制作的水晶宫漏最能代表他的技艺水平。宫漏高约六、七尺，宽长三尺，“造木为匱，阴藏诸壶其中，运水上下，匱上设四方三圣殿，匱腰立玉女，捧时刻筹，时至辄浮水而上。左右立二金甲神人，一悬钟、

一悬钲，夜则神人自能按更而击，无分毫差。当钟、钲之鸣，狮凤在侧者皆翔舞，匱之东西有日月宫，飞仙六人立宫前，遇子午时飞仙自能耦进，度仙桥，达三圣殿，已而复退立如前。其精巧绝出，人谓前代所鲜有”。这种巧夺天工的宫漏，元顺帝做过不只一个，元亡后，明司天监长官进献给朱元璋一座元顺帝所制的水晶宫漏，朱元璋过目后，对侍臣说：“废万机之务而用心于此，所谓作无益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何至灭亡？”命人砸碎之。

明熹宗天启皇帝，集上述皇帝的偏好与禀赋于一身。明熹宗不好女色，夜宴结束后，又兴致盎然地欣赏杂戏，霄分（子夜）始就枕。有时夜间兴奋，在灯下舞刀。上树掏鸟巢，曾失足堕地，裂裳破面；又曾于太液池上摇浆，风起船翻，险些溺死。在宦官的唆使下，熹宗常以残杀猎物为乐，有时照例视察太学，大臣还未赐茶就匆匆回宫，到十库后打猎，抓住狐兔后，挥刀使其身首异处，而眼睛尚在转动，众宦官称贺欢笑。玩弹弓、放马铳，也是天启皇帝的乐事，近侍宦官也常常手持马铳习射，一次暖殿（宦官职名）王进在御前放铳，铳身被高温烧断，落下，打落其左手，熹宗险些遇难。

“龙凤旌旗左右分，广场排列阵如云”。宫中的广场有时会变成演兵场，天启皇帝要与皇后同御同操，天启统率宦官三百人，旗帜绘龙，列左；皇后统率宫女三百人，旗帜绘凤，列右，张皇后秀慧沉静，变成操练场上的女将实非其所愿，不得已勉为其难。有一次她姗姗来迟，称病，熹宗很是不快，不多时她又先告辞回去了。熹宗没能被皇后扫了兴致，仍旧欢笑如初，命宫

女中丰硕者代替皇后，一个宫女难以服众，索性选出三名宫女共为统率。宫女、宦官们各持战具，在操场上来回奔跑。

天启皇帝最拿手的是木工和机械，可与元顺帝论短长。他对水傀儡戏有所创造、设计用方铜池，长、宽各三丈，贮水浮竹板，板上立各色傀儡。池侧设有一帐，钟鼓司的习艺宦官隐身帐内，引动傀儡机关，傀儡便活动起来。后场有鸣锣鼓者，代傀儡道白者。当时常演的傀儡戏有“东方朔偷桃”、“三宝太监下西洋”等。

铜缸水戏在当时可称为奇技，可见天启皇帝之聪明绝顶。他在盛水的铜缸（或大木桶）下，凿孔设置机关，用机关操纵，缸中的水或泻如瀑布、或散若飞雪、最后则亭亭直上如玉柱，类似今日的人工喷泉。有时从下面涌上一只圆木球，核桃大小，在水尖上，随水的运动而高下跳荡，久而不堕，宫女们欢笑惊叹：

御前呼笑不胜喧，惟看君王弄水盘。

瀑布喷残飞雪霁，玉竿高处拥金丸。

耗费朱由校最多精力的是木工，好造漆器、砚床、梳匣等精巧器具，尤在雕刻上见工夫，作品施以五彩，精致妙丽，出人意表。在做工上，他对自己要求极严，制成一件作品后，先是欣喜，后又不满意，弃之，再做，毫不厌倦。有时宦官拿着急切章疏来呈奏，却见皇帝正得意地“工作”，天启不愿让烦人的政事打断他的“工作”，便令识字女官朗诵奏疏上的官职、姓名和大学士所拟的批语，然后对送奏疏来的秉笔太监王体乾说：“我都知道了，你们用心行去”。由此，皇帝裁决政事的笔便拿到了弄权的宦官手中。

明熹宗做了那么多精美的器物，他自己并不知道有何用途，只是一味地做。有时他让宦官拿到市上去卖，其实他并不缺钱，也不象万历皇帝那样贪财，只是给作品找个去处。既然卖，自然不能太便宜，他的护灯小屏八幅和雕刻的“寒雀争梅戏”，让小太监出去卖，叮嘱他，御制之物，价须一万。第二天，小太监如数把钱呈上，熹宗大悦。

熹宗死后，崇祯以异母弟身份入继大统，见到先皇留下的一座沉香假山，上面池台林馆悉具，灯屏、香几精美依旧。崇祯低声说：

“亦一时精神所寄也”。

倡优在古代一贯受到鄙视，有些皇帝却在后宫以演戏为乐事。这种戏分为两个层次，宫中秘戏不可为外人道也，不能归作文艺项目。西汉的周仁因病而成为宦官，得以参加后宫秘戏；北宋的佞臣蔡攸、王黼曾参与过宫中秘戏，或侍曲宴，身着短衫窄裤，面部涂青抹红，杂倡优侏儒，道市井淫物谑浪语。层次稍高的戏有艺术成份，但皇帝主要当作游戏为之。后唐庄宗李存勖是个最好演戏的皇帝，他艺名“李天下”，演戏的爱好在幼年形成，称帝后更能尽情演戏。他的戏多是自编自演，乐在能够装成各色人物。皇后刘氏与父亲失散多年，其父刘山人身份低贱，到宫门前认女，而刘皇后拒不认父。后来庄宗以此为题材，戏弄皇后，他穿着一身破旧衣服，背负药囊、药笈（刘父为卖药人），让儿子提着破帽随其后。刘皇后正在午睡，庄宗径直来到她卧房，说：“刘山人来省女！”刘皇后猛醒、惊愕，然后大怒，打了儿子。

宋徽宗与蔡攸等人在内廷学俳优们演戏，有一次他们演参军戏，徽宗扮演参军，疾步走出，蔡攸戏语道：“陛下好个神宗皇帝！”徽宗找来一根棍杖予以回击，回敬蔡攸：“你也好个司马丞相！”看来这未必是预先编好的内容，徽宗闲逸风流，时时作戏，又时时弄假成真，与他的书、画修养相比，

显得荒诞不经。

辽兴宗耶律宗真常常夜间酣饮，有时加入到伶人乐队中自娱自乐。一次，他兴致高昂，入乐队弹奏，命后、妃们换上女道士衣服，在席上表演。皇后父亲萧磨只觉得很丢面子，说：汉番百官都在场，让后妃演戏，不太合适！辽兴宗当即给了岳父一耳光，说：我都上场了，你算什么！

清代道光、同治都曾演过片断戏，据说都与孝道有关。道光皇帝为了娱悦生母，在母后生日时，演斑衣戏彩一阙，挂白须、衣斑连衣，手持鼗鼓作孺子戏舞状，对着母后唱老莱子那一段，剧情采自老莱子作孺子憨态博父母欢悦的故事。同治演戏也是为了其母，慈禧嗜好观戏，尤好淫剧，同治帝随着年龄增长，深以为耻，但又难以阻止母后点淫戏。一天，慈禧又点“翠屏山”，同治闻之，便到后台化妆扮演石秀，开演之后，石秀的戏被他草草了结，戏词削减大半，而潘巧云的戏也不得不潦草完成，又一日，慈禧又点了出“双摇会”，

同治扮戏中劝架之邻居，戏词是他有意加上的：“你我两家邻居，相处多年，你家大爷年纪也不小了，家庭里若是这样常常闹笑话，闹个不了，非但不成体统，也未免太不给年轻的人留地步了！”慈禧在台下听得难受，却不便发作。其实，同治皇帝若无演戏的爱好，是不敢临时赶场的，既有演戏的爱好，就不会只为其母而演。野史上说，同治好演戏却不能合关目，每演必扮戏中无足重要之人。一日演打灶，载徵（恭亲王奕訢长子）扮小叔，某妃扮李三嫂，而同治皇帝则扮灶君，身着黑袍，手执木板，为李三嫂一骂一击以为乐。

皇帝历经的乐事多了，总想发现、尝试新的乐事。有的以伤人为乐、杀人为乐、观人丑态为乐，例如唐敬宗李湛喜欢观赏激烈的角抵，以伤人为乐，或夜里出外自捕狐狸，谓之“打夜狸”。北齐文宣帝高洋正为找不到新的乐事而烦恼，逢其弟高淖入朝，高洋问：以什么为乐？高淖说：捉蝎子最乐。高洋立即实践，一夜就收集蝎子五斗，放置在一个大浴斛中，将一无辜者脱衣投入浴斛。那人周身爬满了密集的蝎子，痛苦至极！哀号宛转，徒劳挣扎。高洋观赏了人被蝎子螫死的过程，后来飞书给高淖说：有这样的快活事，怎不早说？

第十一章 皇宫节令风俗

一、岁首吉庆活动

宫中习俗，展示的是后宫作为一个大家庭、小社会的风俗活动。帝王宫廷是以特殊的家庭形式，存在于社会的顶层。社会上的各种习俗，即民俗、民族风尚，在宫中也有保持的必要，事实上构成宫中习俗的主要内容。

皇帝居于家和国之上。每逢重要年节，皇帝要以家、国之主的身份，代表人间的当政者，恭祀天、地、祖先等各种神灵。皇帝从事的这些只有皇帝才具资格完成的活动，无疑是反复证明他的唯一性、神圣性。这些活动被编入国家的典章制度，列为皇帝最重要的政事。这似不能归入帝王宫廷（后宫）生活的内容，不过对皇帝来说，家事国事统而御之，并无严格的区分。朝廷的各种年节规则、定例，也被典制所容纳，皇帝以至宦官、宫女都不能怠慢。所以，宫中习俗又与民俗不同，自成一统。

夏历正月初一，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这一天是岁之首、时之首、月之首，无论贫富贵贱都要以最隆重的方式贺岁。

宫中岁首朝贺，起自于汉高祖，是日举行君臣大朝会，行礼作乐，并筵请外藩使节。元正大会的仪式在外朝的正殿举行，皇帝身着衮冕，郑重出席仪式。届时，设仪仗，备太常雅乐，百官在御前列队（北宋俗称“排正仗”），太子、王公、宰相代表百官向皇帝贺岁、执酒上寿，诸国使臣献礼朝贺。然后赐宴，上演乐舞、百戏。

明代大朝会的仪式规定为：“先一日，尚宝司设宝案于座之东，鸿胪寺设表案于殿东中门外，主客司设外藩贡方物案于丹陛左右，钦天监设定时鼓于文楼上，教坊司设中和韶乐于殿内东西，设大乐于皇极门内东西，俱北向。至期，锦衣卫陈鹵簿仪仗于丹陛丹墀东西，设羽扇于殿内东西，陈车辂步辇于皇极门丹墀中道，北向。金吾等卫列甲士军仗于皇极门外、午门外丹墀东西，旗手卫设金鼓于午门、皇极门外，御马监设仗马，锦衣卫设驯象于文武楼南，东西相向。钦天监设报时位于丹陛之东。鼓初严（天未明，四刻捶一鼓为一严），百官朝服列班午门外。鼓次严，百官次第由左右掖门入，谐丹墀序立，鸣鞭卷帘。鼓三严，导驾官前导，尚宝司捧宝前行，乐作，奏‘飞龙引’之曲，上衮冕升座。外赞排班，班齐鞠躬。大乐作，奏‘风云会’之曲，再奏‘庆皇都’之乐，三奏‘喜升平’之乐。赞搯笏鞠躬舞蹈，赞跪唱山呼，赞出笏，俯伏四拜兴。礼毕鸣鞭，奏‘贺圣明’之乐，驾兴。尚宝司捧宝，导驾官前导至中和殿，驾还宫。”

在出席大朝会之前，皇帝先在明堂和祖庙祭告。例如清代元旦一早，皇帝到堂子（祭祖之所）行礼，然后出席大朝会。外廷仪式结束后，回内廷，接受皇后率领嫔妃行礼、皇子皇孙行礼。

清雍正始行元旦明窗开笔之典。元旦的子夜在养心殿（寝殿），开笔濡染翰墨，先用硃笔书字，再提墨笔，书吉语，以祈一岁之政和事理。乾隆每年元旦，例行抄写《心经》一册。

明宫内，正月初一五更，穿着葫芦景补子和蟒衣的宫眷、宦官们焚香放炮。这一日内廷跳荡着一片欣喜气氛，人们将门闩或木槓向空中抛掷，以三次为度，称为“跌千金”。与民间一样，互相拜祝，贺新年。食物丰盛而特殊，饮椒栢酒，吃水点心，叫做吃“扁食”，其实就是水饺。扁食中暗包银钱一、二于内，吃到的人便会认为一年吉利。食物还有百果，“百事大吉盒儿”中装着柿饼、荔枝、圆眼、栗子、熟枣。还有吃驴肉之习，用小盒装

驴肉，民间俗称驴为鬼，宫中也是同样，于是吃驴肉就叫做“嚼鬼”。

清代沿自关外的习俗，在元旦当日，皇帝与外藩王、贝勒、辅臣、六部正卿吃祭神肉，又称跳神肉。肉中以髀体为贵，皇帝用御刀切割肉骨，然后自奉。王和大臣们分别吃各自盘上的肉。元旦的例餐水饺，清宫叫“煮饽饽”，饽饽中也有包藏银镮的，皇帝御膳中的饽饽，碗面上的一、两个便是此馅，皇帝自然会吃到，以此为喜。元旦的团圆饼是清宫的特色，饼以淀粉制作，内裹肉馅。有时皇帝以团圆饼赏赐大臣，以示恩宠。

立春，在元旦的稍前或稍后时，是为古人的春节。春天将万物生发，阳气上升，一片绿色，所以在立春来临时，有迎春、迎气的习俗。东汉时，迎春的使者打着青幡，头裹青帻，到东郊迎春。在此之前先把一位童男装扮成春天的象征，一身青色衣，青巾罩头，藏于东郊外的田野中。迎春使者至，童男在田野中出现，使者拜之，把“春天”带回。明代宫中派出的迎春使者，到东直门外迎春。汉、唐时，皇帝要亲自前往东郊迎气，祭祀青帝。清代皇帝在宫中延庆殿九叩迎春，为民祈福。

以农业为民生之本的古代中国，立春一到，就要准备春耕。在立春时节，京城的地方官要向朝廷进献春牛，以示劝农。例如北宋由开封府造进大春牛，南宋由临安府造进，明清由顺天府造进。春牛用土制成，又称土牛。在内廷，宦官用五色丝彩杖鞭牛（宋代）或由进献春牛的顺天府尹击牛（明清），民间这种仪式叫做“打春”。明清进春牛的同时还要进春山（明代称春花），春山用金银珠翠等物制成。

宋代，立春日皇帝赐给京官和仆从各色幡胜，幡胜是用金银箔罗作成的彩色装饰物，唐宋时盛行。宫中的风俗食品是春盘，上盛烹豚、白熟饼、大环饼及糖果，以生菜萝卜为装饰。明代立春日，皇帝于午门赐百官食春饼，春饼即簿饼，夹菜肴卷成筒状而食。宫中除吃春饼外，以“咬春”为名吃萝卜。

中国古代以男耕女织为社会分工，深居皇宫中的帝、后每年都要象征性地耕田、采桑，在大礼中称为藉田礼、亲蚕礼。

耕藉在孟春时节举行，皇帝在三公、诸王、尚书等大员的陪同下，来到祀先农之所。庄重地祭祀先农之后，皇帝按照繁密的礼仪规定，站到耕位上，面向南。侍中从司农卿手中接过耒耜，奉进给皇帝。皇帝抓耒，耕三推，侍中再接过耒耜，交司农卿收回。陪同仪式的三公诸王耕五推，尚书、卿耕九推，以符古礼。然而皇帝为了显示谕凉农耕之辛苦，常常逾礼多耕，如唐玄宗就曾一直耕完一垅。

皇后于季春时节举行亲蚕礼。在此之前，先行斋戒，陪同亲蚕的有命妇、嫔妃、公主等。亲蚕地点在后苑或宫外的先蚕坛，清代的先蚕坛在西苑之东北隅。皇后先按照复杂细密的规则祭祀先蚕氏。之后，在女官的引导下来到采桑处，从女官手中接过钩，按规定采下三条桑叶，另有女官拿着筐接住皇后采下的桑叶。皇后采完，把钩交还女官，命妇、嫔妃等开始采。皇后采下的桑叶被拿到蚕室，由负责养蚕的妇女饲蚕，有时皇后亲自饲蚕。在“礼毕”声中，皇后返回。

二、上元灯火

正月十五日是古代的上元节，亦称灯节。

千门开锁万灯明，正月月中旬动帝京。

三百内人连袖舞，一时天上著词声。

元宵赏灯始于汉祠太乙。西汉朝廷在正月望日（十五日）祀太乙神，祭祀过程从当日天黑到第二日天明，灯火燃一整夜，此后形成正月望日夜游观灯的习俗。然而，在上元节以灯为主要形式庆元宵，唐以前并不常见。

以前，除了张灯歌舞宴乐外，此日还有登高之习，北方朝廷较重视。石虎在邺都曾设正月十五日登高之会。隋文帝常在此日与近臣登高。有次登高时，文帝发觉元宵没有跟随，派人驰马召来。见到元宵，文帝说：“公与外人登高，未若就朕也”。登高后，赐宴欢饮。

在北朝登高的同时，南朝张灯庆元宵之风渐盛。隋时，民间正月十五日夜欢闹通宵，鸣鼓聒天，燎炬照地，人带兽面，男为女服，竭资破产，竞此一时。

唐朝开始，京城正月十五日前后三夜解除夜行之禁，于是寺观街巷，灯明若画，山棚高百余尺，神龙（唐中宗年号）以后复加严饰。士女无不夜游，车马塞路，有足不蹶地浮行数十步者。唐代以宫廷为引导的上元灯火极盛。唐玄宗曾在东都洛阳上阳宫，大陈影灯，设庭燎，自禁中至于殿庭，皆设蜡炬，连属不绝。巧匠毛顺，做缯彩灯楼三十间，高一百五十尺，悬珠玉金银，微风一至，锵然成韵。灯呈龙凤虎豹腾跃之状，时人惊叹非人力所能为。早在登基的第二年，唐玄宗意气高扬，在正月十五、十六、十七日三夜，于京城安福门外设置高二十丈的灯轮，灯轮披挂锦绮，饰以金银，错杂五万盏灯，灯轮如万花开放的巨树。宫女上千人，衣罗绮，曳锦绣，耀珠翠，施香粉，又从长安、万年两县少女、少妇中挑选千余人，在灯轮下踏歌，三夜纵欢，这是古人少见的狂欢场景。为装点这盛大的场面，唐廷耗费巨费，一花冠，一中帔，价值万钱，场中每一个女艺人的装费就达三百贯，民间少女少妇的衣服、花钗、媚子也都由朝廷支出。

宋代上元观灯成为固定习俗，前后五日城中张灯，皇宫正门结彩为山楼影灯，设置路、台，教坊陈百戏。徽宗在位时，元宵之盛在北宋空前。正月初，彩山已经搭好，灯光与彩丝相配，金碧交射。宫门前设三大牌坊，彩结为饰，金书大牌，中间是“都门道”，左右是“左右禁卫之门”，最上面的大牌上写着“宣和与民同乐”。彩山之脊上画着神仙故事。山的左右是传神的文殊、普贤跨狮子、白象，每位的指或爪各涌出五条水道，而且还不停地摇动。灯山的高处有一水箱，用辘轳绞水上去，贮于箱内，水从上喷下，如同瀑布，又构成一景。用草编成的戏龙卧于左右门上，用青幕遮笼，草上密置灯烛数万盏，望之宛如双龙飞走。自灯山至宣德门楼前面的大街，约百余丈的地方，有一个用棘刺围起来的演出场所，内设两长竿，高数十丈，以绘彩结扎，各种纸糊的百戏人物悬于竿上，随风摇动，宛若飞仙。一旁的乐棚内，由官府乐人作乐、演杂戏，左右军也在这里演百戏。

宣德楼上、黄缘帘后，徽宗皇帝坐在御座上观赏盛景。帘外有黄罗搭成的彩棚，侍卫官执黄盖掌扇。两旁的朵楼上各挂灯球一枚，直径接近一丈，内燃椽烛。帘内，乐声与宫嫔的嬉笑之声此起彼伏，飘于楼外。楼下用枋木垒成露台一座，彩结栏槛，台上演戏，两边站列着身着锦袍的禁卫，个个头

簪上插着皇帝赏赐的花。露台面对着乐棚，露台弟子与教坊钧容直艺员，竞演杂剧。露台下面是争睹盛会的百姓，乐人们不时率导百姓山呼万岁，如此更添一景，宣德楼上的徽宗皇帝能不喜上眉梢？

上元设灯，宋代由三日扩为五日，到十八日夜方收灯。传说是因吴越王钱俶来朝，献土纳钱，以买后两夜。此说不无道理，吴越王为求自保，常向宋廷贡进财物，这笔收入，宋廷自然愿意用在节庆上，加上为昭示天下承平，扩展两夜灯会顺情顺理。

迁至临安的南宋朝廷，一进入新年灯火就日盛一日。由宦官机构置办的内廷灯盏，竞出新意，年年不同。专为陈灯立起的鳌山，灯品极多，其中以“苏灯”最具风采。灯中，圈片大者直径三、四尺，用五色琉璃为框架，其上有山水人物、花竹鸟雀，奇巧动人。后来福州进献的白玉灯更奇，灯围全用白玉，光耀夺目，如清冰玉壶，爽彻心目。之后，新安又献上“无骨灯”，整个结构形同玻璃球，其实是用粟为原料烧成的。

上元节的奇巧之物层出不穷。宫中制作的琉璃灯山，“其高五丈，人物皆用机关活动，结大彩楼贮之。又于殿堂梁栋窗户间为涌壁，作为诸色故事，龙凤喷水，蜿蜒如生，遂为诸灯之冠。前后设玉栅帘，宝光花影，不可正视。仙韶内人，选奏新曲，声闻人间。殿上铺连五色琉璃阁，皆球文戏龙百花。小窗间垂小水晶帘，流苏宝带，交映璀璨。中设御座，恍然如在广寒清虚府中也。

上元夜间二鼓，皇帝乘小辇，到宣德门观鳌山。为使皇帝便于观赏，擎辇的内官们要倒行。这一夜，宫中五色荧煌炫目，天空也被映得发红。鳌山上的灯千百种，精巧奇特，无所不有。鳌山正中以五色玉栅簇成“皇帝万岁”四个大字。上面是伶官奏乐，称念口号、致语；下面是露台，百艺群工，竞呈奇技。教坊女艺人和宦官百余人，皆巾裹翠蛾，仿街坊流行的清乐和傀儡戏，在灯月下弹奏、舞弄。他们的表演比不上街市中的名艺人，有时皇帝下旨，宣唤市井舞队，在此之前临安府尹已经做好了准备，挑选貌美和善歌者在宫外谨候。

欢腾的气氛延至深夜，最后一个节目是燃放烟火，百余架烟火隆响，乐声四起，皇帝在烛影纵横中起驾，还于内寝。而宫外市井上的歌舞喧闹仍未止息。

明代，朝廷明令允许民间自正月十一日至二十日，放灯十夜。明宫每逢上元节，宫女、宦官皆穿灯景补子蟒衣，宫中张灯，有牌坊灯和鳌山灯。节前，宫女和宦官们在乾清宫丹陛上安放牌坊灯，在寿皇殿安放方圆鳌山灯。牌坊多至七层，鳌山至十三层。这一夜，皇帝于午门赐大臣观灯，“九门灯火云霄上，午夜山河锦绣前”。在鳌山之顶，点放神器三具，待“霹雳一声开夜色，九重星斗九重天”。

宫中燃放烟火之事，由钟鼓司太监负责，自岁暮二十四日起至正月十七日止，每晚在乾清宫丹陛下扎烟火，种类有“寿带”、“葡萄架”、“珍珠帘”、“长明塔”等。

清代正月十五的烟火最盛，燃放烟火之地常在圆明园。圆明园的“山高水长”是皇帝与王公大臣、外藩观赏烟火之所，其地处园西，俗称“西厂”，地势开阔，宜陈火戏。皇帝在筵宴上先观赏摔跤、玩艺（杂技）、外藩音乐、歌曲之后，再放花盆。侍卫将左右柱上所系盒子线焯火引之，于是金蛇电掣，倏忽间至十余丈外，火焰如鹤翅翻飞，而且色彩斑斓。烟火盒子有大小方圆

多种，上绘人物花鸟。诸侍卫手执花筒，络绎点放。最后一盒烟火叫做“万国乐春台”，俗称“炮打襄阳城”，每一年都由这盒烟火压轴，方法是“沿河编花篱，遍置花炮，星火乍然，万响齐发。”然后圣驾还宫。

舞灯，是清宫庆元宵的一个精彩节目。舞灯又叫转龙灯，表演者一人持一竿，竿上再横一短竿，横竿两头各系一红灯，舞灯的队伍盘旋行走，参差高下，如龙之宛转，康熙年间曾在元夜大放灯火，地点选在南海子（南苑），令臣民纵观于行殿外。康熙皇帝与诸王大臣饮酒观灯，出场的是宫女五十人，虹裳霓衣，覆以杂彩，人担两灯，各据方位，高低盘舞，若星斗撒在夜空，如珠光闪烁海面。乾隆时圆明园的灯舞结合传统的宫廷字舞，规模更大、更具观赏性。三千人列队舞灯，口唱太平歌，各执彩灯，循环进止，各依其程序，忽而三千人排成一“太”字，再转成“平”字，忽又形成“万”字、“岁”字。

康熙皇帝和王公大臣以及周围聚观的民众，欣赏完灯舞，继而聆睹火药的壮美：“火发于筒，以五为耦，耦具五花，抡升递进。乃举巨炮三，火线层层，由下而上。其四箱套数，若珠帘焰塔，葡萄蜂蝶，雷车电鞭，川奔轴裂，不一而足。又既则九石之灯，藏小灯万，一声迸散，万灯齐明，流苏葩瑤（花形的装饰品），纷纶四垂。箱中鼓吹并起，箏鞞鼙箫，次第作响，火械所及，节奏随之。霹雳数声，烟飞云散。最后一箱，有四小儿从火中相搏堕地，炮声连发别有四儿花翎，杖鼓拍板，作秧歌小队，穿星戴焰，破箱而出。”康熙皇帝通晓科技原理，不知上述烟火是否出自他的设想。

明清宫中与民间同样以浮圆子为上元之夜的特定食物，遂称“元宵”。这一时节，宫中好尚的珍味食物自然不止是元宵，刘若愚在《酌中志》上，对明宫中上元节的各种食品作了介绍：“斯时所尚珍味，则冬笋、银鱼、鸽蛋、麻辣活兔；塞外之黄鼠，半翅鹌鹑；江南之密柑、凤尾桔、漳州桔、橄榄、小金桔、风菱、脆藕；西山之苹果、软子石榴之属；冰下活虾之类，不可胜计。本地则烧鹅鸡鸭、烧猪肉、冷片羊尾、爆炒羊肚、猪灌肠、大小套肠、带油腰子、羊双肠、猪臀肉、黄颡管耳、脆团子、烧笋鹅鸡、醃醃鹅鸡、煤鱼、柳蒸煎火蟹煤鱼、煤铁脚雀、卤煮鹌鹑、鸡醃汤、米烂汤、八宝攒汤、羊肉猪肉包、枣泥卷、糊油蒸饼、乳饼、奶皮、烩羊头、糟腌猪蹄尾耳舌、鹅肫掌。素蔬则滇南之鸡枞；五台之天花羊肚菜、鸡腿银盘等蕨菇；东海之石花海白菜、龙须、海带、鹿角、紫菜；江南蒿笋、糟笋、香菌；辽东之松子；蓟北之黄花、金针；都中之山药、土豆，南都之苔菜；武当之莺嘴笋、黄精、黑精；北山之棒、栗、梨、枣、核桃、黄连茶、木兰芽、蕨菜、蔓青，不可胜计也……凡遇雪，则暖室赏梅，吃炙羊肉、羊肉包、浑酒、牛乳、乳皮、乳窝卷蒸用之。”

元夕，清皇室大多举行家宴，观传统乐舞，回顾王业的艰难；观太平万岁宫舞，畅享升平富贵。康熙皇帝五十七岁那年，在元夕家宴上，躬亲起舞，为七旬的皇太后举杯祝福，被内外传为天家盛事。

三、中和节花朝日

二月一日中和节，始自唐朝，李泌请朝廷以二月朔为中和节：赏赐民间以囊盛百果、谷、瓜、李的种子，相互遗送，称为“献生子”；皇帝在宫中接受百官进献的农书，以示务本。从此中和节成为宫中和民间的节日，并延续下来。宋代，皇帝完成接受农书的仪式后，到后廷与后妃、皇子、公主们饮宴、戏乐。宫女们则在殿外玩斗百草的游戏。

明代的这个节日，宫中的习俗与民间同样，用黍面枣糕，以油煎之；或用稀面摊为煎饼，名曰“薰虫”；食河豚，饮芦芽汤以解热；煮过夏之酒；食鲈（腌鱼、糟鱼之类），名曰“桃花酢”。

清代又称中和节为太阳节。北宋街市上到处叫卖太阳糕。太阳糕是用江米做成圆饼状，有的五枚一层，上面立着一只寸大的小鸡；有的上面印着金乌圆光，民间用太阳糕祭日。祭日祭月本是国之大典，只有皇帝才能主持，士民不得擅祭，平民百姓祭日不过是用太阳糕感谢阳光普照之恩，与皇帝祭日不存冲突，因而被许可。

宫中逢太阳节，每年必设太阳供。照例在供前念斋意，供设地点为宫内的养心殿或南海的涵元殿。习艺太监在太阳供前奏乐。

二月十五日相传为花神的诞日，时值百花争春，此日便是花朝节。清宫对此节尤为喜好，因二月十五日又是太上老君的诞日，故花朝移到十二日。是日，剪黄、红绸条，宽二寸、长三尺，系于宫内各树上。皇帝、皇后在圆明园花神庙拈香，南府的习艺宦官在船台演戏，承应的戏目是“花台啸侣”、“百花献舞”。皇太后也在这一天到圆明园的同乐园听戏，南府的宦官们要准备上演“万卉呈祥”、“山门”、“打番”、“赶车”、“飞虎山”、“卖兴”、“刺汤”、“叩当”、“万花献寿”。

四、清明节三月三

冬至以后的第一百零五日 是寒食节，寒食后两日是为清明。为纪念春秋时人介子推，人们相约在介子推被烧死的那一日家家不得动炊火，只能吃冷食。后相沿成为风俗，民间执行得尤其严格，介子推的家乡太原形成了连续一个月寒食的风俗。北魏武帝曾为此下达禁令：“闻太原、上党、西河、雁门冬至后百五日，皆绝火寒食，云为介子推。旦子胥沉江未有绝水之事，今北方冷寒之地，老少羸弱，患将不堪。令到，人不得寒食。若犯者，家长半岁刑，主吏百日刑，令长夺一月俸”。看来皇帝对寒食不感兴趣，也未闻宫中有执行寒食的方法。

唐玄宗开元年间，敕令寒食扫墓。这一条在礼经上并无根据，但却沿习下来，衍成风俗。寒食前后的三日，百姓皆出城上坟。

不论寒食是否断炊，在宫中，寒食节之后清明例有取火之举。唐宋皇帝于清明日赐新火，是用游戏的形式。唐代集尚食内园官小儿于殿前，用榆木钻火，先钻出火者，进献给皇帝，同时得到三匹绢、金碗一口的厚赐。该日，京城民众聚观于宫门外。宋代皇帝清明日赐臣僚巨烛。命小宦官用榆木钻火，先得火者，得到与唐代同样的赏赐。

清明节，北宋的诸军禁卫排成马队，跨马、作乐、出城，旗旌鲜明，军容雄壮，人马精锐，此举叫做“摔脚”。祭陵的队伍另外悄悄出宫。

寒食清明，宫中一片嬉乐场景，唐代有拔河、斗鸡、荡秋千等项目。荡秋千是宫女的专项，且在清明期间最为盛行，明宫径称清明节为秋千节。紫禁城的坤宁宫及各宫，清明时各竖起秋千一架，到立夏前一日才卸下来。宫女们自有戏秋千的服装，金绣衣襦，香囊结带，头插柳枝，双双相向而荡，绮罗飘舞，彩带交飞。“未许人间轻比拟，壶中游戏半仙娥”（乾隆诗）。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三月三上旬巳日，官民都要到水边洗濯，象征洗去一年的尘垢和久病。魏晋以后改为三月三日。

三月三日与水密切相关，宋代每年逢此节都要开金明池、金水河。唐宋以来，赐宴曲江，曲水流觞为三月三日的君臣佳会。关于这一习俗的形成，有多种说法，晋武帝司马炎曾问尚书郎挚虞：“三日曲水，其义何指？”挚虞解释说：“汉章帝时，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一邨以为怪，乃相携之水滨，盥洗，遂因水的泛觞。曲水之义起于此。”司马炎说：“若如所谈，便非佳事。”尚书郎束皙更发高见：“仲治小生，不足以知此。臣请说其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诗云：羽觞随波。又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见有金人出，捧水心剑曰：‘令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诸侯，乃因此处立为曲水祠。二汉相缘，皆为盛集。”司马炎对此说极为满意，一声“善！”的感叹之后，赐束皙五十斤金，降挚虞为阳城令。王右军的《兰亭序》云“暮春之初……修禊事也”。就指三月三日的活动，修禊也是指水边除凶去垢，因此《兰亭序》又称《禊帖》。

汉以至清，皇帝都要在宫苑主持曲水流觞。汉唐时，皇帝也常出宫到郊外的水边祓禊，例如汉武帝某年三月三日，祓于灞水之滨，回宫时路过平阳公主家，在饮宴时看上了歌女卫子夫。唐诗人王维曾侍从皇帝祓契并侍宴曲江，诗中道：

万乘亲斋祭，千官喜豫游。
奉迎从上苑，祓禊向中流。

又有“君王来祓禊，灞浐亦朝宗”之句。后来祓禊成为三月三日曲宴之前的一种仪式，曲水流觞之宴代代流传。曲江宴上，君臣常即席联诗，是为雅戏。

这个祈求吉祥的日子正适合安排吉祥的事情。唐代宫女例行于这一日，在兴庆宫大同殿前与骨肉相见，与家人相互询问、安慰，互送物品。唐代皇帝在此日赐给侍臣细柳圈，据说携带它可以免蚕（蝎子）毒。

五、花节端午

三、四月间，宫中百花盛开，赏花的美事不可或缺。在一年之中最令人流连的春季里，赏花没有定日。唐穆宗对鲜花非常爱怜，每当宫中花开，便命人搭设重顶帐，为其遮蔽风雨，特置惜春御史，负责守护百花。位于临安的南宋宫廷，花的品种极多而且花期长，皇帝赏花之前，宫廷花匠们为苑中花木妆点一新。在景点上设锦帘绡幕，上缀飞梭绣球，下铺茵褥，其间器玩盆窠，珍禽异物，各务奇丽。小宦官到市肆勒索性地购买珠翠冠朵，篔簹环绣缎，画领花扇，官窑定器，孩儿戏具，闹竿龙船等以及水果食品类。上述只是皇帝赏花时的辅助物品，而花苑则被装点成西湖景致。皇帝先在梅亭赏梅花，芳春亭赏杏花，桃源观桃花；再到聚锦堂赏金林檎，照妆亭赏海棠，兰亭修禊；最后到钟美堂饱览群芳。堂前三面，皆以花石为台三层，各植名品，标以象牌，覆以碧幕。台后分植玉绣球数百株，花如镂玉。钟美堂内左右各有三层花架，雕花彩槛，护以彩色牡丹画衣。架上列碾玉水晶金壶及大食玻璃官窑等瓶，插着花中的珍品，有姚魏、御衣黄、照殿红等近千朵。在堂中的四面，摆设着千百棵植在大斛中的异花，斛面贴以银箔。此堂的梁栋窗户间，亦以湘筒贮花，鳞次簇插，如万朵艳翅。皇帝在花海中，天颜悦怿，赐给随行的妃嫔、内官及伶官各色物品，叫做“随花赏”。到春暮，皇帝在稽古堂、会瀛堂赏琼花，静侣亭、紫笑净香亭采兰挑笋，则春事已在绿阴芳草间矣。

明代，宫眷们在三、四月间穿着罗衣，到观花殿赏牡丹，牡丹花圃上架着彩棚。牡丹盛开后，芍药又在延赏之中。明宫中的珍奇花卉在冬天存于窖内，二月开窖放风，三月搬到室外，装点于园圃、亭榭。

明宫四月尝樱桃，以为此岁诸果新味之始。吃笋鸡、白煮猪肉，有“冬不白煮，夏不爇（炼熬）”之说。又用各种肥肉、姜、葱、蒜剉如豆大，拌饭，以莴苣大叶裹食之，名曰“四胞儿饭”。尝一岁五谷新味之始，以食“捻转”为象征，“捻转”是用刚结出的麦穗煮熟去芒壳，磨成的条。

四月八日是释迦佛的生日。唐宋时，民间有浴佛斋会，人们煎香药糖水互赠，名为浴佛水，寺中举行浴佛仪式——以水灌佛像。明清时四月八日俗称结缘日，京城人用青黄豆数升，煮熟后邀路人食之，以为结缘。

清代宫中每年，将大内所备的红蜜及诸王所备之蜜，贮黄瓷浴漱内，以净水搅匀，将宫中的佛请到浴池内。浴后，以新棉垫座，安奉亭中，还于原位。是日，皇帝在圆明园观戏。

端午节古代又称天中节、浴兰令节。《大戴礼》上说：“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人们在此日以兰汤沐浴，“浴兰汤兮沐芳华”（楚辞），故称此节为浴兰令节。五月五日接近夏至，夏至意味着阴气上升，病毒渐虐，所以《夏小正》指示人们“此日蓄采众药以蠲除毒气”。汉时人家用朱索连以桃印，施于门户之外，后来人们用艾草扎成人形或虎形，悬于户上以禳毒气，或用蟾蜍祛疾，将赤灵符著于心前以辟五兵。这便是天中节的辟毒活动，延至清代。

两宋宫中端午，宫中造办物品的机构内司意思局，制作红纱彩金盂子（小匣），里面有人工捏做的毒虫，即蜈蚣、蛇、蝎、蜥蜴等，毒虫被葵、榴、艾叶、花朵所围，盂子的正中，摆着用菖蒲或通草扎成的天师驭虎像，四周是五色染就的菖蒲叶。皇帝于是日赐给大臣取禳毒之意的经筒、符袋，实则

内装糖果、巧粽镂金花等礼物。明宫中自五月初一至十三日，宫眷宦官皆穿五毒艾虎补子蟒衣，门两旁放置菖蒲、艾盆，门上悬挂吊屏，上画天师或仙子、仙女执剑“降五毒”的故事，恰似年节的门神。初五日午时，即天中节的时辰，宫中人人饮盪砂、雄黄、菖蒲调成的酒，吃加蒜过水温淘面，身佩艾叶，调诸药酒，画治病符。太医院官员举着旗子、带着鼓吹到南海子捉蟾蜍，取蟾酥，方法是用针刺其两盾，取酥后蟾多死，后只刺其一眉，蟾得以继续存活。蟾酥用来做解毒的药。清宫中，人们用雄黄调酒，涂于耳鼻，以避虫毒。

唐时宫中有赐赠服玩、斗百草的习俗。唐太宗曾在端午日对长孙无忌、杨师道说：“五日旧俗必有服玩相贺，朕今各贺卿以飞白扇三枚，庶动清风，以增美德”。唐玄宗曾于此日赐宰臣钟乳，宰相宋璟拜受赐，携去炼药。斗百草是由蹋百草演化来的，其技法今已不详。有一则记载是，谢灵运临刑前将美须施给南海祇洹寺，作为维摩诘像之须。几百年后到唐中宗时，安乐公主要在端午日斗百草，为广其物色，令人驰驿取须。

然而，众所周知，端午节是为纪念屈原而形成的节日，那是因为屈原在不吉祥的五月五日投江，与天中节、浴兰令节恰是一天。屈原投江后，楚人哀之，每年至此日用竹筒贮米，投江祭悼。以竞渡的形式纪念屈原始于越王勾践，或者说民众驾舟楫争渡于水上，欲救屈原的行动被勾践定为风俗。

魏晋以后，端午节人们必食粽子、角黍，在水上斗龙舟，以存纪念屈原之遗意。唐时，粽子有百索粽、九子粽。开元年间，宫中端午造粉团、角黍，用小角造方子，架在箭上射盘中粉团，射中者得以食之，食品与戏乐相结合，与祭悼的原义相差甚远。宋代粽子品种又增花样，有角粽、椎粽、菱粽、筒粽、秤锤粽，由里面夹枣或糖增为夹松栗、胡桃、姜桂、麝香等，又用艾灰淋汁煮之，其色如金。

明清时，天中节与浴兰令节的内容逐渐淡却，明宫端午节除了斗龙舟、食粽子以外，复演射柳故事，宦官们以骑射为娱，文武官蒙赐“走骠骑”于后苑。“走骠骑”的规定是，一人骑马执旗引于前，一人驰骑出呈艺于马上，或上或下，或左或右腾掷矫捷，人马相得。如此者数百骑。其后是穿著服者，臂鹰走犬，表演围猎状，俗名为“走解”。上述表演者是御马监的勇士。

清代每年端午节，皇帝在圆明园的望瀛洲，太后在蓬岛瑶台，观龙舟相竞，“中流九龙舟，谁肯相参差”。龙舟竞渡者为宦官，在表演前他们在福海已经演习多时。道光以后内患外乱，皇帝不再有兴致观赏龙舟了。应节戏则照例上演。

六、乞巧节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
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
终日不成章，涕泣零如雨。
河汉清且浅，相去讵几许。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牛郎织女鹊桥相会是流传于民间的浪漫故事。据古人考证，这个故事始于汉武帝。七月七日作为节日，对宫女们来说是再重要不过了。织女与牛郎毕竟相会有期，恭立于七夕星空下的代代女儿们，并不认为织女哀哀可怜。织女在人们观念里是女神，她掌握着幸福、巧艺和寿考，而且这位女神心地善良，她会接受人们虔诚的祈福。传说唐大将郭子仪曾在七夕请求织女赐给长寿富贵，织女笑着说：“大富贵亦寿考”。后来果真福寿两全。这等梦臆，宫女们难以编织出来，因此七夕之夜的翘望和祈求代代相传，期待的心绵绵不绝。

七月七日宫女们一年中最重要的一天。这一天，西汉的宫女们到百子池边，演奏于闾乐，相互以五色缕羈连，叫做“相连爱”。在宫中的开襟楼，宫女们竞相穿七孔针，乞求织女授巧。七夕穿针仪式成为宫女们历代相沿的习俗。唐宫七夕，宫女们各执九孔针、五色线，向空中穿去。为了穿针乞巧，宫中出现了穿针楼（南齐）、乞巧楼。

元代宫廷曾有斗巧的游戏，宫女们登台，以五彩丝穿九尾针，先完者为得巧，迟完者则输巧。众人出资赠给得巧者。元武宗时洪妃独宠后宫，七夕，诸嫔妃不得登台，台上结彩为楼，洪妃与几名宦官登上。洪妃剪彩散于台下，令嫔妃宫女们争拾，以拾到的彩丝艳、淡分胜负。次日举办斗巧宴。

明宫七月七日，设乞巧山子，兵仗局进乞巧针。宫眷们身着鹊桥补服，在这日午间斗巧。在庭院中放置一盆水，水被日光久晒，生了一层膜，宫女们设针浮于膜上，看水底针影：影呈云龙花草形者，便是得巧；如果形如椎、丝、轴，就是拙针。清宫沿此习俗。

既是乞巧于织女，就须有贡品。各朝宫中，织女星下，都摆设着各种果品，“甘瓜素果敞清筵”。唐至清，宫女们在陈设瓜果花酒以外，采蜘蛛于小盒，次日观蛛网之疏密，以密而圆谓之得巧，此法由唐宫中传至民间。清代的七夕巧筵常设在御园四十景之一的“西峰秀色”，设彩棚、摆蛛盒。乾隆诗云：“西峰秀色霭宵烟，又试新秋乞巧筵。”

清宫每年七夕，陈瓜果，设牌位，由皇后亲行拜祭礼。牵牛和织女的神牌分别是“牵牛河鼓天贵星君”，“天孙织女福德星君”。

古人把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列为三元。七月十五是中元节。

中元节起自于佛教“目连救母”的典故。《盂兰盆经》中说：“目连比丘见其亡母生饿鬼中，即以钵盛饭往饷其母，食未入口化为火炭，遂不得食。目连大叫驰还白佛，佛言：“汝母罪重，非汝一人力所奈何，当须十方众僧威神之力，至七月十五日，当为七代父母、现在父母厄难中者，具百味五果以著盆中，供养十方大佛。佛敕众僧皆为施主，咒愿七代父母行禅定意，然后受食。是时目连母得脱一切饿鬼之苦。目连白佛：‘未来世佛弟子行孝顺者，亦应奉盂兰盆为尔，可否？’佛言：‘大善！’故后代人因此广为华饰，乃至刻木割竹，饴蜡剪彩，模花果之形，极工妙之巧。”

信佛而崇尚孝道的古人对此广为化之，形成了一个节俗。唐代每年七月十五日，宫中都要接受尚署进献的盂兰盆。盂兰意为救倒悬，盆是食器。皇帝在这一日还要进行有关活动。唐宪宗曾于此日到安国寺观礼，唐代宗曾在中元节于内道场造盂兰盆，不惜花费银子百万两，把盂兰盆装点得珍贵之极。又架设高祖李渊以下七位先皇的神座，备幡节、龙伞、衣裳之制，各书尊号于幡上。神座被隆重地异出内廷，陈于寺观。是日宫中大排仪仗，百官序立于光顺门以迎候神座。在通往寺观的道上，旗鼓大张，人群欢呼。此后每年都要举行这种仪式。有识者却嗤其为不典、伤教。

中元节逐渐发展成为祭悼先人、超渡亡灵的日子。到宋代，市井上除卖瓜果食品以外，又卖冥器，如靴鞋、袱头、帽子、金犀假带、五彩衣服。城中人或在家祭祀、或前往墓地拜扫。宫中车马出门朝陵。官方祭阵亡军士、设孤魂道场。

明代中元节例于番经厂、大高玄殿作法事。与天启皇帝同乘舟、落水而未能生还的小太监高永寿，被天启特命在中元节法会上超渡亡灵，这是唯一的一位宦官获此哀荣。

中元张灯，起于宋太祖，开宝四年中元节京城张灯。宋太宗时曾诏令三元张灯，皇帝在中元节御东华门观灯，后又取消了中元、下元之灯。南宋中元节，皇帝赐钱差内侍到龙山放江灯万盏，在江上放灯，意在祭享江海鬼神，以“渡”亡灵并供士民游观，明清沿之，中元节大放河灯，地点是西苑（今北海）湖中。民间则在运河闸上燃灯。灯是用蜡烛置于荷叶上点燃的。明代宦官、宫女常在西苑桥上，河灯万盏之时，相携看灯，夜深方归。清慈禧太后曾于中元节，集僧徒数百，超渡孤魂。夜晚与宫眷泛舟湖中，糊纸如荷花，点燃上面的蜡烛，漂灯于水上。

清代中元节除放河灯外，偶有放烟火之事。应节戏“佛旨渡魔”、“魔王答旨”照例在御前上演。

中元节祭悼先人、亡者，需食素。王建宫词云：“看取中元斋日到”。明宫此节例行食银苗菜和冰鸭，银苗菜是藕的嫩芽，冰鸭乃是头一日晚上煮熟后凝成膏状的鸭子汤。甜食局例行进供佛波罗蜜。

七、中秋

《礼记》上说：“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朝日以朝，夕月以夕”。八月十五夜正是夕月之夕。

此夕金风荐爽，玉露生凉，丹桂香飘，银蟾光满，且五谷已熟，瓜繁果盛，一年中最好的时光无过于中秋之夜。文人学子常于这一夜泛舟湖上，举杯邀月，叹今夕何夕！

中秋之夜，并不存在严格的祭月仪式供皇帝主持，宫中是一片与月同怡的浪漫情调。为了更接近明月，帝、后们登上宫中最高的楼台赏月，还要与水中之月同乐，所以赏月台要建在水边。唐玄宗曾与杨贵妃在太液池边中秋望月，月斜后便望不见了。玄宗遂勒令于太液池西再筑高台，与贵妃来年望月。故说中秋玩月，肇于唐明皇。

赏月时，筵宴、笙歌不可缺。鲜果、美酒、佳肴亦是娱月之设，歌声、乐声飘向夜空，自有享月之意。皇帝经常召来词臣雅士，对月吟诗。

古人逢节日，喜欢食夹馅的饼，中秋日常吃果饼，饼呈圆状的象圆月，遂有月饼之称。明宫八月十五日，每个庭院都摆设月饼、瓜果，傍晚就开始静候明月。月亮出现，即焚香大吃月饼，一直吃到夜深。如剩有月饼，则收存到岁暮再吃，那时则称之为团圆饼。

兔是月仙之一，清代民间街市叫卖的泥塑彩兔，常被宫眷们买来供月，“不供嫦娥怜兔影，为侬捣药祝长生”。

九是阳数，九月九日故称重阳。此时正是秋高气爽，过了重九便进入深秋，秋气日渐萧肃。古人在这个节日要饮酒、佩茱萸、登高、赏菊、食粘米花糕。

《西京杂记》记载，汉宫每年九月九日，宫中上下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据说可以使人长寿。菊花酒是在菊花舒展时连茎叶一并采下，杂黍米中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酿成，开罐而饮。菊花在百花凋谢后盛开，古人视它为象征长寿的吉祥花。秋天与人生的暮年相对应，于是人们在重阳节释发寿命长生不衰的愿望，饮菊花酒寓意着祈望生命长久。不过古代重阳节，延年益寿并不是唯一的主题。

重九，宫廷以及民间，人们欢乐、享受季节的馈赠、畅抒豪情或者讲习斯文，互致美意。

菊花在这个季节独领风骚，受到人们珍爱，不能不赏菊。魏武帝（曹操）在重九日送给书法家钟繇礼物，并书：“九月九日草木遍枯，而菊芬然独秀，今奉一束”。北宋时已有许多品种的菊花供人延赏，有黄白色的万龄菊、粉红色的桃花菊、白色的木香菊、黄色的金铃菊、纯白而硕大的喜容菊。南宋的庆瑞殿，重九前已陈列好万树菊花，灿然眩目，且点菊灯，以助佳氛，皇帝赏菊、赏灯，同时赏赐奏乐的宫廷艺人。

清代慈禧太后每当宫中菊花发芽时，便愉快地做起花匠的工作，修齐剪枝。她对于辨别菊花似有奇能，菊尚未发芽时，就能指出开何种颜色花，花开之时，果然不误。可谓现今的园艺师了。

茱萸俗称辟邪翁，插在头上或浮在酒上，取辟毒气、御初寒之意。

皇帝在重阳日或登高、或赐宴公卿、或讲经史、赋侍，以赏菊、登高为多。登高，或到郊外登山、或登宫苑中的小山，也有登塔、登楼台之时。唐中宗曾登慈恩寺塔。明代皇帝在此日驾幸御园的万岁山、兔儿山或旋磨台，

穿着菊花补服的宫眷、宦官随同登高。不过旋磨台并不高，皇帝要在这里例行观看秋收打稻戏。清代皇帝或在禁内登高，或登临香山，若值秋勅，则往往策马奔向塞外之山。

重阳节，人们用当年收获的米面蒸糕，上嵌百果，称为重阳花糕。南宋的御厨蜜煎局用五色米粉塑成狮子蛮王状，以小彩旗簇之，用熟栗子肉捣成的细末，入麝香糖蜜和之，捏为饼糕小段，或如五色圆球，沾上韵果糖霜，放在狮蛮下面，制成“狮蛮栗糕”，与酒配在一起，进呈皇帝食用。明宫上下除饮菊花酒、吃花糕以外，还有迎霜麻辣兔上席。宦官们常在重阳前后，摆迎霜宴，宴上食兔肉，谓之迎霜兔。清宫御厨饽饽房制作花糕，花糕不仅作为宫中节令食品，还要装点精细、插旗贴金，摆上奉先殿和佛堂的供桌。

八、岁暮游乐生活

冬至在十一月中下旬，是一年中阳气渐升、阴气渐降的转枢之日。

在一年的所有令节中，冬至的重要性不次于元旦。从冬至那天起，天逐日加长，夜逐日减短。昼为阳，夜为阴；相对应的是天为阳，地为阴；在阴阳天地之间，古人敬天崇阳，因此，冬至日正是皇帝一年中祭天的最恰当的日子。

在祭日之前，皇帝先行斋戒。到冬至日，备大驾前往城外南郊，祭天于圜丘。祭天是皇帝政务活动中最庄严、浩大、仪制缜密繁缛的一项。如果没有掌仪官的引导，皇帝是难以记住前后数不清的规定的。

祭地的仪式在夏至日举行，城外北郊的方泽坛是皇帝每年祭地的场所。

百官、外藩使者在冬至日上朝参加隆重的朝会。文武官整齐排列在殿庭中，北宋俗称“排冬仗”。皇帝在皇宫的前殿受朝贺。仪式与元旦略同。《汉书》说：“冬至阳气起，君道长，故贺；夏至阴气起，君道消，故不贺。”

在后宫，宫女们冬至那一天，用红线量日影，以后每天添长一线，这是魏晋宫中的习俗。唐代宫女们以女功揆日长短，冬至以后比常日增一线之功。

冬至是隆冬的开始。在这个数九的第一天，明代的宫眷宦官们穿上阳生补子蟒衣，每间屋子的墙上挂上一幅未着色的梅花图，梅花总共八十一瓣，从此日起每日染一瓣，以待九九尽而春归。图上还有“九九消寒歌”，句子最初多是民谣俚语，后来经正德、嘉靖间文士杨慎改定为新诗。“九九消寒图”由司礼监印刷，图中的诗共三首，每九一首，如一九的诗是：

冬至才过一九逢，家家闭户避寒风。

风送雪花如斗大，飞来飞去满空中。

清宫的“九九消寒图”用文字构成画面，多种多样。道光皇帝御制的“九九消寒图”别有心裁，“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九字，每字皆为九笔，张挂在满是图书翰墨的懋勤殿。双钩成幅，题曰“管城春满”，在懋勤殿轮值的翰林诸臣，按日填廓，细注阴晴风雪，用行行小字的空白构字，工致绝伦。此后每岁相沿，后廷宫女们也来效仿，“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九字，每日写一笔，八十一天写完。

逊清皇室仍然用消寒诗图打发隆冬时光，将长篇诗句写成吉祥葫芦图案。

冬至前后，职掌天文历法的机构（明清为钦天监，此前为太史官），要向皇帝恭进来年的时历。清乾隆时，为避弘历的御名，改时历书为时宪书。清代把这一天定为十月朔日，皇帝先行斋戒祭享，然后驾临乾清宫阅时宪书。时宪书上，列有每日宜、忌三十七事，进御者六十七事，包括颁诏、覃恩、肆赦、封拜、行幸、遣使、出师、庆赐、伐木、畋猎、平治道路、破屋坏垣各事。

十二月是一年中有多讲究的月份，进入年终，人们祈望吉祥，驱避邪魔，以图本年得到一个圆满的终结，并雀跃地恭候、迎接新禧。

十二月初一日，清代皇帝在重华宫开笔书写“福”字，第一张福字例行悬于乾清宫正殿，其余的张贴于各宫苑、颁赐皇子、宗藩、大臣和侍卫们。这是乾隆时确立的节令仪式，在此之前，皇帝们偶有年终御书“福”字赐大臣之举。书福之笺，质以绢，傅以丹砂，绘以金云龙。书福字之外，皇帝有时还写些吉祥对联、吉祥词句如长寿、宜春迎年、宜入新年、一年康泰等字。

每年有幸接受皇帝面赐福字的皇亲、大臣十人左右，皇帝临案执笔，受赐者依次跪于案前，仰瞻御书毕，叩首谢恩。两名太监对持福字笺而出，受赐者再在福字下面叩谢。

十二月八日腊祭是一项古礼。夏代称其为嘉平，商代称为清祀，周代称为大腊，汉代则称腊。腊祭的对象是百神。腊祭原非定在十二月初八。汉代以冬至后的第三个戌日为腊日，汉为火德，火衰于戌，故以戌为腊日；曹魏是土德，土衰于辰，故以辰日为腊日；晋是金德，金衰于丑，故以丑日为腊日。因为“王者各以其行，盛日为祖，衰日为腊”。祖祭是祭祀路神，与腊祭同样古老。随着五德说不再被严格信奉，腊日便定在十二月八日。

唐代，皇帝常在腊日赐群臣腊肉或在苑中畋猎。腊的古义就是以畋猎获得的野兽作为祭品。

宋代以后，腊日的活动变为吃粥。此日吃粥原是礼佛的一项内容，此习由寺院传至民间，再进入宫廷。宋代皇帝尚未能接受腊日吃粥的习俗，明清皇帝则理所当然地以吃腊八粥度此节日。

明宫中腊八粥的做法是：“先期数日，将红枣捶破泡汤，至初八日早，加粳米、白果、核桃仁、栗子、菱米煮粥。腊八粥先供于佛像前，而且户牖、园树、井灶之上也供设此粥，剩下的内廷成员分食之或互相馈送。皇帝常把御用的腊八粥赐赏下属。

因为腊月八日相传为如来佛乞食以布施众生之日，所以清宫此日用青豆煮粥，意在助如来布施。腊八前的二、三日，雍和宫大事煮粥，用宫中大号粥锅两个，每锅可容米二、三十石，每年煮粥用银十万两。熬粥者十人，曾在宫中专门练习，喇嘛多人围锅念经，满蒙王公贝勒监视。腊八当天，由监视大员率众将粥进奉内廷，皇帝照例谕令供祀太庙、寿皇殿及内廷西苑各庙，然后分赏内廷各宫后妃，再赏外廷王公大臣。分赏外廷者，由太监一名押送，二人抬黄食盒一架，内装黄盒子一个，盒中盛粥一碗，受赏大臣跪接、跪送。粥中没有盐和其它调料，淡而无味，其实很难下咽。

紫禁城内宝华殿后的中正殿还要举行送岁仪式，殿下设一个黄毡圆帐房，称为小金殿，皇帝驾临，众喇嘛在殿下唪经，达赖喇嘛和章嘉胡图克图到皇帝面前佛拭衣冠，意为祓除，以取吉祥。

十二月二十三日以后进入交年，宫中与民间同样为送旧迎新而忙碌。

二十二日或二十四日，灶君要上天言事，民间须得祭灶，宫中的灶君也要受到款待。清宫十二月二十三日在坤宁宫祀灶，太监们设供案、奉神牌、香烛、燎炉、拜祷等，陈列祭品三十三种，另有黄羊一只。祭品多是各种干鲜果子和糖，民间用麦芽糖粘住灶君之嘴的习俗也被清末宫廷所采用。这一日，皇帝诣佛前、神前、灶神前拈香行礼。之后，皇后行礼，在民间女子无拜灶之礼。

二十四日各种迎新的陈设都要摆好。各宫门改易春联、张贴钟馗像。明代自这一日到正月十七日止，每晚都要在乾清宫丹陛上扎烟火、点放；清代从这一日到二月初三日，乾清宫丹陛上安设万寿灯二座、丹陛下安设天灯二座。万寿灯的左右各悬万寿宝联十六幅。二十四日起，皇帝出宫时每过一门，太监放爆竹一枚，入宫亦如此。清宫二十六日，除张挂春联、门神外，还要在后妃所住的十二宫张挂钦定“宫训图”，如在景仁宫挂“燕姑梦兰图”、承乾宫挂“徐妃直谏图”，共十二张，各有御制赞话。

岁暮贴在门上镇邪的钟馗，出自唐玄宗的一场梦。唐玄宗一夕梦见一个

凶煞又正气凛然的鬼物，自称终南进士钟馗，当应举而不第，触阶死，在阴间食鬼，玄宗醒后命画师吴道子绘出其梦中的钟馗形象。每年岁暮将钟馗像赐给大臣，民间贴于门首，以辟除不祥。明宫除张挂绢画的钟馗以外，惜薪司用灰炭塑成将军、钟馗像，抬入后宫。钟馗塑像高三尺许，通身五彩而手和脸全黑，称为“彩妆”。征袍如火，^髯如戟，小胆宫娃不敢看。“彩妆”钟馗用于祀灶，安放于各宫殿门口。

除夕之夜，在人间的灯火和喧闹中完全是一个白昼。繁华而短寿的隋朝，按炀帝的旨意，每当除夜，殿前诸院，数十座灯火之山光耀天地。熊熊燃烧的是沉香木，每一山焚沉香数车。当火光渐暗时，浇上甲煎以助火焰，甲煎是从蠹类动物中提取的脂液再加工制成的香料。沉香与甲煎燃烧成的火山，焰高达数丈，香气飘散出宫，数里之外都能闻到。这一夜，共烧沉香二里余车，甲煎二百石。殿内房中取光则不用膏火，一百二十颗大珠悬垂，光比白日。又有明月宝夜光珠，大者直径达六、七寸，小者也不下三寸。

唐太宗贞观初年，曾在除夕大事装点宫掖，明设灯烛，殿内诸房莫不绮丽，后妃嫔御焕然盛妆，金翠耀眼。殿阶下的火堆映得庭院明如白昼。在乐声的渲染下，唐太宗感到很满足，便筵请隋炀帝当年的萧皇后同观此景。太宗一再要萧氏回答：“朕施設孰与隋主？”萧氏被追问，乃叙述了隋炀帝挥金如土的情形，太宗良久不语。

宫中的人们通宵守夜，等待新年的黎明。南宋宫中上下在夜色中用珍果消磨时间，消夜果子盒极精巧，供给皇帝一盒消夜果，不啻中等人家十户之产。盒内果品多至上百种，各种蜜饯居多，杂在糖、糕、豆、酥之中，象形的玉杯宝器、珠翠花朵、犀象博戏之具、销金斗叶及诸色戏弄之物，极为小巧。巧工制作的微型玉辂置于盒上，玉辂全部用金玉为饰护，以贴金龙凤罗罩。如此奇侈，只图皇帝天颜一笑。整夜，宫中爆竹之声不断，爆竹花样繁多，有果子形、人物形。殿司曾抬进一座屏风，外面贴着钟馗捕鬼等图，里面穿着长串火药和引线，一经点燃，爆竹声连发百余响。人们在临安的街巷中常能听到除夕之夜皇宫传来的爆竹声。

清宫除夕特有的习俗是^炆岁、封笔、掸尘。殿中用金炉^蒸松柏枝，叫做^炆岁。自康熙开始，清帝于这一天郑重封笔，手^蒸名香致敬，仪式与开笔相同。乾隆某年勘定金川时，除夕下午四时，一封军营奏报传至宫中，乾隆已经行完封笔仪式，不宜用笔批奏，权且口授近臣，缮旨颁发。

九、皇帝寿辰——万寿节

皇帝的生日是宫中盛大的节日，与元旦、冬至并重。帝诞日的名称只是在明清时才叫万寿节，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名称，如唐代曾有：千秋节、天长节、天平地成节、庆成节、嘉会节之名；后晋名启圣节；后汉名嘉庆节；后周名天清节；宋代名长春节、乾明节、寿宁节、承天节、乾元节、寿圣节、同天节、兴龙节、天宁节、乾龙节；辽代名千龄节；金代名天寿节；元代名圣节。几乎每个皇帝的寿节名称都不同。

唐代以前，宫中并无大庆皇帝生日的典礼。确切地说，皇帝祝寿是从唐玄宗开始的。

贞观二十年十二月的某天，唐太宗对长孙皇后的哥哥长孙无忌说：“今日吾生日。世俗皆为乐，在朕翻成感伤。诗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劳。何以劬劳之日，更为燕乐乎？”

然而八十多年后，唐玄宗却志得意满地接受了宰相源乾曜和张说的奏请，以他的生日为令节。张说等在给玄宗的表上说：“少昊著流虹之感，商汤本玄鸟之命。陛下二气合神，九龙浴圣。月惟中秋，日在端午。常星不见之夜，祥光照室之朝，请以为千秋节。著之甲令，布之天下，咸令宴乐。群臣以是日献甘露醇酎，上万岁寿酒，王公戚里进金镜、绶带，七庶以结丝承露囊相遗问，村社作寿酒宴乐，名为赛白帝、报田神。上明元天，光启大圣；下彰皇化，垂裕无穷。”玄宗愉快地提笔作诏，回答张说等人的请求：“当朕生辰，卿等请为令节，上献嘉名，自我作古，是为美事。依卿来请，宣付所司。”

这一年是开元十七年，唐玄宗四十四岁。八月五日千秋节那天，李隆基宴百官于花萼楼下，大陈歌乐，倾城纵观。天下诸州皆令宴乐休假三日，编入律令。

次年千秋节，李隆基再登花萼楼，百官献贺。在欢庆之宴上，玄宗喜赐四品以上官金镜珠囊、缣彩，五品以下官束帛，并喜题八韵诗以示群臣：

兰殿千秋节，称名万岁觞。
风传率土庆，日表继天祥。
玉宇开花萼，宫悬度会昌。
衣冠白鹭下，纁暮翠云长。
献遗成新俗，朝仪入旧章。
月衔花绶镜，露缀彩丝囊。
处处词田祖，年年宴杖乡。
深思一德事，小获万人康。

为庆千秋节，唐玄宗创作了大曲《千秋乐》、《千秋子》。北宋帝诞日，群臣于紫宸殿上寿，面对皇帝行三十三拜礼，而正旦朝贺十九拜，冬至朝贺十二拜，均低于皇帝寿节之拜。宰相代表群臣上殿，捧觞祝皇帝万寿。皇帝赐百官茶汤。

北宋皇帝的圣寿宴场面很大，教坊艺人歌舞不绝。开始，乐人先效百鸟鸣，内外肃然，只闻半空和鸣，若鸾凤翔集。宰相与亲王及外国使节坐于殿上，群僚和外使随员坐于殿外两廊。每位的面前都摆放着各色食品，有环饼、油饼、枣塔、果子等。辽国使节的食物最丰盛，特加猪羊鸡鹅兔连骨熟肉。为皇帝斟酒者，每每举其袖，唱引道：“绶御酒——”

教坊乐人在山楼下彩棚中早已陈设好器乐，有拍板、琵琶、箜篌、高架大鼓、羯鼓、铁石方响、箫、笙、埙、篪、鬲篥、龙笛等，两边对列杖鼓二百面。

第一盏御酒举起，乐人一名歌板色，笙、箫、笛先奏，后众乐齐响。宰臣举酒，百官倾杯，艺人在台上舞蹈，对舞、独舞。第二盏如前。到第三盏御酒时，左右军百戏入场。所谓左右军，实际上是指京师坊市左厢、右厢，演员都是民间艺人。百戏项目有：上竿、跳索、倒立、折腰、弄碗注、踢瓶、筋斗、擎戴等。凡御宴至第三盏，方下酒肉、酖鼓、爆肉、双下驼峰角子。

第四盏时，杂剧上场。第五盏，乐人弹琵琶、方响，跳三台舞之后，戏谑色彩的参军色入场，小儿舞队二百余人入场，舞步齐进，叩于殿阶。参军色与小儿班首问答，小儿班首诵台词（口号），音乐声起，小儿舞队载歌载舞。接着杂剧入场。这一盏，下酒群仙炙、天花饼、太平毕罗、干饭、缕肉羹、莲花肉饼。

第六盏御酒，先是笙奏慢曲、三台舞，而后左右军比赛击球。殿前立三丈高的球门，哨笛杖鼓为两支球队助威。这一盏下酒菜是假鳖鱼、蜜浮酥捺花。

第七盏，女童舞队四百余人上场。女童们都是从坊市中挑选的妙龄容艳过人者，上场时装束得宛若仙女，执花而舞，且舞且唱。然后杂戏入场，参军色在歌舞与杂戏之间穿插作诙谐之语。这一盏下酒排炊羊、胡饼、炙金肠。

第八盏，唱踏歌，奏慢曲子、跳三台舞。下酒菜是假沙鱼，食馒头和肚羹。第九盏，左右军表演相扑，下酒水饭，簇钉下饭。皇帝起驾。

其实皇帝生日宴不是每次都这样繁琐，有时很简单，原因只是皇帝不耐久坐。

元代皇帝生日前一天，文武官员亲自到寺观建道场，以祝延圣寿万安。寿节之日，朝臣诣阙称贺，地方官率僚属、儒生、耆老、僧道人等，结彩香案，呈舞百献，夹道祇迎，就寺观叙班舞蹈三呼毕，公宴而退。

明宫中每逢万寿节，地位低下的宦官宫女都可以不衣青紫，穿上自己喜爱的衣服。天启时，宫女们竞相创制新式方胜葫芦，戴在身上，字形图案有：宝历万年、洪福齐天、四海丰登等。宝历万年是由八宝荔枝、卐字点鱼凑成的；洪福齐天的构图是两面赤色蝙蝠各一，中填齐天二字；四海丰登是由两蜂附灯而飞、四隅各填海字凑成的。

清代皇帝寿典之繁盛，超过任何朝代，在帝王中以康熙六十寿典与乾隆八十寿典最具盛况，乾隆过于康熙。康熙的万寿盛典图长达二十余丈，乾隆的万寿长图有一百数十页。而清代最为铺张、隆重的庆典仪式却是慈禧太后的七十大寿。

当然最先创此胜绩的是康熙皇帝。其六旬寿庆期间，自京西的畅春园到西直门，经新街口、西安门通中南海，与紫禁城的庆仪连接，一路彩坊接连不断，连缀着彩墙、彩廊、演剧采台、歌台、灯坊、灯楼、灯廊、龙棚、灯棚无数，路径的寺观，大设庆祝经坛。直隶以及各省进京的臣民代表也搭设彩坊为各自的庆祝界，沿路的京城各部、寺、监官衙同样建经棚、设彩坊。几里一个御座，御座周围便是一个热络、设施繁丽的景点。一路上，用彩绸结成的“万寿无疆”、“天子万年”等大字赫然出现在彩墙上；候补官员献给皇帝的万寿图屏，金色的寿字共万种字体；蒙古、汉军都统以下武官建百老献寿台，台呈九级，扮成百名老人的演员各执金寿字，层累而上。一路演

剧彩台上的歌舞、戏剧节目、陈设难以尽数，其内容多为神仙祝寿故事。至于小如蟠桃、长生花、一统万年青，无不刻意求其吉祥之义。当是之时，京城内外，金碧相辉，锦绮相错，华灯宝烛，霏雾氤氲，弥漫周匝；紫禁城及御苑，绣幙相连，笙歌互起，金石千声，云霞万色，当世人都莫能描画尽致。此间无人不著礼服，各种事务暂歇，欢腾、庆贺达七天。

清代帝寿十年一大庆，每年一小庆，里程碑式的六十、八十大寿，则刻意隆庆。

第十二章 宫廷风雅生活

一、古代宫廷乐舞

中国古代宫廷乐舞分为礼仪性的和娱乐性的两类。音乐有雅乐、燕乐之分，与乐相配的舞也是同样。礼仪性的乐舞在重大仪式如大祭祀、册立太子、纳后、元旦冬至大朝会及盛大宴会时使用。主要是用于祭祀。

传说发明乐器和最早弹奏音乐的是伏羲。到黄帝时代，黄帝命伶伦造律，根据凤凰之鸣以别十二音阶，于是黄帝时产生了最早的礼仪性乐舞《云门大卷》。尧时产生《咸池》，舜时则有《大韶》，孔子自称听过流传下来的韶乐，称赞为尽善尽美的乐舞。夏禹时的乐舞为《大夏》，商代纪念伐桀功勋的乐舞称为《大濩》，周代表现武王伐纣业绩的是《大武》。周代存有以上历代各种乐舞，总为六乐，分别在各种祭祀时使用。《云门大卷》用以祭祀天神；《咸池》用以祭祀地神；《大韶》用以祭祀四望；《大夏》用以祭祀山川；《大濩》用以祭祀始祖姜嫄；《大武》则用来祭祀开创周代基业的祖先。

上述雅乐流传到汉时只有《大韶》和《大武》，随着时间河流的冲刷，雅乐变得越来越模糊，缺失越来越多。流传得如此艰难，除了古人记谱的技术原因以外，是雅乐本身缺少生命力。用乐舞传述礼、调合天地、表现仁，实在是难为了艺术，肩负如此重大使命的乐舞，怎能不平板、沉重？然而雅乐对每一代朝廷却是不可少的。儒家以雅乐为正声，每个王朝建立伊始都要制礼作乐，由皇帝召集博学多识的文臣对古礼、雅乐舞进行考据、推敲，制出本朝的乐舞，以颂扬本朝的功德。各代由太常寺掌管雅乐。隋文帝登基后，派遣多人，用数年时间考订太常雅乐，由于“沦谬既久，音律多乖”以至积年议不定。隋文帝怒责他们：“我受天命七年，乐府犹歌前代功德耶？”

礼仪性的乐舞（雅乐舞）分为文舞、武舞两类，象征文治武功。文舞的舞队，每人左手执籥（乐器）右手秉翟（舞具）。武舞的舞队，每人手执朱干（盾）、玉戚（斧）等兵器。

显然，雅乐舞不是用来娱乐的，皇帝在雅乐舞面前生不出任何杂念也不会感到轻松。战国时，魏文侯好古，想从雅乐（古乐）中听出滋味来，然而在雅乐演奏中，魏文侯却昏昏欲睡。他对孔子的学生子夏说：“寡人听古乐则欲寝，及闻郑卫，余不知倦焉”。郑卫之声是儒家贬斥的“淫邪之声”，子夏反驳了魏文侯的说法，为雅乐辩解，仍未能再使魏文侯对雅乐感兴趣。《宋书·乐志》说“魏文侯虽好古，然犹昏睡于古乐，于是淫声炽而雅乐废矣。”

隋时，胡声（西域音乐）侵入了雅乐，当时儒臣们对“礼坏乐崩”痛心疾首。至今琵琶成了古典音乐的首要乐器。

二、皇室燕乐

燕乐，是帝王在后廷宴乐时演乐的乐曲。古代考据学家郑玄说：“燕乐，房内乐也。”明宣宗在《五伦书》中说：“周公作乐，曰《勺》，又有《房中之乐》，以歌后妃之德，”燕乐就是怡情悦耳的音乐，与中平、沉重而拖沓的雅乐相反，被认为是淫声。“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不用也。”传说商纣肆虐时，命令乐师师延作靡靡之乐，妖冶的音乐导致民心轻漫而鄙贱，人心思乱。武王伐纣之时，师延投于濮水自尽。师延的靡靡之乐早于周公时代的《房中之乐》，也许就是最早的燕乐。

相对于雅乐，燕乐也被称为俗乐，事实上燕乐大多取自民间。春秋战国时，郑国和卫国的民间音乐优美婉转，被儒者指为淫靡之音，子夏说“郑音好滥淫志”，“卫音趣数烦志”。从此“郑卫之音”就成为妖冶的燕乐代称。

先秦时儒者们对燕乐兴盛惶惶不安，是怕燕乐取代雅乐的地位。秦汉以后雅乐、燕乐趋向分途了，各自都有存在的理由，至于雅乐不停地衰败和被扶持，似与后廷娱乐用的燕乐无多大关系。

至少在周代就已有的天子宴享时的宴乐，属于燕乐的一大内容，宴与燕字有时通用。燕乐一般都配有舞蹈。出 帝日常宫廷生活中的乐舞自然就是燕乐舞，在宫廷大典和 上也会演奏颂扬本朝功德的雅乐舞。

周代已经拥有一批在宴乐时演奏的曲目：《鹿鸣 牡》、《皇皇者华》为专业乐工演唱；《南陔》、《白华》、《华黍》用笙演奏；还有歌唱与笙演奏相间的三组曲目，即《鱼丽》与《由庚》、《南 嘉鱼》与《崇丘》；《南山有台》与《由仪》，前为唱后为奏。以上是贵族燕礼时的曲目，周代贵族是周天子的宗亲，上述音乐也会被周王享用。

西汉高祖的唐山夫人制《昭容乐》、《礼容乐》、《房中祠乐》等，汉惠帝令主管音乐的机构乐府用箫管演奏上述音乐，改编并更名为《安世乐》。汉以后相沿以乐府以演奏燕乐的机构，乐府诗则是可以演唱的歌词。

谈到汉代的音乐，人们很容易想起刘邦荣归故里时唱的《大风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刘邦边唱边击筑（乐器），唱完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

古人即兴作歌与即兴起舞一样早已有之，用以渲泄感情。商亡后，商纣的叔父箕子从封地朝鲜朝见周王时路过商的都城，见废墟上已长出麦苗，有感而作歌唱道：

麦秀渐渐兮，
禾黍油油兮，
彼狡童兮，
不与我好兮。

周成王时，政平而民安，凤凰来翔，成王乃作歌：凤凰翔兮于紫庭，
予何德兮以感灵？

赖先人兮恩泽臻，
于胥乐兮民以宁。

秦宫中曾发生过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即荆轲刺秦王，如果荆轲一举刺死了秦始皇。那么战国以后的历史恐怕要重写，秦始皇是从一位美人的即兴弹

唱中得到启示而转死为生的。当荆轲图穷匕首见并马上一把抓住秦始皇的衣袖时，秦始皇提出要听琴一曲再死，荆轲同意。王美人在危机中沉静、机智，即兴弹唱到：三尺罗衣何不掣，

四面屏风何不越。

秦始皇有所悟，便掣衣、翻越屏风、拔剑击向追来的荆轲。荆轲的匕首无法与秦始皇的剑较量，几个回合，荆轲倒在柱下，含恨殉难。

汉高祖刘邦是一位很不错的音乐爱好者，除《大风歌》以外，他还即兴填词，用楚地的曲调，唱过一首悲歌，这首悲歌是唱给戚夫人的：

鸿鹄高飞，

一举千里。

羽翼已就，

横绝四海。

横绝四海，

又可奈何？

虽有矰缴（打鸟的工具），

尚安所施！

吕后所生的太子刘盈，有雄厚的辅翼，戚夫人的儿子终于不可能取代刘盈的太子位置，刘邦用歌声道出了他的无奈。戚夫人是位女音乐家，对于音乐、舞蹈的共同爱好加深了他们的感情，戚夫人会弹奏各种乐器，舞技高超，亦能象刘邦一样歌以述志。在被吕后罚做女奴、整日舂米的日子，戚夫人想念儿子、悲叹自己的命运，唱道：

子为王，

母为虏。

终日舂薄暮，

常与死为伍。

相离三千里，

当使谁告汝。

此时的戚夫人自然不会忘记与刘邦歌舞燕乐的日子。或与刘邦倚瑟弦歌、或带领宫女们歌唱，高亢或低婉的歌曲《出塞》、《入塞》、《望归》，宫女数百人随着她的声音齐唱，声入云霄。

三、汉乐府

汉代掌管燕乐的机构是乐府。乐府中的大部分音乐采自民间，早在周代就有采风制度，采集民间的诗和音乐。西汉乐府的基本工作就是收集、挑选民间音乐，直接取用原来的歌词或填写新的歌词，配制乐器，准备在各种场合演奏。由于汉代的开国皇帝是楚地人，按照“乐其所生，礼不忘本”的规律，汉代皇帝自然偏爱楚地的音乐，所以乐府的音乐多为楚声，例如《房中乐》即《安世乐》就是“楚声”。乐人也多来自楚地。西汉乐府的乐人多至八百余，其中负责民乐的占一半以上。

西汉在音乐上颇有造诣者应数李延年和汉元帝。李延年善弹、善歌，亦会制曲，他曾根据从西域传入的胡笳曲，改编为十首乐曲。李延年音乐才能出众，被汉武帝任命为协律都尉。汉元帝则是汉代皇帝中最有音乐修养的一位。汉元帝的文与艺兼长，文辞十分优美，班婕妤曾评估元帝父子的文书风格，说元帝词句华丽优雅，成帝则平易亲切，汉元帝喜爱吹箫，也能弹琴鼓瑟，善于自度曲，配以歌声。史书称元帝的自度曲“分刊节度，穷极窈眇”，曲调非常优美，节奏多有变化，当然胜于一字一腔的雅乐。相信也超过了已有的燕乐曲。

汉武帝对音乐的关心不亚于其曾祖刘邦，他们二人善于造新词配旧曲，汉武帝曾作《白麟之歌》、《宝鼎天马之歌》、《朱雁之歌》等，以纪念天降祥瑞、赞颂神明。为表述对李夫人的悼怀，汉武帝曾赋《落叶哀蝉》之曲：

罗袂兮无声，
玉墀兮尘生。
虚房冷兮寂寞，
落叶依于重扃。
望彼美之女兮，
安得感余心之未宁！

当方士使用法术，在帷幄中映出李夫人的形象时，汉武帝欲近前而不能，口占一诗曰：

是耶非耶，
立而望之，

何姗姗其来迟？汉武帝的作品被乐府配以弦歌。当日西倾，凉风激水。武帝在昆明池上，泛翔禽之舟时，命女伶悲歌其《落叶哀蝉》之曲，是一番多么苍凉空渺的景象。武帝坐在帐前，听乐工们讴唱《是耶非耶》，便可回想李夫人映出的身影。

元光三年（前一三二年）黄河决于瓠子口，灾难持续了二十五年，到元封二年（前一九年）决口终于被堵住了。为了治河，武帝调动兵卒数万人，并亲临决口，将白马玉璧沉入水中，送给河神，命令百官自将军以下，皆负薪填塞决口。此际，汉武帝创作了《瓠子之歌》，感叹治河工程的艰难：

瓠子决兮将奈何？
皓皓旰旰兮閻殫为河！
殫为河兮地不得宁，
功无已时兮吾山平，
吾山平兮钜野溢，
鱼沸郁兮柏冬日。

延道弛兮离常流，
蛟龙骋兮方远游。
归旧川兮神哉沛，
不封禅兮安知外！
为我谓河伯兮何不仁，
泛滥不止兮愁吾人？
鬻桑浮兮淮泗满，
久不反兮水维缓。
继而歌曰：
河汤汤兮激潺缓，
北渡污兮浚流难。
攀长茝兮沈美玉，
河伯许兮薪不属。
薪不属兮卫人罪，
烧萧条兮噫乎何以御水！
颓颓林竹兮隳石菑，
宣房塞兮万福来。

汉武帝晚年巡行各大河流，秋日泛舟于汾河，与群臣宴饮，胸中腾起悲壮之兴，乃作《秋风词》，配以楚歌：秋风起兮白云飞，

草木黄落兮雁南归。
兰有秀兮菊有芳，
怀佳人兮不能忘。
泛楼船兮济汾河，
横中流兮扬素波。
箫鼓鸣兮发棹歌，
欢乐极兮哀情多。
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赵飞燕的歌喉与舞姿并美，她在太液池上仙女般的歌舞被千古传颂。汉成帝命工匠造了一座合宫之舟，浮在太液池上，为歌舞之台。成帝曾以文犀簪击瓠，伴赵飞燕歌《归风送远之曲》，船随歌声飘荡，歌正酣时，大风起，赵飞燕顺风高扬歌喉，举袖唱道：仙乎仙乎，

去故而就新，
宁忘怀乎？

赵飞燕能够用“气”以轻身，作盘中舞、掌上舞。一次赵飞燕在舟上轻舞时，又值大风扬起，赵飞燕在风中展袖，舞姿若随风升飞状。汉成帝担心赵皇后真要随风而去，急命侍者抓住她的裙裾，裙子为之绉。反来宫女们效仿其绉裙，号称“留仙裙”。西汉的倒数第二个皇帝汉哀帝一举取消了乐府机构，他对乐府的燕乐采取了“圣人”态度，在诏书中说“孔子不云乎‘放郑声、郑声淫’。其罢乐府官”。汉哀帝天性不喜好音乐，即位之前就对成帝时名倡的骄奢淫逸极为不满，即位不久就罢除了乐府。此事并不能说明哀帝通达大义，却显示了皇帝对宫廷燕乐兴衰的决定作用。汉代还有一支经常出现在宴会上的乐队——黄门鼓吹。“黄门鼓吹，天子所以宴乐群臣，《诗》所谓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者也”。东汉的燕乐舞机构就是黄门鼓吹署。

鼓吹的乐器包括箫、笳、笛、鼙、鞀、饶歌，主要用笳、箫、饶，“鸣笳

以和箫声”，“短箫饶歌”是军乐的代称，所以鼓吹乐本来就是军乐，偶然用于宫廷宴会上以助兴。汉武帝尤其鼓吹振奋情绪的军乐，才更多地将其引入宫廷娱乐中，除在饮宴上使用鼓吹外，还令宫女们在游戏中演奏，宫女们乘着龙头形的船，游荡在昆明池中，唱着《棹歌》，吹奏箫、笛，武帝在豫章观上欣赏这幅悦耳悦目的景象。

黄门鼓吹乐与短箫饶歌是同一种乐曲与乐器的两种名称，在宴享时出现的自然叫黄门鼓吹。汉代鼓吹饶歌有十八曲，曲目是：

《朱鹭》、《思悲翁》、《艾如张》、《上之回》、《翁离》、《战城南》、《巫山高》、《上陵》、《将进酒》、《君马黄》、《芳树》、《有所思》、《雉子》、《圣人出》、《上邪》、《临高台》、《远如期》、《石留》。以上诸曲，歌词均载在史书而曲调杳然，如《圣人出》。

圣人出，
阴阳和。
美人出，
游九河。
佳人来，
駉离哉何，
驾六飞龙四时和。
君之臣明护不道，
美人哉，
宜天子。
免甘星筮乐甫始，
美人子，
含四海。

《远如期》
远如期，
益如寿，
处天左侧，
大乐，
万岁与天无极。
雅乐陈，
佳哉纷，
单于自归，
动如惊心。
虞心大佳，
万人还来，
谒者引，
乡殿陈，
累也未尝闻之。
增寿万年亦成哉！

凡乐曲都可以配以舞蹈。《诗经》中说“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歌、舞共表达一种情绪。周代及以前的六代雅乐都有舞，叫做“六代舞”。汉代的乐府、黄门鼓吹署的燕乐，也应配以舞蹈，但舞姿似无严格规定。西汉的两位舞蹈家戚夫人和赵飞燕，舞技很高。戚夫人擅长“翘

袖舞”、“折腰舞”，赵飞燕擅长“掌上舞”，舞技由她们独创独擅，未见传授他人。她们多在乐曲声中即兴起舞或边歌边舞，哀则折腰，遇风则扬袖，仍无一定章法。汉高祖刘邦歌罢《大风歌》，情不自禁地起舞，汉武帝与长沙定王宴乐时也即兴起舞。

群舞不能不有章法，有一定章法和名称的群舞乃能流传于后世。刘邦非常欣赏蜀地蛮人的舞蹈，其舞表现强悍而又敏锐的精神，刘邦将它命名为“巴渝舞”，命乐人学习，在宫廷表演。巴渝舞的舞曲有《矛渝》、《安台》、《弩渝》，歌词古涩，汉人已不能洞晓其意。汉代宴享时常以鞞舞助兴，汉代傅毅、张衡在赋中提到过鞞舞，曹植作《鞞舞歌》序中说“汉灵帝西园鼓吹有李坚者，能鞞舞”。鞞舞者持鞞鼓（一种军中乐器）而舞，舞时有歌。汉代鞞舞曲辞有五篇：《关东有贤女》、《章和二年中》、《乐久长》、《四方星》、《殿前生桂树》。巾舞又叫做公莫舞，表现鸿门宴时项庄舞剑欲刺沛公刘邦，项伯起舞用袖阻隔项庄，舞者用巾代表衣袖，出语：“公莫”。鞞舞、巾舞、铎舞、拂舞、杯鞞舞、白鞞舞流行于汉魏南朝宫中，各舞均有曲、辞（歌诗）。

四、魏晋宫廷乐舞

魏晋南朝皇帝对于能够娱情的事物大多感兴趣，在歌舞上的用心自然不少。被迫认为魏武帝的曹操和魏文帝曹丕对诗歌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他们所作的诗大多是乐府诗，用以配唱。曹魏宫廷将汉代流传的相和歌改编增删为十三曲，大部分用曹氏父子创作的乐府诗歌唱。采中原旧曲和吴、荆楚民歌作为宫廷音乐的清商三调中，曹氏父子和魏明帝的新词占了绝大部分。曹丕仍用诗表现乐人演唱乐府新诗的情景“弦歌奏新诗，游响拂丹梁。繁音赴促节，慷慨时激扬”。

五、南北朝宫廷乐舞

每一个王朝在继承前一个王朝的乐曲时，往往改换曲目名称和曲辞，以适应于本朝并标明新的朝代有新的一套。例如南梁将汉曲《朱鹭》改名为《本纪谢》、《思悲翁》改为《贤首山》、《艾如张》改为《桐柏山》……《上陵》改为《昏主恣淫慝》、《上邪》改为《惟大梁》，用以歌颂梁师的战功，渲染齐东昏侯的丧道以衬托大梁的德业。

梁武帝是南朝皇帝中最懂音律的，他曾“按十二律制十二笛以写通声，较古钟玉律并周代古钟皆不差”。主持制定了梁王朝的礼乐，由于笃敬佛法，又制成述佛法的十篇乐章，为《善哉》、《大乐》、《大欢》、《天道》、《仙道》、《神王》、《龙王》、《灭过恶》、《除爱水》、《断苦轮》，在欲断尘念的同时，梁武帝又创作了许多以闺情为主题的艳歌，这是南朝宫廷诗歌的一种风尚，梁武帝是其中的集大成者。

他在《春歌》中咏道：

阶上歌入怀，
庭中花照眼。
春心一如此，
情来不可限。

他的儿子昭明太子萧统、梁简文帝萧纲都是艳歌的热心创作者，轻浮绮靡的阴软之歌中了“亡国之音”的圣贤判断，继之的短命王朝南陈，又被陈后主的软歌送掉。陈后主也擅长诗歌、音乐，创作了《玉树后庭花》、《堂堂黄鹂》、《留金钗》、《两臂垂》，《玉树后庭花》的曲子似应是陈后主亲自谱写，也可能是采自江南歌调，极其哀婉，其辞有：“玉树后庭花，花开不复久……”。大臣何胥也奉命从事艳曲的创作和配制，教习宫女们歌唱。

南齐的东昏侯整日溺于欢歌之中而不知难将临头，当萧衍（梁武帝）起兵进攻建康，宫廷侍卫叛变，欲捕捉东昏侯时，东昏侯却在含德殿吹笙歌作《女儿子》。

南北朝皇帝在饮宴上自娱性的歌舞属于常事。宋武帝曾在宴席上酒酣意适，对范晔说：“我欲歌，卿可弹”。宋武帝乃引喉高歌，范晔弹琵琶伴奏。宋武帝很想单独听范晔弹琵琶，然而范晔不肯献艺，范晔此时不得已奉旨伴奏，武帝的歌声一止，他的弹琵琶的手指也停住了，未免显得不够尊重。宴乐时起舞是允许也是应该的，但在一次宴席上不宜屡次起舞，起舞时一般属（邀请）他人一起跳舞。孙权曾设宴款待顾雍父子及孙顾谭，顾谭当时很受孙权重用，任选曹尚书，君臣欢宴，顾谭酒醉，三次起舞并且舞的时间很长。顾雍在席上一团恼怒，回去后斥责孙子：“君王以含垢为德，臣下以恭谨为节。汝何以三舞且不复止？虽为酒后，亦由恃恩，损吾家者必汝也！”

北魏孝文帝在大飨群臣的宴席上，为表示对冯太后的尊敬，离席起舞于太后前，群臣全部离席，随皇帝一起欢舞，孝文帝且舞且歌，向冯太后拜寿。

孝文帝是位贤明、崇尚风雅的君主，他在酒宴上与各臣高歌，文辞雄浑、雅致。孝文帝唱道：“日月光天兮无不曜，江左一隅兮独未照”。彭城王元勰接唱：“愿从圣主兮登衡，会万国兮驰诚”。郑懿接唱：“云电大振兮天地辟，率土来宾兮一正历”。邢峦接唱：“舜舞干戈兮天下归，文德远被兮莫不思”。郑道昭接唱：“皇风一封兮九地匝，戴日依天兮清六合”。孝文帝又领唱：“尊彼汝境兮昔化贞，未若今日道风明”。宋弁唱道：“文王政

教兮晖江沼，宁如大化兮光四表”。

琵琶、笛是北方胡人的常用乐器，北朝皇帝有不少能够娴熟地吹奏。北魏节闵帝元恭曾经与大臣在酒席上吹笛、奏弦管。北齐后主高纬人称“无愁天子”，对音乐耽爱无已，他能弹奏许多乐器，自制曲调，“悦玩无倦，倚弦而歌”。常在后宫自弹琵琶领唱，和唱者百余人，高纬创作的《无愁曲》，“音韵窈窕，极于哀思，使胡儿闾宫之辈，齐唱和之，曲终乐阙，莫不殒涕”。乐极而悲，恐于来日无多。北周宣帝也是荒淫的短命皇帝，常与宫女们深夜连臂蹋踑而舞，并唱道：“自知身命促，把烛夜行游”。

北齐的王朝的奠基者高欢也曾闻歌堕泪，那是因征战受挫，又被传闻中弩，高欢心情沉重，勉强出见众将，佯装无疾，令斛律金唱《勅勒歌》。

勅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
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高欢也唱了起来，苍凉、感伤，竟涕泪横流。

由于隋唐承接的是北朝而非南朝，北朝引入宫廷的西域民族乐舞为隋唐的燕乐舞注入了新血液，也成为隋唐燕乐舞的特色。

北齐的杂乐有《西凉乐》、《龟兹乐》，为西域音乐，北周君主喜欢在宴飨时演奏高昌音乐，后来突厥人又带来了康国和龟兹音乐，隋取代了周朝，也继承了其音乐。《玉海》中说“周隋管弦杂曲数百，皆西凉乐也，鼓舞曲皆龟兹乐也”。元代学者马贵与认为，隋唐所谓燕乐，西戎之乐居其大半。另一位郑夹漈认为，凡清乐妙舞未有不自西出者，八音之音以金为主，五方之乐惟西是承。此话虽有些偏颇，但无法否认胡乐舞在隋唐燕乐中的优势，就连盛唐第一曲《霓裳羽衣曲》也是采用西凉音乐的作品。

六、隋唐宫廷乐舞

隋朝建立后，将魏、齐、周、陈乐人子弟征集于长安，并录用新人，空前扩大了音乐机构。将乐舞伎按乐舞种类分为七个部分，称为七部乐。一为国伎。吕光占据凉州时将龟兹音乐改编而成的，号力“秦汉伎”，北魏北周时谓之“国伎”，其歌曲有《永世乐》、解曲（分为许多段落的曲子）有《万世丰》，舞曲有《于阗佛曲》。国伎就是西凉乐。二为清商伎。清商乐从汉代流传下来，隋朝灭陈时得之，其歌曲有《阳伴》、舞曲有《明君》、《并契》。三为天竺伎。张重华占据凉州时，印度通过四重翻译进贡的男伎，歌曲有《沙石疆》、舞曲有《天曲》。四为高丽伎。歌曲有《芝栖》，舞曲有《歌芝栖》。五为安国伎。歌曲有《附萨单时》，舞曲有《未奚》，解曲有《居和祇》。六为龟兹伎。有《西国龟兹》、《齐朝龟兹》、《土龟兹》三部。七为文康伎。隋炀帝将七部乐扩为九部乐，即清商、西凉、龟兹、疏勒、康国、安国、天竺、高丽、礼毕。以龟兹乐为一大宗，炀帝以龟兹乐为曲调，填制艳词，命太乐令白明达配制成歌曲，曲目有《万岁乐》、《藏钩乐》、《七夕乐》、《相逢乐》、《投壶乐》、《舞席同心髻》、《玉女行觞》、《神仙留客》、《掷砖续命》、《斗鸡子》、《斗百草》、《泛龙舟》、《还旧宫》、《长乐花》及《十二时》等，曲调“掩抑摧藏，哀音断绝”，炀帝则“悦之无已”。

歌曲以哀调动人，平调、欢调显得单薄，越是哀调越是委婉，曲调多变，如曲径，如幽谷，勾魂摄魄，令人辗转流连，欲罢不能。魏文帝时有位刘子直能创新声，曹丕以屏风为隔听他唱奏，刘子直哀婉的歌声似乎并未能打动曹丕，曹丕问一旁的卞兰何如，卞兰说：“子直不复饮食，昼夜呻吟，欲作奇异，然其音更似哭声”。看来知音难觅，而亡国之君却少有例外地欣赏这种歌曲。

大业六年，西域高昌国来献音乐，炀帝耍了个花招，高昌乐人在旅馆演习时，密令懂音律者于暗地倾听、默记，到高昌乐人来到殿廷献艺时，炀帝先令隋朝乐工演奏，把高昌人惊呆了。此次进献的歌曲有《善善摩尼》，解曲有《婆伽儿》，舞曲有《小天》，又有《疏勒盐》。唐玄宗也玩过这种伎俩，西域贡给唐廷一位琵琶高手，玄宗置酒设宴，请西域人弹奏，密令乐工罗黑黑（玄宗使其受阉刑纳入内廷）在帷幕后细听，只一遍，罗黑黑就记住了全部曲调。西域人弹奏完，玄宗对他说：“此曲吾宫人能之”，遂取过一个大琵琶，仍令罗黑黑不露面，在帷后弹奏。西域人惊问：“是宫女也？”自惭无法胜过唐人，乃告辞归去。唐朝无所不能的消息传开，为此，西域数十国降附于唐。

隋九部乐中的康国乐，歌曲有《戢殿农和正》，舞曲有《贺兰钵鼻始》、《未奚波地》、《农惠钵鼻始》、《前拔地惠地》。疏勒乐中歌曲有《亢利死让乐》，舞曲有《远服》，解曲有《盐曲》。礼毕乐即是文康乐，是从晋代沿袭下来的，晋太尉庾亮死后，庾家的歌舞伎追思庾亮，编制歌舞，用假面具套头以象庾亮，执翳而舞。文康是庾亮的谥号，故此乐舞名之曰文康乐。在隋九部乐中，前八部演奏终，出演文康乐，更名为“礼毕”。其行曲有《单交路》，舞曲有《散花》。

说到假面，西汉已有，假面乐人叫做象倡，隶属乐府。在哀帝罢乐府前，西汉每逢冬至、夏至日，皇帝于前殿置酒，命象倡用“郑声”歌舞。

如果没有唐代帝王的热心参与，唐代的音乐舞蹈艺术不会那么繁盛。唐代的乐舞昂扬振奋，大展宏业的帝王与亡国之君的喜好毕竟不一样。

《秦王破阵乐》奏响了唐代宫廷乐舞的序曲，这支乐舞便是唐太宗的杰作。据说唐太宗为秦王时战胜刘武周，回师的途中，河东士庶歌舞于道，士兵们也在秦王带领下，耍着剑戟、擂着大鼓欢舞起来，以后这场军中舞蹈经唐太宗的加工发展成为大型的宫廷乐舞，又名“七德舞”，兼为雅乐舞。凡宴会必演奏。

秦王破阵乐舞，队形是“左圆右方，先偏后伍，交错屈伸，以象鱼丽鹅鹳”。观者为之振奋，太常卿萧瑀请示太宗，在舞中加入擒获敌军将领的段落，太宗不赞同。破阵乐在音乐上是汉族清乐与西域龟兹乐的结合，其乐器大部分是西域乐器，以大鼓壮威，胡乐齐鸣，声震百里，动荡山谷。

李靖和唐太宗谈到这支乐舞，李靖说：“臣观陛下所制破阵乐舞，前出四表，后缀八幡，左右折旋趋走，金鼓各有其节。此即八阵图，四头八尾之制也”。太宗说：“兵法可以意授不可以言传，朕为破阵乐，惟卿已晓其表矣”。

放达而亲和的唐太宗喜欢起舞舒怀，李治（高宗）立为太子不久，生了长子李忠，太子在东宫欢宴，太宗也赶来了，对席上的宫臣说：“朕始有孙，欲共为乐”。于是开怀畅饮，酒酣，太宗起身舞蹈，邀请在座的诸臣与他一起欢舞，人们都跳了起来。

唐代皇帝尚未意识到在子孙和大臣面前跳舞有失尊严，后唐庄宗整日在内廷演戏，乐在其中，然而宋以后皇帝便矜持起来，举手投足十分注意稳重。

舞蹈，也是唐代大臣的份内工夫。“臣妾人人学团转”，舞风甚盛。大臣在皇帝赐宴的席上用舞蹈表达欢愉的心情，也包藏着向皇帝献媚的用意。舞艺有高下之分，玄宗时，工部尚书张锡表演的《谈容娘》舞就很内行，将作大匠宗晋卿会浑脱舞，左卫将军张治善舞《黄麟》。中宗在位时，有位博士祝钦明自我推荐说能脱《八风舞》，皇帝允许他舞一个看，祝钦明想出出风头，其实并不会跳舞，体肥笨重，旋转不起来，只是站在地上不停地晃头，把眼睛睁得溜圆，左顾右盼，丑态百出，皇帝大笑。在场的吏部侍郎卢藏用嘲弄说：“是举五经扫地”。诗人王维，则因跳舞违反了规定，被免了官。唐代规定，只有皇帝才可舞《黄狮子》，王维做大乐丞时，一次被人怂恿着舞了一段《黄狮子》，结果丢掉了大乐丞的职位。此事发生后，大臣们十分小心，不敢再乱舞了。

唐玄宗无疑是最热心于音乐、歌舞的皇帝，在中国各代皇帝中无人能与之并肩。唐玄宗多情又多艺，对于音乐甚至到了沉溺的程度，欢乐系之，悲感系之。

唐玄宗最喜欢演奏的乐器是笛子和羯鼓，尤以羯鼓适意。史称玄宗性情俊迈，因此不喜欢琴声，琴声太缓，太从容，远不如羯鼓令人振奋。有一次他命人弹琴，曲未终就听得不耐烦了，把乐人打发走，喝令内官说：“速召花奴（宁王之子）将羯鼓来，为我解秽！”看来对琴已经如对秽物般厌恶了，真是爱憎分明。当时宰相宋璟也喜欢羯鼓，君臣有时在议政之余谈起羯鼓的质量和击法，宋璟形容击鼓的形象是“头如青山峰，手如白雨点”。山峰意为不动，雨点意为碎急。教坊艺人吕元真击鼓最绝，头上置水碗，曲终而水不倾动。玄宗在藩邸时就闻知吕元真的技艺，多次派人召他来，而吕元真恃才高，每每拒绝未来天子的邀请，玄宗为之衔恨，报复手法是，令吕元真

终身没有职位，而他的同事均受爵命。

内廷歌舞场中，玄宗经常是乐队中的一个成员。当谢阿蛮（教坊女艺人）舞玄宗创作的《凌波曲》时，宁王吹玉笛，玄宗击羯鼓，杨贵妃弹琵琶，马仙期击方响，李龟年吹觿，张野狐弹箜篌，贺怀智拍板。

在赏花宴上，玄宗曾吹笛为杨贵妃的歌声伴奏。当禁中牡丹花开，玄宗和贵妃在兴庆池东沉香亭前赏花，乘兴召来梨园弟子中的十几名高手，以歌咏花。李龟年为当时首屈一指的歌者，这时他手持檀板，在乐人的吹奏下正要一展歌喉，玄宗止住他说：“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命李龟年持金花笺，宣赐翰林学士李白立即呈上新词。李白酒尚未醒，援笺落下三首《清平乐》。第一首：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第二首：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

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第三首：

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

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

李龟年将新词奉上，玄宗立即命梨园弟子调弦配曲，催促李龟年演唱。这时杨贵妃含笑手持玻璃七宝杯，酌西凉州葡萄酒，情意饱满地领唱。玄宗拿过玉笛吹奏，贵妃边饮边歌，酒酣歌亦酣，玄宗伴奏亦不忘调情，每当曲遍将转换时，玄宗拖长笛声“以媚之”。

笛子是玄宗制曲的工具，经常按笛创作新曲。一次坐朝时，高力士发现玄宗不停地用手指上下按其腹，退朝后，高力士问玄宗：“陛下向来数以手指按其腹，岂非圣体不安耶？”玄宗说：“非也。吾昨夜梦游月宫，诸仙娱予以上清之乐，寥亮清越，殆非人间所闻也。酣醉久之，合奏诸乐以送吾归。其曲凄楚动人，杳杳在耳。吾回，以玉笛寻之，尽得之矣。坐朝之际，虑忽遗忘，故怀玉笛，时以手指上下寻，非不安”。高力士请聆听玄宗此曲，玄宗欣然吹奏，吹罢，高力士请问其名，玄宗笑道：“此曲名《紫云回》”。

《羯鼓录》中记载“元宗（玄宗）洞晓音律，由之天纵，凡是管弦，必造其妙，制作曲调随意即成，不立章度，取适短长，应指散声皆中点拍，至于清浊变转，律吕呼召，君臣事物，迭相制使，虽古夔旷（夔、师旷，古代音乐家）不能过”。

玄宗好神仙术，他制曲据说多是受梦中神仙的启示，或是神仙传授，《紫云回》是如此，《凌波曲》亦相似。玄宗在东都洛阳时，白日做梦，梦中一女子容貌艳异，头梳交心髻，身穿大袖宽衣，翩翩来到御床前下拜，玄宗问：“汝何人？”该女答：“妾是陛下凌波池中龙女，卫宫护驾，妾实有功。今陛下洞晓钧天之乐，乞赐一曲以光族类”。于是玄宗奏了一支新曲，龙女再拜而去。醒后，玄宗将梦中的新作记了下来，名《凌波曲》。

唐代最辉煌的舞曲《霓裳羽衣曲》为唐玄宗的杰作，创作此曲的过程亦十分神妙。传说玄宗登三乡驿，望女儿山，忽感光阴易逝、人生短促，益发向往极乐无忧的神仙生活，回去后玄宗根据这种感受创作了《霓裳羽衣曲》。又有一传说是，被玄宗请到宫中向他传授神仙术的大师罗公远，在天宝初年某个八月十五日夜，宫中赏月之际，向玄宗说：“陛下能从臣月中游乎？”

取过一个桂树枝向空中掷去，化成一座色如白银的天桥，罗公远请玄宗与他同登此桥，行至数十里，眼前出现美丽壮观的宫殿，罗公远告诉玄宗这就是月宫。这时有仙女数百人在广庭上歌舞，玄宗被美妙的音乐吸引，走上前问：“此何曲也？”对方答：“《霓裳羽衣》也”。玄宗将曲调密记于心，走回宫中，回顾银桥神秘地消失了。从此《霓裳羽衣曲》被玄宗由天上带到人间。这个美妙故事的编造者大概就是玄宗本人。

曲成数年后，西凉府都督杨敬述进献了一支印度的《婆罗门》曲，玄宗觉得此曲与《霓裳羽衣曲》有相合之处，正是梦寐以求，不妨拿来。于是将《婆罗门》曲揉进了《霓裳羽衣曲》中。

《霓裳羽衣曲》在杨贵妃进宫之日演奏，通过杨贵妃的再创作，此曲配上了舞蹈。与杨贵妃入宫时的女道人身份相关，舞蹈的服饰、道具用上了道教的羽服和幡节。此舞成为杨贵妃最得意的舞蹈，自认为盖过了赵飞燕的成就。《霓裳羽衣舞》确实是唐代宫廷乐舞的杰作。由于已经失传，其美妙之处难以形容，唐诗人白居易有幸在此乐舞出现约百年后的宪宗朝欣赏了她，写下了《霓裳羽衣舞歌》：“我昔元和侍宪皇，曾陪内宴宴昭阳。千歌万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案前舞者颜如玉，不着人间俗衣服，虹裳霞帔步摇冠，钿璫累累佩珊珊”“飘然转旋回雪轻，嫣然纵送游龙惊。小垂手后柳无力，斜曳裾时云欲生”。“翔鸾舞了却收翅，唳鹤曲终长引声”。

作了四十多年太平天子的唐玄宗，已经习惯了歌舞升平的生活，不料烽烟忽起，王朝不日间危如累卵。面临只有出逃之策的李隆基，心绪烦乱，自忖，欢歌酣舞的日子已不可复得，他再一次登楼置酒，命乐人弹唱。乐工弹琵琶，美人歌《水调》，歌罢，玄宗准备离去，又眷眷不舍，徘徊于歌楼，忽然问旁人，楼下是否还有擅长歌《水调》曲子的？这时一位少年领悟其意，自荐为皇帝歌一曲，于是唱道：

……

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
不见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飞。

唱出了玄宗此时的心境，玄宗潜然流涕，感叹词作者李峤为真才子，不待曲终而离去。

在逃往蜀地的路上，玄宗为怀念杨贵妃作了《雨霖铃》曲，命张野狐记下来。一日玄宗登高望秦川，又想起宰相张九龄的箴言，遣使为张九龄祭悼，玄宗复将感怀寓于笛声，调弄新曲，号《谪仙怨》。

唐代的许多皇帝都有音乐、歌舞的创作天赋。唐高宗略有其父太宗的遗传，通晓音律，一日清晨，高宗闲坐，不知何处传来莺的委婉啼啭声，有感而发，遂作《春莺啭》曲，命乐工白明达记述下来。高宗创作的舞蹈有《上元舞》，舞者一百八十人，皆穿画云五色衣，以象征元气。此舞用在大祭祠和盛大的宴享仪式上。武则天创作了《万岁乐舞》，当时宫中养的鹦鹉鸟善模仿人言，武则天听到鸟儿“万岁”不离口，十分欣喜，遂乘兴创作了一支舞蹈，舞者为三人，红袍大袖，头戴鸟冠，拟鹦鹉之状，欢跃而舞。这支舞蹈不过是这位女政治家的游戏，不会有多少艺术价值。

唐德宗以《八卦舞》为代表作，其舞是雅，德宗为之说明“朕以仲春之首纪为气节，听政之暇，韵于歌诗，象中和之容，作中和之舞”。以舞述哲理、载乾坤之道，使舞蹈既庄严又神秘，意义也沉甸甸的。《八卦舞》显然不能达到娱乐、消遣的作用，而应归为礼仪性的雅舞，但唐德宗却自称他在

听政之暇欣赏此舞，意即取代了娱悦耳目的轻歌曼舞。这样一本正经是不是有些矫情？相似的是唐文宗，这位受制于家奴的皇帝以读圣贤书为务，而且好听雅乐，对雅乐毫无倦意。“深明大义”而难以有所作为，这样的皇帝内心的折磨一定很重。

雅乐是不能取代燕乐的魅力，当唐文宗听宫人沈阿翘弹奏《凉州曲》时，不禁叹道“天上乐！”文宗还善吹小管，曾作曲《文淑子》。文淑是位晓音律、经常出入宫廷的法师，后来因过失被流放，其弟子入宫服务。文宗一日听到法师的讲习声，乃是其弟子的模仿，文宗有感而吹管作曲。

喜欢吹芦管的唐宣宗是晚唐皇帝中最突出的音乐爱好者。宣宗经常创作美妙的乐曲，传授给宫女们。每当赐宴的前数日，宣宗都要教宫女们排练他的新作，待设宴之日，数百名宫女盛妆而出，分行列队，连袂而歌，“其声清怨，殆不类人间”。其作品有《播皇猷》、《葱岭西》、《倾杯乐》、《泰边陲》等。《倾杯乐》制成后，宣宗捻管演奏，命乐工辛骨𪛗打拍，吹奏时宣宗发觉辛骨𪛗的拍子没有打在点上，便瞋目瞪视辛骨𪛗，骨𪛗心惊胆战，以为犯下大过，回去后惊恐不安，竟一日而死。乐工虽然在皇帝身边服务，但在皇帝眼中不过是歌舞的道具，身份低贱，命如草芥。

唐代的乐舞机构是全国音乐、舞蹈、杂技人艺的聚居所。有大乐署、鼓吹署、内外教坊、梨园，前两个机构所属于中央机关太常寺，主要演奏雅乐；后面的几个机构直属于内廷，听命于皇帝。内教坊设在禁内，包括女伎、谐谑等。外教坊设在京城，右教坊在光宅坊，左教坊在延政坊，右教坊主要聚集歌唱艺人，左教坊则以舞蹈艺人为主，盛唐时内外教坊艺人有两千之多。皇帝任命宦官为教坊使。梨园是天宝年间设置的，叫做梨园新院，人数在三百左右。此外还有宜春院，挑选民间妓女入内，谓之“内人”或“前头人”。另有一类“挡弹家”，指的是从民间选入宫中学习弹奏各种乐器的女子。挡弹家的技艺比不上宜春院的妓女，凡节目宜春院练习一日就可上演，而挡弹家要练上一个月，玄宗曾在上戏前策励她们：“好好作！莫辱没三郎”。三郎是玄宗的自称，艺人们私下称皇帝为“崖公”。崖是巍峨高大的意思。

乐工中的出色人才当数李龟年之兄弟，李彭年善舞，鹤年、龟年善歌。鹤年写诗作词尤妙，其作有《渭川》。李龟年不仅善歌，对音乐艺术有极深的修养。他常被邀请到王公大臣家献艺，一次岐王想试试他的水平，让他静听艺伎的弹奏，只许闻声不得见弹奏之人。琴声起，李龟年细听，辨出：“此秦声”，琴曲继续弹奏，一段时间过后，李龟年又说道：“此楚声”。岐王到后面一问，果然前面弹奏者为陇西沈妍，后来弹奏者为扬州薛满。李龟年在三兄弟中最受玄宗的恩宠，还与他擅长击羯鼓有关，有这个特长，玄宗当然会更加看重他。一次玄宗问李龟年：“卿打多少杖？”龟年答称：“臣打五千杖讫”。玄宗说：“汝殊未，我打却三竖檀也”。三竖檀想必是三万，看来玄宗的气力真不小。几年后李龟年打到一竖檀，玄宗赐物以褒奖。李龟年可能是谦逊，他不敢比皇帝打得更多。安史之乱后，李龟年流落江南，以卖艺为生，遇良辰美景，为人歌数阙，座中闻其歌，莫不掩泣罢酒。

宜春院的“内人”许永新的歌声亦极其动人。许永新音高而声远，能在不具备扩音器具的古代，歌声令万人共闻。开元盛世，玄宗大酺（大聚饮）于勤政楼，万众喧哗，一片沸腾景象。高力士奏请玄宗，令许永新出楼歌一曲。永新承旨，出现在万人面前，撩鬓举袖，全场顿时寂静下来，屏息静听，许永新歌声回荡于广庭，沁入人们的心怀，此时“喜者闻之气勇，愁者闻之

肠绝”。每逢高秋朗月，台殿清虚，许永新的歌声与秋景相配，极富感染力。他还善于再创作，能变新声。

乐舞机构承演的舞蹈，分为软舞和健舞，软舞有《垂手罗》、《回波乐》、《兰陵王》、《春莺啭》、《半社渠》、《借席》、《乌夜啼》等，健舞有《阿辽》、《柘枝》、《黄麾》、《拂林》、《大渭川》、《达摩支》等。歌舞开演前，乐曲单呈送到皇帝手上，皇帝如以墨点某曲、即舞，此法称“进点”，如不加点则不舞。

然而《霓裳羽衣舞》到宋代就已失传了，唐代的其它优秀乐舞如《七德舞》（即《秦王破阵乐舞》）、《龙池舞》、《倾杯舞》等也已失传。宋代宫廷乐舞远不如唐代有声有色、包罗万象，胡声、胡舞在宋廷不再喧宾夺主了，因此乐舞少却了雄浑、激烈的色彩，变得柔曼了。

队舞成为重要的宫廷舞蹈形式。宫中舞队有“小儿队”，由七十二人组成，“女弟子队”，由一百五十三人组成。小儿队的七十二人的舞蹈项目有十种，各以队的名称出现，一为《柘枝队》，二为《剑器队》，三为《婆罗门队》，四为《醉胡腾队》，五为《诃臣万岁乐队》，六为《儿童感圣乐队》，七为《玉兔浑脱队》，八为《异域朝天队》，九为《儿童解红队》，十为《射雕回鹘队》。女弟子队的舞蹈项目也有十种，也各以队的名称出现，一为《菩萨蛮队》，二为《感化乐队》，三为《抛球乐队》，四为《佳人剪牡丹队》，五为《拂霓裳队》，六为《采莲队》，七为《凤迎乐队》，八为《菩萨献香花队》，九为《彩云仙队》，十为《打球乐队》。

七、宋辽金元宫廷乐舞

宋代皇帝也喜欢在燕乐上一试身手。宋太宗洞晓音律，前后创作的大小曲及改编的旧曲共计三百九十支，其中的十八支大曲是：《平戎破阵乐》、《平晋普天乐》、《大宋朝欢乐》、《宇宙荷皇恩》、《垂衣定八方》、《甘露降龙庭》、《金枝玉叶春》、《大惠帝恩宽》、《大定寰中乐》、《惠化乐尧风》、《万国朝天乐》、《嘉乐生九穗》、《文兴礼乐欢》、《齐天长寿乐》、《君臣宴会乐》、《一斛夜明珠》、《降圣万年春》、《金觞祝寿春》。这些大曲都是以颂功德、庆吉祥为主题，太宗的小曲从题目上看就知道别有一番意趣，小曲有二百七十支，兹列其中十曲的题目：《一阳生》、《玉窗寒》、《念边戍》、《玉如意》、《琼树枝》、《鹞鸢裘》、《塞鸿飞》、《漏丁丁》、《息鞞鼓》、《劝流霞》。

宋太宗很喜欢隋代流传下来的贺若弼的琴曲十小调，其中的一、两个曲名不甚优雅，太宗动手改换，将原来的《不换金》改名为《楚泽涵秋》，《不换玉》改名为《塞门积雪》。太宗还命词臣发挥文字本领，为琴曲填写新词。大臣苏易简填得一首《越江吟》很是出色：

非云非烟瑶池宴，片片碧桃冷落黄金殿。
虾须半卷天香散，春云和孤竹，清婉入霄汉。
红颜醉态烂熳，金舆转，霓旌影烂，箫声远。

太宗还命工匠将琴由七弦增为九弦，这表明他在乐器革新上有所作为。至于宋高宗要求把琴制成盾样以示不忘武备，并不比其先祖的作法更有意义，反而显得心虚、自欺欺人。

宋太宗的子、孙真宗、仁宗均洞晓音律，能制新曲。宋真宗对郑声（燕乐）不感兴趣，他的作品是飨太庙用的两首雅乐章。仁宗也有一些雅乐作品，如《景安》四曲以祀天地，《兴安》四曲以祀宗庙，《祐安》五曲以祀五帝。仁宗日常偶有灵感便自度曲，曲成后赐给教坊，或出题目，命教坊完成，这样的作品有五十四首，分别用于各种场合。

辽代颇有作为的皇帝辽圣宗也是帝王中的一位音乐爱好者，他喜欢与臣下昼夜饮酒、歌舞，还经常作大臣家中的不速之客，尽欢而罢。这位精力充沛、爱好广泛几乎无所不能的皇帝有音乐作品五百余首。“新制乐章五百首，自敲檀板教宫娥”。

南宋的一首优美的曲子《望海潮》流传到了金朝宫廷，时值雄心勃勃的金海陵王在位。一日海陵王在后宫游观，闻听宫女唱道：

东南形胜，江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
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
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
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迭嶂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嘻嘻钓叟莲娃。
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
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海陵王从未听到过如此动人的曲词，得知柳永的这首词是赞美钱塘的美景，便召来曾出使过南宋的兵部尚书胡邻，寻问钱塘美景如何，胡邻回答：“江南扬州琼花、润州金山、吴江姑苏、钱塘西湖为天下美观，其它更有许

多美景，但臣迹不到。只此数景，天下已罕，况于他乎！”海陵王的心被牵动了，他按捺不住对江南美景的馋念，决意发兵攻打南宋。南宋五朝未想到它的“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竟招致金国投鞭渡江之心。时人诗云：

谁把杭州曲子讴，荷香十里桂三秋。

哪知卉木无情物，牵动长江万里愁。

海陵王也未想到，他出师不利，在采石被宋军击败，金朝又内院起火。最后海陵王丧命于扬州。

金世宗即位后结束了海陵王的暴政，社会安定，边境无战事，金朝渐出现汉文景时代的气象。金世宗对自己的政绩颇感得意，值皇太子出生，世宗在东宫设宴，命乐工演奏新曲，他告诉在座的大臣：“朕制此曲，名《君臣乐》，今天下无事，与卿等共之，不亦乐乎？”由此可知，金世宗也是音律的行家。

队舞，由宋代传至元代。元宫廷舞队有《乐音王队》、《飞天夜叉队》、《寿星队》、《礼乐队》等。《乐音王队》的舞蹈场面是，开始舞者男子三人，戴青面具而舞，然后一队飞天夜叉出场，翩翩舞至台前，继而出现二十名艳妆女子，持牡丹花边舞边歌，女乐人摇日月金腔稍子鼓，与歌舞配合。最后是男子三人上场，五人作五方菩萨相，一人作乐音王相，伴随着歌曲，乐音王与菩萨们在西天极乐世界的情境中舞蹈。《寿星队》是由男子执金牌，或执梅竹松椿石，或执其它吉祥物，如宝盖、日月棕毛扇、鱼鼓筒子、龙竹藜杖，载歌载舞。《礼乐队》的组成是童子五人，执香花妇女二十人，分为四行，鞠躬拜兴（弓身、直身）而舞，或执孔雀幢歌舞。然后是男子八人，披金甲，执金戟，一人头戴平天冠执圭，齐唱舞蹈前行。《乐音王队》的歌舞用于元旦仪式上；《寿星队》用于皇帝生日宴会上；朝会时则由《礼乐队》出场。一般在上述舞队演完后，由妇女三人唱《新水令》、《沽美酒》、《太平令》三曲。

出现在唐代的“字舞”（或者更早）在元宫廷被发扬了，凡是皇帝在宫内行走（乘舆或骑马）时，都由教坊舞女在前引导，舞出“天下太平”字样。

元代的宫廷舞蹈有浓厚的宗教气息，前述的几个队舞即是如此。用于赞佛的《十六天魔舞》传自河西，唐代已有，到元末成为最有魅力的宫廷宴享舞蹈，“背番莲掌舞天魔，二八娇娃赛月娥”。舞蹈者为十六名美女，头垂辮发，戴象牙佛冠，身披纓络，扮成菩萨形象而舞。有诗传述《十六天魔舞》的姿采：

十六天魔女，分行锦绣围。

千花织步障，百宝贴仙衣。

回雪纷难定，行云不肯归。

舞心挑转急，一一欲空飞。

元顺帝尤其喜爱《十六天魔舞》，昼夜观舞不倦，因担心宰相进谏，乃挖掘地道，夜间在装点得五光十色的地道中观赏天魔舞。顺帝对于人生多有感慨，他曾对嫔妃们说：“百岁光阴等于驰电，日夜为乐犹不满十万，况其间疾病相侵，年寿难必，如白云有期，富贵皆非我有矣。何为自苦，以虚度一生乎！”因此顺帝日夜忙于行乐，长歌大舞，自暮达旦，称这种生活为“遣光”。

八、明清宫廷乐舞

明清两代，陶醉于歌舞之中的皇帝并不多见，甚至可以说皇帝们对于燕乐舞的兴致悄然减退了。也许是戏曲的发展，转移了皇帝的注意力？缺少了皇帝热情参与的明清宫廷乐舞，显然不如汉唐那样生机盎然、那样色彩纷呈。

如果没有崇祯皇帝喜爱音乐的事实，人们便会怀疑朱明天子的血统中有无音乐细胞。崇祯喜欢听琵琶曲，闲暇时命宦官或才人在寝宫弹奏琵琶，崇祯倾听不倦，其中最喜爱的是《~~瑟~~索梁州》。崇祯本人可能不会弹琵琶，但鼓琴确实在行，鼓琴是他的雅好。最能显示崇祯音乐才能的是作曲，身处内忧外患之中的年轻皇帝，向往道家空灵无忧的境界，因此创作了五支访道曲：《崆峒引》、《敲爻歌》、《据桐吟》、《参同契》、《烂柯游》。宠妃田氏与崇祯有同样的音乐爱好，被崇祯引为知音，五支访道曲经常由田贵妃鼓琴弹奏。田贵妃且弹得一手好琵琶。宦官白秀贞从蜀地带回一把精美的琵琶，上有镂金红文，成双凤图案，崇祯赏给了田贵妃。在皇帝身旁，田贵妃弹奏琵琶，如抱月怀风，音韵凄清。

清代是一个极重雅乐舞的朝代，尽管清代在年代上距上古最遥远，古音依稀，但清代雅乐舞俨然完整无缺，频繁出现在皇帝各种活动中。这之中少不了皇帝对雅乐舞的抬举，康熙、乾隆二帝都精通律吕，他们的音乐修养大多用在了雅乐的考证和修订上。作为少数族入主中原建立的朝代，清代着力兴隆华夏文明，编纂四库全书，在知识界形成古文献、古史考证之风，而朝廷大抓雅乐舞相当于高屋建瓴了。

现代音律学家看得出，清代的雅乐不过是假古董，但只要它体现着复古意识，就不能不说它是雅乐。清代雅乐不仅用于祭祀、朝会上，也用于宴飨上，具有普遍和代表性的是《中和韶乐》，在祭祀时配以歌舞，歌词的种类、量极大，词藻是古来一贯的庄重而晦涩。在朝会和宴飨时所奏的《中和韶乐》不配歌舞。太和殿中，乐器一应具有，常年供用。

在酒宴上演出的《喜起舞》、《庆隆舞》值得一提。这两种舞沿自满人的传统。《喜起舞》的舞者是从侍卫中挑选的有膂力、动作敏捷的十人，身穿一品朝服，舞于殿庭之坛。歌声与舞蹈同拍，歌者身穿豹皮褂，头戴貂帽，用满语歌唱，歌词为陈述国家忧勤开创之事。乐工吹箫击鼓，歌舞酣畅。《庆隆舞》用意是表现八旗艰难创业、建立武功的历史。在殿庭外的丹陛间，摆放虎豹异兽模形或以人装扮，八大人骑马而来，象征八旗，舞姿呈骑马逐射状，搭箭射兽，一只兽被射中，则众兽皆丧胆驯服。

乾隆皇帝的音乐作品与其诗作相比，在数量上差之远矣，御作《花子拾金》只是提示后人，乾隆还有作曲的才赋。《花子拾金》不能算作单支曲子，应是北曲（昆曲）小段，即短剧，讲的是一个叫花子拾金而发财的故事。这是戏曲创作而非音乐创作，但在古代总之是一个“曲”字。

多愁善感的光绪皇帝注定是一个音乐爱好者。裕德龄说他是天生的音乐家，种种乐器都不学而能，最喜欢的是洋琴，即钢琴。光绪的爱好都在西洋乐器上，殿内摆放着许多精制的钢琴。经德龄的传授，光绪能在钢琴上弹奏舞曲。

九、诗人皇帝

帝王，在国人中间属于文化人。不识字皇帝几乎没有，有识字不多的开国皇帝，读书不甚行，但可听书。那些在宫中长大的嗣位皇帝，由全国一流文士中的卓越者为之启蒙，教习经史、书翰，接受严格的教育，可以说皇帝是高门弟子了。且看十四岁的朱瞻基（明宣宗）怎样即兴续祖父出的对联：永乐十一年端午节，明成祖率皇亲击球射柳，观众有文武群臣、四夷朝使、在京耆老，成祖见皇太孙连发连中，武艺达标，大喜，紧接着试其文才，出上联“万方玉帛风云会”，太孙随即叩头应声道：“一统山河日月明”。果然才思敏捷。

大多数皇帝都有作诗才能，但把诗文当作嗜好、甚至当作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的皇帝并不多，这和皇帝们的性情、天赋有关。多愁善感和豪爽、浪漫的个性引导他们喜欢诗，天赋则影响他们的能力和水平。

汉武帝雅好诗文，他自己的水平算是中等，怀悼李夫人的赋是代表作，仍可见想象力丰富，文辞典丽。武帝的鉴赏水平甚高，当时司马相如尚未显达，其作品《子虚赋》令他玩味不已，未知作者是当代人，乃叹道：“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此话被侍立一旁的狗监（职官）杨得意听到，杨是司马相如同乡，禀告：“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武帝惊喜，马上派人召来相如。此后，武帝与司马相如结成了文学上的朋友，经常读到相如的作品，但武帝并没有作品与相如交换，除了一层君臣关系外，是因为武帝没法与相如比试水平。

魏晋南北朝出现了很多诗人皇帝，被迫认为皇帝的曹操是位领一代风骚的政治家，魏文帝曹丕写诗吟诵，不落其父之后。

南梁的君主不知为何都染上了诗癖。梁武帝萧衍的爱好不脱时代特色，专喜细赋、阴柔的闺怨诗。他最喜欢的诗人是谢朓，到了“不读谢诗，三日觉口臭”的程度。谢朓也擅长这类风格的诗，兹举一首“玉阶怨”：

夕殿下珠帘，流萤飞复息。

长夜缝罗衣，思君此何极！

梁武帝之子萧统、萧纲都沉醉于诗文。先立为太子的萧统是位青年文学家，他编纂了中国第一部文学总集《文选》，著有文集、诗集四十卷。冥冥中注定等待他的不是帝位，而是英年仙逝。萧统死后谥为“昭明太子”，现今流传下来的著作又称《昭明文选》。萧统的弟弟萧纲即后来的梁简文帝，自称“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他继萧统为太子后，以作艳诗自娱。“艳”意为美人，古代楚地的歌曲也称为艳，艳诗则是指男女爱情诗，与闺情闺怨诗属一种源流。萧纲的艳诗在南梁广为流传，文士争相效仿，艳诗很快成为当时诗坛的主旋律，由于它出自宫中，又被称为“宫体”。

梁简文帝的《美女篇》：

佳丽尽关情，风流最有名。

约黄能效月，裁金巧作星。

粉光胜玉靥，衫薄拟蝉轻。

密态随羞脸，娇歌逐软声。

朱颜半已醉，微笑隐香屏。

南梁的君臣几乎无一不是诗人，一群诗人组成了一个朝廷。君臣宴乐，常常诗兴大发，吟诗往往成为宴饮上的主要内容，这种宴便叫诗宴。在诗宴

上，文臣们竞相展示才华，梁武帝时，沈约当仁不让是文坛泰斗，诗宴自然由他担任主角，他负责分韵给在座诸臣，要求即兴成诗。一次，武将曹景宗立功还朝，参加诗宴，沈约以为他只会吃酒，没分给他韵。曹景宗不甘寂寞，执意要求赋诗，但韵将分完，只剩下“竞”、“病”二字。曹景宗领了韵，稍作沉思，挥笔完成，诗中的韵句是“归来笳鼓竞”，“何如霍去病”。真是急智惊人、功底下浅，文臣们不得不对武将刮目相看了。

梁武帝第七子、五岁就能背诵《曲礼》的梁元帝萧绎，文才不在兄长们之下，可惜遭逢外乱。当北魏大军进攻至城下时，梁元帝别无良策，却在城上身穿戎服对臣下讲《老子》，巡城时犹口占为诗，随从的大臣也有占诗与他唱和者。天不保佑，诗书如何能够保佑？眼见魏军发起猛攻，城将不守，梁元帝愤而焚烧图书，以宝剑击柱，哀叹：“文武之道，今夜尽矣！”然后，出城投降。

十、隋炀帝痴爱文词

隋代的杨坚、杨广父子都不乏诗才，比较而言，儿子比父亲更爱诗文，且才高一筹，更加自负。隋文帝杨坚作皇帝的第十年，巡幸至并州，与亲族宴饮，忽感时光易逝，前景难料，生悲怀而作四言诗：

红颜讵几，玉貌须臾。
一朝花落，白发难除。
明年后岁，谁有谁无。

隋炀帝痴爱文词，对文学有较深的修养，史称他的文风“并存雅体，归于典制。虽意在骄淫，而词无浮荡”。由于爱好文学，炀帝改变了以往的取士标准，专以诗赋取士，广罗文士、才子，入仕朝廷。

隋炀帝自奉才高，认为自己的文才在天下文士之上，曾对待臣说：“天下皆谓朕承藉绪余而有四海，设令朕与士大夫高选，亦当为天子”。但隋炀帝却时而发现自己的高估不切实际，一些文士才华闪烁在他之上。他每看到惊人妙语出于别人之手便忿忿不已，隋炀帝的个性也非宽弘、磊落，而是诡秘、偏狭。他因一篇歌颂文帝时代而不赞美本朝的文章，杀害了作者薛道衡，实则是内心忌恨薛道衡的文采。薛道衡死时，炀帝解恨说：“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空梁落燕泥”是薛道衡诗中的一个佳句，未想到引得皇帝如此衔恨。另一位文士王胄依附叛乱的杨玄感，败后被捕，然后被送上断头台。王胄死前，炀帝诵其佳句曰：“‘庭草无人随意绿’，复能作此语邪！”看来是文采太高，不被君容，否则不一定丧命。同是诗人，南唐中宗李璟也有过隋炀帝的这种酸涩感觉，但他没有恼羞成怒，只是以玩笑的口气对冯延巳说：“‘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

隋炀帝晚年在醉生梦死中度日。在东都洛阳，日夜酣饮，以图麻醉自己，遗忘那些令他心烦而无对策的祸乱。隋炀帝本来具有牧羊犬般敏感而警惕的本能，羊群已经四散逃跑，他却故作无事悠闲度步，内心能不如麻乱、如火焚？他在洛阳作的五言诗，结尾是“徒有归飞心，无复因风力”。诗成，令美人再三吟咏，炀帝位下沾襟，侍御者莫不歆歔。

隋炀帝生命的最后一站是江都，在江都留下一首百感交集的五言诗：

求归不得去，真成遭个春。
鸟声争劝酒，梅花笑杀人。

但隋炀帝也彻底享受过乐不够的时光，他在东都咏道：

洛阳城边朝日晖，天渊池前春燕归。
含露桃花开未飞，临风杨柳自依依。
小苑花红洛水绿，清歌宛转繁弦促。
长袖逶迤动珠玉，千年万岁阳春曲。

在龙舟千里下江南的路上，隋炀帝欢心鼓舞，写下《泛龙舟》，配曲歌唱：

舳舻千里泛归舟，言旋旧镇下扬州。
借问扬州在何处，淮南江北海西头。
六辔聊停御百丈，暂罢开山歌棹讴。
讵似江东掌间地，独自称言鉴里游。

十一、唐帝好文墨

唐代是诗人蜂聚云集的朝代，皇帝如有幸被列入诗人的阵容里，也不过是不起眼的角色。对于身系天下的皇帝来说，作诗只是雕虫小技，不必象梁元帝、隋炀帝那样被诗陷进去以至于被夺命或夺人之命。

倚筵移暮景，紫阁引宵烟。
南栋歌尘合，分阶舞影连。
声流三处管，响匝二重弦。
不似秦楼上，吹箫空学仙。

这是唐太宗的《三层阁上置音声诗》，一番闲情雅兴，道出人间仙子的滋味。赋诗，是君臣间文雅的游戏。一次在洛阳，太宗宴群臣于积翠池，酒酣，命大家各以历史事件、人物赋诗一首，他自己先赋《尚书》：

日昃玩百篇，临灯披五典。
夏康既逸怠，商辛亦沉湎。
恣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鲜。
灭身资累恶，成名由积善。
魏征紧接着太宗的思路，以西汉历史作诗：
受降临轺道，争长趣鸿门。
驱传渭桥上，观兵细柳屯。
夜燕经柏谷，朝游出牡原。
终籍叔孙礼，方知天子尊。

太宗说：“魏征每言，必约我以礼”。有魏征在，唐太宗的神经就不得松弛，须臾不敢怠慢。然而在另一种场合——与近臣的宴饮中，气氛就不一样了，太宗尽可仰面捧腹。一次在这种宴席上，太宗令近臣们相互嘲谑，揭别人的短处取乐。皇后之兄长孙无忌先嘲弄书法家欧阳询，欧阳询身材瘦小而貌丑，长孙无忌一诗道出：

耸膊成山字，埋肩不出头。
谁家麟阁上，画此一猕猴？
欧阳询应声回诗作答：
索头连背暖，漫裆畏肚寒。
只由心溷溷，所以面团团。

长孙无忌生性怕寒，长着一张圆脸，冬天头戴大厚皮帽，古人的袍服里面裆是开着的，长孙却缝紧了裤裆。欧阳询的诗并不比长孙无忌赠送的诗更尖刻，然而太宗在大笑后收敛起笑容对欧阳询说：“汝岂不畏皇后闻耶？”

李白与唐玄宗共处一个年代，他的才气传到玄宗耳里是自然的，玄宗特在金銮殿召见他，共论时事，李白当即挥笔成《颂》。玄宗大为欣喜，赐食，并亲自为李白调羹，诏命供奉翰林。

如果把唐玄宗与李白的关系和汉武帝与司马相如的关系相比，似乎前者的遗憾要多一些。也许是李白更不适合做一名臣下吧。李白空有凌云志，他不愿只充作御用文人，而玄宗恰恰只是在需要诗文时才会想到李白。在翰林中李白受到了皇帝的特殊重视，但他从未受宠若惊过，这是个性使然。玄宗未能得到李白的多少颂歌也罢，但脱靴一事，令玄宗和高力士这对主奴都有点受不了，高力士终生以脱靴之事为耻，得到了杨贵妃的同情。而李白的诗“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一句，把杨贵妃比作汉代赵飞燕，杨

贵妃初不以为意，经高力士指点，才悟出这种比喻是贬贱了自己。如此，李白在玄宗的身边结下了两个冤家，这岂是聪明的仕宦者做出来的事？

玄宗晚年枯寂悲凉，往事耿耿于怀却又如幻影，虚、实、死、生浑沌如也，只有李白的《傀儡》诗能应对他的心情。在宫中，人们常能看到毫无当年声色的老人在吟诗：

刻木牵丝作老翁，鸡皮鹤发与真同。

须臾弄罢浑无事，还似人生一世中。

李白和唐玄宗死于同一年，一个在流落地当涂，一个在长安冷落的宫院。

唐代另一位伟大诗人杜甫的诗句，许多年以后常被唐文宗吟诵：

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

……

唐文宗的诗斯文雅致，澹泊悠远，且看这一首：

辇路生春草，上林花满枝。

凭高何限意，无复侍臣知。

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有首诗是奉唐武宗之命作的。唐武宗曾与一名宫女生气，长时间冷落她，后来气稍缓，复召见她。当时柳公权在内庭充当文学侍从，武宗对柳公权说：“朕怪此人，若得学士一诗，当释然矣”。柳公权几乎不加思索捏来一首，代宫女发言：

不分前时忤主恩，已甘寂寞守长门。

今朝却得君王顾，重入椒房试泪痕。

武宗闻诗，心情顿时畅快，前嫌尽释，忙牵来宫女向柳公权拜谢。

唐末期另一位有诗文雅兴的皇帝是唐宣宗。唐宣宗性情内向、沉着寡言，武宗在位时，他是皇叔，以装痴为韬略，保全自身，他曾与僧人黄蘗同游，观瀑布，黄蘗咏得上联：

千岩万壑不辞劳，远看初知出处高。

宣宗的下联已胸有成竹：

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

这两联似成偈语，预示宣宗终登大位，不久果然兑现。宣宗即位后，对诗文的爱好益增，大臣的诗也常得到他的琢磨品味。一次，宰相荐李远为杭州地方官，宣宗闻李远之名，想起他的诗，便对宰相令狐绹说：“比闻李远诗云‘长日惟消一局棋’，岂可以临郡哉”。宣宗以为李远是个他事不问的棋迷，而令狐宰相更了解李远，回皇帝：“诗人之言，不足为实也”。阐明李远廉察可任，宣宗乃同意。

十二、君臣曲宴

欲出未出光辣挞，千山万山如火发。

须臾走向天上来，赶却残星赶却月。

这是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创业时作的《咏日》诗。词虽不甚典雅，但一腔豪情壮志抒发得痛快淋漓。这是开国皇帝应有的气魄，令人想起汉高祖刘邦“大风起兮”的吟唱。不过即位以后，就未见宋太祖有多少诗情了。

宋太宗颇懂得以诗赋联络君臣的情义。早在藩邸时便与大臣李昉作诗唱和，乃至二十多年后，李昉以年老致仕还家，太宗在元宵节登楼设宴，召至李昉，亲酌玉樽为他敬酒，赐食佳肴。语及他们唱和之事，李昉竟如儿童背《诗经》一样，一口气背诵了太宗的御制诗将近七十篇。太宗感慨道：“何记之精邪？”李昉答：“臣自得谢（即致仕后），无事，晨起巾栉，每一诗日诵一遍”。太宗也告诉他：“朕以卿诗别笥贮之”。

侍读学士杨徽之以诗闻名，太宗得知后，向他索要全部诗篇。杨徽之感激莫名，整理了数百篇，奏呈，卒篇附以谢恩诗：“十年牢落今何幸，叨遇君主问姓名”。太宗和了一诗赐给他。读了杨徽之的诗，太宗对宰相说：“真儒雅之士，操履无玷”。升杨徽之为礼部侍郎，并亲自挑选其诗集中的十联，写在屏风上。太宗所欣赏的十联诗是：

犬吠竹篱沽酒客，鹤随苔岸洗衣僧。

《江行》

天寒酒薄难成醉，地迥台高易断魂。

《寒食》

戍楼烟自直，战地雨长腥。

《塞上》

偶题岩石云生笔，闲绕庭松露湿衣。

《僧舍》

新霜染枫叶，皓月借芦花。

《湘江舟行》

废宅寒塘雨，荒坟宿草烟。

《哭江为》

青帝已教春不老，素娥何借月长圆。

《嘉阳川》

浮花水入瞿塘峡，带雨云归越巂州。

《嘉阳川》

春归万年树，月满九重城。

《年夜》

开尽菊花秋色老，落残桐叶雨声寒。

《宿东林》

宋真宗时常与群臣曲宴，宴席上群臣欢洽，谈笑无间。一次真宗品酒问大臣，哪家酒铺最好，有人答称“南仁和”。真宗于是命人到“南仁和”沽酒来，遍赐宴席，品味“南仁和”的酒。真宗也觉得甚好，问起价格，宦官以实对答。真宗忽然问左右的大臣：“唐酒价几何？”大臣们一时懵住了，目目相视，便闻副宰相丁谓开口道：“唐酒每升三十钱”。真空曰：“安知？”丁谓称：“臣尝读杜甫诗曰：‘蚤来就饮一斗酒，恰有三百青铜钱’。是知

一升三十钱”。真宗大笑说：“甫之诗自可为一时之史”。

副宰相丁谓文辞敏捷，并能急中生智的本领给宋真宗留下了深刻的好感。真宗每年赏花钓鱼，命群臣以此题材作诗，某岁，真宗临池钓鱼，鱼并不合作，不吃真宗的钓饵。许久钓不上一条鱼来，真宗不免烦躁，而丁谓的应制诗及时奉出，诗中道：“莺惊凤辇穿花去，鱼畏龙颜上钓迟”。此诗妙极了，真宗大加称赏，一旁也在应制赋诗的群臣皆自以为不及。

在皇帝面前即兴作诗，要正切君怀，且显不出阿谀奉承来，十分不易，而这正是皇帝身边的臣僚们孜孜以求的。某日，宋真宗对御沟旁的柳树产生诗情，作诗一首，命宰相和中央两省大臣和诗，门下省的右正言陈执中进献的和诗最得要领：

一度春来一度新，翠光长得照龙津。

君王自爱天然态，恨杀昭阳学舞人。

久负诗名的梅尧臣，被大臣们屡次推举应入国子监，终于见到考核官仁宗皇帝。早在赐见前，仁宗就对他的诗玩味已久了，梅尧臣进殿，仁宗悠然问道：“能赋‘一见天颜万人喜，却回宫路乐声长’者也？”经仁宗亲试，梅尧臣被赐为进士出身，升职国子监直讲。

宋代卓越的文学家苏轼与宋神宗为同时代人，也得到神宗的垂意。“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

南宋孝宗为政从容宽厚，政务之暇，喜编唐人绝句。大臣洪迈随侍于内庭时，孝宗告以：“宫中无事，则编唐人绝句以自娱，今已得六百余首”。洪迈却说：“以臣记忆，恐不止此”。孝宗问总共共有多少，洪迈估算说有五千首，孝宗大惊道：“若是多耶？烦卿为朕编集”。洪迈归家搜阅，忙了一年，发现自己夸大了口，何来五千首唐人绝句？最后只搜罗到不足一千首，还把稗官小说、神仙鬼怪和妇女诗作包括了进去。孝宗本已知道洪迈所说的五千首是妄称，但这位富于温情的皇帝仍嘉奖洪迈的敏贍，予以升迁，赐给金帛。

因宪圣吴太后力主以光宗继孝宗之位，光宗即位后与太后家族关系密切，太后同母弟吴玠尤承眷宠。光宗曾与国舅作诗唱和。光宗赏花时在团扇上题诗二句：

细叠轻绡色倍 酉 浓，晚霞犹在绿荫中。

其诗如一幅春意缱绻的图画。题完，光宗命吴玠续作下两句，吴玠拜谢后，提笔附上：

春归百卉今无几，独立清微殿阁风。

“独立”一词在这里有双关意义，意指吴太皇太后独立光宗即位之事。光宗称叹吴玠续得好，玩赏久之。

十三、金帝文墨功夫

与隋炀帝有相似之处的金海陵王，残忍、淫荡又多猜忌，却具备上等的文墨功夫。海陵王迁都汴京的那一年，中秋举杯，欲抒豪情，然而月亮躲在云后始终不出现。待月不至，海陵王乃填《鹊桥仙》词：

停杯不举，停歌不发，等候银蟾出海。

不知何处片云来，做许大通天障碍。

髭髯撚断，星眸睁裂，惟恨剑锋不快。

一挥截断紫云腰，仔细看嫦娥体态。

金代最趋文雅、最擅诗赋的皇帝无疑要算金章宗，金章宗也是他所处的时代中最富文采的女真人。他的母亲是宋徽宗某公主之女，血缘的关系，促成了他对汉文化的兴趣。金章宗的父亲，被谥为金显宗的完颜允恭就是位诗词爱好者，那么其子的稟赋就更不是偶然的了，兹录显宗的一首咏风筝诗：

心与寥寥太古通，手随轻籁入天风。

山长水阔无寻处，声在乱云空碧中。金章宗天姿颖悟，诗句中灵气逼人，且看他的咏牡丹诗：洛阳谷雨红千叶，岭外朱明玉一枝。

地力发生虽有异，天工造物本无私。

下一首宫中绝句也是金章宗的杰作：

五云金碧拱朝霞，楼阁峥嵘帝子家。

三十六宫帘尽卷，东风无处不杨花。

橙子难得进入北方宫廷，贵妃掏空瓢子，外观橙黄光亮，章宗戏称为软金杯，还为软金杯赋得一诗：

风流紫府郎，痛饮乌纱岸。

柔软九回肠，冷怯玻璃碗。

纤纤白玉葱，分破黄金弹。

借得洞庭春，飞上桃花面。

十四、紫禁城内的风雅皇帝

时光转到明代，永乐皇帝坐稳江山后，亦附庸文雅。中秋开宴，欲与群臣举杯邀明月，偏偏这个月亮与金海陵王见到的一样，躲在云后。成祖命学士解缙以此为题赋诗，解缙口占《落梅风》词，奉上：嫦娥面，今夜圆。下云帘，不着臣见。

拼今霄倚阑不去眠，看谁过广寒宫殿。

解缙为人幽默，这首小令由他拈来逗趣，以解君臣赏月而无月之尴尬。果然皇帝来了兴致，真要“拼今霄倚阑不去眠”。待到半夜，忽然云开月朗，成祖大喜，道：“才子，可谓夺天手段也”。假如没有“靖难之变”，建文帝也会在这个中秋之夜赋词。论作诗的才情，建文帝决不逊于他的叔父。传说建文帝化妆为僧，潜逃至贵州，曾在金竺长官司罗水庵题诗于壁间：

遥想禁城今夜月，六宫犹望翠华临。

百官此日知何处，惟有群岛早晚期。

再看孝宗皇帝的桃符写得怎样，孝宗天性好静，有时玩弄一下文字也是自娱，他在某年端午节手书一桃符：

采线结成长命缕，丹砂书就辟兵符。

意在祈求延年、平安。孝宗不爱将自己的作品传扬出去，宫廷外的人很难看到他的作品。而一般皇帝在写诗作文上都煞有介事。如明世宗，把自己的作品交大学士更定，大学士岂敢对皇帝的诗妄加圈点，只有倍称圣制精妙，使得天颜怡悦，君臣欢洽，不过明世宗有时会批改大学士的诗，大学士杨一清曾拟赋上元诗进呈，其中有句“爱看冰轮清似镜”，世宗琢磨此句似是写中秋而非元宵，乃改成“爱看金莲明似月”金莲应指花灯，圆而亮。杨一清上疏谢恩，称道：“曲尽情景，不问而知为元宵矣。圣资超悟，殆非臣下所及，信乎非一清所及也”。

清帝作诗，似乎与以往帝王不同，诗的情、韵、境仿佛是次要的，常以阐述大义、歌颂功德为主题。皇帝的每一所宫殿、每一个去处都有御制诗，正象雅乐被普及一样，皇帝的诗也雅而不艳了，如果用词再晦涩一些就近于雅乐的词章了。然而，无人能够否认清代帝王文学、经史修养之深邃，诗中频频使用典故，都是披览万卷书的结果。拥有御制诗五集、作诗十余万首的乾隆皇帝，与其祖父康熙一样酷爱读书，不同的是乾隆好大喜功，作诗数量千古无人能比，尤爱在诗中炫耀博学。每首诗写成后，交儒臣注释，一时注不出来的，允许回家翻阅经史。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满腹经纶的儒臣把万卷书翻遍竟找不到御制诗中的出处，然后由乾隆点出其出处，以博一笑，群臣无不佩服。如此，多次证明皇帝学问远在群臣之上。例如，乾隆在《塞中雨猎》诗中用了一个“制”字，大臣无人通晓“制”字在此作何解释，乾隆笑他们：“卿等一代矩儒，尚未尽读《左传》耶？”指出《左传》中有陈成子杖制以行之语，“制”在诗中就是使用杖。

清帝如此博学，自然不会作不出唐音宋韵之诗，康熙的《弹琴峡》就是这样一种好诗：

琮琤流水意，仿佛似鸣琴。

曲度泉归壑，声兼峡泛吟。

空山传逸响，终古奏清音。

不御金徽久，泠泠会素心。

康熙曾在御苑南海捕鱼赐群臣，群臣赋诗谢恩。翰林学士查初白诗的末句是“笠簷蓑袂平生事，臣本烟波一钓徒”。很称康熙之意。康熙忽然命宦官传语：“宣烟波钓徒查翰林”，皇帝的戏语令大臣们备感亲切和幽默。

咸丰在位时，不复有清代盛年的祥和景象，国运已衰，悲愤感慨之情常寄寓诗中。某年元旦，咸丰写下“一杯冷酒千年泪，数点残灯万姓膏”。悲天悯人，也透出咸丰皇帝文学修养不浅。大臣林则徐死在负重致远的途中，海内痛惜，咸丰为之震悼，遂亲自为林则徐书写挽联：

答君恩，清慎忠勤数十年，尽瘁不遑，
解组归来，犹自心存军国；
殫臣力，崎岖险阻六千里，出师未捷，
骑箕化去，空教泪洒英雄。

清德宗光绪，得之于翁同龢的教导，文词斐然可观，大臣王文韶认为光绪的文字颇似翰林院中人。在幽禁中，光绪写下长篇《幽思赋》，幽怨哀艳，继《诗经·雅》与《离骚》的遗风，读来令人长叹息。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时，慈禧挟光绪西逃，光绪幽居的瀛台被某国兵占据，而写成摺册的《幽思赋》流落于市井。此摺册字迹依稀，人们看得出是皇帝的翰墨：

……天既付予有家兮，乃遗大投艰于朕身。……呼昊天以罔极兮，伤我生之不辰。伊余情之信芳兮，椒酒进兮将饮，念椒专佞以慢谄兮，夫安知其不为鸩。……万物除旧而布新兮，穷则因时而变通。……深宫既邃远而莫叩兮，渺九阍之孰吁。岂余身之惮殃兮，念民彝之攸斁，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又焉能忍而与之终古。……心宛结而不解兮，思蹇蹇而不释。

十五、书画天才宋徽宗赵佶

书法、绘画是文人的艺术。在书画中卓有才能的皇帝首数北宋的亡国之君——宋徽宗，如果说陈后主、南唐后主是皇帝中的诗人，那么宋徽宗则是皇帝中的书画家，同样是亡国之君，同样在诗书画以外，几乎一无所能，及至国破家亡，死生不能自主。宋徽宗的书法，独树一帜，清瘦、峻刻，呈硬线条的秀姿，号称“瘦金体”。南唐后主李煜由于词作甚丰，人们可能忽略了他的书法成就，其实他也不是书法的外行。李煜还曾尝试创新，喜作颤笔，字形扭折，遒劲如寒松霜竹，号称“金错刀”。他还善写大字，不用笔而是用卷起来的帛，沾墨挥写，颇似今人举拖布而书的情景，全身运动，于字于字，都激情饱满。这种书法当时称为“撮襟书”。“瘦金体”、“金错刀”、“撮襟书”都体现了“劲”与“冷”字，如果字如其人，李后主、宋徽宗怎么能到最后只会“垂泪对宫娥？”

宋徽宗在书画上投入了过多的精力，这是无疑的。为了弘扬书画，他创立了翰林书画院，虽然前代宫廷中也出现过画院机构，但这一次规模空前，可以与唐玄宗创立的空前的宫廷乐舞机构相媲美。书画院广罗人才，史称，宋徽宗以类似取士的方法，在书画上兴学较艺，选拔优秀，在书画家米芾当上了书画学博士，书画俊才得以与皇帝交游。而另一位大书法家蔡京高居相位，尽管他走的是科举正途，然而没有超众的书法技艺，徽宗未必能看中他。君相二人经常研论书艺。

徽宗对绘画对象的观察极具耐心，是一位非常投入的画家。他观察孔雀单腿独立的故事流传甚广。某日，徽宗命画师们面对实物，各画一幅孔雀欲升藤墩的图像。此时孔雀是双腿立地，画师们凭想象构图，结果都不称旨。徽宗指点说：“孔雀欲升高，必先举左”。经证实，皇帝的观察正确，画师们无不叹服。

宋徽宗为了画好鸟的眼睛，独出心裁，用墨漆点睛，隐然如豆，高出画布的平面，呈现出立体感，这是徽宗作画的又一佳话。

宋徽宗的书画创作在沦为阶下之囚后仍未终止，他在囚禁中作画的事情是在六百多年后的清代才得到证实的。徽宗的最后囚所和死所是五国城，星转月移，到清代该地名叫白都纳。乾隆年间，副都统绰克托筑城，掘得宋徽宗在此地画的鹰轴，盛于紫檀匣中，墨迹如新。宋徽宗对书画至死不渝的痴爱，实在感人。想当年，徽宗被掳，高宗在临安再延宋脉。物是人非，高宗时时面对父皇遗留的画扇流泪感伤。此扇被一个姓左的宦官偷携至家，在内廷应制的诗人康与之适来与左燕饮，见左出示的徽宗画扇，慨然情生，在左氏入内取肴核的时候，康与之情不自禁在扇上题诗一首：

玉辇宸游事已空，尚余奎藻绘春风。

年年花鸟无穷恨，尽在苍梧夕照中。

左氏见画扇被题，大惊失色，而康已深入醉乡。次日，左宦官伺高宗闲适时叩请死罪，高宗怒将画扇取过，诗入眼帘，高宗愠怒立消，然后又是一番悲恸。

十六、皇帝书画之娱

历史上，书画何时成为人的一种修养，在此不敢考证。只知未能当上皇帝的项羽，早年要学点本事，学书而不成，却说：“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史称，西汉元帝多才艺善史书，然而语焉不详。东汉明帝雅好丹青，别开画室，创鸿都学，以集奇异之人才与作品。喜好游玩的汉灵帝颇留意书法，征召全国工于书法者数百人于鸿都门。这些书法家各具特色，有善于作大字的，大到一字径丈，善于写小字的则方寸千言。

曹魏少帝，即废为高贵乡公、最后被杀的曹髦，有绘画之才，唐人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曹髦之迹，独高魏代，有作品《祖二疏图》、《盗跖图》、《黄河流势》、《新丰放鸡》、《犬图》传至唐代。晋明帝司马绍，最善画佛像，其画图略于形色，却颇得神气，笔迹超越。其作品有：《豳诗七月图》、《毛诗图》二、《列女》二、《史记列女图》二、《杂鸟兽》五、《游清池图》、《息徒兰圃图》、《杂畏鸟图》、《洛神赋图》、《游猎图》、《杂禽兽图》、《东王公西王母图》、《洛中贵戚图》、《穆王宴瑶池图》、《汉武回中图》、《瀛洲神图》、《人物风土图》等。

南齐高帝萧道成，博学，工于草隶，当时大臣王僧虔也博通经史兼善草隶，以才气自负的齐高帝欲与王僧虔一赌输赢，双方各挥笔墨，然后，齐高帝问：“谁为第一？”王僧虔答得巧妙：“臣书人臣中第一，陛下书帝中第一”。萧道成笑道：“卿可谓善自谋也”。

南齐武帝萧赜是萧道成之子，秉承其父的书法天赋，臣中第一的王僧虔仍在朝廷供职，武帝欲作书界雄主，障眼者唯有王僧虔。善于自谋的王僧虔在武帝之世，不再敢显露锋芒，常用拙笔，以此获得武帝的宽容。武帝常观落英茂木的姿采，创“花草书”之体，这种形如花木之叶片的柔媚字体恰与萧赜刚毅果断的性格相反相成。

梁武帝在理政之余，也爱琢磨书法，他总结道：“夫运笔斜则无芒角，执手宽则书缓弱，点掣短则法拥肿，点掣长则法离渐，画促则字势横，画疏则字形慢，拘则乏势，放又少则，纯骨无媚，纯肉无力，少墨浮涩，多墨笨钝。比并皆然，任意所之，自然之理也。若抑扬得所，趣舍无违，值笔廉断，触势峰郁，扬波折节，中规中矩，分润下注，浓纤有方，肥瘦相和，骨力相称，婉婉暧暧，视之不足，稜稜凜凜，常有生气，适眼合心，便为甲科”。对钟繇的字，梁武帝形容：如舞鹤游天，飞鸿戏海。

梁元帝虽一目失明，却无碍他对书画的偏好。有一幅时称“三绝”之作，出于梁元帝的手笔，他自绘宣尼（孔子）像，自作赞文，亲书于其上。梁元帝的作品还有《圣僧图》、《蕃客入朝图》、《职贡图》、《鹿图》、《师利像》、《鹤鹤》、《陂池芙蓉》、《醢鼎图》。

唐太宗算不算书法家呢，正象他的诗作在唐代算不得一流一样，在人才济济的盛世，唐太宗的书法未必能争得一家的地位，但他与书法真正是结下了不解之缘。

太宗执政之暇，象个初学的少年一样临书习字，虔诚笃敬之心贯注。长年不倦，多有心得。他曾对人说：“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惟在求其骨力，及得其骨力而形势自生矣”。多年以后，太宗认为已深得书法之真谛，乃作《笔法论》、《指法论》。《笔法论》教导初学者，应收视反听，绝虑怡神，只有心正气和，契画才会归于玄妙，如若心神不正，气志不宁，

则字画之出，只能是欹斜颠仆，如鲁器乱陈。书写时为点必收，贵紧而重；为画必勒，贵涩而迟；为擎必掠，贵险而劲；为竖必怒，贵战而雄。《指法论》中说，字以神韵为魂，如神韵不和，则字必无态；心豪不坚，则字必不健；以心豪为筋骨，思与神会，合于自然，字画之业才能日臻完善。

太宗于二王书法中，偏爱王羲之，他评点王献之的字，曾说：“献之虽有父风，殊非心巧，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笔纵拘束，若严家之饿隶。其枯树也，虽槎枿而无屈伸；其饿隶也，则羸羸而不放纵”。

除了临古人字贴以外，唐太宗以虞世南为师学书。虞世南是位旷世奇才，入仕隋朝时，隋文帝称他有五绝：“一曰博学，二曰德行，三曰书翰，四曰词藻，五曰忠直。有一于此，足谓名臣，而世南兼之”。虞世南早年学书于同郡僧人智永，智永是王羲之《兰亭序》的藏主，精研王右军的书法，唐人何延之在《兰亭记》中指出智永就是王羲之的七代孙。智永是否真是王羲之的子孙无妨，他确可作为王氏书法的传人。虞世南学书于智永，唐太宗学书于虞世南，真象是一脉相承。不过，唐太宗的书法实践似不及于他的理论或议论，他从虞世南学书，每每在“戈”字上窘住，总是不得要领，一日太宗正写“戠”字而不敢完成右半边，召虞世南来补写戈字。一幅字完成后，太宗拿到魏征面前，请他鉴赏，魏征眼力之惊人出乎太宗的意料：“仰观圣作内，‘戠’字戈法逼真”。太宗不得不叹服魏征的识见和无情。

太宗经常将自己的作品书之于屏风，以示群臣，称颂之声不绝于耳，谄谀者有之。然而太宗的书法功夫虽不抵虞世南，也足够非同凡响了。他对自己的书法成就十分自信，曾对朝臣说：“书学小道，初非急务。时或留心，犹胜弃日。凡诸艺业，未有学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专精耳”。

唐太宗寻访王羲之《兰亭序》的故事，是书法史上的一则传奇。据说僧人智永死后，他所收藏的《兰亭序》传给了弟子辨才，辨才在寝房的伏梁上凿了一个暗洞，以藏此宝。太宗搜求王氏的书帖，几年间搜得二千六百纸，唯独《兰亭序》不见踪影。闻知辨才知道下落，将他召来寻问，辨才推说《兰亭序》已在战乱中散失，太宗恨恨不已。将辨才放归后，反复推究，结论是该帖只能在辨才处，又下敕令追回辨才，再问兰亭所在，老僧坚决不吐真情。如此，更加重了太宗对《兰亭序》的渴求，耿耿难寐中想出了智取之策。宰相房玄龄及时推荐了智谋之士萧翼——这位监察御史乃是梁元帝的曾孙，身兼才艺谋略，面见太宗定计之后，萧翼便以一个山东书生的模样南下至越州。萧翼衣衫潦倒而气质高雅，很快便在寺庙结识了辨才，二人弈棋抚琴，谈说文史，意甚相得。双方以诗赠答，叹相知之晚。几句过去，谈及书法，萧翼说：“弟子先传二王楷书法，弟子自幼来耽玩，今亦数帖自随”。辨才请他拿来一看，次日萧翼拿来，辨才端详之后说：“是即是矣，然未佳善也。贫道有一真迹，颇是殊常”。辨才道出此贴便是兰亭，萧翼用激将法，说：“数经乱离，真迹岂在？必是响榻伪作耳”。辨才便急于将兰亭展示，萧翼仍指认这是伪作，佯为不感兴趣。此后，辨才不再将兰亭藏于伏梁，而是与萧翼的那几帖一同置于几案，每日于窗下临学数遍。日久不存猜疑，萧翼趁辨才出外，令寺童开门，窃走兰亭。及至萧翼在督邮处以御史面目再现，召辨才来时，老僧惊惧昏绝，良久方苏醒。

得《兰亭序》后，太宗命供奉榻书赵模等四人，各榻数本，以赐皇太子、诸王、近臣。太宗崩逝后，根据其遗嘱，王羲之的书帖陪葬于昭陵，《兰亭序》以玉匣贮之，其它二千六百纸皆以一丈二尺为轴，伴太宗长眠地下。多

年后，昭陵被盗，《兰亭序》还于民间。

唐太宗的后代，唐高宗善作飞白书，唐玄宗善作八分书，各逞其才。玄宗流传至今的作品是行书《鹤鹑颂》，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

宋太宗赵光义在笃好书法上不落唐太宗之后。淳化年间，他将搜集来的古帖编为十卷，刻石于秘阁，此后这些古帖称为阁帖，可惜这些刻石后来遭火灾被毁。

当时大臣王著学王羲之书，深得其法。宋太宗在闲暇时，也学练王氏书法，经常命宦官将他的习书持示王著，请他评议。最初，王著的答复是：未善。太宗更加刻意临学，之后，再拿给王著，王著再次以未善为对。反复多次，太宗再接再厉，执意求进。旁人问王著何以用此法规益皇帝，王著说：“书固佳矣，若遽称善，恐帝不复用意”。此后，宋太宗练就笔法精绝，超越前古的工夫，王著之功存焉。

皇帝也好为人师，仅当学生是不够的。宋太宗经常御笔飞动，召书吏中可造就者于便殿，向他们传授笔法，观其长进，学有所成者赐以银章象笏，入翰林院待诏。

宋仁宗，在当朝士人的眼中是“天纵多能，尤精书学”，他的飞白书已达炉火纯青。文臣李唐卿曾撰飞白三百点进呈，仁宗颇为嘉赏，特作“清静”二字赐给李唐卿，这二字中的六点尤为奇绝，出于李唐卿的三百点之外。仁宗喜用飞白书为宫殿门观题榜。大臣之碑上也多有仁宗的赐篆，如王曾之碑篆文是“旌贤”，寇准之碑是“旌忠”，范仲淹是“褒贤”，吕夷简是“怀忠”。

仁宗还曾用飞白书答谢辽兴宗的赠画。辽兴宗耶律宗真通儒术、好音律、擅绘画，他画的鹅鸭点缀精妙，宛乎逼真，曾将一幅鹅鸭画送给宋朝，得到仁宗飞白书的答谢。后来又将五幅缣画千角鹿图送来，宋仁宗欣然张图于太清楼下，召近臣纵观，次日又经皇后召命妇观览。之后，将画藏于天章阁。

与宋皇室有特殊关系的金章宗完颜璟，嗜好书画，悉心效法宋徽宗之体，在字上，专师“瘦金书”，学画也极逼真。宋徽宗喜用磁蓝纸泥金字贴签，金章宗亦相效仿；徽宗曾用苏合油搜烟为墨，金章宗也要仿之，仅购得一两，而价格却是黄金一觔，挥金如土，金章宗无奈不敢仿效。

明代皇帝对于书画的爱好明显强于对音乐的爱好。书画几乎是明代皇帝皆有的修养，就中最出色者是明宣宗朱瞻基。他书学颜清臣，而微带沈度姿态；在绘事上，喜欢画意趣横生的花石和小动物。现今故宫博物院藏有多幅明宣宗的画作，自然也有不少作品流落到民间，因为宣宗常将画作赐给太监和近臣。如赐给太监吴诚的一幅，画的是一只小鼠正在吃荔子，小鼠的个头比荔子还小，旁有数石，菖蒲树杂错于石间。赐给太监王进（即王瑾）的《子母鸡图》，亲情爱意寄与笔墨点染间，附诗：“斜阳欲没影荒淡，细草乱茁青猗猗”。宣宗画的《黑兔图》，上有丹桂花子垂垂，下有瑞草呈紫白色，黑兔居中间，兔的茸毛外层用淡墨轻轻染成，似碧空满月，贯注着皇帝的一片怜意。宣宗的点染工夫很细，加之观察敏锐，抓取小生灵生动的一瞬，图画情景颇能牵动观者的情感。他所画的黑猿攀槛悬臂取果之景具有动态中的妙趣，仿佛果树枝在摇动，地上布满了果子。《荷雀图》中的小鸟，楚楚动人，湖石水草，俱得真趣。宣宗也常画山水人物，在赠给某王公的一幅小扇面上，画着山溪红树间，一人骑马漫游，后有一名侍从执宫扇，人、马长不及寸，而意态生动。《西山霁雪图》也见功力。

明人沈德符说：“本朝列圣极重书画”，除宣宗书画出众外，宪宗、孝宗父子也精于绘事，明成祖喜好沈度、沈粲兄弟的书法，而明神宗的书法出于宣宗之上，但对画作不甚留意。

明宪宗作画的题材多是神像、金盘、金瓶、牡丹、兰菊、梅竹之类，他的山水小景据当时人记载，也是洒洒出尘。孝宗无意将自己的书画四下传扬，他性情沉静并不自以为是，喜欢默观画士们作画，观赏他人作画的过程也是一种享受，而且可以琢磨笔法，启迪自己的灵感。仁智殿是明代聚集画士的地方，有次孝宗在仁智殿观钟钦礼作画，由于皇帝的脚步声和气息声很轻，钟钦礼全身心投注于创作上，不知道皇帝在背后观看。钟钦礼挥毫如劈如飞，极为兴奋，孝宗也被他这种情绪所感染，钟钦礼画到如醉如痴的地步甚至有些癫狂了，他忽然捋一把胡子大叫：“天下老神仙！”此事后来成为一则美谈，孝宗赐给他“天下老神仙”字作为私印。

明神宗自幼练习书法，加之天资聪敏，十岁即位时已写得一手好字了。神宗最先习赵孟頫字，其后又练章草，而二王的字帖也是神宗习字的重要法帖，在日常宸翰中常常模仿这种笔体，时人称，御墨挥洒，有凤翥龙翔之妙。

明代就连被排出十三陵之外的景泰皇帝也时常点染翰墨，笔下生出明丽的夹竹桃枝、杏花和小鸟；仅作了一个月皇帝的明光宗，每每挥洒出大字扁额、书写对联。

由于天子极重翰墨，宫廷用笔的供应便频繁而考究。明廷规定，每月十四、二十四日两次贡进御笔各二十管。冬天笔管裹绵外施以绫，春天外裹紫罗，夏秋则用象牙、水晶、玳瑁笔管。这些笔都由内府临时指派各地制造，运京。弘治年间，吴兴笔工进造的御用笔都有细刻的小标记，刻上笔工之名，孝宗发现很多笔管上都刻着“笔匠施阿牛”之记，觉得此名太鄙俗，遂更其名为“施文用”。

清顺治皇帝福临，很少人知道他善作指头画。今人王伯敏的《中国绘画史》中说，指头画最先由唐代张璪尝试，宋、元、明期间未出现有此专长的画家，清人高其佩应为指头画的确立者。然而事实上顺治皇帝恰是在高其佩出生以前擅长指头画的人，高其佩生于1660年，顺治则生于1638年，死于1661年。乾隆朝编辑的皇家书画录《石渠宝笈》收录了顺治的四件法书和十五件绘画，这些画是他在十八岁到十九岁时创作的。顺治曾将他亲手画的《渡水牛图》赐赠某大臣，画面皆以手指螺纹点铺，意态生动。高其佩是顺治之后的一名出色的指头画家，对指头画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然而福临这位少年早逝的、以异族入主中原的皇帝，对汉民族沉湮已久的指头画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并创作了很多作品，实在难能可贵。

康熙在政事之余，勤练书法，他临摹的是翰林院詹事沈荃的字，沈荃素习明人董其昌的字体。康熙二十四岁时，曾令沈荃将他的草书《千字文》、《百家姓》奉上，作为字帖，并将御书汉字二幅赐给沈荃。在给沈荃的谕旨中说：“朕素好翰墨，以尔善于书法，故时令书写各体，备朕摹仿玩味。今将朕所书二字赐汝，非以为佳，但以摹仿尔字，故赐汝观之，果相似否？”沈荃感恩上奏：“臣任外吏有年，书法甚为生疏，每奉旨命书，臣皆勉强缮写进呈。今不意皇上殊恩，将御书颁赐，臣获恭睹宸翰，精妙已极，实由无纵。臣书陋劣，何堪上尘御览。钦捧皇上御笔，非但臣一身感戴，传之子孙，永荷皇恩于不朽矣！”

清代大臣对于皇帝益加诚惶诚恐，王著规策宋太宗苦练书法的故事不复

重演，而唐代辨才敢冒欺君之罪，藏匿《兰亭序》的事情也不复再现。康熙十六年八月，国子监祭酒冯源济将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墨迹二十四字装成册页，进献皇上，奏称“此帖乃王羲之所出真迹，臣父素所珍藏。今皇上留心翰墨，臣不敢收藏此帖，愿进御览”。康熙收览后传谕冯源济说：“朕万几之暇，笃好读书临贴。常临王羲之字，素谓此贴甚善。今睹所献真迹更佳，朕心喜悦，赐以表里各八端，将此贴留览”。

数月后，康熙为王羲之曹娥碑真迹作跋，他写道：“曹娥碑相传为晋右军将军王羲之得意书。今睹真迹，笔势清圆秀劲，众美兼备，古来楷法之精未有与之匹者。至今千余年，神采生动，透出绢素之外。朕万几余暇，披玩摹仿，觉晋人风味，宛在几案间，因书数言识之”。

仅有二十几字《快雪时晴贴》传至乾隆手中，益加受到珍爱，乾隆将此贴与王献之的《中秋贴》、王珣的《伯远贴》，藏于养心殿西室，此室因这三件珍宝而得名“三希堂”。弘历在六十多年中不停地玩味《快雪时晴贴》，反复为之题跋，据统计，他对此帖竟作过七十三次题跋。

乾隆皇帝一生精力极为充沛，加之寿长，在人间留下了许多墨迹，其数量之多，创历代皇帝之最。神州到处都可以见到乾隆御笔。不过，大量的墨迹中也有一些是精于书法的文臣代作的。弘历曾学大臣张华亭（即张照）的笔体，而一些御题的碑铭，是由张华亭直接代书的——“寺里石碑称御笔，精神姿态是华亭”。从筋骨中可分辨御笔的真伪，但一一分辨也非易事。

精力充沛的乾隆皇帝过着富足的风雅生活，诗、书以外，对于绘画的兴趣亦甚浓厚，他所做的更多的是搜集、玩赏历代名画，组织宫廷画士从事绘画创作。弘历本人也能提笔作画，其作品有《烟波钓艇图》、《竹溪雪意》、《岁朝图》、《春蔬图》、《梅花》、《四友图》等等。他的画作与画士们的相比算不上精品，但好为人师的帝王心理，使他在画士们面前常摆出导师姿态，如意馆是画士们作画的地方，弘历常察看他们的工作，见有用笔草率者，辄亲手指教，遇这种情况，该画师极感荣幸，旁人也钦羨不已。

